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斯



大

政

林

治

[英]艾萨克·多依彻著
于 干 译

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

记

4



200008071

50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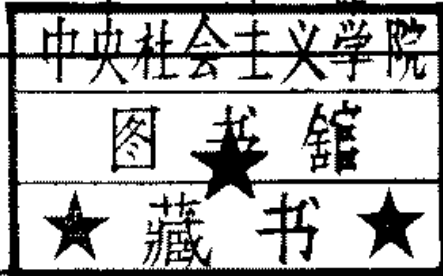
11780/30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斯大林政治传记

[英]艾萨克·多依彻著

于 于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斯大林政治传记〔英〕艾萨克·多依彻著 于干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 插页 4 字数 537 千
1982 年 11 月第一版 198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书号: 11118·101 (内部发行) 定价: 2.27 元

第二版序言

《斯大林政治传记》这一版是在该书写成约二十年后出版的。当1948年夏季我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斯大林尚处于权力的顶峰，为全世界所钦佩和恐惧，并在他的国内受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崇拜”。当时世界的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苏联还不是一个核大国；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还颇有一段距离；而斯大林同铁托的破裂刚刚才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我在该书的最后谈到了对斯大林的估价：

到此我们就暂时停止叙述斯大林的生平和工作。我们并不幻想能够从中得出最后结论，或者根据它来对这个人以及他的成就和失败作出肯定的判断。在经历了这样多的高潮和低潮之后，他的戏剧似乎现在才达到了顶点；而我们不知道这最后一幕将比前几幕有什么新的景象。

现在我这本书新增加的一个部分（即关于斯大林最后岁月的补篇），就是叙述这“最后一幕”的。1948年以后，我书中的这位主角的戏剧的确达到了最高潮，终于导致了随后斯大林崇拜的崩溃。但是我对斯大林作用的估价，现在看来也许有点过于谨慎了，因为斯大林晚年的活动和行为，对于他先前的记录并没有提

供任何新的景象，而只不过使我已经描绘过的景象轮廓更加鲜明而已。当时我在书的结束部分已经预见到所谓的非斯大林化。

我经常被问道，根据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在1956年二十大和以后的“揭露”，是不是有必要对我的观点进行修正。说实在的，对于我在本书中谈到的斯大林掌权的经过，他同列宁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关系，他在内战时期的政策，他对大清洗的指挥，以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作用，那些揭露并没有增加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在斯大林生平的所有这些重要阶段，本书所提供的材料比苏联读者迄今能够看到的要丰富得多。因此可以顺便说一下，我的这本《斯大林政治传记》在苏联、中国和东欧各国仍然是一本禁书。

我也不完全相信赫鲁晓夫的“揭露”，特别是不能接受他这样的断言，说什么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断言显然意在贬低斯大林而吹捧赫鲁晓夫自己。它同许多可靠的目击者的证言是不符合的。这些目击者有西方的政治家和将军，他们是没有理由故意夸大斯大林的作用的；也有苏联的一些将军，他们最近在这个题目上以一种严肃而带有批判性的语调写了一些东西。

根据赫鲁晓夫的揭露，斯大林的活动只有一个方面对我来说似乎是更清楚了，这就是斯大林镇压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以及牺牲他的追随者斯大林分子的规模和程度。在本书新增加的一章中，我分析了这一重要事实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阶段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赫鲁晓夫一班人实行非斯大林化的性质和作风。除此以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对斯

大林生平的叙述和解释。同本书的第一版比较，我在这儿只作了极少的改动和文字上的润色。

艾·多

1966.10.11.

导 言 （1961年）

我在十三年到十四年前写的这本传记，其对象是一般的读者，而不是专家，而且我尽可能平易而无争论地叙述有关斯大林及其事业的一些重要事实。当我开始计划这部著作时，这个国家的公众和报刊还没有完全克服战时对斯大林的奉承；而当我最后完成它的时候，柏林空运的机声正在吼叫，斯大林已成为冷战中的恶人。我认为，政治气候中的这些剧烈变化并没有影响我对斯大林的论述，因为我从来就不是崇拜斯大林的信徒；而冷战也不是我要从事的战争。不过，书出版后不久，一个英国评论家就写道：“就象它的题目一样，这本书已经变成热烈的和有时是凶猛的争论焦点……近年来还没有过一本传记引起这样的兴趣和招致这样激烈的怨恨及敌视。”我也许还可以补充说一下，大多数的英国评论家对待这本书还是坦率而大度的——不过，“凶猛的争论”事实上的确进行了许多年，特别是在大西洋两岸的外国。

对于这本书是毁誉交加，众说纷纭：有的人把它当成对斯大林主义的谴责，有的人把它当成为它进行的辩护，而有时一些人又把它当成既是谴责又是辩护。因此，已故的摩西·皮雅杰（铁托元帅的朋友和同事）有一次曾向我解释他的政府为何不准出版《斯大林政治传记》的南斯拉夫版。他说：“你看，你

的书毛病就出在，当我们同俄国人争吵时，它对我们来说是太亲苏了；而当我们想同他们友好时，它又太反苏了。”（他还眨巴着眼睛补充说：“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允许出南斯拉夫版，因为如果我们出版了它，任何人都会立即看出，我们的那些大理论家是从什么地方吸取他们大半的智慧。”）

按照肖像画的一条古老的金科玉律，一幅好的肖像画，要表达出人类性格的复杂性，使观者能够从画上看到不同的面孔。对于这条规律也许还可以加以评论；但如果按照它来判断，《斯大林政治传记》可以说还描绘的不错。不论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评论家，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幅肖像中找得他所想找的东西和读到他愿意读到的东西。我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性格的高度复杂性；在我描绘的这幅画像中，斯大林从正面来看是列宁的子孙，从侧面来看却是伊凡雷帝的子孙。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却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我承认，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要努力做到的是老式的客观主义；而我也必须承认，客观主义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因此我必须努力以赴。对我来说，最容易不过的是写成一本谴责性的斯大林传记，因为差不多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已经反对斯大林主义；还在强迫集体化正在进行时，我就谴责过它的残暴（不象我的某些批评者那样，他们是在事件发生后二十或二十五年才来谴责它）；至少从1931年起，我就严厉地批评斯大林的政策方便了纳粹的兴起；我揭露了大规模恐怖、清洗和当时正在上演的莫斯科审讯；等等，等等。简言之，我是一个“早熟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如果我打算把过去近二十年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那些东西简单地重复一下，那末我写成的书就不会有人批评它是为斯大林辩护了。

但是，我决心不从智力惯性出发来写这本书。对于这个我十分熟悉的研究题目，我决定采取一种新的和批判的观点。有的评论者说我探讨斯大林时“冷静而不动个人感情”。其实，这本书的写作深深地牵涉到我个人的经历，我并借此机会默默地反省和批判地回顾我自己的政治记录。我曾经是被斯大林残酷击败的那些人中的一员，因此我不得不问我自己：他为什么得到这样的成功。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党派观念的人就必须变成历史学家，平心静气地检查原因和结果，坦率地观察对手的动机，看到并承认对手力量之所在。如果仅仅因为形势的某些因素和机会尚未被认识和决定，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的行动对于特定形势的影响尚在未定之天，一个政治战士是不容许对自己在其中活动的形势持极为严重的决定论观点的。相反，历史学家不能不是决定论者，或者装成决定论者，因为除非他指明原因和结果是如此紧密而自然地交织在事件中，已经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也就是说，除非他指出他所涉及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那末他就没有充分完成自己的任务。有党派观念的人要对付的是变动不定的环境，因为在一切方面，人们尚在行使冲突的意志，集结力量，使用武器，实现或者推翻决定。历史学家对付的却是事件的固定而不可逆转的格局，因为一切武器都已使用过了，一切意志力都已用尽了，一切决定都已实现了，不可逆转的东西就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了。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探讨，这就说明了贯串本书的那种争论很多的不可避免性的含意。作为一个有党派观念的人，我否定了我的主角的许多行为；而作为传记作者，我又指出它们的不可避免性。然而这种矛盾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在这两方面，

我都是从相同的哲学-政治前提出发来辩论的，所不同的和部分矛盾的只是观察的角度。

对我的方法执异议显然是有足够理由的。当我发表《斯大林政治传记》时，其中所叙述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和变成不可逆转的事。比如，仍然可能象西方一些重要政治家和评论家所预期的，苏联的力量将从东欧“滚出去”；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苏联工业的进展将会停滞下来，等等。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东欧战后的革命尚在进行中，我就把它们说成是不可逆转的；战争刚刚结束，苏联大半还是一片废墟时，我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苏联的工业将持续上升。我应该承认，在作出这些政治判断和预言时，我是冒险的，因为许多历史学家对此都是避而不答的。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读者们将会原谅我在这方面的冒失，而在判断我提出的一些明确的和含蓄的预言时，他们将会考虑它们是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还有另一种批评可以在此重复一下。这种批评说，由于我把斯大林的胜利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我毕竟是在为他的记录进行辩护。这一批评暗示，明智的人总是或总应该是甘心于不可避免的事的。我不同意这种暗示。人类历史中某些最可以骄傲的阶段，就是当他们同不可避免的事物进行斗争的时候；而且他们的斗争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宣称“存在即合理”的那位哲学家，也曾认为“合理即存在”。历史的过程是在现实和必要的深浅不同的水平上进行着的。这一代俄国革命者在抵抗斯大林的专制中毁灭了，这至少说明他们做的事正是一种历史的必要，只不过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罢了。也许我可以提醒一下批评者们，在指出“斯大林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和探讨了它的消极

和积极方面之后，我差不多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著名揭露八年以前，就已在书末着重地预告了非斯大林化的“不可避免性”。我说过：“……历史还不得不严格地净化和重整斯大林的事业，就如它曾经净化和重整克伦威尔以后的英国革命和拿破仑以后的法国一样。”

这一版《斯大林政治传记》同第一版一样，没有什么改动。如果我要重新写这本书的话，我很可能要用不同的文体。但是尽管在细节上会有不同，着重点会有改变，我认为最好现在还是从整体上维持它的原状。这本书多年以来已成为广泛而热烈争论的目标，这一事实很可能已使它的原本成为某种文件似的东西，因而即使是它的作者也不愿意把它修改了。因此，整个来说，我坚持本书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不变。

这部传记最初是打算作为包括列宁生平和托洛茨基生平在内的三部曲的一部。我这个三部曲的写作仍在进行中；但是对托洛茨基研究中的两卷，即《武装的预言家》和《解除武装的预言家》已经出版，第三卷很快也将完成。这一工作的原定计划就是，某些叙述和解释的部分，在三部曲的一部中只是半展开，而在另一部中将予以补充、扩大和突出。即使如此，《斯大林政治传记》却是一部独立的作品，它过去是、今后也还是可以独立地加以阅读的。三部曲其余部分中的知识，将使读者们对本书的主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艾·多

1961.4.24.

第一版序言

这本书对于斯大林生平的叙述，有点模模糊糊地终止于1945—1946年。这是作者目前所能做到的，因为最近两三年斯大林所起的作用，没有看到什么文件可以作为根据。但是我希望，本书最后几章将对斯大林在战后的情况有所说明。就在不久以前，要把他的事迹叙述到1938年或1939年以后，几乎还是不可能的。幸好最近发表了一些官方文件以及西方国家部长和将军们的战时回忆录，使我的工作容易多了。但是，苏联却没有发表过可资比较的文件或战时回忆录。作者在企图考虑斯大林的正反两面情况时，却发现只有丘吉尔、赫尔、贝尔纳斯、哈里·霍普金斯、白宫文件等单方面的证据。作者在另一方几乎没有发现什么材料，只除了极少数由半官方透露出来的歪曲了的片言只语，其中令人十分惊奇地竟然包括了诸如维尔塔的《斯大林格勒大战》电影剧本。这是迄今为止的唯一渠道，苏联领导人通过它，把那些伟大年代的极少的内幕情况告诉他们的人民。历史女神克莱娥还没有获准进入克里姆林宫。

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最大和最英勇牺牲的国家，竟然只被允许知道有关它的外交、军事和政治背景的最少情况，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悲叹的怪事。西方的作家和回忆录作者自然是根据他们特殊的民族和政治观点来叙述的，因此我希望在

使用他们的证据时，我已经充分地考虑了那些不可避免的偏见。但是那些著作中观点和判断的千差万别，本身就成为估价其相对可靠性的手段；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在有关斯大林作用的说明方面，其重要事实、甚至细微末节，他们的叙述都是十分一致的。除此之外，我还利用了一些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和政治家亲口告诉我的印象和情况（它们涉及斯大林生平的这一时期和其他时期），以补文件资料的不足。这些人属于很多民族，持有互相矛盾的观点，他们在不同的时机接触到了斯大林。对于这些人，我要姑隐其名，并对他们表示谢忱。

我理应把这一作品称为政治传记。我承认，我是倾向于研究著名人物的政治活动而不是个人私事的。而且除了这一原因以外，想要叙述斯大林的私生活，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比如他唯一的一封私人信件曾载于他的姨妹 A.S.阿利卢耶娃的书中，而这本书却遭到禁止发行的命运。差不多所有想研究斯大林生活这一方面的传记家，或者是对此无话可说，或者不得不满足于不能证实的传闻。象托洛茨基这样精明的观察家和著名的作家，同斯大林在政治局中相处了近十年之久，他也不能免于这种通病。

至于斯大林生平的初期和中期，到不缺乏文字材料，但它又太丰富和太矛盾了，以致使得传记作者感到苦恼。斯大林的生平就象一张大羊皮纸，其上重重叠叠地写着许多笔迹，起迄日期不同，书体不同，对事件的说法也不同。甚至斯大林的亲笔也是如此明显地矛盾。我相信这本书的读者将在其中找到对这种奇怪情况的解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注视着这张羊皮纸的情况，现在我又再一次逐条地考察了它，对于互相矛盾的说法

加以比较、核实和互证。我在本书中提出了我的发现。但是，我不想把我据之得出结论的对复杂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的材料堆砌其中。我可以肯定，这样做是会使读者十分厌烦的。然而，学者和专家将在本书的脚注中找到必要的线索，我在这些脚注中经常把对斯大林敌视和友好的材料来源一并注出。

本书原打算作为传记性三部曲的头一部分，其余两部分是《列宁生平》和《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关于1917年以前的布尔什维主义以及诸如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无产阶级先锋队”等思想历史的主要研究，当然应该放在列宁的传记中。在目前的这本书中，对于这些思想的成长和演变情况，只是在为了理解主角的必要情况下才简略地提及。《斯大林政治传记》的主要部分自然是讨论十月革命和内战以来的布尔什维主义观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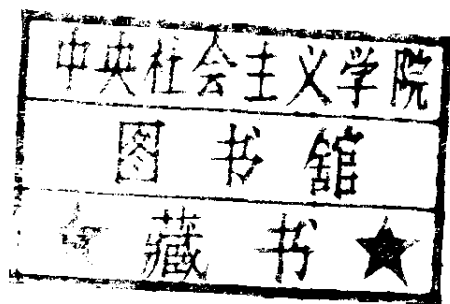
（下面略去两段表示感谢别人和妻子的话。）

艾·多

目 录

0780/30

第二版序言	1
导 言(1961年)	4
第一版序言	9
第 一 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	1
第 二 章 地下社会主义者	32
第 三 章 总演习	58
第 四 章 柯巴变成了斯大林	108
第 五 章 1917年	149
第 六 章 斯大林在内战中	199
第 七 章 总书记	260
第 八 章 “大转变”	337
第 九 章 渴望权力的诸神	395
第 十 章 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一)(1923—1933年)	443
第 十 一 章 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二)(1934—1941年)	476
第 十 二 章 大元帅	530
第 十 三 章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573
第 十 四 章 胜利的辩证法	629
第 十 五 章 补篇：斯大林的最后岁月	653
译者的话	719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

斯大林的父母：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和叶卡特林娜·格拉泽——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后来的斯大林）在格鲁吉亚（高加索）哥里城出生（1879年），度过童年和学校时代。——格鲁吉亚民间传说的影响。——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1894年至1899年斯大林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格鲁吉亚人反俄罗斯化的斗争。——斯大林以“小乔”为名在1895年发表诗文。——秘密读书会。——1898年参加“麦撒墨达西”（第三集团）。——高加索的产业暴动。——作为社会主义演讲实习生的斯大林。——他被开除出正教中学。——农奴制的烙印。

也许在1875年，也许在此以前的一二年，一个年轻的高加索人维萨里昂·伊凡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离开了高加索首府梯弗里斯附近的吉第里洛村，定居于格鲁吉亚的一个小城镇哥里。他在那儿开始了小鞋匠的营生。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格鲁吉亚农民的儿子，这些农民仅仅在十年以前还是农奴。他生下来就是某个格鲁吉亚地主的奴隶。如果他一生都是奴隶的话，就绝对不会自由地离开他的故乡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工匠。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祖先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他们被固定在土地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一个地主

的手里转到另一个地主的手里。甚至在维萨里昂童年的时候，格鲁吉亚的报纸上还登载着一些广告，说明地主出售或求购“五百或一千亩土地和五十或一百五十名农奴”。奴隶买卖经常是欺骗性的；格鲁吉亚法院的档案中，有一些案件曾记录着，同一个农民家庭曾同时出售给三个或更多的买主。^①

维萨里昂当时必定是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离开他的村子的。他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了，而且这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工匠，他希望能够挣得一些财产。在哥里，他和出身同样微寒的一个女孩子叶卡特林娜结婚，她是汉巴勒乌里村农奴格奥尔基·格拉泽的女儿。就象许多贫苦农民的女儿一样，她迁移到城镇，成为某个亚美尼亚或俄罗斯资产阶级家庭的女仆。（高加索的资产阶级是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差不多还没有格鲁吉亚的资产阶级，格鲁吉亚人或者是乡绅或者是农奴。）叶卡特林娜同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结婚时才十五岁。在一个人类成熟就象在亚热带阳光下葡萄成熟一样快的地方，这种早婚是并不罕见的。这两口子在哥里郊区租了一间破房子，月租是一个半卢布（约合两个先令）。它只有一间厨房和另一间住屋。那间住屋不到五个平方码，很潮湿，从一个小窗子透进微弱的光线。它的门直接开向单调乏味的院子，而由于屋子的地面同院子一样平，没有台阶隔开，一到雨天，泥水就从院子往房子里灌。地面是砖铺的，全部的家俱就是一张小桌、一个凳子、一张沙发，一张木板床，上面铺着稿荐。^②朱加施维里一家的住宅现

① 弗·马哈拉泽《十九世纪的格鲁吉亚》，载《全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第1卷，第488页。

② E·雅罗斯拉夫斯基：《斯大林一生中的里程碑》，第7页。

在已经变成一座纪念馆，供游览该地的旅游者参观。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小作坊，连同其中摇摇晃晃的旧椅子、钉锤和槌头也供人参观。

就是在那间一个半卢布租金的暗淡无光的屋子里，叶卡特林娜从1875年到1878年之间生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就死了。叶卡特林娜差不多二十岁时，于1879年12月21日生了第四个孩子。由于命运的恶作剧，这个孩子成长为一个健康、强壮和固执的男孩。受洗时被赐约瑟夫之名；这样，东正教的地方神甫（他还代理户籍员）就登记下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在这个世界上的出现，后来他以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而烜赫于世。

关于他的幼年情况，外间所知极少。在六岁或七岁时，他染上了天花，面部留下了麻子。由于左手长疮，血液被感染，他第二次病倒了。他后来回忆说，他差一点就死了。他曾告诉他的姨妹A.S.阿利卢耶娃说：“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救了我：是我强壮的体格还是乡下郎中的膏药。”当他康复以后，左胳膊就不容易弯曲。由于这点微疾，这位未来的大元帅在1916年被宣布免役。^①

他在生以俱来的悲惨和贫穷的环境里长大。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曾经企图爬上资产阶级下层的阶梯上去，但没有成功。他的鞋匠营生不足以糊口；因此他的妻子“必须日夜辛劳来弥

^① A·S·阿利卢耶娃：《回忆录》，第167页。

补家用……而且不得不出外做洗衣妇”。^① 甚至一个半卢布的房租也要用她的收入去付。有些斯大林的传记作者据此推断说，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必定是把他挣得的一点点钱花在伏特加上了，这个结论在斯大林同学的回忆录中倒是可以找到一些根据。^② 酗酒的确象是鞋匠的职业病——大多数东欧语言中都有这一句俗话：“醉得象个鞋匠”。回忆录还进一步说，维萨里昂对他的老婆和孩子很凶恶。斯大林童年时的一个朋友伊雷马什维里写道：“无端而可怕的殴打，使这个孩子变得象他的父亲一样地冷酷无情。”他对付父亲残酷行为的办法就是：猜疑、机警、逃避、装假和忍耐。生活早就给他一些教训（还有一些斗争策略），这些在以后是有用的。

酒鬼和暴徒的形象对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来说也许不完全公平。他必定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品质，一种进取的精神和对世界的好奇心。不然的话，他一个农奴的儿子，怕不会把他在本乡的懒散生活去换取城市的不安定生活。在东欧，“鞋匠哲学家”和“酗酒的鞋匠”都是民间的谚语。这两句谚语形容那种往往是兼而有之的职业癖好。情况也许是，斯大林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一种沉思的头脑。他自己在无意之间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去了解他父亲的内心矛盾。这种矛盾使得他的父亲对他的家庭变得阴沉、恶毒和凶狠。维萨里昂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工匠，就离开了哥里城和他的家庭，到梯夫里斯去。他在那儿成为某个阿德里汉诺夫鞋厂的工人。他的这一新地位显然是屈辱的，因为他的雄心是自己成为主人，而现在他却从一个农

① E·雅罗斯拉夫斯基前引书，第7页。

② 列·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6—7页。

奴变成了一个雇佣奴隶。他尽力同命运搏斗，甚至不去养家糊口。也许他因此才容易发怒和冒火。在早期的一本小册子里，斯大林用他父亲的经历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点。他写道：“假定有一个鞋匠开了一个小鞋铺，因为竞争不过大厂主，结果只好关门，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厂老板阿德里汉诺夫那里当雇佣工人去。他进阿德里汉诺夫的工厂，并不是想永远当个雇佣工人而是想积些钱，凑一笔资本，再开自己的鞋铺。可见这个鞋匠的地位虽然**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地位**，但他的意识**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意识。”^①这个鞋匠无疑地是作者用来说明其论点的例证。小鞋铺，生意不佳，甚至雇主的名字，这一切都是维萨里昂故事的组成部分。使维萨里昂心里感到别扭的就是他的社会地位同他的“小资产阶级”野心之间的冲突。

维萨里昂并没有能够“凑一笔资本”并重开他的铺子。他1890年死于梯弗里斯，那时他的儿子才十一岁。他的去世可能没有影响到这个家庭的物质条件，因为那位寡居的洗衣妇照样要去挣钱养活她自己和她的儿子。后来，在约瑟夫的心里，那个死者的形象已经模糊了——他几乎从未提及他的父亲。当然，对“无情殴打”的回忆，也许能说明斯大林及其传记的官方作者为什么对维萨里昂保持极端的沉默。^②

对叶卡特林娜·朱加施维里的情况知道的就更多一些。她和她同时代的广大妇女并没有什么区别。俄罗斯的诗人们曾经写道：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9页。（本书的马恩列斯著作引文，均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译者）

② 阿利卢耶娃的回忆录中，包含了许多关于斯大林及其母亲的生活情况，但从未提及他的父亲。

命运已经为她们准备了三种考验，
第一种是同一个奴隶结婚；
第二种是成为这个奴隶的儿子的母亲；
第三种是终生依顺这个奴隶。
所有这些可怕的考验
困扰着俄罗斯大地的妇女。

叶卡特林娜具有东方农妇无限忍耐和驯顺的性格。她坚毅地忍受命运的折磨，对她的丈夫毫无怨言。她百般爱抚她唯一活着的儿子。她深信宗教，在困苦的生活中把教堂视为唯一的慰藉。她也不识字，只是在老年的时候，才学习阅读，因而证明她自己是配得上她那出名的儿子的。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一致称赞她“娴静、端庄，在长期的痛苦生活之后，尚能如此待人接物，而没有改变她的性格”。^①甚至在她的儿子高升之后，这位凯特大娘仍然是一个谦逊朴实的农村妇女。她有一个时候同她儿子住在克里姆林宫里，但却渴望着返回较为熟悉的阳光明媚的高加索环境中去，并且后来果然返回那里。不过，她还是以半喜剧性的生动方式，努力去起到作为这位伟大人物母亲的作用。阿利卢耶娃有一次在高加索的波热姆温泉碰到这位朱加施维里老太太，尽管天气酷热，这位老太太却穿着一身厚重而严肃的黑色衣服。当问她为何穿得这样不舒服时，这位老妇人答道：“我不得不这样。……你没有看到，这儿周围的人都认识我是谁。”^②

① 阿利卢耶娃上引书，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82页。

就叶卡特林娜而言，把年仅九岁的孩子送到哥里的正教学学校去，这的确是一个英明果断的决定。象这样年纪的穷苦孩子，成为鞋匠或木匠的学徒，这并不是罕见的事。但是叶卡特林娜并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干这种营生，即使这可能影响到她的命运。她要她的梭索^①继续维萨里昂已经失败的事业，并使自己的地位提高到他的寒微的父母之上。在她联翩的浮想之中，无疑地愿意他成为一个受周围人们尊敬的教区神甫。这个前景是灿烂的，因为仅仅在几年之前，正教学学校对农民的孩子还是紧闭大门的。

从1888年到1893年，梭索在哥里的学校里学习了五年。他通常都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之一，甚至是最好的一个学生。教师和同学都很快注意到，这个贫苦的麻皮孩子异常聪颖，学习功课几乎不费什么劲。他们也注意到，他有点任性，喜欢出人头地。他越想这样做，就越意识到他的大多数同学都来自更富裕的家庭；而他的一些同学也发觉这一区别，并看不起他。无论如何，他在班上却有一种优越之处，就是比起那些出身于葡萄酒或小麦商人的纨绔子弟，他能够更轻松地朗诵课文。在操场上，他的敏捷和胆量大大超过他们，因而大家都听命于这个鞋匠的孩子。正是在这所暗淡无光的教区学校里，未来的斯大林第一次了解了阶级区别和阶级仇恨。

也是在这所学校里，他第一次领略了那个在他成年以后一心一意研究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格鲁吉亚语是朱加施维里的民族语言。叶卡特林娜根本不会说俄语，她的丈夫不知道会

^① 梭索在格鲁吉亚语中就是乔。梭赛罗是更进一步的爱称。

不会说一点点。学校中的大多数功课都是用俄语教的，课程表中规定每周只有很少几节课用格鲁吉亚语教。梭索在他这样年纪时，自然很容易地吸收了这种外来语言。但是出了学校和在家里，他继续讲格鲁吉亚语。他的一些同学的民族语言是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或高加索方言。在学校里，所有的地方语都听不到了，俄语统治了一切。政府强迫实行的俄罗斯化，弄得怨声载道。甚至十多岁的孩子也举行罢课和示威，捍卫他们的民族语言。在七十年代，格鲁吉亚经常发生学潮。俄罗斯族的教员遭到袭击和殴打，学生甚至放火烧学校。^①朱加施维里在哥里学校上学的那几年里，没有闹过这样的学潮，但必定到处都有压抑着的愤怒之火。

在他生活的早期影响中，本地的自然、传统和民间传说都发生过作用。哥里位于盛产小麦和葡萄的三条河谷汇合处。城外的悬崖峭壁，库拉河两岸和另外两条河流，拜占庭古堡的墙垣，城内羊肠小道之间的田野，半农村半城镇的气氛，这一切都给这个孩子充分的空间，使他能够自由玩耍和逃避单调乏味的家庭。大自然本身多少补偿了这个贫民区孩子家庭生活的无聊和烦闷。乡间充满了野兽、鸟类、植物和果实——无怪有人认为这就是金羊毛之乡^②了。这些有益身心的环境，使未来的斯大林具有一副强壮的体格。乡间也广泛地流传着丰富的故事和传说。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都曾经在那儿打过仗。教科书上记载着波斯和土耳其入侵的故事。民歌和民间故事记述着著名的高加索强盗。在民间传说中，这些强盗常常是民族的

① 《外高加索阶级斗争史》第1卷，附录，第89—90页。

② 希腊神话中的宝地。——译者

或人民的英雄，如反抗俄国沙皇的格鲁吉亚贵族，农奴的领袖，人民的复仇者。他们对贫穷的和受蹂躏的人宽大厚道，对富人却十分憎恨。他们隐藏在雪峰和山洞里，突然冲到大路上，捕杀敌人。所有这些民间传说离事实都不太远，哥里周围甚至在斯大林上学的那些日子里还有拦路强盗出没。周围还有许多穷困的格鲁吉亚小乡绅，他们没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和固定收入，但在精神上仍然生活于氏族和采邑的逝去的世界中。他们彼此之间经常进行一些奇怪的袭击，或者是袭击偶然伤害了他们自尊心的人，不然就是袭击招惹他们敌意的人。于是整个地区就传播着袭击和辉煌事迹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近乎强盗的活动，但却不无罗曼蒂克的魅力。这些当地的“罗宾汉”^①提供了学习的榜样，那些在哥里的悬崖和田野中玩“强盗游戏”的孩子们，必定是热中于模仿他们的。

因此，对年轻的朱加施维里说来，在哥里的五年学校生活并不完全是不愉快的。不过他已开始意识到社会和不平等，使他在日后成为叛逆者和革命者。当然还不能说这种意识有多么强烈。苏联官方传记和回忆录作者宣称，他们的英雄在哥里时已经读过达尔文的著作，并且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人们可以怀疑，他这样的小小年纪，是否就能够读达尔文的著作。但他也许是从一些通俗的概要中获得了对这一新理论的模糊概念的，他的思想也许已经转而反对宗教了。他的早慧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在1895年，即他仅仅离开哥里学校一年以后，他已经在格鲁吉亚一家主要刊物上发表了诗文。他必定在

^① 中世纪时英国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译者

哥里时就已经试着写了一些诗歌。他的官方传记作者还宣称，就是在那里，他已经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了。这看来是很不可能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外高加索的首府梯弗里斯才只有少数几个人信奉马克思主义，它的影响几乎还不可能传播到哥里学校去。^① 斯大林的辩护士们仅仅是急于说明，他在童年时就已经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正统派了。随后的事情似乎不过是证明下面的假设：年轻的朱加施维里怀着某种叛逆的情绪离开了哥里学校，这种叛逆情绪是抗议社会的不公正，并夹杂着半罗曼蒂克的格鲁吉亚爱国主义。当他进入高年级时，格鲁吉亚诗歌中怀旧的民族主义对他的影响，大大超过任何社会学思想对他的影响。他的一个同学瓦诺·克泽霍越里写道：“在哥里学校高年级时，我们熟悉了格鲁吉亚文学，但没有导师来指导我们的发展和明确我们的思想方向。恰夫恰瓦泽的诗《强盗卡科》给我们印象很深刻。卡茨贝格的英雄在我们年轻的心灵中唤起了对祖国的热爱，在离开学校时，我们每个人都热切地想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对服务的形式有明确的概念。”^② 由于朱加施维里对他的老师小心地隐瞒了自己的叛逆情绪，他们把他当作一个模范学生，并帮助他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业。

第二阶段就是他于1894年秋进入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学习。他的母亲的梦想似乎就要实现了。作为一个穷苦的洗衣妇，她是无力供给他进入中学的，哥里学校的校长和本地神甫帮助他

① 贝利亚：《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第11页；马哈拉泽：《格鲁吉亚工人运动史》，第114—128页；阿尔科梅德：《高加索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第49—50页。

② 雅罗斯拉夫斯基前引书，第9—10页。

获得了奖学金。这个前途无量的孩子由于前程似锦，必定感到欢欣鼓舞。从梦幻一般的农村小镇转移到鳞次栉比而又喧嚣热闹的高加索首府，仅仅是这一变化就令人眼花缭乱。他十五岁了，已经成熟到足以理解他的新地位的优越性。就在不久以前，这种优越性还不是一个农民孩子所能企及的。他走了四十英里到梯弗里斯去，兴高采烈地感到他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比之于二十多年前诱使他父亲离开吉第里洛村到哥里去的目的，这一次是更为现实的。

* * *

他从1894年10月到1899年5月一直在正教中学学习。对他的智力发展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形成年代。这时还有哪些更为主要的影响形成他的思想呢？

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有两个问题激动了格鲁吉亚的社会：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关系；高加索废除农奴制的影响。

整个这一世纪中，沙皇俄国都从事于征服高加索和巩固其征服物。从1783年起，格鲁吉亚就已成为俄罗斯的属国，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格鲁吉亚人的命运从某些方面来说同波兰人的相似。但不同的是，波兰人每一代都举行武装起义来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格鲁吉亚人则从未认真地企图摆脱俄国。他们怀有反俄的情绪，但对民族自立的愿望却比较淡薄。由于他们意识到，格鲁吉亚毕竟没有什么机会来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且在所有可能的征服者中，俄国还是最不可怕的，所以他们对俄国的抱怨就缓和下来了。当土耳其和波斯威胁着要征服格鲁吉亚

时,最后一个格鲁吉亚君主就投降了俄国沙皇。宗教的考虑也决定了这一选择,因为格鲁吉亚人也象俄罗斯人一样地信奉东正教。^①在俄国人眼里,高加索是反对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军事堡垒,其重要性仅次于多瑙河诸国。俄国在高加索修筑了大规模的军事公路,然后又修筑了铁路网,因而刺激了这一地区的工业发展。这是俄国既统治又赎罪的特点。

另一个问题就是俄国文化对格鲁吉亚的影响。格鲁吉亚的古代文明比俄罗斯的还要古老,格鲁吉亚人虽然以此自傲,但他们的观点却是一种东方半氏族和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同格鲁吉亚相反,俄国却是欧洲的观点。历史学家 G·恰恰普里泽写道:“在西欧、特别是俄国文明的影响之下,欧洲的风俗习惯渗透到格鲁吉亚上层阶级的生活中去。”^②沙皇的政策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它拚命要使这个国家俄罗斯化;另一方面,它又企图确保格鲁吉亚乡绅和教士的忠诚。格鲁吉亚最后一个王朝被放逐到中俄或西伯利亚;但是被放逐的君王的儿子们,却被允许在圣彼得堡为他们的人民从事有益的文化工作。其中的一些人,比如巴格拉梯阿尼弟兄,就成为格鲁吉亚“开明人士”的代言人,把许多欧洲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格鲁吉亚文,并使俄国

① 格鲁吉亚作家、最著名的民族主义自由派领袖伊利亚·恰夫恰瓦泽于1899年总结俄国统治一个世纪的经验说:“没有别的出路,格奥尔基二世(东格鲁吉亚最后一个君主)为了拯救格鲁吉亚,不得不依靠土耳其、伊朗或俄国。……他不得不迅速作出选择。格奥尔基自然转向同教的俄国。这是他执行先辈的意志,从1491年以来,他们就不断地同俄国交涉,希望获得它的支持。”转引自恰恰普里泽《十九世纪的格鲁吉亚和俄国》一文,载《历史问题》1946年第5—6期。

② 恰恰普里泽:《十九世纪的格鲁吉亚和俄国》,载《历史问题》1946年第5—6期。

社会熟悉了格鲁吉亚的文学和历史。沙皇尼古拉一世甚至任命泰穆拉茨·巴格拉梯阿尼为皇家科学院的名誉院士。

同这些影响相平行的是，俄国的革命思想也传播到了高加索。为沙皇征服这一地区的是叶尔莫洛夫将军，即1812年波罗金诺战役的英雄。这位“高加索代总督”表现出有些倾向于“十二月党人”（1825年12月发生于圣彼得堡的自由派起义领袖）。他庇护了同反叛者有牵连的一些大作家，如普希金、格里鲍耶陀夫（他的部长和政治顾问）、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等人。参加起义的一整团人被放逐到高加索；其中有许多被开除的知识分子军官作为士兵在服役。这些被放逐者同少数有教养的格鲁吉亚人保持联系，并强烈地影响他们。当然，他们同情格鲁吉亚人的爱国主义，甚至比他们格鲁吉亚朋友还要进步，鼓吹格鲁吉亚农民的解放。

这些早期的接触，为俄国自由和革命思想的继续影响准备了基础。正是沙皇自己，虽非出于自愿，但却极大地帮助了这种影响，因为他选择高加索作为一个政治犯的流放地。在每一代人里，新的俄国革命者和新的思想都出现在梯弗里斯、库泰依斯等地。这一世纪前期的那些军队反叛者和作家的事业，由从俄国贵族和官员出身的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者）继承了下来。后来则有波兰的起义者和俄国的恐怖主义者。到了这一世纪末，又产生了完全新型的一代革命者，他们就是从中俄放逐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工厂工人，其中有未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者、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岳父塞尔哥·阿利卢耶夫。

当俄国反对派把先进思想输入高加索时，沙皇们为了战略

利益，力图把这个国家保持在落后的状态中。^①在俄国，农奴制度是在1861年废除的。格鲁吉亚农民的解放一直拖延到1864—1869年，甚至在这以后，即在1912年以前，农奴制度还在格鲁吉亚以“临时劳役”的形式苟延残喘着。俄国行政当局渴望保持格鲁吉亚乡绅的支持，延迟了改革。只是在俄国农民解放的消息已经传到高加索乡间时，它才被迫着手进行这件事。当时农奴有一触即发之势，而且鉴于他们有很长的起义纪录，再拖延他们的解放是太危险了。^②但是改革对地主非常有利，甚至超过了俄国的情况。农民们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他们作为农奴时所拥有的土地，差不多有一半被拿走了。他们还必须为被允许留下的土地交付完全超过他们财力的补偿金。现在农民对地主的经济依附表现为：或者象美国废奴后南方实行的分成制，或者订立“临时劳役”的协议。迟至1911年，一个对沙皇制决无敌意的权威方面还写道：“在俄国，奴隶制现在已成了历史的

① 要想对俄国在格鲁吉亚的好坏影响作一清算是很困难的。这可以从1929年全苏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一次事件(它不无愉快的喜剧色彩)中看出来。当时著名的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马哈拉泽作了一次演说，其中颇为着重地谈到了格鲁吉亚同俄国联合中好的方面。这引起了当时俄国主要历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教授的抗议，他说：“马哈拉泽同志对我们俄国人太宽容了。在过去，我们这些俄国人(我是作为一个血统最纯的大俄罗斯人说话的)，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坏的掠夺者。”见《全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第1卷，第494—495页。

② 格鲁吉亚在1804、1811、1812、1820、1830、1837、1841、1857和1866年都爆发过农民起义。在克里米亚战争时，俄国司令官们十分耽心高加索农奴的态度。据称，英国在特里比宗德的使节正在武装他们来进行叛乱。见P·I·里亚施钦科：《苏俄国民经济史》第1卷，第557页；马哈拉泽在《全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文章，见该书第1卷，第485等页；恰恰普里泽的《格鲁吉亚的农民运动》，载《格鲁吉亚工农运动史纲》一书，第13—105页。

陈迹。但是在外高加索，特别是在格鲁吉亚，还没有通过法律来制止临时劳役。……我国农民的经济依附……在近五十年来有所发展，并且采取了农奴制的一种新形式。”^①

农奴制如此渗透了整个氛围，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就是在这个氛围中生活的。它不仅沉重地压在直接受其影响的农民身上，而且还压在一般的人类关系上，压在家庭、教会、学校、心理状态和整个生活方式上。^②可以说，整个沙皇帝国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列宁在把俄国废除农奴制和美国解放黑奴加以比较时指出，俄国1861年的改革比美国的改革大大地不彻底。他得出结论说：“因此，在过了半世纪以后的现在，在俄罗斯人身上留下的奴隶制度的痕迹要比黑人**多得多**。”^③列宁的这个尖刻的评论无疑是夸张了一点。作为一个革命的宣传家来说，他急切地想看到俄国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掉封建的遗产，自然会有这样的夸张。但是如果这句话对俄国人来说是不完全真实的，那末对高加索人来说仍然是真实的。他们的社会生活表现出太多和太新鲜的“奴隶制痕迹”。人对人的赤裸裸的和公开的从属关系，毫不加掩饰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原始的暴力，以及缺乏人的尊严，是农奴制生活方式的特点。被压迫人民的主要武器就是装假、欺骗和暴力，他们被保持于愚昧之中，照例是无法通过公开而有组织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

① 被引证的这个权威方面就是皇家农业学会的机关刊物《高加索经济》，见《外高加索阶级斗争史》，第1卷，第10—15页。

② 格鲁吉亚诗人 G·列昂尼泽写了一首吹捧斯大林青少年时的叙事诗，暗示斯大林的祖父是农奴，被地主拷打致死。（这首诗被吉洪诺夫翻译成俄文，并在1944年以书的形式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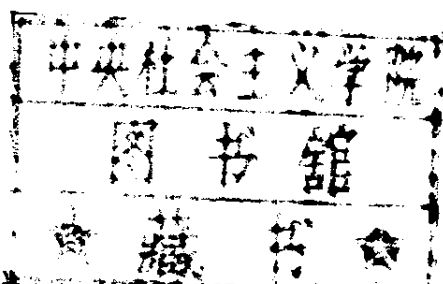
③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41页。

梯弗里斯的正教中学是一个奇怪的学校。在格鲁吉亚，甚至在整个高加索，它虽不是唯一的、却是最重要的中学。它是本地知识分子的主要培养地，也多少有点象农奴制的精神保护区。正是在这儿，进步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直接地渗入，并同封建教会的习性发生冲突。

这所中学看起来象座兵营，由严厉的修道士严格地管理着生活。一个人走进去以后，就完全与世隔绝了。规定学生必须日夜地呆在学校里，但如果向负责一个班的修道士申请，可以获准两小时的假。日间的课程充满了经院神学的说教和无尽无休的祈祷。^①从穷苦家庭来的学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二三十个学生挤在一间宿舍里。从精神上来说，这所学校半是修道院半是兵营。一个旧学生说道：“生活是这样的悲惨和单调，终日被关闭在兵营之中，我们感到好象是囚犯，没有犯任何罪行，却必须呆在那儿许多年。我们所有的人都很沮丧和忧郁。在屋子和走廊里闷得要死……差不多永远没有青春的快乐。当青春的气质不时表现出来时，立即遭到修道士和班长的压制。”^②不允许学生到非教会的图书馆去借书，只有经过修道士认可的作品才能阅读。这个学校当然也是一个俄罗斯化的工具。违犯了规则就要被罚禁闭。修道士们积极地侦察学生的思想和行

① 斯大林传记的一个作者断言，“给学生的作文出这样的题目：《先知的驴子讲什么语言？》”。（《圣经》故事：先知被派去谴责以色列，却受到驴子的责备。——译者）

② 转引自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14页。



为，搜查他们行李，偷听他们的谈话，只要有一点点怀疑，就向校长告发。

然而，这座严酷的中学也是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中心。许多后来成为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舆论界著名人物和领袖的人，都是在这座学校里成长起来的。1930年，外高加索共产主义大学历史系发表了梯弗里斯宪兵队的档案材料，其中就有这座中学中“政治不忠”表现的报告。这些报告涉及二十年的时间，从1873年直到朱加施维里进入学校之时，对学生中激动的思想提供了很好的说明。^①

早在1873年，一个宪兵上校就向他的上级报告说，截获的信件表明，有些学生读过达尔文、巴克尔、穆勒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曾经命令进行了一次搜查，查到了两本最具“煽动性”的书：勒南的《耶稣传》和雨果的《小拿破仑》。调查确定，有三个教员在班上“以自由主义的精神”讲课，而因为这一罪行，校长把他们开除，并向宪兵队告发。有几个人被判了刑，有几个人因为已知其罪行，所以就暂时没有加以告发。^②报告强调说，犯罪者都受过格鲁吉亚爱国主义的鼓舞。

这种情绪上的激动导致了1886年6月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当时一个名叫约瑟夫·拉吉耶夫的学生由于反俄态度而被开除，就刺杀了校长巴维尔·楚德茨基。这个凶手是哥里地区牧师的儿子。梯弗里斯的宪兵头子报告说：“同俄罗斯的中学相比较，梯弗里斯中学认为自己处于最不公平的条件下。学生们来到学校……经常表现出……一种反宗教的情绪和对俄罗斯人的

① 《外高加索阶级斗争史》，第1卷，附录，第31—100页。

② 同上书，第83页。

敌视。要改造这样的学生常常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地人民最容易激怒，而且具有病态的自尊心。”^①他接着说，刚刚被封闭的几家格鲁吉亚报纸，曾经煽动公众反俄，并使这座中学成为格鲁吉亚爱国主义的大本营。结果这座中学被关闭了数月。格鲁吉亚大主教保罗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他曾经向宪兵队头子暗示，这次暗杀并不是个人的而是一个秘密组织的行动。他提到某个名叫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的人是主要的嫌疑犯，因为一年以前他曾经袭击过校长。吉布拉泽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朱加施维里的政治导师之一。在1886年开除的学生中还有米哈伊尔·茨哈卡亚，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后来成为列宁的友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的主席。

这座学校中所有格鲁吉亚学生的正式罢课，发生在朱加施维里进入该校仅仅几个月以前。1893年12月4日，梯弗里斯宪兵司令扬可夫斯基将军向圣彼得堡电告：“正教中学的大多数学生已经宣布罢课，要求撤换几个教员，并建立格鲁吉亚文学讲座。”^②格鲁吉亚的大主教同学生呆了一整天，徒劳地企图劝诱学生不要罢课。校长要求警察出来帮助。警察于是封闭了这座学校，强迫学生们回到家里去。但是警察头子不安地报告说：“很多知识界的人士认为，对于学生来说，封闭这座学校将是一件不公正的事情，因为这些学生只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来捍卫本民族的利益。”在离开学校时，学生们宣誓要团结一致。不过，在该学期终止以前，他们之中还是有八十七人被开除出学校。米哈伊

^① 《外高加索阶级斗争史》，第89—90页。

^② 同上书，第92页。

尔·茨哈卡亚再次被认为是这次罢课的主要组织者。在开除的学生中有拉多·克泽霍越里，他从前是哥里学校的学生，只比朱加施维里大三岁，很快就成为朱加施维里在政治上的良师益友。^①在这些报告中，没有一件提到社会主义的宣传，罢课者主要是出于格鲁吉亚爱国主义的义愤。

当十五岁的朱加施维里进入这座学校时，人们对上次罢课的情况还是记忆犹新的。学生们必定讨论了这次事件，并对开除八十七人进行了议论，因此新入学的学生对于在学校中教授本民族文学的要求都很同情。他因而一开始就受到政治骚动的感染。但是一如在哥里学校那样，他对教师还是隐瞒了自己的感情。也同在哥里学校一样，他在这儿仍是一个模范学生，能干、勤奋和听话。他无疑地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注视着这个新的环境。校长是俄罗斯僧侣海尔莫杰尼斯，训导长是格鲁吉亚人阿巴希泽，他正因为是格鲁吉亚人，所以才过分地奴颜婢膝，急于讨好俄罗斯当局。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在这儿能够在较小的规模上就近考察专制统治的情况。学校当局处于紧张和恐惧之中，因为俄罗斯人校长还不能忘记他的前任的被暗杀；而格鲁吉亚人训导长一方面对上级的一点点不悦都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又十分耽心在幽暗的走廊和学生宿舍角落中可能酝酿着的阴谋。但是，这些僧侣越密切地监视学生，积极地偷听学生的谈话，经常地在学生的大衣和箱子中搜查禁书，那些异端思想就越更有效地在学校中传播开来。在这些年轻的学生眼中，新近被开除的学生成了道德上的模范，他们想方设法地同这些从前

^① 《外高加索阶级斗争史》，第100页；《伟大斯大林的故事》，第79页；塞·阿利卢耶夫：《走过的道路》，第86页。

的学友保持接触，使他们的影响在这座教会的堡垒中传播。

当朱加施维里还在一年级时，他必定经常半秘密地到城里去，同反对派的成员们进行接触。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1895年10月29日，即他到达梯弗里斯差不多正好一年时，他在格鲁吉亚刊物《伊伯里亚》上发表了一首诗，这个刊物是由自由派的爱国者伊里亚·恰夫恰瓦泽主编的。这首诗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但却带有社会激进主义的色彩。他把它献给著名的格鲁吉亚诗人R.艾里斯塔维。这首诗署名“梭赛罗”（“小乔”），因为作者想对学校当局隐瞒自己的身份。^①他的另一不法行为是从城里流动图书馆中借书。除格鲁吉亚的诗歌外，他喜欢阅读俄国的名著和欧洲的文学作品。他最喜欢的是三个伟大的俄国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果戈里和契诃夫，后来他经常在演讲和论文中引证他们的作品。在他读过的外国著作中，最主要的是雨果的小说和萨克雷的《名利场》俄译本。对他的思想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达尔文主义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通俗读物。在那个时候，自然和社会的实证论和唯物论观点，在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中极有影响。

差不多所有的传记作者，不管对斯大林是友好的还是敌视的，都同意G.格鲁尔吉泽对他的印象。格鲁尔吉泽是他的同学，三十年代仍在哥里当教员。他说：

我们有时在作礼拜时读书，把书藏在靠背椅下。当然，

^① 这首诗以原来的署名转载于1899年和1907年出版的格鲁吉亚诗歌两卷集。见M·凯伦吉里泽：《斯大林青年时代的诗》，载《伟大斯大林的故事》，第67—70页。

我们得十分小心，以免被教师捉住。约瑟夫手不释卷，甚至在吃饭时也在阅读。……当向他提问题时，他总是慢条斯理地答复。

在学校令人难以忍受的窒息气氛中，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唱歌。当梭索领导我们即席合唱时，当他以清越而愉快的声音歌唱我们喜欢的民歌时，我们总是十分愉快的。^①

不过，另一作者伊雷马什维里强调了朱加施维里性格中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他还描述说，朱加施维里是学生中的主要辩论手，他比许多同学知道的东西多一些，能够很顽强而又巧妙地提出自己的论点。但是他渴望压人一头，不能轻易地忍受别人超过自己。一当他的论点遭到有力的挑战时，他就变得烦躁起来。只要在辩论中有一点点挫折，他就发怒生气。所以有几个同班同学回忆说，有时他对获胜的对手怀有妒意，用恶毒的流言和诽谤来寻求报复。这种行为虽然在同年龄的孩子中不乏其例，但却使他成为一个难以相处的伙伴。

只是在他进入学校三年的开头时，教士们才开始注意到他们的这个好学生正在走入歧途。1896年11月，一个教士在操行册上记了一笔：“看来朱加施维里有一张廉价图书馆的借书证，他从这个图书馆里借书。今天我没收了雨果著的《海上劳工》，从书中发现了上述的借书证。”校长在这个报告上批道：“罚他长期禁闭。我已经为了雨果的《九三年》一书警告过他一次了。”^②的确，雨果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小说，对于一个准备当牧师的

^① 转引自雅罗斯拉夫斯基前引书，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6—17页。

青年读者是很难说有什么帮助的。同样的记录在操行册上越来越经常出现：“下午十一时，我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那儿没收了勒杜劳的《各国文学发展史》，这是他从廉价图书馆借的。……我发现朱加施维里在教堂楼梯上读上述这本书。该生被发现阅读从廉价图书馆借来的书，这已经是第十三次了。我已把该书交给训导员神甫。”这是1897年3月间写下的，离第一次犯规仅仅有四个月。校长下命令说：“罚他长期禁闭，并给予严重警告。”^① 犯规事实中没有说在这个犯规者那儿发现社会主义（更不用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从他同代人的回忆和他自己日后的作为来判断，当他在高年级的时候，必定首次了解到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参加了学校中的一个秘密辩论团体和在城里的一个名叫“麦撒墨达西”的秘密社会主义组织。他是在1898年8月参加后者的。^② 把社会主义的书带到学校去显然太危险，而且它们也不容易得到。雅罗斯拉夫斯基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资本论》俄译本，当时梯弗里斯只有一本，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就用手来抄写它。人们可以设想，朱加施维里在设法离开学校的几个小时里，是阅读或浏览了一些社会主义作家写的书籍和小册子的。

“麦撒墨达西”这个组织是1893年建立的，他差不多十九岁时加入其中。这是梯弗里斯首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之一，虽然它的观点仍带着格鲁吉亚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取名“麦撒墨达西”（第三集团），是为了区别于“麦奥里达西”（第二集团）；第二集团是一个进步的自由派组织，在八十年代曾领导了格鲁吉亚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前引书，第17页。

^② 《斯大林传略》，第24页。

的知识界。^①“麦撒墨达西”的创建者有诺亚·饶尔丹尼亚、齐赫泽和策烈铁里，他们很快就以温和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而在格鲁吉亚以外成为知名人物。发起者中最有力的是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他就是那个因袭击校长而被开除的学生。“麦撒墨达西”的领袖们通过自由派报纸《犁沟报》阐述自己的观点。

很久以后，朱加施维里回忆他信奉社会主义的动机时说：“我所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我的社会地位（我的父亲是鞋厂的工人，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劳动妇女），但是也……因为学校中严格地不容异说和实行耶稣会的纪律，它如此无情地压倒了我。……我生活的环境中充满了对沙皇压迫的仇恨。”外界发生的事件则是最后的触发。在那些年代，梯弗里斯工人掀起了汹涌的罢工浪潮，这是高加索首府的头几次罢工。它对工人阶级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影响之大，到现在都难以想象。在后来的几年里，罢工频繁发生，大家习以为常，就已经不再激动人心了。但是，这头几次的罢工已显示出工人出乎意料的力量；它们是社会斗争的一种新武器，而且就象通常新武器的作用一样，引起了人们过份的希望和恐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已从其中看到伟大事件即将来临和即将发生激烈变化的迹象——对俄国来说，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梯弗里斯当时已是一个小规模产业革命中心。它的生活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对东方封建宗法的高加索的新冲击。“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居民稀少的或者与世界经济甚至历史完全无关

^① “皮尔维里达西”（第一集团）受到格鲁吉亚贵族中开明人士的支持，甚至在1865年以前就鼓吹废除农奴制度。贝利亚前引书，第203页；阿尔科梅德前引书，第172—179页。

的山民所居住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石油工业者、酒商、小麦与烟草工厂主的地方。”^①这就是当时尚未知名的列宁对上世纪末这个国家情况的描述。巴库和巴统的石油工业已在英法资本的帮助下进行开发。除列宁所列举的那些工业外，很快又增加了乔杜里的丰富锰矿。1886年到1887年，格鲁吉亚的梯弗里斯和库泰依斯两个区工业生产总值才有一千万卢布，在四年里产值就增加了两倍，1891年到1892年达到了三千二百万卢布。^②在同一时期，产业工人从一万二千增加到二万三千，铁路工人还不在此内。在连结里海和黑海两岸（巴库到巴统）的外高加索铁路上，梯弗里斯是一个主要的中转站。铁路工厂因而成为梯弗里斯的主要工业，也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秘密的高加索工人运动的神经中枢。这些工厂和闹闹嚷嚷的亚洲式集市，就成为这个城市生活中的两个矛盾的组成部分。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可能花过一些时间去观察那些东方商人的作风和习惯——这些肯定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怎样，那个“甚至同历史无关”的东方世界是不适合他的，他已经被高加索生活中的新因素所吸引了。

有两三个原先准备成为教士而后来转变为革命者的人，已经成为他的导师。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是“麦撒墨达西”的一个领导人物，而且是这位见习教士十分重要的密友。除他之外，朱加施维里还同另外两个良师益友交往。他们是沙爱·祖鲁启泽和拉多·克泽霍越里。祖鲁启泽只比朱加施维里大三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544页。——译者

② 马哈拉泽在《全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文章，见该书第1卷，第489—490页；《格鲁吉亚工农运动史纲》，第115—128页。

岁，在“麦撒墨达西”中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望的文人了。他热情地为事业而奋斗，但染上了肺病，五、六年以后就死去了。他发表在格鲁吉亚地方报纸上的文章，表明他有渊博的社会学知识，在写作上有光辉的天才和文学气质。在他的作品中，有一本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通俗著作。^① 朱加施维里同沙爱·祖鲁启泽一道，有时去拜访《犁沟报》编辑部。对于那些半自由派半社会主义派编辑的名言警句，他始而肃然，继而哑然失笑。

他的另一个良师益友克泽霍越里不是一个文人，而是一个更为务实的人。他已经信仰了这一新的主义，所以主要的兴趣就在于想各种办法使别人也相信它。他已在高加索以外见到了一些市面。他是1894年被学校开除的八十七人中间的一个，之后就到了基辅，这是一个古老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心，比梯弗里斯要开化一些。他在那儿呆了几年，并同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小组有了接触，而这些社会主义者又同彼得堡思想相同的人，甚至同流亡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领袖人物有联系。他返回高加索之后，急于做点什么事情，使他本乡的运动脱离襁褓期。他环视周围，看看是否可能设立一个秘密的印刷所。按照他的意见，这是任何革命宣传小组的头一个可靠的基地。地方上那些半社会主义派和半自由派的格鲁吉亚报纸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们的编辑对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不得不十分小心谨慎，并把每一篇文章交给沙皇的审查机关。象这种胆怯的和被删削得毫无力量的宣传，是不能说服任何人和起任何作用的。因此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摆脱审查制度。这就是说要

^① 斯大林后来怀着感激之情回忆祖鲁启泽。1927年，他要求苏联国立出版社把散见于格鲁吉亚许多小刊物中的祖鲁启泽的论文辑印成册。

有一个秘密的印刷所。正是为了这一实际事务，当朱加施维里成为“麦撒墨达西”成员时，克泽霍越里才注意到了他。

克泽霍越里和祖鲁启泽想交给这个革命的新学徒一项特殊工作，主持几个工人的学习小组。他的任务是给几个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和马拉有轨车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工人们都集合成为小组，每组十多人到二十人。每一个志愿前来的学生都被分配给相同的工作，因为这个年轻的组织极端缺乏现成的人材来启蒙它的成员，他们读不懂阐述这个组织的理论的书和小册子。这些小组聚集在工人拥挤的窝棚里，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马合烟气和汗臭味。门外有一个人放哨，以免遭到警察的袭击。讲课的学生可能从这一工作中得到很大的精神满足。因为他感到自己得到了提升，并不是劳而无功的。在这儿，他表面上还是阿巴希泽教士看管下的一只驯顺的羔羊，却把精神上的炸药放到了帝国和教会的基础上。工人们恭敬地听他讲，他们往往比他的岁数大得多，却把他当成自己的权威和领导人。

在这样的集会之后，他必须匆匆赶回学校，向教士进行解释，为自己长时间不在学校寻求借口，然后装着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进行祈祷。这是很难堪的、甚至是令人羞辱的事情。这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双重生活。不仅作为一个不信教者却要假装为正教徒；而且作为一个革命者，在城里已经是一个重要人物，并开始在举止上象一个知名者，现在却又不得不重新扮演未成年学生的角色，听任上级的指责呵斥。他究竟能够忍受多久呢？

朱加施维里在学校的最后一两年里，必定经常考虑过这一

个问题。他最厚颜而虚伪地欺骗教士们，但这并未使他有什么顾虑和不安，因为他仅仅是用欺骗来反对欺骗。难道他们没有侦察过他和当他不在时搜查过他的东西吗？难道他们所教的东西不都是一些可怕的欺骗吗？他的虚伪仅仅是对他们的虚伪的答复。在这场谎言与欺骗的决斗中，他肯定是一个佼佼者；而且无疑地，他的成功和由此而引出来的兴趣，帮助他忍受了几乎无法忍受的处境。当然，他可以卷起铺盖，然后向教士说声再见。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出了学校就无以为生。那个组织极端贫穷，不能够帮助他，他不想成为母亲的累赘。而无论怎样诱人，他也不想成为一名工人或职员。学校生活虽然不愉快，但还是给他充足的时间去辩论、梦想和阅读，这是他不愿轻易放弃的。如果是一个更为冲动和志大才疏的青年人，他就会冲破学校的大门，而不计其后果。但是他却是一个前农奴的儿子，虽然现在为改变全体人民的生活而工作着，还是习染了农民的不爱动和惰性，生来就害怕变化。的确，继续留在学校，那就要不断地隐瞒和装假；但这些东西他从童年时就习以为常了，现在更几乎成了他的第二天性。

无论如何，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在他留在学校的最后几个月里，操行册上还没有提到他进行过任何社会主义的宣传。他显然想方设法地隐瞒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活动。但是他同校方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了。1898年9月29日的一个报告说：“下午九时，一群学生在饭厅里围着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他给他们读一些没有经过校方批准的书。有鉴于此，我们对学生进行了搜查。”几星期以后，操行册上又写道：“在搜查学生的过程中……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几次企图引起辩论……对反复的搜查

表示不满……并且声称，别的学校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搜查。朱加施维里对于校方人员一般说来是不尊重和粗鲁无礼的。……”^①

在他加入“麦撒墨达西”之后不几个月，他的难题由教士给解决了。1899年5月29日，他被开除出学校，理由是为了“不明的原因”而未参加考试。^②他本人后来说，他被开除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不是校方提出的理由，但他们无疑是怀疑他在政治上不忠诚。当离开这座他度过五个重要年头的半修道院半兵营似的学校时，他没有什么悔恨。

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父母出身农奴，这使他和差不多所有的其他革命领导人物都有所不同。大多数革命领导人物都来自完全不同的阶层，即来自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列宁是一个大学生，曾以强烈的知识好奇心就近观察过农民的生活。但是，他作为一个被封为贵族的国民教育视察员的儿子，既未生活于农民之中，也不属于农民阶级。托洛茨基是一个暴发的犹太地主的儿子，他是从他家的窗口去观察贫困和剥削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拉科夫斯基、拉狄克、卢那察尔斯基、齐切林和其他许多人是知道社会弊端的，但他们并不是由于亲身的经历。对他们大多数来说，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更不用说农奴制度），也只是他们以不同程度的洞察力去探讨的社会学原则。这些原则后面的现实是同他们的个人经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前引书，第16—17页。

^② 同上。

历完全无关的。加里宁、托姆斯基和施略普尼科夫这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本身就是工人，而且象大多数的俄国工人一样，在农村里还有根基。但是即使这些人，也几乎没有一个象朱加施维里—斯大林那样，在青年时期就直接而痛苦地生活在农奴制的环境之中。

二十岁的朱加施维里肯定已从他原来出身的地位高升了，他现在已经属于知识分子。当然，不是熟知自己在社会中地位和价值的那个稳定而体面的阶层，而是落魄的半游民阶层。不过，对于那些处于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人们，他还是几乎没有什么亲近感的。上层阶级出身的革命者从个人的接触中只知道工人阶级中的精华部分，因为这些人是有知识的工人，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宣传，并热望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交朋友。对于不易接受社会主义观点的迟钝的广大群众，他们将其说成是无产阶级中落后的和不自觉的部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于那种落后性的沉重负担是颇为清楚的。他们记得，上一代的许多上层阶级出身的革命者，怀着“到民间去”的理想，到人民中去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结果却遭到农民的怀疑而被野蛮地杀害或被出卖给宪兵。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启蒙运动和政治经历，最终会使那些落后的和不自觉的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但是此时此刻，那些理论家和宣传者同尚未觉醒的群众的确是没有共同语言的。另一方面，那些走向社会主义的上层阶级的青年人，一般说来最初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赎罪感的。正是这种感情，使他们把被压迫阶级看成情操高尚的象征。

对于俄罗斯生活和政治中的落后性，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必然具有一种异常的、几乎是天生的敏感，这种敏感甚至在未来

的年代里还有所增长。虽然这时他也关心进步的工人，因为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接近落后的群众，并使他们摆脱温顺和懒惰的状况。但是他对于工人阶级并不怀抱乐观的希望和理想主义的判断。他不仅怀疑压迫者，即地主、资本家、教士和沙皇宪兵，而且对于他为其事业而奋斗的被压迫者即工人和农民也是不信任的。他信奉社会主义，丝毫也不是出于赎罪感。他对于自己出身的阶级无疑是有某种同情的，但他更仇恨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出身上层阶级的革命者所感到和鼓吹的阶级仇恨，是一种发展起来的第二感情，是从他们的理论信念中培养出来的。对朱加施维里说来，阶级仇恨是他的第一天性，而不是第二天性。社会主义学说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它似乎给他的感情以道义上的批准。在他的观点中没有丝毫的多愁善感。他的社会主义是冷酷的、清醒的和粗暴的。

他性格中的这些特点在未来对他大有好处，但也产生了一些重大的不利之处。上层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带着固有的文化传统进入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背叛了本民族的信念和偏见，但也把自己环境中的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和品质带进革命之中——这不仅是知识，而且还有思想、演说和举止的高尚文雅。的确，他们背叛到社会主义，其本身就是道德上的敏感和智力上的精炼的产物。朱加施维里的生活正好没有如此仁慈地培养他这些品质。相反地，他的道路上充满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悲惨景况，减弱了他的敏感力和鉴赏力。别的领袖中很少人会有社会自卑感。他们大多数人如果选择更为和平和保险的道路，也能够干出辉煌而体面的事业。象列宁这样具有天才的人，无论在哪个政权下，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托洛茨基是一个具有

很高声望的文人。象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这样的人，是能够在学术界获得很高地位的。他们全都是具有很高才能的演说家或作家，在早年就表现出是具有很大干劲、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思想家。年轻的朱加施维里不乏聪明和一般常识，但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不是他的特色。他能够比较顺当地向工人小组讲授社会主义，但却不是一个演说家。正如后来事实所表明，他也并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在等级严格和官气十足的俄罗斯，这个格鲁吉亚农民的儿子在社会阶梯上本来是爬不高的，即使他具有很大的雄心、顽强性和好运气。在教会里，他充其量只能成为另一个阿巴希泽。环境使他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自卑感，甚至当他成为一名秘密的社会主义者时，也没有摆脱这种自卑感。

第二章

地下社会主义者

未来革命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他们在高加索的影响。——1899年斯大林成为梯弗里斯天文台的职员。——1901年他由于革命活动而被赶入地下。——编辑《斗争》报。——他的第一篇政治散文作品。——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人民的好奇心”是反对暴政的一种武器。——1901年斯大林离梯弗里斯到巴统。——开始使用柯巴（不屈不挠的人）这一假名。——建立秘密印刷所。——工人同军方的冲突。——1902年斯大林被捕。

朱加施维里于1898年8月参加“麦撒墨达西”。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即三月份，十多个社会主义者在明斯克城举行秘密会议，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这种时间上的巧合表明，朱加施维里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参加社会主义者行列的，这个运动正接近一个转折点。这时俄国还不存在什么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只有一些宣传小组，其中的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这些小组中的辩论和讨论，几乎不为外间所注意。甚至到了现在，有些肤浅的研究者还把这些讨论看成是不相干的空谈。但是这些“宗派的”宣传者却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未来那场革命的科学家或艺术家。

整个这一世纪中，俄国知识分子一直以大胆无畏的精神反叛沙皇专制主义的压迫；但是只有到了这一世纪末，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才在革命反对派中成为统治的潮流。在八十年代晚期，由民粹派代表的一种农民牌子的社会主义还占居优势。民粹派认为，俄国是一个农民的和封建的国家，应该避免当代追求利润的产业主义的弊端，建立完全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建基于农村公社，即尚在农村中残余的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之上。在他们看来，要创造社会和精神自由，只须废除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一旦赢得了这些胜利，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救世伟业就是可靠的了；那时农民（而不是工业无产阶级）将成为领导阶级，成为国家的创造性力量。大多数民粹派都是革命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反对在本国传播欧洲的影响。

但是从他们的行列中又出现了另一股潮流，它本身就受到西欧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朱加施维里出生的那一年，民粹派在沃罗涅什举行了一次秘密的会议，分裂成为两个集团：一个坚持传统的农民观点；另一个由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领导，很快就开始把西方工业社会主义的思想移植到俄国革命运动中。作为俄国最有才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阐释者，作为列宁和整个一代俄国革命者的导师，普列汉诺夫崭露了头角。普列汉诺夫深信，资本主义工业将侵入俄国，并摧毁它的封建宗法结构和原始农村公社，而民粹派却想把他们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这些上面。他说，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将要在俄国成长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西欧的模式来争取工业社会主义。要从纯粹的封建主义中直接产生特别的斯拉夫农业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乌托邦，而且很快这种希望就会化为泡影。普列汉诺

夫结论说，革命者现在就必须开始组织产业工人阶级。

他真是跑到他的时代前面。现代工业才仅仅开始在俄国有微弱的发展。只有最大胆的思想家才能在其不大的开端中看出重大的意义，并把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差不多还不存在的工业无产阶级身上。看起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民粹派在鼓吹乌托邦。^①

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使根本的分歧扩大了。民粹派或者想唤起农民来反对专制制度（他们的这种努力未获成功），或者想通过谋杀沙皇本人或他的大臣和总督而推翻这个制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农业社会主义实际上已存在于封建专制的硬壳之下，照他们看来，当然只消粉碎这层硬壳就行了。1881年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第二，获得了表面上的胜利。恐怖主义者是一批知识水平和道德品质都很高的男女——“一群象罗慕洛和瑞慕斯^②那样喝母狼奶长大的英雄”。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贵族的子女，至少也是出身于显贵家族的人，却为人民的事业而献身。这次密谋的一个中心人物就是苏菲娅·皮罗夫斯卡娅，她是圣彼得堡总督的女儿。但是，正是他们的这次胜利（刺杀沙皇）成了他们幻灭和衰颓的根源。他们曾经希望，这次打击会使这个可憎的制度一蹶不振。事实上，他们只是杀了一个专制主义者，却没有推翻专制制度。亚历山大第三继承了亚历山大第二，其暴政更为凶残。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采取这种恐怖

① 令人奇怪的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的争论中，马克思拒绝支持前者。见他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

② 罗马神话：战神的双生子，婴儿时即被遗弃，靠吮吸一只母狼的奶长大。罗慕洛后来成了罗马的奠基者。——译者

主义的方法。暗杀个人，或者如他们称为的“个人恐怖”，是毫无用处的。他们说，需要做的事是推翻一个制度，而一个制度并不依赖于少数的几个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工业无产阶级身上，认为他们会行动起来反对整个的专制制度。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在人数上还很少而不能行动，他们只好等待着工业的发展产生出工人大军。这时，他们只能进行宣传工作，鼓动人们信仰社会主义，并使思想相同的人建立起松散的小组。

时间证明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见是正确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工业和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在人数和力量上都增长起来，劳工纠纷就大大增加了。到了九十年代，在一些青年革命者的眼里，民粹派的学说已经十分陈腐。1894年，正是朱加施维里进入正教中学的那一年，年轻的列宁发表了他的小册子《什么是“人民之友”？》，他在书中攻击了民粹派，这是对他们的致命一击，虽然在随后的几年里，还出现了另一种更为摩登的农业社会主义翻版。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矛盾。在他们同民粹派的论战中，他们说，为了能够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而无现代工业，就象说三角形只有两个边一样，是一种语辞上的矛盾。在西欧，社会主义者正好在为推翻资本主义而工作着；但在俄国，所有的希望还寄托在它的生长和发展上。因为他们认为，在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残缺的中继站。他们强调这个中继站的有利之处，即它的进步的特点，它的文明的影响，它吸引人的气氛，等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早期著作，包括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在更小程度

上甚至包括斯大林的，读起来几乎就象是为西欧自由资本主义辩护似的。这种矛盾不可避免地导向含糊其辞。在那些宣传者中，有些人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论点的这个部分，而另一些人又强调另一部分。有些人期待着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另一些人眼睛却盯住资本主义这个中继站。换句话说，有些人是社会主义者，而另一些人不过是使用马克思主义辞句为进步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西欧，社会主义本身是自由主义的不合法产物；而在俄国，自由主义却部分地是社会主义的旁枝侧系。那些同路人越是向往那个中继站，他们的差异就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到了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和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不可逾越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只以抽象的形式来鼓吹理论，以便沙皇审查当局能够接受）是集合在少数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等——周围的人，他们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上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却彻底地忽略或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面。^①这一分裂在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中引起了混乱，而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无疑已经吸引了非常温和的人们，这种混乱就更严重了。^②马克思主义对于“个人恐怖”的批评，对暗杀组织者和暗杀企图

① 在随后的年代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保守的自由派和君主制度的代言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西方以写作十九世纪英国商业周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而著名。

② 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话：“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属于工人阶级的党，只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属于大资本的党。”见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概要》，第2卷，第72页。

的断然拒绝，使它看起来是当代革命学说中更为温和的一种。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以及他们较不出名的友人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不得不进行艰苦的工作，以便克服这种混乱状况，重申他们学说的革命结论，并区别出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

这场论战在书籍、小册子和报刊中激烈地进行着。它传播到俄国每一个政治反对派的中心去；梯弗里斯也受到了它的影响。“麦撒墨达西”是所有保证遵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人的一个松懈的团体；但它的温和派成员在观点上却带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色采。当朱加施维里参加“麦撒墨达西”时，这场论战正处于相当热火的阶段。由挪亚·饶尔丹尼亚领导的右翼占了上风。朱加施维里加入了左翼少数派。^①

这场论战几乎还没有过去，又产生了新的论战。头几次的罢工和劳工纠纷激发了一种叫“经济主义”的新倾向。这个特殊的牌号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用来形容在法国称为工团主义的那种主义，它是非政治化的工联主义。“经济主义者”想把他们的活动限于支持工人提出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完全不去考虑政治。他们唯恐反对沙皇的“放肆的”政治谈话和社会主义宣传将使工人阶级招来怨恨；他们认为，工人的兴趣只在面包黄油问题，而不在其他。那些有政治思想的社会主义者反驳说，“经济主义者”对工人阶级采取低估和轻视的观点。他们

^① 顺便说一下：挪亚·饶尔丹尼亚这位多数派的领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公认的领袖。1917年以后，他被选为格鲁吉亚共和国的主席。1921年2月，斯大林个人命令苏军入侵格鲁吉亚，把他赶出了这个国家。本世纪初在梯弗里斯发生的这场争论，于是就好象成了未来戏剧的序幕。

争辩说，事情的发展将表明，只要社会主义者把政治的重要性向他们讲透，工人们能够成为最有政治思想的阶级。如果他们的领袖本身就害怕谈论政治，肯定就不能使他们脱离面包黄油的水平。

一直到了1901年，“经济主义者”在国外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仍然居于多数。但是那些政治家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争取动摇者来反对多数派。特别是在高加索，“经济主义者”在一个短时期内还居于政治家中首位。不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派到梯弗里斯去的代表已经去那儿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经济主义者”的影响开始衰落。同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在一起的那些人，即祖鲁启泽、克泽霍越里和其他人，以及他本人，都支持革命的政治活动而反对“经济主义”。

最后，还有两个彼此联系的问题引起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的注意。他们的成员这时正十分迅速地增加着。到1900年，单是在梯弗里斯就已经有了好几百人。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地下小组中，工人已经比知识分子多；他们同工厂有紧密的联系，使他们现在已经能够接近工人大众。把仅仅对几十个挑选出来的人讲解社会主义原则转变成为在群众中进行系统的工会和政治工作，这样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了。在俄国的习语中，这叫做“从宣传过渡到鼓动”。宣传一词当时同今天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用政治广告的聪明谋略来使一般公众大吃一惊，不是向轻信者“兜售一种思想”，或者人为地吹捧和树立领袖人物。恰恰相反，它的意思是在学习小组中谦虚而热情地讨论各种原则，交流思想而不是空喊口号。这时正当本世纪初，大多数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都已感到，象那样的宣传

已经不再够了。但是为了在群众规模上进行有系统的政治工作，他们非常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党和一个公认的全国领导机构，使它具有能够支配的足够的道义和物质力量，有能力去领导、指挥和协调各个地方小组的活动。换句话说，非常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某种一致性和突击力量的全国性政党。

从普列汉诺夫同民粹派在沃罗涅什代表大会上分裂以后，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还没有这样的政党存在。只有一些由地方领袖领导的地方小组，在朱加施维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时，情况仍然如此。1898年在明斯克举行的代表大会，就是建立这个党的初步尝试。但是差不多所有的参加者都被警察围捕了，他们的决议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还只是停留在字面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言人普列汉诺夫正在西欧流亡，势必要失去同俄国的联系。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尖锐地感到，需要把那些分散的小组统一起来。列宁这时已三十岁，他正在离最近火车站还有三百英里的西伯利亚东北部叶尼塞省的某个小村中，不耐烦地等待着三年流放的满期。他在西伯利亚写了一些短文和内容丰富而有份量的经济论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立即使他获得主要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声名。但是著作上的成功并不能抵销他对流放的不耐烦。他急欲做点事情来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

列宁从西伯利亚释放出来后，就同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友人取得联系。他们主张，他应该同“老头子”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事磋商和合作。列宁极其热望这样做。几个月内他就到了国外，同年老的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联系。结果还是没有成立一个党而是办了一个事业，它虽然表面看来是十分温

和的，却在俄国甚至世界历史上取得了地位。在1900年的最后几天，一家叫作《火星报》的报纸在斯图加特创刊。报纸的名字象征俄国革命的火星已经燃起。报纸的编辑并不仅仅满足于对时事进行评论。他们努力使报纸定期地送到俄国读者手里，方法是由地下工作者偷偷地把它们运过国境。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过去几十年由流亡者出版的俄国报刊，很多也是以同样的途径进入俄国的，虽然不那么定期。《火星报》具有真正新颖的特点，使它在整个新闻事业史上成为一个独特的冒险。这个特点就是，这家报纸还是俄国国内地下党的组织中心。编辑部派出许多特派员和代表，秘密地在全国旅行，同地方小组进行联系，或在没有小组的地方建立小组，努力使这些小组同国外的编辑部保持定期的通讯，并按照它的建议行动。这样一来，迄今还没有协调一致的秘密运动，就集中由《火星报》编辑部指导。这个编辑部已由慕尼黑移至日内瓦，后来又移到伦敦，沙皇的警察对之鞭长莫及。报纸的编辑们很快就洞察了分布在俄罗斯帝国各地的小组的力量和内部活动；一个由评论家和编辑记者组成的班子，就变成了地下运动的真正的执行机构。这时他们已经处于这样的地位，可以使那个散乱而不定形的运动成形，结成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所有赞同他们观点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都把自己称为“火星派”。这家温和的报纸因而变成了革命的杠杆。

《火星报》的特派员没有忽略高加索。在梯弗里斯，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把自己称为“火星派”，朱加施维里也是其中之一。就象其他人一样，他这时也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报纸在比较长的间隔后一期期地从秘密邮递中到来。新报纸的到来

就象过节一样。报纸上有他能够信赖的智慧的权威，每一期报纸都带来了精神的食粮和大量坚实的论点，在同对手辩论时，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报纸还增强了这个青年的自信心。他这时已经能够以犀利的论点和尖锐的词句去挫败他的对手，这些都是国外的主要理论家创造的，通过在当地的可以信赖的人向他进行传达。当然，他太年轻，虽然按当地的标准来看是有知识的，但仍太缺乏教养，所以不能对《火星报》贡献任何自己的东西。但是他的思想已经受到了足够的训练，能够吸收和消化报纸所提观点的主要方面（如果不是所有精义的话）。对于那些他在政治上负有责任的工人，这时他已经不仅仅向他们解释社会主义的一般观点和应该反对沙皇制度及资本主义剥削的理由，而能够详细地阐述反对农民社会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特殊论据。他的一切思想活动这时已经建基于这些论证的路线上，它们构成他在格鲁吉亚最初一些文章的要旨。

他被中学开除后的这两年因而成为他思想和政治发展中的最重要的阶段。当他离开那座中学的时候，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似乎还是模糊的。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吸引，但很难说已经熟悉了它，更不用说已经吸收了它。他的格鲁吉亚爱国主义正在让位给一种更为广阔的信仰，即相信国际社会主义除了能够结束经济的剥削，还能结束民族和种族的压迫。但是他对于爱国主义情绪必定还是恋恋不舍的。大约两年以后，无疑是在普列汉诺夫、列宁和他们的同事的著作影响下，他的思想终于定型了，这可以从他在1901年发表的头一批文章中作出这种判断。他的格鲁吉亚爱国主义倾向已被克服。他的整个注意力已被和“民族”问题不同的“社会”问题所吸引，他已经能够用有说

服力的和“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词语讲话了。

在被学校开除后的几个月里，即从1899年5月到年底，朱加施维里既找不到职业，又没有固定的住处。他到哥里同他的母亲呆了一些时候，后来又返回了梯弗里斯，大概是同听他讲课的一些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住在一起。靠着朋友的帮助，他在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中教课，挣得一点点钱。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他谋得一个职位，在梯弗里斯天文台当一名职员。他的薪水十分微薄，但这个职位却有重大的好处。他的工作并不太忙，在天文台里有单独的一间屋子，第一次尝到了清静的味道。这时他能够不时地在他的屋子里举行集会，并希望在天文台受到尊敬的庇护下，暂时逃脱警察的监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后几个月里，警察逮捕了一些“麦撒墨达西”成员，而他却安然无恙。他懂得如何使自己不引人注意。小心谨慎，沉默寡言，敏锐机警，沉着镇定，他已经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理想的地下工作者了。

在天文台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同其他一些人忙于准备高加索的第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这是对欧洲工人表示团结的行动，也是一次对当局的挑战。这次挑战还是比较胆怯的。在指定的那一天，四五百工人溜出了城，到梯弗里斯远郊区的盐湖去集合，因为这儿大概是不会受到警察监视的。到了目的地，示威者整齐了队伍，举起了红旗。自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画像也高高地举起来了。这个温和的集会倒颇象一次举着圣像的东正教仪式，不过是把圣像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像而已。朱

加施维里在会上作了他第一次的公开演说。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发表了演说，之后唱起社会主义者的歌曲，最后这一小群人就匆匆忙忙地解散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次集会可能是毫不重要的，示威者的行动似乎也是很胆怯的。但是从当时的气氛来说，却又另当别论。社会主义正是以这种方式开始聚集自己的力量；下一次五一节示威就将是在城中心对暗探局的公然对抗。^①

在那不平静的一年里，还发生两件颇有意义的事，这就是铁路工厂的罢工和列宁的朋友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抵达梯弗里斯。朱加施维里多少卷入了这场罢工。他无疑地曾同他的伙伴们讨论过这次铁路工人罢工的策略，并帮助他们印制传单。但是罢工本身是由熟练的铁路工人自己领导的，他们就是被放逐来的俄罗斯人加里宁、阿利卢耶夫等。^② 库尔纳托夫斯基的到来振作了梯弗里斯的社会主义运动。列宁的这位友人和赞赏者必定把列宁的一些事情和他的思想及计划告诉了人们。列宁的这位使者本人，据大家说，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后来他成为1905年革命的传奇人物。朱加施维里给他的印象很深。在库尔纳托夫斯基看来，他是可以信赖的当地领袖人物之一，不过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更亲密的联系。^③

1901年是个多事之秋。五一节是社会主义者一个大的冒

① 暗探局是1881年亚历山大第二被暗杀后成立的政治警察，代替了过去的第三部。对这次五一节示威的描述，见马哈拉泽和哈恰普里泽的《格鲁吉亚工农运动史纲》，第164—165页，以及塞·阿利卢耶夫的《走过的道路》，第46—48页。

② 塞·阿利卢耶夫前引书，第46—59页，还可参见《红档》1939年第3期。

③ 《关于伟大斯大林的故事》，第91页；贝利亚前引书，第22页；塞·阿利卢耶夫前引书，第74—80页；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27—28页。

险，其严重的程度大大超过前一年的五一节。当局受到了更为直接和更为尖锐的挑战。在梯弗里斯散发的一张传单说：“全俄国的工人已经决定，在他们城市的通衢大道上公开地庆祝五一节。他们骄傲地告诉当局，哥萨克的皮鞭和军刀，警察和宪兵的酷刑都不能吓倒他们。”^① 梯弗里斯暗探局决定先发制人。在五一节前一个月的3月21日，库尔纳托夫斯基和一些最积极的当地社会主义者被监禁起来。朱加施维里在天文台的屋子也受到袭击，警察们终于看穿了这位不引人注意的职员 的所作所为。朱加施维里正好不在家，所以逃脱了逮捕。但是他已经不能回到天文台了，不得不告别了这个清静的职务。他也不能用原来的名字居住在任何地方，因为警察知道后会立即追踪他。的确，他已不再能够合法地生存下去了，必须隐姓埋名。即使在以前，知道他真名实姓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多数人都叫他各种各样的绰号。从现在起，他的整个生存都将由假护照和假名掩盖起来；在未来的十五年内，他使用了近二十个假名。在此以前，他尚生存在秘密和合法的界线上，这时却被赶入真正的地下，直到1917年他成为第一个苏联内阁成员前不久才公开出来。至于他的生活，则完全依靠那个组织所能够给他的一点帮助（这个组织不乏雄心和热情，但经济却很拮据），以及同志们私人之间的支援。走这条道路的决定是一种非正式的清贫誓愿^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他作为社会主义练习生的满期。这个以前的中学生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不信神的革命游侠和香客，对他来说，除了进行礼拜仪式以外，生活就很少或没

^① 贝利亚前引书，第23页。

^② 进入修道院时要宣誓终生清贫、独身和顺从。——译者

有什么乐趣和吸引力了。

这次逮捕以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躲开暗探局的突然袭击。五一节的冒险必须进行到底，还不能让暗探局得到真正的成功。由于其他领导成员的被捕，就给他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现在他只要表现出勇气，就能在地下运动中自动地升到更高的地位上。传单中提出的挑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实现。五一节这一天，大约有两千工人（比上一年多四五倍）集会在城中心亚历山大花园附近的索尔达茨基广场。警察和哥萨克兵也已经来到现场。后来就发生了冲突，十四个示威者受伤，十五个被捕。几星期以后，《火星报》的编辑评论这次示威，把它说成是重大事情即将来临的预兆：“4月22日星期日在梯弗里斯发生的事件，对于整个高加索都具有历史意义——这一天标志着高加索公开革命运动的开始。”^①

在此以前，朱加施维里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偶然写一些短的传单和宣言，现在他已经试着写一些革命的报刊文章了。克泽霍越里已到了巴库，终于在那儿建立了一个他日思夜想的秘密印刷所^②。他现在已经可以着手用格鲁吉亚文出版一家非法的报纸了。这家报纸叫做《斗争报》，于1901年9月创刊。

一篇叫做《编辑部的话》的声明提出了这家报纸的纲领。迟至1946年斯大林把这篇声明编入了自己的全集时，才宣称他是这篇东西的作者。从风格来说，这篇声明不象他后来的著作。很可能它是由几个人集体写的，而朱加施维里对它作出了

^① 贝利亚前引书，第24页。

^② L·B克拉辛：《往事》，第14—17页。克拉辛曾负责组织印刷厂的技术方面工作，他把克泽霍越里称为“天才的组织者”。

重要的修改。这篇声明流利而简洁，没有浮夸之词，没有提出一般的社会主义思想，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它从一开始就间接地反对“麦撒墨达西”中温和的多数派。它解释迫使他们采取非法印刷的理由时说：“如果工人中间有人以为合法报纸……能代表他的利益，代表工人的利益，那末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关心’工人的政府对待合法报纸的手段是很高明的。一大群叫做书报检查员的官吏被派来专门监视这些报纸。……一道一道的训令雪片似地飞到书报检查局：‘不得放过任何一点有关工人的消息，不许登载某某事件，不准讨论某某问题’，如此等等”^①。

《斗争报》是第一张自由的报纸，因为它免于检查员的检查。更具有特点的是，编辑们在政治上都是温和的。他们特地声明，他们没有制定自己任何政策的野心，因为格鲁吉亚的工人运动应该是整个俄国工人运动的一部分。这样，他们的政策就不可避免地要服从沙皇帝国的那些社会主义领袖们。这些话对“麦撒墨达西”的多数派来说是非常刺耳的，因为它主张格鲁吉亚党自立，同俄国党联合而不从属于它。

下一期的《斗争报》三个月后于1901年12月出版。它登载了一篇相当长的未署名的文章，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它的作者就是朱加施维里。这篇文章是《火星报》的，特别是列宁本人的那些观点的摘要，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斯大林已经能够正确无误地运用表达这些观点的风格、解释方法、词汇、甚至得意的隐喻，以致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当需要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5页。

向全世界报告和作出名垂青史的事情时，他就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不断地重复这些东西。在他着重解释主要的论点时，有一种奇怪的力量，一种颇为令人厌烦的重复（列宁的风格也有这个特点），而且喜欢使用带有东正教主日礼拜气味的阴沉而夸张的隐喻。比如他在文章中说：“为了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在西欧有过多次数暴风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旧没有消散，创伤还是那样厉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① 这位作者丢开了那种笨拙的隐喻后，接着就象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宣传者所做的那样，根据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普列汉诺夫或列宁的著作，简明而通俗地总结了欧洲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他把当地最近发生的事件作为具体例证，然后作出结论说，高加索的社会主义成熟程度已远远落后于俄国的其他地方。然后他就抨击了经济主义者，说他们只想使工人为了自己的面包和黄油而斗争，而不是为了用社会主义去反对专制制度。经济主义者和西欧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地因小失大；例如，爱德华·伯恩斯坦在德国的追随者竟然相信微小的改革而放弃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他是根据《火星报》的报道谈及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的论争的，因为他并不懂德文。但是他谈到这些情况，表明他在密切注视西欧社会主义的趋势和潮流，虽然其论据是第二手的。他继续争辩道，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至少能够宣称，他们已经生活在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争得人权”；但是谁会相信在专制的沙皇制度下能够争取到些微的进步呢？“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这并不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9页。

是说，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应该去为工人的面包和黄油而斗争。相反地，社会主义者应该去帮助进行这种斗争，因为尽管它当前的目标很微小，工人们却能在斗争过程中聚集自己的力量，最终要同代表统治阶级有组织力量的国家发生冲突。

文章的第二部分一开头就描述了被压迫的俄国的痛苦和愤怒的图景：

在沙皇制度压迫下呻吟叫苦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专制制度沉重的魔掌也窒息着其他的社会阶级。呻吟叫苦的有因经常挨饿而浮肿了的俄国农民。……呻吟叫苦的有小市民……小职员，小官吏，总之，就是人数众多的城市平民，他们的生活也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一样地没有保障，他们有理由不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呻吟叫苦的有不能容忍沙皇鞭笞政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中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有学识的人。……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被压迫的各民族和异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乡土而其神圣情感蒙受伤害的波兰人和芬兰人，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都被专制制度蛮横地践踏了。呻吟叫苦的有经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其他俄国庶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权利，即随处居住的权利、就学的权利、供职的权利等等。呻吟叫苦的有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他们被剥夺了开办本族学校的权利、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服从专制政权所疯狂推行的、可耻的、压迫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政策。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各种教派的千百万信徒，他们不愿

依照正教神父的意旨而想本着自己的良心来信奉宗教。①

被压迫的俄国的这幅图景，由于粗鲁而有效的不断重复，收到了强调的效果。这是为了用革命的巨大可能性来打动读者，并说明工人阶级是一切阶级中最革命的，它有如此广泛的社会阶层作为同盟军。

然而，作者还以冷静的调子作出了警告：“可惜俄国农民还处于数百年来由于奴役、贫穷和无知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他们现在还刚刚在觉醒，还不明白谁是他们的敌人。俄国各被压迫民族，在不仅有俄国政府反对它们，甚至还有俄罗斯人民由于尚未认识专制制度是全国人民的公敌而同样也反对它们的时候，它们简直不敢想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但他更强调警告的是，要反对资产阶级口是心非地反沙皇制度：“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极善于攫取并非由自己的胜利所得来的果实，都极善于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他们从来也不愿意在与强敌斗争中，在暂时还不大容易获得胜利的斗争中，拿自己的较有特权的地位去冒险。尽管他们不满意，但他们毕竟生活得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7—18页。作者谈及“呻吟的”各民族时，其次序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俄国社会本身的各被压迫阶级，然后是波兰人和芬兰人，然后是犹太人；只是谈到犹太人之后，作者才特别谈到他的本民族格鲁吉亚族，并以被迫害的俄国各教派作为结束。这种次序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为了把格鲁吉亚问题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中，使它看起来仿佛只是全帝国普遍压迫中的一个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别例证。在格鲁吉亚报纸上对待格鲁吉亚问题的这种态度，几乎是一种蓄意的挑衅。作者显然决心抵制政治上的自我中心，而这是所有被压迫民族的特点，格鲁吉亚的其他政治团体对此也不能免。《斗争报》第一期上曾保证说，它将把格鲁吉亚的社会主义运动看成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这个保证在这篇文章中审慎地实现了。

不坏，因此他们乐意把受哥萨克鞭打、被士兵枪杀、在街垒中搏斗等等权利让给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去独享。”产业工人阶级因此应该承担起领导责任。任何反对专制主义的胜利，如果它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的，结果都是虚假的东西，因为工农在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之后，他们权利就会遭到资产阶级的践踏。如果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领导的人民推翻了专制主义，结果就会有“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法，这个宪法给工人、闭塞的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①。

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再来读这篇文章，必定会感到这个温和的民主结论（甚至给资本家以平等权利）和作者对资产阶级猛烈的攻击是前后矛盾的。但是这种“前后矛盾”是当时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所共同有的。他们共同的想法是，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去争取社会主义；在可预见到的未来，一切能够进行的革命，就是用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封建的专制制度。^②当前那些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又在为本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胜利进行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在态度上也有类似的矛盾。几年以后，他们的队伍中就发生了同这个矛盾有关的一次根本性分裂。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或称孟什维克）争辩说，在仅仅为了用资本主义来代替封建主义的革命中，自由派的资产阶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7—24页。1933年，斯大林为了事前为他准备同希特勒达成的协议进行辩护，也曾经说道，在慕尼黑协定以后，西方强国希望使俄国“为他们火中取栗”。

^② 斯大林在1916年为其全集所写的序言（《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7—10页）中解释他为什么认为当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还不成熟，他说：“著者当时所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级不可避免地要充当第一提琴手；又说，社会主义者在帮助自由主义者打败专制制度并得到政权之后，必须在代议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起普通社会主义者反对派的作用。布尔什维克则争辩说（就象朱加施维里在1901年争辩的那样），不能够指望自由主义者去打败专制制度；又说，社会主义者必须在反封建的革命中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仅仅为在其经济结构中留下资本家的某种民主制度铺平道路。在1905年革命前夕，这个政治上的辩论充分地开展了起来。从那时起一直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这个老一套的说法在主要特点上始终没有变化。

因此，朱加施维里根据这种“温和的”和民主的正统观念，认为可以给工人、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这是同当时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精神相一致的。也许令人吃惊倒是，还在早期阶段，即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前几年，而他自己又才二十二岁的时候，他的观点就已经是未来的布尔什维克观点了。他所使用的习语，直到1917年列宁主义才加以使用。他的政治思想已经完全形成，以致在后来的十年或十五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还在当时，列宁对他的影响已经是决定性的了，尽管这位布尔什维主义的奠基者才仅仅发表了一些早期的著作，而且还没有多大名气，因为他的大多数文章和论文是用各种笔名或干脆没有署名发表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列宁复杂而多方面的性格已经给这个年轻的高加索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位导师的一些预见和思想，甚至他思想中的一些潜流，是完全超出这个学生的智力范围的，而且后来一直如此。但是对他能理解的列宁思想中的那些特点，他是从一开始就服膺的。

这个年轻的作者不仅是宣传家，还表现出是一个革命的熟练工作者，对于能使党达到预期目的的各种特殊手段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分析了各种行动方法的优缺点，对罢工、秘密报刊和街头示威的效果作了比较的研究。秘密报刊只能达到狭小的读者层，其作用是有限的。罢工比较有效，但有危险性，容易使罢工者遭到报复。街头示威是迄今最有效的行动形式。朱加施维里心里显然是想到高加索第一次五一节示威的成功，这次示威是他帮助组织起来的。他对这次成功有点冲昏了头脑，所以过高地估计了它的意义。但是，在他的分析中，对于群众心理和沙皇自杀性的笨拙行为，却闪现了锐敏的洞察力。他说，示威是由一小群革命者组织的，却激起了漠不关心的群众的好奇心，“在人民的这种好奇心中间，隐藏着对政府当局的主要危险”^①。街头示威征服了中立的旁观者的心，使他们不能长久地中立下去。当警察野蛮地驱散示威者时，有些旁观者就会同情被镇压的牺牲者。由于警察的愚蠢，他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旁观者和示威者一律鞭打，结果就使那些原先还在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游行行列的人参加到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中来。朱加施维里评论道，甚至鞭子也能帮我们的大忙。他预言说，在这过程结束时，“人民革命的魔影就会出现”。他对这一点充满了信心，以致敢于特别地预言说，只要再过两三年，“魔影就会出现”^②。很少有什么政治预言比这灵验的了。正好过了三年，就爆发了1905年的革命。

不管这篇文章在政治质量上如何高，它却不是一篇在文字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22页。

技巧上出色的东西。它一点也没有学术气。当朱加施维里二十二岁的这个时候，列宁已经写了一些经济学和统计学的论文，这些论文使很多经济学的讲师甚至教授都为之汗颜。托洛茨基和朱加施维里同一年生，作为《火星报》的重要撰稿者，他很快就声名四扬。象朱加施维里的这篇文章是很难登到《火星报》上去的，更不用说登到也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出版的更为高级的《曙光报》上去了。从这样的标准来判断，他的文章充其量只是一个门徒和模仿者的作品；他的社会学的论证是粗糙的；他的风格虽然有自己的那种说服力，但还是太平淡了。《火星报》的编辑们，特别是列宁，能够很容易地说出这个外省的作家细读了他们的哪些文章，并且能够指出哪些段落完全是从他们那儿抄来的。但是，拿极为老练的俄国社会主义杰出作家的标准来衡量朱加施维里的第一篇写作，这也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因为《斗争报》已经谦虚地向读者自我介绍说，它不过是这些杰出作家的在格鲁吉亚的代言人。从高加索当地的标准来看，朱加施维里的文章还是很有技巧的。今天的读者读到这篇文章，把它同这一作者后来的一些写作加以比较，对于它较为成熟的风格不禁感到惊奇。这篇发表于《斗争报》上的文章，是这位作者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一篇东西，很少有比这更好的，而很多却在内容与风格上比这篇更糟糕。

详细叙述朱加施维里随后几周乃至几年的活动，这将是令人厌烦的事。他现在过着一个被追捕的鼓动家和组织家的典型生活；其中充满了罢工、街头示威、秘密集会、代表大会等等。

他的活动同他那一类人的活动完全一样，所以大多数事情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只是在三四十年以后，才开始对它们进行研究。他的朋友和敌人都在搜寻有关他早期活动的详情。他的朋友们热衷于指出，这位伟大领袖甚至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异常的崇高；而敌人们则同样决心把这个恶人的罪恶追溯到他的摇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写出的为之辩护和对之谴责的书籍有如汗牛充栋，但对了解斯大林的真实情况却无多少帮助。在一堆毫不相关的论争中，只能找到少数几件不容置疑的事实。

1901年11月，他被正式选为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委员。这个机构有九个人，领导这个高加索首府的各社会主义小组，而且暂时还是全高加索的实际执行机构。朱加施维里因此处于优越的地位上，控制了整个地区的运动。但是，在他提升后才两个星期，他就离开梯弗里斯到巴统去了。巴统是邻近土耳其的一个新的石油工业中心，刚刚由油管同巴库联结起来。梯弗里斯委员会的中心人物是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就是曾经袭击正教中学校长和后来成为朱加施维里的社会主义导师的那个人。这两个人相处不好。吉布拉泽可能对他的学生有点以恩师自居而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此外，吉布拉泽还和“麦撒墨达西”中温和的一翼站在同一边。政治和私人之间的对抗，使他们颇难合作。朱加施维里离开梯弗里斯到巴统去，这对吉布拉泽，对朱加施维里，对梯弗里斯委员会来说，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巴统需要一个精力旺盛的社会主义组织者；而且两个竞争者中资历较浅的一个，为了发挥他的精力和雄心壮志，到那儿去的确是一条出路。^①顺便说一说，正当朱加施

^① 贝利亚前引书，第24—25页；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29—30页。

维里呆在邻近土耳其的那个城镇时，他开始使用柯巴这一假名，在土耳其语言中它的意思是“不屈不挠的人”。在格鲁吉亚诗人卡茨贝格的诗里，柯巴是一个英勇的逃犯、人民的复仇者的名字。朱加施维里还在童年时期就很喜欢卡茨贝格的诗。在他采用另一个更为出名的假名斯大林之前，柯巴就成为他的同志们所熟悉的名字，一些高加索的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很久以后都一直叫他柯巴。^①

巴统比梯弗里斯小得多，它的人口仅有二万五千，而梯弗里斯则有十五万人。但是主要由于外国资本的流入，它作为一个工业中心而日益重要起来。主要的石油工厂属于罗斯柴尔德康采恩；高加索四分之一以上的产业工人居住在巴统。虽然这个城市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宣传，但还没有一个紧密的秘密组织。柯巴决心要填补起这个空白。在到达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召开了一次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会议——表面上只是举行一次愉快而无害的新年舞会。在这次会上选出了巴统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他的下一步打算就是设立一个秘密印刷所，就象克泽霍越里在巴库所做的那样。印刷所设在一间小屋里，它同时还是他的宿舍。印刷工人当然都是社会主义者，其中的一个后来回忆道：“铅字都放在火柴和香烟盒里，有些就放在纸条上。”一个目击者回忆说，柯巴坐在印刷所中间的桌子旁书写传单，然后就交给排字工人。^②柯巴还不时地旅行到梯弗里斯去，同委员会的人们进行联系，参加他们对事情的评议，并报告他在巴统

^① A·S·阿利卢耶娃：《回忆录》，第110页。

^② 见S·托德里亚和G·卡拉泽的回忆，载《1902年的巴统示威游行》，第53、73页。

的成就。由他亲自撰写并在他的宿舍里印制出来的传单，散发到了石油工厂、货运车站和一些工厂里，很快就引起了政治骚动和劳工纠纷。秘密警察的一个机密报告说：“1901年秋，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派了它的一个成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他从前是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的六年级生）到巴统来，目的是在工厂工人中进行宣传。由于朱加施维里的活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已经开始在巴统的所有工厂中出现。社会民主党宣传的后果已经在1902年里看到，罗斯柴尔德工厂发生了长期的罢工，街头发生了一些示威游行。”^①在一次这样的示威游行中，高加索来福枪营向群众开火，十五个工人被杀害，许多工人受伤。暗探局这时更加努力来发现秘密印刷所和社会主义鼓动者。1902年4月5日，柯巴在巴统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被捕，印刷所却没有被发现。

他在巴统才呆了四个半月，但这是紧张活动的几个月。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因为它对未来的事件投上了暗影。柯巴在巴统的活动，引起了由尼古拉·齐赫泽领导的当地更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尖锐批评。齐赫泽和柯巴一样也是一个正教中学的肄业生，他小心谨慎地在黑海岸一带播下第一批社会主义的种子，由于他知识广博和口才流利而享有很高的威信。显然，这

^① 见关于斯大林活动的警察报告，《1902年的巴统示威游行》，第177—190页。在《斯大林与哈希姆》一书第14—32页上，有对巴统组织的原始东方背景的生动描述。柯巴被警察追捕，就迁往巴统附近的阿布哈齐安村。他住在一个老穆斯林哈希姆的房子里，并把印刷所也搬到了那里。组织里的人戴着高加索妇女传统的长面纱化装成女人来取非法传单。这件事引起了邻居们的怀疑，传出谣言说柯巴在印制假钞。于是村民们要求分享利益，使情况变得很危险。但是柯巴显然成功地向村民们解释清楚他工作的真正性质，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不过，他答应哈希姆，他将要信仰伊斯兰教。

位宣传家后来对于建立一个有效的秘密组织有些胆怯。他认为，在象巴统这样的小城里，不容易保守秘密，秘密活动会被暗探局扼杀在萌芽状态中，所以这样的一个组织没有任何机会能够存在下去。他认为柯巴的计划是轻率鲁莽的，因此亲自并通过朋友们恳求柯巴打消这一计划，让当地的社会主义者自行其是。但是柯巴并没有被说服。他虽然被对手谴责为“瓦解组织者”和“疯子”，但仍要把他的计划贯彻到底，并斥责齐赫泽是“内心怯懦”。^①后来这两个格鲁吉亚人又在更大的冲突中相遇。十年以后的1912年，齐赫泽成为孟什维克在圣彼得堡的雄辩家和国家杜马（沙皇的准议会）中社会主义党团的主席，而柯巴则是处于秘密状态中的布尔什维克的一名领袖，在幕后操纵着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们。1917年，齐赫泽是孟什维克的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当布尔什维克得势以后这一职位由托洛茨基继任），而斯大林则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革命的那一年里，这两个格鲁吉亚的正教中学肄业生都参加了在沙皇首都的战斗，他们各自的禀性同他们在巴统交锋时没有什么不同。

^① 贝利亚前引书，第29页；《1902年的巴统示威游行》，第64—65页，187—190页。

第三章

总 演 习

斯大林在巴统监狱中。——沙皇的监狱是革命的教育中心。——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列宁；党章的第一条。——1903年斯大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4年从流放地逃出后返回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斯大林在1904年后期转向布尔什维主义。——1905年革命。——彼得堡苏维埃。——高加索的农民暴动和士兵暴动。——斯大林成为列宁的信徒。——从地下走出。——斯大林（以伊凡诺维奇的假名）参加在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全俄党代表会议（1905年）并第一次会见列宁。——1906年斯大林首次出国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土地改革上同列宁意见不一致。——“战斗小队”。——党代表大会反对“没收财物”。——托洛茨基指控布尔什维克。

1902年4月初，柯巴—朱加施维里被关进巴统的监狱，他并不需要什么殉道者的异常才能来同他的命运奋斗。沙皇的监狱虽然名声不好，但对于熟知希姆莱或叶热夫的残酷以及比尔森和奥斯威辛死亡营的一代人来说，它似乎还是温和的，甚至几乎是人道的。沙皇监狱和流放地的当局是一种残忍和“开明的”无效率相混合的东西。对于那些憎恨现存制度的囚犯，它们是够残忍的；但由于它们腐败和无效率，也使得革命工作即使在监狱的铁栅中还能有效地进行。对于许多年轻的社会主

义者来说，监狱是他们的“大学”，他们在那儿往往能够得到有经验的导师的指导，受到可靠的革命教育。政治犯照例能够享受某些不给予刑事犯的“特权”，以一种团结一致和相互帮助的精神来组织他们的公共生活。监狱通常就是一个大辩论的社团。这就勿怪有些前囚犯在回忆录中说，当他们离开监狱走向自由的时候，感到一种淡淡的悲哀。

柯巴十分严于律己，起得很早，工作很努力，书读得很多，是监狱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的辩论者。许多年以后，同监狱的人还回忆起他滔滔不绝地反对农业社会主义者和“火星派”的其他反对者。他在辩论中的态度是合乎逻辑的、尖锐的和蔑视一切的。除了参加这些讨论外，他就保持缄默，镇定自若和离群而居。直到现在，几乎所有回忆录作者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有的地方也有分歧。朋友们回忆他是一个耐心的、敏感的和有益的同志，而反对他的人却把这位自信的辩论家形容为邪恶的阴谋家，喜欢谩骂自己的批评者，并煽动他的狂热追随者来反对他们。^①柯巴从巴统转移到库塔依斯的另一座监狱，然后又从那儿转回巴统。他总共在高加索的监狱里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直到1903年11月底。检查当局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来反对他，他们手头只有一些秘密警察的报告，而一个正常的法官是不会把这些东西作为判罪的正当理由的。就象很多定不了罪的嫌疑犯一样，柯巴被“行政”判处流放三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依尔库茨克州的新乌达村。囚犯是不能行使人身保护权的；也没有任何法律来保护他们免遭当局的滥用权力。

① E·雅罗斯拉夫斯基前引书，第31页；《1902年的巴统示威游行》，第96—97页。

当柯巴在监禁的时候，外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地方性的，它使斯大林在地下工作的地位大露头角；另一件对于俄罗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柯巴的一生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903年3月，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成立了一个全高加索联盟。柯巴被缺席选入它的执委会。任何一个代表大会把一个被监禁中的成员选入领导机构，这的确是稀罕的事，除非这个成员在地下工作中的作用十分突出，以致这个组织值得冲破一切困难到监狱里去同他商量重大问题。为了贬低或者夸大柯巴在那些日子中的作用，许多人已经写过不少东西。但是，选举这一事却暗示，他在小小的二十二岁年纪时，就已经是他本地地下工作中的“灰主教”^①了。他肯定不象托洛茨基所形容的是一个平凡的、无足轻重的普通成员。但他也不象他的传记作者所形容的是“高加索的列宁”。他的性格即使是出众的，但仍太灰暗。

另一甚为重要的事件，7月间在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人民大厦”一间里屋开始（这间屋子里堆着成包的羊毛，遍地都是跳蚤），8月下半月晚一些时候在伦敦结束。在布鲁塞尔终于召开了由“火星派”准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实际上，这是第一次真正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虽然历史学家们由于尊重1898年在明斯克召开的那次失败的会议，把这次称为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进行几天之后，代表们发现他们的行踪受到沙皇暗探的密切监视，于是代表大会就匆匆地从布鲁塞尔转移到伦敦去。代表们希望完成“火星派”的

^① 十七世纪法国红衣主教和权相黎希留的私人秘书皮尔·约瑟夫对黎希留影响极大，故被称为“灰主教”，特指幕后行使权力者。——译者

工作，并最后形成全俄罗斯的党。但结果并没有如愿，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分裂成两派：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革命派和温和派，或者如他们最初被称为的“强硬派”和“软弱派”。“火星派”发生冲突的这次会议是由二十三岁的托洛茨基主持的，因为较老的领袖们对由谁当主席没有达成协议。十四五年以后，这次分裂震撼了欧洲和世界，其猛烈程度不亚于四百年以前由马丁·路德发动的另一一次分裂。但是分裂的起因似乎是极端地微不足道的。产生宗教改革运动的维登堡教堂的背景，比之于产生布尔什维主义的布鲁塞尔那座充满羊毛包和跳蚤的“人民大厦”来，肯定还少荒唐一些。路德在教堂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向罗马教廷挑战。列宁的挑战最初只是一个小段落中的一句话。如果说路德感到惊奇而宽慰的是，反对他的主张的力量很小，那末列宁对于他引起了分裂却是如此激动，以致代表大会之后不久他就弄得精神崩溃了。^①据说路德的论纲在公布后两星期就传遍了整个德国，而列宁关于党章的第一条却一直不为外间广大的人们所知。不过，1903年7月至8月间滚进历史中的那个球，就一直滚下去了。

党章第一条规定什么人可以当党员。表面看来，这不牵涉到什么原则或策略。实际上，代表大会在通过了纲领和策略决议之后，是把这一点作为纯组织问题来讨论的。代表们的面前有两个草案。列宁的草案说：“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党员。”另一个由马尔托夫

^①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72—80页；托洛茨基：《我的生涯》，第154页。

提出的草案中，“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被代之以“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①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这两个说法差不多是一致的，而争论似乎是作过分细致而无益的分析。但是，在争论的下面，却是关于党的观点和结构的两种互相区别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主张。列宁坚决认为，只有固定地参加党的地下组织的人才能被认为是党员，并有正式的权利去影响党的政策。他不让党包括那些日益增加的外国同情者和同路人，不管他们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秘密组织的成员将要成为革命的战士，自愿接受党的纪律，并准备按照中央领导机构的命令和指示去行动。不能指靠同路人成为坚定而可靠的革命战士——他们只是党的无形的和动摇不定的民间后备力量。照列宁看来，党是一个紧凑的、紧密结合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具有无穷无尽的打击力量。如果让那些不坚定的、心情易变的同情者参加，就会冲淡它的实力和削弱它的打击力量。列宁认为，这正是马尔托夫条文中所隐藏着的危险，因为他只要求党员在组织的“监督和指导下”工作，而不在组织中进行有纪律的工作。

党是革命的工具。迄今的争论还只是这一工具的形状问题。双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在革命本身的性质上是认识一致的。但是，甚至在代表大会以前，《火星报》的编辑们就模糊地意识到他们在观点上有分歧。他们半开玩笑地彼此称对方为“强硬派”或“软弱派”。列宁无疑地是“强硬派”。“这是一个用罗伯斯庇尔材料做成的人”，普列汉诺夫论及他的这位前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230页；F·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第266—280页。

学生时这样说过。这位前学生此时正在明显地争取领袖的地位，而无视那位老近卫军。马尔托夫同样无疑地是“软弱派”。但是直到这时，这种分歧还只看作是个人性情和气质上的分歧，是为了共同目的而斗争的一群人中难免的事情。这种气质上的分歧还没有来得及转变成为明确的政治敌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参加者们对于争论的激烈也感到吃惊和沮丧。他们认为，他们的感情太冲动，以致超过了健全的理智。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这场意外的风暴之后会有更晴朗的天气；这个在团结上的小小裂痕能够容易地弥补起来。在这个直接引起争论的问题（党章第一条）上，列宁失败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以二十八票对二十三票获得通过。列宁欣然地接受了这次败北。他说道：“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有决定全党生死存亡的严重意义。我们决不会因为党章中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①所有这些演员似乎都不想表演下去了，他们错误地把戏剧的序幕当成了尾声。

代表大会临近结束时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和《火星报》编辑部成员，又爆发了一次新的风暴。列宁派的候选人意外地获选，马尔托夫派的候选人则失败了。这次选举的情况纯属偶然。由于“软弱派”的一些代表离开了代表大会，所以只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投了票。列宁派的候选人只以两票的多数当选（十九票对十七票，三票弃权）。列宁坚持这次投票的合法性，因为他有正式的权利这样做。但是“少数派”却拒绝接受失败。从这以后，列宁的追随者们就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布尔什维

^① 唐恩前引书，第281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278页。

主义这个不合理的词，连同与俄文原意相去甚远的 它的 世界性字尾，从此也就进入了政治辞典。马尔托夫的追随者则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这两个新的“主义”并不反映原则上的分歧，而只反映一次投票中的偶然性的算术计算，它们仿佛是故意设计了来标志一次表面上的和转瞬即逝的分裂。但事实上，它们的确标志了一次使这个运动从头到脚分开的大分裂。

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拒绝承认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并宣布抵制它。列宁坚持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他说，多数票选出的候选人是有效的，中央委员会是党合法的最高权威；孟什维克对它的抵制是一种不能容许的个人主义行为，对无政府主义不能加以容忍。由此又以更大的力量重新展开了关于党的性质和结构的争论。孟什维克反对列宁在党内实行“戒严状态”，反对他的建党思想。他们指责他把毫无生气的兵营纪律强加给社会主义。争论的范围逐渐扩大，甚至列宁也是在多年之后才理解了它的全部含意。

起码有一点很快就清楚了：在组织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反映了对革命重大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孟什维克把党看作是一个比较广泛并因而是比较松散的组织，它应该努力去包罗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并在最后和他们等同起来。这种观点是根据这样的信念而来的，即认为无产阶级因社会主义志趣相投，以致可以把整个无产阶级看作是潜在的社会民主党。列宁认为这种认识是幼稚的。他把工人阶级看成是极为参差不齐的群众，它由于出身和观点的不同而区分，并由于宗派的利益而分裂。照他看来，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所有部分都能接受高度的社会主义启蒙的。他们之中有些人极端无知和迷信。如果党企

图包罗整个或大多数无产阶级，它就会象无产阶级本身那样变成参差不齐的东西——它既包罗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包罗了它的弱点；它既包罗了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憧憬，也包罗了它的愚昧无知；它既包罗了无产阶级的雄心，也包罗了它的落后。它将会变成工人阶级的没有活力的偶象，而不是它的鼓舞者、领袖和组织者。^①按列宁看来，指望工人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这是愚蠢的想法，因为按照他们的本愿，他们最多只能达到纯粹的工联主义，而这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一致的。列宁引证了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考茨基的话，一再地谈到这样的论点：社会主义只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从外部带入工人运动中。这就证明，指望群众中“天生的”社会主义是不行的。党必须是一个有选择的团体，它只包罗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和勇气的部分，即能够进行坚决而有纪律行动的真正的先锋部队。对于孟什维克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好象是布朗基主义的一种不祥的翻版。布朗基主义是巴黎公社时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它认为，进行革命的唯一方法是，由一小群密谋的人不顾多数人的意愿，采取直接行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强烈谴责布朗基主义，列宁也急于要避免这种指责。他解释说，在他看来，只有人民中的大多数人需要并加以支持，革命才能胜利——他以此同布朗基加以区别。但是，大多数人必须由积极的和高度组织起来的少数人领导——他以此同孟什维克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加以区别。西欧的社会主义者，象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那样的人，是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边的。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455—458页。

孟什维克、特别是它早期最有力的发言人托洛茨基，从更早的历史中找寻类似的情况，批评列宁的“雅各宾主义”。列宁对这个称号并不生气。他甚至颇为骄傲地接受这个称号，只是说，雅各宾是下层资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党，而他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创造者难道不就是雅各宾吗？一个革命者把雅各宾主义当成一种侮辱人的字眼难道不是古怪的吗？他最后说，他只批评今日的吉伦特派，他们是那些胆怯的调和主义者的模仿者，为了使雅各宾上升到顶点，革命不得不把他们扫除^①。在这一点上，历史似乎比那些小册子和微不足道的“宗派”期刊所进行的辩论还要雄辩。托洛茨基马上提醒列宁说，雅各宾的故事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结束，它的尾声就是雅各宾领袖的互相屠杀。托洛茨基于1903年写道，雅各宾“砍掉人民的头——我们却要用社会主义来启蒙人类的心灵”。“雅各宾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最终将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法庭上被控以调和的罪名。马克思的狮头将首先从断头台的刀片下滚出。”在列宁听来，这些话是虚夸而空洞的。这种对于尚属遥远的革命后时代所进行的思辨性一瞥，并不能使他动容。他旺盛的聪明才智，这时完全集中在准备革命和为此锻造工具的更为直接的任务上。托洛茨基和其他孟什维克认为那个党绝对不能完成革命，但他们却又无力产生任何满意的东西来代替列宁的建党计划。

在第二年即1904年的过程中，全俄国都感到了政治地震的头几次震动。在2月份开始的日俄战争中，沙皇制度遭到首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第90—102页；《列宁全集》，第7卷，第377页。

次的失败。资产阶级自由派由于这一事件而大胆起来，开始公开地要求结束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社会民主党应该怎么办呢？孟什维克争辩说，他们有义务去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反对专制制度，因为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中，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注定了要进行领导的。列宁反对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更不用说接受它的领导了。自由派新表现出来的勇气是靠不住的。列宁预言，他们不会有效地和长期地反对专制制度，因为他们害怕革命就象害怕沙皇制度一样。工人阶级，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必须承担起领导责任，即使这场革命并不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①到了这个阶段，所有关于策略和原则的事情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分裂日益深化，也日益剧烈。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赢了第一个回合，但很快又输了第二个回合。他一心一意地坚持他的观点，无情地反对他的对手，以致没有能够使他的盟友甚至追随者跟上他的步伐。孟什维克的反叛者拒绝投降，并继续抵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部。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曾支持列宁，这时也热衷于同孟什维克和解。遭到抵制的中央委员会对自己形式上的权威感到不安，并拒绝把它强加给不愿意接受的成员。列宁发现自己几乎陷于孤立。他辞去了《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让这家报纸由孟什维克掌握。这样他就丧失了他初期胜利中的重要部分，因为俄国地下活动的大多数线索都掌握在《火星报》手中。列宁虽然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失去了他的机会（表面上他的地位还是巩固的），但却没有被孤立所吓倒。相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28—45页；唐恩前引书，第358—362页。

反，他勇气倍增，才智横溢，即使被朋友所抛弃和被对手所嘲笑，仍在孤军奋斗。他把斗争的重点转到俄国的地下活动。他呼吁地方委员会反对孟什维克和那些急于同孟什维克和解的布尔什维克。

* * *

当西欧的俄国流亡者聚居地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新争论时，柯巴-朱加施维里却从一座监狱转到一座监狱，直到1903年11月，他才被流放到新乌达村去。装载流放者的船队，由宪兵护送，离开黑海海岸，开始了前往寒冷的西伯利亚的长途跋涉。在这以前，柯巴也许听到也许没有听到关于分裂的初步传闻。一个多月以后，柯巴才到达新乌达村。在路上，船队经常停下来装载更多的流放者。当这些流放者向东行进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感到日俄战争的迫近。由于气氛太令人激动和太狂热了，使得柯巴不能容忍同政治隔断三年之久的前途。他一到达目的地，就开始准备逃跑。在战争前夕的混乱中，接近满洲边界的当局防范削弱了，地下运动能组织起大规模的逃跑。1904年1月5日，柯巴开始了横过雪原的旅行，他经过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库兹涅茨克大工业区，而当时却还是一片不毛的荒原。一辆农民的大车载着他向乌拉尔西行。他在途中冻伤了，但终于在1904年1月或2月初重新出现在梯弗里斯。

这时，代表大会的情况已经传到了高加索组织。三个在代表大会上曾同列宁站在一起的高加索代表从伦敦返回。他们对大会的叙述自然是对布尔什维克十分有利的。未来的外交家列昂尼德·克拉辛也曾经追随过列宁。他在高加索很有影响，是

一个著名的技术人员，在工业中任高级的管理职务。他能够给地下活动以谨慎而宝贵的帮助。在柯巴从西伯利亚返回前不久，列宁的一个年轻的拥护者列昂·加米涅夫访问了梯弗里斯，也起到了游说的作用。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在高加索的初期胜利很快就丧失了。事实上，正是克拉辛本人领导了主张和解的布尔什维克来反对列宁的。他急于不使分裂破坏这个年轻的组织，就照常领导这个组织的日常活动，仿佛没有发生过分裂似的。特别使列宁感到愤怒的是，他把曾经印刷《火星报》的巴库一家大而有效率的秘密印刷所交给了现在负责这家报纸的孟什维克。在孟什维克的队伍中，和解者同不可和解者也在争吵不休。

因此，柯巴一回来就陷入了混乱而变化不定的派别斗争中。由于分裂的不断恶化，争论的内容就更加混乱了。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初反应不可能不是模糊的。多年以后，他的官方传记作者宣称，由于他使徒般的锐利目光，甚至还在流放西伯利亚以前，他就已经同列宁站在一起了。这种说法受到托洛茨基的挑战，他断定柯巴最初是一个孟什维克^①。实际上，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曾经是一个孟什维克，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自己宣称的在分裂以后他立即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情况很可能是，起初他克制住不参加任何集团，企图在互相矛盾的报告中寻出一个头绪来。他的犹豫（如果这个词能够正确地表达他当时心情的话）没有持续很久。他从西伯利亚逃出后几个月，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50页。托洛茨基的这一断言是根据1911年警察报告中的一句话而来的。这个报告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准确的。例如，它声称斯大林仅仅到了1902年才参加社会民主工党。

就下定决心支持列宁。到1904年底，他已经热心地鼓吹布尔什维主义了。

他在报上谈及分裂的第一篇文章叫《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用格鲁吉亚文写成于这一年年底，1905年元旦发表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①。这个刊物的前身是《斗争报》，即他三年前发表处女作的报纸，它停刊一个多季度以后，才出版了《无产阶级斗争报》来代替它。这篇文章是列宁著名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的摘要。斯大林说，政党是“战斗的领导集团”。因此它必须是：（一）在人数上比无产阶级少得多；（二）在觉悟和经验上比无产阶级更高些；（三）比任何无产阶级的组织都要更团结一致。“一个以领导**战斗的无产阶级**为目的政党，就不应当是个人的偶然凑合，而应当是团结一致的集中的组织。”“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果观点的一致被破坏了，党也就要瓦解的。”消极承认党的观点是不够的。不少的空谈家很乐意承认任何纲领。无产阶级的战斗是不能依靠自由行动的人来赢得的。“以前我们党很象一个好客的宗法家庭，愿意把一切同情者都接纳进来。”但是，现在“我们党……完全变为一座只对够资格的人开放大门的堡垒了”。这座堡垒究竟如何同社会主义者的宴会厅加以区别，倒是孟什维克很感兴趣的问题。柯巴引用了列宁的全部论据，甚至使用了他的一些比喻。只有一点是他独到的见解，即我们在他早期文章中已经熟悉的东西，他坚持认为，党内必须在观点上保持一致。他意识到，在这一点上，他比列宁还更加强调和更加直截了当。但是他相信，他同列宁的意图是完全合拍的。他说道：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55—64页。

我们知道，马尔托夫的条文只说到承认纲领，关于策略和组织却只字未提，其实为了保证党内的一致，不仅要有纲领观点的一致，同样还要有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的一致。有人会对我们说，列宁同志的条文也没有讲到这一点。不错！但是要知道，列宁同志的条文是没有必要讲到这一点的！一个人既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就必然和党在一起进行斗争，服从党的纪律，所以他除了遵循党的策略和党的组织原则而外，当然不能遵循其他的策略和其他的组织原则，难道这还不明白吗？①

这位作者根本没有想过，有些人是可能成为党员的，他们接受党的纲领和纪律，但在一些次要的策略问题和组织方法上却执异议。他所坚持的观点有着“铁板一块”的正统气味；布尔什维主义在获胜以后，正是主要在斯大林的指导之下，变成了这种“铁板一块”的正统主义的。但这是后事，暂且不提。甚至列宁也不认为分裂是不可克服的。他仍然希望各个派别最后会熔合起来；而且他坚信，党的胸怀是宽广的，足以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如果团结的因素——共同的原则、集中和自觉的纪律——强大到足以使他们维系在一起的话。

1904年夏，列宁的年轻助手加米涅夫刚刚从莫斯科监狱中释放出来，回到了梯弗里斯。加米涅夫比柯巴见多识广，虽然他比柯巴还小三岁。他曾经在莫斯科大学进行过革命活动，到过日内瓦、巴黎和伦敦，在列宁亲自领导下在国外工作，并同《火星报》中的其他一些领导成员辩论过。他不可能不对柯巴施加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62—63页。

某些影响。他目前的任务是准备召开一次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地区代表会议——类似的代表会议在俄国北部和南部都已召开过。不知是什么原因，柯巴没有参加11月间举行的高加索代表会议。三个地区性的代表会议选举了一个全俄布尔什维克常务局，由未来的苏联总理亚历克赛·李可夫和未来的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辛·李维诺夫领导。这个常务局是列宁同那个动摇的中央委员会相抗衡的力量。现在他可以宣称，他对于孟什维克的不可调和的态度已经得到俄国工人地下力量的支持。他建议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来结束迄今普遍存在的暧昧不明的情况。布尔什维克中的调和者也接受了这一建议。柯巴于是就投入了为召开代表大会的斗争中去，从这一年年底一直忙到第二年年初。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对柯巴具有吸引力，其一般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从气质上来看，他是属于革命者中的“强硬派”的，任何形式的软弱都不是他的性格。列宁的思想以其固有的优点吸引了他。这些思想鲜明而锐利，十分合乎他的心意。除此之外，列宁主义还有一个方面，对于他精神和情绪上的紧张情况，即使在早期也产生过一种安抚的效果。孟什维主义似乎轻视或者甚至贬低象他这样的人的作用，而布尔什维主义却似乎重视他们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观点，职业革命家，即被追捕的和长期生活贫困的鼓动者和组织者，是“社会中坚”。正是这种人在不断地把真正的社会主义灌输给自发的工人运动。象柯巴这一类型的委员会的人，是革命所精选出来的人。不难想象，列宁的理论必定给予柯巴很大的自信和骄傲，因为他在正式的社会中是没有地位的，甚至在地下工作中也不能出人头地。他必定渴望得到某种形式的精神补偿。按照这种理论，他代表的

恰好是反对普遍混乱的高度组织原则。在列宁主义思想的这面镜子中，他看到自己好象是阿特拉斯^①，肩负着人类的未来。

地下的党已经开始在培养它的核心组织、等级制度和官僚机构。不论是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都难免于此。这种等级制度决不比西欧任何正规而高尚的政党官僚机构为差，但在某些方面——理想主义、对事业的忠诚、甚至教育——则优于它们。本来，按照孟什维克的党的模式，个人是没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可言的。从理论上来讲（虽然决不是从实际上来讲），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即“每一个罢工者和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平等的。马尔托夫是一个理论家和文人，而不是任何等级制度的头子。列宁也不是。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宣传者，他虽然是无人能够匹敌的，但即使在那些早期的年代里，他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了。他理直气壮和毫无禁忌地去这样认识和行动。他明确地规定了那个行政机关的结构，并使它的活动提高到理想的高度。^②柯巴所以热情地响应列宁的说法，正是因为他在精神上得到提升而在下意识中对此感激不尽。

* * *

当地下的社会主义运动被争论弄得四分五裂，而各个派别又继续在发狂地争吵时，它们几乎没有注意到第一次俄国革命

① 希腊神话中顶天的巨人。——译者

② 因此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结束他关于党章第一条的演讲时说：“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列宁全集》，第6卷，第453页）后来他又说过：“必须组成一个坚定不移的、忠实的火星派内阁。”（《列宁全集》，第7卷，第64页）

的爆发。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1905年4月间在伦敦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列宁从《火星报》退出后，终于在日内瓦出版了一家新的报纸——《前进报》。孟什维克宣布，他们将抵制这次代表大会，并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与此同时，日俄战争以旅顺口陷落和俄国失败而告结束。旧历1905年1月9日，大批工人群众在加邦神父的带领下，进军彼得堡的冬宫，向沙皇递交请愿书。游行队伍是和平的。它的参加者都信赖沙皇，认为是坏的大臣对他蒙蔽了人民痛苦的真象。请愿书的调子是悲哀而胆怯的。游行者携带着很多教堂的旗幡和沙皇的画像，有力地证明了这次游行忠于皇家的性质。沙皇卫队向他们开了火。打向群众的排枪成了革命的信号。罢工遍及整个国家。革命者暗杀了朝廷心腹顾问之一的塞尔盖大公爵。

头一批罢工的浪潮还没有平息，全国各地又爆发了农民的暴动。帝国的边缘地区都卷入这阵狂潮中。波兰城市罗兹的罢工导致了武装起义，持续了近一个星期。华沙和敖德萨的街道和广场上筑起了街垒。停泊在敖德萨港的“波将金”号装甲舰的水兵也参加了起义。在某些城市，罢工者选举了工人代表委员会——这是在群众运动的大动乱中出现的第一批苏维埃。沙皇的信心动摇了，作出了让步，答应召开杜马（协商会议），但工人在其中并没有代表。所有的反对党，从自由派到布尔什维克都抗议沙皇的敕令。10月间，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爆发了全国总罢工。所有的铁路都停顿了。彼得堡的罢工者选举了工人代表委员会，即彼得堡苏维埃，它很快就成为革命极为壮观的中心。在一个短时期中，彼得堡苏维埃成了官方行政机构的实际对手，它的命令和指示得到普遍的遵守。苏维埃号召全国停止

付税给沙皇。结果它的成员连同他们年轻的主席列昂·托洛茨基都被捕了。于是爆发了新的罢工，它的顶点是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这是第一次革命的真正高潮。后来起义失败了，因而革命也开始退潮。虽然革命仍能重整旗鼓，但已经越来越弱，最后就失去了动力。整个1906年，甚至到了1907年，狂热的劲头仍然很强，以致政治领袖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运动实际在退潮中。差不多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期待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但是沙皇逐渐恢复了信心，撤销了他当初在恐慌中作出的半自由的让步。1907年6月3日的政变，标志着这次革命的结束。那一天，新任的总理大臣斯托雷平解散了“第二届杜马”，逮捕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五十五人。^①

后来列宁把1905年的革命描述为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但是人们要问一下，在这次总演习的过程中，1917年的那些主要角色是怎么行动的？答复是惊人的：大多数的主要角色根本没有出现在舞台上。未来的主角扮演者列宁本人就只满足于在离舞台很远的地方起鼓动者的作用，以致真正的表演者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当革命高潮兴起的时候，他仍然流亡在日内瓦。只是到了1905年10月底，即彼得堡游行后差不多十个月的时候，他才离开瑞士。当他最后到达彼得堡时，总罢工已经过去，事情已成定局——革命发展到了它的下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无望的高潮，即莫斯科起义。这位革命的伟大建筑师已经无能为力了。

是什么原因使列宁在那一年的关键时刻不能回到俄国呢？他有一切理由认为，他回国后，沙皇警察必然要追踪他；的确，当

^① 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捕者为六十五人。——译者

他11月在彼得堡出现时，警察果然在追踪他。但是，这不足以说明他迟迟不离开瑞士的原因。他知道他对革命的价值，无疑也明白他离行动的舞台近一些是重要的。当他终于返回时，他在一个秘密的隐藏地点指导他的追随者们；他很早以前本来就可以这样做的。是不是他当时还没有理解自己长期渴望和预言的那个事件的充分意义呢？他显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革命时机的重要性。他必定是认为，这个革命的过程还要拖长一些，高潮还没有十分接近，革命的来潮和退潮不会象后来事实证明的那样突然。甚至在潮流已经肯定地转变时，他仍坚持这一错误的认识。

这时，他急于利用时间来制订他的革命策略，引起他的追随者的注意，并教给他们起义的艺术，等等。当革命已经等不及他工作的结果，自行闯上门来时，他仍在革命政治的实验室里进行着实验。对于革命的科学家和实践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一方面，他看到俄国的整个运动都是自发的，由各种偶然的动力推向前进，不协调，不成形，缺乏领导。他是不相信自发性的。他要求党准备好去承担领导责任，照他看来，只有劝使党抛弃孟什维克的观点，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即便如此，如果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从在瑞士的隔离状况中走出来，他是可能有更好的机会去影响事件的进程的。在流亡的领袖人物中，年轻的托洛茨基是唯一的一个人，一听到消息就冲上战场，成为第一次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在列宁的脚跨入俄国时，托洛茨基已经即将成为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1905年以后，列宁必定不只一次地回想到他失去的机会。当第二次革命来临时，他就决心不再坐失。1917年，他毫不犹豫地穿过当时仍在同俄国作战的德帝国，登上回国的旅程，以便在第二次革

命的早期就出现在俄国的首都。

列宁在这次“总演习”中的相对失败是无独有偶的。在孟什维克的重要领导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次要人物中，没有一个是表现不错的。1905年革命的汹涌浪潮席卷而来，使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其他人都搁浅了。除了托洛茨基以外，1905年的领导者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他们为群众的热情和义愤所卷入，但却没有什么革命的训练和技术。托洛茨基扮演了近乎他1917年所扮演的角色，1917年他也是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但是，如果把他在1905年和1917年的角色加以比较的话，就鲜明地看出他在第一次革命中是“不成熟的”。在第一次革命中，他几乎是以一个孤立的个人身份活动的。在1917年，他的巨大的个人才能，由于受到他刚参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有力支持，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在1905年，他主要是进行热情洋溢的演说和表现出颇富戏剧性的革命挑战姿态，虽然没有产生立即的实际效果，但却唤起了群众的想象力，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这个事业。当哥萨克兵和宪兵包围了正在开会的彼得堡苏维埃时，是托洛茨基命令它的武装成员放下武器投降的，因为再进行抵抗已经是无益的了。他在沙皇法庭上的鼓舞人心的演说，赞颂了这次革命，并宣称它有权进行武装起义。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许多工人的心，成为下一次革命的种子。但是尽管有这些表现，他仍然有许多外行的言行，这是他在1917年时所没有的，当时他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绝没有作放下武器的任何表示，而是带领人们去争取十月起义的胜利。

在那“干革命蠢事的一年”里柯巴—朱加施维里的表演如何呢？在这整个期间，他没有起到全国性的作用。他仍然是一

个地区性的高加索的领导人。但是，高加索却是这次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它虽然只是一个地区，但多次成为帝国其余部分的典范；当反革命已经得势而俄国的其余部分被迫沉寂下来的时候，高加索是最后一个承认失败的地方。1904年12月，在彼得堡工人向冬宫进军前几星期，巴库的石油工人发动了一场顽强而长期的罢工，结果是工人和雇主之间签订了一项集体协定。这是在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签订的集体协定。工业家们被迫同罢工的秘密领导者——实际上是被宣告为不合法的委员会进行谈判。在一定意义来说，在巴库发生的事件是这次革命的真正前奏。当罢工爆发的时候，柯巴恰恰在这个地区巡回演说，反对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亚美尼亚半民族主义半社会主义者等等。他中断了旅行，立即返回巴库。他不可能亲自领导这次罢工，因为他才在这个城市呆了几天。但是他的建议肯定对罢工的领导人是有影响的。他看到了巴库的情况，又看到了高加索应征的士兵拒绝入伍，因而对于未来的事件必定有了强烈的预感。

由于他密切地注意着本地的情况，所以他就能听到这次革命初来时的隆隆声。早在1905年1月8日，即首都“流血星期日”的前夕，社会民主党高加索联盟就发表了题为《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的宣言。^①这个宣言的作者就是柯巴。他肯定地说，“沙皇专制制度就要失去它的主要靠山——他的‘可靠的军队’！”他认为这些军队将转过来反对政府。他对运动的力量估计过高了。沙皇制度所以能经受住第一次革命的冲击，其中的一个原因正是他的军队是可靠的。整个来说，军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65—70页。

队仍然听命于沙皇而反对革命人民。军队中的士兵十之八九是农民，他们的态度正好反映，农民并不是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的。柯巴的错误估计，可以很容易地用高加索的特殊情况来加以解释。在他的家乡格鲁吉亚，农民们的生活比俄国其他地方都要坏得多。那儿的土地问题十分尖锐，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比任何地方都要普遍。^①

在其他方面，柯巴也过高估计了沙皇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他预言，政府很快就要破产，因为它已在西欧面前丧失了信用。其实，法兰西共和国的钱袋正慷慨地提供贷款，帮助沙皇多少整顿一下财政情况。柯巴警告他的读者说，沙皇政府“象毒蛇那样蜕去老皮”，它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因此准备放下鞭子来实行改变，并向人民提供一些空洞的诺言。但是，“现在是推翻沙皇政府的时候了！……俄国象一支装上子弹、扣起扳机的枪，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叫做社会主义世界的‘乐园’！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使我们睁开眼睛认清敌人，才能把我们组成一支勇猛的大军，并率领我们去和敌人作斗争，才能和我们同甘共苦而且总是走在我们前头！”瞧，这位以前的教会学校学生变成了多么顽强的委员会的人了！照他看来，人们在通向社会主义乐园的沙漠中徘徊不前，党就象圣经的火光照亮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如果不是党委员会的牧师们，谁又能够同人民“同甘共苦”呢？这篇宣言结束时高呼：“打倒沙皇专制！全

^① 官方的报道宣称，格鲁吉亚乡下的游击队小组主要由“临时农奴”组成。见《高加索阶级斗争史》，第1卷，第23页。

国立宪会议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为了应付革命的威胁，沙皇政府的内务部放出了黑帮匪徒来对付包括自由派和犹太人在内的各色社会主义者。在巴库，石油工人罢工后不久，黑帮就开始了行动。在帝国的其他地方，犹太人成了沙皇转移群众不满的替罪羊；在高加索，亚美尼亚人起了这样的作用。因为在高加索，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民族和宗教世仇本来就一直在沸腾着，而由于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边界上进行屠杀所引起的激动，以及对当地亚美尼亚资产阶级的憎恨，这种世代的仇恨就不断地发展下去。因此黑帮很容易煽动起穆斯林暴民去屠杀亚美尼亚人，使高加索陷于民族复仇的血泊之中。在斯大林的岳父塞尔哥·阿利卢耶夫的回忆录中，曾生动地描述了那时的可怕情况：

各级行政当局受到各个部门和各个级别的官吏（他们本身就是巴库的黑帮）的积极支持，又受到城镇警察的保护，武装了“俄罗斯人民联盟”的恶棍们。这些匪徒们首先挑动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孩子之间的冲突。然后由于孩子受伤而引起大人之间的猛烈争吵。黑帮伏击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并放火焚烧房子。当局使用各种阴谋诡计来挑动世仇，达到了他们预期的目的。8月间，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开始互相野蛮地屠杀。城镇四周响起了枪声。亚美尼亚人的店铺被抢掠，住家被洗劫。大路和便道上躺满了尸体，受伤者的呻吟声不绝于耳。到处的士兵和警察对屠杀都袖手旁观。然后黑帮就纵火焚烧工厂和油井，并放出荒诞的谣言说这是罢工者干的。在“反对纵火”的借口下，

匪徒和凶手们追捕我们党的工作者。……我们的生活就象在地狱中一般。石油工厂中的火焰越烧越旺。我们周围都是暴乱的因素，都是令人畏惧的、猛烈的和难以扑灭的火焰；到处都是死亡与破坏。^①

许多个月中，在多民族的高加索城市里，革命接近于失败，或者是处于停滞状态。柯巴写了一张又一张的传单，警告工人阶级不要兄弟阋墙，并号召国际团结。他称赞在少数情况中，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和俄罗斯人一起友爱地从教堂游行到清真寺和公墓，“宣誓互助亲爱”。^②他敦促党鼓励这类的示威，并鼓吹同任何党派达成协议，准备采取共同的行动来反对大屠杀。

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发展。5月间，柯巴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略论党内意见分歧》，^③再次重复了列宁的论点，其中充满了关于社会主义乐园的老一套隐喻。这本小册子和他的其他文章，使人相信柯巴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列宁主义者。在高加索地下党中，布尔什维克只居于很微弱的少数地位。柯巴的本乡格鲁吉亚就是孟什维克的一个典型的据点。他的观点又属于少数派中的少数，因为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寻求同孟什维克和解。在这一点上，柯巴就必然引起列宁的注意了。列宁原来预料他的论辩在高加索不会得到多大的支持，现在大出意料之外，他从马克思·李维诺夫那儿得悉了柯巴用俄文、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

① S·阿利卢耶夫前引书，第13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76页。

③ 同上书，第79—117页。

发表的小册子。列宁的妻子和助手纳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得到一本小册子和一份柯巴用格鲁吉亚文阐述列宁观点的清单。这是列宁和他未来的继承者之间第一次无可置疑的、虽然是间接的接触。如果这个地区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曾经全心全意地支持列宁的话，柯巴会不会受到列宁的注意，这还是可以怀疑的。这是列宁的特点：当他感到不能依靠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时，他就去同那些居于次要地位和一般的成员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些人更加坚定地支持他，而他也鼓励他们，信任他们，并在他这一派中把他们提升到更高的位置上。列宁第一次友好的表示，使柯巴由于在当地得不到成功的失望情绪得到了补偿。他对孟什维克要人的攻击越来越狂热和尖锐，这既反映了他在当地同志中的孤立感，也反映了他知道自己正同列宁走在一起而产生了自信。由于他的两个朋友和导师——祖鲁启泽和克泽霍越里的死去，他必然感到十分的孤立。这两个“麦撒墨达西”的少数派领袖如果还活着，他们很可能象他一样的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但是克泽霍越里被梯弗里斯可怕的麦特希堡监狱当局枪毙了；而祖鲁启泽也因肺病而死去。

* * *

这时，柯巴密切注视着他的导师在发展各种不同的革命新方法。在伦敦的4月会议上，列宁已经向他的追随者提出了武装起义的问题。^①返回日内瓦以后，他继续在探索这一问题。他说，沙皇制度是不愿意让位的，必须用武装起义来推翻它。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赞成的。但是他们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338—344页。

很多人把起义看成是人民自发的暴动，是革命的基本现象；它是不可避免的，但又象太阳的升落一样，是不能事前准备和计划的。列宁轻蔑地把这些社会主义者称为革命中的罗曼蒂克的米考伯^①。他说，武装起义是要加以学习和实践的艺术。他提醒全党注意这样的基本准则：起义只能不断地进攻才能获胜，防御就是它的失败。他力促他的追随者设立党的特别军事机构。

柯巴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重申了这一论点：

我们有许多组织在实践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人力和物力去武装无产阶级。我们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现在已进入大家都承认的必须武装起来的时期。然而仅仅意识到武装的必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直接地清楚地向党提出实践的任务。**因此我们的委员会应当立刻着手就地武装人民，成立专门办理这件事情的小组，成立各区收集武器的小组，设立制造各种炸药的小工厂，制定夺取国家的和私人的军械库和兵工厂的计划。……派别的计较要尽量少妨碍一切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在这个基础上的团结。^②

柯巴不仅把列宁的指示翻译成了格鲁吉亚文，而且还把它付诸行动。他参加建立和领导地区军事组织的工作，在这个组织中，克拉辛还建立了一个很有效率的秘密的炸药试验室。诚然，

^①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他平时不知筹措，老是幻想突然走运。一译者

^②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21—122页。

列宁关于集中计划和指导起义的思想，在第一次革命中还没有形成。但是，在那一年里，战斗小队在许多不相协调的暴动中还是崭露了头角。在高加索，它们抵抗了黑帮，保卫了工人阶级免遭部族复仇之害，并同农民游击队保持联系。柯巴在党的这个新机构中不是一个指挥战斗的官员，而是一个组织者、行政领导者和鼓舞者。

党的这个新机构必须根据异常机密的原则组织。它同党的其他部分比较起来，在组织机构和人员上更加蒙上一层厚厚的秘密色彩。的确，党的这个技术部门同其他部门的接触已经保持在最低的限度以内了。

在革命的全盛期中，党的队伍中涌进了许多新的和未经训练的成员。当沙皇的恐怖行为一缩小时，党就放松了它的规则和秘密习惯。在1905年以前，委员会、执委会和党的官员照例是由更高一级委员会随意指派的，就是说组织是自上而下建立的。一般的党员不知道各个领导机构的成员都是谁。在第一次革命过程中，组织的方法改变了，委员会受到一般成员的民主监督。由上面任命委员会被由下面选举委员会所代替。^①但是，技术部门并不实行选举原则。在整个第一次革命中、特别是在它的退潮中，柯巴是在党的这个最秘密的堡垒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般的成员看不到他，也监督不了他。

武装起义如果成功了，结果就会建立一个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的观点和作用，是柯巴要研究的下一个题目。在这方面他还是紧密地追随列宁的论点：俄国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

^① 《联共(布)决议汇编》，第1卷，第59页；N·波波夫：《党史纲要》，第1卷，第174页。

主义革命的程度，因此临时革命政府将不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它也不是一个代议制政府，因为在一次革命当中这是不可能产生的事。列宁认为临时政府是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麻烦而自我矛盾的公式，虽然从1905年直到1917年就是一切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基础，但无论是它的作者或作者的信徒们都从来没有清楚地解释过；而由于在这一点上缺乏明确的说明，使得本来充满了争论和危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在1917年时又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照柯巴看来，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是：解除反革命“黑暗势力”的武装；把人民武装起来；然后召开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在革命政府（它的权力没有宪法的根据）出现和召开立宪会议之间，这个政府要进行一系列激烈的改革，其中没有一项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这些改革包括：宣布出版和集会自由，取消间接税，施行累进的利润税和遗产税，设立革命的农民委员会来负责土地改革，教会和国家分离，八小时工作制，实行社会服务，成立劳动介绍所，等等。这整个纲领是非常温和的，甚至比四十年后温和的工党政府在英国采取的纲领还要温和得多。但是，对俄国来说，在这个世纪之初，在废除农奴制不过四十年之后，这个纲领就意味着彻底的大变动。^①

象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一样，柯巴也认为，刚刚提出的这个纲领，只有由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个体农民联合，才能付诸实行，因为城市的自由资产阶级不支持这次革命。他也认识到，从长期来看，工人阶级和农民所追求的目标不同，而且最后他们的利益和政策可能发生冲突。但是，只有当社会主义者企图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25—142页。

推翻资本主义时，这种冲突才可能发生，而俄国这次革命的任务并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将纯粹是民主性质的，它的纲领“没有一丝一毫”严格的社会主义东西。说它是专政，这是因为即使它的目标仅仅限于建立一个非社会主义的代议制政府，也将召致旧制度使用专政的暴力方法来进行镇压。它将建立在两个阶级的联合上，而这就意味着各党派在政府中都有代表。这样，社会民主党就注定了要进入政府，在其中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保证无产阶级的统治”。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者将给农民的党以领导，因为按照定义，农民的党要比无产阶级的党后进，缺乏远见和决心。

孟什维克坚持认为，自由资产阶级将领导这次革命。他们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不是去管理一个非社会主义政府的事务。在那些年代里，全世界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甚至温和派，还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任何联合政府是一种不能容许的机会主义，如果不是对社会主义直接背叛的话。当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接受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职务以后，他就自动地脱离了社会主义者的范围。孟什维克这时就是指控列宁犯了米勒兰主义。照他们看来，列宁鼓吹社会民主党参加非社会主义政府，就非常接近机会主义了。柯巴反驳说，孟什维克混淆了不同形式的政府。由革命产生并进行激烈改革的临时政府，和仅仅以保持现存制度为标志的一般政府完全不同。他问道：“内阁是什么？它是正式政府**存在**的结果。而临时革命政府是什么呢？它是正式政府被**消灭**的结果。前者依靠常备军来执行**现行**的法律。后者则废除现行的法律，依靠起义的人民把革命的意志变成法

律。……奇怪的是孟什维克竟把这种起码的革命道理都忘记了。”他解释道，列宁绝对不是一个沾沾自喜的支持内阁者、一个卑鄙的米勒兰。

孟什维克的另一个批评——它更真实地反映了批评者的真正忧虑——是，列宁的纲领是对宪法规定的嘲弄。因为照列宁看来，即使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临时政府就要发布一系列彻底改革的命令。因此批评者预言（他们的预言在1918年成为现实），立宪会议或者不得不容忍那些改革的既成事实，或者它本身就会被独裁的政府所解散。柯巴则认为这种宪法上的顾虑是令人奇怪的。^①他看不出立宪会议有什么理由来反对临时革命政府在它空位期间所颁布的一些改革法令，因为这些改革虽然有剧烈的民主性质，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必定会得到极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不可避免的内战将延迟立宪会议的选举，同时临时政府迫于国内情绪要给农民以土地，颁布八小时工作制法令，等等。这个时候为什么还来辩论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临时革命政府是否应该推迟改革呢？革命出于自卫的本能是会采取行动的。柯巴问道：“难道这种议论〔孟什维克的议论〕不是含有庸俗自由主义的意味吗？从革命者口中发出这种议论，岂不令人奇怪吗？这就好象一个判了死刑的囚犯，脑袋将被砍掉的时候，却恳求别碰着他脖子上的疙瘩。”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于这次革命的总目标还持有同样的观点——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别无其他。分歧之处在于策略。孟什维克使他们的策略适应有限的战略目标，而列宁的毫无禁忌的革命策略却想达到自相矛盾的目的。布尔什维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39页。

克很容易证明，他们对于坚持的“资产阶级民主”正统观点意味着放弃革命。但孟什维克甚至更容易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在词语上就是矛盾的。双方的批评都同样有力，在逻辑上都无懈可击。孟什维克的论辩无疑地更前后一致些；但这种一致性中却有一种清静无为的低调，如果一旦陷于革命激流中，这种低调对党是不利的。列宁的论辩则是混乱的；柯巴对它所作的粗俗的总结，甚至使它经常前后不一致。但是这种论辩的调子却反映了夺取政权的革命意志。最后——列宁的某些批评者就是这样预言的——列宁将不得不使他的战略和策略彼此一致起来。他或者不得不放弃他的极端策略，或者就要冲破纯民主、非社会主义革命的框框，企图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但列宁曾一再重复说过，在俄国进行这种试验，将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冒险。在1905年，社会主义者中只有托洛茨基认为，这次革命如果胜利，也无助于走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把他的这种预言当作疯子的胡言乱语。^①在这次“总演习”中，除了托洛茨基以外，主要的角色们不仅在最重要的几幕中都没有出场，而且他们的表演也大异于那些实际登台表演的人。这一点对于柯巴来说也是真实的。

10月，沙皇发布了答应立宪的宣言。自由派胜利了。他们希望能够把沙皇专制制度转变为君主立宪，而且认为杜马（新召集的议会）是完成这一转变的工具。大多数孟什维克和一些布尔什维克也认为，他们应该参加这次选举。的确，选举权是受到限制的，工人阶级在杜马中只有很少的代表，因此肯定要

^① 赫尔普汉德——帕乌斯也执有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但他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只是昙花一现的。

由温和的自由派控制。孟什维克争辩说，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关系。在法国大革命中，温和的立法会议曾由于群众运动所迫，
让位给更激进的国民公会。在俄国也会发生类似的转变，扫除
杜马，代之以某个国民公会。柯巴不同意这个意见。他鼓吹抵
制这次选举，因为“在整个俄国全民起义的前夜”进行任何选
举，只不过是转移人民对直接革命行动的注意。他在为梯弗
里斯委员会写的呼吁书中说：“无产阶级不会向政府要求微小
的让步，它不会要求政府取消某些城市和乡村中的‘戒严’和
‘鞭笞制度’。……谁向政府要求让步，谁就是不相信政府会
灭亡，但无产阶级却充满着这种信念。”“只有在压迫者的骸
骨上才能建立人民的自由，只有压迫者的血液才能使人民专制
制度的土壤肥沃！”^①列宁有时也会同意这种表示愤怒的粗俗
方式，但他自己却不喜欢这样做。在柯巴这个前农奴的儿子的
口里，这类话就习以为常了。他在另一篇宣言中号召“无情地
反对人民公敌自由派”，因为自由派正在同沙皇搞交易。这无
异于诋毁孟什维克，虽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是同一个
党的党员。柯巴还说道：“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自由资产阶级已经
孟什维克化了，或者是高加索‘少数派’已经自由主义化了。”

沙皇的宣言引起了抗议的风暴。它太无诚意而不能满足反
对派的要求；而它本身就明显地是一种软弱的信号，注定了要引
起更多更新的要求。抗议之后继之以总罢工和地方起义。在沙皇
作出半自由的姿态后两个月，高加索的警察局长向他在彼得堡
的负责人报告说：“库泰依斯的情况十分危急。……起义者已经
解除了宪兵的武装，成为铁路西线上的主人，自己售票和维持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71—172页。

秩序。……我从库泰依斯得不到报告；宪兵队已经离开了铁路线，集中到梯弗里斯。派去送报告的信使遭到革命者的搜查，文件被抢去了；情况实在使人受不了。……副总督的神经已经崩溃；但情况还不是完全绝望的。伯爵参加了极重要报告的撰写，但他很衰弱。如果可能，我将通过邮政送上详细报告，否则将由信使送去。”^①

各个党派都从地下走出。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公开印刷和出售。在彼得堡，李维诺夫和克拉辛编辑了《新生活报》。托洛茨基主编了《起点报》，这是第一次革命中最漂亮的新闻冒险事业，发行约五十万份。在梯弗里斯，柯巴-朱加施维里和邵武勉^②联合编辑了一家名字较少象征意义的布尔什维克报纸《高加索工人小报》。这家报纸短命而亡——起义一失败，它就被警察查封了。这时，柯巴的时间都花在合法出版的报纸编辑部、半秘密的梯弗里斯和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以及完全秘密的党的技术部门之间。在这些不同的活动中，他还筹备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他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是列宁首次在俄国国内召开的。实际上，这次大会是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因为芬兰比帝国的其余部分享有自治和更大的自由，代表们在那儿感到更为安全。

* * *

这是柯巴第一次从半亚洲的高加索走入俄国的欧洲部分，

^① 贝利亚前引书，第80页。

^② 邵武勉是未来巴库的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是在英国干涉高加索时被俄国反革命枪杀的二十六名人民委员之一。

从梯弗里斯那种死气沉沉的环境中走到真正全国性的集会上。他也是第一次在塔墨尔福斯同列宁会见的。许多年以后，他以特有的极其粗俗的语调描述了他的导师给他的印象：

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是伟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伟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魁梧奇伟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简直是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通常，“伟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使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他出现的；而且在‘伟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警告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①

他的这些话再好不过地说明他当时眼界十分狭小。这位农奴的后代尽管可以学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习语，对革命的技巧问题进行辩论，但他仍然出乎意料地看到，这次革命的那位领袖完全没有庄园主的风度。这个前正教中学的学生早已经背离了教会，但仍然幻想列宁是社会主义的高级教士或大官员。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9页。

他眼睛盯住列宁，贪婪地听着他的演说，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而列宁也的确有很多品质深深地打动了这位梯弗里斯的代表：他的演说极富于逻辑性，他在政治上是大无畏的，他的观点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他的结论既敏锐又简明，最后而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他具有严肃认真的求实精神。代表们是兴高采烈地来到塔墨尔福斯的，由于莫斯科起义头几次浪潮的刺激，他们满怀迅速推翻沙皇制度的希望。^①甚至列宁也受到了普遍乐观的影响，例如在会议中有一件颇富戏剧色彩的事：在会议休会期中，列宁曾带头到树林里练习用手枪打靶。但是，列宁仍然是清醒而谨慎的。他在开幕式上提议说，尽管在那些“自由日子”里多么地自在，但代表们还是应该使用假名来代替他们的真名。他说，沙皇暗探局还没有遭到失败，因此还不能完全取消秘密状态。柯巴用了伊凡诺维奇的假名。他在这次大会上的作用，也象他的这个假名那样朴素和谦恭。他同列宁之间还不太熟悉，更不用说有什么友谊了。但是他会见了一些日后成为重要人物的人：罗佐夫斯基，他是未来红色工会国际的负责人和1941—1945年苏德战争中的主要官方发言人；雅罗斯拉夫斯基，未来的无神论协会负责人；鲍罗庭，恰恰在二十年之后，他成为斯大林的特使和蒋介石的顾问；纳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她是列宁的妻子；以及其他一些人。

柯巴获悉这次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合并，这使它颇感意外。形势的发展使这两派日益接近。团结的趋势，在俄国中部比在高加索要更强烈。在高加索，由

^① 见G·克拉莫尔尼科夫的叙述，载《全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汇编》，第1卷，第210—247页。

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不大，所以分裂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实际意义。两个派别都感到，分裂削弱了它们，因而急于结束这种状态。罗佐夫斯基在大会上建议，地方组织应该直接合并，不必等待领导人员之间的正式协议。他的提议被接受了。和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同时，孟什维克也举行了代表会议，并通过了赞成联合的平行决议。这两个代表会议之后，双方领导人在彼得堡进行了谈判。

在塔墨尔福斯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杜马的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应不应该参加这次选举呢？在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上，柯巴曾主张进行抵制，说工人阶级应该去的地方是街垒而不是投票站。但是，大大出于柯巴意料之外，列宁在塔墨尔福斯却出面主张参加选举，或者至少参加它的某些阶段，因为这次选举是间接的。在列宁看来，抵制的策略是消极的和不会产生什么效果的；不是街垒就是投票站，这种意见太不成熟，不能据之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孟什维克认为在群众的压力下，一个温和的杜马也可能被一个激进的国民公会所代替，这多少是有些道理的；而且他相信“缺席者总是错误的”这一谚语^①。一般的议会主义，连同它的演讲术和互相妥协与讨价还价的习惯，对他是没有吸引力的；但是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从议会的讲坛上来促进革命事业。在后来的年代里，他曾经说过，甚至在粪堆上和猪圈里也能鼓吹革命——为什么不在沙皇杜马的猪圈里鼓吹革命呢？对于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大多数人，对于耳际还响着罢工和起义的大吵大闹声的地下实际工作者，

^① 法国谚语，意为一个人由于缺席，在遭到别人谴责时，不能亲自进行辩护。
——译者

列宁的论据听起来就好象纯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柯巴同其他地区的代表一道强烈地反对他的导师的建议。他同其他人必定是认为，这位伟大领袖同许多侨居外国的人一样，已经失去了同俄国生活的接触，因而低估了最近事件的影响。他们这些实际工作者不是在日内瓦、伦敦或巴黎的图书馆里，而是在莫斯科、喀山或巴库研究革命过程的，因此对它知道得更清楚。列宁被出乎意料的反对力量所震惊。他说，也许搞实际工作的人是完全正确的，他快活地宣布，他“有秩序地撤出自己的阵地”。柯巴—伊凡诺维奇被选入起草这一决议的委员会。这是他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的首次成功。他能够反对列宁的意见，这不能不使他提高了自信。^①

这次代表会议在这多事的一年的最后一天结束。按照秘密警察的一个报告（他们在代表中有一个代理人），会议结束后不久，“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一些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在彼得堡城郊大街九号集会，以便讨论团结问题”。这个报告提到，梯弗里斯的代表伊凡诺维奇出席了这次会议。柯巴在会议上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列宁和马尔托夫以极和解的口气谈及当前的形势，马尔托夫甚至走得更远，接受了列宁的著名的党章

^① 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委员会的人通常都是相当自信的人，他认识到委员会的工作对群众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一般地不承认任何党内的民主。委员会的人说，‘这种民主主义〔它要求委员会应由普通成员选出〕只会使我们落入权威之手’。这些委员会的人内心深处都看不起‘在国外的人〔即流亡的领袖〕’，认为‘他们应该在俄国的条件下来工作’。委员会的人……不喜欢革新。……在1904—1905年，〔他们〕……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但是很多人却难于适应……不断增加的合法工作的机会和公开斗争的方法。”（《回忆列宁》，第93页）克鲁普斯卡娅的话无疑反映了列宁对于委员会的人的意见。

第一条，而这一条正是引起分裂的原因。列宁很可能是胜利了。社会民主党似乎最后又重新团结起来，并按照列宁的说法行事。

1906年元旦，当柯巴首途返回梯弗里斯时，革命的浪潮已经退去。莫斯科的起义失败了。格鲁吉亚的起义也成了强弩之末。副总督这时已经恢复了信心，下命令封闭了《高加索工人小报》。但是这种变化只是逐渐地使人感觉到。在一些领袖们看来，革命的倒退只不过是在一个复杂的图表上的一段曲线而已。柯巴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两次搏斗》^①中分析了这一年的事件，即从彼得堡的游行到莫斯科的起义。他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当需要不断的进攻时，却采取了防御态势。缺乏领导，而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内部分裂所致。这些事件表明必须团结起来，而这种团结很快就要愉快地达成了。

但是，团结这付药开得比较晚了，它的成分是否合乎标签上所写的也还是有疑问的。孟什维克曾经被这一年最后几个月的激烈情绪冲昏头脑，现在又恢复它原先更为温和或胆怯的态度。布尔什维克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合并的风险，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布尔什维克高加索局，成为这个“统一的党”中的一个党。各派经过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就派出它们的代表出席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906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目的是为了批准两派的合并。代表高加索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一个代表，其中十个是孟什维克，一个是布尔什维克。这个布尔什维克就是柯巴—伊凡诺维奇。

他在第一次出国旅行中，没有时间去观察俄罗斯以外的生活。代表大会由于一系列冗长的会议和没完没了的辩论与争吵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79—186页。

而拖延很久。他在会上几次发言捍卫列宁的观点。但是，在辩论的关键问题（土地改革）上，他却采取了独立的观点。^①孟什维克鼓吹剥夺地主，把其土地转交给市政当局所有。列宁则主张国有化土地。象往常一样，孟什维克看到未来俄罗斯共和国将由自由资产阶级统治，所以急于增强更得人心的地方政府，反对中央的行政机构。列宁考虑到“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希望所有的土地都归中央政府所有。柯巴—伊凡诺维奇既反对土地国有又反对土地市有。他所主张的土地改革是干脆把大庄园在农民中进行分配。甚至在代表大会以前，他就在格鲁吉亚的《闪电报》上谈了自己的土地改革观点。^②他提出了两个论点来反对列宁的国有政策。其中的一个听起来仿佛是从孟什维克那儿借来的，另一个则具有他自己的特点。他说，未来的政府将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因此把一切土地都归属于它，从而不适当地增强它的力量，将是一个错误。柯巴甚至不想去解释一下这种主张怎样能够符合他一直在宣传的“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但是，他既反对国有又反对市有的主要理由是，两者都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他是一个出身农民的革命者，比别人深知农民对于土地的极端渴望。他写道：“农民想分配自己夺得的土地，他们做梦也梦见这些土地是自己的财产。”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分配主义”，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把它看成是对农民个人主义的一种反动让步。列宁猛烈地反对这些“党的实际工作者”，说他们支持落后的农民，忽视社会主义原则，肆无忌惮地利用农民对财产的渴望情绪。伊凡诺维奇答复说，他所希望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15—217页。

② 同上书，第195—207页。

土地改革当然会在农村中助长资本主义，但是根据共同的协议，这正是革命所主张的东西。小农庄和农业资本主义肯定要比封建主义进步。由于孟什维克居于多数，列宁最后就同他这一派中亲农民的集团一起投票，以期挫败孟什维克。但是他继续对柯巴一类思想狭隘的“现实主义者”表示了自己的恼怒。

对于1917年的土地革命，对于1945年在红军庇护下东欧和东德实行的土地改革来说，这一事件是一个意义重大（虽然间隔得太久）的前奏。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在农民中分配土地，虽然名义上是国有化。在1945年，普鲁士容克和波兰与匈牙利地主的土地是直接分给农民的，甚至都不使用国有化的名义。因此可以说，后来采取的这种土地革命的方针。早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上就由伊凡诺维奇比列宁更鲜明地提出来了，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妨碍伊凡诺维奇—斯大林在1930年粉碎了他曾捍卫过的“农村资本主义”，而代之以集体农庄。四十年之后，伊凡诺维奇—斯大林在1946年他的《全集》的序言中，曾企图解释一下他同列宁在斯德哥尔摩的争论。他进行自我批评，把它归因于象他这样的“实际工作者”的思想狭隘和缺乏理论远见。他承认，他们这些“实际工作者”不能理解列宁当时已经看到俄国革命的前景，它将由“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阶段。而他斯大林却认为，在两个阶段之间将被一个很长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分隔，因为他不能想象在工人阶级成为国内的多数以前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①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如果按照这个原则行事，俄国直到今天都还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自供既使人看到布尔什维主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7—10页。

义发展的一些复杂情况，也使人看到它的领袖们暗中摸索的态度，他们由于形势所迫，在革命征途中转变了自己的方向。

从斯德哥尔摩返回后，伊凡诺维奇在一篇署名“科同志”的特别的小册子里报告了这次“统一代表大会”情况。^①在他看来，这次代表大会是失败的。它的决议反映了孟什维克多数派的机会主义精神。难怪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它的结果感到异常高兴。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通过的众多决议中，有一项同柯巴在技术部的审慎工作有直接关系。在孟什维克的动议下，代表大会谴责了战斗小队对银行、运金车和政府部队的袭击。列宁认为革命仍在方兴未艾，游击队的袭击提供了一个好的方法，为未来全国性起义训练战斗小队，因此他坚决反对这个决议。当暴动和起义的大乱持续不已的时候，孟什维克的确是束手无策的。但是他们比布尔什维克更快地认识到革命这时已经退潮，虽然还没有什么人敢于更多地谈到这一点。普列汉诺夫重新考虑了十二月起义后得出结论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对于列宁来说，这纯粹是亵渎神明的言论，因为他是不会为1905年的“蠢事”后悔的。许多孟什维克还不敢赞同普列汉诺夫的结论，但是他的这句话却很恰当地概括了他们的心情。

起初，关于战斗小队的争论，对于更为广阔的争论来说，还是次要性的。如果说十二月起义是一个大错，那末战斗小队的袭击就更糟糕了。但是，如果革命仍在前进，那末战斗小队就会发生重要作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原则上否定了“游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1—253页。

击战争”，但它却不能下决心通过断然的裁决。^①它禁止一切形式的袭击，但夺取武器和兵工厂却是例外。技术部门马上钻了这个空子，继续不断地袭击沙皇高级官吏、银行、运金车以及兵工厂。这是第一次革命中最暧昧不明，也许还是最罗曼蒂克的篇章。它充满了戏剧性的事件和闻所未闻的丰功伟绩。它的英雄人物都是一些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圣徒和引人注目的冒险家。但是暗探和歹徒也在革命的旗帜下干他们的勾当。不容易把他们区别出来，也不容易弄清他们的个人动机。西欧一贯把俄国历史上的这种插曲说成是某种俄国特有的东西，反映了斯拉夫灵魂的神秘。按照西欧人的兴趣来看，他们对这种恐怖行为，有人称赞也有人讨厌，虽然西欧的自由派对于“不屈不挠的反对沙皇暴政的战士”是抱着同情心的。但是，不论是赞美或谴责这种行为的人都认为，这些事是遥远的和具有异国情调的，在文明的西欧环境中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不幸（或者说幸运）的是，在纳粹占领的岁月中，西欧也不免于这种“异国情调的”经历。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挪威的马基和游击队的各种抵抗运动，也正是俄国人差不多四十年前所做的事，只不过西欧的抵抗运动规模更大，经费更足，行为更“恐怖”，死的人也更多。俄国革命者认为他们是在同自己本国的专制制度作战，因此就有道义上的理由来维护自己的行为。就象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一样，在沙皇俄国里，这个运动的英勇和具有理想的核心，也为一些可疑的分子包围着。在两个运动中，基本的类型——战士、理想主义者、冒险家、英雄和歹徒——差不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6 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纪录》，第 262—267，第 336—337 页。

多都是相同的，“俄罗斯灵魂”中的著名的神秘性，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丹麦的灵魂中也惊人地表现了出来。

尽管革命者认为他们这种特殊的反对方法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但很多布尔什维克还是感到不安。游击战在革命中只能起辅助作用，就恰如四十年后它是由正规部队从事的主要战争的辅助一样。在列宁看来，布尔什维克战斗小队必须服从的“正规军”就是在起义中的整个俄国人民。得不到普遍起义支持的游击战，只能自行其是而被孤立起来，它肯定会要堕落成为无望的和混乱的冒险。事情已经很清楚，革命的退潮并不是暂时的，在下一次高潮兴起时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这时人们理所当然地希望列宁取消游击战和解散战斗小队。起初，在整个1906年，列宁仍然怀抱希望，以为革命的力量还没有耗尽。这就足以说明他为何顽固地捍卫他的战斗小队，即使由孟什维克控制的统一党的中央委员会坚持要解散它们。

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各派都遭到了财政上的巨大困难。在1905年，党员人数猛烈增加，党的收入来自党员的党费。富足的同情者对财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07到1908年时，反革命得势，党员人数锐减，同路人也背离了已经失败的革命，于是当时机构已经膨胀得很大的党就没有财力来进行工作了。革命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列宁没有看出这个机构由于缺乏财力而受到了破坏。他认为，即使这次革命失败了，也必须准备下一次革命；他决心筹借必需的资金来进行这一任务。除了战斗小队外，谁又将向党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渡过残酷的反革命时期和使第二次革命大获全胜呢？列宁喜欢说，如果需要，革命者应该能够向自己的目标匍匐前进——他现在就命

令他的战斗小队匍匐前进以供应革命的需要。他意识到道义上的风险，建议使战斗小队处于党的严格监督下，以便清除可疑的和不可靠的分子。^①

高加索是战斗小队活动的主要区域。它们起初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完全符合当地英勇土匪的传统。在1905年到1908年间，高加索总共发生了一千一百五十件恐怖行为。^②最著名的一次是，1907年6月23日在梯弗里斯的一个广场上夺取（或者为后来称作的“没收”）财政资金。另外一次是在巴库港掠夺“尼古拉一世”号轮船。梯弗里斯的那次袭击搞到了二十五万卢布，及时地转移到国外的布尔什维克金库去了。由于这笔钱都是大面额的纸币，所以不容易在事前已经得知其来源的外国银行中兑换。有几个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未来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当在西欧企图兑换这笔钱时被捕了。这一事件在俄国和欧洲的报纸上引起轩然大波。孟什维克大声地反对列宁，并把这一问题提交给一个党的审判机构来处理。这个机构是由另一名未来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未来的上司和敌手契切林主持的，他当时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谴责列宁，并要求社会党国际注意他所说的俄国社会主义蜕变和道德败坏的危险。^③

柯巴在这一切事情中的作用是重要的，虽然这种作用从未明确地判定。他在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局和战斗小队之间充当某

① 《联共（布）决议汇编》，第1卷，第67—68页；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97页。

② 同上。

③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105页；《我的生涯》，第209—210页。

种联络员的职务。他以这样的身份从未直接参加袭击活动。他批准或不批准由战斗小队计划的行动，向它们进行建议，照管主要行动的“后勤工作”，并从远处监视执行情况。沙皇警察追捕犯罪者，但从未怀疑柯巴同他们有何联系。他伪装的技巧非常高明，以致他的这种作用完全不为全党所知。战斗小队的两个传奇性的指挥员是他的学生和心腹——特尔·彼得罗相（“卡莫”）和柯特·金察泽，两个都是身材魁伟、热情洋溢、罗曼蒂克、足智多谋和不知疲倦的革命者，当他们被暗探局抓到后，忍受了非人的苦刑，没有泄露任何机密。^①柯巴敏锐地看到了他的同志们的这种性格，知道他可以信赖这两个人，而且他显然同他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因为这是十分保险的事。然而，高加索的孟什维克也显然知道了一点点他的真实作用，因为他们企图向党的检察机关控告他违反上次代表大会关于袭击的禁令。但是，他想法规避了这次审判，从梯弗里斯搬到巴库去了。

布尔什维克在这座石油城的力量，比在高加索首府的力量要强大；他作为巴库委员会的领导者，能够公然反抗那些谴责他的人。由于他在战斗小队后面牵线，他在政治对手中本来就不太高的声名，这时甚至降得更低了。他们经常把他称做“疯子”和“瓦解者”。柯巴并不关心他在政治对手中的声名如何，因为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得到列宁批准的。当地的孟什维克威胁着要把他开除出“统一的”党，这没有什么要紧。在他看来，那种统一好歹只是半真半假的。对于游击战在高加索政治气氛中所引起的可悲后果，他也并不为之心动。在很多人看来，革命已经同一般的抢劫联系起来。袭击引起了当局的野蛮报复，这虽然增加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104—108页。

了人们对沙皇制度的普遍仇恨，但却也使人民感到恐惧，并使他们更加冷漠，反革命正是利用这种情绪而猖獗一时。战斗小队的这种鲁蛮灭裂的策略，浪费了人的生命和精力。S.阿利卢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描绘了那种无谓英勇的阴暗图画，它谈起来好象就是对战斗小队政治领导（至少是他未来的女婿柯巴在地方上的领导）的无心的控告。^① 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俄国社会主义者就面临着游击战这个极端麻烦的困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欧洲的地下运动也为此大伤脑筋。无论四年或四十年之后，谁想从这一困境中找出一条出路，他都难于作出判断：对于那些领袖们是毫无批评地颂扬呢还是加以谴责，因为那些领袖们当时也是迫于形势，而且一切又处于未定之天，才作出那些甘冒风险的决定的。

并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实行游击战和“没收财物”。在高加索，更为温和的亚美尼亚联邦主义集团也干同样的事情；甚至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虽然大声地谴责布尔什维克的袭击活动，但也不是不喜欢搞自己的袭击活动，或者对布尔什维克的掠夺品进行分赃。在波兰，是社会主义的右翼而不是左翼专门从事革命恐怖活动。最出名的波兰恐怖主义者就是波兰未来的元帅和独裁者皮尔苏茨基。他组织袭击的一个主要助手是波兰工人阿尔西塞夫斯基，他后来成为波兰1945年在伦敦的反苏流亡政府总理。柯巴和皮尔苏茨基当时都干着同样的事情，但他们的方法，更多的是他们动机都是不相同的。皮尔苏茨基具有罗曼蒂克的民族主义思想，只是薄薄地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颜色。他回顾了十八和十九世纪中波兰贵族的那些堂吉诃德式的英勇起义，

^① S·阿利卢耶夫前引书，第159—166页。

认为自己是波兰民族英雄——科秀斯科、米罗斯拉夫斯基等人的直系后裔。他并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任何人民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的）革命上，而是真正地希望通过游击战使波兰摆脱俄国的统治。柯巴并不存在任何这类的幻想。他的战斗小队只是一场伟大人民斗争中的工具，而且肯定不是具有决定性的工具。

顺便说一下，这一点也说明，他们两人在成为各自国家的统治者之后，对待早先游击队的功绩有着不同的态度。在皮尔苏茨基的波兰，战斗小队的事迹笼罩着一种官方的崇拜。每一次主要袭击的周年纪念都举行庄严而华丽的庆祝。有关皮尔苏茨基业绩的每一历史细节都发掘出来，并载诸无数的书籍和文章中——很多细节都是由成人之美的历史学家们在事后制造出来的。在俄国，官方对斯大林在游击战中的作用谨慎地保持着沉默。所有他的官方传记作者甚至避免提到这一点，而斯大林本人对于他生平那一阶段的一些流行说法，也从未说一句肯定或否定的话。他的《全集》中附有详细的年表，其中逐月和逐周地回溯了他在第一次革命中的活动，但对游击运动却不置一词。^①关于这方面所有已被人们所知的情况，是他的敌手透露出来的，或者就是他在高加索的下属在他上升到绝对权力以前很久有选择地说出来的。按照列宁主义的传统，他同战斗小队的关系想来是不够体面，所以不能让人注意。这就等于说，在斯大林或者甚至在列宁的事业中，好象曾有过一种偏向或错误。看来可以证明的情况是，在他头一次准军事的活动中，柯巴表现出十分爱好鲁蛮的、浪费的战争方法，他的这种性格在日后以更强烈的形态和在更大的规模上表现了出来。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84—387页。

1907年5月，柯巴再次以伊凡诺维奇的假名，前往伦敦出席党的新代表大会。他的代表资格受到孟什维克的怀疑。最后他被允许参加大会，但只有发言权。他的家乡现在已经是一个孟什维克的“堡垒”，所以他不容易获得任何公认的高加索组织的代表委托书。他自我安慰地认为，反正布尔什维克已经控制了彼得堡、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地方的组织。^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获得微弱的多数，并设法在大会的决定和决议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游击战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提出来讨论了。马尔托夫猛烈地抨击了列宁，而列宁这一次忍住了没有进行攻击。反对战斗小队的意见也在布尔什维克派内部传播开来。大多数的列宁追随者要求制止它们的活动。在这一点上，孟什维克没有费什么力就使大会通过禁止一切武装袭击和“没收财物”的决定。在整个大会期间，柯巴—伊凡诺维奇小心谨慎地坐着，一言不发，也许这是因为列宁警告过他不要暴露自己。在通过禁止武装袭击的决定时列宁弃权，但许多代表愤慨地要他表示明确的态度。他无疑地准备违反这个禁令，再搞几次“没收财物”的活动。否则，这个辩论就不是真实的了，因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双方都还在预言，说“新的革命爆发”已经临近，虽然孟什维克已经调整了他们的政策，使之适合于反革命年代的情况。^②

柯巴—伊凡诺维奇返回巴库后，在新创办的秘密报纸《巴库无产者》上描述了代表大会的情况。^③他说，布尔什维主义代表了俄罗斯中部先进工人的愿望，他们大多数都是受雇于重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52页。

② 《联共（布）决议汇编》，第1卷，第109—110页；F·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第388—389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49—75页。

工业的。孟什维克所以在本地占优势，他解释说，这是由于地方的“落后和小资产阶级”性质使然。孟什维克责骂布尔什维克的官僚机构，但是在代表大会上，他们比列宁派有更多的党官员和更少的工人。此外，在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之中，只有少数几个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大多数是犹太人或格鲁吉亚人；而布尔什维克中，绝大多数都是纯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中曾有人……开玩笑说，孟什维克是犹太人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是真正俄罗斯人的派别，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不妨在党内来一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在这句沉重的玩笑话中几乎看不出什么反犹主义，因为谁都比不上柯巴那样直率地谴责种族仇恨。但是这句玩笑话却是模棱两可的，使多数社会主义者听来非常刺耳。

柯巴的报告还有另一句很有特色的话。他说，代表大会明显地分裂为两派。托洛茨基两派都没有参加，证明他是“漂亮的废物”。正是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柯巴头一次见到了他未来的大敌。这位前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被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但成功地从流放地逃出，刚刚赶上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他大声地表示了对列宁游击战的愤慨。这样，这两位未来的敌对者在初次见面以后，就在尖锐的争论中彼此严阵相对，虽然在伦敦兄弟教堂举行的三周会议中，他们甚至没有直接交谈过几句话。柯巴在这次争论中，站在党的立场一边。对于托洛茨基谈及“没收财物”的话，他不能不感到刺耳。说托洛茨基是“漂亮的废物”，这反映了对托洛茨基善于雄辩的印象，也许还反映了列宁对于这些雄辩已经不能忍耐，因为柯巴似乎总是重复列宁的话。在那些日子里，柯巴和托洛茨基两人是光度完全不同的两颗星星。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在俄国的整个

历史中怀着如此深仇大恨地互相对立。托洛茨基当时已经在国内和欧洲享有盛名，而柯巴这颗星星还只在狭窄的高加索地平线上黯然地闪烁着。但是，从他们在伦敦教堂的第一次见面开始，柯巴心中就种下了怨恨那位前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种子了。

第四章

柯巴变成了斯大林

反革命的胜利(1907—1912年)。——“取消派”和“抵制派”。——斯大林在巴库的工作(1907—1910年)。——他被监禁和放逐到索里维切果茨克。——逃跑和返回巴库(1909年)。——斯大林指责侨居国外的领导人(包括列宁)“远离俄国现实”。——斯大林藏身于鞑靼石油工人之中。——他给俄国社会主义报纸写的通讯。——他第二次被流放到索里维切果茨克(1910—1911年)，他在高加索活动的结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最后分裂。——斯大林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真理报》的创刊(1912年4月)。——斯大林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的作用。——他到克拉科夫和维也纳的旅行。——《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在维也纳会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返回俄国时被一个暗探出卖而被捕。——被流放到近北极的西伯利亚(1913—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斯大林在战争中无所作为。

1907年12月，列宁决心返回日内瓦去，他同一个朋友告别时说道：“一个反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它将持续二十年，除非沙皇制度在此期间被一次大战所动摇。”^① 斯托雷平政府（即“六三政权”）的恐怖正在全国猖獗一时；列宁甚至在他的芬兰藏身处也感到不安全了。九年以后，他仍然不相信第二次革命

^① L·克拉辛：《列昂尼德·克拉辛生平和著作》，第37页。

已经迫近。1917年1月，即沙皇垮台前几周和他自己掌权前几个月的时候，他对年轻的瑞士社会主义者发表纪念第一次革命的演说，在结束时他向他们保证，虽然他这一代活着看不到第二次革命了，但他们这些青年肯定能够看到它的胜利。^①两次革命之间实际上只隔了不到十年；而这十年中只有头五年能够说成是反革命的时代。到1912年时，革命运动已经有了新的高涨。

但是，在1907年底时，列宁的悲观论调似乎是很有道理的。沙皇制度又牢牢地重新站住了脚。工人阶级被疲惫和失望所压倒。在这次革命高潮时，有二百多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其中大多数都想促进政治目的的实现。1908年只有十七万四千工人参加罢工，1909年只有六万四千人，1910年只有四万六千人。言论、结社和新闻的有限自由也大部分消失了。地下的各党派已经精疲力尽和士气涣散。失败在党员和追随者中引起了玩世不恭和怀疑主义。知识分子的那些浪子们公开抛弃了激进主义，寻找门路重新回到上流社会来。那些放荡不羁的文人曾经在地下运动的边沿上生活于幻想之中，现在都陷入消沉的神秘主义、性欲描写或为艺术而艺术。各种秘密组织就象泄了气的皮球。剩下的人们则与暗探为伍，而这些暗探都向暗探局报告各派人事和活动的的第一手情报。暗探局的特务甚至钻入各团体的领导中心，尽力煽动内部不和，使地下运动成了一个背叛、阴谋、恐惧和怀疑的大泥沼。

对于秘密工作的厌恶，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的反应。孟什维克的作家把它提高到了政治原则的高度，他们要求党结束地下活动，抛弃旧的习惯，把党转变成为一个普通的反对党，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9页。

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公开地为自己的目的进行活动，就象欧洲的社会党一样。列宁把那些鼓吹“重新评价”的人们贬为“取消派”，党的掘墓人。列宁说，尽管秘密组织的条件非常糟糕，但革命的鼯鼠必须继续在地下掘洞。在那些日子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西欧、特别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它的强大的政治和工会机器，它的富有活力的和大众化的报纸，它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选举运动和议会代表制。他们越是厌恶俄国地下运动的解体，就越是强烈地希望使国内的运动欧化。

但是俄国社会的整个结构是非欧洲式的。沙皇制度还是半亚细亚的专制制度。的确，甚至六三政权也没有全部勾销第一次革命的成果。在最猛烈的恐怖浪潮过去之后，到处都留下一些不可靠的自由孤岛。各反对党又公开地出版报刊，但受到严厉和恶毒的审查，只能以冲淡的形式，用伊索寓言似的暗示和引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报刊照例是短命的。暗探局的铁拳以极微小的借口就能取缔它们。少数合法存在的工会和左翼俱乐部与协会的情况也是一样。那个影子议会即杜马的地位也不更佳。在两次革命中间选举的四届杜马，都被沙皇专断地解散或封闭了。无论在哪届杜马中，社会主义代表都没有豁免权——许多代表都是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度过了议会任期的。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那些企图把欧洲的工党移植到俄国来的人，就好象是在近北极圈的地区栽种热带水果一样。有几个孟什维克的领导人仍愿意保持秘密组织的存在，但希望把党的主要工作转为合法形式的活动。只有普列汉诺夫（他在各方面来说都是最温和的孟什维克）继续象以前一样地认为地下工作是重要

的。这就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结成了最后一个政治联盟，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个联盟才破裂。

多年以后，列宁在回顾这一时期时写道：“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政党中间，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① 列宁的一些同事和追随者拒绝学会“有秩序地退却”的艺术。列宁的策略是为了避免同专制制度作无望的冲突，并节约革命的力量。他捍卫地下党，反对“取消派”，但是他要求党既使用秘密行动的形式，也使用合法的形式。甚至在反革命得势之前，他就放弃了对议会选举的抵制；而在看到他的追随者仍坚持抵制策略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同孟什维克的人一道投票，反对他自己的一派，以便派出社会主义者到投票站去。^② 他还坚持在审查制度许可的情况下，他的追随者们应该出版报刊、书籍和小册子；他们还应该到合法存在的工会和教育协会中去工作。只有这样，党才能把它的思想和观点传达给远比在秘密宣传时所能接近的更为广大的群众。当然，公开的宣传肯定有很多事不方便说，但是它可以由无所忌讳的秘密宣传加以补充。秘密的委员会应该指挥和控制一切形式的活动，不论是合法的还是地下的。

当孟什维克中厌恶地下工作的情绪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页。

^② F·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第427—428页；《联共（布）决议汇编》，第1卷，第113页。

布尔什维克却不大愿意进行公开的活动。整个1907年，甚至到1908年，“召回主义”支配着他们的思想。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克拉辛、高尔基这些优秀的作家、宣传家和组织家，领导了布尔什维克的“极左派”。

社会主义行动的内容和形式又重新成为争论的问题。那些反对地下工作的人，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得鼓吹同现存制度实行某种程度的和解。比如，要通过沙皇的新闻审查，就不可能在出版物上主张推翻沙皇制度。因此列宁争辩说，那些想把党的行动方式限制在当局所允许范围内的人，实际上是抛弃了共和国的原则。孟什维克把资产阶级自由派看成是反对派的法定领袖，他们也同这些自由派一样，现在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使沙皇制度逐渐转变为君主立宪。在列宁看来，这种希望是同社会民主党不相称的，因为它是虚假的。另一方面，召回派则是革命的宗派分子而不是实践家。他们崇拜地下工作，对更广阔的行动机会畏缩不前，势必使革命陷于无能。他们是倒过来的取消派。^①

正是在两次革命的间歇期中，柯巴变成了斯大林，并从一个比较不为人所知的格鲁吉亚地下工作者上升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全国领袖。他的上升显得最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在1907年到1917年的十年期间，他差不多有七年是在监狱里、在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和从流放地逃跑之中度过的。他小心地收集起来的这一期间的政治著作，加起来在他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0—427页。

的著作中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卷。即使是最宽容的读者，从这一卷里也几乎找不到什么证据，足于说明他在才智和政治上有什么明显的成就。这位在列宁从瑞士返回以前就在1917年初匆匆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领导布尔什维克的人，同那个在《斗争报》上发表文章的青年作者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他上升的原因在于实际的活动，而不是任何文学或新闻工作上的才能。

当列宁和其他领导人再次在西欧安营扎寨的时候，他一直留在巴库。他不属于那一类的领袖，对于这类领袖，党需要他们到国外去，使他们免受暗探局的迫害。他也不属于那一类有前途的工人，对于这类工人，党把他们送到国外各类党校去完成革命的教育。在列宁的私人档案中，是把他归入自己教育自己一类的。除了两次短期旅行到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以外，他那些年里都呆在俄国，据守在地下运动里，陷入革命日常的枯燥工作中，而这种日常工作同惊涛骇浪和激动人心的节日气氛是大不相同的。这就是他重大力量和重大弱点的根源。侨居国外的领袖们，由于在西欧的生活而具有广阔的国际远见，他却丝毫没有这种远见。当然，他也象其他布尔什维克一样地是国际主义者，虽然他的国际主义更多的是教条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经历。他是在地方范围内活动的，他只知道高加索部族和民族之间的血腥世仇，它表现为一种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蠢行。他的国际主义缺乏对欧洲生活总趋势的深切理解，缺乏对被称作欧洲文明的那个五彩斑斓的彩虹的敏感。另外一方面，他的确从他的本乡本土吸取了力量。他扎根在本土中，最初是由于出身和教养，现在则是由于政治上的命运。

1907年10月25日，他被选为巴库委员会的委员。他后来写道：“在石油工人中间的三年革命工作，把我锻炼成一个实际的战士和实际的地方工作领导者。一方面，在和巴库先进工人……的交往中，另一方面，在工人和石油业主最激烈的冲突的风暴中，我第一次知道了领导广大的工人群众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就在那里，在巴库，我受到了第二次战斗的革命洗礼。”^①在巴库，欧洲和亚洲甚至比在梯弗里斯更密切地汇合和互相渗透。迅速扩大的石油工业代表了欧洲的技术方法和经济组织。同波斯的边境贸易则是东方的性质。那时，巴库的雇佣工人百分之四十八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百分之四十二是波斯人、列金人和鞑靼人——大多数的波斯工人是季节性的。百分之十是土耳其人。把所有这些种族、民族和宗教以及它们不同的风俗习惯纳入一个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这是很费力的事情。俄罗斯人是熟练的工人，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先锋。穆斯林工人则是不熟练的、象乞丐一般的无产者。鞑靼人在他们的“沙黑西·瓦黑西”节日期间盛行自我鞭挞的习俗。传统的血亲复仇制只比阿拉伯沙漠地带稍好一些。在城市的穆斯林居住区中，每个家庭都与世隔绝地过着懒散的生活，对于激励着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居住地的那个世界是完全缺乏热情和好奇心的。正因为如此，穆斯林居住区就非常适合于搞秘密工作。布尔什维克在那儿设置了秘密的印刷所。柯巴也在那儿用假名加约兹·尼沙拉泽躲避警察的追逐。

但是，分散的穆斯林工人是不容易被宣传和被组织起来的。亚细亚的成分不仅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构成，也使石油公司的政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55页。

策带上了它的色彩，虽然公司的股东们都是欧洲人。就象柯巴在文章中说的，工资制度是实物工资加奖金（别什凯什）。西欧只是在产业革命初期才熟悉的那些剥削花样，以及东方人的狡猾才能发明的各种欺骗行为，经常运用在石油工人身上。机械工厂雇佣的工人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它们实行的工资制度比较接近欧洲的制度。但是这样一来又分裂了工人，并使工会的人难以协调他们的要求。实物工资制使俄罗斯工人依赖雇主到了这种程度：里海石油公司竟在1909年禁止工人未经公司许可而自行结婚。因此，尽管工业人口不纯和落后，这儿的劳工冲突却经常具有尖锐和爆炸的性质。

人们记得，在1904年底，巴库就早于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而发生革命骚乱。后来，这儿的政治生活却淹没于血腥的部族仇恨之中。1907年底，当俄国其他地区的骚动已经平息之后，巴库仍在爆发新的革命火花。这儿的地下运动也不象其他地方那样马上就被粉碎了。9月底举行了这一届杜马的初选，各个等级分别进行选举，工人区选举了布尔什维克作为自己的代表。柯巴写了《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①。他说，代表将是党的代表，必须执行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命令。他们的工作并不是直接立法。他们应该在杜马中坦率地声明，只要沙皇制度还存在，任何进步的立法或和平改革都是无用的。他们应该继续是革命的鼓动者。这个指示是布尔什维克议会策略的一个范本。

选举之后，柯巴转而注意石油工业中的劳工冲突。石油工人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的一个工会的，而机械工人则由孟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77—78页。

什维克分别组织和领导。柯巴这时所主张的东西非常接近于美国产联的原则——产业工会而不是行业工会。他坚持认为，石油公司必须同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每一个行业绝不能容许被收买而牺牲别的行业。工资制度必须改革。工人们需要的不是更多一点的奖金（别什凯什），而是欧洲的工资制度。工人们赞成欧洲的方法，反对亚洲的惯例。他在布尔什维克工会的合法报纸《汽笛报》上以科·卡托为名发表了一系列短文，阐述了这些观点。^①在工厂主同意和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之后，他号召“五万巴库工人”来选举他们的代表。当局答应给会议的代表豁免权。这是布尔什维克的一次胜利，因为孟什维克曾主张事前不提任何条件而同石油公司开始谈判，社会革命党和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人则号召无条件地抵制这次协商。

这次协商会议举行了几个月，详细地讨论了集体合同、管理罢工和发表政见等问题。后来塞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写道：“当全俄罗斯都被黑帮的反动所统治时，一个真正的工人议会正在巴库举行。”奥尔忠尼启则是未来的重工业人民委员，也是当时柯巴的密友之一。巴库向六三政权的挑战是大胆而公然的。列宁怀着忧郁的心情赞美这件事说：“真可谓群众政治罢工的最后的莫希干人！”^②他知道，巴库是无力使俄国其余部分行动起来。革命只是在高加索打着后卫战。但是，巴库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这次战斗的指挥者，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一片冷漠和无可奈何的气氛中能够坚持下来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对了，有那么一个伊凡诺维奇—柯巴，他曾经在塔墨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85—123页。

^②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99页。

尔福斯、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看见过他，这个人同战斗小队有关系，但是他的大名即使在列宁的私人档案中也还没有列入。此外，还有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当时石油工会的书记，未来的元帅）、叶努基泽兄弟（其中的一人后来成为苏联副主席）、斯潘达梁、贾帕里泽和邵武勉（未来的巴库人民委员）。俄罗斯其余部分一片死寂，到显得巴库的“汽笛”声震耳欲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使列宁逐渐熟悉了柯巴这个假名。这就是他已经不再用他本地的格鲁吉亚语写作了。巴库的格鲁吉亚人很少，俄语是不同语言的一个统一因素，并成为当地通用的语言。由柯巴主编或助编的《汽笛报》和秘密的《巴库无产者报》都是用俄语出版的报纸。它们定期地送到国外的布尔什维克总部去，列宁严格地审查了他的追随者们所印出来的每一篇文章和评论。柯巴的文章既不多也不出众，但却表现出对布尔什维克派的狂热般的忠诚，以及为列宁所高度赞许的务实精神。因此，柯巴从梯弗里斯到了波斯边界的这座石油城，的确就是从本地的一潭死水中走到全国政治的急流中去了。

在巴库委员会工作和组织了多次石油工人罢工后八九个月，柯巴—尼沙拉泽和其友人塞尔哥·奥尔忠尼启则被暗探局逮捕，并被关进拜洛夫监狱。在等待流放命令的长时期里，他们在监狱里还从事政治活动，如与不同观点的监友辩论，与一般同志交换秘密消息和印刷物，写秘密的传单，把写的东西偷送出监狱去，等等。不同派别之间的辩论，由于革命失败的加重而更趋剧烈。狱中布尔什维克的两个发言人，柯巴是冷静、无情和镇定自若的，奥尔忠尼启则却容易激动，感情充沛，突然之间就会吵了起来。狱中的讨论被怀疑所毒化，这是因为暗探

局甚至在牢房中也安置了暗探。于是同监的人出于狂热的怀疑，就经常想追踪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杀死受怀疑的人，因为地下工作的信条容许、甚至要求杀死暗探，作为一种自卫的措施。一些无辜者不幸引起人家的怀疑，有时就会遭到这种命运。这样一来就使病态的恐惧心理得到发泄，甚至提供了公报私仇的机会。每一派都急急忙忙地在对方中搜寻暗探，而在自己一方却又迟迟不去揭露他们。一些在拜洛夫监狱中和柯巴关在一起的不友好的回忆录作者曾谈到一些故事，说柯巴狡猾地煽动别人来进行政治迫害，并牺牲那些偶然开罪他的无辜者。^① 这些故事究竟真假如何，是很难说的，因为它们涉及到很多地下工作者，而且它们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怀疑情绪。

柯巴曾在巴统的监狱中呆过几年，其中的生活还是比较安静和轻松的，但巴库的监狱却在许多方面有显著的不同。等待处决的犯人常常和其他人混居在一起，而处决的地点就在院子里。当人们看着可能是刚刚同他们辩论过的人被带到刑场去，神经就紧张到了极点。但是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柯巴却酣然大睡（不知目击者相不相信），其神经之坚强，使他的同志都为之吃惊。如果不睡的话，他就继续去熟悉他无法掌握的复杂的德语语法。在这样污秽和堕落的环境中，他仍努力地注视着石油工业中的冲突，并不断地为《汽笛报》和《巴库无产者报》撰写评论。^② 但他的评论的调子这时已经不那么自信了。他劝告他的同志们不要指望总罢工。“只有各公司分别举行罢工才是合乎时宜的适当的退却形式”。他要求工人们注意防止“经济恐怖”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117—12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79页以后。

——这是一种绝望的行动，即个别工人袭击厂主或经理，当时变得越来越经常——因为这会使有组织的工人遭到报复。但是，当一家地方“自由派”报纸——“石油大王的喉舌”——向社会主义工会工作者鼓吹道德并谴责他们对经济恐怖无动于衷时，柯巴极端愤怒地进行反击，说石油工人的悲惨景况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陷于绝望和采取暴力。他嘲笑孟什维克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说社会主义者在防止经济恐怖时应该同当局合作。柯巴最后说，有组织的工人依靠自己的手段和按照自己的利益，必须制止绝望情绪和暴力行为，但是他们拒绝把犯罪者交给当局，他们也不向石油大王自以为公正的“自由主义”乞怜。

11月，他接到放逐到一个叫做索里维切果茨克地方去的命令，他将在警察的监督下在那儿度过两年。索里维切果茨克是十四世纪俄国商人作为盐和皮毛贸易中心而建立的一个小小的居留地，位于俄国欧洲部分沃洛格达州的北部。它的气候比西伯利亚北部放逐地要好一点。这说明柯巴的放逐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仍然成功地不引起暗探局的特别注意，而且避免了在行动的时候被当场抓住。在从沃洛格达往北到索里维切果茨克的途中，他患了斑疹伤寒，但终于在1909年2月到达。四个月之后他又逃跑了。他经过彼得堡到高加索去，在彼得堡时他拜访了他未来的岳父阿利卢耶夫，并通过他同秘密的党总部进行了联系。他得到了一张新的假护照，7月间他就以扎哈尔·格利哥里·迈里基扬茨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巴库。在彼得堡总部时，他必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党的工作者们仍然很看重巴库这个“不屈不挠的堡垒”。他还得到非正式的任命，担任国外出版的党“中央”刊物的高加索通讯员。由于这个职务，

他比以前更引起列宁的注意。

在从彼得堡返回巴库的途中，他必定很不愉快地回想起他在首都的所见所闻。那儿的组织，1907年时尚有党员八千人，这时已经减少到不足三百人。对于党总部的没有效率，他似乎还有一些怨言。他曾经贪婪地询问关于高加索的情况，但总部也没有什么情报。彼得堡同侨居外国的领袖们联系很少。秘密刊物的发行也很薄弱。他不禁渴望参加彼得堡总部的工作。

在他被监禁一年半之后，发现“巴库堡垒”的情况也不很妙。这儿的组织也缩小到只有几百人，其中有二百至三百布尔什维克和一百孟什维克。工会的会员也不很多。教育俱乐部（“科学俱乐部”和“知识即力量俱乐部”）有气无力。在油田里，劳动时间又从八小时增加到十二小时；虽然石油工业正一片繁荣，但工人却未得到什么好处。党的组织已经不再理睬鞅鞅的无产者，不再向他们散发用他们语言写的小册子和传单。党的资金已经耗尽，从他被放逐的那年以后，连一份秘密的俄语《巴库无产者报》也没有出版。这儿的事情看起来比其他地方还算好一点，但它已不再是老的蔑视一切的巴库了。

柯巴—迈里基扬茨在巴拉哈拉纳油田的一个秘密住所安顿下来之后，头一件事就是恢复《巴库无产者报》。在他返回后三星期，第一期报纸就发行了，其中有他一篇未署名的社论《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①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危机；他除了针对国内的读者外，还针对党的国外总部，作出了这样的分析。他根据从首都得到的一些消息说道：“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的各个组织彼此毫无联系，不是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41—150页。

而是彼此隔离。彼得堡不知道高加索在做什么，高加索不知道乌拉尔在做什么，如此等等，每个地方都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严格地说，过着共同生活的统一的党，也就是我们大家在1905、1906、1907年引以自豪的那个党，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国外的中心都受到了同样的指责，因为它们的刊物（他在这儿除了提到孟什维克的《呼声报》外还提到列宁的《无产者报》）“都没有并且也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系起来，不能使它们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如果以为远离俄国现实的国外机关报能把早已经过小组活动阶段的党的工作连成一气，那就太奇怪了。”^①这段话的最后部分是不中肯的。按照作者的陈述，现在的地下党并不比老的《火星报》时期强大，那时《火星报》曾把一小群先驱的宣传家组成为一个党。但柯巴是在表达土生土长的革命者对于“远离俄国现实”的国外领袖的不满，而且他也不想使列宁免于这种责备。他继续说，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例如公开党或把地下党的一切职责交给工人。前面一个办法等于取消了党；后一个办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如果仍然“保存旧的组织系统，使用老一套的党的工作方法，从国外进行‘领导’。他把领导这个字轻蔑地放在引号内。

但是，在结论部分他就比较谨慎了，因为他并不要求把领导权转交俄国国内。他所要求的是用俄文出版一家全国性的报纸，以便同国内的生活保持接触，并使党的分散的部分联合成为一个整体。负责创办和领导这一报纸的就是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工作这一任务本来就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但这个任务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41—142页。

现在执行得不好。……”这时两派之间仍然是半心半意地进行合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中央委员会中存在着长期的僵持状态。柯巴根本没有接触这一问题。他谴责整个中央委员会“远离俄国现实”。他关于出版全国性报纸的主意到不失为一个实际的建议，但是过了三年之后，才在彼得堡创办了《真理报》，柯巴是其中的一个编辑。同时，作为《巴库无产者报》的编辑，也间接地为他提供机会，使他成为到彼得堡总部工作的一个候选人。在一句旁白中他说，不象其他多数组织，巴库的党组织“直到现在还和群众保持着联系”。

在同一期《巴库无产者报》上，他发表了一个他自己写的巴库委员会的决议，论及国外布尔什维克领袖之间的不和。这个决议公开责备列宁为了柯巴认为的一些小的意见分歧而搞派别分裂。^①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位布尔什维主义的奠基人正在同那些激进派和抵制派断绝交往，这些人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波格丹诺夫、作家卢那察尔斯基、小品文作者曼努依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这些激进派谴责列宁背叛了布尔什维主义。因为这时列宁为了劝说他的追随者们把地下工作同合法活动结合起来，用一种批评家的观点鼓励他们把原则冲淡一些，执行一种经过阉割的、类似孟什维克的宣传。

策略上的分歧由于哲学上的争论而更趋复杂。那些激进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观点提出了疑问，企图根据新康德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哲学来修正辩证唯物主义。有一个时候，列宁完全摆脱了日常的政治活动，而且使他的学生们大惑不解地把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57—160页。

自己关在巴黎的图书馆里，^①以便写出他的哲学巨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在这本书中猛烈抨击新康德主义者、造神派和所有其他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②敌对的双方都各自设立了学校，来训练被吸引进争论的党的工作者。列宁的学校设在巴黎附近的朗居曼。激进派和造神派的学校则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庇护下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上鼓吹他们的观点。这两所学校在学生和资金上互相竞争。那些冒着很大危险从俄国赶来的工作者，渴望学习实际政治、政治经济学和地下工作的技术，却碰到了深入细致的哲学课程，并被号召在互相冲突的纯理论中进行选择，以及对开除异端分子表示赞成与否，而这些异端分子恰恰在政治策略上和他们持同一观点。

那位巴库委员会的领导人藏身在巴拉哈拉纳油田的鞑靼人之中，对于朗居曼和卡普里之间的争论颇为不耐。他必定认为，那些远离俄国现实的侨民已经达到了精神失常的边沿。巴库委员会应该谴责他们，并使他们恢复正常。他的意向表现出来是赞成列宁的策略和政治观点而反对激进派的，但他也反对列宁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和波格丹诺夫忽视党的纪律。由于各个小派别在主要政治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它们应该在一起工作；而列宁则应该停止践踏少数派的权利。在朗居曼和卡普里的争论中，巴库拒绝站在任何一边，因为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不充分。列宁注意到了这一谴责。他在自己的刊物上温和地向高

①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在日内瓦和伦敦英国博物馆阅览室写成的。——译者

② 波克罗夫斯基教授的回忆录中说道，布尔什维克曾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要求列宁放弃他的哲学研究，转回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来。波克罗夫斯基本人就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但是，列宁拒绝向他的追随者让步。

加索的批评者解释说，他无意进行政治迫害，但他不得不开除那些激进派，因为他们拒绝按照纪律行事。

柯巴在对国外的总部施加压力时，却小心地不使自己卷入同列宁的论争。1909年11月和12月，他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了一系列《高加索来信》，这家报纸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代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合中央委员会。编辑部包括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马尔托夫和唐恩。这些“来信”对高加索的情况作了详尽而可靠的考察。作者讨论了石油工业、当地政府和工会的情况，讨论了高加索的民族关系、地下工作、社会主义者的合法活动，并把梯弗里斯和巴库的情况加以对比——所有这些都是一本正经和具体的，虽然在风格上平淡无奇。他在一些“来信”中尖锐地批评了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及其首领挪亚·饶尔丹尼亚，引起了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反对，因而把这些信只发表在通常供进行争论用的辩论专页上，有一封信干脆就没有发表。这位高加索通讯员表现出是一个顽强的列宁主义者。他注意一点也不批评列宁，而他过去是曾经通过巴库委员会和《巴库无产者报》匿名批评过列宁的。列宁对于得到这位高加索通讯员一臂之力是感到高兴的。列宁很快注意到了他在俄国的追随者的心情，也要求在俄国设置进行工作的全国总部，并压迫不大愿意的孟什维克同意此事。同时巴库也为此大鼓其劲。在柯巴于1910年初写的另一决议中，巴库委员会要求“把（领导的）实践中心移到俄国来”。这个要求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决议一开头就预言：“俄国革命动力一个时候有过的沮丧和麻痹状态开始消失了。”^①在这一点上，柯巴正象以前一两次一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87页。

样，先于大多数侨居国外的作者们看出了问题，虽然当时托洛茨基在维也纳也作出了类似的预言。巴库委员会这时显然更加密切地同列宁站在一起，它也要求最后开除那些“取消派”，并使布尔什维克同那些赞成地下工作的孟什维克(如普列汉诺夫)合并。

3月，在准备石油工业总罢工期间，柯巴一迈里基扬茨再次被捕。在他入狱的那一天，秘密印刷所发行了他写的一张传单，纪念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七十寿辰，其中说，“在他的批评之下……‘戴皇冠的人物’、第一流的学者都不止一次地退却了”。在八个月的紧张工作之后，这时他又有六个月的时间在监狱里等待“行政”判决。这次也不是很苛刻的。他被命令回到索里维切果茨克去完成他的流放期。流放期满后，在五年期内禁止他在高加索和俄国其他大城市居住。于是他又踏上了向北的熟途。这一次他逗留了大约九个月，直到1911年6月27日流放期满，没有企图逃跑。这一次他也就永远地离开了高加索。后来他还到他的本地去作过短期旅行，但那是代表中央委员会去视察地方组织。他在高加索的一章这时已经结束了。

关于革命运动重起的预言的确很快就实现了。1910年列·托尔斯泰葬仪时发生的街头示威标志着它的开始。1912年时运动真正有了劲头，当时工人普遍罢工，抗议西伯利亚连纳金矿枪杀数百名罢工者。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虚假的团结也无可挽回地破裂了。1912年1月，列宁在布拉格召开了有布尔什维克和少数孟什维克参加的代表会议，以便宣布他的派别组

成另一个党，或者勿宁说使它的派别成为**现在的这个党**。这是他同孟什维克主要部分的最后决裂。就象1903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会议也是在一座叫做人民大厦的地方举行。捷克社会主义者是俄国革命者的东道主。就是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列宁在向代表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放上了柯巴的名字。但是柯巴没有当选。这是因为大多数代表都是从各个侨居地来的，他们彼此相识，但对柯巴这个名字却还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柯巴以前的助手和在巴库的那位脾气暴躁的同监奥尔忠尼启则当选了，这很可能因为他是直接从列宁在朗居曼的学校来的（他在那儿还是一个学生）。但是列宁并不就此作罢。根据党章规定，被选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增补别的委员，于是在列宁的提议下，中央委员会使用这个权力增补了柯巴。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则和俄罗斯化的波兰人马林诺夫斯基，他是暗探局的一名暗探。

列宁为什么倾向于柯巴？在政治运动复兴的开头，列宁急于使自己得到最大的活动余地。他摆脱同孟什维克的有害联系，以便不会有妥协或团结的考虑迫使他“削减”他的宣传和口号。这时他正开始使他的组织形成起来。过去的分裂使他同一些能干的同事分了手，他最近孤注一掷的决定又使他身边没有留下多少著名的朋友。托洛茨基此时正领导着一个五花八门的联合体，其中有孟什维克右翼、布尔什维克激进派、反孟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者、取消派、抵制派、造神派以及干脆的托洛茨基派，他们在报纸上猛攻列宁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列宁的亲密助手，但甚至托洛茨基的姻兄弟加米涅夫也开始动摇了。列宁已经不再理睬那些侨居国外的知识分子。他选择了

一些地下党的实际工作者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选举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就设置了一个俄罗斯局，指导党在俄国内部的活动。这个局包括四名成员：柯巴、奥尔忠尼启则、斯潘达梁和某个叫做果洛什切金的人。头三人都曾经是巴库委员会的成员。因此高加索集团就成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台柱，扮演了同他们地区重要性极不相称的角色。这是由于巴库在1908年罢工和示威的名声仍然很高，也许在列宁的眼里还把这种名声过分夸大了。列宁必定认为，前头的任务需要一些象巴库领导人一样坚毅、顽强和敏锐的人来完成。在克鲁普斯卡娅的档案中，巴库集团的代号是“马”，列宁现在就把他的马套上挽具了。^①

柯巴的提升并非突然。列宁必定从国外的高加索工作者那里听到许多对他赞美的话。在朗居曼学校，奥尔忠尼也曾吹嘘柯巴是巴库委员会中最坚强的人。这位候选者本人也没有忽略去做一些谨慎而考虑周到的姿态，以帮助他能够得到提升。他在流亡中一直同有影响的党工作者保持联系，他们也可能在总部为他讲些好话；他尽可能地向每一个人表现得和蔼可亲。在从索里维切果茨克写给中央委员会委员谢明·施华兹的一封信中，他再次建议组成一个俄国中心，从而转弯抹角地提供了自己的贡献。这封信的调子表现得对侨居国外的中央委员会极度尊敬，对列宁充满了忠诚之心，并嘲笑了列宁的对手们（“列宁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明察秋毫”）。列宁不可能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他这时有一切理由认为，他的这位高加索仰慕者（他

^① L·克拉辛：《往事》，第16页。

显然是急欲得到提升的)将是他的思想的忠实执行者。①

到1911年6月,柯巴的流放期满了。由于禁止他居住任何大城市,他就选择了比较接近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沃洛果达。两个月后,他突然从沃洛果达到了彼得堡,再一次去敲阿利卢耶夫的门。阿利卢耶夫的房子已被暗探局的特务监视,柯巴虽然事前得到警告,但他对过分小心和怀疑感到不耐。恰好就在这一天,斯托雷平总理被一个悔恨的暗探巴格罗夫在基辅暗杀,他所以如此,是想在地下党眼中赎回自己的罪行。暗探局一片慌乱,逮捕了所有的可疑分子。以新的假名(契柯夫)出现的柯巴又被捕了。②他在监狱中呆了几个月,后来被放逐回沃洛果达,为期三年。

当他在返回沃洛果达途中,布拉格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正在国外集中。只是到了1912年2月中,当时已经是新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特使的奥尔忠尼启则到沃洛果达来看他,他才获知会议的结果。奥尔忠尼启则向列宁报告说:“我已经见到了伊凡诺维奇,并已经同他安排了一切事情。他听到事情的结果是很高兴的。那些消息使他印象极为深刻。”③柯巴显然不曾反对列宁同孟什维克的最后决裂。除了对于原则的考虑外,他的提升同这一决裂大有关系,也使得他要遵循列宁的政策。下一件事就是如何逃脱沃洛果达警察的监督,返回首都。当他准备逃跑时,他写了一篇传单,向俄国社会主义者解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定。他在这份文件的后面落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99—202页。

② A·S·阿利卢耶娃:《回忆录》,第108—109页。

③ E·雅罗斯拉夫斯基:《里程碑》,第75页。

这还是头一次他代表布尔什维主义全国领导发言。^① 这张传单印了六千份，在主要的工业城市中散发。当时一些体面的俄国报纸几乎都没有注意这件事。但是柯巴这时在他当权的道路上已经摆下了决定性的一块踏脚石。五年之后，沙皇退位，他从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就是凭这个在1912年得到的正式资历，在列宁从瑞士到来之前，担任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

但是，如果象他的官方传记作者所宣传的那样，认为柯巴在一生的这一阶段中已经在布尔什维克里居于仅次于列宁的地位，那也是错误的。情况远不是这样。布尔什维主义领导人员的调整是继续不断的过程。除了它的中心人物列宁以外，这个等级制度还不是固定的；列宁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政治才能，而不是他要求自己的追随者忠诚和服从的结果。列宁周围的星系是在变化莫测和飘忽不定地旋转着的，永远是老的星星消失了，又出现了新的星星。在布尔什维克等级制度中同柯巴不相上下的许多人，他们的名字已经被人逐渐遗忘了。我们只有根据他随后的事业来看，他在1912年的擢升才显得是重要的。但是他也不象其他人一样，他的根子已经牢牢地扎下来了。当时看来，他升入中央委员会一事，好象只是党的许多人事变动之一，特别是因为这位新人并不是以新思想的创始人或政策的制定者而闻名的。总之，他是中央委员会的股肱，而不是它的头脑或心脏。

从柯巴擢升到第二次革命的五年期间，他的活动极少，这一点更足以说明他的擢升是偶然的，几乎是侥幸的。在这五年中，只有第一年他履行了中央委员的职责，因为其余四年他被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03—207页。

流放到近北极圈的西伯利亚去了。即使在第一年中，他也只出来工作了约五个月，之后就再次被捕和流放，再次准备逃跑。总之，他有效的政治工作只持续了总共七个月，其中又只有五个月是完整的一段。这段时间只够他小试一下身手，熟悉党内的领导人物，也许还可以巩固一下自己的地位，但是这点时间不足以使他获得很多新的经验或剧烈地改变他的地位。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顽强地工作着。他从沃洛果达直接到南方去，听取了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对布拉格会议决议的反映。然后他又从高加索匆匆赶到莫斯科，同奥尔忠尼启则交换关于各地方组织对列宁新“路线”的看法。4月中，他返回首都，及时地帮助当地准备庆祝五一节。他照例写了一张传单，署名中央委员会，但仍回响着正教中学学生的腔调：“工人运动的海洋日益波澜壮阔地泛滥起来，把欧洲和美洲到亚洲、非洲和澳洲的许多新的地域和国家卷进去了。……无产阶级愤怒的海洋掀起了巨浪，日益猛烈地冲击动摇着的资本主义堡垒。……他们确信自己的胜利，他们镇定而坚强，他们骄傲地沿着通向乐士的道路迈进。……他们今天应当告诉大家，他们和自由国家的同志们是一致行动的，——他们现在不崇拜、将来也不崇拜金偶像了。”^①

在他呆在彼得堡的时候——只过了十二天就被捕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建立了联系，因为他是代表中央委员会对他们的行动进行监督的。他兴致勃勃地编辑了三期《明星报》，把他自己的文章填满了大部分篇幅。他还为《真理报》的创刊进行了准备。1912年4月22日，《真理报》终于创刊，登载了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10—211页。

柯巴写的一篇编辑部文章。^①由于工人们对于列宁最后同孟什维克决裂表示不大赞成，柯巴在文章中的语气十分缓和，进行了充分的说理。他答应，《真理报》无意掩饰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以为强大而充满生命力的运动，没有意见分歧是不可想象的，——‘观点的完全相同’只有在墓地里才能实现！”工人运动中一致之点多于分歧之点。因此，《真理报》号召社会主义者在阶级斗争中统一起来，“无论如何要统一起来”。“既然我们对敌人应该势不两立，我们之间就得互相忍让。对工人运动的敌人要斗争，在运动内部却要和平，要同心协力地工作。”这篇为报纸写的文章，后来成为斯大林主义国教的著名论点。当载着这篇文章的报纸从印刷所出来的那天，它的作者已经蹲在彼得堡的监狱中了。三个月之后，照例下达了流放三年的命令，这次的地点是东西伯利亚的纳赖姆州。刚好两个月后，柯巴又逃出纳赖姆，重新出现在彼得堡，恰恰赶上领导他的党进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

工人区的选举运动分几个阶段进行：在工厂和车间选举代表，代表选举选举人，最后选举人再选举杜马代表。头一个阶段之后，当局宣布若干大工厂的选举结果无效。柯巴召集了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宣布抗议性的罢工。结果政府退让了。在选举运动的各阶段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公开地竞争工人的选票。首都工人选举人的会议通过了柯巴写的《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它在很多方面类似上一次选举时他在巴库写的委托书。委托书要求代表们公开提出工人的要求（“1905年的全部的不折不扣的要求”），成为革命的代言人，“而不是在士绅的杜马中无谓地玩弄立法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43—244页。

把戏”。列宁鼓励这次选举运动，并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密切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对《委托书》的干脆明了和柯巴的成功感到高兴。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区占了上峰。最后选出了十三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六个是布尔什维克，七个是孟什维克。但所有布尔什维克的代表都是工人区选举的，而大多数的孟什维克代表却来自资产阶级的选区。因此列宁指出，在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公开地同温和的一翼竞争中，工人阶级支持布尔什维克。柯巴在他给《真理报》写的文章和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通讯中，温和地抑制了列宁的乐观看法，指出当布尔什维克向工人提出激进的口号时，社会主义各派的公开分裂是不会发生的。

紧接着选举之后，柯巴于1912年11月到克拉科夫去了几天，参加中央委员会估计形势的会议。列宁强烈地要求这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同孟什维克代表公开分裂。他坚信工人最后会认识到分裂的理由，但他也准备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划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即使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柯巴返回彼得堡后没有贯彻列宁的政策。由于这届杜马中极右派占居优势，所以布尔什维克代表不愿把社会主义者内部的分裂暴露出来。列宁也发现《真理报》在分裂问题上退缩不前，感到很愤怒。他可能想到，这个由他带进党内核心的高加索人是否还支持他。在托洛茨基写的斯大林评传中，他把这一事件说成是柯巴反对其导师的一次恶毒的阴谋。^① 列宁还不这样看。他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422—426页；A·E·巴达耶夫：《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第194—211页；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143—149页。无所不知的暗探局的报告中也有对这一事件的叙述，见《红档》，1939年第1期，第77—80页。从暗探局截获的斯维尔德洛夫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对于斯大林编辑《真理报》的方式是印象不佳的。

把这事看成是一次令人尴尬的但转瞬即逝的不和，他希望利用他特有的精明而老练的方式去克服这个困难。他召集了中央委员会和克拉科夫六个布尔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准备详细考核一下《真理报》的编辑部，其方式又不会触犯柯巴的自尊。

到1912年12月底，柯巴离开俄国已六星期，这是他一生中在国外呆得最长的时期。^①他在这一短时期做的事情对他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当前的分歧被妥贴地解决了，在导师和学生之间没有留下什么介蒂。列宁想法劝使六个代表同孟什维克分开。他责备了《真理报》的和解调子，悄悄地派了一个叫雅可布·斯维尔德洛夫的人到彼得堡负责这家报纸。斯维尔德洛夫（未来的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主管了编辑部——其中有一

① 斯大林向他的姨妹 A·S·阿利卢耶娃描述了到克拉科夫的这次旅行。他这次旅行时没有护照。“在俄国和奥属波兰边界的一个小镇里，他不认识任何人，但他小心地结识了一位居住当地的商人。

在路上他们进行交谈。……他是一个波兰的鞋匠。……他们到了他的家里。主人让他休息和吃饭。……他亲切而谨慎……只是问了问他的客人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很远”，斯大林回答说，并看了看屋子角落里的鞋匠工具和小凳，他说：“我的父亲也是一个鞋匠，在那边格鲁吉亚的老家里。”

“在格鲁吉亚？”那个波兰人重复道。“那么你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听说过你的国家，它是一个好地方，有山，有葡萄园。而且象在波兰一样也有沙皇宪兵。……”

“对，就象在波兰一样”，斯大林说，“没有用自己语言教书的学校，但却有很多宪兵。”他们彼此看着。“我能信任他吗？”斯大林想道。最后他下了决心说：“我今天必须通过边界。”

这个人没有再问什么。“好吧，”他说，“我愿意带你过去，我知道路。……”到了边界，斯大林想付钱给他……但这位向导把他的手推开。

“不”，他坚决地说：“不要这样。……我们都是被压迫者的子孙，应该互相帮助。”A·S·阿利卢耶娃：《回忆录》，第185—187页。

个年轻的大学生斯克尼亚宾—莫洛托夫——并使《真理报》焕然一新。列宁给柯巴很多安抚，让他到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完成一些重要的任务。

在这一阶段，列宁无疑想亲自同他的门徒更熟悉一下。他的思想特点是什么？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如何？他的重大特点和缺点是什么？列宁是一个鉴定人的专家，而且有一种接近人的真正的苏格拉底方法。起初他肯定是向柯巴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彼得堡选举的过程，地下工作的情况，高加索的种族和民族，等等。人们可以猜想，这种考察不会是学究气的。考察者必然已经知道了被考察的门徒的限度。但是结果他还是感到满意的。这个年轻的人（柯巴这时是三十三岁）虽不是一个有独力思考的人，但却坦率、精明，通晓实际事务。例如，他异常精通高加索民族的复杂事务。两个人的谈话很快就集中到这一点上去了。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的观点，而柯巴根据他的经验，却能赋予他的导师的计划以血肉。在一次讨论的过程中，列宁建议柯巴对这问题写一篇文章，给党的稳健的社会学刊物《启蒙》登载。

这个建议是讨人喜欢的，因为在此以前柯巴还不敢进入复杂的理论领域。但是这个民族问题要比高加索的种族纠纷广阔得多。就在波兰这个生长国王和诗人的中世纪城市克拉科夫，对于波兰人的民族愿望就不可能加以忽视。隔着列宁住处几乎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皮尔苏茨基正在准备他的军团的干部，以便举行反对俄国的起义。列宁说：“波兰人憎恨俄国，而这是不无理由的。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民族感情的力量。我们的革命必须非常温和地对待他们，如果必要，甚至要允许他们同俄国分

离。”^① 然后还有奥匈帝国各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包括马扎尔人、德意志人、捷克人、南部斯拉夫人。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曾为这些民族制订了一个计划。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奥地利人的政策，肯定是值得加以比较的。列宁谨慎地不去伤害他的门徒的自尊心，很可能向他提示了文章的概要、主要论点和结论。这篇文章需要几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而维也纳是写作的最适宜的地点，因为它是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的首都。此外，中央委员会还必须派一个特使到维也纳去安排一些技术问题，如印刷党的决议，安排党从巴黎到克拉科夫的邮递，因此柯巴到维也纳去就可以一身而二任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的起因，它发表时署名科·斯大林（钢铁的人）。主要是由于这篇文章带给作者在这些事务方面的专家名声，他在五年以后的列宁政府中当任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在代表们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离开克拉科夫之后，柯巴还在那儿呆了几个星期。在列宁身边的时候，他必定回想起他对于侨居国外的人“远离俄国现实”的嘲笑。列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门徒不会不对他的导师进行观察。列宁看来一点也不脱离现实。他对于国内每一个情况的事实和本质都有惊人的理解。他对于地下工作的洞悉大大超过许多生活在国内的顽强的布尔什维克。他掌握人的本领是高超的。他这时刚四十岁出头，但由于经历而磨练出来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却完美地构成了一个成熟的和明智的性格。作为革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一些领导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优秀人士中是无以伦比的。列宁的这种性格肯定比其他人对柯巴—斯大林更具有吸引力。那

^① 斯大林在1941年向西科尔斯基将军谈到这些话。

末为什么这位活动家却把自己的精力经常浪费在宗派性的争吵和吹毛求疵的理论争论中呢？什么东西促使这位秘密核心的天才领袖耽于象他同卡普里的哲学家们之间进行的那种无益而尖刻的争论呢？

就象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实际工作者一样，柯巴—斯大林也是深受马克思主义思维习惯所薰淘的，他们明白一场哲学争论中的政治含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强调一元论的。根据这种一元论，科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和策略都紧密地组成一个单一的思想体系。但是象斯大林类型的实际工作者，对于哲学和理论的兴趣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只是为了在知识和政治上的便利，从通俗理论工作者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似乎提供了奇异的线索，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掌握这种线索更令人安心的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中级干部就是来自这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在思想上省力的装置，容易驾驭，又非常有效。只要在这儿按一下旋钮，就会使那个思想迎刃而解；在那儿按一下旋钮，又会处理好另一个思想。这种省力装置的使用者很少想到，在发明这一装置之前，要经过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也没有想到，这种兴味索然而表面看来又不切实际的研究，有朝一日会使他们的那种省力装置陈旧过时。使用这种装置的人自然以同样狭隘的功利主义方式来对待他们的一切问题。列宁并不象他的许多追随者，他是思维试验室中的一个批判性的学者。最后他总是把他发现的东西应用到某些政治问题上去；而他的发现从来没有使他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发生动摇。但是当他从事于研究工

作时，他是虚心的和不偏不倚的。有时当他感到需要填补自己知识的重要空白时，他会毫不迟疑地离开实际政治一年，关在大英博物馆或巴黎国立图书馆中，吸取丰富的新材料，然后对某个辩论中的问题谈出自己的想法。在这样的时候，那些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使用省力装置的人，对于这位严肃认真的思想家就会逐渐感到不耐烦。作为学者的列宁对于他们的烦躁是可以不管的，但作为党的首脑却又不能不管。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门徒深切信赖他们的首脑，所以他们也会克制住对于理论家的愤怒。当列宁和他的这位门徒在克拉科夫会见时，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精神上存在着隔阂。为了鼓励他的年轻的同事去解决政治理论上的主要问题，列宁就设法来消除这种隔阂。他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和党的首脑，他还是一位精明而关心人的导师，对于形成他的学生思想的那些艰苦条件是充分了解的。列宁并不害怕他在思想上的粗野，帮助他把自己的优秀品质发掘出来。

在1913年1月下半月，柯巴动身到维也纳去。他在那儿呆了约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一些文章和传单，并安排了各布尔什维克中心之间的技术联络工作。他还会见当时在维也纳的下面一些重要流亡人物：尼古拉·布哈林，未来的共产国际领袖；亚历山大·特洛扬诺夫斯基，未来的苏联驻美大使；以及列昂·托洛茨基。^①布哈林才二十岁出头，已经是一位有才能的和博学的作家了。当时他正在从事写作，批判边际效用的维也纳经济学派，这个学派的最著名的代表就是伯姆—巴维尔克教授。这位年轻人必定充当了那个粗鲁的高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158页。

加索人的向导，因为他的德语刚刚入门，在奥地利首都深感不便。布哈林可能还帮助他找寻所需要的书籍和引语。除了民族问题以外，布哈林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同列宁的观点不一致。列宁鼓吹民族自决权，并把它说成是，波兰人、乌克兰人、列特人等有权脱离俄罗斯帝国并组成自己的独立国家。布哈林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它对波兰人、乌克兰人等民族作了不必要的让步。他认为，革命将径自解决现存的民族分野问题。斯大林的文章中没有布哈林的论点，它始终一贯地是列宁主义的。但是，这两个人看来是以友好的态度分手的。他们在维也纳的会见，是他们随后十年中亲密的政治伙伴关系的开场，这种伙伴关系最终以斯大林消灭布哈林而结束。

不论是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都没有谈及他们在维也纳的会见。托洛茨基只回忆起在斯大林“猜疑的眼光”中“闪现着敌意”。有“敌意”是不奇怪的。几年以前，托洛茨基在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小队时，曾无意之中开罪了斯大林。旧恨未平，现在又增加了新仇。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同孟什维克最后决裂的运动这时恰恰达到了高潮。按照托洛茨基对革命任务的观点来看，他不是孟什维克也不是布尔什维克。他没有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也不同意列宁关于革命将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种观点。他两者都反对，而鼓吹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预言革命将很快地从反封建转变到反资本主义阶段，或者勿宁说在实际的事件过程中两者交织在一起。但是，由于俄国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它的出路就在于全欧洲的大变动。俄国的革命将激起欧洲其余部分的革命，到

了那时，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就成熟了。这就是他的“不断革命论”的概括说明，这种理论使他在许多方面都站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左面。但是，在党内的争论方面，托洛茨基又居于两派的中间，甚至还鼓吹所有社会主义者的统一。这时他进攻的火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反对列宁，因为正是列宁坦率地抛弃了统一的思想而蓄意使党分裂。托洛茨基谴责布拉格会议是“欺骗和篡权”。不过正是这次“篡权”，才使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的等级制度中擢升了。

这两个未来的敌手不仅仅在原则问题上互相冲突。这时托洛茨基还第二次在无意之中抨击了柯巴在地下工作中的地位。就象在希腊悲剧中一样，环境和偶然事件中的某种宿命的东西，使得在正剧开始之前就已造成了第一次冲突的因素。斯大林这时正负责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的《真理报》。而托洛茨基却在他自己的维也纳《真理报》上猛烈攻击列宁主义者的“分裂行为”。在最近一次的杜马选举中，托洛茨基还给孟什维克“取消派”在彼得堡的报纸写了一些文章。斯大林在到维也纳前不久总结了这次选举，在《真理报》上写道：“运动的实践粉碎了托洛茨基的联合不能联合的东西的幼稚计划。……托洛茨基正在从空想的统一的说教者变成取消派的伙计。……托洛茨基曾用一切办法使我们有两种互相竞争的报纸，两套互相竞争的纲领，两个互相否定的会议——现在这个假装的大力士自己却向我们唱起统一的高调来了！”^①同样，在一封头一次署名斯大林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1913年1月12日）的信中，他写道：“有人说，托洛茨基以其‘统一’运动给取消派的旧‘事业’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58页。

注入了‘新血液’。这是不对的。虽然托洛茨基作了‘英勇的’努力和‘来势汹汹的威胁’，但他到底不过是一个爱吵爱嚷的假装的大力士吧了，因为他五年来的‘工作’，除了取消派，就没有能够团结任何一个人。”^①五年之后，托洛茨基被布尔什维克欢呼为仅次于列宁的革命领袖、红军的创建人和内战的胜利者。但是关于“爱吵爱嚷的假装的大力士”的嘲笑仍然在斯大林的心中闪过。虽然这句话说得粗俗，但它的作者显然是理解托洛茨基的弱点的——他在策略把戏和政治花招方面是无能的，而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证明自己倒是一个老手。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也必定怀着好奇心注视着列宁新中央委员会的这位不知名的成员。这位傲慢的思想家和审美家对于这个粗俗的人几乎是没有什么印象的，这个人说着带格鲁吉亚口音的蹩脚俄语，在讨论中提不出任何新鲜的思想。对于这个阴暗的交谈者，他肯定没有看出他身上具有的精明、实际感和固执精神。他可能自言自语地说，“列宁现在竟然同这些阴暗和呆滞的人为伍。”不久之后，他写信给孟什维克的杜马领袖齐赫泽（就是1901年在巴库把柯巴说成是“疯子”和“捣乱者”的同一人）说：“那位争吵能手列宁所蓄意挑起的令人讨厌的争吵，是多么地没有意义……列宁是利用俄国工人运动落后性的专家。……”^②在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必定是这种“落后性”的一个样板。

到了2月中，斯大林已经首途返国。他的情绪很高，因为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76页。

^② 引自N·波波夫，《党史纲要》，第1卷，第289页。托洛茨基从未否认过这封信的真实性。

他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受到列宁热情的称赞。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篇东西原来必定是很粗糙的，这位“老头子”对它的文体和逻辑性进行了删改。但是，对于这位门徒能够熟练地考察东欧民族问题的万花筒，掌握大量的事实材料，并能利用布尔什维克纲领中的精辟而明晰的说法来进行分析，他也不禁为之惊叹不已。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①中，颇为骄傲地提到了这个“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的著作。于是最近期间因意见不和而产生的烦恼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列宁太高兴地看到他的门徒成为一个理论家。柯巴长时期以来就暗中怀着这样的雄心。由于没有机会实现，他有时就愿意以一种思想狭隘的活动家姿态来掩饰这种挫折。现在他不需要再故作姿态了。由于才智突出，他在党内的正式地位也上升了。

在他返回彼得堡一周之后，2月23日，他的活动被政治警察打断了。这次被捕的结果是流放整整四年。他这次失踪的情况很古怪。他是被他的中央委员会同事、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出卖给暗探局的。这个暗探曾经把克拉科夫会议的详情报告给秘密警察头子贝列茨基，然后贝列茨基又把这些情报上报给内务大臣马卡洛夫。于是就布置了罗网来逮捕返回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被捕那一天，他参加了一次无害的音乐日场演出，这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但警察已经加以批准。这种活动是很多合法活动的一种，党借以同它的同情者保持联系。毫无戒心的斯大林问马林诺夫斯基他参加音乐会有无危险。马林诺夫斯基花言巧语地让他放心，同时却立即告诉了暗探局。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71页。

斯大林的同志们感觉到了危险，设法把他引出这个陷阱，让他穿上女人的大衣来欺骗暗探局的特务。但此计未售。^①

列宁为这一消息而苦恼，但希望能够安排斯大林尽快地逃跑。被要求来准备这件事的人却是马林诺夫斯基，因为他不仅是中央委员，而且还是负责消灭暗探和组织重要人物逃跑的小机构的成员。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马林诺夫斯基共同制定了秘密行动的详细计划和代号等等。于是列宁就号召“第三号”去把“瓦西里”解救出来。但是“第三号”（马林诺夫斯基）却尽力使西伯利亚北部土鲁汉斯克边区的宪兵更加严密地监视“瓦西里”（斯大林），并把他转解到更远的近北极的冻土地带去。^②此时列宁已陷于失望之中，因为他的所有重要特使，其中包括《真理报》的主编雅可布·斯维尔德洛夫，都以同样的方式失踪了。不过他仍然不愿怀疑马林诺夫斯基，尽管孟什维克已经一再表示对这个人的不信任。后来，马林诺夫斯基辞去了在杜马中的议席，因为新上任的暗探局长害怕会引起议会丑闻。杜马中自由派的发言人罗将柯知道这件事，但他向杜马保持了秘密。甚至在马林诺夫斯基辞职以后，列宁仍不愿怀疑他的忠诚，后来把他开除出党只是为了他违犯了纪律。一直到了1917年，暗探局的档案被公开，这件稀奇古怪的事才大白于天下。^③

在被捕后一年多，斯大林于1914年3月被转解到叶尼塞河

① A·E·巴达耶夫前引书，第283—284页。

② 马林诺夫斯基的作用，见巴达耶夫前引书第100—102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中克鲁普斯卡娅和皮亚特尼茨基的发言；还可参看《雅·斯维尔德诺夫（论文集，回忆录）》，第42—44页。

③ A·E·巴达耶夫前引书，第285页。

下游的库莱卡村。在比苏格兰还大的这片土地上，只居住着一万俄罗斯人和本地人。他们住在小村子里，彼此相离几十到几百英里的雪原。那儿的冬季长达八个月甚至九个月，夏天很短，热而干燥。在夏季里，当地居民居住在驯鹿皮做的帐篷里；冬季则退居半是棚子半是窑洞的屋子里。冻土地带不生产粮食，当地居民靠渔猎为生，用毛皮和伏特加保暖。只是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他们在生活中才使用汽油引擎和现代的农业方法。在斯大林被流放的期间，那儿是一片荒凉的原野。

这个生长在亚热带高加索的流放者，经受住了气候对他健康的考验。孤寂和懒散的生活就靠书报来排遣。这些书报是朋友们寄来的，由一个飘忽不定的邮差每隔几个月送一次来。起初，《真理报》的两个前编者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共居一屋。斯维尔德洛夫是这样描写他们的共同生活的：

我们有两个人，因为我同格鲁吉亚人朱加施维里合住一屋。他是一个好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主义的东西太多，而我希望起码在表面上要有一点秩序才行。因此我经常感到激动不安。……更糟糕的是，我们同房东的家没有隔开。我们的屋子就在他们的间壁，而且由一道门出进。他们有孩子，那些小家伙自然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我们这里。有些时候他们真碍事。除此以外，当地的居民也经常光临。他们来后就坐下，一直沉默半个钟头，然后突然站起来说道：“好了，我要走了，再见。”一个人走了，另外一个又来，没完没了。他们仿佛什么也不管不顾，在晚上最后的学习时间光临。……这儿还没有煤油，因此我们不

得不在烛光下学习。……^①

这两个人显然相处不好。斯维尔德洛夫很快就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斯大林单独留了下来，用钓鱼、打猎和阅读来打发未完的岁月。起初他还一心一意地想逃跑，后来就逐渐淡漠了，因为对他的监视也越来越严。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件事才算到了头。但是，由于俄国的戒严令，流放者宁愿呆在他们原来的地方。起初斯大林继续研究民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写了一篇新的文章，通过尚住在彼得堡的能起很大作用的阿利卢耶夫转交列宁。^② 这篇文章从未发表，也许是在路上丢了，或者就是水平不如他以前的那篇，因而列宁不感兴趣。他呆在库莱卡村的其余时间中几乎没有写什么。在他的《全集》中，从1913年2月到1917年3月有一段空白，出版者企图解释说，斯大林在那段时期的著作“至今还没有找到”。^③ 革命使斯大林逃出了流放地，并使他的著作不再受到暗探局的销毁，因此上述解释不是很说得通的。情况很可能是，当他同实际工作脱离之后，他并没有拿起笔来。他是一个革命的实际工作者，而不是一个革命的文人。

正是在库莱卡的孤寂生活中，他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这一事件并不是晴天霹雳，但却使俄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惊惶失措。在前几年，国际社会主义者几次代表大会都曾强烈地呼吁世界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但是很少有领袖人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171页；又见A·S·阿利卢耶娃前引书，第115页。

② A·S·阿利卢耶娃前引书，第118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页。

物真地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在战争爆发前两年，列宁忙于派别的事情，很少写东西，写的东西也没暗示他注意到了这种危险。当战争真地爆发时，他为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大吃一惊。他在瑞士的报纸上谈到，德国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的代表支持德皇的战争，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开头还把这一报道看成是德国总参谋部放出的试探气球，目的是为了欺骗工人阶级，使他们同意这一战争。^①他对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力量的信念是多么地强烈而单纯。正是由于他过分着迷于这个信念，以致在思想中完全没有考虑政治了。但是后来他克服了那种思想，并决定“用战争来反对战争”。他不是和平主义者。他对战争的答复就是革命。他指斥托拉斯、卡特尔和大银行是真正的罪犯，并谴责交战各国中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阶级之间的爱国休战，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并不害怕别人谴责他说，由于他在本国促进革命，就可能招致本国的失败。他坦率地把自己称为革命的失败主义者。他说，沙皇的失败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人民益处最少；如果这种失败加速了革命的到来，那就更好了。俄国的所有反对党，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党，毕竟在十年以前的日俄战争中就采取过失败主义的态度了。他还进一步拒绝同不赞成他观点的社会主义者打交道。那些工党领袖已经变成替欧洲各国司令部提供炮灰的人，和他们是没有什么团结可言的。在他看来，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同他们进行任何联系就是背叛行为。第二国际已经死亡——没有什么东西剩下来了，只有从新开始从基础上建立第三国际。

就象过去有些时候一样，这时列宁也大大跑在他的信徒和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涯》，第226—227页。

追随者前面去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已被战争沙文主义冲昏头脑。他们仍然忠实于反军国主义的信念，并反对这场战争。但是在他们看来，列宁似乎把事情强调得太过分了。他们困惑地看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瑞士写的东西中特别强调他们的失败主义观点。大约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巴黎却鼓吹“既不胜利又不失败”，而要革命。许多布尔什维克认为他的主张更合乎道理。他们对列宁号召同第二国际决裂更是惊得发呆，因为他们曾习惯于把第二国际看成是所有社会主义者梦想和希望的体现。在支持战争的社会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或“护国派”）和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有一大批犹豫不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由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行为而沮丧，但又不愿意采取不可调合的分裂行动。

俄国国内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担心，如果他们严格地遵循列宁的政策，他们就会脱离那动摇的但为数很大的一部分人。战争一开始，沙皇政府就把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投入监狱，指控他们犯了叛国罪。这些人中有加米涅夫，他从斯大林被流放后就在宣传他们的政策和编辑《真理报》。他们出庭受审，检查官用列宁关于失败主义的宣言作为证据，对他们进行控告。加米涅夫和一些代表于是就声明同列宁脱离关系，这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真地反对列宁的失败主义，一部分是由于他们急于逃避检查官的打击。代表们和加米涅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叶尼塞州。他们的到达，在流放者中间引起了混乱和愤怒的辩论。列宁的追随者（失败主义者）指责他们缺乏政治原则和在法庭前丧失自己的尊严。流放者都是坐着狗或驯鹿拉的雪橇旅行几百英里到某个居民点去参加辩论的。斯大林也参加了几次

这样的集会，他在会上谈了些什么和他站在哪一边，至今还一无所知。他的官方传记作者说，他是革命失败主义者的主要发言人。斯大林主义正统派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他们的英雄同列宁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很可能是，斯大林采取了骑墙的态度，因为这正是他返回彼得堡后在1917年还仍然抱着的态度。

总之，他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争论。他离开政治行动的任何舞台都有几千英里之遥；苦心制订出各项行动原则，但却没有任何立即实施的机会，这不是他乐意干的事情。那些血气方刚的流亡者，或者那些更爱思索的人们非常激动。在两三个漫长的北极冬季里，他们都在进行辩论和写作文章。斯大林越来越冷淡，直到最后象一名隐士一样地离群索居起来。

斯大林虽然现在已经年届三十以上，但关于他的私生活却很少有什么可说的。他自己在后来也不愿意多谈这个问题。除这个原因以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也是很难去留意“私生活”的。他在青年时代，曾同叶卡特林娜·斯瓦尼泽结婚，她是他梯弗里斯中学的一个同学的妹妹。她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去世，遗下一个儿子，由他在高加索的外祖抚养。斯大林在1918年以前一直没有再结婚。但是，他已经是他未来的岳丈塞尔哥·阿利卢耶夫一家的密友，而且阿利卢耶夫一家经常照料他。在他流放期间，正是他们给他寄去食物、衣服和书籍的。

他在叶尼塞的孤寂生活必定是颇为艰苦的。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看起来已经遭到了挫折。当他回忆起多年的地下工作时，

也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安慰。他的私生活是缺乏温暖的和累遭挫折的。他在给他未来的岳母奥尔加·叶夫根耶夫娜·阿利卢耶娃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这种孤寂的心情。顺便说一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斯大林唯一的一封非政治性的私信。他在信中感谢他们寄去的包裹，并要求他们不要为他花更多的钱，因为他们自己的经济也很拮据。他所希望得到的只是风景明信片，因为在叶尼塞，自然界是“阴沉沉的”，除了一望无涯的冰天雪地之外，看不到什么悦目的东西。“在这个可诅咒的乡间……我渴望能够看到一些风景，即使是在纸上的。”^①

^① A·S·阿利卢耶娃前引书，第117—118页。

第五章

1917年

斯大林不适宜服兵役。——二月革命。——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于3月12日返回彼得堡并约束由莫洛托夫和施略普尼科夫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左派。——列宁4月3日的返回及其《四月提纲》。——布尔什维克党内危机。——斯大林返回来同列宁站在一起。——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立志要整顿党。——革命的升降沉浮。——斯大林在“七月事变”中的作用。——斯大林劝说列宁进行隐藏及其领导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参加布尔什维克。——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兵变。——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赢得多数。——列宁的起义计划。——中央委员会的分裂。——10月10日选举的第一个政治局。——斯大林在拥护起义和反对起义争论中的态度。——十月革命。——托洛茨基在起义中的领导。斯大林不在起义总部。——他在《真理报》的编辑工作。——他对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攻击：“革命既不能怜悯也不会安葬那些离开革命的死人。”

1916年底，沙皇制度被战争弄得精疲力尽了。俄国的成年男子在无数条战线上萎谢于沟壑之中，这时甚至在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者都应征入伍了。这一年年底，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离开库莱卡的居住地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兵体检委员会去。由于他童年时代招致的左臂残废，这位未来的大元帅被免除了兵役。^① 2月，他被允许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近郊住到流放期满。

^① A·S·阿利卢耶娃前引书，第167页。

但是这已经是沙皇制度的末日了。

一星期以后，俄国就响起了旧制度的丧钟。1905年“流血的星期日”纪念日时，首都开始了罢工和游行示威，最后成了自发性的起义，卫戍部队也倒向了人民一边。革命开始了，它是人民的革命，但也是由一场宫廷政变所刺激和助长起来的。这场政变是由宫廷枢密顾问、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和英国外交代表共同策划的，他们希望把沙皇推翻以后，会使俄国的政策摆脱宫廷中亲德集团的影响，以便俄国能够更加努力地作战。3月2日，沙皇让位给他的弟弟米哈依尔大公爵。一天以后，大公爵就退位了。沙皇的大臣们被捕。自由的保皇派李沃夫亲王组成一个临时政府，自由派的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长，左翼的前杜马代表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是可疑的，因为它是上届杜马少数成员创制的，而且这个丧失了声誉的准议会早被沙皇解散了。即使如此，临时政府开始时还是得到人民拥护的，甚至在沙皇退位前几天组成的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也自愿地支持它。

苏维埃的代表是由工厂、车间、后来也由驻守首都的部队中选出来的。俄国的所有大城市和农村也先后以同样方式选出了苏维埃。由于这种选举方式，它们当然不代表贵族和无数散漫的资产阶级。它们是最好的“人民议会”，从定义上就排除了上层阶级。由于没有任何议会的陈规陋习，它们是俄国在1917年所拥有的最广泛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苏维埃的代表没有固定的任期，选民们有权随时选举另外的人来代替他们。因此苏维埃的组织成份可以通过经常的中期选举来更新，它们也就能对人民情绪的变化有非常敏感的反映。这是它们具有

无可匹敌的道义权威的根源。它们除了赋予下层阶级以准议会的代表权以外，还是事实上的执行机构，那个不受信任的正规的行政机构是无法同它竞争的。苏维埃的命令通行于工厂、铁路仓库、邮局和军队中。临时政府从它存在的时候起就无法执行任何重大的决定，除非它得到彼得堡苏维埃领导人的批准。因此临时政府实际上是苏维埃的俘虏，虽然苏维埃和临时政府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两者的冲突时隐时现，一直贯穿于整个的革命过程中。同时，人民仍处于革命的蜜月里，因为未来所发生的那些冲突仍在潜藏着，而且兴奋的心情暂时还没有减退。自由已经获得了，即使它是在战争的恐怖中出现的。

成群的政治犯和流放者从西伯利亚返回，一路上受到了欢迎和款待。从西伯利亚一个城镇回来的三个流放者，打电报向在瑞士的列宁致以“兄弟般的问候”。他们是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的前杜马代表穆拉诺夫。对于过去意见不和的记忆已经淡薄了，三个人都急于在获得自由的当时，就向他们的导师致敬。3月12日，斯大林及其同伴们抵达彼得堡，被当地的人当作老资格的领袖加以欢迎——这时侨居国外的领袖们还没有归国。在彼得堡曾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临时局指导二月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它由三个非常年轻的人组成：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战前他是《真理报》的撰稿者；亚历山大·施略普尼科夫和彼得·扎鲁茨基，两个都是精力旺盛和自学成材的工人。这三个人都没有足够的政治知识和经验来制定明确的政策，使它们适合于革命中预料不到的情况。整个党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中——布尔什维克的右翼和左翼在不断争吵，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来统治全党。这三个人代表了

布尔什维克的左翼。他们对李沃夫亲王的政府构成不满，因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其中占了上峰；他们对苏维埃的温和政策也不满，因为苏维埃中孟什维克和农民社会主义者（或称社会革命党人）居于优势。对于临时政府公开宣布要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以及对于孟什维克的爱国态度（或者称为“护国主义”），三人都表示了敌意。^①莫洛托夫主编的《真理报》号召群众立即推翻李沃夫亲王的政府，并把一切权力转归苏维埃。以沃依庭斯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右翼则鼓吹支持李沃夫亲王，“保卫祖国”，并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重新结合在一个党内。由于加米涅夫返回，右翼集团的力量大大加强了。斯大林谨慎地摸索着，在敌对集团之间保持等距离，并企图弥合它们之间的裂缝。

由于他具有1912年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正式资历，就能够“罢免”彼得堡的三人小组，同加米涅夫一道接收了《真理报》的编辑部。^②在列宁4月3日从瑞士返回之前，大约有三星期的时间，他行使了党的实际领导权。他的中庸态度，使他或多或少地被两翼所接受。在广大工人群众中，他的名字还是不见经传的；但是地下运动的大多数领袖，由于被迫隐姓埋名，他们的名字也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甚至这种隐姓埋名也是一种个人的政治资本，因为它暗示了忠诚而无私的服务记录。当斯大林回来几天之后，他就作为彼得堡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出现在它的执委会会议上，他只受到少数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老相

① A·施略普尼科夫：《第十七年》，第2卷，第170—188页。还可参看莫洛托夫在《永垂不朽》一书中的叙述（《二月革命时期中的列宁与党》），第533—534页。

② 施略普尼科夫前引书，第175—188页。

识的欢迎，这些人（如齐赫泽）这时在首都已经非常著名。对于其他人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不知名的革命战士而已。

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种变化还是惹人注目的。不论是在苏维埃中还是在《真理报》上，布尔什维克的调子都是比较和解的。加米涅夫是这种温和政策的主要阐述者。斯大林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左翼而不是倾向于加米涅夫，但是它们也完全不象莫洛托夫那样地激进。他回来后两天，就发表了一篇论苏维埃作用的短文。^① 苏维埃体现了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联盟；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老观点，他把这个联盟看成是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但两个阶级的联盟还不是很巩固的。因此任务就是“加强这种苏维埃……使它们在中央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人民革命政权机关领导下彼此连成一气”。他在这儿清楚地预见到了列宁回国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看起来意味着猛烈地反对李沃夫亲王的政府。但是斯大林只满足于陈述自己的积极原则，而避免说出它的消极含意。他概括地说明了这次革命的纲领：“给农民土地，给工人劳动保护，给俄国全体公民民主共和国。”换句话说，这次革命仍然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它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他的下一篇文章《论战争》，同样把在一般原则上的激进主义和实际结论上的模棱两可结合了起来。^② 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甚至在推翻沙皇制度后它也仍然如此：“我们深信，俄国事变的进程将会暴露出‘自由在危急中’这种狂叫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6—10页。

全部虚伪性：‘爱国的’烟幕一消散，人们就会亲眼看到俄国帝国主义者的真正用心——想……占领海峡，侵略波斯……”这是从列宁的书中搬来的。但是——“一个光秃秃的‘打倒战争！’的口号……是完全不适当的。……它没有发生而且不能发生任何作用。”斯大林怀着某种保留，欢迎彼得堡苏维埃向全世界人民发出的半和平主义和半护国主义的宣言；但是他怀疑这个呼吁是否能够被交战各国的工人所听到。工人、农民和士兵必须迫使临时政府表示它愿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这听起来几乎象是要求同德国单独媾和。但是在下一句中，作者又敦促临时政府“当众公开表示它试图促使一切交战国……立即开始和平谈判”。为了平衡起见，文章的论点特别着重在“反帝”方面，但是它又暗示孟什维克或自由派的护国主义者是真诚的，这种暗示很快就会遭到列宁的嘲笑。

几天之后，斯大林又评论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一篇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读者从昨天的《真理报》上可以看出，这种目的是帝国主义的目的：侵占君士坦丁堡，侵占阿尔明尼亚，瓜分奥地利和土耳其，侵占波斯北部。原来俄国士兵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并不是为了‘保卫祖国’，并不是为了‘保卫自由’，象被收买的资产阶级报刊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为了侵占别国的领土。”左翼的司法部长克伦斯基宣称，米留可夫只是表示他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临时政府。斯大林评论说：“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克伦斯基的声明不真实……或者米留可夫……应当辞职。”（这位作者恐怕想不到，差不多三十年后，他自己会重新搬弄米留可夫的某些战争目的；而米留可夫在流亡巴黎的临死之前，会慷慨地为他的前批评者大鼓其掌）。

斯大林在从西伯利亚归来刚一周时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对于革命的前景感到深刻的不安。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清楚地理解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潜在的矛盾。革命的主要根据地是在首都，在彼得堡苏维埃。临时政府则从各州吸取力量。双重政权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临时政府代表了那些温和的资产阶级，他们甚至在革命开始大踏步前进以前，就因它的“过火行为”而害怕得发疯了。这样的一个政府，是可能变成封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盾牌的。革命必须争取各州。工人必须武装起来成为赤卫队。正规军现在“站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但在紧急的时候，革命是不能依靠它的，因为军队经常在各地之间调来调去，而且已经处于混乱之中。最后，革命还需要一个立宪会议的批准，这个立宪会议无疑将比临时政府要更激进一些。

3月底，布尔什维克全俄代表会议在彼得堡举行，这是沙皇退位以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地点是从沙皇情妇、宫廷女芭蕾舞演员克舍辛斯卡娅那儿征用来的一座豪华宫殿，现在它已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总部。这次代表会议的特点就是一片令人不安的混乱和麻烦。^①代表们企图根据列宁在战前所鼓吹的计划去制定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政策。但是看来历史已经破坏了这一计划。实际情况同这一计划对不了头。据认为，这次革命将是一场民主革命，而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其结果就是成立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每个人都还坚持这一想法，以致当一个代表半开玩笑地对这一原则表示怀

^①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正式叙述，见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第231—301页。

疑时，主席就剥夺了他的发言权。人们还进一步认为，自由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沙皇，工人阶级将要领导民主的大变动，而临时革命政府将是工人和农民党派的联合政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中居于首位。但是情况恰恰相反，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抛弃了沙皇，并掌握了共和国的领导。孟什维克的观点看来还是更现实一些的。那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是否在自由派的政府中仍然居于反对派的地位并维护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就象孟什维克从1905年以来就提出的那样）呢？但是历史也捉弄了孟什维克原先的计划，因为孟什维克正在主张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联合。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则要求他们的党给予李沃夫亲王政府以有限制的支持。

对于那些深受党的平民极端主义精神熏陶的更为激进的集团来说，这些话听起来是太矛盾了，以致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争辩说，反封建的革命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胜利，因为沙皇虽然被推翻了，土地贵族仍然统治着俄国的农村；李沃夫亲王是不会没收他的本阶级而有利于农民的；只有工人阶级（即苏维埃）才会倡议土地革命。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方案行事，产业工人就要承担这次革命的主要重担，而农民却成了主要的受益者。对于仅仅使工人成为农民的政治保护人的政策，工人是不会有很大兴趣的。形势的逻辑要求，工人在这次大变动中的利害关系，要同农民的利害关系一样清楚或者一样大；工业的社会主义化应该同地主农庄的解体联系起来；革命应该是既反封建又反资本主义。但这就意味着要抛弃关于俄国不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旧原则。列宁的信徒中没有谁敢于对理论问题

作这样剧烈的修正。他们继续陷在严格的反封建革命僵局中，其中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认为激进主义无用，而激进派又认为这样的革命不足以发挥他们的革命干劲。

大约有一周的时间里，斯大林小心谨慎而又无能为力地主持着这一辩论。作为残余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发言人，他并不太关心解决这一基本的两难问题，而更关心提出一个能够把问题掩盖起来的方案，即暂时不作出决议，并防止党内刚刚露头的分裂。在论及李沃夫亲王政府和苏维埃这“两个政府”时，他说道：

在它们两者之间存在而且应该存在摩擦和斗争。它们的作用已经作了区分。工兵代表苏维埃事实上是执行革命转变的带头人。苏维埃是人民起义的革命领袖，是监督临时政府的机构。另一方面，临时政府将起保护革命人民胜利果实的作用。苏维埃动员各种力量和实行监督，而临时政府虽然畏缩不前和混乱不堪，却要承担保护人民胜利果实的作用。……这种情况既有不利的一面又有有利的一面。对于目前推进事件的发展，它对我们是不利的，并因此立刻招致资产阶级的怨恨，而资产阶级在将来是不可避免地要抛弃我们的。我们必须制止资产阶级分裂出去，以便我们赢得时间，准备进行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①

随着不断变化的压力，他也不断改变论据的着重点，时而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第237—238页。

建议对临时政府作有限制的支持，时而又拒绝给它任何支持，或者含含糊糊地说，应不应该给临时政府支持，这是没有关系的事，问题在于临时政府会不会支持苏维埃的革命主动权。

在同孟什维克统一的建议上，展开了一场新的三角战斗。一派赞成无条件的统一。莫洛托夫代表激进派发言反对统一，并说只有接受鲜明的反战纲领的人才能统一。斯大林要求立即在赞成“齐美瓦尔德和昆塔尔的原则”基础上开始谈判。所谓“齐美瓦尔德和昆塔尔的原则”，就是在瑞士那两个城市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原则。列宁曾批评它们缺乏革命精神。斯大林不顾莫洛托夫的反，说：“跑得太前和事前就提出不同意的条件，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党内生活不可能没有争执。我们党内就一直存在着微小的意见分歧。”^①但是他又安抚左翼说，谈判只是暂时性的，它的结果并不会约束住党。于是谈判在事实上很快就开始了，只是列宁返回之后才被中断。

列宁一回来，斯大林就退到旁边或隐于幕后去了。他进行领导的几个星期，正好使他能够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是属于党的，生活于党内，而不是走在党的前面。他避免走极端，坚持中间道路，即使这意味着原地踏步和浪费时间也在所不惜。他的领导方法只是追随一时盛行的情绪，并用拼凑起来的灰色原理来表达它。他并不想把党铸造成为任何新的形式。在一个已经建立了秩序的党里，这种领导方法可以使任何正常的党对一切事物应付自如。但是，他却不是能够使布尔什维克成为一次新革命的创造者的那种领导。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第275页。

4月3日,列宁在他“乘坐闷罐车”^①横过德国的著名旅行之后返回彼得堡,受到了工人、水兵和士兵群众的欢迎。离开火车站后,他在一队装甲车队的簇拥下胜利地通过了首都的街道。^②对于那些唠唠叨叨而又温柔敦厚的欢迎词,他简直有点忍受不住了。他心急火燎地要去会见他的同志和追随者们。他的心一直记挂着要在自己的党内搞一次突袭,以便他的党能够在全国进行一次新的革命。当他还没有从不期而来的欢迎仪式中恢复过来时,就用电报体匆匆地写出了十点提纲。这些提纲是他的信念的表白,革命的新计划,布尔什维主义的新宪章,他在抵达的翌日就向布尔什维克的会议提出来了。

当列宁的追随者们即将出席同孟什维克讨论统一的大会时,列宁以他的提纲^③使他们明白了一切。他在提出这个提纲之前,对于他在当时发现的那种牧歌似的政治进行了愤怒的讽刺。他说,他在回国途中,预期会从车站直接走进监禁政治犯

① 列宁通过法国、瑞士、瑞典和德国的著名社会党人安排了这次旅行。作为交换条件,他唯一的义务就是答应德国政府,尽自己的力量保证使一小群德国平民离开俄国。德国政府注意到了他的反战态度,肯定是希望从他在俄国的宣传中得到好处的。列宁在决定利用这次通过德国的便利前是有些踌躇不决的,但由于一心想尽快回到革命的中心,他终于打消了这种踌躇。他本来应该通过英国返回俄国,但英国政府拒绝让他过境。在他返回后,并没有人对他的这次行程提出责难。温和党派的领袖们把他看成是一个老的和经过考验的领袖而加以欢迎。几星期以后,马尔托夫和一些孟什维克也效法他的样子,从同一路线返回,也没有受到什么责难或批评。只是到了后来,当列宁的影响日益增大时,他的某些反对者才把“乘坐闷罐车”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同德国总参谋部之间达成的阴险协议。参看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3卷,第10—13页。列宁:《我们是怎样回来的》,载《列宁全集》,第24卷,第7—9页。

② 苏汉诺夫前引书,第3卷,第26—2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6页。

的可怕监狱彼得——保罗要塞。但是相反地，他却受到敌人和社会主义叛徒们的欢迎。这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护国主义”已经在俄国各地胜利。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正在欺骗无产阶级。在俄国还有一点是特别的，这就是从野蛮的暴力极为迅速地转变成为最微妙的欺骗，使得群众相信统治者战争目的正义性。布尔什维克必须同护国派和半护国派断绝一切往来。他们的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二月革命中，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拥有一切权力，但由于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就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甚至我们布尔什维克也对临时政府表示了信任。这只能用革命时容易发生的陶醉情绪来加以解释。这是社会主义的死亡。同志们，你们曾经信任过临时政府。如果这就是你们的态度，那末我们就得分手了。我宁愿居于少数派的地位。一个象德国反军国主义者李卜克内西那样的革命者，比一大群孟什维克、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护国主义者都要好得多。如果你们同情李卜克内西而又不同‘护国派’断绝一切往来，那就是对国际社会主义的背叛。

列宁小心地不对他的信徒进行嘲笑，而是让他们自己悄悄地退回来。但是，他却无情地抨击《真理报》说，《真理报》要求临时政府放弃割地的要求。向资本家的政府去请求放弃割地的要求，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是公然的愚弄，是纯粹的欺骗。现在是承认这一错误的时候了。应该愉快而坚决地这样做！是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孟什维克的革命词藻不过是对革命人民的谄媚。他并不是在鼓吹立即夺取政权，因为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仍居于少数地位。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多数时，他们就应该耐心地向仍信赖孟什维克的群众解释，直到他们说服

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使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同时，他们还必须告诉人民，他们所努力的目标，不是一个代议制的共和国，而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废除警察、〔常备〕军队和官吏。农民们要求土地，他们将不请求你们的允许，径直占有土地，而且地主永远也不可能再把它拿走。但远还不是全部的要求。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所有的银行应该合并成为一个国家银行，由苏维埃进行监督。工业还不能够立即社会化，但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必须由工人监督。应该修改已经过时的党纲和甚至党的名称；由于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已经背叛社会主义，我们应改名为共产党。你们敢于背叛老的纪念物吗？但是为了换内衣，我们就得脱下脏衬衫，换一件干净的。他的最后一点提纲预示了新的第三国际的建立。他最后提出警告说，如果他的同志不准备跟随他，他也决不动摇。他宁愿象德国李卜克内西那样地陷于孤立，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地去反对他们。

一个刚好参加那次会议的非布尔什维克作者后来描述了列宁讲话的那种力量：“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次雷鸣电闪似的演说，它不仅使我这个偶然在场的异端分子吃惊和愕然，而且对所有那些忠实于他的人也是大出意外的。我敢断言，出席会议的人没有谁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它仿佛是宇宙破坏的精灵从它的藏身处走了出来，无所畏惧，而且肆无忌惮。它的声音响彻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宴会大厅中，回旋在象着了魔力一样的信徒的耳际。”^①

随后的几天中，列宁继续完成他的杰作。加米涅夫、加里宁

^① N·苏汉诺夫前引书，第3卷，第26—27页。

和其他一些人坚持反对他的原则和计划，说他自己曾经断然声明过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他以激烈的言辞反驳说，“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在党的历史中不只一次地扮演可悲的角色”，因为他们保守地坚持那些记熟了的老原则，而不是根据新的经验去批判地审查它们。他承认，把俄国孤立于欧洲之外来考虑，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但是如果从欧洲整体来看，这种时机已经成熟，因此要号召俄国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开一个头。那些列宁主义者抱怨说，这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托洛茨基主义，它将再次引起老的争论。经过几天的紧张辩论之后，列宁使得党内一大部分人赞同他的主张。布尔什维克的极右派一块离开了党，斥责他们的前领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阴谋家，一个新的巴枯宁。但是，以莫洛托夫和施略普尼科夫为不称职的发言人的激进派，完全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列宁的提纲完全合乎他们的心意。这种纯民主革命的格局，因为过去是党的理论所批准的，所以他们还不敢冒然地打破它，但却模糊地感觉到它过分地限制了他们的革命雄心，现在它终于被这种理论的作者本人打破了。列宁的这次突袭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因为它满足了他的党的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它给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以勇气和方向。对于他的反对者来说，这个变化似乎太荒唐和突然了，以致在他们看来，它本身就将成为一个泡影。加米涅夫、加里宁和其他一些人坚持自己的意见，暗示列宁由于长期不在俄国，已经使他丧失了同俄国现实的接触。他们希望全党迟早能从这种新列宁主义的迷恋中醒悟，转回到较为温和与较少冒险的政策上来。在革命的整个这一年，特别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新老列宁

主义者之间的这场拉锯战，一直使领袖们的团结受到严峻的考验。在列宁逝世以后的继承权斗争中，这个争论将重新爆发起来。但是从4月以后，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开足马力去爬第二次革命的那个危险的陡坡了。

列宁的论辩和谴责象冰雹一样，使得斯大林采取沉默来自保。在他的导师进行危险行动时，他小心谨慎地持异议态度，这已非第一次了。但是他并不认为列宁轻率或者在进行堂吉诃德式的行动，因为他太深知列宁了。对他来说，要跟上导师大胆的政治想象力去飞翔，这总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对列宁的现实主义却有着绝对的信赖。他忍受了列宁在《真理报》上的嘲笑，虽然在他担任党的领袖后，立即就受到这样的指责，必定感到是丢脸的。然而，列宁的批评对他还是比较客气的，所以他决定不进行反驳。他毕竟不是加米涅夫那样的公开“调和者”。他曾经十分小心地动摇于调和派和激进派之间，所以能够不太丢脸地接受了列宁的提纲。他的犹豫不决反映了他内心的困惑不解，现在终于从这种困境中解救出来了。对于那些在列宁不在时领导党的人，他们偶然犯了放弃斗争的错误，列宁也是不会深究而使他们大丢其脸的。于是斯大林继续主编《真理报》，而且列宁还帮助他来适应这种情况。在列宁回国和提出提纲后才十天，斯大林就急急忙忙地在《真理报》上表示他同列宁的团结一致。

他署名的社论《给农民土地》^①是对他刚刚鼓吹的东西的反驳。地主们由于害怕农民起义，纷纷放弃财产，逃往城市。但农业部长盛加略夫却禁止农民耕种这些被遗弃的土地，要农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3—35页。

民耐心地等到立宪会议制定一个土地改革法。斯大林对此评论说：“因为立宪会议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因为立宪会议的召开被……临时政府延期了，所以实际上土地仍然要荒废下去，地主仍然占有土地，农民仍然没有土地，而俄国，而工人、农民和士兵仍然没有足够的粮食。”他号召农民把自己的事掌握在自己手里，“组织到革命的农民委员会里……有组织地自行耕种这些土地”，不要理会“阻碍革命前进的”反动部长们。仅在几天以前，他还在争辩说，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强行推进这一事情，因为它会引起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敌对。现在他却把这同一观点称为“反动的空想”。“俄国革命的胜利进军，一定会把他们〔资产阶级进步分子〕^①当做多余的废物扫开，因为他们只是合乎革命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几天之前，他还怀疑西欧工人会不会听反战的宣传，现在他却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写的五一节宣言^②中坚定地认为，“在俄国革命的霹雳声中，西方工人也从沉眠中惊醒。……资本家强盗脚下的土地燃烧起来了，因为国际的红旗又在欧洲的上空飘扬起来了。”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统一的希望已成了泡影，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现在“已经倦于革命”。“凡是在革命时期力求停止不动的人都必然要落后，而凡是落后的人都不会得到宽恕：革命一定会把他推到反革命阵营里去。”^③

4月底，布尔什维克举行了另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了有九个成员的新中央委员会，其中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

① 据《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5页，此处作“一定会把这种政策当做多余的废物扫开，因为这种政策只是合乎……”。——译者

②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6—37页。

③ 同上书，第58页。——译者

涅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在一次直接和公开的选举中以很大数量的票获选为领导，这在斯大林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现在在党的干部中已是被人熟知的人物了，虽然外界对他还不熟悉。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他是民族问题的报告人。^①临时政府刚刚同芬兰人发生过冲突，芬兰要退出俄国。斯大林说：“承认把任何一个民族强留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我们就会变成沙皇制度的政策的继承人”。他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并不想使高加索从俄国分离出去；但是如果高加索人民希望如此，那么任何人都无权加以阻止。未来的布尔什维克政治警察创建者波兰人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对此表示反对说，各民族分离的愿望是反动的。斯大林反驳说：“难道爱尔兰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运动不是一种打击帝国主义的民主运动吗？”他说，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大的，因为它牵涉到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命运。支持那些人民的民族愿望，就是“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使广大的亚洲人民支持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位《真理报》的编辑从此巩固了作为党的民族问题专家的声誉。

这时，布尔什维主义的浪潮开始上升。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一百三十三人，代表了约七万六千名党员。^②（在二月革命时最多只有党员三万人。）在正规的议会选举中，这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力量。但是在革命的年代里，社会和政治影响是不能这样来衡量的。这“一小撮”布尔什维克却是一些组织和训练得很好的“中心人物”，他们居于工业、运输、军队和苏维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46—53页。

^② N·波波夫：《党史纲要》，第1卷，第364页。

埃的重要岗位。大多数是工长和工厂及团队的代表，对工人和士兵群众的影响日益增大。他们是“积极分子”、“革命先锋”，在他们的后面有一大批真正坚决的群众在进行战斗。在每一个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都是作为——紧密的组织在行动；而且在随后的几次选举中，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实际的力量还要比人数为大。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不得不照管大量的鼓动员、工厂代表和苏维埃委员。有的人还不得不同这些人保持日常的接触，向他们传达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示他们在苏维埃中如何投票和同其他党派如何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这项艰巨的任务是由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来执行的。由于交通运输的混乱和彼得堡是革命的焦点，所以使得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可能定期地到地方党组织去视察。现在各种代表经常到首都来出席苏维埃全国大会，军队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以及工会或农民的会议。中央委员会的这两个主要组织者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或者在党的总部克舍辛斯卡娅宫，或者在彼得堡苏维埃原来的地址塔夫利达宫，集合这些代表和给予他们指示。当列宁、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在会议上发言和进行口号及决议的斗争时，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就作为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不疲倦的和无形的指导者，使一般成员随领袖一致行动和投票。对这个顽强而熟练的组织者，列宁曾在他的革命计划中赋予重要的作用，现在他证明自己是不负所望的，他不是一个狭隘的地下工作者，而是公开和不断发展的人民运动中的一个领袖。但是，由于生性使然，他的作用仍然象从前一样，是不为人所知的和朴实无华的。对于一些重要的人民领袖和演说大师，革命是慷慨而迅速地给予声望和名誉的，但却没有给他这些东西。

在那些日子里，布尔什维主义获得了一个新的人民领袖，这就是列昂·托洛茨基。他由于自己的勇气、政治热忱和漂亮口才，很快就使那些天天在彼得堡苏维埃讲台上向全国讲话的有才能的领袖们相形见绌。在列宁返回后一个月，托洛茨基直接从加拿大的拘留营中返回俄国。他急于结束同布尔什维主义奠基者的长期争论，并同他携手合作。^①这次战争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他的观点。他放弃了长期以来想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统一起来的雄心。他曾经希望，在革命的冲击之下，孟什维克会向左倾，而布尔什维克会摆脱他认为的那种特有的宗派主义狭隘性。他现在看到了，在战争的冲击下，孟什维克是右倾了，已经变成“护国派”。另一方面，自从布尔什维克从地下走出以后，在他看来好象也比以前更虚心了。他愿意承认，关于革命政党的性质、结构和纪律的争论，事实证明是列宁而不是他对了。他自我安慰地认为，在布尔什维主义奠基者的四月提纲中，已经采取了他很早以前就阐述过的观点，即俄国革命的目标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为列宁出乎意外的“偏向托洛茨基主义”而瞠目结舌，这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在彼得堡，托洛茨基领导着一个很有才能和影响的社会主义者小团体，叫做“区联组织”，它于7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小团体的人有卢那察尔斯基，未来的教育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重要的历史学家；梁赞诺夫，马克思传记的作者；以及未来的外交家曼努伊尔斯基、越飞、加拉罕、尤里尼耶夫等。甚至在他们正式参加以前，托洛茨基和他的一些同事就同

^① N·苏汉诺夫前引书，第4卷，第185—194页；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313—314页。

列宁一致行动，并经常在苏维埃内外代表布尔什维克发言。一个伟大而热情的革命领袖的星团出现了，这是丹东、罗伯斯比尔和圣鞠斯特时代以来所未曾见过的，而斯大林则继续在暗淡的后台干他的工作。

在5月和6月中，彼得堡的革命狂热继续在上升。首都的市政选举暴露了在临时政府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米留可夫的立宪民主党有许多弱点。一半的票数投给了社会主义温和派，而使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党这两个极端派成为有影响的少数派。立宪民主党占优势的政府于是让位给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但是当这个新政府企图去驾驭这场风暴时，它却显得没有什么真实的力量。布尔什维克成为彼得堡郊区工人阶级的主宰者。军队越来越大声地要求和平，而俄国的西方盟国却压迫俄国最高司令部对德军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布尔什维克对这个新的联合政府十分敌视；但在反对它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极为策略和得体，以期收到巨大而迅速的效果。他们不是简单地叫喊打倒整个政府，因为他们知道，对于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工人阶级对此是有好印象的。但是工人阶级对于在联合政府中居首位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也抱有怀疑。于是，列宁就压迫社会主义温和派同联合政府决裂，并在苏维埃的基础上组成自己的政府。聚集在首都红色郊区的布尔什维克鼓动者提出了两个简单明了的口号：“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头一个口号引起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一般成员对立宪民主党的普遍怀疑。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等于要求社会主义温和派单独执政，因为他们在苏维埃中居于多数派地位；而且这一口号对于普通的

孟什维克工人也具有吸引力。在整个5月和6月中，大批的孟什维克工人转而赞同布尔什维主义。6月18日，五十万工人和士兵在首都街头游行示威，它名义上是由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领袖号召的。广大的示威者举着标语牌和旗帜，上面差不多全是布尔什维克提出来的口号。这时，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好举行会议，各地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只占六分之一的少数）对于这次反映布尔什维克在首都影响的示威，不能不获得深刻的印象。^①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当一个社会主义者部长辩护说，需要扩大政府的基础，没有哪个党能够单独应付因战争引起的崩溃和混乱时，列宁站起来用一个简短的声明打断了那个发言者。他说，他的党已经准备好来执掌整个政权。^②列宁的话受到大声的嘲笑，但是首都街头的群众示威却告诉他们对此不能等闲视之。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还不准备去夺取政权。他们继续把苏维埃视为革命权威的合法根据；而且只要他的党在苏维埃中还居于少数，列宁就不考虑单独夺权的任何企图。但是他不得不进行艰苦的工作，来约束工人、士兵和水兵中没有耐心的半无政府主义集团，他们对于他的谨慎策略已经不耐烦了。他看到，由于革命节奏和冲动的不平衡，已经危及他的行动计划。当外地的工人阶级把他的政策视为极端时，首都的大部分卫戍部队和无产阶级却开始怀疑布尔什维克是不是太温和了，或者是不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446—468页；N·苏汉诺夫前引书，第4卷，第282—375页。

② N·苏汉诺夫前引书，第4卷，第232页。

是缺乏革命的勇气。斯大林不得不在《真理报》上警告红色郊区，要它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的鼓动者，因为他们力促工人举行不成熟的“发动”。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布尔什维主义一直在延迟革命的危险和过早行动的危险之间不安地徘徊着。

由于反革命也在准备摊牌，所以这两种危险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保皇派的将军、爱国军官联盟、退伍军人协会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都十分注意六月示威的意义，并决心通过一次暴力的突然袭击，把布尔什维主义正在上升的势头压下去。社会主义温和派领袖们心惊胆战，并模模糊糊地在打这样的主意：这样一次摊牌会使他们摆脱掉左翼的反对者，因为光靠他们自己，是越来越没有能力反对左翼了。列宁和他的同事们决心不让自己被迫进行不成熟的起义。他们相当自信地认为，他们的党依靠首都的无产阶级群众，就能够立即夺取政权；但是他们同样深信，他们不能够保持住政权以对付国家其他地方的反对。^①他们还认识到，现在彼得堡街头的每一次重大示威都很可能变成巷战。这是因为工人都是武装的。士兵们也不愿徒手参加任何游行。由于每一次没有武装的游行只会给反革命匪帮提供射击的目标，因此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禁止一切游行。但是，它却无法贯彻执行这个禁令，因为郊区和兵营中的革命情绪已非它所能控制。这就是“七月事变”严重危机的背景。斯大林在“七月事变”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这次事变以布尔什维主义遭到严重的（虽然是暂时的）挫折而告终。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73—95页；《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15页。

“七月事变”后几个星期，党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①生动而真实地叙述了这一事件的经过。7月3日下午，某团的一个代表团闯入党的市代表会议，宣称该团和其他团已经决定当晚举行“发动”，并说他们已经派代表分赴别的团队和工厂，号召所有的人参加发动。彼得堡委员会领导人沃洛达爾斯基严厉地提醒士兵们，他们作为党员，党期望他们遵守禁止游行的命令。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局随后举行会议，重申了这一禁令，并派出鼓动员到工厂和兵营去贯彻执行。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作为代表，把最近事态的发展通知由孟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执委会。这些事件发生后才两小时，斯大林就去执行他的使命。但是雪崩已经开始了。当晚，大队工人和一些团队，全副武装，举着旗帜，聚集在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办公处前。布尔什维克讲话者敦促群众和平地解散，但遭到嘲笑和奚落。愤怒的革命人民不理解这是为了什么。于是他们提议向苏维埃的所在地塔夫利达宫进军，对苏维埃执委会提出他们的要求。队伍高唱着《马赛曲》前进。群众实际上终夜围住了塔夫利达宫，毫无结果地等待着对他们的主要要求进行答复，这个要求就是苏维埃的领袖们同临时政府脱离关系，自己执掌政权。

这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拖延时间，期望“忠于”政府的军队迅速前来援救。在此以前，集会和游行都还是和平的，但是群众情绪激昂，越来越临近爆炸的程度。农业部长切尔诺夫被群众认了出来，并被一群暴民“加以拘留”。幸好托洛茨基很镇定，并勇敢地进行了干涉，这位老革命的部长才被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47—174页。

暴民释放。^①午夜以后很久，季诺维也夫站在塔夫利达宫的阳台上，尖着嗓子毫不疲倦地同群众辩论，企图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的：既说服群众回家，又不对群众的热情浇冷水，相反地还要使这种热情保持下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彻夜开会，努力要解决这个难题。最后它决定，党应该参加游行，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游行的轨道上去。这样做的风险是，他们不会得到成功，一场战斗不可避免，而且最后可能招致重大失败而使反革命的力量大增。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总是动摇犹豫，不肯全力出击，那就更可能在这次摊牌中招致失败。在他们面前还有另一个行动方针，那就是割断同示威者的关系，让事态自然发展下去。但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是不能这样泰然自若的。群众脱离了领导，光凭自己的热情和渴望行事，肯定会要陷入内战的圈套中。到了那时，群众对于布尔什维克就永远不会原谅，因为这就等于在危机的时期背叛了他们。布尔什维克的最后胜利正是依靠这些人的信任和支持的，因此他们不能在这些人的眼睛中丧失自己的信誉。

在随后的几天里，示威者的规模和激情与日俱增，因而不时地发生一些冲突和流血事件。但是布尔什维克最担心的事情却没有发生——这些小的冲突并没有引起一场正规的内战。整个运动的冲劲已经耗尽，并逐渐平息下来。差不多与此同时，反革命的势力却在增加。当右派的武装集团采取行动时，中上层的资产阶级都大大舒了一口气。布尔什维克总部和《真理报》编

^① N·苏汉诺夫前引书，第4卷，第422—427页；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51—52页。

辑部被捣毁了。在这一片骚乱声中，传来了俄国前线攻势崩溃的消息。布尔什维克受到了谴责，复仇的呼声日高。右派的鼓动者把列宁及其追随者说成是德国的间谍。一些有声望的报纸发表了伪造的文件，企图证明这种指控。政府的军队对红色郊区进行了讨伐性的远征。

在整个“七月事变”的日子里，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同苏维埃执委会进行谈判，并尽力使桀傲不驯的分子受到控制。开头他把布尔什维克反对游行示威的决定通知执委会，后来才获知这个决定已经被推翻了。于是他又不得不把变动的情况向苏维埃领导人报告，并解释其理由。斯大林在苏维埃统治集团中的信誉显然是不错的，因此后来当政府对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发出逮捕令时，斯大林虽然是一个中央委员，却没有受到骚扰。采取最后措施来结束这场部分的起义，这就是说使彼得-保罗要塞的起义者放下武器，这项任务也落在斯大林肩上。他由苏维埃执委会的一个孟什维克成员陪同到了这个要塞。它座落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对面的一个岛上，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的总部已经被政府的军队占领了。要塞的驻军包括暴躁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发动这次起义的机枪手和一些赤卫队，他们全都拒绝放下武器，并准备进行长期而血腥的围攻。人们能够容易地想象到，斯大林的任务是多么困难而微妙。他说，官方保证起义者不会受到惩罚，但起义者仍然拒绝放下武器。最后斯大林精明地说服了他们，使他们向苏维埃执委会投降，这听起来比向政府投降要体面一些。于是一场血战就这样避免了。^①

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布尔什维克的挫折只是表面上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05页。

的。但是，在“七月事变”后不久，所有的党派对这次挫折都夸大其词了。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其中也包括列宁，都认为他们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①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与日俱增。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被指控为德国收买的间谍。社会主义者温和派知道这种指控是虚假的，但由于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十分怨恨，所以就不愿意出来捍卫列宁及其同事。他们中的许多人怀疑列宁在“七月事变”中曾经认真地企图夺取政权。

中央委员会这时讨论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否应该自动向当局投案，或者是否应该躲藏起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有些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如果逃避审讯，会使那些不明真象的人相信对他们的指控。卢那察尔斯基和加米涅夫最初也有这种考虑。相反地，斯大林却建议他们隐藏起来。他说，如果信赖临时政府的司法，这是愚蠢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歇斯底里正在肆无忌惮地盛行着，以致任何一个年轻的军官或军士，当他押解“德国间谍”进监狱去，或者从监狱押解到法庭去，他会认为在路上就把他们干掉是一桩爱国的英雄行为。列宁对斯大林的建议仍是犹豫不决。于是斯大林就到苏维埃执委会去告诉执委会们，如果执委会能够保证列宁的生命安全，使他不遭非法暴力的危害，他就准备出庭受审。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承担这样的责任，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最后就下决心隐藏起来。

7月8日，列宁隐藏了起来。这无疑是记起了罗伯斯比尔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166—168页；《季诺维也夫全集》，第15卷，第41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第113—115页。

的例子，他在掌权前不久，也同样受到追捕，并在一个雅各宾木匠家中隐藏起来。列宁的“木匠”就是工人阿利卢耶夫，斯大林的老朋友。列宁在他的房子里呆了几天。^① 7月11日，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夫护送列宁穿过黑暗的街道到达海洋车站，从那里离开以后，最初隐藏于首都附近的农村里，后来到了芬兰。从那时到十月革命，他一直在地下，通过给中央委员会的大量小册子、文章和信件，向他的党传授党的战略问题（如果不是策略问题的话）。季诺维也夫同列宁一起离开。几天之后，加米涅夫被监禁起来。托洛茨基（他已经公开宣布同列宁团结一致）、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亦被捕。一些重要的领袖和中坚人物都星散了。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斯大林再次进入党的领导前列。他相对来说是不太知名的，这给他带来很大好处；他的名字也还没有引起别人的愤怒和憎恨。

在列宁离开后不久，斯大林以他的全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科·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名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的文章，向已经遭到失败但还没有溃散的党进行呼吁。^② 他一再地说，在“七月事变”中，布尔什维克是被形势所迫的，反革命已经开始了进攻，那些“妥协者”应承担重大的责任。反革命的进攻还没有过去——“他们已经从进攻布尔什维克转到进攻所有参加苏维埃的政党和苏维埃本身”。他预见到要发生新的政治危机：“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第一个训条就是不接受反革命分子的挑衅，要具有坚韧沉

^①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72页；S·A·阿利卢耶娃：《回忆录》，第183—184页。阿利卢耶娃描述斯大林给列宁理发。他把列宁的胡髭剃掉，使人认不出他来。

^②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99—101页。

着的精神，养精蓄锐。……第二个训条就是要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鼓励不坚强的人，带动落后的人。”他一再向布尔什维克城市代表会议发出同样指示，这个代表会议在“七月事变”以前就开始存在，现在则半秘密地继续工作着。这个代表会议通过了斯大林写的宣言，它的风格是一种革命的和东方僧侣术语的奇异混合：

这些先生们显然打算瓦解我们的队伍，在我们中间散布怀疑和惶惑的种子，培养对我们领袖不信任的情绪。可恶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我们领袖们〔即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名字从来还没有象现在，当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流氓们辱骂他们的时候，这样为工人阶级所珍贵和亲近！下贱的东西！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资产阶级庸仆们诽谤得愈粗野，工人对领袖的热爱就愈强烈。……无耻的诬蔑者这一耻辱烙印——这就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请接受选举我们的那三万二千名有组织的彼得格勒工人送给你们的这个烙印并把它带进棺材去吧。……至于你们这些资本家和地主、银行家和投机分子、神甫和特务先生们……你们庆祝胜利未免太早了，你们开始埋葬伟大的俄国革命未免太早了。掘墓的先生们，革命活着，它还将显出自己的威力。①

布尔什维克的确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到了7月底，他们就能半公开地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代表了二十四万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32—133页。

党员，三倍于4月间的数字。斯大林和布哈林是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发言人。这次代表大会的高潮是斯大林、布哈林和普利奥布拉任斯基之间关于即将来临的革命性质的辩论。这场辩论一部分是列宁四月提纲争论的回声，一部分是未来岁月中更为激烈争论的先声。斯大林提出一项决议说，胜利的俄国革命将“联合各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引导政权走向和平，走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一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普利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一项修正说，革命政府应该“引导政权走向和平，并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走向社会主义”。在两人的说法中，俄国革命同西欧无产阶级的“联合”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普利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是，除非西欧也革命化，俄国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那个前提，革命只能获致和平（也许还有民主制度的巩固）。布哈林也以非常相同的方式规定了革命的目标。斯大林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俄国不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不管西方发不发生革命。

他反驳普利奥布拉任斯基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我国革命的基础比西欧广阔，在西欧，无产阶级是同资产阶级面对面孤军作战的，我国却有贫苦农民阶层的支持。……德国的国家权利机关要……优越得多。……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②

十分奇怪的是，在那一阶段中，斯大林的观点看起来是同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4页。

托洛茨基的观点一致的，因为托洛茨基也说过，俄国将在欧洲之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这时还没有阐述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俄国在孤立于世界其余地区之外时，光凭自己的力量就能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厦。只是到了七八年后，他才同布哈林一道形成了这一观点，用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主张。但是现在他的话语中已经比托洛茨基或列宁都更强调俄国特殊的社会主义使命了。在托洛茨基和列宁那时的著作中也能找到这种强调的地方，但这只是作为一种陪衬的说法，他们断然地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最终**还是要依靠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说，俄国能够而且也会在其他更先进的国家之前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是走不远的。斯大林一心要重复说明的是这一论点的前半部分而非后半部分。他的话事实上就是俄国革命自力更生的一种含蓄的、半自觉的信仰。在1917年7月和8月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些争论意味深长地暗示着未来的分裂。

这是一种命运的嘲弄：正是在斯大林主持的这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集团正式并入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尚在监禁中的托洛茨基还被选为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其他的委员是：列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李可夫、布哈林、诺根、乌里茨基、米留亭、柯仑泰、阿尔特姆、克里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越飞、索柯里尼科夫、斯密尔加、勃布诺夫、穆拉洛夫、邵武勉、伯尔辛。代表大会向遭受政治迫害的领袖们致敬，把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加米涅夫和柯仑泰选入“名誉主席团”。

当时，这位当一些重要人物不在时领导党的人，却没有产生

什么重要的观点。他的演说中没有独创的思想。他的话枯燥无味，缺乏激情。但他却有一种自信，要在战斗中独挽狂澜。他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可靠，就足以平息队伍中早期的惊惶失措。当他正向代表大会作报告时，消息传来，各城市（包括察里津，即未来的斯大林格勒）已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讨伐，全国各地实际上已经实行戒严令。代表大会镇定自若，不为所动。就象在第一次革命低潮中巴库的柯巴那样，现在的斯大林也还能够镇定地去应付这场暴风雨。

代表大会以后，被监禁的领袖们，首先是加米涅夫，然后是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人都陆续被释放，于是斯大林又有些黯然失色了。

8月底，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举行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使首都陷入一片惊惶。这次叛乱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反革命即将来临的不断警告。这次政变的起因是暧昧不明的。克伦斯基曾经打算同布尔什维克最后摊牌，要求科尔尼洛夫将军向首都派来可靠的部队。但是这位将军并不满足于镇压布尔什维主义的计划——他想一举而使国家摆脱苏维埃、社会主义者温和派和克伦斯基本人。他充满了自信和“社会救星”的使命感，对自己的打算毫无顾忌，取消了对临时政府的忠诚，在里加投降了德军，然后命令他的部队向彼得堡进发。

临时政府、苏维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各委员会及执委会都惊恐万状。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不把追随列宁的工人武装起来，不恢复苏维埃和在“七月事变”中被镇压下去的赤卫队，他们就不可能击败科尔尼洛夫的这次政变。克伦斯基亲自请求布尔什维克劝说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他们在七

月的兵变中非常积极)来“保卫革命”。布尔什维克隐忍不满和怨恨,响应了这一呼吁,“在第一线上”同科尔尼洛夫作战。反革命弄巧成拙,驱使所有社会主义派别组成了一个“统一战线”,这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也小心谨慎,不再犯相似的错误。当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到监狱去拜访托洛茨基,并问他应不应该一举而“解决”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时,托洛茨基建议他们一个一个地解决他们的敌手。几天之后,科尔尼洛夫的政变就全部失败了。

这次反革命事变的流产推动了布尔什维主义,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作最后的一跃。布尔什维克党从危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最坚决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革命捍卫者的光荣。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镇压之后,列宁公开号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同科尔尼洛夫的同谋者立宪民主党断绝关系,把政府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把它绝对地建立在苏维埃的基础之上。他答应,如果他的建议得到接受,布尔什维克将在苏维埃的体制内起一个合法的反对派作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就使他们在工人阶级的眼里无可挽回地丧失了信义。^①布尔什维克由于越来越大声地主张和平和给农民以土地,它在军队中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在这些日子里,布尔什维克进行鼓动的风格是简明而透彻的,这可以举斯大林在《工人日报》(8月31日)上的一篇不署名社论为例,因为斯大林的作品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是很少有区别的:

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已被打垮,但是还没有被彻底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322—323页。

消灭。

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已被击溃，但是革命的胜利还没有得到保证。

为什么呢？

因为妥协派不但不同敌人作无情的斗争，反而同他们进行谈判。

因为护国派不但不同地主资本家决裂，反而同他们成立协议。

因为政府不但不宣布他们为非法，反而邀请他们参加内阁。

卡列金将军在俄国南部掀起暴动来反对革命，而他的朋友阿列克谢也夫将军却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米留可夫党在俄国首都公开支持反革命，而该党的代表人物马克拉柯夫之流和基什金之流却被邀请参加内阁。

是结束这种反革命罪行的时候了！

是坚决不移地宣布**对敌人要搏斗而不是妥协**的时候了！

反对地主和资本家，反对将军和银行家，保卫俄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争取和平，争取自由，争取土地，——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同地主资产阶级决裂，——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成立工农政府，——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任务。①

在科尔尼洛夫将军被逮捕后几天，彼得堡苏维埃发生了一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55—256页。

个重要的事件。由于最近几次的补缺选举，布尔什维克已经变成了多数派的党。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苏维埃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托洛茨基被保释后不久就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这是他1905年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在他的领导下，苏维埃要求尚被社会主义温和派统治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把一切权力转归于它。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决议就是起义的前奏。只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居于多数时，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实际结果。因为这个口号意味着，在苏维埃中居于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将掌握全部权力。而且遵不遵循这一行动方针，完全由这个多数派决定。但是现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意味着政权归布尔什维克这个新的多数党。这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个问题：如果临时政府拒绝这个要求并根本不赞成苏维埃，那又会怎么样呢？那末苏维埃就在政治上有义务坚持自己的主张，反对临时政府，并推翻它，以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但是只有通过起义，才能做到这一点。

到了9月中，列宁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并决定敦促中央委员会准备一次起义。^①由于不能亲自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他就通过一系列的信件同他的同事们进行联系。这些信件（连同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零星记录）对于起义的预备工作，特别是对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之间事前的剧烈争论，表现了无与伦比的洞察力。这些信件由信使送到塞尔哥·阿利卢耶夫家里，在“七月事变”后列宁曾在这儿隐藏过，在他离去以后不久，就由斯大林迁入。斯大林在列宁和中央委员会中间起到了联络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10页。

的作用。9月15日，他带着列宁的两件备忘录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两件备忘录就是：《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① 列宁写道：“既然要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末同时我们就应当不放过一分钟，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所谓的民主会议刚在那儿举行会议〕，占领彼得-保罗要塞，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的官员……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旁边，用电话把它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等等联系起来。”^②

起义的最初计划和它的实际过程是很不相同的。列宁并不考虑起义的政治基础，或者说由谁来宣布这次起义。他离行动的舞台太远了，不可能制定出任何行动计划。根据实际起义的情况来看，他最初的计划看起来就象一个颇为天真的冒险试验。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看到它时都耸耸肩头。列宁自己也只把它看成是一次试验性的建议。他的意图是使他的同事们认识到事情的迫切性，警告他们要反对关于自发的“人民起义”的外行打算，提醒他们必须象对待艺术一样地对待起义，以及鼓动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中央委员会为此而分裂了。托洛茨基同意列宁强调事物的迫切性，但提出他自己的另一计划供讨论，这个计划更为艺术地考虑了问题的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他反对由党单独负起起义的责任，要求同苏维埃联合起来，因为这个“工人议会”的道义权威，在工人眼中比党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125—166页；《列宁全集》，第26卷，第1—1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0页。

无疑地要高一些。这种政治和心理上的考虑，决定了起义的时间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将于10月下半月在首都举行，因此起义要同这次代表大会一致起来。

从战略上讲，托洛茨基是与列宁一致的；从战术上讲，他是反对列宁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从战略原则上就反对列宁。当列宁头几封关于起义的信件在9月15日的会上宣读时，加米涅夫十分害怕党由于列宁提出的行动方针而遭到损害，以致提议把这些信件烧掉。有六个中央委员赞成加米涅夫的提议。斯大林建议把这些信件交给一些主要的组织讨论，这好象暗示他是支持列宁的，因为对这件事的更广泛的讨论，会使党有义务把争论变成行动。但照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是希望把这件事交给地方组织讨论，从而把它搁置起来，因为各地方组织甚至比中央委员会还更胆怯。^①不管情况是不是这样，反正斯大林的建议没有得到通过。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核心组织的较低层圈子里，赞成起义和反对起义的人一直在进行争论。很快他们就有了机会来试验一下自己的力量，因为临时政府决定召开所谓的临时会议。这是克伦斯基来得太迟和太无力的一种企图，他想的是利用某种反苏维埃的代议机构来支持自己的政权。临时议会仅仅是一种咨询机构，而且它的成员由政府指定。布尔什维克应该接受任命并参加临时议会呢，还是应该抵制它？这个问题虽然不能和另一个关于起义的问题完全等同起来，但它们彼此却是有联系的。一些坚决赞成起义的人认为，他们对这个假议会丝毫不抱什么期望，它的日子无论如何是屈指可数的了。那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222页。

些害怕列宁计划的人则主张参加临时议会。这个问题提交党的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表决，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会上主张予以抵制。这两个未来的对手持同一观点，这种例子还是很少见的。但是，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却主张参加，并使代表会议的多数人赞同了他们的意见。因此，在起义前仅仅一个月的时候，这个领导起义的党却表现出一种情绪，列宁愤怒地斥责它是“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表现”。^①

这时全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失败和混乱的情况中。临时政府和总参谋部曾经一度打算从彼得堡撤退，并把政府各部迁移到莫斯科。这个谣传对布尔什维克无异是火上添油，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是一种反革命的阴谋。据说，临时政府所以要放弃红色首都，是希望把革命的头脑砍掉。这种威胁使得市苏维埃立定了脚跟，并迫使它承担起保卫彼得堡的责任。由于政权已经开始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就逐渐从无条件地反对战争转变为一种准护国主义的态度。他们现在号召保卫彼得堡，这是把它看成革命的首都，而不是帝国的首都。社会主义温和派一般传统的护国主义，暂时同布尔什维克新的护国主义吻合起来了。因此，苏维埃承担保卫首都责任的决定，得到了参加苏维埃的各党派的支持。

苏维埃由于采取了这种主动行为，就使自己获得了新的声望和权威，最后就能够摆脱临时政府。托洛茨基作为苏维埃的主席，控制了它的一切活动，成功地把革命的重大准备工作作为共和国全国需要的措施而提出来。于是苏维埃坚决主张，首先在原则上，其次在事实上，它有权监督首都及其附近各州的部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24页。

队运动；也就是说，它有权监督各军事司令部和参谋部。自从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人民对军官团极不信任，因而增强了苏维埃的力量，使它能够对付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代表苏维埃来负责这些事的是10月13日由执委会任命的军事革命委员会。^①苏维埃的主席同时就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按其性质来说，就是起义的总参谋部。

这一发展的特别之处在于，起义的这个机构不是秘密的、自我任命的集团或密谋者的派别，而是由象苏维埃这样有广泛代表性的机构所公开选出来的。可以说，这个密谋是裹在苏维埃的合法外衣下的，这种情况使得社会主义温和派的反对几乎不起作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呆在苏维埃里，无可奈何而又十分尴尬地看着自己的败落，甚至还要参与共谋。托洛茨基——现在一切起义的线都操纵在他手里——成功地使起义蒙上了一层防御行动的外衣，以便防止或者勿宁说为了阻挡住反革命的行动。这是一个很有策略的计谋，它争取了工人阶级和卫戍部队中那一部分犹豫不决的人，使他们站到起义者一边来。但这并不是说起义的防御性质完全是虚构的。临时政府以及在它后面的保皇党将军和右翼政客的确在准备卷土重来：在起义的前夕，克伦斯基就取缔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逮捕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新命令，企图动员效忠于他们的军队和封闭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但是，在这场革命和反革命的竞赛中，革命方面的确有很多有利条件；而且由于起义的领导者一直精明地保持了防御的外貌，甚至使这种有利的条件更加扩大了。

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获得一个接一个的优势时，列宁从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92—95页。

他的隐藏处努力去克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反对。他设法说服他的追随者，就象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所建议的那样，退出克伦斯基的临时议会。10月7日，临时议会听到了革命即将来临的隆隆声。托洛茨基在议会上发表了热烈而响亮的声明，宣布布尔什维克脱离“这一为反革命所默许的议会”，而且他还高呼：“彼得堡在危险中！革命在危险中！人民在危险中！”伴随着这些口号，布尔什维克离开了会议厅。^①10月8日，列宁秘密地从芬兰转回彼得堡。两天以后，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了他们最动人的抗辩：“在历史面前，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在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面前，我们无权把整个的未来押在武装起义这一张牌上。”他们坚决要求中央委员会等待临时政府现在已经答应召集的立宪会议，而且他们希望它由一个激进的多数派来统治。他们想象中的这个新国家，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和议会民主制的结合。他们警告列宁的政策将导致革命的最后崩溃：“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况，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与其不战而降，勿宁战至失败。俄国工人阶级现在是不是处于这种情况中呢？不，一千个不!!!”^②他们反对起义有两个理由，其中的一个很快就被事实所驳倒，而另一个却为未来的事变所肯定。他们说，起义的鼓吹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临时政府的力量。对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也抱过分乐观的看法。

列宁不耐烦地把这一切关于立宪会议的考虑都撇到一旁。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68—70页。

^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英文版），第21卷，第2册，第328—332页。

临时政府已经把它束之高阁很久了，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它不再一次这样做呢？延迟起义，就意味着给科尔尼洛夫将军们以时间，使他们能够发动政变，并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列宁把他的对手关于力量对比的悲观看法视为懦夫的忠告。在布尔什维克的后面有俄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全体“欧洲无产阶级”也肯定是支持他们的。^①在出席这次会议的十二个委员中，十人（其中包括斯大林）赞成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了反对票。在捷尔任斯基的建议下，选举了一个政治局，“以便在最近的将来进行政治指导”。它的成员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科里尼科夫和布勃诺夫。^②于是这个后来成为高踞国家、党和革命之上的机构就成立起来了。在同一次会议上，还把起义的日子定在10月20日。

政治局没有能够完成分配给它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拒绝服从起义的决定，并尽一切努力来取消它。列宁化了装，头戴假发，出现在10月10日的会上，随后又返回隐藏地，不能参加日常的准备工作。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持久而几乎是绝望的努力中，希望能够克服他那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和信徒的“可耻的动摇”，“令人吃惊的混乱和胆怯”。^③托洛茨基忙于苏维埃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以致不能更多地管中央委员会的事务。除了这一原因外，列宁的起义计划也不怎么吸引他。列宁抛弃了他最初在彼得堡发动突袭的计划，提出首先在莫斯科进行打击。后来他又建议，起义应该从赫尔辛基开始，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73页。

② 《内战史》，第2卷，第19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69页。

然后发展成为对彼得堡的攻势。^①托洛茨基继续对这些“局外人的意见”(这是列宁自己说的)淡然一笑,不置可否。斯大林也执同样态度,他后来不无讽刺地谈到列宁变易不定的起义时说:“我们觉得我们实际工作者对于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小沟、泥坑和坎坷要看得清楚些。但是伊里奇是伟大的,他不怕自己道路上的泥坑、坎坷或深沟,他不怕危险,他说:‘站起来,一直走向目标。’而我们实际工作者认为,当时这样做对我们是不利的,应当绕过这些障碍,然后对准要害,果敢地行动。于是,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②除了从军事上说是不合适的以外,列宁的各项计划还有一个共同的主要缺点:它们使得起义的政治基础变得狭小,剥夺了苏维埃对起义的批准权,并使托洛茨基筹划的人民行动削减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更为狭隘的事务。它们还使起义脱掉了防御的外衣,暴露出它的进攻性质,甚至使那些对革命怀有好感的人也认为它是煽动性的。

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于10月16日举行,出席的有一些不是中央委员的著名党员,它批准了上次作出的赞成起义的决定。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反对列宁的斗争公开化,在高尔基主办的报纸《新生活报》(它的立场介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上警告公众要反对起义。列宁对于这种轻率的行动十分愤怒,把它称为“工贼行为”、“叛变活动”,要求立即把他们开除出党。^③在其他中央委员看来,这个惩罚似乎太严厉了。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了列宁的谴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6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8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96—199页。

责，但在一篇和解的社论中缓和了一下它的效果，意思是想填平对立观点之间的鸿沟。^①在中央委员会10月16日的会议上，他发言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客观上是让反革命有可能准备和组织起来。我们将无止境地退却，使革命遭到失败。……现在应该有更大的信心。这里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坚持争取革命胜利的方针和回头看看欧洲，第二条路线是不相信革命，只打算做一个在野党。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走上了起义的道路。……”^②

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当中央委员会正在浪费时间的时候，在托洛茨基领导下的苏维埃已经开始行动了。那末斯大林为什么现在要保护那两个一心想阻止起义的轻率的同事呢？他是不是急于要防止党内的分裂？或者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惊惶失措的警告和喊叫也使他有点犹豫不决？或者也许如托洛茨基所断言的，他采取了玩世不恭的态度，想既不公开背弃起义者的队伍，而又不使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呢？在中央委员会下一次的会议上，当加米涅夫宣称要辞去领导职务时，斯大林再次维护了他。但加米涅夫的辞职被接受了，于是斯大林由于他在社论中所表现的态度遭到了列宁的批评，也提出了辞职的要求。但是，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要求，它唯恐把这个党报的编辑推到起义反对者的怀抱里去。斯大林为了补救他在社论中的失误，现在急于表示他真地同鼓吹起义的人是一条心的。他建议，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起义派中最坚定的领袖，应该成为党在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革命派的代表大会）

^① 1917年10月20日《工人之路报》（《真理报》）。

^②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66页。

中的主要发言人。^①

这时，孟什维克占优势的执委会决定使这次代表大会延期五天到10月25日开幕。就是在这几天中，起义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完成了。10月21日，彼得堡军队委员会的一次代表会议正式承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卫戍部队的真正首脑——除非有该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连署，任何人的命令都不服从，也就是说要有托洛茨基或他的助手安东诺夫—奥伏申科、彼德沃依斯基，或适当受权的委员连署才行。10月23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驻扎首都及其周围的几乎所有团队的军事委员，因而保证了同实际在它指挥下的所有部队的联系。官方司令部改编卫戍部队的命令没有得到遵从，预定调离首都的部队拒绝移动。凡是服从苏维埃权威的军官都被撤职，其中有些人还被逮捕。

最后，在10月24日，临时政府决定反击，从而为起义提供了借口。政府的部队占领了斯大林所主编的报纸编辑部，封闭了它的印刷厂。报纸工人的一个代表团要求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部队到编辑部来保证报纸的出版。这个要求实现了。起义的领袖后来写道：“官方的一块火漆封在布尔什维克报纸编辑部的门上，作为一种军事措施，它是很不够的，但它却是一个极好的战斗信号。”^② 战斗迅速扩大到桥梁、火车站、邮局和其他战略要点；在托洛茨基指挥下的部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这些地方。唯一发生真正战斗的，是起义者对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进攻。这次行动由安东诺夫—奥伏申科领导，他是后来驻波兰和内战时期驻西班牙的大使。但是即使是这次行动，也不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163—164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205页。

具有“阿芙乐尔”巡洋舰用哑弹轰击冬宫那样的喜剧风格。临时政府在政治上很孤立，起义者却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以致他们能够轻轻一推就打倒了临时政府。当10月25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起义已接近胜利；这次代表大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立即批准了这一大变动。^①

在这次大变动的日子里，斯大林并不是主要角色。他甚至比往常更加默默无闻。这一事实使他的官方传记作者也有些尴尬，而这也许正好证明托洛茨基说的，“事件越是猛烈发展，斯大林在其中的地位就越微不足道。”这一部分是因为中央委员会没有起什么作用，而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影响要比在它的外面的影响大得多。在中央委员会10月16日的重要会议上，斯大林和其他四个成员（斯维尔德洛夫、勃布诺夫、捷尔任斯基和乌里茨基）被派往苏维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代表党。但是，如果可以相信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托洛茨基的话，斯大林在这个起义机构中的贡献是等于零的。^②如果在杂乱无章的起义文件中至少能找到几个同斯大林直接有关的记录，那么托洛茨基的上述证词就可以因为它的派性而加以驳倒。但是这样的记录却一个也找不到。

自从斯大林升到绝对权力的高位以后，托洛茨基的名字就被坚持不懈地和系统地从一切官方的革命史中涂掉了。凡是提到这个名字，只是把他说成是实际起义的“叛徒”和“破坏者”。所有的官方历史和教科书都谈到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或是把

① 在此以前的日期，按照革命以前的俄国旧历计算。从现在起的日期，按照新历计算。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234页。

无法略去的托洛茨基的事绩和讲话都归给无名无姓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但是，尽管苏联官方历史学家有着一片好心和热忱，他们却无法把斯大林的名字去填补因托洛茨基受到控告后而留下来的空白。即使由斯大林本人，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高尔基和基洛夫最无耻地编纂的《苏联内战史》中，也没有包含一个文件或具体事实，以支持斯大林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的说法，除非人们把某个斯瓦洛加或符拉季米尔斯基在事件多年以后所画的低级而极端虚伪的画也算做历史文件。在这些画里，斯大林被描绘为一个极为漂亮的胆大妄为的人，他正在给起义者发布指示。斯大林自己的详尽年表对这一点同样是没有片言只字的。^①十分令人奇怪的是，他甚至没有出席中央委员会在起义那天早上所举行的会议。托洛茨基评论说：“这不是说他是一个胆小鬼。没有根据谴责斯大林胆怯。他只不过是在政治上态度不明朗。这个谨慎的阴谋家在关键时刻宁愿置身事外。他在等着看看起义结果如何，再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万一起义失败了，他就向列宁和我以及我们的追随者说：‘这是你们的过错！’人们必须清楚地重新回忆一下那些日子里的火热情绪，才能按照它的功过来评价这个人的冷静刚毅，或者你如果愿意说的话，评价他的阴险狡诈。”^②

托洛茨基的这种说法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他把他的敌手说成阴险狡诈，这看起来好象还是说他有一点胆怯。人们之所以不能同意托洛茨基的说法，还有另外的原因：事实上，斯大林的确早在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表决起义时就表明了自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400页。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234页。

己的态度了。后来他又同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在表决时赞成起义。10月16日，他再次在表决时赞成起义，还为起义进行辩护。而且这次并不是在中央委员会这一范围狭窄的秘密会议上，而是在一次范围大得多的代表会议上，参加的有彼得堡的组织、党的军事部门、工会、彼得堡苏维埃以及来自工厂委员会和铁路工人的代表。如果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宁愿置身事外的谨慎的阴谋家”，他是不会在那种会议上于众目睽睽之下完全站在列宁一边的。对于斯大林在起义中没有在总部出现或活动，没有找到其他的解释。但是它始终是一个奇怪而不容否认的事实。

在那段重要的时期中，他不可否认地在一个岗位上尽到了自己的职责，那个岗位就是《真理报》改名的《工人之路报》的编辑部。他在这家报纸上传播党的声音，主要是撰写一些不署名的社论。当然，他并没有公开号召起义。就象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一样，斯大林在他的报纸上用防御的姿态来掩盖一种在本质上是进攻的政策——这是对起义的小心掩护。10月10日，甚至还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通过起义决定前，他就写道：“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第一次阴谋已经被击破。但是反革命并没有被摧毁。……为了长久地保障革命免遭危险，应该彻底扑灭现在正在酝酿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第二次阴谋。……苏维埃和委员会应该采取一切办法用伟大革命的全部威力来消灭反革命的第二次发动。”^①三天以后，他的态度更鲜明了：“最终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在起义的那天早上，他总结了革命的过程后说：“二月革命胜利之后，政权落在地主和资本家、银行家和投机分子、包买主和奸商的手里，——这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48页。

就是工人和士兵的严重错误。……必须立即纠正这个错误。”^①仿佛是重复列宁的话并暗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他继续说：“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再拖延下去就会使整个革命事业遭到毁灭。……必须以人民承认的、由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选出并对这些代表负责的政府来代替目前这个不是由人民选出和不对人民负责的冒牌政府。”十四年以后，托洛茨基因此描写起义者的情绪说：“所有那些参加起义的人，从上到下，都绝对地相信，将要毫无伤亡地获得胜利。这是这次起义的力量所在，有时也是它的弱点所在。”^②斯大林在起义前几小时写的文章正好表达了这种自信：“如果你们大家都同心协力、坚定不移地行动起来，那末谁也不敢抗拒人民的意志。你们的发动愈有力、愈有组织、愈强大，旧政府就会愈和平地让位于新政府。”^③

在这一伟大事件的前夕，这个人的情绪和心境最可靠的反映，也许可以从一篇文章中看出。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于布尔什维克计划和意图的许多似是而非的或仅仅是使人担忧的问题。斯大林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是一篇含糊其词的谩骂杰作：

下面是我们的回答：关于资产阶级及其“机关”：对他们我们另外再谈。关于资产阶级的走狗和佣仆：我们将打发他们到特务机关去，他们可以在那里“打听到”“发动”的“日期”和“时刻”，同时向有关的人“报告”，而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72页。

②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221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73页。

发动的行进路线已经由《日报》中的挑拨分子拟好了。……我们不向这伙站到……政府方面反对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英雄们”〔社会主义温和派〕做报告。可是，我们要竭力使他们这些工贼英雄们来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做报告。^①

他最恶毒的谩骂是针对高尔基的。高尔基是著名的作家和革命者，列宁多年的同路人，正是这个人，斯大林在后来把他尊为新文明的预言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的文章曾登在高尔基主办的报纸上，这家报纸还要求列宁及其同事“把牌摊开”；高尔基自己则借用托尔斯泰反对沙皇的一篇作品的题目《我不能默不作声》，撰文攻击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反唇相讥，对之发泄猛烈的怨恨：

至于《新生活报》〔高尔基的报纸〕的神经衰弱者，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究竟向我们要求什么。如果他们想知道起义的“日期”是为了预先把张惶失措的知识分子的力量动员起来，以便及时……逃跑，比如说跑到芬兰去，那我们只能……赞扬他们，因为我们“总是”赞成动员力量的。如果他们打听起义的“日期”是为了镇静他们“钢铁般的”神经，那末我们要告诉他们，即使起义的“日期”已经确定了，即使布尔什维克把这个消息“附耳”告诉了他们，那也不会使我们的神经衰弱者感到丝毫“轻松”，因为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发生歇斯底里等等。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68—369页。

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也对高尔基感到恼火，但没有一个人怀着这种个人的恶毒情绪攻击他和他的同事，说他们胆小、背叛等等。斯大林下面一段谩骂甚至是更不公正和更为粗暴的：

高尔基说“不能默不作声”不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吗？这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这是事实。当地主……把农民弄到绝望和饥饿“骚动”的时候，他们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当资本家及其走狗给工人制造全俄同盟歇业和失业的时候，他们坐在一旁，默不作声。……但是，当革命的先锋彼得格勒苏维埃起来保护受骗的工人和农民的时候，这些人却“不能默不作声”了！并且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责难反革命，不是的，而是责难那个他们在茶余酒后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最紧要关头却象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开的革命！

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使他的攻击达到了顶点：

俄国革命淘汰了不少权威人士。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对“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们为它服务，如果他们不愿意向它学习，那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这些后来被革命抛弃的“名人”整整有一大串：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查苏利奇以及一切仅仅因为他们老而出名的老革命家。我们担心这些“泰斗们”的桂冠会使高尔基睡不着觉。我们担心高尔基会被“死命地”拖到他们那里去，拖到档案库里去。那有什么呢，自由人是可以自由行动的……革命既不会怜悯也不会安葬那些离

开革命的死人……①

对于这些话的作者、格鲁吉亚农奴的后代和布尔什维克核心组织的成员来说，革命显然不仅仅是维护被压迫阶级。它也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委员会人对俄罗斯社会主义“名人”的胜利。他同任何传统、甚至社会主义传统都没有什么关系和有机联系。在这一点上，他非常不同于其他领袖，特别是不同于列宁。甚至在最狂热的争论中，列宁也决不会对他以前的导师普列汉诺夫说出这样的话：他“仅仅因为老而出名”。在斯大林这种毫无节制的咒骂后面，人们不难发现这个人被抑制住的失意感。他的特殊才能都不能使他成为“名人”，甚至当他正跨进权力的门槛时还是这样。但是，革命虽然曾把一些名人“抛到九霄云外”，它也的确造就了一批新人，他们甚至更加光辉，更加深深地铭刻在人民的心上。

后来的事件赋予斯大林的那些话以这样的意义，这就是不自觉地或者半自觉地向那些新人进行挑战。这场革命暂时之间只向世界展示了它的一面——焕发着热情和崇高希望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即吞食自己子女的怪物的那一面，却还隐藏着。但正是这一面，斯大林在那时已经对之加以崇拜了。“革命既不会怜悯也不会安葬那些离开革命的死人”——这就是他大约二十年后所实行的大清洗的主题。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68—370页。

第六章

斯大林在内战中

导言：革命的困境。——斯大林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列宁的第一个政府。——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斯大林到赫尔辛基宣布芬兰独立。——他对弱小民族“自决”的观点。——他起草的第一个苏维埃宪法（1918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1918年3月3日）。——斯大林和列宁一起赞成和约和反对“左派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的对德从事“革命战争”。——恐怖和反恐怖。——1918年5月斯大林在库尔斯克同乌克兰中央拉达进行和谈。——内战的扩大。——1918年6月斯大林到察里津（斯大林格勒）的使命。他支持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反对托洛茨基。——深仇大恨的根源。——斯大林要求给予南方战线的全权。——列宁企图调解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不和。——关于保卫察里津的互相矛盾的叙述。——1918年10月斯大林被召回莫斯科。——他对1918年欧洲革命的反应：《光明来自东方》。——1919年5月斯大林保卫彼得堡。——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膺红旗勋章。——作为行政工作者的斯大林。——他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的作用。——喀琅施塔得叛乱和新经济政策（1921年）。——一党制和对布尔什维克内反对派的禁止。——斯大林从布尔什维克核心组织不断增加的影响中获益。

十月革命——一次温和的、不流血的事变——之后继之以一场残酷的内战和外国干涉，它持续了近三年之久。在这个新的革命国家的形成中，其所受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所鼓吹

的思想影响，少于内战这一危急关头所给予它的影响。事件迫使这个革命的政党放弃了某些抱负、愿望和幻想，以便挽救革命的根本。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本身，它的领袖和追随者，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精神和政治上的变化。

这种变化中的一个显著方面，是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所具有的。每一次伟大的革命开始时，总是人民群众的力量、焦急、愤怒和希望的惊人爆发。每一次结局时，又是革命人民被弄得精疲力尽和幻想破灭。在革命的初期阶段，能够最充分表达人民情绪的党打败了自己的对手，获得群众的信任，并掌握了权力。在最极端的那部分人民看来，即使是最革命的政党有时也是不够革命的。革命由于不断发展的形势所迫，必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并向一切保守的力量进行挑战。然后就受到不可避免的内战的考验。革命的政党仍同民族中的大多数并肩前进。它充分地认识到，它应该同人民团结一致，它的目标要同人民的愿望十分和谐。它能够号召全国的群众不断地作出努力和牺牲；而它也肯定会得到响应的。在这个英雄主义的阶段中，革命政党是真正能够理解民主原则的，即使它用专政的无情手段来对待自己的敌人，并且不遵守宪法的严格规定。领袖们绝对信任广大的平民追随者；而且他们的政策也依靠这种互相信赖。他们愿意、甚至急于要把他们的政策交付公开辩论，并接受人民的裁决。虽然他们热望去领导群众，但他们也容许自己被人指导。

革命的政党（不管它叫做独立党、雅各宾或布尔什维克）同人民群众的愉快关系并不久长。它没有经受住内战的考验。新制度的许多忠诚的和有力的支持者在内战中萎谢了。一些人

则从卑微的地位中青云直上，而且往往享有特权。革命的政党因胜利而喜气洋洋，充满了骄傲和自信，但也感到疲惫和衰弱。人民的疲惫情况甚至更为深刻。整个国家受到内战和干涉的蹂躏，已经陷入悲惨的境地，其情况可能比当初人民起义来反对的那种情况还更恶劣。1920年俄国遭到的饥饿和匮乏就比1917年还糟糕。新统治者对环境所迫和为了自保所采取的无情手段，引起了人民的反对。而反对最厉害的人，正是先前坚决要求党实行那种方针从而使这种无情手段成为不可避免的人。

于是革命就成了虎头蛇尾的东西。领袖们不能实现自己早期许下的诺言。他们已经摧毁了旧制度，但却不能满足人民的日常需要。诚然，革命已经为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和不太遥远的未来的进步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在后代子孙看来是有道理的。但是革命的果实成熟得很慢；在革命后的头几年里，情况是悲惨的。这个新的国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它暴露出革命政党和人民之间存在着鸿沟。这是一场使革命政党目瞪口呆的真正悲剧。如果革命政党的行动听命于人民的情绪，那末它现在就不得不隐退，或者至少放松自己的权力。但是任何一个革命政府在内战获胜之后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的，因为已被打败的反革命的大量残余分子还在觊觎着这个权力。自动放弃权力就等于自杀。而且它还需要使大量的革命工作作废；而正是依靠这些工作，社会已经发生了转变，虽然它还不太巩固。一个政权的政治机构，如果它使革命和反革命的激情都能释放出来，那末它同稳定的代议制制度所提供的政治旋转门就大不相同；在代议制之下，政府可以通过那道旋转门上台和下台，情况或多或少是温和的，勿需把对方的脑袋砍掉。但是革命的政党是不会后

退的。它之所以走上目前的道路，主要就是因为它遵循现在已经被抛弃的那些人民的意志。它将继续按照它认为的职责去做，不会太注意人民的呼声。最后就会窒息人民的声音。

起初，革命的政党对于这个新阶段的所有含意是并不十分清楚的。它管理的政府是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现在它至少丧失了一个可贵的属性——它不再成为民治的政府了。全党可能仍然希望这种同人民情绪的不和只是暂时性的；经过各方面的诚实努力，将会重新唤起人民的想象力，并使最近才过去的英雄业绩重新出现。然而这种分裂却在不断扩大和加深。统治者已经习惯于专断的统治，而这种习惯又反过来统治了他们。当初多么富于希望的一场伟大的、热烈的群众运动，如今已经逐渐蜕变成为一种狭隘而冷酷的专制制度。在这个过渡期中，革命政党里那些提倡新观点或同这种新观点和平共处的人，就同那些坚持旧观点的人发生了分裂。它的某些领袖惊恐地指出了革命同人民的离异；而另一些人却为党的行动辩护说，这种离异是一种不治之症。还有一些实际的统治者，他们根本否认这种离异的本身，因为如果承认它，就会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有些人惊恐地叫道，革命已经被出卖了，因为按他们看来，民治的政府是革命的本质所在；没有民治的政府，也就没有民享的政府了。统治者找到了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说，不管他们做什么，最终总是为国家更广大的群众服务的。整个来说，他们也的确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巩固革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许多胜利成果。在这一片指责和反指责声中，革命领袖们的头脑开始膨胀起来，革命后国家的权力高踞于被它统治的社会之上。

革命发展的这种主要的方面，似乎是十分简单而又混乱的。历史的真理在最一般的概括上比在复杂的事件顺序中更是少见，它在每一次革命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在某一次革命的图景上显得模模糊糊的某些特征，在另一次革命中却十分清晰可辨。比如，雅各宾主义在几个月中萎谢和消亡的过程，在布尔什维主义中却发展得很缓慢，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而且它们的结果在很多方面都是十分不同的。但在这一方面，事件的一般趋势是重要的，这在迄今为止的所有伟大革命中都是共同的。只有根据这种广阔的前景来看，已获胜利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变质，以及斯大林个人的命运，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

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从默默无闻、贫穷和受迫害的景况下获得权力和名声，成为俄国的统治者，其过程的突然和快速，是很少人了解的。列宁在除去了伪装的假发和大眼镜后不久，就在起义的当晚于斯莫尔尼宫会见了他的朋友们，他曾开玩笑地承认这种转变过程所引起来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感觉。当1917年10月26日听到加米涅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一个人民委员会的名单时，斯大林也必定有这种类似的感情。这个名单包括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一名字，他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他成为其中一员的这届政府，受到所有非布尔什维克党派的抵制。这届政府的十五名成员中，十一名是知识分子，只有四名是工人。列宁任主席，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李可夫负责内务，米柳亭负责农业，施略普尼科夫负责劳动。陆军和

海军由以下三人负责：安东诺夫—奥夫申科，他是一个革命者和前军官；克里连科，前海军少尉和律师；德班科，一个身材魁伟、识字不多、虽然粗鲁却又性情温和的水兵，他是作为波罗的海舰队的革命领导人而知名的。“寻神派”和学者卢那察尔斯基负责教育。这个新政府废除了一些传统的陈规陋习。它的革新之处甚至表现在它的名称上，它以人民委员部代替了内阁各部的名称。每一个人民委员部都由一个委员会管辖，这个部的人民委员则是委员会的主席。政府的组织反映了它的民主激进主义。但还不能说，头一批人民委员的观点同日后布尔什维主义的“无情决定”或“狂热情绪”是一样的。相反，许多人民委员的“心慈手软”，很快就使政府处于一系列悲喜剧的情况中。这儿只能列举两三个典型的事例。

当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还在进行时，风传克里姆林宫已经在战斗中遭到毁灭。于是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宣布辞职，抗议赤卫队破坏文化艺术。他在一篇声明中大声疾呼地说：“同志们，正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是一场可怕的、无法弥补的灾祸。……人民在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已经伤毁了我们的首都。……在这些斗争猛烈和战祸惨重的日子里，作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这是特别可怕的事。……即使最愚昧无知的人也将会醒悟和理解，艺术是快乐、力量和智慧的源泉。”^①结果证明上述关于克里姆林宫的谣传完全夸大了事实；于是列宁费了颇大的劲，才劝使这位多愁善感的人民委员复职。

从政府存在的第一天起，它就遭到公务员的抵制。他们拒绝服从新主人的命令。一个目击者说：“亚历山大娜·柯仑泰

^①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304页。

……被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原来部里的人，除了四十人外，全都用罢工来欢迎她。各大城市的贫民立即……陷入悲惨的境地。饥饿的残废者、面有菜色的孤儿的代表们包围了这个部的大厦。柯仑泰泪流满面地下令逮捕罢工者，直到他们交出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① 革命还在泪流满面地打败敌人的破坏行为。

人民委员会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死刑，尽管列宁曾对此一再表示反对。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向彼得堡进军，企图推翻布尔什维克和解散苏维埃，他被赤卫队俘虏了，但旋即被释，因为他庄严地保证不再恢复战斗。但是后来克拉斯诺夫却在南俄领导了一支白卫军。在折磨人的内战经历中，革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擦干眼泪，不再相信敌人的保证，并学会以疯狂的决心去行动。这使得革命具有某种新的但令人厌恶的特点，但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特点，革命才得以生存下去。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那个“钢铁的人”是许多人中间的一个，他们使革命断绝了敏感的（或者说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

斯大林在他的部里没有遇到公务员的破坏行为，因为以前根本没有一个专门的部来处理各个非俄罗斯民族的事务。他不得不从头开始来建立他的人民委员部。起初，他的部的整个“机构”只是在斯莫尔尼宫中的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卡片柜，柜上钉着那个部的夸张的名字。后来，在一场各人民委员争夺设备的颇为滑稽的斗争中，他通过高压手段，才为他的部争得一个比较象样的部址。后来他又在周围集合了一群助手，有格鲁吉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足以来处理他的

^① 里德前引书，第200—201页。

人民委员部的事务。①

当这第一个人民委员会停止存在时，他几乎还没有开始他的工作。那些以前反对起义的右翼在政府中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在幕后酝酿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和解，主张他们的党同社会主义温和派分享政权。这个要求受到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工商人民委员诺根，以及卢那察尔斯基、加米涅夫（他这时已被选为共和国主席）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这些人民委员都辞了职，迫使列宁同其他党派开始谈判。②但是，和解的企图失败了，因为孟什维克坚持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起义的鼓舞者不应包括进联合政府。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里，对于这个条件还有点犹豫不决，但大多数人看出这个企图是要“使布尔什维克党群龙无首”，因而拒绝了它。斯大林投票反对联合政府中不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同孟什维克一直谈判到底。接着在政府和中央委员会里又有一些人辞职，只是这些不服从的人受到开除出党的威胁时，辞职之风才停止了。提出这种威胁的声明，首先是由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签名的。无论如何，这个危机导致了新政府的成立，其中包括了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这个唯一愿意同列宁和托洛茨基合作的集团，主要是为了要实现他们土地革命的目的。

除非适当地考虑到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软弱性”对于列宁的影响，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从苏维埃政府一开始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些领导人的动摇使列宁充满了忧虑和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256页。

② 里德前引书，第223—224页。

惊恐。他看到他的政府面临着一些几乎是无可挽救的灾难：国内的混乱，经济的瘫痪，不可避免的反革命，以及战争的创伤。他环顾左右，看看他在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同事，能够依靠谁来组成一个紧密的核心，以便在紧急情况到来时能够坚决而迅速地采取行动。他想设置一个核心内阁，而不是任何独裁的三人执政。在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曾任命了一个由四人组成的执委会，这四个人是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政府成立以后，政府把一些重要而紧急的事务委托给由五个人民委员组成的核心内阁来处理，其中三个是布尔什维克，两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三个布尔什维克成员是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①

我们已经说过斯大林如何在1912年成为一个中央委员。当时，列宁同他的大多数著名同事在意见上不一致（顺便说一下，其中有的人在1917年就参加了他的党）。于是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集团的挑选，就决定了这些人的消灭或自我消灭；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被地下工作的实际工作者、主要是巴库委员会的人们所代替。现在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斯大林的提升，正是由于许多中央委员执不同政见。诚然，这些执不同政见者这次并没有离开党，没有被开除，甚至后来还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会议中重新恢复了势力。但是他们继续存在只不过是暂时的事。这并不是说斯大林就完全免除那些更为温和的领导人所具有的怀疑和动摇；在十月起义的前夕，他就曾经有一个犹豫不决的时期。但是他基本上是列宁的一颗卫星，在列宁的轨道内不停地运行着。他自己的判断和政治本能，不时地诱使他脱离轨道；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241页。

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他的判断比列宁的还更合理。但是，至少在革命后的头几年里，那颗主星强有力地拉住了他，使他稳定地在预定的轨道上运行。列宁无疑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并不反对来充分地利用这个情况。在意识形态和原则问题上，他对于差不多任何中央委员的意见都比斯大林的意见更为认真地考虑；但是在政府的日常事务方面，在它的广泛的行政工作方面，他对于斯大林的帮助也许比对任何别的人的帮助评价都更高。虽然他自己并不象堂吉诃德，但他却喜欢有一个桑丘·潘沙。^① 斯大林在列宁的身旁，于彼得堡军事总部度过了10月27日到28日的夜晚，注视着为击退克拉斯诺夫将军向首都进军所采取的措施。几天之后，列宁告诉总司令杜鹤宁将军向德军司令部提出停战，并命令他立即停火。杜鹤宁将军拒绝了这一命令，列宁于是解除了他的职务，任命克里连科为总司令。这一次斯大林也站在列宁一边。这是斯大林军事活动的开始，随着内战的发展，这种活动的规模和重要性也在增加着。

在布尔什维克起义后三个星期，斯大林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第一次公开出现在芬兰社会民主党的赫尔辛基代表大会上。对于芬兰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和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新的俄国政府的代表宣布了芬兰从俄国独立出去。沙皇帝国对芬兰的逐渐吞并，是在拿破仑战争后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开始的。克伦斯基的民主政府认为自己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因

^① 桑丘·潘沙是堂吉诃德的仆人。——译者

此坚持它对芬兰的主权，即使它对俄国的主权都正在成为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老的错误终于被纠正了。代表俄国政府执行这个庄严的历史正义行动的人，本身不是一个俄罗斯人，而是受到沙皇压迫的另一个小民族的成员，这使得赫尔辛基代表大会更加显得不平常。他演说中的活泼措辞，同冷淡而无感染力的腔调形成了奇异的对照。这位演说者几乎是咕咕啾啾地讲着俄语，而且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但是由于他抛弃了一切浮夸之词，到增加了真诚的气氛。“芬兰人民和俄国其他各族人民都有安排自己生活的充分自由！芬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应该结成自愿的真诚的联盟！不应该对芬兰人民实行任何托管和任何来自上面的监督！这就是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和指导原则。”^①这是新俄罗斯的信息，是由南方格鲁吉亚的一个儿子带给北方芬兰的自由公民的。1917年12月18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芬兰独立。宣告的命令是由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

这个高尚的行动同斯大林1913年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所提出的纲领是一致的。他在这篇论文中支持被沙皇帝国压迫的民族获得自决权。他解释这个原则的意义说，每一个被压迫的民族都应该能够自由地脱离俄国并自己组成独立的国家。诚然，社会主义是不赞成民族分离主义的，而且组成的无数小国家也缺乏生存的能力。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成国际的社会主义社会。按照社会主义者看来，真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要求废除使民族隔离的屏障。但是斯大林说，国际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组成它的各民族自愿同意下才能建立；而自愿同意就意味着每个民族首先要获得完全的自由。列宁为这种观点辩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5页。

护，他把这种自由同社会主义者鼓吹的离婚自由加以诙谐的对比说，我们的意思不是鼓励妇女同她们的丈夫离婚，虽然我们应该使她们能够自由地去这样做。同样地，布尔什维克为非俄罗斯民族有权脱离俄国而辩护，也不是鼓励它们的分离主义愿望。革命后一个星期，在11月2日，这些原则就体现在《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中。这个宣言的作者是列宁和斯大林，它是打算向全世界宣布这次革命原则的文件之一。它说：“……人民委员会决定采取下列原则作为其活动的基础：1.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享有主权；2.俄国各民族有自由的自决权，甚至可以分离和组成独立的国家；3.废除一切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权和歧视；4.凡居住在俄国领土上的少数民族和种族集团，都能自由发展。”^①

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希望，非俄罗斯民族将效法俄国的榜样，进行自己的革命；而在它们获得分离权之后，将重新同俄国结合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但是芬兰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等脱离俄国的权利，并不取决于他们国家中建立起来的政权。1917年12月22日，斯大林在把芬兰独立的法令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曾辩护说：“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芬兰获得独立的情形，那末我们就会看出，实际上人民委员会是违背自己的意愿把自由交给了芬兰资产阶级，而不是交给芬兰人民，不是交给芬兰无产阶级的代表。……芬兰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从俄国社会主义者手里取得了独立。”芬兰社会民主党人由于“优柔寡断和令人不解的怯懦”，应对此事负责；但是“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迫使人民委员会背弃自己〔承认芬兰独立〕的诺言”。虽然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受到责难，它对

^① 列宁和斯大林：《联共（布）党史学习文集》，第2卷，第17—19页。

待芬兰资产阶级的独立要求是“十分公正的”。^①

这种政策的确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反布尔什维克的各党派大喊大叫地说这是“出卖”俄国。象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则认为，斯大林的政策对于小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了毫无意义的让步，而且这种让步是以牺牲俄国革命作代价的。但是斯大林受到列宁的支持，坚持他的信条。

然而，很快就清楚了，这个信条同现实发生了冲突。在俄国所有的边疆地区，新政府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它们都是反布尔什维克的，都坚持同俄国完全分离。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被信以为真了。乌克兰的问题最为严重。它新建立起来的政府，即所谓的“拉达”，同苏维埃发生了冲突。阿塔曼·佩特留拉是“乌克兰军队总司令”，他下令所有乌克兰部队离开前线并返回乌克兰。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自决已经成为荒谬的行动。斯大林在一篇官方声明中解释了这一新冲突的背景。^②布尔什维克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军队，但是他们还无力来改组军队以满足乌克兰人的要求。他们急于结束战争，同德国缔和。他们已经实现了短暂的停战，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和谈。但是在和约缔结以前，他们不能解散军队，打乱战线，瓦解交通体系。在沙皇的旧军队里，士兵不是按民族来隔离的，如果现在开始进行隔离，就意味着在仍忠于德皇的德军面前解除了俄国革命的武装。于是这儿又发生了乌克兰民族愿望同俄国革命利益之间的两难问题。

这种两难问题一再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俄国南部，哥萨克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7—14页。

将军卡列金集合起一支反革命军队，开始进行内战。苏维埃政府急于派部队到南方去，因为顿涅茨的红色煤矿区面临卡列金的进攻。乌克兰就象一个楔子，把俄国的南北两部分分开。但乌克兰拉达却拒绝红军假道。难道苏维埃国家为了尊重乌克兰的自决权而要向拉达的决定低头，甚至这可能使南俄落于白卫军之手吗？问题还不止此。苏维埃革命事实上也传遍到乌克兰，乌克兰苏维埃和拉达之间正展开紧张的战斗。拉达已经用武力解散了苏维埃。难道当红色基辅和哈尔科夫被当地反革命淹没时红色的彼得堡能袖手旁观吗？

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并没有犹豫很久。他在1918年1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描述了这个困难问题，鼓吹对这一政策进行修正：小民族的自决原则“必须……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①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批评了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问道，布尔什维克为什么给芬兰资产阶级独立而不给乌克兰？当已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和约的托洛茨基只是要求在波兰和其他德国占领区中实行公民投票时，斯大林为什么要求支持乌克兰苏维埃？斯大林的答复是，在他和托洛茨基的观点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波兰和其他边疆地区中并不存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也无意去“臆造”它们。而乌克兰已经存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不能从苏维埃倒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去。这次代表大会同意了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观点。

斯大林向同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苏维埃国家宪法一般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9页。

原则的动议，其中包括了另一个对原则的修正。这项动议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实行联邦制。^① 在他论及民族问题的著作中，斯大林同列宁一样，是反对联邦制的。当时他争辩说被压迫民族可以自由地退出俄国，但是如果它们留在俄国，它们就不得不接受这个新国家的中央集权机构，因为现代经济要求高度的权力集中，也因为在同一国家中各民族存在屏障，这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这是斯大林在1913年的看法。到了1918年初，情况已经很清楚，苏维埃国家经受不住所有小民族的分离，因此这个新国家实行联邦制，似乎就能最方便地在布尔什维克俄国的需要和各小民族的要求之间起到平衡作用。

然而，制定真正宪法的时间还不成熟。苏维埃政府还不是它国内的主人。为了保持政权，它刚刚被迫又进行了一次政变。1918年1月初，它解散了立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拒绝批准以下一些革命措施：建立工人对工业的监督，国有化银行，没收地主财产，呼吁立即开始曾由托洛茨基向所有交战国提出的和平谈判。立宪会议是根据克伦斯基所制定的法律选出的，它很可能不反映十月革命前夕国家情绪的转变。解散它是不困难的，因为它已无力集合任何部分的人民来捍卫它。由于解散了它，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连根拔除了俄国第一个议会民主制的嫩芽。于是苏维埃就成了唯一的代议制机构和唯一的权力来源。

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危机。布尔什维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0页。

克本来希望，革命将象野火一样地燃遍欧洲，并使这次战争结束。但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布尔什维克鼓励俄国和德国士兵进行战壕“联欢”，希望以此来使德军习染革命，尽管如此，德皇的军队迄今却很少或没有失去战斗力。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由于受到美国参战的鼓舞，也毫无意思去进行和谈。但是俄国已经无法继续战斗下去了。它的伤亡数字是巨大的；它的军队的装备和武器简直糟糕透顶。新政府曾经发誓要立即结束战争，它是否遵守这个诺言，将成为对它评价的标准。农村中的革命又给战场上的军队以致命的一击。农民们抛弃战壕，涌回家去参加平分地主的庄园。按照列宁的说法，他们用脚来赞成和平。苏维埃国家只好提出单独媾和的请求。

只有根据德国的条件才能得到和平。这些条件包括以各种形式把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部分乌克兰割让给德国，这些地方反正是被德军占领着的。但是，布尔什维克曾经允诺要缔结“不割地和不赔款”的和约。这曾经是他们的鼓动员的老生常谈。他们甚至走得更远，经常地说他们只同一个革命的德国政府而不同德皇的奴仆们媾和。理想和现实再一次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列宁尽心竭力地要使他的同事们理解绝对没有希望的局势，并劝说他们接受和约。他说，为了挽救年轻的、尚未巩固的共和国，他们不得不接受德帝国主义的勒索。德国和欧洲其余部分的革命已经延迟；如果这时俄国革命又遭到德国武力的粉碎，那末它们的革命就更要被消灭于萌芽状态中了。只要苏维埃国家能够生存下去，即使这是以屈辱和表面上对原则的否定为代价，最终也会鼓舞欧洲无产阶级起来造反。现在放弃的阵

地并不会永远失去，因为他们将利用这个以高昂代价换来的喘息时间，准备好再来一次竞赛，以决雌雄。

起初，谁也不听列宁的劝告。他的绝大多数同事和追随者都主张“以革命战争反对德帝国主义”。布哈林领导了主战的一派，后来他们被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争辩说，缔和会解开德皇政府的双手，使它能够去反对国内正在临近的革命。如果为了使自己免遭损伤，就背叛德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并默认为霍亨索伦帝国兼并外国的领土，那末俄国革命就要大丢其脸。即使苏维埃国家去从事力量悬殊的战斗，并因而失败和毁灭，这也比在羞耻和背叛中生存要好。它的榜样将激励别的国家恢复或继续战斗，就象半个世纪以前巴黎公社的英雄范例一样。他们说，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只是为了生存，就牺牲生活的唯一目的。

托洛茨基当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领导和平谈判，站在两派之外。他同意列宁的意见，认为苏维埃国家没有能力从事一场革命战争；但他也同意布哈林的意见，认为他们如果接受和平条款，就会大丢其脸。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拖延谈判进程，希望此时德国可能开始革命。他在惊愕和恼怒的德奥将军和外交家面前施展了极为漂亮的革命雄辩，意在暴露德国的颐指气使，并激发德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但是他的革命宣传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同时那个生死存亡的两难问题又必须加以解决。托洛茨基成功地说服中央委员会推翻了它原先赞成革命战争的决定，同意他提出的“不战不和”的公式。然而事情的发展很快就暴露了这个公式的空想性质。苏维埃国家不得不或者选择战争或者选择和平。“脚踏两只船”，这对宣传者或新闻

工作者来说是一种合适的姿态，但对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来说却是不行的。

斯大林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站在哪一边呢？对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告诫和革命道义的说教，他都不为所动。为了欧洲革命就必须牺牲俄国革命的想法，在他看来完全是天方夜谈。然而即使高度现实主义的列宁，也是不敢轻易否定这个想法的。但是对于一个多半时间是在巴库和梯弗里斯度过的人来说，欧洲革命这个观念是太模糊和太遥远了，因而在苏维埃共和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对他不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个共和国是他亲自帮助建立的，它虽然还很脆弱，但却是一个明明确确的实体。他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立场。有人认为，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向德国无产阶级的呼吁，将会对前线力量的对比产生影响，斯大林对这种想法只是耸耸肩膀，或者干脆加以嘲笑。他随同列宁及其小派别投票赞成缔和。列宁嘲笑左派共产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们说道“我指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我可以做任何蠢事”。他把布哈林及其追随者比为波兰贵族说：“这位小贵族临死的时候手握利刃，摆出美妙的姿态，说道：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他们讨论问题时是用小贵族的观点，而我却是用农民的观点。”^①谁还会比这位格鲁吉亚农民的儿子更能理解这番话呢？

随后两个月中，在中央委员会、政府、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都进行了辩论，斯大林在这些辩论中并无突出表现。（顺便谈及，他在任何一次重大的辩论中都是不引人注意的，这些辩论是真正的思想竞赛，在列宁生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93页。

前，党定期地沉湎于这种辩论之中。)但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所说的话已足以说明他在想什么：“如果采用革命战争的口号，那我们就帮助了帝国主义。托洛茨基的立场是不能叫做立场的。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单单依靠可能性。如果德国人开始进攻，那就会加强我国的反革命。……十月间我们谈论过反对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因为当时有人向我们说，单单‘和平’两个字就能掀起西方的革命。……”^①他虽然同列宁一道投票赞成缔和，但他们两人论点的着重点却有细微的区别。列宁象往常一样，一直注视着事实和情况的可能性，谈到西方革命运动发展的延迟。斯大林虽然也理解事实，却并不考虑可能性——“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诚然，他还补充说，如果托洛茨基“不战不和”的政策被接受，“那我们就会给西方革命运动造成最恶劣的条件”，因而这就意味着他也关心问题的这一方面。但是根据上下文来看，这不过是布尔什维克用语中一次随便的措辞。他的论点的真正分量，在于他否认西方革命运动的现实性，以及他对十月间破灭了了的幻想的尖锐评论。

在这场时时危及党统一的大争论经过多次起伏之后，在停战失败和德军迅速推进到彼得堡之后，在乌克兰拉达同德军单独媾和之后，在苏维埃国家可悲地暴露了军事上的无能之后，在列宁多次发出呼吁和警告之后——在这一切之后，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人和一般党员才转而支持主和的一派。3月3日，代替托洛茨基作为苏维埃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代表团首脑的索柯里尼柯夫签署了和约。列宁并没有想去掩饰这个行动。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6页。

没有谁比他更直言不讳地谴责这一行动是“耻辱的”。他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同1807年拿破仑强加给普鲁士的屈辱而不公正的提尔西特和约加以比较，当时进步的普鲁士政治家曾经利用这个和约在国内作了彻底的改革，准备了普鲁士的胜利。^① 他预言不久的将来要发生革命的战争。就在这一年底，德奥君主专制及其一切军事力量都化为了灰尘，一支革命化的德国军队从乌克兰撤退。因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也就自动地失效了。

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争论有着复杂的后遗症。它的政治后果是多方面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和解。虽然在当前的问题上失败了，但他们却代表了党内的一种重要的情绪，即一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不快，一种对妥协和机会主义的不安，而胜利的革命曾经和仍要不只一次地被赶进这种妥协和机会主义之中。他们还代表了对最初原则天真无邪的堂吉珂德式或乌托邦式的忠诚，对革命信仰的不通情理的纯洁性。这种情绪在一个阶段被镇压下去或遭到了失败，又在下一个阶段重现出来；而且它不断地改变形式、表达方法、甚至代言人。它将成为布尔什维克思想中的长期麻烦。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一个更为特殊的后果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的崩溃。后者在3月中退出了政府。他们的动机一部分是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一致的，一部分也是由于一般的民族主义思想使然。从此以后，政权就由一党行使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中也不再包括一党执政的条款。但事件的进程就是这样的：由于他们的合作者拒绝承担缔和的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68页。

责任，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成为国家的唯一统治者。他们虽然单独执政，但除了对极右的内战发动者以外，并没有对他们的敌手进行镇压。只是到了1918年6月，当内战已经全面展开的时候，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暂时遭到查禁，理由是他们之中的某些成员同白卫军站在一边。同年11月，当孟什维克保证将在苏维埃政权体制内做一个忠诚的反对派时，他们被允许重新公开活动。

但早在7月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激起布尔什维克爆发了第一次真正的恐怖。为了阻碍和约的缔结和迫使布尔什维克继续对德作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各布·勃柳姆金刺杀了德国大使冯·米尔巴赫伯爵。同一个党还在各地（其中包括在和约缔结以后政府迁往的莫斯科）发动了一系列的叛乱。8月30日列宁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受伤，另外两个布尔什维克领袖乌里茨基和沃罗达夫斯基则被刺死。托洛茨基也差点送了性命。布尔什维克正式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他们的自卫至少同他们遭受的攻击一样地凶猛。当时的那种精神可以从斯大林由察里津（未来的斯大林格勒）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一封信中看出，斯大林当时是那儿的人民委员。电文说：“得悉资产阶级的佣仆恶毒地行刺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领袖和导师列宁同志，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公开的、经常的、群众性的恐怖行动来镇压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以回答这一卑鄙的暗杀行为。”^①这封电报是由斯大林和察里津部队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共同签署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前身）由波兰籍的捷尔任斯基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15页。

领导，开始了疯狂的活动，甚至不惜枪毙人质。那个应对暗杀企图和暗杀行为负责的党自然被取缔了。这就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所引起来的激情，这就是它的阴郁的后果。斯大林实践了他在察里津说的话。这个城市的红色恐怖以他的名字为名，很快就成为人民中间的一句俗语，就象一百三十年前年轻的雅各宾党人富歇在法国里昂的暴行成为当时的一句俗语一样。于是恐怖和反恐怖就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争论还有一个较不重要的后果，它涉及布尔什维克各个领导人的地位问题。列宁在道义上获得了巨大声望。他所表现出来的非教条的逻辑和信念上的勇气，使他能够公然反对党内流行的情绪；而他说服人的惊人力量，使他能够终止党内思想的摇摆。在十月革命的实际活动中，全党和全国还很少见到和听到他，现在却能够看出他真正的高度，即他在精神和性格上的各种优点。在危机期间，十月革命的“逃兵和工贼”季诺维也夫也站到了列宁的一边；而列宁就象当初无情反对他一样快地就忘掉了旧恨。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暂时之间显得黯然无色了。他身上有一个重要的弱点，即缺乏某种平易的现实主义，而有一种夸夸其谈和矫柔造作的癖习，这在某些情况下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但是他的黯然失色并不严重。他在道义上的权威仍仅次于列宁。他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由契切林接替，自己改任军事人民委员。正是在这个新职上，他作为红军的创建者，名声达到了新的顶点。但是其他领导人一直没有忘记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中的立场。多年以后在列宁继承人的尖锐斗争中，他们还为此而反对他。

斯大林的地位也相应地上升，虽然自从联合政府垮台之后，

布尔什维克核心内阁的三人执政已经不存在了。由于斯大林没有登上讲坛在公众面前维护和约，所以他没有赢得什么声名。但是在反对“夸口的骑士”和超革命的梦想家的斗争中，他甚至成了列宁不可残缺的人。“利用这个喘息时间”，“训练和组织自己”——这就是列宁现在对他的追随者的教导。在这种平凡的新努力中，他相信是能够依靠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

喘息时间的代价还没有完全付完。共和国仍然担心德军可能重新发动战争。和约必须逐条地履行，而且一条比一条更为屈辱。有一条规定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正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斯大林于和约签订后不久的1918年4月2日，敦促苏维埃政府立即同乌克兰拉达开始和谈，因为它同苏维埃国家仍在战争状态中。^①人民委员会对此犹豫了近一个月。它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刚刚在签订和约前，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发动了一次政变，组成同拉达敌对的政府。斯大林亲自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保持了官方的联系，甚至指示它派自己的代表到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来。他现在的动议就等于不承认乌克兰苏维埃政府而赞同乌克兰拉达。人民委员会必定是认为这个权术搞得太过分了，因而在一个月中都没有作出决定。与此同时，德军司令部命令部队占领了全乌克兰。4月27日，人民委员会终于同意和拉达开始谈判，并指定斯大林为苏维埃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同乌克兰的特使在库尔斯克会见。谈判几乎还没有开始，消息传来，德军司令部废黜了温和的社会主义拉达，代之以由保皇派海特曼·斯柯罗帕茨基为首的傀儡政府。除乌克兰之外，德军这时还占领着黑海周围俄国的纯工业区，即塔甘罗格和顿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91页。

河上的罗斯托夫，以及克里米亚。

列宁和斯大林于5月5日命令乌克兰前线停火，但已经太迟，不能挽救形势。斯大林从库尔斯克返回莫斯科，同政府协商。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应不应该同在乌克兰很不得人心的斯柯罗帕茨基傀儡政府谈判。斯大林对此毫无顾忌。他在同《消息报》记者的谈话中说，“一般说来，乌克兰的政变对和平谈判暂时还没有发生不好的影响。相反地，可以认为乌克兰的政变并没有排除苏维埃政权和乌克兰政府之间缔结和约的可能。”^①他继续谈到，事件只是表明，拉达企图在德帝国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采取中间立场是无益的。斯大林小心地暗示，斯柯罗帕茨基这个公开的反革命和德国傀儡，甚至可能证明是一个和谈的更可靠对手。他很快就从这种权术中受到教训。

由于俄国的所有西部边疆都被德军占领，斯大林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工作范围就缩小到毫无意义了。甚至在他的本乡高加索，他也不能有什么作为。德军占领了格鲁吉亚，并没有遭到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抗议。土耳其人进入了巴统。高加索的事件使斯大林坚信，在德国军国主义铁锤和布尔什维主义铁砧之间的弱小民族，甚至无力保持名义上的独立。当布尔什维克让它们使用自决权时，它们就一个跟一个地成了德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斯大林暂时把注意力转向在欧亚边境之间居住在俄国东部的那些未开化的、落后的部族。要把那些种族和部族带进苏维埃政权的体制内，比之于使俄国东部更为进步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77页。

民族苏维埃化，在某些方面是更容易一些，但在某些方面又更加困难。鞑靼人、巴什基里亚人或土库曼人的政治愿望是很简单的。在他们之中还没有强烈的分离倾向。然而，要使他们前资本主义、前封建主义、甚至是游牧的生活方式适应于中央政府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政策，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1918年5月中，斯大林首次企图来处理这一任务，他主持鞑靼—巴什基里亚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一部分。

他刚刚开始工作，就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新的危险困扰了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春夏，白卫军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一时之间使苏维埃政权的政令只能达于原来莫斯科大公国的区域内。在东边，由前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同白卫军携起手来，在几个星期中，就闪电一般地占领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中游的一些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中心。新组成的鞑靼—巴什基里亚共和国已经失掉了。8月间，白卫军占领了喀山，直接威胁着莫斯科。在南面，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兵企图向北推进，同在喀山的白卫军携起手来。在推进中，他们割断了察里津和莫斯科的铁路联系。苏维埃首都同北高加索于是被隔断了，而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丢失后，北高加索已经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唯一粮仓。于是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的面包配给下降到每天约一盎斯。与此同时，仍在西线酣战的协约国军也开始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行动。美军在西伯利亚登陆。英军在北面占领了阿尔汉格尔，在南面占领了巴库。正当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力量达于最低点时，社会革命党人举行了叛乱，并企图谋害列宁的生命。

在最危险的关头，差不多所有的政府成员都离开莫斯科，

赶往前线最重要的地段去。列宁同少数技术助理在克里姆林宫指导整个斗争，同现场的人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两个人被派去解救看来最受威胁的地方。为了使首都免受军事威胁，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乘坐已成为内战中传奇的装甲列车到喀山附近的斯维亚斯克。斯大林则由近一营的武装警卫陪同前往伏尔加河上的察里津，以解救威胁着首都的饥荒。他将安排从北高加索把谷物运至莫斯科。他的任务实质上是非军事的，原先打算不需要很长时间，然后他就更往南到巴库去。但是由于预想不到的情况，他在察里津的时间拖长了；而且他越呆得长，就越深深地陷在南线指挥内战和同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最后，他到伏尔加河这座城市的旅行就变成了他一生事业的里程碑。

在他到达后的那一天，即6月7日，他向列宁报告了他的第一个行动。^①他发现伏尔加地区“投机盛行”，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察里津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负责贸易的一个苏维埃官员将要被逮捕。“请转告施米特〔劳动人民委员〕不要再派坏蛋来。”这是一个爱好管制和镇压的干员的语言。不过由于这一切情况，也许管制和镇压都是有道理的。他不喜欢革命遗留下来的极端民主的混乱状态。“铁路运输因许多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都热心过问而被完全破坏了。”布尔什维克在罢黜了工业中的旧经理人员和行政人员之后，起初企图由委员会来监督。他们现在又要废除那种极端民主而又运转不灵的制度，重新建立个人管理和个人负责的制度。左派共产主义者激昂地反对这种改变。斯大林无疑地放弃了他原来的主张。他派专员去克服运输中的混乱状态。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04—105页。

在察里津一个月之后，他请求授予他南线的特别军事权力。这是因为鉴于克拉斯诺夫哥萨克兵的军事行动，向莫斯科供应粮食主要已成为一种军事行动。在回答列宁关于社会革命党爆发叛乱的通知时，他向莫斯科保证说：“为预防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将做好一切准备。请放心，我们的手决不发抖。”^① 察里津和北高加索农业地区的铁路“仍未恢复。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该责骂的人……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或别人，粮食总会运去。……”在他的这封信里，实际工作的严肃性和一种奇怪的含意混合在一起，用来表达无情的决心。

在这同一封信里，他要求授予他军事权力，第一次暗示了他同托洛茨基的冲突。信里有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② 正是在这一点上，著名的察里津争吵开始了。

几个月之前，在旧军队完全解体之后，托洛茨基开始建立红军，起初是志愿兵，后来就征召工人和农民。由于这支新军没有军官，托洛茨基就让一些沙皇的旧军官去负责新编的师和团；但是，由于这些前军官在政治上不可靠，他又给他们派去一些共产党员作为政治委员。“军事专家”负责训练军队并领导他们进行战斗，而政治委员则监督这些军官的行动，如果需要的话，就防止他们的叛变，并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每一个军事命令都必须由指挥员和政委共同签署；两者都要执行军事纪律。这个新奇而大胆的试验，起初受到党的领袖们忧心忡忡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06页。

② 同上。

怀疑，引起了左派共产主义者最猛烈的反对。列宁原来也是怀疑的，只是在听到托洛茨基说，红军中已经雇用了四万名“专家”，如果取消他们，共和国的整个军事机器就会瓦解，他才打消了怀疑。他对这个试验的精明之处印象很深，故以自己的影响来支持托洛茨基，把他的这个行动描述为用已经崩溃的旧制度的残砖剩瓦来建造社会主义，而这是一种不可残缺的建筑方法。^①

这个试验虽是不可残缺的，但进行得并不顺利。前军官叛变的事例时有所闻；而这种情况越是经常发生，这些军官对于苏维埃政权在军事上胜利的机会越觉得渺茫。在内战的高潮中，团、师、甚至军的一些指挥员都投到白卫军去，有时还带走了他们的队伍。每一次叛变事例都增强了反对托洛茨基和列宁者的口实。在各级指挥机关，从连队一直到总司令部（托洛茨基把一名前沙皇上校瓦采梯斯提升为总司令），都笼罩着一片紧张和怀疑的气氛。政治委员和军事指挥员的紧张关系加剧了，这是因为前者经常表现出一种粗鲁的、不灵活的怀疑态度，伤害了后者的尊严。这个问题还仅仅是更大争论的一部分。托洛茨基曾经打算把许多松懈的游击队和赤卫队组成一支正规军，具有由中央指挥、管理和供给的有效制度。这个改变受到许多红色游击队领导人的阻挠，这些人已经在内战中成名，要他们居于保守的军官之下，这自然是十分反感的。更为老练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在原则上反对军事上的中央集权。他们提醒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两人在夺取政权前曾强调地答应过，苏维埃国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9—50页；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54—173页。

家将要永远废除常备军（以及政治警察），而代之以人民卫队。然而，象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的许多保证一样，这一诺言也不得不抛弃了。

察里津是这个新军事政策斗争最剧烈的中心。司令部设在那儿的第十军指挥员是伏罗希洛夫，他曾是一个工人，十年前是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中的同事，领导过石油工人的工会。伏罗希洛夫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个军士。当地的另一个指挥员是布琼尼，也曾是正规骑兵中的一个军士长，一个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是第十军的政治委员。斯大林一到达后，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些老朋友中，他们由于对往日战斗的回忆而联系在一起。这差不多等于是旧的巴库委员会转移到第十军的司令部来了。光是这点，就使得斯大林有意同情“察里津集团”，即使他们对他们的行动也执批评的态度。

察里津集团拒不服从前沙皇军官、现南线司令员西丁的命令。对于伏罗希洛夫不服从命令的怨言，从南线司令部不断地用无线电报告了总参谋部，再由总参谋部报告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于是对察里津总部发出了许多劝说、训令、命令和告诫。由于当地的“军事专家”发生了几起背叛事件，这更增加了“军士反对派”（这是托洛茨基加给察里津集团的称号）的顽固性。^①

即使考虑到斯大林同伏罗希洛夫的老关系，斯大林对这些反对派的同情初看起来也是令人不解的。在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中，他是一直维护中央权威和纪律的。对于混乱和半无政府状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59—65页；92—96页；
伏罗希洛夫：《列宁、斯大林和红军》，第70—75页。

况实行严格的纪律，这是他受到人们称赞的主要品质之一。那末为什么他要存心蔑视对察里津的权威呢？察里津集团对于出身旧知识分子或“绅士”的前军官有一种平民般的不信任感，这同格鲁吉亚农民出身的特派员的心意正好合拍。不能说争论双方中一方全对而另一方全错。例如，布琼尼曾经敦促最高司令部组织一支红色骑兵，并以大规模的密集队形、甚至单独一个军来使用它。这位前军士长富于想象力的主意遭到了军事专家的冷遇，非常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另一些专家否定以密集队形使用坦克的建议。托洛茨基起初也拒绝考虑布琼尼的主意，因为他担心骑兵中不得不包括大量的哥萨克；他们是俄国天生的骑手，但对苏维埃政权是不友好的。只是到了后来，托洛茨基才发出命令：“无产阶级骑上马去”，使布琼尼的这一主意得以具体化，并开创了内战中最富于浪漫色彩的传说，即关于红骑兵及其指挥员布琼尼的传说。^①这时，这位前军士长在察里津也对总参谋部和军事人民委员发泄了不满和怨恨，而他发现斯大林对此是很乐意听的。

但是，斯大林所以保护察里津集团，主要原因不在这儿，而在于他同托洛茨基早期的敌对。在随后的几年里，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因为这种敌对是在政治局大门里尖锐地发展起来的。即使在政治局内，由于列宁的监视，这种敌对的表现还是比较谨慎的，以致新参加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种敌对的凶猛和剧烈程度。甚至在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崩溃以前，关于政府的设立就引起了敌对。布尔什维克的核心内阁是由列宁、托洛茨基和

① 伏罗希洛夫前引书，第56页；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274页；E·沃伦堡：《红军》，第97页。

斯大林组成的。斯大林在三人中资历最浅。两个老资格的成员名声很高，并受到人民的爱戴。照一般的说法，他们的名字都是由连字号连结在一起的。这个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列宁-托洛茨基的政府。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也都把这个党称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党。起初还只是俄国国内这样称呼，后来全世界都这样称呼了。这两个人一出现在代表大会和其他会议上时，总是受到了热烈的欢呼。这个年轻共和国的热情都自发地集中在这两位领袖身上，无需官方的捧场者来费力地支撑。但是三人中这位资历较浅的人却还名不见经传。他的权力和他的默默无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即使一个野心和骄傲不大的人，对此也是会感到愠怒的。这个人尽管有非凡的经历，却从未达到自年轻时就渴望的出人头地的目的；这个人即使受到提升因而能够飞黄腾达，他那种令人烦恼的自卑感也会反常地表现出来。这种情况的确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列宁的优越地位对他没有什么伤害，因为他理所当然地把这视为不可改变的情况，就象他们两人年纪的区别一样。但托洛茨基的优势却不能不引起他酸溜溜的怨恨。他的敌手和他是同代人——他们出生于同一年。仅仅在几年之前。斯大林还在列宁的全力支持下以最轻蔑的态度攻击托洛茨基，说他是“爱吵爱嚷的假装的大力士”，“取消派的伙计”。他如此无望地被托洛茨基弄得黯然无色，他不得不看到托洛茨基经常地被欢呼为这次革命的战士，不得不听到热心的布尔什维克群众对托洛茨基大肆赞扬，这种情况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在同社会革命党人破裂、政府重新调整和三人执政解体之后，他必然是感到愤懑不平的。这时，斯大林在政府中的影响，就象它兴起时那样充满了偶然性地消失了；托洛茨基的影

响则随着内战的发展使军事人民委员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而扩大了，他成了政府里的中心人物。斯大林怨恨和嫉妒的种子是在察里津开始萌芽的。

因此，在俄国历史上的这一深仇大恨，其起因是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怨恨和嫉妒，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看起来几乎是矛盾的，但它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诚然，在随后的阶段中，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冲突，有着更为广阔而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个人之间的敌对，本身不会采取这场重大戏剧的那种规模；在这场重大戏剧中，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国际的整个生活都逐渐地被重新塑造了。但是在最初阶段，这种敌对纯粹是个人性质的，因而它是狭窄的。它起初并没有什么特别和过分之处。在任何国家的同一政党和政府领袖人物中，通常都能发现这种私人之间的敌对行为，因而成为一些群众报纸闲话专栏的材料。即使对他们生平进行研究的博学者，也发现不了此时这位军事人民委员和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之间在原则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甚至在军事政策的争论中，斯大林最后也站到托洛茨基一边，或者勿宁说站到支持托洛茨基的列宁一边。）他们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两个人都在尽其所能地使革命免遭失败。但他们也是普通的人，因而在完成其革命使命时，也不免于有个人的野心和激情。

对托洛茨基采取不友好态度的并不仅仅是斯大林一人。老的地下工作者，即列宁说的职业革命家和组织者，都有一种明显的团结精神。在他们很多人看来，托洛茨基不过是一个新来的人。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隐隐然触犯了他们的共同感情。象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局外人一参加了党，就极强烈地吸引了

党的追随者，这是任何党的核心组织所不曾有过的事。的确，当托洛茨基于 1917 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他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但是党当时尚在努力夺取政权，而且托洛茨基是在“七月事变”中参加党的，那时党被它的所有敌人逼得走投无路，正不知下一步是被打入地下，还是夺得政权。象托洛茨基这样有地位的人参加党，就使党暂时消退的自信心有所恢复。内战的危险重新使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团结起来，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未来如果说要完全依靠什么人的话，那就是要依靠军事人民委员的成败。事件本身的力量仍在维护着这个核心组织。但是总有不少委员会的人长久地忘不掉那种宿怨，很容易转而反对托洛茨基，特别是在旧恨之外加上了新仇的时候。

正如斯大林所答应的那样，粮食从北高加索运到了莫斯科。因此人民委员会有理由感谢他派到察里津去的那位特使。斯大林第一次比较胆怯地提出给予他特别军事权的请求，但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在 1918 年 7 月 10 日给列宁的信中再次坚持地提出了这一请求。这封信只是到了 1947 年才第一次发表出来，他在信中猛烈地攻击了托洛茨基，这种攻击也包含着对列宁的抗议。他说，如果托洛茨基没有通过当地的人而继续把自己的人派往北高加索和顿河，那末，“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北高加索的一切将全部垮台，我们将完全丧失这个边区。……从工作利益着想，我必须拥有军事全权。这一点我过去提过，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自己作主，不经形式手续把那些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当然，我决不因为没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动。”^①

^① 《斯大林全集》，第 4 卷，第 108—109 页。

从技术上来说，斯大林干预军事是不合法的。他要求未经他和伏罗希洛夫同意，总部不能作出任何任命，这也超越他的权限范围。但是，现在粮食问题和军事行动已经交织在一起了；而且斯大林认为，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和党的一个高级领导，不管他在军队中的正式职位如何，他有权按照自己的决定去做。托洛茨基方面则坚持说，只要斯大林是隶属察里津总部的，他就应该服从最高司令部，不应该利用自己在政府或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来损害军事上的权威。^①托洛茨基的这一主张虽然在技术上说是正确的，但在心理上却是不现实的。斯大林在统治集团中已有一种强烈的等级观念，他是不愿意在他老朋友的战线上屈尊的。列宁（不管他对斯大林信件的语气作如何想法）小心谨慎地不在这场争吵中火上添油。他对两人的工作都给予了好评（虽然对两人使用的是不同的尺度），而且急于要消灭他们两人之间的摩擦。他没有向托洛茨基展示斯大林那些最冒犯人的信件，也没有把托洛茨基的批评转给斯大林，他企图制止这一个和安抚另一个。后来经托洛茨基同意，斯大林得到了他所要求的全权。另一方面，他也不辜负列宁的支持，采取措施来增强中央司令部的权威。

详细地来研讨察里津的争吵是乏味的。反正列宁倡导的妥协并没有消除两人的摩擦。莫斯科和察里津之间继续在发出命令、威胁、抱怨和训诫的电报。在托洛茨基的一份命令上，斯大林批道：“不理它”。^②9月，伏罗希洛夫把白卫军赶过了顿河，斯大林向人民委员会报捷说：“敌人被彻底击溃……察里津局势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第206—208页。

^② 伏罗希洛夫前引书，第47页；雅罗斯拉夫斯基：《里程碑》，第115页。

稳固。进攻在继续中。”^①不久以后，他在前往莫斯科期间，又同列宁联名打电报向察里津前线的英勇部队致以兄弟的敬礼。^②但是，这些电报中的自信调子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白卫军很快又包围了察里津。由于托洛茨基一再的抱怨，斯大林才被召返莫斯科。托洛茨基打电报给列宁说：“我绝对坚持把斯大林召回。尽管有极多的部队，察里津前线的情况正在恶化。伏罗希洛夫只有能力指挥一个团，而不是一个有五万人的军。但是，如果他能够随时向南线军司令员西丁报告，我将让他指挥第十军。察里津甚至到现在还不送来行动报告。……我曾要求他们一日两次送来侦察和行动报告。如果明天还不这样做，我将把伏罗希洛夫押送军事法庭，并将在军事命令中公布这一事实。”^③托洛茨基在同伏罗希洛夫见面时又重复了这一威胁，伏罗希洛夫最后让步了。

托洛茨基对于那位未来的军事人民委员和总司令的能力看得很低，这一观点为原来的大多数苏联将军所承认；而且在1941年得到了证实，当时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在对德战争的指挥中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时，斯大林被召回莫斯科，向革命军事委员会解释他的态度。他精明地同“军士反对派”脱离了干系，并至少在表面上同托洛茨基寻求和解。1918年10月11日，刚刚在察里津被白军重新包围以前，他被派返察里津。几天之后，包围者再次被击退，而且这次是一劳永逸地被击退了。

正是这次察里津的胜利，随后引起了究竟应该归功于谁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16页。

② 同上书，第117页。

③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288页；《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350—351页。

没完没了的争论。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三十年代大清洗以前为大多数苏联将军所主张，胜利的桂冠应该归诸南线的司令部，因为它的部队从外面打破了对察里津的包围圈。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则认为桂冠应属于他们。这是许多无聊的军事争论之一，它不可能也不值得去加以解决，而且只是从它的政治背景来看才会夸大其意义。在克里姆林宫，察里津集团的主张显然被驳回了，因为正是在察里津解围之后，列宁最后同意了托洛茨基的要求，把斯大林从南线召回，让托洛茨基能够自由地同伏罗希洛夫去打交道。^①多年之后，察里津集团又重新提起这个争论，他们的主张构成了斯大林军事传奇的一部分；在斯大林追求最高权力的更为广泛的要求中，这一部分虽是次要的东西，但却具有相当大的意义。这一事件后大约五年，察里津被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42年，当斯大林决定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和市内进行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战斗时，他的动机并不仅仅是由于对现实形势的战略考虑。他也是受到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察里津定影法”的鼓舞的，因为当他创造了第二次更加接近事实的胜利时，他就在历史面前捍卫了他第一次的那种传奇。

到1918年夏末，从东面对莫斯科的威胁已经解除。在这种威胁存在的时候，总参谋部只把南线看成是次要的。但是到了10月，捷克人已被赶回乌拉尔，托洛茨基能够把全部注意力转向南线了，他不容许对他的战斗命令有任何干涉。于是南线就不能两雄并立了，其中的一人必须走，而这个人就是斯大林。列宁尽量把这颗苦丸药裹上了糖衣。他派共和国主席斯维尔德洛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289页。

夫去把斯大林接回莫斯科，他们乘坐的是专车，而且礼仪相当周到。这一事件表明了列宁处理人事问题的特点：他精明地看到斯大林的弱点所在，所以非常小心地不去不必要地触犯斯大林的敏感部分和虚荣心。托洛茨基的态度正好相反。他看轻他的对手，不考虑他的野心，几乎每一步都要触犯他。这是他的天性使然，倒不是有意如此。载着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到莫斯科去的火车，同载着托洛茨基到察里津去的火车在途中相遇。经过斯维尔德洛夫的精心安排，这两个敌手在托洛茨基的车上会了面。据托洛茨基的说法，斯大林颇为温和地要求他不要对“察里津的孩子们”太严厉。托洛茨基的答复却是尖刻而傲慢的：“这些好孩子会毁掉革命，而革命又不能等待他们成长起来。”随后，伏罗希洛夫就从察里津转到了乌克兰。

斯大林恰恰在革命一周年前抵达莫斯科。他为《真理报》写了一篇短文，干巴巴地总结了过去一年的事件：

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自始至终是革命的鼓舞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住在彼得格勒维波尔格区的一个秘密住宅里，10月24日傍晚他被请到斯莫尔尼去领导运动。有关起义的一切实际工作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完成了。可以肯定地说，全党首先和主要应该感激托洛茨基同志，他使卫戍部队迅速地投向苏维埃一方，并效率极高地组织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①

① 对托洛茨基的这段评价，在1947年出版的《斯大林全集》中被删去了（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39页）。这里的文字引自斯大林著《十月革命》的官方英文版，第30页。

在这篇文章写成三十年之后，斯大林对于托洛茨基在革命中作用的这一评价，听起来好象是一种荒谬的颂扬。它被作者在1947年出版的《全集》中删掉了。在最近二十年来，苏联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没有谁敢于引证它——斯大林自己讲的话变成极危险的异端邪说了。但是在写它的时候，听起来倒真是一种颂扬。它的目的是阴险地贬低托洛茨基的作用，因为它没有完全按照事实，只把托洛茨基描绘为不过是列宁思想的执行者（当然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执行者）。这是当时斯大林所能发泄其怨恨的一个极限；他只能在一束花中暗藏一根刺来伤害一下他的对手。

俄国革命一周年之后几天，德国和奥地利本身发生了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王朝化为尘埃。柏林和慕尼黑、华沙和里加产生了工兵代表委员会（苏维埃）。社会主义温和派掌握了各战败国的政权。布尔什维克坚信，这个过程将以全欧洲（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的“十月革命”而结束；而社会主义温和派的政府将很快地被极左的社会主义者所推翻，就象克伦斯基的政府在俄国被推翻一样。只要几星期，顶多几个月，俄国革命就将摆脱孤立状况；国际社会主义社会就将奠定基础。先进的、工业化的和文明的西方国家将领导一个雄伟的运动，并把“落后的、半亚细亚的俄国”推向更高的文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全都为幻想所陶醉，怀着不安的希望，注视着西方事变的进程。象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季诺维也夫、柯仑泰、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

都曾侨居西欧多年，他们看出了先兆，并把它们解释给本国的人民听。俄国的眼睛紧紧地盯住西方。

在十九世纪，俄国精神和政治生活中一个最大的分歧，就是欧化和斯拉夫化的分歧。也就是说，有些人努力要使俄国欧化；有些人则认为俄国的特殊使命就是发展自己的文明：或者是独立于西欧之外，或者就是明显地反对西欧。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倾向的分支。布尔什维主义把两种倾向合而为一。早在1913年中国革命的时候，列宁写过一篇叫《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文章。^①他把强烈要求革命和社会主义视为现代文明最进步的特点，因此他描述被帝国主义和保守主义纠缠住的西方是“落后的”，而为社会变革所激动的东方则是“先进的”。就他应用这一标准来看，他可能被说成是代表“东方”倾向的，虽然他的东方倾向并不象斯拉夫化那样，仅仅限于俄罗斯民族或斯拉夫民族，而是包括有色人种、觉醒的殖民地民族。但是列宁在多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主张“欧化”的人。在他看来，进步就意味着东方接受马克思主义，即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产物。而且，他并不认为东方光靠自己就能获得解放。西方由于其工业化和更高度的组织，当它破除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之后，是注定了要领导东方的。他思想中的这两种因素，按照情况的不同，或此或彼地占了上峰。现在当革命的曙光似乎在欧洲升起的时候，列宁主义中的“欧化”因素占了更大的分量。正是在这些日子里，建基于布尔什维克和西欧社会主义极左翼之上的共产国际匆匆忙忙地组成了。

斯大林对于这一新形势是如何反应的呢？他很少谈及西方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82—83页。

的事件。因为这是那些曾经侨居国外的领袖的领域，他们的谈论是根据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和对西方问题的长期研究而来的。斯大林对于这一讨论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名为《不要忘记东方》，另一篇叫做《光明来自东方》。^①象他这样一个人，曾经生长在欧亚交界的俄罗斯、鞑靼、波斯石油工人和格鲁吉亚农民之中，自然会亲密地同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东方”倾向打成一片了。由于这两种倾向还不是区分得十分清楚，因而这一事实就更值得注意了。当时也没有一个领袖人物（当然不包括斯大林）意识到这两者之间潜藏着不和谐之处。在那个阶段，如果说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中已经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东方的因素，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的偏爱纯粹是一种天性。在他的观点中也还有这样的话：“在西方，应当首先打断在欧洲铸炼而用来扼杀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锁链。”^②但是这种对于西方革命重要性的讲话（虽然在形式上是笼统的），不过是偶然谈及的，它的意思仍在于强调他的警告：不要忘记东方。在他的话里，对于这时西方完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有着一种政治上嫉妒的味道：“在这样的時候，遥远的东方及其数亿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就‘自然而然’从视野中消失了，被忘记了。”他在谈到一次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员代表会议（目的在于加强在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宣传）时说：“必须彻底领会这个真理：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他的另一篇文章谈论布尔什维主义在乌克兰的新高潮，在结束时说：“光明来自东方！帝国主义吃人者所盘踞的西方变成了蒙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52—154页；158—162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152页。

昧和奴役的策源地。任务就在于摧毁这个策源地，使世界各国劳动人民欣慰欢腾。”这是一个在克里姆林宫安顿下来的巴库委员会人的大声疾呼。根据布尔什维克战略，他强调东方的重要性，这肯定是合法的；而他“反西方”的调子又十分含糊，不致于引起任何反对。但是，在他的心目中，革命的社会主义西方形象，比作为“蒙昧和奴役的策源地”的西方形象要模糊得多。后来，它甚至变得更加模糊了。例如在英法干涉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时候，斯大林不公平地把英国国内反对干涉的人说成是在玩弄“卑鄙勾当”，事实上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反对苏维埃俄国。^①然而这个“卑鄙勾当”的结果却恰恰是，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英国码头工人对运往波兰的军火实行了禁运。

把斯大林的这些说法同托洛茨基的《给红色陆军和海军的命令》(第一百五十九号命令)加以比较，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托洛茨基的命令是1919年10月24日发布的，正当尤登尼奇向彼得堡推进而俄国国内反英情绪最强烈的时候。这个命令说：

红色的战士们，在所有的战线上，你们都碰到了英国敌视我们的阴谋诡计。反革命部队轰击你们的大炮是英国来的。你们在南线和西线的申库尔斯克和奥涅加兵营中发现的军火是英国造的。你们俘掳的敌军有着英国的装备。阿尔汉格尔和阿斯特拉罕的妇孺是被英国的飞行员和高爆炸弹炸死和炸伤的。英国军舰还炮轰我们的海岸。

但是即使目前在这个反对英国走狗尤登尼奇最剧烈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83页。

关头，我还要号召你们：绝对不要忘记存在着两个英国，除了那个自私、暴虐、贪婪和嗜血的英国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劳动的、高尚的、伟大理想的和国际团结的英国。反对我们的是那个证券交易所的英国、寡廉鲜耻的英国。劳动的英国，它的人民，是和我们在一起的^①。

由此可以看到，在那些日子里，布尔什维主义的声音是由多么不同的声调混合起来的！西方的声调暂时大大地掩盖了东方的声调，但未来却是属于东方声调的。

内战在1919年达到了高潮。这一年，西方国家的干涉也达到了最深入的地步。年初，高尔察克的白军重新由东面推进，占领了皮尔姆。刚刚击退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又从南面发动攻势，夺取了基辅和库尔斯克，直逼莫斯科。差不多与此同时，在5月间，尤登尼奇向彼得堡推进，希望在城防司令部“第五纵队”的帮助下夺取该城。斯大林被派往这座从前的首都，负责保卫它。他揭穿了阴谋者，领导了军事行动，为苏维埃政权挽救了这座城市。10月间，尤登尼奇再次企图夺取彼得堡，已经进到了城郊。这次是托洛茨基为苏维埃国家挽救了这座城市。

10月时的形势最为危急，因为莫斯科和彼得堡看起来都要被白军攫取。白军完全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高尔察克自封为俄国的独裁者，他受到巴黎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正式承认。邓尼金则得到进入黑海的协约国海军的支持。法国军队占领了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涯》，第416页。

敖德萨。英国海军在芬兰湾帮助了尤登尼奇。英国的丘吉尔和法国的克里蒙梭是干涉的两个最坚决的倡导者。但是不论是白军的将军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想绝对地成为俄国的救世主)，还是西方国家,都没有能够协同他们的行动;于是布尔什维克就逐个地解决了这些敌人。1919年11月,白军从所有的战线上狼狈逃窜。苏维埃政权就实际上赢得了这次内战。它的最后一个行动就是在南面反对弗兰格尔的战役。它是继1920年俄波战争之后进行的,规模较以前几次为小。11月,红色莫斯科庆祝了它的胜利,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获得了红旗勋章。

在整个内战中,而且一直到1925年,托洛茨基都是红军的负责人,他被称为胜利之父。斯大林虽然也获得最高勋章,但他的名望在内战结束时并不比开头时更高。许多历史学家和事件参加者的回忆录,几乎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如果只根据这一事实就对他的作用作出结论,那也是错误的。根据当时的秘密军事通讯(一小部分是斯大林发表的,另一小部分是托洛茨基发表的),他的作用远远大于托洛茨基当权时一些文章和著作中所说的,虽然不如斯大林时代一些官方历史所说的那样大。

关于当时战略问题的争论,已经写了一系列的书,目的都在于增强各个要求掌权者的传奇性。其实,没有一个领袖是不犯错误的。他们每个人在一些场合表现出精明的决策,但在另一些场合又犯下严重的错误。托洛茨基反对高尔察克的战略小心到了胆怯的程度。当高尔察克的部队由于失败而陷入混乱时,他还拒绝越过乌拉尔去追击他们。只是在斯大林和其他一些人的坚持下,红军才开始追击,并肃清了俄国亚洲部分的大部分

白军。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反对南面邓尼金的计划，经后来的事件证明，在各方面都是很出色的。他建议以顿涅茨煤矿区为基地发动一次进攻，因为这个区域的居民对红军是友好的。但是，总参谋部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支持，宁愿在反革命哥萨克居住的顿河区发动战役。就象在十月革命中一样，托洛茨基现在也很敏锐地看到内战中社会和军事因素的互相影响。他的计划没有受到同事们的重视，直到邓尼金推进到了奥勒尔，才迫使他们改变了想法。还有，当尤登尼奇第二次向彼得堡推进时，列宁过高估计了进攻者的力量，而且为了保证莫斯科必要的防御，他主张放弃彼得堡。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都顽强地反对这一建议，而且事件证明他们是对的。因此，这些争论并不反映政治或战略原则的敌对，而只是由于根据军事上的便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引起的。

斯大林从各条战线发出的秘密信件和报告，和他在公开谈论与报纸文章中所表现的情况完全不同，两者在风格上的对比是非常鲜明的。在讲坛和报纸上，他的弱点十分显著。他的语言极端缺乏想象力，这在一般以政治为生的人中是很少见的。他的语言阴暗、干瘪、无趣——就象托洛茨基说的，“使人昏昏欲睡”。他的论述令人厌烦地重复，散漫，而且充满了不合逻辑的地方。他的比喻和隐喻照例是非常不恰当的。幸好它们极少，在差不多二十年的写作中，他不过才用了不到二十个，随后的三十年中也没有增加多少。他一旦想到一个比喻，就念念不忘，并单调无味地重复它，这说明他的想象力十分狭窄。在面对听众的时候，他无法使自己和听众都激发起热情来。这并不仅仅由于缺乏文学和演说的才能。这个人一处于公众的监视下就感

到不自在，甚至连声音也象是口技演员那样的古怪。他的态度和风格都是装模作样的，完全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是，在私人通讯中，他又变成了另一个人了。他的风格经常是简洁明了的。他在这儿是以一个大官员身份讲话的，没有在公众面前那种拘谨的表现。在这儿几乎看不到令人厌烦的重复、稀奇古怪的矛盾和用得不得体的比喻。在这儿他是一个清醒的调查员、对危险地区的视察者，使用直接了当和有条有理的词句报告其所见所闻。人们几乎老是看见他在工作，因为他一到达目的地，就立即冷静而清醒地观察发生事情的现场，军事机器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司令部、党委会和地方苏维埃等的混乱情况。他一形成自己的意见后就向莫斯科报告。接着他就开始“督促并责骂”周围的人，继续进行调查，发现当地或最高司令部中新的缺点或疏忽。最后他在能够信赖的人中组成一个紧密的小集团，提升一些人，撤换一些人，把另一些人送上军事法庭，安排粮食供应，再次向莫斯科报告。几乎在每一封信的末尾，他都要刺一下托洛茨基。

这就是他从皮尔姆、彼得堡、斯摩棱斯克、谢尔普霍夫等地发出函电的大致内容，应该在内战史中而不是在他的传记中对它总结一下。也许他最著名的一次视察就是1919年初对皮尔姆的视察。他是同新组成的政治警察头子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一块去的，目的在于调查新近第三集团军被击溃的原因。在斯大林所写的报告中，他们说：

在我们看来，问题不仅在于第三集团军……而且还在于：（一）总参谋部和军区军务部所编制和派往前线的显然

是一些不可靠的部队；（二）全俄政治委员局给后方编制的部队派去的是些小孩子，而不是政治委员；（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它的所谓训令和命令扰乱战线和各集团军的指挥事宜。①

总部既然派来这样的半白卫军的预备队……那就不能给第三集团军以重大的援助了。而且，第三集团军各部队在退却中这样筋疲力尽，以致士兵成群地躺在雪地上，请求政治委员枪毙他们：“我们站都站不住，走路更不能了，累极了，同志们，打死我们吧。”

不应该打没有预备队的仗。……只有把总参谋部的一套旧的动员制度和编制制度加以根本改变，把总参谋部本身的人员加以更换，预备队才能发生作用。②〔这是在攻击托洛茨基的门徒、总司令瓦采梯斯，他很快就由斯大林的门徒加米涅夫接替。加米涅夫和他的前任一样，也曾经是沙皇的军官。〕

……

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中盘踞着不可靠的人，贫农委员会掌握在富农手里，党组织很弱、不可靠、脱离中央，党的工作无人过问，而且地方干部竭力加强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来补救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普遍的软弱无能。在党和苏维埃的工作普遍混乱的情况下，肃反委员会成了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唯一代表。③

……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69页。

② 同上书，第185页。

③ 同上书，第4卷，第190页。

皮尔姆和维亚得卡的党和苏维埃的报刊既不善于安排工作，又不了解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这些报刊上，除了关于“世界社会”革命的一些空洞词句外，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例如维亚得卡市苏维埃机关的四千七百六十六个工作人员中，有四千四百六十七人在沙皇时代是在省地方自治局中担任同样职务的。……^①

在关于改革的无数技术性和政治性的建议之后，又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特别的人民委员部来监督和检查各行政部门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接受，斯大林被任命负责这个新的人民委员部。

列宁明察秋毫地研究了那些函电。他对于批评托洛茨基的话并不完全相信。因此当托洛茨基因这些指控感到恼怒而提出辞职的时候，政治局一致通过决议，庄重地要求他继续留任。（斯大林曾经转弯抹角地要求撤换托洛茨基，这时却投票赞成这一决议。）但是，斯大林由于这无数次的视察，他作为一个极为干练的行政官员的名声就大大提高了。在他被任命为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之后一些时间，党内一位著名人士曾批评把过多的职务集中于斯大林一人，列宁对此回答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民族的代表都肯到他那里去详细谈谈问题的人。……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推荐不出第二个人。工农检察院也是这样。任务非常重大。为了善于进行检查工作，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②

^① 《斯大林全集》，第191—19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9页。

反对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战斗之后，又发生了俄波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斯大林是南部战线的政治委员。1920年5月，波兰军队在皮尔苏茨基元帅的指挥下进入乌克兰，并占领了基辅。皮尔苏茨基的胜利是短命的。他的军队碰到一个决定性的障碍，即碰到乌克兰农民的敌视。他们怀疑，波兰人如果胜利，就会在乌克兰农村建立波兰地主的统治。6月间，波兰人撤出基辅，被北面的图哈切夫斯基和南面的叶果洛夫与布琼尼穷追。经过一次闪电般的进攻，红军到达布格河岸。这条河大略地划分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居住的界线。应不应该渡过布格河把战争带进纯波兰领土并夺取华沙呢？这是一个在政治局中进行辩论的问题。列宁主张继续进攻，而托洛茨基赞成向波兰人提出和平条件。斯大林起初赞同托洛茨基的看法，但随后又站到了列宁的一边。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列宁希望，红军进入波兰后，就会刺激波兰工人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但是，他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波兰，而是在于当时正处于革命狂热状态中的德国。他的目的是去影响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之间的连结点。他想，西方共产主义还没有强大到可以依据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因此红军的推进就可能决定性地增强它的力量。他要“用红军的刺刀去探索欧洲”。^①这个主意同他先前不允许用刺刀尖把革命带到外国的警告是大相逕庭的。他的态度反映了他对于苏维埃国家继续处于孤立状态的失望情绪，而且是他企图打破这种状态的一个尝试。列宁的意见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他们象1917年那样，认为如果西方没有革命，俄国的共产主义

^① 克拉拉·蔡特金：《回忆列宁》，第19—21页。

就极少希望。在他们的政策之中潜藏着一种危险，就是严重地低估了波兰对于苏维埃国家入侵的抵抗，因为波兰人（包括波兰工人阶级）这时正处于民族独立的蜜月之中。

对于波兰人情绪的更清楚的认识，促使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都反对关于进军华沙的谈论。甚至在红军克复基辅之前，斯大林就在《真理报》上警告党：“波兰军队的后方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后方大不相同，这对波兰是很有利的。……波兰军队的后方是单纯的，民族方面团结的。……后方居民的普遍情绪——‘祖国情感’……在部队中造成了民族团结和坚定精神。……如果波兰军队是在波兰本土活动，和它们作战无疑是困难的。”^①在俄国开始发动攻势以后，他以更直截了当的话重复那一警告：“我认为某些同志所表现的那种骄矜和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是不切实际的。其中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前线的胜利，叫喊‘向华沙进军’；另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只是防卫我们共和国，使它免受敌人进攻，傲慢地说，只有打到‘红色苏维埃华沙’，他们才能罢休。我不想来证明，这种骄矜和这种自满是完全不符合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和前线敌人力量的情况的。”^②在作了这些清醒的警告之后，他却同那些“骄矜和自满”的人一块投票赞成发动攻势。反对进军华沙的托洛茨基和两个波兰人捷尔任斯基与拉狄克（著名的德籍波兰人，小册子撰写者，他已经参加布尔什维克）却遭到了失败。就象过去有些时候一样，斯大林现在又跟着他的导师的意见跑，而这次是违反了他自己较为正确的判断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87页。

② 同上书，第295页。

7月12日，他返回南线总部，那时整个战线已不可抗拒地向前推进了。在几个星期中，图哈切夫斯基的集团军就进到华沙的郊区。但是交通线危险地拉长了，士兵疲惫不堪，预备队已经耗尽。皮尔苏茨基得到法国魏刚将军的帮助，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南翼发动了反攻。苏维埃国家最高司令部命令南线部队的司令员叶果罗夫和布琼尼在华沙方向由南往北进攻，以便粉碎皮尔苏茨基的反攻。但是南线部队的司令员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想在图哈切夫斯基进入华沙的同时占领里沃夫。就象过去在察里津一样，斯大林不顾从中枢发出的命令，鼓励叶果罗夫和布琼尼突然向里沃夫发动进攻。于是战局就突然逆转了。波兰人在维斯杜拉河上获得了著名的胜利。到了这个时候，斯大林、叶果罗夫和布琼尼才改变主意，急速前往救援图哈切夫斯基，但已经为时太晚，红军从华沙溃退了。

接着就是关于这次失败应该归咎于谁的不可避免的争论。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责备南线司令部迟迟不肯把进攻方向从里沃夫转移到华沙。斯大林重复他已经为人所熟知的指责说，托茨洛基和最高司令部没有能够在战线后面增强有力的预备队。双方公说公理和婆说婆理，虽然失败的主要原因与其归咎于攻势中的错误，到不如更多地归咎于深入波兰的那个决定。^①

^① 列宁在他同克拉拉·蔡特金的上引谈话中承认了他的错误。托洛茨基的观点见《我的生涯》，第439—444页和《斯大林评传》，第328—330页，斯大林主义者的观点见伏罗希洛夫的《列宁、斯大林和红军》，第58页。还可参看沃伦堡的《红军》，第121—148页。图哈切夫斯基的观点见他的《阶级战争》（第50—60页）中一篇有趣的文章《从无到有的革命》，以及他对于1920年战争的若干演说。这些东西的波兰译文，作为附录载于皮尔苏茨基的《1920年》，它就象西科尔斯基的《在维斯杜拉河和伏克拉河上》，从波兰官方的观点分析了这次战争。

* * *

在波兰战争结束和迅速救平弗兰格尔男爵的白军（他的部队被从克里米亚的佩里科普地峡赶下海去）之后，俄国终于获得了和平。苏维埃政权这时已经巩固，执政党的地位稳如泰山，领袖们都在夸耀自己的胜利。但是整个国家却残破不堪，饥馑和瘟疫流行。

由于一再发生的紧急情况，使得执政党的行动与初衷相违，矛盾重重，力不从心。布尔什维克曾经保证要废除警察和常备军。但现在政治警察（“革命之剑”）却象斯大林在皮尔姆的报告中所说的，在全国很多地方“成了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唯一代表”。起初，布尔什维克企图对反对派表现出容忍态度。在苏维埃和工会的各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发言人都能自由而严厉地批评政府。言论自由虽然受到一些限制，却还是很广泛的。执政党内继续能够进行公开的争论，各种意见都要经过充分而认真的讨论，而不宽容任何权威。党员能够自由地组成集团和派别，以便在党内设法通过自己的观点。各个集团和派别也没有极明确的分野，它随着所发生的事件和问题而变动不定。即使在内战高潮时，这种自由精神也还存在，而且一直延续到1920年。到了斗争的最后阶段，当胜利实际上已确有把握时，这种自由精神才开始消失，即使是执政党，也发现它的自由因受到限制和强迫而被禁囿了。

造成这种奇怪状况的原因是，这个政权最严重的危险只是在内战最后一枪响了之后才来临的。这场革命已经粉碎了它的

敌人，但也损失了它的大多数朋友。为了供应饥饿的城市和保证军队的给养，政府无情地没收了农民的粮食。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有秩序的没收是很容易地蜕变而为直接的抢掠的。农民在1918到1919年时曾保证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到了1920年时却转而反对它了；而且他们越是坚信地主和白匪将军们的政权已经崩溃，就越是坚决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农民暴动遍及整个国家。这个政权也不能肯定会得到产业工人的支持了，而产业工人却曾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积极支持者。这个专政正是以他们的名义实行的。但是他们的队伍剧烈地削弱了。他们之中最奋发有力和最富于理想的人已经死去。残存的人已经疲惫不堪，而且由于饥饿、失业和使卢布贬得一文不值的通货膨胀而陷于绝望的境地。工业生产只及正常年份的五分之一弱。^① 钢铁工人只生产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五。在那些由于奇迹才维持着生产的大小工厂里，工人们得到的是实物工资，然后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用这些实物去换取粮食。产业工人阶级已经变成了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它完全脱离了有秩序的工业环境，被投入充满混乱的黑市中去。“无产阶级专政”多少是巩固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本身已经不再成为有阶级意识的分子和有组织的因素。

为了使工业能够生产，政府逐渐实行劳动的军事化。起初是把一些暂缓投入战斗的军队用来进行伐木、运输油料和粮食的工作。他们被组织成为“劳动军”。这是托洛茨基出的主意。

^① 见托洛茨基的《被出卖了的革命》，第28—30页。还可参看《工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79—86页中李可夫的讲话；L·克里茨基：《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149—162页。

斯大林作为乌克兰战线的政治委员，也就成为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主席。后来这个方法又被以更大的规模和相反的意义使用：不仅应征入伍的士兵用来进行工业劳动，而且产业工人也象士兵一样被征召来从事劳动。1920年，托洛茨基在工会代表大会年会上鼓吹劳动军事化。^① 尽管孟什维克反对，工会仍同意作为军事化的代理人来进行活动。这样，党原先答应废除常备军，现在却把劳动人民转变成为一支军队了。

在内战期间，政府也别无他法可想。但是后来统治者却把它视为非做不可的事情。他们要求人民接受这种做法，不是作为一种紧急措施，而是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生活方式和苏维埃社会的高度文明。这就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主要错误观点。当列宁和托洛茨基辩解说劳动军是社会主义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时，布哈林也赞美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把这说成是没有货币的真正共产主义经济的先兆。^② 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明确地意识到俄国从半封建状况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复杂性，因而在国有化大工业时有意地放慢速度和采取谨慎步骤。现在的这些想法同这种谨慎态度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但是在内战的气氛中，执政党似乎已经抛弃了它原来的现实主义，改而采取一种顽固的和堂吉诃德似的热情来实现它的乌托邦。正如卡尔·拉狄克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希望手里拿着枪，抄小路强行进入完全无阶级的社会。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有了军事命令的习惯。而且即使在碰到军事命令无法应付的经济和社会混乱时，也坚持这种习惯。

^① 《工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87—95页。

^② 这是布哈林在其《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货币》中表示的观点。

1921年3月，全国不安定的情绪突然被喀琅施塔得叛乱所点燃，它恰好发生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列宁说，这一闪电比任何东西都更好地照亮了现实。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讽刺，发生暴乱的地方恰恰是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坚强堡垒喀琅施塔得。白卫军的同情者、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还有布尔什维克，都肩并肩地对红军部队战斗；这支红军部队是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下，跨过冻结的芬兰湾，前来镇压叛乱的。这次叛乱在执政党中引起的惊惶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在接到叛乱爆发的消息后，代表大会中断了辩论，并派出大多数的代表去参加对喀琅施塔得的进攻。内战中任何一次危急的关头都没有引起象这次那样的惊惶。^①

喀琅施塔得叛乱者要求结束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并恢复由苏维埃产生的真正的政府，就象布尔什维克过去曾经答应过的那样。他们还要求结束经济和政治上的压迫。他们的领导人有些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共产党人；他们的口号是从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早期所提出来的那些口号中借用过来的。尽管这次叛乱具有极左的色彩，但它却在已失败的反革命队伍中激起了希望。这个专政已经达到在其他革命中已为人所熟知的一点，即当革命打败了旧制度的拥护者之后，它却驱使右派和左派、保守派和革命派走到一个共同的顽强的反对派中。一时之间，在列宁的眼前必定出现这样的阴影：在欢乐的巴黎平民中隆隆地滚过了死刑犯的囚车，贵族把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

这次叛乱被救平了。从这以后，列宁得出了下面的结论：我们已经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保证有足够的基地……群

^① 托洛茨基：《被出卖了的革命》，第96页。

众都已经感觉到我们还没有自觉地阐述过的东西……这就是，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形式，纯社会主义分配，是超过我们的力量的，而且除非我们证明能够实行退却，并限于去做容易一些的工作，我们就将有毁灭的危险。于是战时共产主义制度被废弃了，代之以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建立了一种混合的经济。大规模的工业和运输业还是国有的。在中小工业和商业中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外国的康采恩被邀请来俄国重新营业，甚至在大规模的工业中也被容许。在农村中没收粮食的做法停止了，代之以普通的农业税，起初是实物，后来改为货币。随后，卢布也稳定了。这些彻底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差不多不存在了的工业，重新用工业品去交换粮食和原料，一句话，靠私人资本的帮助，重建一个能起作用的经济。国家除了拥有大规模的工业外，还从总的方面控制了经济。

在这种体制中，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和私营“部分”，彼此在商业基础上进行竞争。人们希望，在这种竞争中，社会主义部分将逐渐扩大，而私营部分将逐渐缩小。按照列宁的观点，由于大工业对小企业的优势，由于政府对社会主义部分实行温和的保护政策，社会主义最终的胜利是很可能的，虽然还不是肯定的。然而，这场竞争实质上将是和平的和真正商业性的。社会主义必须证明它在一场经济竞赛中能够站住脚。这一规划中的若干关键地方自然还是模糊的或空洞的；因而在这些关键地方的争论就成为列宁逝世后争夺权力斗争的一个部分。斯大林对于新经济政策原先的规划毫无贡献，它全部是列宁的创造。他对这种政策的通过也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这一改革是受到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刺激而实行的，事先并没有进行过辩论。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域中进行了另一个比较不惹人注目的行动，而这一行动的含意，即使对当事者来说，也还是不清楚的。当经济上的专政大大放松时，政治上的专政却紧起来了。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反对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被最后查禁了。第二步就是禁止在执政党中组成任何反对集团。布尔什维主义这时已经不知不觉地、几乎是暗中摸索地走到了后来被称为集权国家的门限前。我们需要暂时停一停，再一次考虑一下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并分析一下它的领袖们的要求和动机，以便获得一个线索，来理解苏维埃国家今后的发展和斯大林随后的高升。

在执政党内禁止组织反对集团的决议，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工会在苏维埃制度中的作用进行了激烈辩论之后通过的。这一场大争论发生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前夕，争论中出现了三四种观点。由前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和亚历山大娜·柯仑泰领导的工人反对派要求国家的工团主义化，即把一切经济权力转交工会。十分奇怪的是，工会的领导人托姆斯基和鲁祖塔克却不是工人反对派的领袖；这是因为它并不表达工会领导人的愿望，而是表达了许多布尔什维克一般成员对党的经济专政的不满。这个反对派批评了不断发展的经济官僚体制，以及它对工人权利和利益的粗暴对待。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仑泰争辩说，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直接代表，应该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和领导负责，而且工会应该加强成为同政治局和政府（两者都由同样一些人统治着）相抗衡的力量。^①另一个对政治不满的集团是

^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41，54—55页。还可参看亚·柯仑泰：《俄国的工人反对派》，第31页。

“民主集中派”，它采取同样的观点，指责党的领导鼓励“官僚集中主义”。^①这个集团的主要要求是在苏维埃内和党内的自由，它在许多方面来说都是后来更有影响的反对派的前驱。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极端的“官僚集中主义”是由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代表的，他们要求工会合并入政府机器内。托洛茨基指出，工会已经陈旧到失去了原先的作用。这个国家是工人的国家。按照定义来说，政府就代表了无产阶级的一般的和共同的利益，以区别于工会一贯维护的各种工人集团的部分利益。工人的部分要求不应该反对他们共同的和一般的利益。工会现在应该同政府合作来实现政府的经济计划，而不是捍卫个别工人或工人集团的利益以反对工人国家。当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仑泰希望国家和党把经济权力交给工会时，托洛茨基却要求工会放弃它的独立性，向国家和党投降。^②

列宁得到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十二名中央委员的支持，企图维持住平衡。他否定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关于由国家吸收工会的要求。他说，严格讲来，苏维埃国家还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它代表了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此外，它还“带有官僚主义弊病”。他漂亮地利用他的辩证法说道，工人必须捍卫这个国家，但是他们也必须通过工会来捍卫自己，防止国家的侵害。因此工会对国家应该说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且，工人对工会也应该有某种独立性，他们有权参加或不参加工会。

但是，主要的斗争并不是发生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他们两人共同反对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因为对党和政府最

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339—341页。

② 同上书，第192—194页。

直接的威胁来自这一方面。由于这种威胁的严重性，使得列宁的攻击也十分厉害。他把反对派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把他们的言行说成“是一种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存在直接的的政治危险”。^①这就是禁止党内反对集团的起因。照列宁看来，工人反对派的危险性倒不在于它对工会的特别看法，而更多地在于它暗中要使党的作用比以前更加温和。列宁半心半意地企图使这种禁令缓和一点：党员还能够在“讨论专页”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有些反对派的主要发言人还被重新选入中央委员会。但是当他说服代表大会提出“宣传这种思想〔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是同俄共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②时候，他又亲自消除了这种自由姿态的影响。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开除那些在代表大会上当选的领导人，因而那些刚刚重新获选的工人反对派发言人的头上又响起了皮鞭声音。三个能干的、有教养的和有独立精神的党的书记克里斯廷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由于倾向或宽容这个反对派而被撤了职，由象莫洛托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那样“可靠的”人接替。这些新的书记都是斯大林的密友。托洛茨基投票赞成这个禁令，他没有料到这个禁令有一天会成为他自己那个反对派的陷阱。

一党统治苏维埃国家的思想根本不是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所固有的，更不用说只许一党存在的思想了。托洛茨基写道：禁止其他党派，“显然是同苏维埃民主的精神相违背的”，而且“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原则而只把它当作为了自卫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5页。

② 同上。

的一时之计”。^①象这样一个一向不禁止内部争论的党，却禁止内部的反对派集团，这是大大违背了它由来已久的习惯的。党现在偏离了它本身的性质。当它企图去表白自己的时候，它就陷入不能自解的境地。

在内战接近结束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同曾经支持过它的那些阶级发生了冲突。农民和工人的不满情绪，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表达出来；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这时是令人信服和有效的，不象 1917 到 1919 年那样的毫无效果。如果苏维埃民主的机制能够起作用，如果苏维埃能够自由地选举和自由地选择政府，那末它几乎肯定会把布尔什维克赶出政府，并使它曾经抛弃的那些党派重新掌权。布尔什维克决心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看来，只有革命的党掌权，革命才能安全。他们近来的一切经验都使他们坚信这一观点。革命之所以获得胜利，正是不顾和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怀疑、动摇和阻挠的，社会主义温和派是没有勇气和力量去进行一场内战的。照布尔什维克看来，如果温和派重新执政，这不过是一个幕间的插曲，最后就是白卫军的重返和旧制度的复辟。诚然，由于精疲力尽，群众现在是愿意孟什维克或无政府主义者重新回来的，但是难道能够容许群众危害整个革命工作吗？当苏维埃几乎肯定要利用它的权力来复旧的时候，难道能够容许它自由行动吗？这种局势正如但丁所说的：“人民大声呼喊：‘让生者死，让死者生！’”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是不愿意听取这样的意见的。

^① 托洛茨基：《被出卖了的革命》，第 96 页。

不过，当人民不满情绪的代言人被取缔和窒息时，不满情绪照样在流行。各个阶级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同农民利益的冲突，也并不因为镇压了他们的代言人而不复存在。这时作为政治战场上孤独的胜利者，执政党本身的思想也开始受到挫折和不满情绪的侵袭。党内时而这个部分时而那个部分开始发出类似的不满和抱怨。国内存在着的分裂威胁着要使迄今由于铁的纪律而维系在一起的执政党发生分裂。为了避免这些讨厌的影响，不得不使党的感觉迟钝了，视野模糊了，听力减退了。新经济政策的改革，看来使得这一切更显得十分紧急。在经济领域中既然允许资本主义集团和利益在新的范围内存在，但在政治领域中却又没有留下什么党派来代表它们。它们自然就要寻求表达的渠道，自然就要在唯一存在的党内寻求这种渠道。只有绝对的隔离，才能使党免于分裂成为无数敌对的派别。

但是，党这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无异于缘木求鱼的。为了挽救革命的战果，它不得不镇压国家政治生活中自发的律动。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党又使它的身心遭到损害。从这时起，党员都害怕表达那种按照分析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反映“异己阶级压力”的意见。只有最高当局才能决定什么意见是布尔什维克的和无产阶级的，什么意见则不是。意识形态的事成为神秘莫测的东西；而政治局就成为革命智慧的唯一储藏所。大多数领袖都逐渐失去对他们追随者感情的接触，因为思想的交往只是单向的——从政治局而下的。党也就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官僚主义的机器。的确，由于对革命关心，迫使布尔什维主义采取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的道路；但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也的确越来越失去它原先的本质。为了挽救革命，

党已不复是一个独立的、批判的和勇敢的革命者的自由联合。它的大部分成员都屈服于权力越来越大的党机器。这是毫无别的办法的。那些掌握了这个机器的杠杆的人和同它密切相关的人，那些在教养和气质上同这个新机器的观点相投的人，就自动地成为这个新时代的领袖。行政官员开始排挤理论家，官僚主义者和委员会人消灭了理想主义者。在这种演变中，谁还比斯大林这个委员会人中的佼佼者更得益和更强烈地赞成这个演变呢？

事情的这种趋势并不是很快就变得明显的。它在矛盾的之字形中逐渐发展，总是和早期习惯的惰性不一致。行政官员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分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行政官员中不乏理想主义；理论家最初是欣然投向官僚主义者的，甚至还在提倡新纪律中同他们竞争。因此，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理论家托洛茨基甚至因其大大超过了官僚主义者的愿望，而使最坚定的官僚主义者都为之愕然，并且使他自己相当地失去了人心。在列宁的身上，不同的性格是差不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十分理想地适宜于统率他的党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他在道义上的权威，使他能够暂时在各种冲突倾向之间实现短暂而动摇不定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在他逝世以后注定是要崩溃的。但是，即使在他生前，官僚核心的力量已在逐月地不断增大（虽然是不易察觉的），而斯大林在这个核心中的作用也在同样地增长着。

第七章

总书记

斯大林权力的积累。——他作为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的作用。——他在政治局中的地位。——斯大林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2年4月3日）。——总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斯大林领导第一次“清洗”。——列宁患病。——斯大林同格鲁吉亚反对莫斯科命令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冲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重提。——斯大林是1924年宪法的作者。——他同列宁的冲突。——列宁的遗嘱。——列宁攻击斯大林作为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的工作（1923年1月至2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成功。——三人执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1923年的争论。——三巨头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列宁主义崇拜的根源。——列宁逝世（1924年1月21日）。——斯大林对列宁的效忠宣誓。——列宁关于解除斯大林职务的遗嘱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1924年5月）。——季诺维也夫拯救了斯大林。——斯大林在二十年代中期的侧面象。——他对敌手和伙伴的策略。——1924年秋的“著作辩论”。——斯大林保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反对托洛茨基。——斯大林反对“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1924年春）。——同年秋他改变了想法。——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心理背景。

列宁还在世的时候，斯大林就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惊人的权力，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还是罕见的。内战结束后两年，俄国社会已经实际上处于斯大林的统治之下，虽然人们还没有完全

知道这个统治者的名字。更为奇怪的是，他是被他的敌手们选入和任命来担任所有这些职务的。在他后来反对这些敌手的斗争中，将演出许多阴暗的戏剧。然而这种斗争只是在他紧握了一切权力和他的对手警觉到他的作用而企图把他从统治地位中排除之后才发生的。但是到了那时，他们发觉他已经稳如泰山了。

内战之后他立即担任三个最重要的职务：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处理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近一半人口的事务。在一亿四千万居民中，有六千五百万人属于非俄罗斯民族。他们处于文明的各个阶段，从乌克兰的半欧洲生活方式直到二千五百万土库曼牧羊人的原始部落生活。白俄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塔吉克人、布利安人和雅库特人，以及英语中叫不出名称的其他人群，处于部落村社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各中间阶段。布尔什维主义急于吸引住这些民族，并消除对沙皇压迫的记忆，因而给所有这些民族以自治的地位。这些集团中很少有任何程度的“民族”觉悟，更少的民族具有自治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教育程度。为了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就得依靠外来的帮助，也就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对他们大多数来说，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就好象爱因斯坦的理论对于布哈拉汗那样的遥远。在他们的土地上，革命就意味着从埃米尔、汗和毛拉统治的原始公社中解放出来，达到一定程度的欧化。

除了乌克兰是在由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领导的具有独立思考的政府治理下之外，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面对的主要是俄罗斯广垠的、懒散的东方边缘地区。大多数的领袖都是在西

欧度过成年阶段的，他们没有一个能够象斯大林那样适宜于做这个部的头头。他对他的臣民的风俗习惯有无与伦比的第一手知识，他处理这种复杂的“政治”的能力也是无人能够超越的。这种“政治”是血亲复仇和东方阴谋同一种走向现代文明的真正要求相混合的东西，而他的态度也恰恰是耐心、家长式的坚定和必要的狡诈相结合的。政治局信赖他的这种态度，不去对他进行干涉。

亚洲和半亚洲的边缘地区于是就成为他的第一个无可争议的领域。紧接革命之后，骚乱而激烈的欧俄城市（首先是彼得堡和莫斯科）居于全国的领导地位，那些边缘地区的分量是无足轻重的。随着革命低潮的到来，那些原始的地区就一反旧态了。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重新坚持自己的权利。它们的思潮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决定了全国的观点。这种思潮大部分是东方式的，而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斯大林如此适合于代表俄国共产主义向东方边缘地区民族发言，他也就非常适合于来使他的党东方化。在他任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年代里，他广泛地同边疆地区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进行接触，他能够指望得到他们的衷心支持，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后来也就成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随从。

在季诺维也夫的建议下，他于1919年被任命为工农检察院的人民委员。这个部门的建立，是为了监督从高层到低层的政府各部门，以消灭苏维埃文职官员从沙皇前任那儿继承下来的颀顽无能和贪污腐败这两个重要的缺点。它是整个摇摇欲坠和嘎嘎作响的政府机器的严厉而开明的检查员；它揭露滥用职权和文牍主义；为政府各部门训练可靠的骨干分子。这个人民

委员部通过工人和农民的小组来进行活动，这些小组能够随时自由地进出任何人民委员部，监督那儿的工作。到了后来，工农检察院的小组能够定期参加各部的秘密会议，甚至参加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设立这个制度是为了训练公职人员的骨干，但其结果是，工农检察院能够监视政府机器的每一个组成部分。^①

这个稀奇古怪的检察制度是列宁的得意之作。他被公职人员中的颓废和不忠所激怒，企图用极端而无情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办法来根治它们，而工农检察院就将成为一个合适的手段。选择斯大林来担任这个职务，说明列宁对他高度信任，因为工农检察院将是一种超政府的机构，它本身不能沾染任何官场的污点和瑕疵。

列宁的这个治疗办法证明是无效的。正如列宁所经常指出的，文职人员的这些缺点，反映了整个国家惊人地缺乏教育，物质和精神生活极为贫困，它至少要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渐根治。为了使自己（更不用说使别的部）超然于俄国官僚主义黑暗之谷，工农检察院必须是一个天使的人民委员部。列宁由于深信工人阶级所固有的美德，所以呼吁工人们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官僚机构。但是，这个官僚主义的磨坊使工人自己也变为官僚分子了。正如列宁后来发现的，工农检察院已经成为混乱、腐败和官场阴谋的又一个来源地。到头来它变成了所有行政机构的非正式的而却是无事不管的警察。但是我们不必去详细叙述这些情况，只消说一说这点就够了：斯大林作为工农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23—29页；季诺维也夫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162—163，501，225—226和290—291页；《工农检察院概要》。

检察院的负责人，比其他人民委员都更密切地控制整个政府机器，即它的工作和人事。

他再一个有利的地位是在政治局。在整个内战期中，政治局只有五名成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自从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联合破裂后，这个政治局成为国家的实际管理者。列宁是政府和党公认的领袖。托洛茨基负责指挥内战。加米涅夫在各方面都是列宁的副手。布哈林负责出版和宣传。对于党的日常管理工作则属于斯大林。政治局是讨论重大政策的地方。另外一个机构是组织局，它同政治局一样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负责党的人事工作。它可以按照内战的需要，在整个军队和行政机构中召集人员、指导工作和分配工作。从1919年初起，斯大林就是政治局和组织局之间唯一的常设联络员。他保证了政策和组织之间的团结一致；也就是说，他按照政治局的指示，调度党的各种力量。他不象他的任何同事，他全身心地投入党日常的枯燥工作和它的一切内部阴谋中。

在这一阶段，他的权力已经令人生畏。1922年4月3日，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权力就更加增长了。党的十一大刚刚选举了一个扩大了的新中央委员会，并重新修改了党章。这时党的领导机构非常臃肿，设立总书记一职，就能在许多不断发展和叠床架屋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据托洛茨基说，正是在这个场合，列宁曾经在内部圈子中对斯大林的候选资格表示担忧说：“这个厨子只会做带辣椒的菜。”^①但他的怀疑无论如何还是不严重的，而且正是他自己最后赞成了这个“厨子”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涯》，第450页。

的候选资格。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被指定为斯大林的助手，前者早已经是党的书记之一了。这个任命在俄国报纸上不事张扬地进行了报道，因为是把它作为党内生活的一件小事看待的。

不久以后，党的最高层就开始发展一种潜伏着的双重权威。现在是七个人组成了政治局（除了前述的五人外，新近又选举了季诺维也夫和托姆斯基），它代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智慧和精神。但是总书记却有着管理和指挥的更多的物质权力。从名义上说，总书记从属于那个辉煌而崇高的政治局。但是政治局依赖总书记到了这样大的程度：如果没有这个靠山，政治局就越来越象尴尬地悬在空中的楼阁。总书记为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准备议程，为每一个辩论的问题提供文件。他把政治局的决议转给下级机构。他同首都和地方的千千万万机构保持日常联系，负责它们的任命、提升和黜退。他甚至能够在任何问题提交辩论之前就影响政治局的观点；能够根据总书记的口味，歪曲政治局决议的实际执行。在任何政府中都存在类似的一些机构，但很少获得这种独立的权威。为了防止它们超越自己的权限，通常在整个管理制度中实行一定的权力分散，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控制，以及有时要求行政官员表现忠诚老实。但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面，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控制。最后而不是最不重要的，总书记个人野心勃勃。而所有这些，就使得总书记一职才设立几个月之后，他就开始具有异常大的势力。

如果不提一下另一个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那末这幅图画还是不完整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赫然耸立于布尔什维克的事务中。它对党的作用，就如工农检察院对政府机器的作用，就是

说，它是审查党内道德的。它是1921年十大上应工人反对派要求组成的，而这次代表大会在其他方面对待工人反对派却十分严厉。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所谓的清洗工作。这也是十大应工人反对派要求而发动的。他们原打算定期清洗为数甚夥的见风使舵的党内冒险家，整顿那些习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共产党员，以及那些权迷心窍的人民委员。列宁同意这一主意，并打算利用它来制止他的追随者脱离党的清教徒标准。但是他也把清洗的另一面刀刃用来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动摇者、怀疑者和执不同政见者，即反对那些新实践的发起者。

清洗的程序起初同后来所变成的那种样子十分不同。清洗与司法完全无关。它们是在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公开的公民法庭上举行的，不论布尔什维克或非布尔什维克都能自由地参加。从最有势力的到最卑微的党员，其行为都要受到公众的严厉审查。男女听众都能自愿作为证人。凡是工作被发现不能令人满意的布尔什维克，或者受到谴责，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被开除出党。监察委员会不能对他们加诸比这些规定更为严厉的惩罚。

清洗的原来动机几乎是堂吉诃德式的。它想使人民能够定期地在他们统治者的头上响一下鞭子。但是由于执政党认为政策的一切实质问题并不能真正地让群众监督，所以这些恢复群众监督的新办法就注定了是毫不相干的东西，不能不是无效果的。它们只说明党内那个早已熟知的两难问题：党在不断地脱离人民，却又急切地希望保持人民的性质。在列宁政治活动的最后两年中，这个两难问题构成了他在党内进行可悲实验的基础。清洗将代替真正的选举，它使一些腐化的成员离开政权，

却又无损于党。^①

在莫斯科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很快就变成了全国清洗牺牲者的最高上诉法院。开始时，它是独立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之外的。后来它被赋予和中央委员会差不多平等的地位，两个机构经常举行联席会议。总书记是它们之间的协调人。因此，斯大林就非正式地成为了清洗的主要领导者。

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在更小程度上的托洛茨基，都赞成斯大林拥有这些职务。因为对于政治局中那些聪明伶俐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这些职务是很少有吸引力的；他们的才华表现在理论问题方面，他们的政治分析力很少应用于工农检察院或总书记这些岗位上。在这些岗位上所需要的是巨大的工作能力，能够进行艰苦而平凡的劳动和耐心而持久的组织工作。斯大林的同事中没有一个对他的任务艳羡。只要列宁仍在管理政府，他们就把斯大林看成不过是列宁的助手而已；而他们所有的人都欣然接受列宁的领导。他们或列宁都没有及时注意到这种微妙的变化：斯大林逐渐从助手的角色变为第二把手。

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后不到两个月，列宁就不能再管理政府了。1922年5月底，他的动脉硬化症第一次发作。他几乎失去说话的机能，从克里姆林宫被送到莫斯科郊外。直到这

① 清洗掩盖了一切形式的公报私仇。列宁于1922年5月写信给斯大林说：“……大多数地方审查委员会在清党过程中有个人和地方挟嫌报复的行为。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也是十分突出的。”在同一封信中，列宁抱怨党人缺乏足够的法律教育，不能抵抗这些纯粹地方的影响。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27页。

年仲秋，他才恢复到足以重新办公的程度；但此后他的活动时间就很短促了。这一年秋末，疾病的第二次发作使他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到了冬末，即1923年3月，第三次发作使他最后脱离了政治舞台，虽然在1924年1月21日以前，他还一直同病魔进行着搏斗。

列宁患病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影响的确很大。整个星座差不多立即因主星失明而黯然无光，或者脱离了平常的轨道。列宁的信徒和仆从（只有托洛茨基不属于这两类人）开始感到自己独立的存在，他们逐渐地抛弃了那些仅仅是模仿而来的特点，即他们第二种较好的天性。列宁对他的追随者有过压倒一切而又经常不断的影响，现在其消极的一面突然变得非常明显了。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可以从托洛茨基证实的这一情况看出：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跟着他们的导师学徒期间，他们甚至学会了列宁的笔迹。他们现在继续在模仿他的笔迹，却没有他思想上的那种光华。

比起其他同事来，斯大林有一种比较不太依赖列宁的感觉，因为他在知识上的需要比起其他人来是有限的。他的兴趣在于实际利用列宁主义的一些小装置，而不是列宁主义的整个思想试验室。他这时的行为是由他已经控制的这一庞大政治机器的情绪、要求和压力来决定的。他的政治哲学归结为通过最灵活和最方便的办法来保证对这一机器的控制。在一个极端独裁的政权中，镇压往往是一种最灵活和最方便的行动办法。由于列宁的消失，政治局可能会发生混乱，但总书记处却不会。恰恰相反，由于它不再考虑那位警惕而精明的监护者的意见，它干起来就更加坚定和自信了。工农检察院的情形也是一样。总书

记处和工农检察院都曾遭到托洛茨基的批评，他还提议完全解散后者。^①但是这个建议只引起了政治局委员们的一片愤怒，因为这个机构毕竟是得到列宁同意的。托洛茨基对总书记处的批评也没有产生效果。那位总书记知道如何根据党章来为镇压不满的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行动进行辩护，而这个党章正是由列宁建议和托洛茨基支持而在十大和十一大修改过的。他小心谨慎地把他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解释为由于执行以前共同决议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他把他的朋友、心腹和追随者，即巴库和察里津那一班人，安排到各个职务上去。一些遭到贬黜的不满分子向政治局申诉，托洛茨基受理了这些案子。斯大林对此回答说，按照共同同意的分工，政治局是通过重大政策决议的，总书记处和组织局则负责党的人事工作。政治局对于托洛茨基吹毛求疵的批评最后也感到厌烦了。

对于斯大林行为的最严重的指控来自他的家乡格鲁吉亚。我们在这里必须简略地叙述一下这一冲突的来龙去脉。在1921年2月以前，格鲁吉亚是由一个孟什维克的政府统治着，虽然高加索的其余地区已经逐渐归于苏维埃的统治。莫斯科多少容忍了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政权，但由于斯大林在“麦撒墨达西”时的老对手约尔丹尼亚和拉米什维里统治着梯弗里斯，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恼怒。政治局在等待时机，它坚信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在苏维埃化的高加索中是坚持不久的，因为它要依靠高加索供给粮食和燃料。孟什维克政府的威望事实上也减弱了。但是斯大林的耐心甚至减弱得更快。1921年2月，红军的一支部队从北高加索攻入格鲁吉亚，迫使孟什维克政府逃走了。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346—347页。

的确，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民族主义也不是真正的货色。不论是在沙皇还是克伦斯基统治下，他们大多数人提出的独立要求，只不过是俄罗斯联邦范围内某种程度的自治。在克伦斯基统治时，他们剧烈地反对任何边疆地区同俄罗斯分离，不管是芬兰还是格鲁吉亚。他们的爱国主义新花样不过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形式而已。但是，红军的入侵却遭到了格鲁吉亚高地居民的怨恨。斯大林三年前曾向芬兰人保证说：“不应该对芬兰人民实行任何托管和任何来自上面的监督！”现在他却发出入侵格鲁吉亚的命令。他的老朋友塞尔哥·奥尔忠尼启则是入侵部队的政治委员。这次战役的准备工作，直到最后一刻都向军事人民委员保密，但是到了最后时刻，这一动议受到了列宁和政治局的支持。政治局被通知，梯弗里斯爆发了共产党人的起义，红军只消给起义者一点帮助，就能使起义胜利；如果让起义者孤军奋斗，获取胜利的代价就可能更大了。梯弗里斯的确发生了共产党人的起义，但是它还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足以赢得胜利。^①

斯大林还没有来得及对他的孟什维克同胞复仇到底，就卷入了同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的争吵中。在入侵后几个月，他到梯弗里斯去指导党的高加索委员会的工作。1921年秋，他得到列宁的支持，提出了成立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主张。^②但是这个主张在梯弗里斯并没有引起多少热情。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宁愿他们的国家继续是一个真正的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同一个广泛的全俄罗斯联邦保持松散的联系；他们不愿放弃主权而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26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50页。

去赞成一个更为接近的区域性的高加索组织。

要判断这场争论的是非是困难的。在高加索，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之间充满了血亲复仇的情绪，而他们所有的人又在不同程度上反对俄罗斯人。哥萨克人、车臣人、沃舍梯人和其他一些较小的高地民族在互相残杀，斯大林企图把他们转移和定居下来，以便制止这种残杀。^①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他大规模地把这个办法实施于乌克兰人、波兰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情况很可能是，反对高加索联邦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袖布都·穆迪瓦尼和菲利浦·马哈拉泽，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习染了“地方民族主义”。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感到，在血亲复仇的炽烈气氛中。高加索联邦是无法存在的。他们也可能是要求比表面上的独立更高的东西，特别是在孟什维克统治三年期间，他们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国家地位之后，格鲁吉亚人已经半熄灭的旧怀乡病又重新成为一种活生生的和很得人心的情绪了。这种情绪曾受到入侵的损害，又受到莫斯科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和政治警察中俄罗斯特务的活动的再次损害。政治警察是派到梯弗里斯来“肃清”当地孟什维克的。有些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曾经抗议对孟什维克的迫害，他们仍把孟什维克看成是老同志，尽管在孟什维克统治下，他们同孟什维克发生过分歧并遭受过迫害。

所有这些新的政策，唤起了老格鲁吉亚对俄国统治的恐惧。这些政策的鼓吹者本身是一个格鲁吉亚人，他用本地语言向梯弗里斯的群众讲话，这倒是关系不大的事情。问题在于他是代表莫斯科讲话的。由于那个老的朱加施维里还活着，而且成为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53页。

克里姆林宫的显贵，这使事情更不好办了。中央政府任何一个别的特使，对地方争端都会持保留和超然的态度。斯大林却很快就深深地陷入地方感情和对他青年时代的回忆中。他再一次成为几乎是被“麦撒墨达西”中的小资产阶级多数派赶出梯弗里斯的那个失意的激进派了。当他作为朱加施维里在离那所老正教中学几百码远的地方来算陈年老帐的时候，他却因为他是斯大林而要求得到敬意。他当然是得不到这种敬意的。

1921年7月6日，他在梯弗里斯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①攻击了他的对手。他描述格鲁吉亚作为一个“孤立的”国家将会遇到经济困境，而如果同高加索其余地区合作将会得到好处。他说，格鲁吉亚将从巴库无偿地得到石油。高加索各共和国还将从俄罗斯得到数百万金卢布的贷款。在提出这些礼物时，他继续攻击“地方民族主义”。他说，他感到惊奇的是，高加索的地方民族主义极其盛行；这同他在高加索时工人阶级“一片兄弟般团结的景象”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格鲁吉亚共产党员的下一任务就是“同民族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他们必须“肃清民族主义残余”，“消灭民族主义这条九头蛇”。党必须清洗队伍中的地方爱国主义者，不应该害怕进行清洗。俄国母党只有七十万党员，如果它只追求数量而不顾质量，它是能够很容易地增加到七百万的。正是由于注重党员的质量，俄国党能够进行革命和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切攻击。因此它是值得仿效的一个榜样。

从格鲁吉亚纯地方的观点来看，斯大林对于“民族主义分子”的谴责，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是有道理的和正确的。如果这些话出自一个地方领袖之口，听起来就不以为怪了。但是由于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1—80页。

斯大林是代表莫斯科说话的，因而他所说的话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色彩。在沙皇时代，边疆民族的一切重大事务都是由俄国中央政府决定的。人们怀疑这次革命是否使这方面有了任何真正的变化。格鲁吉亚人比任何人都更多的理由表示怀疑，如果说不是讽刺的话。斯大林目前对格鲁吉亚人错误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训诫，反而使他们更加玩世不恭了。这就仿佛是英国的一个阁员在对都柏林的听众讲话，尽管英国长期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他却申斥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九头蛇”。即使这位大臣是爱尔兰的血统，即使他在代表已经宣布完全解散大英帝国的一个英国革命政府讲话，他的讲话仍然会引起不愉快的感觉，特别是如果他是在英国刚刚进行新的入侵之后来讲这一番话的。这大约就是斯大林在梯弗里斯讲话的效果。

虽然缺乏支持，斯大林仍然泰然自若，命令奥尔忠尼启则清洗党内反对联邦的人（即地方爱国主义者）和对孟什维克表示同情的人。没有必要进行野蛮的镇压。只消把某些“地方爱国主义者”开除出党，并把那些愿意接受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人塞进各种大会中去。那些动摇不定或仅仅有些怀疑的人，当他们听说政治局已经一致批准了成立高加索联邦的主张，就都服从命令了。政治局一致批准的情况倒的确是真实的。^①但是，布

^① 列宁是根据事实才同意这一主张的，但在给高加索追随者的一封信中，他要求他们“了解决不可以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必须深思熟虑地把它加以改变，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在自己那里不是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是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列宁全集》，第32卷，第305—307页。）

尔什维克反对派的领袖穆迪瓦尼和马哈拉泽发现，在各次大会和会议中，他们总是比别人得的票多。因此，他们就继续抗议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这位以前的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者竟然走到了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有联系的地步，这种演变过程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同科西嘉的波拿巴成为法兰西帝国创建者或奥地利的希特勒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最富侵略性的领袖的过程相比，就更值得人们注意了。科西嘉人对法国并无多大怨恨；拿破仑的父亲甚至还是科西嘉“法兰西党”的追随者。泛德意志主义一直对奥地利有强大的影响，只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利益衰微之后才有所收敛。但是在格鲁吉亚，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泛俄罗斯主义情绪。格鲁吉亚对俄国的怨恨虽然是强烈的，但还是不如波兰对俄国的怨恨那样强烈。因此可以说，只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才使斯大林成为一个俄罗斯人的养子；是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特别是它对被压迫民族的敏感态度，才吸引了象斯大林这样的人。虽然自此以后人们不只一次地指控斯大林犯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错误，实际上他当时或以后都不是受到民族主义的一般情绪和偏见驱使的。他所主张的不过是中央集权的原则，这是所有当代革命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他只不过是给这个原则以夸张的和残忍的表现吧了。但是，无论他的动机如何，从他所作所为的实际效果来看，仿佛他就是按照俄罗斯沙文主义行动的。

有证据表明，这个自相矛盾的情况不时地给他一种奇怪的但并非不愉快的感觉。谁没有碰到过那些归化的英国人呢？他们充满了自信，竟然能够说“我们英国人”，甚而还说“我们大

英帝国……”。斯大林在对穆斯林共产党员的一次讲话中就有这样的口气。他说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来就不是严重的问题：“所有的俄罗斯人，其中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员，过去都是统治民族，他们没有经受过民族压迫，除了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外，一般说来，他们中间没有发生过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他们用不着，或者几乎用不着去克服这种倾向。”^①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断言。当它发表在《真理报》上时，必定使许多布尔什维克感到震惊，斯大林从此也再没有重复过它。俄国人不知道当代由于异族压迫而引起来的那种棘手的民族主义，这一点倒是真的。他们的民族主义是压迫者的民族主义，冷酷，野蛮，而且更具有危险性。列宁警告过他的追随者这种危险性，要求他们即使对于前被压迫民族的夸大要求，也要耐心而宽容地对待，因为对沙皇统治的记忆是很不容易消除的。俄罗斯共产党员要反对的主要罪恶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边疆同志们的任务则是抵制喧嚣的地方爱国主义的各种表现。列宁豁达大度的命令同他也主张的中央集权是不容易调和起来的。他的政策势必要彼此冲突；只有一个非常精明而审慎的行政官员才能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斯大林显然是失于过分集中了。

斯大林的错误（如果用这个字是正确的话），反映了俄国行政机构经过革命重新铸造之后思想、情绪和愿望的趋势。这种趋势就是在管理上越加集中，甚至于是重新组成一个“伟大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所以支持中央集权，是因为它在经济和行政管理上有好处。但是，按照列宁的说法，共产党员只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4页。

不过是“沧海一粟”^①。他们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普遍的农民革命，其胆量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却缺乏想象力对官场例行公事制定一个起码的改革。只有重新启用沙皇时代的官僚，革命才能逃脱无所不包的混乱状态；这些官僚虽然没有能力，但在行政管理的日常工作上还是胜过那些前革命派。在新经济政策公布之后，自由职业阶级中的保守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为新统治者服务了。他们受到了欢迎。甚至在白俄之中，对于俄罗斯母亲重新站起来希望也是很强烈的。高尔察克前政府成员乌斯特里雅洛夫教授甚至把这种希望合理化为一种政治纲领。他敦促自己的追随者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在其中工作，以便通过新经济政策逐步向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演变。在二十年代初期，旧的文职人员已经在新的行政机构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单一的成分。^②特别是在急需专家的高层机构中，他们的力量更为强大。共产党人和这些前沙皇官员的关系是不自在的。共产党人以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同路人”；这些“同路人”对布尔什维克则报之以一种恐惧或轻蔑与尽忠职守相混合的感情。尽管他们之间有冲突，而且有时这种冲突还是很残忍的，但他们仍在不断地和有机地相互发生影响。

对于那些旧的公务人员来说，最自然不过的事就是在新的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伟大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的思想。这样，他们就能够为他们保守的良知屈服于革命找到了解释的理由。象入侵格鲁吉亚和使俄罗斯边缘省份重新合并这类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6页。

^② 内战后不久，苏维埃政府大约雇用了五十万前沙皇官员。

的事情，他们竟然声称是他们思想上的胜利。另一方面，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同意这些行动，是因为他们把这看成革命的而不是俄国的胜利果实。在他们看来，俄国不过是世界革命的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堡垒，它的利益要服从战斗的社会主义的超国家战略。但是，俄国的边界和胜利的社会主义的边界暂时还是相同的。列宁主义者仍然认为，社会主义要求国家之间的平等；但他们也认为，把沙皇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领地在苏维埃旗帜下重新联合起来，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在这一点上，列宁主义和乌斯特里雅洛夫主义之间的分界线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这种半真半假的新民族主义潜入了党的政治思想中，就如斯大林不久以后承认的那样。^① 比起其他领导人来，他本身就更是生活于和属于那个混合的行政机构的。他几乎象地震仪那样敏感地表达了它的矛盾情绪。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他个人的喜爱和偏向，同那个国家所感觉到的更为广阔和非人力能够影响的压力是吻合的。

1922年夏，他的人民委员部又卷入一次新的冲突中，这次是同乌克兰的冲突。乌克兰政府也对它的干涉提出了抗议。乌克兰政府的领袖拉柯夫斯基是一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贵族革命家族的有影响的后裔，斯克里普尼克则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坚持党对于边远共和国独立保证的文字和精神，要求尊重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98页。乌斯特里雅洛夫教授当他还是流亡者时于1921年写道：“苏维埃政府将想尽一切办法使边远地区同中央重新结合起来——这是以革命的名义。俄国爱国分子将要为同一目的而战斗——这是以伟大而不分割的俄国的名义。尽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他们实际上是走同一条路的。”（尼·乌斯特里雅洛夫：《爱国主义者》，载《路标转换》，第59页。）

这种保证，尽管斯大林对基辅或哈尔科夫的干涉并不如对梯弗里斯的干涉那样厉害。乌克兰人和格鲁吉亚人携手合作，并决定在未来的修改宪法讨论中向他挑战。

但是，夸大这些冲突的重要性，这是不对的。斯大林的活动也有其光明的一面。他以很大的干劲和决心在革命继承下来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上努力工作。人们记得，他在1918年成立了巴什基里亚自治共和国。1920年春，成立了鞑靼自治共和国。同年10月，柯尔克兹自治政府相继成立。内战以后，成立了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它包括了讲三十六种语言和方言的许多民族。卡列里亚人、雅库特人和其他民族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这些共和国中没有一个已经是或者能够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但全都享有高度的自治和内部自由；而且在斯大林的人民委员部指导下，都尝到了现代文明的某些好处。在当时物质极端贫困的情形下，这个人民委员部帮助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了几千座学校，而以前这些地区只有几十座学校。在干旱地区的灌溉计划和水力发电计划也开始实行了。鞑靼语言和俄语同样成为鞑靼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俄国人被禁止在柯尔克兹草原定居，使其成为当地游牧民族的居留地。实行了一些进步的法律，使亚洲妇女脱离了父权和族权的压迫。所有这些必要的工作执行起来都是比较温和的，为未来的努力提供一个模式；但即使是在温和的开头中，也有一种对进步的积极关怀，这一点吸引了许多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对者。

1922年夏，在列宁的病第一次发作后不久，政治局开始讨论宪法的修改问题，其中要规定俄国和边远地区共和国的关系。斯大林是这次修改的主要主持者。整个1922年下半年，他

都在不断地阐述新宪法的原则。简单说来，他的想法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将由一个共和国联盟来代替。这个联盟将包括四个地区实体：俄罗斯、南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①（正是根据这个规划，他才催逼格鲁吉亚参加南高加索联邦。）他反对由各共和国直接组成联盟的想法；他坚持在中央政府和各共和国之间必须有一个中间的联系环节。他的动机是，通过四个主要渠道进行中央控制，要比莫斯科同许多分散的地方政府进行直接联系有效得多。人民委员部被分为三类：（一）军事、外交、外贸、交通和邮电将由在莫斯科的政府单独负责，各共和国政府不设任何这样的部来处理这些事情；（二）第二类有财政、经济、粮食、劳动和工农检察院，它们虽不隶属中央政府，但要同莫斯科进行协调；（三）内务、司法、教育和农业属于第三类，将由各共和国政府完全独立地进行管理。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后者包括两院：最高会议和民族会议。所有民族集团在民族会议中都有同等数目的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人民委员会议（即政府）。

在列宁第一次恢复健康期间，商量并批准了这个计划。政治局再一次催促格鲁吉亚参加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人反对由莫斯科来代表他们领导外交，并拒绝结束他们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但是在名义上，这个计划使各共和国有很广泛的自治权。它允许他们独立地管理自己内务、安全和警察，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部门。但在政府的实际执行中，却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25—126页。

已公然违反了这一改革的规定。^①正是这种情况引起了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而且这是他们长期友谊过程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严重的不和。

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当列宁在乡间慢慢恢复健康时，斯大林去拜访了他几次，告诉他一些当前的形势。斯大林发表于《真理报》上的一次访问记中，充满了对这位患病领袖的尊敬之词，而且还让全党知道，列宁不久就能重返工作。政治局的讨论情况，托洛茨基对工农检察院的攻击，新宪法的设想，以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反对，必定是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列宁显然同意了斯大林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因为他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位总书记。甚至在后来，即10月间他恢复工作以后，他仍坚持这种态度，并竭力来提高总书记的威望。他愤怒地训诫不顺从的格鲁吉亚人；他驳回了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他还准备在12月举行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维护斯大林的宪法改革。他对他的副手的绝对信任似乎是不可动摇的。

后来到了11月，或者说到了12月初，发生了某种事情，无可挽回地动摇了这种信任。情况很可能是，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单独一件事而是由于许多事巧合在一起所引起的。格鲁吉亚反对派领袖们以一个长篇的声明答复了列宁的指责，这可以给列宁提供了考虑的材料。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由政治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领导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从格鲁吉亚归来，捷尔任

^① 当宪法最后被批准时，它实际上规定由莫斯科控制所有共和国的政治警察。

斯基向列宁报告了调查经过。列宁从报告中得知了奥尔忠尼启则的某些暴行。在盛怒之下，他要求暂停他的这个朗居曼学校的前学生的党籍和职务。但是，他也唯恐偏信了捷尔任斯基的报告。这位政治警察头子虽然为人十分正直和富于理想，但却是一个头脑糊涂的狂热分子，他曾可疑地干预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到列宁的公开谴责。^①他还支持过斯大林在梯弗里斯的政策。因此列宁要求他的私人秘书为他准备一份关于格鲁吉亚的详细报告。

使列宁感到烦恼的还不仅是格鲁吉亚事件。他重返工作之后，感到他周围的气氛有一种模糊的但却是明白无疑的变化。在他离职期间，那个嘎嘎作响的政府机器更是摇摇欲坠。要想对一些询问得到直接而迅速的答复是更加困难了。人民抱怨某些机关的粗暴、文牍主义和滥用职权。他的一些指示和命令常常不知卡在什么地方，没有下达到目的地。他已经有一种背着他发生什么事件的模糊感觉。甚至还在患病之前，他就曾向党谈到他的奇怪感觉，即整个政府机器已经沿着不同的方向转动，大大出于他这个舵手的预料。现在他的这种感觉甚至更加强烈了。他试图追寻这种变化的根源，一下就找到了总书记这一职务上去。于是，格鲁吉亚问题、政治局中的不和，对于斯大林的抱怨，所有这些事情都开始显露端倪了。

12月中旬，列宁的病第二次发作。一星期后，他又康复到能够口授短文的程度，但也感到死亡临近了。1922年12月24日，他向秘书口授了一个简短的备忘录，作为遗嘱的代替物。他一开始就表示对布尔什维主义分裂的担忧。“我们党依靠的是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0页。

两个阶级”——农民和工人——“因此，假如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①但是这种危险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也是极难以置信的事”。因此列宁暗示，目前政治局中的不和，并不反映两个阶级之间的根本敌对。即使如此，他对于不久的将来的分裂危险仍是认真对待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推理突然不起作用了，他甚至于不想暗示一下，照他看来，政治局中的不和的社会背景是什么。相反，他继续简短而极端小心地谈到了他对那几个继承人的看法，似乎暗示他们的不和仅仅由于个人的仇恨，只是到将来才会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他毫不犹豫地指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是主要的敌对者：“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这个意见初听起来竟使列宁的差不多所有同事和学生都大吃一惊。托洛茨基看不起他的敌手，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个“阴暗而平庸的人”。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没有谁同意列宁的看法，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才智上超过那位总书记。这两个敌手中谁最能干，列宁是心中有数：“托洛茨基同志……也许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不过，列宁也决没有理所当然地认为托洛茨基的巨大才干就能保证他处于优势。整个遗嘱中对于斗争的结果充满了不肯定，并急于想在太迟以前制止这种斗争。

^① 此处引证的列宁遗嘱见托洛茨基的《俄国真相》第320—321页。遗嘱的原文从未在俄国发表，但官方作者经常引证其中的片断来反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的引证同托洛茨基所发表的相同，因而间接证明托洛茨基的文本是正确的。可参看波波夫：《党史纲要》，第2卷，第264页。实际上差不多整个遗嘱都被正式引用了，只除了不利于斯大林和有利于托洛茨基的部分。（按：这个“遗嘱”已发表于《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5—620页。——译者）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儿的每一个字都是小心地斟酌过的。列宁所表示的担忧和怀疑，还在他的病复发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但是他感到还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来作出最后的判断。同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比较起来，他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更具有批评性的，尽管他也对他的巨大才能作了称赞。列宁回忆起托洛茨基最近“对中央进行斗争”的一个例子，在这次事件中，托洛茨基表现出“过分自负，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如果党只是根据这些话在“两位卓越领袖”中间进行选择，那么优势可能稍稍有利于斯大林。列宁不仅特别强调了托洛茨基的缺点，而且还暗示托洛茨基有反中央委员会的倾向；而对于一个在纪律、集体领导和对“个人主义”猜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列宁谨慎地不把责任归诸于任何一方——他们“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会突然来临的。”

关于其他领导人，他说得不多。他提醒追随者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10月中反对革命的行为“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说，他谨慎而坚决地认为，他的两个最亲密的学生缺乏革命的胆略和性格。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咎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少归咎于托洛茨基一样。”换句话说，党应该记住他们过去干的坏事，但不应重提这些旧事来反对他们。重提托洛茨基过去的非布尔什维主义表明，这件事是无论如何不会被忘记的。这个遗嘱在结尾处简略地评述了两个年轻的领袖：布哈林（“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不幸，他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和皮达可夫

(有卓越才能,但是“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

作为一个最后的遗嘱,列宁的这些话是令人失望的和没有作出最后定论的。他对他的党分裂的预感,同他毫无办法提出任何指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唯一的建议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五十人到一百人”,这个建议证明了是完全不相干的。同列宁的期望完全相反,政治局和总书记的权力在扩大了中央委员会中不是缩小了而是增加了。

当列宁正在默思他的遗嘱时,斯大林指导了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改革的原则。他赞颂这一改革“在把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到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去的道路上,将成为新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①三天之后,即12月30日,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大会上,他歌颂这一改革在其成就和重要性上堪与内战中建立红军相比。当然,这种说法是夸大的,意思就是:“我的成就并不比托洛茨基小。”他在成立大会上继续说:“这是新俄国战胜旧俄国,战胜作为欧洲宪兵的俄国,战胜作为亚洲刽子手的俄国的日子。……让这次联盟代表大会向那一切还没有丧失理解力的人们表明:共产党人既善于破坏旧制度,也善于建设新制度。”

列宁在那些日子里写了最后几篇有力的文章,但对这一庆祝事件却未置一词。12月30日,即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他对格鲁吉亚的冲突口授了一篇短文:

我想,在这里,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28页。

及他对臭名昭彰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发脾气，起了决定作用。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我还担心……捷尔任斯基同志也只是表现了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①

在列宁口授遗嘱后的五天期间，他对斯大林的怀疑已经肯定下来，认为斯大林是有罪的。因此，这时他的谨慎的批评就一变而为毫无禁忌的控告。情况可能是，在这五天期间，他接待了各地来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或者是他的秘书向他提供了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报告；或者是他本人同那位总书记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或者是所有这些事都碰到一块儿去了。反正这时他已经下定决心，并重新考虑了他的遗言。1923年1月4日，他又对遗嘱口授了一段补充，充分表达了一个被自己最喜欢的助手欺骗了的人的愤怒。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

^① 托洛茨基：《俄国真相》，第322—323页。（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9—631，633页——译者）。

从我们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①

除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和他的秘书们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遗嘱。列宁担心自己完全瘫痪或突然死亡，所以匆匆忙忙地把他对斯大林的指责和他对党的忠告载入记录。不久以后，他的健康似乎又有好转，所以他就亲自出来发动对那位总书记的攻击。起初还是小心谨慎的，后来就越更激烈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一部分是根据托洛茨基后来的透露，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对它的真实性提出疑问。但是这一事件经过的主要部分是根据列宁自己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它们在他的著作的所有版本中都已选入；而且它们不仅同托洛茨基的透露相符，而且对托洛茨基的说法还是一个有力的支持。斯大林或他的辩护者们无论如何对这一事件没有提出过别的说法。

1923年1月25日，列宁对工农检察院的第一次批评发表在《真理报》上，口气还是缓和的，实际结论也有些模模糊糊。^②2月的头一个星期，列宁口授了他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③这是对作为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的斯大林的毁灭性攻击。这是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在它写出四个星期以后，才在3月4日登载出来。在未发表期间，斯大林和他的朋友显然徒劳地要劝使列宁不进行这次攻击。

列宁的文章说：“说句老实话，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现在没

① 托洛茨基：《俄国真相》，第322—323页。（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8页——译者）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6—440页，

③ 同上书，第493页。

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也没有什么要求可提。”^①这里虽然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而且他最近已经辞去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是显然暗含着对他的攻击，因为这个部是他创建的，而且他领导了三年多。列宁继续说道：“一个人民委员部，如果工作马马虎虎，并且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说话毫无威信，那又何必组织它呢？……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避免这种现象。”我们“应当真正给自己确定一个任务……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职衔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列宁谈到改组后的工农检察院应有的优点，在很多方面恰恰反映了它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缺点：“我希望，我们新的工农检察院会摆脱……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摆空架子，它最合我国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官僚主义的胃口。附带说一句，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缺乏文明的习惯是一切麻烦的根源。“我们对那些过分唠叨，过分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就不禁要抱这样的态度：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那个必须审查整个行政机构工作的人民委员部，本身就显然沉溺于“官僚和农奴制文化”之中。

这就是列宁首次公开进行的攻击。在幕后，他准备着在4月召开的第十二大上发动最后的攻击；而且他同意和托洛茨基采取联合行动。3月5日，即他批评斯大林的人民委员部的文章终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4页。

于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第二天，他同斯大林有一次尖锐的冲突。后来他就口授了一封短信给斯大林，要同他“断绝”一切私人关系。第二天，3月6日，他打电报给格鲁吉亚反对派领袖们，答应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考虑他们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我全心全意地赞同你们。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跋扈和斯大林与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十分愤怒。”^①他再次同托洛茨基联系，商谈在格鲁吉亚事件上采取联合行动的策略；他还对即将同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前往梯弗里斯的加米涅夫进行了指示。恰恰在这些行动中间，他的病于3月9日第三次发作，从此就一病不起。

斯大林对列宁的行动还不明所以，但他意识到了危险。他知道，他的可怕的敌手们是很了解他的事业正处于未定之天。因此，至少说来，他是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听到列宁旧病复发的消息的。^②列宁已经不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控告他了，这使得他感到大大的宽慰。他仍然有理由怀疑托洛茨基要进行攻击，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第68—69页。

② 大体上说来，这就是斯大林对列宁逝世的态度。托洛茨基暗示斯大林可能毒死列宁。但正如托洛茨基自己说的，这不过是一种模糊的推测。它听起来就不是真实的，因为他在1939—1940年才第一次提出这个推测（见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372—382页），而在此以前他同斯大林多年的斗争中，他从未提出这个指控，甚至也没有暗示过。显然，托洛茨基是根据三十年代大清洗的经验去推测1924年的事情，不过这个推测是同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性格的描述相矛盾的。托洛茨基说：“如果斯大林在一开始时就能够预见到他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后果，他无疑地会突然停止反对的，尽管他有着战胜一切对手的前景。但是他却没有这种预见。”（同上，第393页）因此，托洛茨基即使在指控斯大林毒杀列宁之后，他仍认为1924年时的斯大林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只不过见识短浅，而象这样性格的人是不可能做那种事的。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即斯大林并没有用这种方法来处置托洛茨基本人；当时托洛茨基在俄国，如果斯大林能够暗害列宁，他肯定也能够暗害托洛茨基的。但是，列宁和斯大林当时的整个关系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结论：列宁的逝世必定使斯大林在严重的忧虑中得到了安慰。

而且还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批评者，但也可能不过是一个“伪装的大力士”。于是他着手来麻痹托洛茨基，使他不采取行动。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党史上第一次将不由列宁指导的代表大会的问题。斯大林建议，由托洛茨基代替列宁，以中央委员会名义作代表大会的主要演说人。^①正如托洛茨基说的，当时的情况有如一幕滑稽戏，很难说这两个敌手中谁在其中扮演了更不诚实的角色。托洛茨基拒绝担任列宁一贯担任的角色，唯恐人们认为他在列宁逝世前就抢班夺权。他的这种考虑肯定是真诚的。但是后来他却建议，斯大林作为总书记，理所当然地应代替列宁来扮演这一角色。斯大林也十分小心谨慎地拒绝了这一建议。结果就由季诺维也夫来接受这一冒险的荣誉。

与此同时，斯大林表现了对列宁的谦恭和忠诚。这种姿态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他，使他免遭许多谴责。在列宁的病复发几天之后，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文章，^②其中充满了对患病领袖的恭敬之情。（“本文应该看做对列宁同志的几个基本观点所作的一个简要概括的叙述。”）即使他们之间的尖锐冲突已由克里姆林宫传出，但大多数人民却不怎么相信。他继续对托洛茨基作出模模糊糊的和解姿态。在政治局的一些会议上，他不坚持己见，欣然同意对他准备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所作的每一修正。他差不多一有机会，就向他的批评者作出口头上的让步。实际上，他对一些小民族的政策，更多地表现了托洛茨基的风格而不是他自己的风格。它的要点就是谴责“中央和地方很大一部分苏维埃官僚”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366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32—148页。

沙文主义地把共和国联盟看做“成立所谓‘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的开端”。还有一个修正案很可能勾销他著名的宪法改革，并让各独立的共和国拥有主权充分的政府，直到苏维埃官僚“能够用真正无产阶级和真正兄弟般的精神注意小民族和落后民族的需要和要求为止”。^①但斯大林也达到了谴责“地方民族主义”的目的，这是一个空子，使他能为自己的政策辩护。

腓特烈大帝曾经说过，他曾同他的臣民缔结一项协议，按照这项协议，他们可以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他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在这个阶段，斯大林能够怎么高兴怎么干，他就不介意托洛茨基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在他作出一切让步之后，政治局决定不把列宁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口授记录通知代表大会，理由是还不清楚列宁作这一口授记录的目的何在。这是斯大林在策略上的第一个胜利。再一个胜利是，托洛茨基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发动已经准备好的对总书记的攻击。（只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公开支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反对派。）由于希望列宁康复，并认为联合行动会比单独努力更为有效，所以托洛茨基就按兵不动。而与此同时，斯大林却采取了行动。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内形成了三人执政。这三个人所以能够团结一致，是因为他们决心防止托洛茨基继承党的领导。他们三个人分开来看，谁也不堪与托洛茨基匹敌。但是三个人合起来，却代表了一种才能和影响力的有力结合。季诺维也夫是一个政治家、演说家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55页。

和对群众有吸引力的煽动家。加米涅夫是这个小组的战略家，它的可靠智囊，在理论问题上有素养，这在权力的竞争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斯大林则是三人执政及其有组织的力量的战术家。他们三个人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党，并通过党，控制了政府。加米涅夫曾经作过列宁的副手，并主持过莫斯科苏维埃。季诺维也夫曾是彼得堡（很快就要更名为列宁格勒）苏维埃的主席。斯大林控制了大多数省份。此外，季诺维也夫还是共产国际的主席，这个职务在俄国的道义权威很高，使得任何觊觎领导职位的人都要争取它的支持。

最后，这三个人代表了党的传统。从1903年分裂以后，他们同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系就没有间断过；他们在领导层中是资历最老的。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除托洛茨基之外，布哈林相当年轻，托姆斯基则是工会领袖，只是最近才成为政治局委员。资历就表明光辉的过去，并以其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矢忠而著称。这三个人这时拒绝跟随那个“前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他不过才参加布尔什维克五年，就已经被公认为列宁的继承人了。这个使他们团结一致的唯一动机，迫使他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各行其是，三人执政就自然掌握了多数。他们的动议和建议通常都在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之前就达成一致意见，因而总是能够通过。其他政治局委员被政治局中的纪律捆住了手脚，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企图把内部争论公诸于众，就会成为一种不忠诚的行动。

由于情况如此，所以斯大林就不怎么担心这次代表大会。反对他的人都是一些第二流的敌手，他们没有能够影响广大代表。许多代表在政治立场上已经唯总书记的马首是瞻。从斯

大林向代表大会报告总书记处人事部门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代表们对他依赖至何等程度。他的报告透露了党对公众生活进行控制的方式方法。在前一年地区工会领袖只有百分之二十七是党员，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五十七是党员了。在消费合作社里的党员已经从百分之五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在军队的指挥员中，党员人数从百分之十六上升为百分之二十四。在所有其他机构中都有类似的情况，斯大林把这些机构称为党同人民联系的“引带”，没有一个公共机构能够脱离这个引带体系。^①

为了能够调度它的力量，总书记处人事部门保存了党的“关键人物”的极为详尽的档案。在经过几次清洗之后，党目前大约有四十万普通党员和二万官员。人事部门迄今已积累了中上层干部的档案，其中包括一千三百名工业经理人员。斯大林透露，这种调查工作仍在继续着。在积累档案的时候，特别注意每一个人员的工作熟练程度、专长、政治可靠性和道德表现。每一个人员的所有污点都适当地记录下来。斯大林说：“必须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②，“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③由于人事部门必须满足或帮助工作人员的调配，所以它在全国都有分支机构。它有权紧急命令各个人员改变职业和住地；为了执行任何任务，而从首都转移到西伯利亚的荒原，或出使外国。一项任务的分配，甚至是一项荣誉任务的分配，都可能成为惩罚某个颇不安份的成员的借口。这些人员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他们很少有确实的把握不因过去有失检点的言行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62页和以后各页。

② 同上书，第172页。

③ 同上书，第171页。

而现在遭到总书记的公开反对。但是，迄今为止，这种事情还不象后来那样普遍。

总书记也负责省委员会领导人的任命。他以一种貌似悲观的语气谈到这个问题。他告诉代表大会，省的组织现在应该自选书记，而不要依靠上面指定。不幸却非常缺乏合格的人材，以致地方组织总是纠缠着总书记处，要由中央派去人员。“培养党的领导人是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很多年，五年到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用布琼尼同志的骑兵去战胜某一个国家比从下层培养两三个将来能够真正领导国家的领导人要容易得多。”他为经常遭到报纸讽刺和攻击的省委会辩护，也为他的由书记们组成的方阵缓颊，他甚至原谅他们的纠纷和摩擦，认为纠纷和摩擦有不好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因为它们对于形成“一个能够经常进行领导的紧密团结的核心”^①是有帮助的。换句话说，省委员会就是具体而微的政治局，有它自己的小三巨头和二巨头以及反对派集团。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回答一个批评者的批评，因而第一次公开承认三人执政的存在，而且宣布了它将团结一致地反对任何反对派。斯大林说：“奥新斯基称赞斯大林同志，称赞加米涅夫，但他侮辱季诺维也夫，他认为目前只要除掉一个人就够了，以后再挨次除掉其他的人。他采取的方针是先瓦解那个经过多年工作而在中央内部形成的核心……。我必须警告他，他一定会碰壁的，而且我怕他会碰得头破血流。”^②对另一个要求在党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5页。

② 使用笔名奥新斯基进行批评的是普林斯·奥波伦斯基，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

内能够更自由进行讨论的批评者，^①斯大林回答说，党不是一个争论俱乐部。俄国被“帝国主义豺狼包围着”，“在两万个支部大会上讨论问题也就是等于把问题搬到大街上去”。在持久的掌声中他结束说：“我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团结一致的、受同一思想鼓舞的代表大会了。很遗憾，列宁同志没有在这里。如果他在这里，他一定会说：‘我培养了党二十五年，现在已经把它培养成一个伟大有力的党了。’”^②在以前的多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都不曾象现在这样充满了自信地说话。

那些没有领导和没有人帮助的不满分子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三个月后，在1923年8月，政治局为工业中突然爆发了多次罢工而感到惊惶失措。自从1921年宣布新经济政策以来，俄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但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工业仍不能满足国家必需品的要求。它不能供给农村充足的物品，以诱使农民出售粮食。低工资、失业和饥饿使工人阶级陷入绝望的境地。由于工会拒绝考虑工人的要求，引起工人的不满，爆发了一些“非正式的”罢工。这种不安定的情绪也潜入执政党内部，党内发现了一些秘密的反对派集团。这些集团中有的是半孟什维克的，有的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并包含有1921年已被禁止的反对派残余和一些新的分子。他们的主要要求就是党内批评的自由。一些执不同政见者被开除党籍，还有一些则被投入监狱。这是在共产党内成立秘密反对派的第一个事例。但在那个时候以前，秘密集团的行动还是不协调的和缺乏领导的。三人执政担心他们的敌手和一般不满群众结合起

^① 这个批评者卢托维诺夫不久就自杀了。

^②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91页。

来。^①

他们对于危机的反应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动议，认为必须在党员中恢复民主和自由讨论。另一方面，他们却动员政治警察来反对秘密的反对派。政治警察发现，在追踪反对派时，一般布尔什维克常常拒绝合作。捷尔任斯基于是要求政治局批准警察也采取行动来反对不合作的布尔什维克。这时，托洛茨基和三人执政之间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托洛茨基在还没有完全清楚地表明他对捷尔任斯基要求的态度之前，就对三人执政发动了攻击。他说，现在发生的事情，表明了党的思想状态，它的失意感，以及它对领袖们的不信任。即使在内战中，“〔由上面〕任命的制度也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程度。任命省委员会书记现在已经成为常规。”他承认，“鉴于充分发展的工人民主同专政制度是不相容的”，所以要求实现工人民主是有点蛊惑人心的。但是内战中的纪律应该让位于“一种更为活泼和更为广阔的党内负责制”。然而相反的情况却是，“党机器的官僚化已经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批评和不满，以及对此的公开表示遭到压抑，被赶入地下，被认为是无法控制的和危险的形式。”^②

三人执政回避了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指责他用心恶毒，怀有个人野心，玩忽在政府中的职守，等等。他们谴责他企图成为列宁的接班人。^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后面一个谴责倒是真的，因为关于接班的斗争正是整个形势中所固有的。不过，

① 波波夫：《党史纲要》，第2卷，第194—204页。

② M·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以后》，附录4，第142—143页。

③ N·波波夫：《党史纲要》，第2卷，第144—196页。

这一谴责也同其他谴责一样，是离题的，因为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党内存在着危机，这是一个事实具在的问题。

在这场较量中，有四十六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发表了一项声明，其要点和托洛茨基的批评是相同的。^①在这项声明上签字的人中有：皮达可夫，他是列宁遗嘱中提到的两个最能干的年轻领袖之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里布利亚科夫，两人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前书记；安东诺夫—奥夫申科，他是十月革命时的军事领袖；斯米尔诺夫、奥新斯基、布勃诺夫、萨普洛诺夫、穆拉罗夫、德罗布尼斯等，他们都是内战中的著名领袖，是一些很有思想和性格的人。其中的一些人曾经领导了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前反对派，表达了党对当时的领导为了一时之计而牺牲首要原则的不满。从根本上说来，他们这次也是表达同样的不满，因为党仍在继续背离自己的初衷。托洛茨基是否直接煽动起这次示威行动，这还不能肯定。迄今为止，他一直限于在政治局中同三人执政争论。党内的一般印象是，他总是全心全意地支持官方的政策。因此，他就落得两头不讨好的境地：他一方面要为他所反对的政策承担责任，另一面又无法及时地聚集起可能支持他的那些人。

11月，由于危机所引起的恐惧，三人执政提出一项动议，赞成在党内实行民主改革。就象在格鲁吉亚事件中一样，斯大林这时也同意对托洛茨基作出口头上的让步。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这一建议。托洛茨基别无选择，只好赞成这一建议。在11月7日十月革命六周年之际，季诺维也夫正式宣布，开始对布尔什维克感到烦恼的一切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党内的戒严状态

^① N·波波夫：《党史纲要》，第2卷，第144—196页。

似乎可能最终地宣告结束了。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反对派所提出的那些事情，并不仅仅是斯大林或其余两人的野心和敌意的结果，它有更为深刻的根源。这一革命由于增强了巨大的政治机器才挽救了自己。群众的冷淡（如果不是敌对的话），使党越来越依靠强迫命令而不是说服教育来进行统治。谁能够肯定地说，现在就是把一切颠倒过来的时候了，就要废弃或者约束政治机器而依靠人民健全的舆论了？谁又能确有把握地说，这样做而不会危害革命的安全？如果需要实行工人民主，那是不是说要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重返舞台呢？批评斯大林的大多数人，包括托洛茨基在内，都同意仍旧取缔孟什维克。照他们看来，在国家中解除戒严状态的时间还没有到来，他们需要的只是在党内解除戒严。但是这样一来，在一个不管好坏而注定了要实行专政的社会里，党会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孤岛呢？除了这些以外，这个巨大的专政机器这时已经有了自我保存下去的既得利益，它可以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同革命更为广大的利益相一致的东西。争论的双方都意识到这一难题，但是对于反对派来说，意识到这一点成了软弱的根源；而对于另一方来说，它却成了力量的源泉。

托洛茨基因而要求只进行一次由上面宣布的有限改革，即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自由。他迄今一直小心地不去诉诸公共舆论，甚至共产党的舆论，来反对统治者。不过，他认为需要把这一争论公开化。官方发起了公开的讨论，就使他有机会这样做。这个机会即使他能够诉诸公众舆论来反对统治者，又使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得到统治者正式的允许。他的真实的或表面上

的前后不一致，是出于更深刻的考虑。他认为，在专政和自由之间是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的，也可能按照实际情况限制或者扩大任何一个。他希望，随着俄国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的进步，这个政权将能够越来越少地依赖强迫命令，而越来越多地依赖自愿的支持。革命应该能够葆其美妙的青春。他认为，革命同人民的离异只是暂时的。三人执政，特别是斯大林，则对此不抱什么希望。

这儿我们就触及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大多数分歧的根源。双方都坚持认为他们是根本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而且没有理由怀疑他们这种表白的真诚性。两派都宣称自己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象基督教徒宣誓忠于新教和天主教一样地自然。双方的信仰既然相同，因而就几乎发现不了双方敌对的什么线索。托洛茨基的态度中潜藏着一种小心翼翼的但却是非常真实的革命乐观主义，他认为，只要统治者遵循的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政策，工人阶级就会支持他们。这种信念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固有的；而且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公开地同它抵触。但是在斯大林的政策路线中，总是表现出对于社会主义声望的一种深刻的不信任，甚至于是一种对于人和社会的本质上的悲观态度。在最近的这一例子中，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对人民坦率的呼吁上，即使他只有一线的成功希望。而当权的悲观主义者却对自己统治的人民不信任。共产主义的悲观论者把他的理论视为一种深奥的知识，不认为工人阶级真地能够接受它，除非提着脖子硬灌给他们。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深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根治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但是前者认为，只要进行适当的启蒙，病人自己

或迟或早（宁早勿迟）会要求治疗；但后者则倾向于不管病人愿意与否就命令进行治疗。然而，这种题外话也许超过本书的范围了。

在季诺维也夫正式宣布公开辩论几个星期之后，斯大林向莫斯科工人居住区红色勃列斯尼亚的共产党员发表讲话，论述“新方针”的意义。^①他坦率地承认党内有骚动的情况，党已经失去对全国情绪的感觉。他认为原因在于地方组织，它们不再讨论公共事务，并放弃选举程序，赞同由上面任命负责人。如果说中央领导有缺点的话，那就是没有及时地发现这些不正常的情况。他继续说，“1917年……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将要有公社，这种公社将是劳动者的联合；我们将消灭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可是实践表明，这对我们说来还是一种遥远的理想，要使国家摆脱官僚主义……人民必须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周围必须有完全有保障的和平环境，有了这种环境就没有必要保存大量的常备军……它的存在就会影响其他一切国家机关。”^②这些弊端可以通过新方针而部分地得到纠正。但是党应该谨防过分地夸大自由的好处。地方组织应该恢复选举制度，但对选举的限制性规定也必须继续有效。应该有言论的自由，但以前对它的一些限制必须继续实施。他讲话的要害还在后面。斯大林说，某些批评者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斯大林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托洛茨基（说到这儿时他的声调变得几乎是虔诚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坚持认为党不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89—302页。

② 同上。当然，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暗示，意思是这些弊端的根源不是党的核心组织，而是军队，亦即托洛茨基主管的部门。

是辩论俱乐部，在行动中必须要有纪律。因此斯大林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以为托洛茨基是支持总书记的政策。根据托洛茨基同三人以前交换的信件来看，他的这种暗示无疑是想挑起托洛茨基进行公开的辩论。

三天之后，在12月5日，托洛茨基进行反驳，给红色勃列斯尼亚区的共产党员一封公开信。^①他站在政治局最近决议的立场上，强调地警告一般党员说，如果他们不警惕地对领袖们施加压力，那些决议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某些有保守倾向的同志〔他没有举名〕易于过高地估计这架机器的作用，过低估计党的自我行动能力，因而对政治局的决议持批评态度。他们说，中央委员会承担了力不胜任的工作，这个决议只会散布虚假的幻想，并导致消极的结果。”当然这不是他托洛茨基的观点。他认为，现在是党恢复自己的主动性和自我管理的时候了，它过去放弃了这些东西，从而有利于这架党的机器。“党应该使它的机器服从自己，永远要成为中央集权的组织。”党应该“公正地”行使它的批评权利，“首先应该从党内撤换那些人，他们一听到批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就想使人们投票赞成镇压。新方针应该由此开始工作，使得从上到下生活在这个机器下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谁也不敢在党内实行恐怖政策。”托洛茨基还向青年呼吁；他仿佛针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老近卫军”三人执政，警告全党说，革命的“老近卫军”不止一次地蜕化为官僚主义者。这种情况在欧洲社会主义改良派领导中发生过，也可能在布尔什维克中发生。公众从他的这封信中看到了政治局内分裂的蛛丝马迹。

^① M·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以后》，附录6，第146—147页。

三人执政立即接受了这一挑战。感情冲动的季诺维也夫提议立即逮捕托洛茨基。斯大林更谨慎一些，他意识到托洛茨基巨大的威望，反对采取这一步骤。十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一阶段，甚至在以后，他煞费苦心表现得是三人执政中最温和、最讲理和最和解的人。他对于托洛茨基的批评，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批评更少一些火气。他知道党内对贬低托洛茨基不满，就让他的伙伴们对托洛茨基进行最粗暴的诽谤，从而使这些人和托洛茨基的威信都遭到损害。他自己则集中精力去完成更为谨慎的任务，即掌握党的机器。他习惯于着重看待党内生活的技术问题，所以急于通过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来获得对反对派的正式裁决。把这一争论提交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将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因此决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各地方组织的书记、官员和总书记处所指定的人。象这样的会议必定是听命于三人执政的，而它作出的反对托洛茨基的裁决，又肯定会影响党的其余部分。这次代表会议预定在1924年1月召开。

与此同时，在12月底，斯大林加入了一场围攻战，矛头主要是针对反对派中的极端分子，其次才是针对托洛茨基的。他的论点充满了谬误和似是而非的推论，但却很有效，因为它暴露了反对派内心的保留和前后的不一致。难道反对派只要求废弃列宁关于禁止党内存在派别的规定吗？究竟是还是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无法明确地答复是或否。无论如何，托洛茨基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要求遵守他曾经赞成过的列宁的规定；但他又声称，这些规定被滥用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斯大林集中了他的火力，迫使托洛茨基撤退，犹豫不定，放弃

一个一个的阵地，直到太迟的时候才企图去夺回自己失去的阵地，但那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已经被弄得混乱不堪和灰心丧气了。

在这场辩论中，当列宁仍躺在病榻上的时候，对列宁主义的迷信实际上就开始了。凡是直接或间接要求取消列宁曾授意过的任何措施，这时就成为一种违反某种不成文法的无可原谅的罪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宣称，党渴望恢复 1920 年以前象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争论中所享有的那种“列宁主义”的自由讨论，斯大林立即回答说，当时的那些习惯已经不值得去仿效了。他问道，难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流的左派共产党人当时不是打算罢免列宁的政府而代之以自己的政府吗？这部分地说来倒是真实的。不过，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争论中，甚至在此以后，并没有什么人因这种思想而受到任何责备。左派共产党人反对同德国媾和，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一个时候还居于多数；因此他们自然考虑过，是否由他们自己接管政府，并负责指挥这场列宁所反对的战争。^①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争论过去之后，这一点并没有妨碍他们同列宁在一起共事。但是到了 1923 年的现在，1918 年的这个插曲看起来就成为一种邪恶的阴谋或一种褻渎的行为了。因此斯大林曾暗示，党应该谨防那些鼓吹回到这种有害实践去的人们。

^① 布哈林肯定提出过这种想法。在三十年代审讯中加给他的阴谋反对列宁的罪名，在这一点上是有些真实的。在 1923—1924 年时，斯大林忍住不去提起布哈林的这件事，因为布哈林刚刚成为他反对托洛茨基的盟友。见《联共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 558 页。

根据列宁主义迷信来看，托洛茨基的立场是最脆弱的。他曾经警告全党关于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蜕化”的危险；而且他在文中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我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由于目前的党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十月革命以后参加党的，^①所以他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斯大林挖苦地回答道，“我要保护托洛茨基，使他不致自己打自己”，因为他肯定不是那种现在被称为蜕化的老近卫军。他继续说，老近卫军的蜕化是托洛茨基的主观臆造。的确有使党瓦解的分子存在，但那是一部分孟什维克，他们虽然参加了我们的党，却没有根除机会主义的旧习气。^②这种暗讽就用不着多解释了。

这场辩论连同它的旁敲侧击和清谈扯淡，只不过是未来代表会议摊牌作准备的一部分工作。同时，总书记处利用分散其领袖的方法来削弱反对派。托洛茨基由于生病和思想上有所保留，弄得死气沉沉。拉柯夫斯基则被认为急需去担任苏联驻伦敦的公使，因为苏英外交关系已于1924年2月建立。克列斯廷斯基被派到德国执行外交使命。越飞则被派到中国去。反对派无法抗议这种分配，因为这些分配都是有道理可说的。这些新任命的外交人员自然就不能干预党内的事务了。乌克兰在拉柯夫斯基的领导下曾经是反对派的一个堡垒，总书记处现在派了拉札尔·卡冈诺维奇去清理那个马蜂窝，卡冈诺维奇从前是一个皮革工人，后来成为一个强硬的行政官员。在莫斯科，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小册子实际上已经停止发行。那些动摇或怀疑的党员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理解双方的论点，地方官员无疑是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7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14—315页。

听三人执政的话的，因此这次代表会议的结果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在代表会议上，斯大林比以前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的观点：“我只谈一点，就是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①人们忘记了“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即使在党的极有限范围内也是如此。经济上的繁荣，军事上的安全，以及社会成员在文化上的提高，这些就是实行工人民主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现在是缺乏的。虽然党还不是民主的，但指责它是官僚主义的也不对。他的论点是模模糊糊的；他说组织即不是民主的又不是官僚主义的，就是一种混乱的说法。但是他的论点的力量恰恰就在这个模模糊糊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安定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接着他就列举了托洛茨基所犯的“六个严重的错误”。托洛茨基曾经赞成政治局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后来又出来批评政治局——他把自己摆在同事们的上面，采取了超人的姿态。他拒绝表明他是拥护中央委员会还是拥护反对派。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的老祖宗”煽动党反对它的机关，又煽动青年反对党。他已经使自己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而其他的领袖们却是为无产阶级说话的。他把党内出现秘密的派别和集团归咎于制度，然而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不同的集团反映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党必须是由一整块材料凿成的完整的组织。二十万“从工作台来的”工人应该被允许立即参加到党内来，他们将给党带来坚强的无产阶级精神，免于受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感染——这就是所谓的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最后，斯大林制造了一次轰动，他公开了列宁在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页。

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中的一个条款，它允许中央委员会开除进行派别活动的党员。他要求代表会议重申这一条款。他的所有建议都被通过了。这次代表会议谴责反对派是“离开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偏向”。

* * *

三天之后，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了。尽管国家近年来处于悲惨和失望的境地，但人们仍然深切悼念他，其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很多领袖。在群众的心目中，他的名字仍代表着革命的宏伟前景，平等而自由的人们的社会。悼念的群众已经对于他的信徒感到不安了：究竟他们之中谁会代替他来掌握国家的命运呢？尽管最近发生过一些争论和逐除教门事件，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但是当群众在瞻仰遗容和其他纪念集会上向他们逝世的领袖最后致敬时，托洛茨基却没有出现在列宁的遗体旁。他到高加索治病去了；而且如果他的声明是可信的话，他所以没有赶回莫斯科参加葬礼，是因为斯大林向他通知的日期错了。所以说，这一偶然事件在历史的天平上是有份量的，但并不太重。^①但事实是，由于那些天拖得很长和精心计划的葬礼，三巨头（而不是托洛茨基）在群众中造成了极深的印象。当三巨头象征性地步入这一突破口时，高明的舞台监督把灰光灯对准了他们，使他们显得非常突出。斯大林

^① 喜欢进行历史类比的人可能回忆起导致丹东垮台的一系列事件，其中他的患病和离开巴黎起了相同的作用。丹东传记的一位作者说：“10月12日，他到奥伯省的阿尔西休假养病。这对于他的敌人——比劳·瓦列里和罗伯斯比尔——准备打倒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当他在11月返回巴黎时，事情很快就清楚了，他的暂时离职使他永远离开了他的岗位。”

自己的“年表”^①，逐日、甚至逐小时地详细报道了这一经过：

1月21日：晚六时五十分，列宁在哥尔克村逝世。晚九时三十分，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前往哥尔克村。

1月22日：斯大林修改《告苏联全体劳动者书》，电告各地党组织，号召它们忠于已逝世的领袖的学说。

1月23日：上午九时，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把列宁的灵柩抬出哥尔克村寓所；下午一时三十分，斯大林及其友人们把列宁的灵柩从帕维列茨车站抬至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在四天中供人瞻仰；下午六时十分，斯大林在列宁的灵旁守灵。

1月25日：斯大林号召全党收集列宁的遗作，送交新成立的列宁研究院。

1月26日：晚八时二十四分，斯大林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忠于列宁的宣誓。

1月27日：上午八时，斯大林在列宁灵旁守灵；上午八时三十分，斯大林站到守灵者的排头；上午九时，斯大林和其他人把列宁的灵柩抬出工会大厦；下午四时，即红场葬仪结束时，斯大林和其他人把列宁的灵柩抬入未来的陵墓中。

1月28日：斯大林在一次纪念会上发表演说。

这种精心策划的仪式是完全不符合列宁的观点和风格的，他的清醒和不喜欢浮夸几乎是有口皆碑的。这种仪式的目的就在于煽起原始的、半东方的人民的情绪，使他们产生新的崇拜列宁的狂热。红场上的陵墓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尽管列宁的遗孀抗议和许多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表示愤怒，列宁经过防腐的尸体还是陈放在陵墓中。对于千百万农民来说，他们的宗教本性在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62—363页。

革命之下曾被压抑住，因而这座陵墓很快就变成一个朝圣的地方，一个无神论教义的奇怪的麦加，它需要一位先知和一些圣徒，需要一座圣墓和许多圣象。就象原始基督教一样，当其在异教徒国家传播的时候，吸收了异教徒信仰和仪式的成分，把它揉合成自己的思想；现在作为西欧思想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也吸收了俄国根深蒂固的拜占庭传统和东正教风格。这种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则只能够以纯粹的形态存在于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流亡在西欧的人的脑子里。现在，在这种学说真地移植到俄国并统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观点之后，它不能不吸收这个国家的思潮、传统和风俗习惯。这种过程不声不响地进行了一些时候了。没有谁比列宁更深刻地洞察到这一点而且对它感到很棘手。他的逝世成为一个发泄口，消除了他的许多信徒在纯马克思主义上的禁忌。这说明一种学说和产生它的环境互相同化的程度。

一个在东正教中学中形成了自己性格的人，自然就会成为这种变化的首要代理人，而且会给这种变化以最充分的表现。他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对列宁的誓词，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认为是他思想最充分和最机密的表露。在这篇誓词中，《共产党宣言》的风格奇怪地同东正教祈祷书的风格揉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同老斯拉夫的语汇也结合得紧密无间。它的革命的祈祷听起来就象是为教堂唱诗班写的连祷文：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

这个党的党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经得住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工人阶级的儿女，在贫困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儿女，在千辛万苦和英勇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儿女，——首先就是这些人应当成为这个党的党员。……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①

鉴于最近以来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认为，这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2—46页。

篇半神秘的誓词完全是虚伪的。也许这个结论过分简单化了，但不容怀疑的是，斯大林的这篇大肆吹捧的告别词的确是不真诚的。只有一点倒无疑是真诚的，这就是他认为他有权把自己视为列宁正统的学生。他拥护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有二十年之久；他成为列宁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也已有十年；在一半多一点的时间，即六个困难重重的扰攘不安的年头里，他直接在列宁的领导下，精力充沛而又忠心耿耿地工作着。难道他们之间短暂而激烈的冲突不能被持久而密切的联系所湮没？斯大林仍然认为，他同列宁的冲突是一个尴尬的插曲，一次误会，如果列宁康复，就可能加以圆满的解决，使大家都能满意。他肯定认为，他对于列宁遗教的态度是不能受到责备的。他很可能没有意识到，对列宁的迷信，特别是他那篇半宗教式的誓词，听起来就象是对真实的列宁的一种嘲弄。^①

这时，他以自己理解的列宁主义，向共青团员和为党培养新知识分子骨干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进行阐释。^②他对这一题目的阐述是毫无创见和沉闷枯燥的，因而很难说它是一种概述。唯一新鲜一点的是他阐述的形式。列宁的学说本质上是社会学的和试验性的，但他却把它说成是拯救人类的一系列僵硬的原则和战略策略的诀窍，而且以簿记员的精确性一一列举出来。他以一种不合逻辑的简单而明晰的风格编纂和形式化了列

^① 列宁对于想把宗教仪式或准宗教用语应用到社会主义来的企图进行了尖锐的嘲笑。一次有人问他，一个社会主义者说社会主义是他的宗教这是否适当。他答复道：“如果一个普通工人说这句话，那末它只意味着那个工人正在抛弃宗教而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领袖或一个知识分子声称社会主义是他的宗教，那他就是在抛弃社会主义而赞成宗教。”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2—165页。

宁主义，从而大大吸引了那些缺乏社会学训练的人们。他引证列宁的话来支持他的每一个论点，有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有时则是生吞活剥的，就象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从圣经中去寻找自己想法的根据一样。诚然，列宁也经常引证马克思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是斯大林已经把这种习气发展到了荒谬的顶点，以致他可以引证阿基米得的话说：“给我一条列宁的语录，我就能够翻动这一地球。”^①

这时，有一条列宁的引语可能会翻动斯大林脚下的地球，这就是他的遗嘱，但全党和斯大林本人都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只是在列宁逝世后四个月，它才在5月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宣读，这次中央全会就是为了决定这个文件是否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公布而召开的。一个目击者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因这一可怕的事而吓得目瞪口呆。”^②“斯大林坐在讲台上，看起来显得很小时和很可怜。我逼近地审视了他，尽管他表现出镇定和沉着，但显然他的命运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因为在这种迷信列宁的气氛中，如果不重视列宁的遗嘱，那几乎是褻渎的行为。在这生死关头，季诺维也夫挽救了他。季诺维也夫在会议上说：“同志们，伊里奇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是法律。……我们已经宣誓去完成列宁在临逝世前所命令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们完全知道，我们将信守那个誓言。”（很多听众都低下了头，因为他们不愿直视着那个老演员的脸。）“但是，我们可以愉快地说，列宁所担心的事情中，有一点已经证明

^① 阿基米得是古希腊的学者，他曾发现杠杆定律等。据说，他曾说过这样的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翻动这一地球。”——译者

^② B·巴然诺夫：《斯大林，红色的独裁者》，第32—34页。

是没有根据的。我指的就是关于我们总书记的那一点。你们所有的人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之间的亲密合作；你们也会象我一样愉快地说，列宁的担心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加米涅夫接着呼吁中央委员会让斯大林继续任职。但如果大家同意这样做，那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列宁的遗嘱就不适当了。克鲁普斯卡娅对压制她丈夫的遗嘱表示抗议，但终归无效。托洛茨基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他太骄傲，以致不愿干预这种也将影响到他的地位的局势。他保持沉默，只是在脸上表现出对这一事情的厌恶。季诺维也夫建议，遗嘱不公开发表，只是秘密地通知一些经过挑选的代表。这一建议以四十票对十票获得通过。斯大林这时才能擦一把冷汗。他又重新掌握了大权，而且是稳固的和一劳永逸的。

三巨头的团结经受了特殊的考验，因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深信，他们用不着象害怕托洛茨基那样地害怕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这时是共产国际的主席，是三巨头中资历最深和最得人心的一个。加米涅夫则认为自己在才智上比他的伙伴们都高。他们两人都把斯大林视为自己的助手；而且他们虽然有时对他的刚愎任性有些不安，却不怀疑他有成为列宁唯一继承人的野心。在这件事情上，全党也是没有丝毫怀疑的。相反，要引起对托洛茨基的不信任，却不是十分困难的事。三巨头的代理人散布流言蜚语说，托洛茨基是潜在的丹东，或者换句话说，是俄国革命的波拿巴。这些流言蜚语是很有效的，因为党从一开始起就习惯于同先前的法国大革命相类比。人们总是承认，历史是可能重复的；一个执政府或单独一个篡位者可能再次站在革命的背上爬上权力的顶峰。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俄

国的篡位者也会象它的法国原型一样，是一个在战斗中赢得光辉和传奇声名的人。那么托洛茨基就非常适宜于扮演波拿巴这一角色了。的确，如果是这样看的话，除了斯大林以外，任何人都可能适宜扮演这个角色。斯大林之所以有力量，一部分原因也正在这一点上。

在特殊情况下，一个想得到权力的人，其最重要的资本就是默默无闻。党一直被教导去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努力实现集体主义。在党的领袖之中，谁也不如斯大林看起来是先于前者而表达了后者的。这位总书记最引人注目的恰恰是他的默默无闻。他差不多没有个人的性格，对于匿名的阶级力量和党来说，似乎是一个最理想的工具。他的态度看起来是十分谦逊的。比起其他领袖来，他更接近普通官员或党员。他力求去接触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省委书记、受欢迎的讽刺作家和外国来访者。他是沉默寡言的，因而在耐心倾听别人意见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有些时候，可以看到他在楼梯口上，抽着烟斗，一动不动地听着一个激动的人谈话，长达一两小时，只是在提几个问题时才打破自己的沉默。他的这一性格看起来就象是他没有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那些访问他的人，由于能够倾吐积愆而感到欣慰，很少指责斯大林在谈话中不推心置腹。其实，正如他的秘书说的，斯大林“从来不向任何人吐露内心的东西。只是在很少的场合，他才同最亲密的伙伴表露自己的思想。它具有保持沉默的高度才能，在一个人们唠唠叨叨不休的国度里，他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①

他的私生活也是无可指责或怀疑的。巴然诺夫说，“这位性

^① B·巴然诺夫：《斯大林，红色的独裁者》，第21页。

情暴躁的政治家没有其他恶习。他不贪财，不爱声色犬马。除了他自己的妻子外，不与任何女人打交道。”在内战中，他第二次结婚。他的妻子纳杰日达·阿利鲁耶娃比他小二十岁，是一个工人的女儿，列宁在1917年七月事变时就是躲在这个工人家里的。她在革命后曾做过列宁的秘书，并于1919年到察里津去。那位政治委员和这位女共产党员就是在那儿开始相爱的。现在他们住在一座小房屋里，过去这是克里姆林宫仆人的住区。纳杰日达·阿利鲁耶娃专心地在莫斯科一所技术学院学习。这位总书记简朴的甚至是严谨的私生活，受到了有清教徒精神的党的称赞，因为党这时对于克里姆林宫中腐化和放荡的最初迹象已经越来越不安了。

那时斯大林给人民的印象是，他并不是一个不能容人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攻击反对派时比其他两个巨头更少一些恶毒的字句。在他的演说中，总是有一种温厚而安抚的乐观调子，这同党越来越滋长的自满情绪是很和谐的。在政治局讨论重大政策时，他似乎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小心谨慎地注视着辩论的过程，看风使舵，总是随着多数派投票，除非他事前就已经能够肯定多数票在他这一方面。因此他总是能够得到多数派的欢心。对于一般党员群众，他表现得是一个没有私人恩怨的人，一个不偏不倚的列宁主义者，一个学说的保卫者，他只是为了事业的缘故才批评别人。甚至当他在政治局内部讲话时，也给人这样的印象。因而在他们相互斗争之中，托洛茨基还对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来访者描述斯大林是“一位勇敢而诚挚的革命家”。^①有人描述政治局的情

^① M·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以后》，第55页。

况时，就生动地谈及斯大林这样的大好人。巴然诺夫写道：

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局的一次会议时，三巨头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正在白热化。托洛茨基是第一个到会的。另外一些人迟到了，因为他们要在会前策划一番。……第二个进来的是季诺维也夫，他经过托洛茨基身旁，两人仿佛谁也不注意谁。当加米涅夫进来时，他向托洛茨基微微地点了点头。最后斯大林进来了。他走到托洛茨基的桌子旁，很友好地向他问候，并隔着桌子同他热烈握手。^①

在1923年秋季的另一次会议上，三巨头之一提议，让斯大林成为托洛茨基尚在负责的军事人民委员部的监察员。托洛茨基为这一建议所激怒，宣称他要辞去这一职务，并要求解除他在俄国的一切职务和荣誉，让他到德国去参加当地的革命，因为当时看起来德国似乎正处于共产主义大动荡的边缘。季诺维也夫提出反建议，也要求让他去德国参加革命。斯大林平息了这场冲突，宣称“党不能缺少这两位如此重要和可敬的领袖的服务”。^②

他在暗中谋划和等待。反对派虽然在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再度受到谴责，但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共产国际的态度也必须加以考虑。那些欧洲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无论是德国人、波兰人还是法国人，或者对使托洛茨基丧失信誉的行动表示抗议，或者企图说服敌对双方实行和解。

^① B·巴然诺夫：《斯大林，红色的独裁者》，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52页。

季诺维也夫在幕后费了很大的劲，才平息了那些人的“吵闹”。这是因为他有唯一胜利了的共产党的威信、国际的神话和十月革命的声望在支持他。他也支配着国际的财库，俄国是这个财库的最大捐献者，而一些欧洲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赖它。用尽了一切高压手段，开除或贬黜了许多共产党领袖，三巨头才使1924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表明反对俄国反对派的态度。斯大林在此以前一直远离共产国际，这时也在国际的波兰委员会上发表演说，严厉批评波兰人同情托洛茨基的偏向。^①

斯大林所以小心行事，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三巨头之间的政见不和。虽然到一年以后，即1925年，他们才争吵起来；但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个人之间的猜疑，已使他们的关系发生了麻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感到，斯大林正在加紧掌握党的机构，不让他们插手。斯大林则对他们在理论问题上的权威有所妒忌。在谴责托洛茨基之后不久，斯大林就第一次吹毛求疵地公开攻击加米涅夫在理论上不可靠。^②三巨头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之间的分裂，可能驱使任何一人同托洛茨基携手合作来反对另外两人。但并不是这一动机才促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缓和了对斯大林的攻击，虽然他们两人最后还是同托洛茨基携手合作了。斯大林在策略上考虑到了这一切。作为一个策略家，他证明他比对手们是棋高一着的。

最后，斯大林仍在等待他的对手因其所执态度而不能不铸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30—236页。

^② 同上书，第224页。

成的大错。托洛茨基是接受列宁迷信的，即使他的理智精神和欧洲情趣为此而受到了损害。列宁信徒的这件制服对他来说毕竟太紧了一些。但是，列宁的神话已经发展得十分厉害，以致任何人要想赢得共产党群众的心，就不能忽视它，更不用说向它挑战了。托洛茨基因而在战斗中陷入软弱的境地。三巨头大量引用列宁过去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批评；而使他更加困恼的是，他对列宁的责难都是十二年或十五年以前说过的老话。在一些青年共产党员的心目中，这些引语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样一幅图画：从1903年的分裂起，一直到布列斯特和约和工会问题的辩论，托洛茨基在每一事变的关头都恶毒地反对列宁。根据列宁主义的教条，托洛茨基自然要受到谴责了。

对托洛茨基说来，如果拒绝这一教条，那就意味着要呼吁非共产党的舆论来反对党。斯大林能够十分肯定托洛茨基不会去做这样的事。在党的外面，革命者无形的灰心情绪，同明显的反革命倾向混杂在一起。由于统治集团把托洛茨基作为攻击的目标，反而使他得到了许多过去恨他的人的虚假同情。当他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受到群众自发的鼓掌欢迎，这些人中有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新经济政策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确全都为了不同的理由而希望有一次变动。^① 恰恰因为托洛茨基拒绝把这些混杂的分子集合起来支持自己，所以他就几乎在每一行动中表现得胆怯和犹豫不决。他不能停止反对把自己和党等同起来的三巨头；但是

^① M·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以后》，第128页；B·巴然诺夫：《斯大林，红色的独裁者》。

即使在进行反叛时，他也仍然匍匐于党的脚下。他的每一行动因而都是软弱的示威。斯大林是有耐心的，他可以等待他的敌手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示威而自己败北。

正是在这一点上结成了死结，直到十二年至十三年以后的悲剧性审讯中才解开了它。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发现最重要的线索去理解那些审讯。在1924年5月的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面临党书记们不能缓和的敌意，已经接近于向他的批评者投降和公开放弃反对立场的程度。克鲁普斯卡娅、拉狄克和其他人劝说敌对双方和解。但是，季诺维也夫却不听劝解。他要求托洛茨基必须在行动和思想上都投降，必须承认他的批评都错了。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一个党员被模模糊糊地指控“在良心上犯了罪”，这还是头一个例子。这纯粹是一种神学上的罪名。但它的动机却是策略上的而非神学上的，因为托洛茨基虽然服从党的纪律，却不公开承认错误，他似乎仍然是三巨头的可怕敌人。季诺维也夫因而在投降的条件中增加了一条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东西，它将迫使托洛茨基去从事不平等的斗争。这样，恰恰是第一次提出“在良心上犯了罪”这样一条反党罪名的人，在十二年之后惊人地承认自己“在良心上犯了罪”而被处决了。斯大林至少在表面上同这一做法无关。他只重复地说，和解的唯一条件是托洛茨基必须停止自己的攻击。他不断地作出这种姿态，看起来好象是把手伸向他的反对者。

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的答复，孕育着这场悲剧，它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比对托洛茨基还要更加残酷：

最后分析起来，党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为

解决其根本问题而拥有的唯一的历史工具。我已经说过，一个人在自己党的面前，没有比承认错误更容易的事了，没有比说这样的话更容易了：所有我的批评、我的声明、我的警告、我的抗议统统是错误的。但是，同志们，我却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并不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一个人**反对党**必定不是正确的。只有同党站在一起，并通过党，一个人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还没有提供另外的道路来实**正确的东西**。英国有句谚语说：“不管正确还是错误，反现正它是我的国家”。我们有更大的历史理由来说：不管正确还是错误，在个别的具体问题上，它反正是我的党。……^①

这些出自反对派领袖之口的话，同一个爱国的英国异端分子所可能说的话不无类似之处。那些异端分子在承认自己的异端思想时，虽然怀着悔恨之心，却又是很顽强的。除了教会之外，他们看不到什么救星，但教会却又不是什么救星。斯大林讽刺地批驳了托洛茨基的声明，他说党并没有宣称自己是一贯正确的。

斗争的下一个阶段是所谓的“著作辩论”，它是在同年秋季开始的。托洛茨基写了一本名为《十月革命的教训》的书，把争论引向一个新的题目，它表面上同迄今所进行的争论无关。这本书研究了革命的技巧和领导在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它的主

^① 《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66和245页。还可参看M·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以后》，第88—89页。

要论点是，“革命形势”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机会，如果革命的政党没有注意到它或不愿去抓住它，就会失去这个机会。革命的确不是能够随意发动的；它是旧制度长期和相对缓慢崩溃的结果——这是它的“客观”条件。但是，一旦这种崩溃达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主观”因素，即领导的作用就开始了。革命形势的本质就是能动的，它迅速地起落着。阶级斗争从静止的战斗发展为闪电般的运动和演习，其中任何事物都取决于革命参谋部的主动和迅速决策。甚至是最革命的政党也会有某种程度的保守惰性。革命的右翼不能根据适合于形势的战略条件去思考和行动。它在决定性的地方和决定性的时刻畏缩不前，不注意时机的重要性，而希望这种在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无限地延长。托洛茨基用1917年的经验来说明他的论点，特别强调地提醒读者们注意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尖锐的不和。

托洛茨基的书看起来好象只是对近代历史教训的冷静而几乎是学院式的研究，但是对于只是在革命后才参加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来说，他对于1917年事件的看法，听起来好象是耸人听闻的、几乎是卑鄙而轻率的。托洛茨基把三巨头中这两个老资格的人称为右派的代言人、革命的“工贼”（列宁的用语）。在书的序言里，他还谈及当前的情况，把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战略同共产党人1923年在德国的做法加以对比。由于法国占领鲁尔，1923年德国发生了骚动。^①托洛茨基说，1923年秋，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但革命者仍然丧失了他们的良机，因为

^① 见托洛茨基的《需要研究“十月革命”》一文，载《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第29—119页。

他们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一样，也是胆怯而无所作为。表面看来，他是攻击德国共产主义领袖们。实际上，他的目标仍然是三巨头，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因为他是共产国际的主席，指导了德国支部的政策。

三巨头避开了这次打击。他们制造了自己对革命史的看法，其中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甚至否认了他们犹豫不决、不知所措以及同列宁不和的情况。他们也竭力贬低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作用。这是对革命史进行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修正”和“改正”的头一遭，到了最后，革命史几乎变成了无法辨认的天书，其中充满了无数互相矛盾和张冠李戴的叙述。此外，从1917年以前起，凡是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攻击和列宁的反驳，都再次从档案中发掘出来并加以公布。一般党员对这种情况都很厌恶，因为它看来同国家的悲惨情况以及党和政府的建设任务并无关联。许多人认为，这些领袖们正在莫明其妙地展示他们不负责任的情况。

斯大林是唯一威信没有受到损害的人。托洛茨基不管其观点对与不对，不得不受到使已经解决了的旧争论死灰复燃的责备。^①对于他过去反布尔什维克行为的不断重提，也不能说没有产生一定的效果。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尖锐地提醒大家注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的行为，的确使两人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是除了模糊的暗示外，托洛茨基却提不出什么证据来反对斯大林；这是因为斯大林在1917年时不管说什么或做什么，照例是隐姓匿名或采取一贯的难以捉摸的态度。这样，托洛茨基现在就在无意之中帮助了斯大林，使他获得了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优势。他们两人现在迫切需要总书记给他们提出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0—11页。

有利的证明，因为只有他似乎能够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见证人来说话了。果然，1924年11月，斯大林就为他的伙伴们的列宁主义正直行为公开作证。^①他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好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他们同党的不一致只不过是一个插曲。在列宁1917年返回俄国之前，他自己也曾发生过某些错误。但是只有那种身在党内而又不属于党的人，以一个局外人的恶意来观察党，现在才会重提那些旧的分歧，并起劲地来利用这些分歧。至于托洛茨基，他在十月革命中并“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的确，他“很会打仗”，但他只是中央委员会意志的执行者；而且可以顺便说一下，甚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后来转而反对革命，当时却也打得不坏。起义的实际领导者是“实践总部”，托洛茨基甚至还不是它的成员。这就是斯大林对于“修正”历史的第一个贡献，它使那些还记得起义实际过程的人大吃一惊。^②但是，整个说来，斯大林的论点听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而按托洛茨基的说法，党的领导看来是一个迟钝的组织，经常需要列宁的鞭策才能行动，这不能不损害了党的自尊心。甚至知道真相的列宁遗孀，也被说服出来庄严地捍卫她丈夫的两个最亲密的信徒；对于一般党员来说，她的证明就使问题解决了。^③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1—309页。

② 斯大林提到的“实践总部”有五个中央委员（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其他两人），他们是派到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而苏维埃是由托洛茨基主持的。作为单独的“实践总部”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它在十月革命的领导中也没有起作用。只是在斯大林高升之后，这种“实践总部”的传奇才在历史书籍中出现；但即使如此，它也提不出任何文件来支持这种说法。参看本书第5章，第192—193页。

③ 见纳·克鲁普斯卡娅：《十月革命的教训》，载《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第365—371页。

“著作辩论”仍在继续着。斯大林出版了他在1917年所写文章的集子，并增加了一篇有关的序言。这场辩论转到了当前的事物上，它具有新的重要意义，这充分表现在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中。

斯大林是在1924年秋第一次形成他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思想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信念，很快就成为忠于党和国家的最高检验。在随后的十年到十五年中，谁要是经不起这个检验，就免不了要受到谴责和惩罚。但是，如果人们研究一下斯大林文章的“导论”部分，他就会注意到这一事实：斯大林第一次提出这个论点时几乎是很偶然的，看来仅仅是“著作辩论”中的一个论点而已。在好几个月中，直到下一年的夏季，斯大林的对手中，无论是其他两个巨头还是托洛茨基，都认为这个论点不值得进行辩论。斯大林自己也还没有拿定主意。在他发表于1924年初的小册子《论列宁主义基础》中，他特别强调地说，虽然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夺得政权，却不能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他说：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

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①

但是，在他同年早些时候写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他却改正了自己的观点，从完全相反的方向作了断言。他停止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一版的发行，把它作为伪经而抛弃掉。起初他还没有意识到情况很快会使他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在暗中摸索着这个公式，当他认为自己正在驶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时，他仿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他当前的目的是使托洛茨基信誉扫地，并第一千次证明托洛茨基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三巨头研究了托洛茨基的过去，碰到了托洛茨基1905年提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发动一场争论来反对它；而在争论的过程中，斯大林完成了他们的公式。由于他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最初是作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对立物而提出的，所以理应对它们彼此的关系作一总结和分析。

托洛茨基从马克思那儿借来了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俄国的革命中去。^②他所说的“不断革命”有双重意义：他预见到，革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56—157页。

^② 托洛茨基是在1906年发表的著名小册子《俄国革命的结果和展望》中第一次提出这个理论的。在他被放逐到阿拉木图之后，于1928年写了《不断革命论》一书，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理论。该书于1930年在国外出版。

命将由于形势所驱，由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转变到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阶段。同当时一般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是先进的西欧国家而是落后的俄国。但是，俄国单独是不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的。革命也不可能停止在它的国界之内。它不得不从国内的阶段过渡到国际的阶段——这就是“不断革命”的第二个方面。在俄国的影响之下，西欧也将革命化。只有到了那时，社会主义才能在一个广阔的国际基础上建立起来。因此托洛茨基说，人类的进步现在不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而且还受到民族国家存在的阻碍。革命转变的最后结果只能是一个世界，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但是，这个预言中有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托洛茨基在1906年问道：如果革命没有能够从俄国传到西欧，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严酷地答道，那时它或者会屈服于保守的欧洲，或者在俄国经济和文化极端落后的环境中它会被腐蚀掉。

人们记得，在1917年以前，这个理论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个人贡献，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拒绝了它。列宁曾在一两个场合模糊地对未来提出过不无相似的看法；但是整个说来，他的政策是坚定地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的：俄国革命只限于反封建的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拒绝了“不断革命论”。然而他也的确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将会刺激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到了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在“先进国家”的帮助下，俄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所否定的不是革命的国际性质，而是俄国在西欧以前从事社会主义的内在能力。他责备托洛茨基“忽视”农民，因为只有忽视农民对

于私有财产依恋的人才认为，在象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只凭自己的力量就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人们也还记得，列宁于1917年改变了他的想法。他的党在一切实质上接受了不断革命的论点(当然不是它的有些咬文嚼字的名词术语)。革命也的确从反封建主义转变为反资本主义阶段。一直到最后，列宁和他的追随者都期望着革命能够传到俄国以外的地方去。这时，他们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受到包围的堡垒，有足够广阔的空间和力量来坚持住。他们认为，在按照社会主义路线来组织这个堡垒的内部生活方面，能够作出重大的进展。在鼓励他的追随者完成这个任务时，列宁(还有托洛茨基)强调地指出了在他们眼前展开社会主义试验工作的可能性。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从国际出发的。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在1924年仍然说，“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但是他现在却说，单靠俄国的努力就足以完成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工作。社会主义经济迄今一直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种极为富足的经济。它的前提就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能力，能够保证整个人民的高度生活水平。这就产生了问题：象俄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微弱的工业已经荡然无存，如何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呢？斯大林指出俄国有巨大的资产：它的广袤的空间和极为丰富的原料。照他看来，无产阶级政府通过对于工业和信贷的控制，就能发展这些资源，使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成功，因为在这样的努力中，它会得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斯大林公式的这个最本质的部分是非常简单化的。它以清

楚的语言向人们宣布，俄国革命是自给自足的。的确，斯大林在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前就作出了这个结论。他甚至于不想去回答他的批评者后来对他的论点提出的异议。其中的一个异议说，大多数农民由于迷恋他们的私有财产，肯定要对集体化进行最坚强的抵抗。他对此只是简单地把它说成是对农民的一种恶意诽谤。他也没有认真地考虑另一个论点，即只有在大多数先进西方国家已经实现的密集工业化基础上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而俄国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赶上那些国家的。按照他的批评者的意见，只有社会主义提供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它才能够击败资本主义。这些批评者推论说，如果俄国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仍然比资本主义国家低，那末从长期来看，即使俄国的社会主义也会失败的。斯大林也没有企图来反驳那些批评者的以下预言：在一个匮乏的经济（就象孤立的俄国经济将要成为的那样）中，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肯定会产生一种新的和明显的物质上的不平等。

但是，不管斯大林的推理中有什么缺点，这些缺点只是党内最有教养的人才能看得出来，他的公式在政治上来说却是很有效的。它毕竟包含着一种清晰而积极的主张：我们能够自力更生，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大厦。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个公式对于论战和实际目的都是有用的。对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它提供了另一个清楚明白的代替物。然而，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斯大林却没有以简单而鲜明的形式提出他的论点。他用各种保留和限制的说法来束缚着它。其中的一种保留就是：只要存在着周围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威胁，就无法考虑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单独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象他的批

评者说的会被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便宜货物”所打垮；而它可能被武装力量所击败。在随后几年中，斯大林就经常谈到俄国面对的这种危险，因而似乎削弱了他的论辩。而且，他还继续表示了对世界革命可能性的信念，虽然这种信心越来越减退了。总之，他在论点中一方面宣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绝对可以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又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这场热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其奇怪之处还不仅于此。在争论过程中，斯大林硬说他的批评者认为在俄国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他就把这场争论说成是这样两种人之间的争论，一种人相信革命的“创造力”，另一种人是“灰心失望”和“茫无所措”的。到了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了。他的批评者无疑地并不是主张俄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也断言过，这个国家的经济是可能和必须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去进行组织的。特别是托洛茨基，自从内战结束以后，他就敦促政治局从速加强计划经济的管理工作；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他还提出了许多主张，其中大多数后来都体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①

研究这场争论的学者因此常常有这种奇怪的感觉：这场争论的目的是难以说清的；它引起了无限的激情和怨恨，结果却是一场过眼烟云。撇开那些争论中的曲解和暗讽不说，使研究

^① 布哈林的《反对派经济纲领批判》一书，完全是为了批评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经济观点的。书中引证了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的信（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在信中总结了政策是：“计划经济；工业高度集中；成本大大下降”（布哈林书第54页）。托洛茨基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发表的《新方针》中，要求财政和金融政策服从工业化的需要（该书第71—72页）。这些主张使他受到了这样的谴责，说他鼓吹“工业独裁”和“超工业化”。见布哈林书，第53—54页。

者大感惊奇的是，这场辩论最后却集中在一些完全不相关的事情上。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或应不应该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于一个孤立的国家能不能够**完成**这个建设。打个比方说，敌对双方并不是争论可不可能和愿不愿意建设他们所希望的大厦；也不是不同意用什么材料和以什么形状来建设它。表面看来，唯一争论之点是可不可能给这座大厦盖上顶子。斯大林断然地说能，而反对派则断然地说否。^①但是他们双方都仍然同意，这个“顶子”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盖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在一两代人中才能实行。双方也同意，敌对力量可能在建设的任何阶段上来破坏这座大厦——他们经常看到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俄国上空。最后，斯大林也象他的批评者一样承认，在盖上屋顶以前很久，他所提出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因为西方的革命将使社会主义的俄国摆脱孤立的地位。

对于争论者来说，这似乎是荒谬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实际的活动家，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而且照他们的表现看来，他们还能够同走一段很长的路程，而把他们之间的分歧留给职业性的经院学者去解决。那末，整个争论是不是个人野心冲突的一种烟幕呢？个人的敌对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强大因素。但是如

① 在辩论的最后阶段，斯大林于1926年1月这样提出了他的观点：“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没有这种可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没有前途的建设，就是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的建设。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不相信我国技术落后并非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否认这种可能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离开列宁主义。”（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60页。）

果历史学家把整个事情看得如此简单，他就大谬不然了。他就仍然不得不解释一下：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竟使布尔什维主义从上到下发生分裂，为什么它会成为俄国整整一代人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什么它决定了这个伟大民族四分之一世纪的观点。另外一种说法也经常出现，即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是为了缓和外国政府的怀疑，因为它们已经为莫斯科指挥的“颠覆”活动感到不安了。这种说法更是没有什么意义。当斯大林制定他的这个理论时，他的名字几乎还不为国外所知；即使到了后来，缓和外国怀疑的想法，也并没有妨碍他对欧洲共产主义发出使外国保守势力为之战栗的声明。

就象一些重大争论中所时时发生的情况那样，争论的双方都强烈地信奉某种共同的原则。因此对于这种争论，就不能从争论者表面说的话，而且肯定不能从他们热情申述的“共同”原则，而必须从他们对自己论点侧重的微妙而经常是不易察觉的变化中去寻求。这种解释还可以进一步从争论者行动和发表谈话时周围的心理和情绪中去寻求。归根结蒂，学说上的争论都是从那些情绪中产生的；情绪是一种共鸣板，它把重要的声音传达给到处流传的表面看来是不易辨认的各种公式。由于争论者信奉共同的原则，所以听众们对他们的争论是无动于衷的，把这看成是老一套的仪式。但是听众们对于双方的各种暗示和暗讽，也还是侧耳倾听的；而且还贪婪地研究双方话语中的含义和没有说出来的结论。他们很快就从那些似乎是矛盾的保留条件和例外条件中知道了任何公式的起作用的部分。

现在斯大林论点中起作用的部分，即其中真正新鲜而生动的东西，乃是他断言俄国革命的自力更生。其余的都是传统的

布尔什维克老话，有一些已经毫无意义，另外一些则是麻烦的。但是所有这些都还必须不断地重复，因为它们从学说上来看是体面的。斯大林论点中的新东西，表明了一种对于党的态度的激烈修正。但是这种修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的：似乎它不是拒绝修正，而是一种思想正统路线的直接继承。在许多学说的历史上，这种方法是屡见不鲜的。我们不想引导读者进一步去探索这一场教条主义的丛林战争。只消说一说下面这个情况就够了：斯大林正竭尽全力地把他的公式嫁接到他从列宁那儿继承下来的整个学说上。

比这种教条之争更重要的事实是，在革命后第七和第八年的现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很可能是其中的大多数，虽然模糊但却很坚决地感到，需要对意识形态估量一下和作出修正。这种需要是情感上的而不是理智上的；而且感到有这种需要的人，决不想同布尔什维克正统观念公开决裂。从来就没有什么革命政党掌权七年而不在它的观点上发生深刻变化的。布尔什维克这时已经习惯于管理这个“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国家。由于他们在政权中所享有的特权和责任，他们已经逐渐获得了自信心和自尊心。当他们还处于劣势时的那些特有的学说和观点，已经不能完全适合目前的观点。他们需要能够充分表达新赢得的自信心的一种思想或口号。“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就满足了这种要求。它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对于不能控制的六分之五世界的依赖感。它在理论上给他们一种慰藉：除非发生战争，什么东西也动摇不了他们对俄国的主宰。迷恋私有财产的农民，国家在工业上的弱点，低的生产率，甚至低的生活水平——所有这些都构不成旧制度复辟的威胁。不管谁（就象托洛

茨基和后来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谈到那些情况所带来的对革命的危险性时，就会触犯党的自满情绪。

这种心理状况还仅限于统治阶层内存在，但在它的下面则有更为广阔的暗流：党和工人阶级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所朝思暮想的世界革命已经等待得越来越不耐烦了。这种期待曾在1917、1918和1920年破灭过，到了1923年德国的骚动中又再度升起。这次又由于希望的迟迟不能实现而使全党灰心丧气。“欧洲的工人阶级不再支持我们了；他们听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话，拜倒在资本主义的纸醉金迷生活之下”——大略说来，这就是许多有政治头脑的工人对西方日常消息的评论。这是一种令人烦恼的思想，它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分不开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俄国共产主义的命运仍然被认为最后取决于外国共产主义的胜利或失败。通常在谈论“落后的”俄国和“先进的”欧洲时，有些党的演说人甚至列举了俄国贫穷和西方富足的一些有力的比较数字，这就有些伤害了民族的自尊心。一般的布尔什维克一心一意地要摆脱这种思想，而斯大林仿佛就是为他们提出那种理论来的。

大概说来，斯大林告诉党的就是：我们当然期待着世界革命。我们当然是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知道，当代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从其本质来说，就是国际性的。我们当然仍然相信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正在临近；我们引以为荣的是尽我们所能地去加速这种胜利的到来。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具有高度启发性的“但是”），不必为世界革命伤这么大的脑筋。即使它无限期地推迟了，即使它永远不会发生，我们这个国家也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羽毛丰满、没有阶级的社会。那末就

让我们集中精力来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吧。那些说这是乌托邦的人，那些说我正在鼓吹民族狭隘思想的人，他们本身不是投机者就是胆怯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和我们很多受到鄙视的农民，已经为社会主义做了比所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加在一起还要多的工作；而且我们还要和我们的农民一起，去做其余的工作。^①

剥去了在名词术语上的虚夸和伪装的辩证法深度，斯大林的理论就缩小为一些大实话。但是斯大林作为它的作者，这时却成为一个自立的理论家了。现在他不仅是总书记、党的行政专家，而且也是一个新教条的作者了。对于一些老的、有教养的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出乎意料之事。记得在那些日子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斯大林卷入一场理论的争论中，他被一个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梁赞诺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打断：“算了吧，柯巴，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谁都知道你在理论方面并不在行。”但是，这位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优越的讽刺，并没有防止“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变成了国家的信条。尽管它是老一套的东西，但斯大林的这一发明却有自己的份量和存在的理由。一般说来，理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从一系列智力活动开始，大胆地探索遥远的、还不清楚的未来；另一类虽然在思想上根基不深和在预见性上没有什么创见，但却总结了一种有力的和前此没有人表达出来的舆论或情绪的趋势。斯大林的理论显然属于第二类。

俄国社会在二十年代中真正悲剧性的特点是渴望稳定，因为在经历了最近的一些事情之后，这种渴望是理所当然的。任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2页。

何国家的未来都不是很稳定的，但最不稳定的还是俄国。因此俄国政治中压倒一切的动机，就是希望至少长期的（非常长期的）延缓这种风险。二十年代晚期以前所实际解释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就提供了稳定的前景。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光是这一名称听起来就好象是对已经疲惫不堪的一代人的不祥警告，说他们没有希望在有生之年得到和平和安静。这个警告后来应验了（虽然其方式不是它的作者所期望的），但它却几乎没有受到注意。

很多布尔什维克害怕担风险和不稳定的前途，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时就直接利用这一点。他把托洛茨基描述为冒险家，习惯于玩弄革命的把戏。这种指责不用说是无根据的。在所有关键时刻（在1905、1917和1920年），托洛茨基证明自己是最认真的革命战略家，并不倾向于轻率的冒险。他也不曾要求党在任何外国实行政变，而斯大林却不是这样的。^①托洛茨基坚定地认为，西欧的共产主义会在阶级斗争的一般进程中依靠自己内在的势头而赢得胜利，外界的倡议或帮助虽然有时是重要的，但只能起一种辅助的作用。斯大林估量西方共产主义的机会时是抱着更加怀疑的态度的；而且他的怀疑与日俱增。尽管如此，“冒险家”的头衔却牢牢地钉在提出“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家头上。斯大林甚至走得更远，指控托洛茨基喜欢搞据说曾经使列宁都害怕的恐怖活动。这种指控也是不公平的，特别它出自斯大林之口。托洛茨基在内战中并不惮于使用恐怖手段，但他并不喜欢使用它，就如外科医生不喜欢放血一样。但是，在刚才描述的情况下，这种指责却是颇为雄辩的。人们害怕继续实行

^① 参看本书第十章。

恐怖政策，就容易认为，对托洛茨基提出这种指责的人，他本身至少是心胸广阔的。

斯大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对于党内外所有心理上的潜流，如无言的希望和默默的企求等，是十分敏感的。他认为自己是这些潜流的一个代言人。在这方面，他同其他两巨头十分不同。在“不断革命论”的争论之初，他们三人是一致的；到了后来他们就分道扬镳了。正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承认的，他们开始这场战役时，是为了引用列宁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一些过时的话，来使托洛茨基丧失声誉；但在心目中他们对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无争论，因为它在党内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思想了。因此他们对托洛茨基理论的攻击就是非常不真实的；他们不过是对革命前流亡期中早已被遗忘的插曲作毫无意义的挑剔。他们甚至想都没有想到用自己积极的理论去反对托洛茨基。斯大林却不是这样的。对他来说，开始时也是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假想敌，后来才发展为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斗争。辩论的论点于是成了争端。他逐渐感到对他的敌手的观点是真正憎恶的，因此他不得不用某种积极的东西来与之抗衡。他了解自己的论点中什么东西可以引起党的官员和工作者的最强烈反应，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动员舆论的工具。“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不期而然地就成为了这种工具。就象受到了天启一样，一种心里虚构的东西，即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幻景，立刻使他着了魔。但是它所以能够这样，还是因为它符合许多人潜在的心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很长时期中没有注意到他们伙伴的这种变化。对于斯大林在单独一国可能建成羽毛丰满的社会

主义这一奇想，他们只是耸耸肩膀；他们只把它看成是一条棍子，由他们在智力上较差的那个伙伴拿着去揍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就不必去详细地研究它了。甚至在1925年3月至4月，斯大林要求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正式批准这个理论而且果然得到了批准时，他们两人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到了第二年秋天，在斯大林提出这一观点后近一年时，他们才对它的意义有所憬悟，并批评它是抛弃传统的布尔什维主义而赞成民族共产主义。托洛茨基在1926年以前还没有向这个教条挑战，而那时这个教条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了。

斯大林理论的实际含义还是不清楚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时已经达到革命后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個关头；但是迄今这次变化还只影响到它的精神方面而没有影响到它行动方面。这种变化的大致路线可以归纳如下：在此以前，布尔什维主义一直把俄国看成是现代文明的边缘。革命首先在这个边缘开始了；社会主义在那儿发现了它的实践上的先锋队。从那儿推动了西方和东方的革命变化。在世界范围的社会改造中，俄国被看作是整个运动的强大的倡议者。但是西欧仍然是现代文明的真正中心；而且按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看来，正是在这个中心而不是在那个边缘，最终将形成新的社会生活的形式。整个过程被看作是一种双重的影响：首先是俄国影响西方，然后是社会主义的西方影响俄国。

按照斯大林的理论，俄国不再扮演文明世界的边缘角色了。正是在它的国界内，新社会的形式正在被探寻和创立起来。它的使命就是成为一种新文明的中心，它在各方面都优于正在以巨大力量捍卫自己的西欧资本主义文明。这种对未来的

新观点，无疑地反映了俄国共产主义对于自己的孤立所产生的恼怒；但是它却用光辉灿烂的前景来使这种孤立镀上一层金。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已经筋疲力尽和大失所望，正在缩回到它的民族的硬壳中，睁着痛苦的眼睛欣赏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前景。

第八章

“大转变”

导言：斯大林是一个中庸之道的人。——托洛茨基的失败和三人执政的结束(1925年)。——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领导的右派的出现。——斯大林支持亲农民的政策。——对世界资本主义情况的争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转而反对斯大林(1925年)并同托洛茨基携手合作(1926年)。——伏龙芝事件。——斯大林捍卫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胜利(1925年)：“团结在斯大林周围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斯大林的揭露。——托洛茨基的“克里蒙梭声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开除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投降”。——斯大林同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对立(1928—1930年)。——农民威胁要使城市挨饿。——斯大林开始农业的集体化工作。——政治局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俄国(1929年)。——右派领袖的贬黜。“斯大林是当代的列宁”。——斯大林命令“向富农发动进攻”(1929年底)，并宣布把俄国转变成为工业强国的计划(1930年6月)。——农村中的混乱和实际上的内战。——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2年)期中苏联的一般概况。——斯大林和克伦威尔。——斯大林诉诸民族感情。——斯大林随从中政治骚动。——斯大林的妻子纳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11月

自杀。——斯大林的社会政策。——劳动管理、强迫劳动和反平均主义。——工业化的成就。——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原始积累”。

在列宁逝世后五年的1929年，苏联又从事它的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是斯大林一手操办的。就其规模和对约一亿六千万人生活的直接影响来说，甚至比第一次革命都更彻底和激进。它的结果是使俄国迅速地工业化了；它迫使一亿多农民放弃了小而原始的土地财产，建立了集体农庄；它无情地从农民手中夺下原始的木犁，迫使他们握起现代拖拉机的方向盘；它驱使千百万无知的人进入学校，使他们能够读写；它从精神上把俄罗斯欧洲部分从欧洲分离开来，而又把俄罗斯亚洲部分向欧洲更加靠拢。这次革命的收获是惊人的，但代价也太大，它使一整代人完全丧失了思想和政治的自由。这次剧变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要有很大的想象力才能估计出它的艰巨和复杂性。甚至不同时代人类的一些丰功伟绩也要让它一头；俄国历史上的一些最大的改革者如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以及其他民族的一些大改革者，比起这位总书记的巨大形态，似乎也成了侏儒。

但是这件巨人的袍子和斯大林的身材是不合适的。在第二次革命的规模和它的制造者的才干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不相称；而这种不相称的情况，在1917年的革命中却是不显著的。在1917年的革命中领袖和事件都同样地伟大；在这次革命中，事件是伟大的，因而似乎使领袖也伟大起来。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他们的革命实现以前很多年就已预见和准备了它。他们的思想为1917年的收获而肥沃了俄罗斯的土地。但斯大林却不是这样。第二次革命的思想不是他自己的，他既没有预见到也

没有准备它，但是他（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他独自一人）却完成了它。他起初几乎是因为迫在眉睫的危险而匆匆忙忙地去解决这一庞大任务的。他尽管心存畏惧，却开始在暗中去摸索。后来，他骑虎难下，就几乎毫不停顿或休息，大踏步地前进了。在他的后面，跟随着千千万万双疲惫而流血的俄国人的脚，跟随着一整代在一个国家中寻求社会主义的人。他的形象似乎达到了神话的程度。但是逼近一看，他仍然是一个具有极普通才干和中流思想的人。只有他的拳头和脚同他真实的身材相异——它们是巨人的拳头和脚。

上面我们已经叙述了斯大林在1925—1926年的生活。从那时以后，斯大林的共产党对手们曾经一再把他的描述为反革命的反动派领袖，而大多数反共人士又一直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共产主义幽灵。不过，在二十年代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中，他主要是一个中庸之道的人。他天性上就讨厌当时那些竞相要求党承认的极端观点。他的特殊任务就是产生一些准则，使两个对立的极端似乎都能妥协。对于党内犹豫不决的多数党员来说，他的话听起来就好象是常理。他们接受他的领导，是希望党能够可靠地沿着“中间道路”前进，并把“安全第一”作为指导原则。可以说，他就象是布尔什维主义中的鲍尔温或张伯伦、哈定或胡佛^①，如果把这些名字同布尔什维主义联系起来不是太不恰当的话。

他从未能够坚持住中间道路，这既不是他的过错，也不是他的功劳；而且他常常由于去冒最大的风险而被迫放弃“安全”的

^① 前两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首相，后两人是第29届和第31届的美国总统。据说他们都以温和著名。——译者

考虑。革命照例是不会容忍中庸之道和“常理”的。革命队伍中那些想走中间道路的人，常常发现他们脚下的大地正在裂开。斯大林就曾一再地被迫采取突然而无规律的猛烈跳动，时而跳到这个极端，时而又跳到另一个极端。我们将看到他三番五次地或者走得比他的右翼批评者更右，或者走得比他的左翼批评者更左的地步。他的阵发性的急转弯，就是一个执中庸之道的人企图在社会大变动中保持平衡的痉挛性发作。使人感到吃惊的是，他多么好地保持住了平衡——如果是一个更少弹力的领袖，不用说多次的跳跃，就是一次也就足以摔断脖子了。

因此，尽管他倾向于调解布尔什维克中间的分歧，他却不是一个能够妥协的人。除了这些分歧根本无法调和的原因以外，他本人也不具备那种调解人的性格。他同那些能够妥协的人只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也怀疑走极端的效果。但是他缺乏平和之气，没有说服人的本领，对于一个政治调解人去缩短相反意见之间的距离也无真正的兴趣。他的性格同妥协完全相反；他思想和性格的矛盾，正好是他行为的基础。他在党内坚持的准则，一部分借自布尔什维克右翼，一部分借自布尔什维克左翼。这是一种奇怪的妥协准则，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使两个极端靠拢，而是助长两个极端，然后摧毁它们。对于那些似乎走在他右面或左面的人，他是不去调解的，他干脆消灭他们。他使中庸之道具体化为独裁，去对付革命后社会上出现的所有难以驾驭的思想和理论；这种中庸之道的独裁，其本身就不再是中庸之道了。

• • •

我们已经谈到了斯大林鼓吹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教条。

现在让我们迅速地来追溯他在继承列宁的斗争中所进行的以下几个步骤。1925年1月，他终于使托洛茨基辞去了军事人民委员之职。托洛茨基作为部队首脑，仍握有一张最可怕的王牌。如果他想搞一次军事政变，他可能会击败那三个巨头的。但他却乖乖地离开了他的职位，丝毫不打算集合他曾经建立和领导了七年的军队来捍卫自己。不管党如何进行领导或由谁在领导，他仍然把党看成是工人阶级合法的发言人。所以他认为，如果他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他就会自动地使自己成为别的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来反对工人阶级，他就会走上他拒绝走的波拿巴主义道路。托洛茨基在辞去军事人民委员之职后，就按照斯大林的指派，潜心从事经济机关中的次要工作。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有一年多完全脱离了一切公开的论战。

在托洛茨基消声匿迹之后，连系三人执政的唯一纽带就断了。一直到了最后，季诺维也夫还吵嚷着要更加严厉地对付托洛茨基，甚至要把他逮捕起来。斯大林反对这一要求，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说，把托洛茨基排除出党的领导之外，这是“不可思议的”事。^①不久以后，他就采取主动来破坏三人执政：他拒绝在政治局会议之前同他的另两个伙伴商讨他的动议。无论从那方面来看，他已是党的无可争辩的主人，即使加米涅夫仍固守在莫斯科的组织之中，而季诺维也夫也还领导着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不过，尽管斯大林已经紧紧地掌握了党，他还是只能通过合法的途径，作为政治局中多数派的发言人来坚持自己的领导。党内集权主义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如许的程度，足以使它的党员屈从于任何单一领袖的赤裸裸的独裁。的确，斯大林当时老

^① 1924年12月18日《真理报》。

一套的说法还是，列宁的学生中没有谁单独能够继承列宁的衣钵，只有作为一个集体才可望进行领导。^①这个集体就是政治局；政治局的意志是通过多数票来合法地表现的。在1925年，这个组织有七名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结束了三人执政之后，斯大林现在完全依靠三名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他们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这个新的组合恰好同党和政治局中右翼的形成相合。这个过程开始于1925年上半年，完成于1925年下半年。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这一新倾向的主要发言人，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出面领导左翼。这个新的组合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几次组合。在列宁领导的大多数时期里，布哈林领导了左派共产党人，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就为最温和的集团代言。在列宁的时期里，各种派别的分野既不固定也不明显。派别随着政治舞台的变化而出现和解散；随着情况、问题和态度的改变，个人也从这个集团转到那个集团。昨天是左派，今天又成了温和派；反之亦然。当时还没有什么忠于集团、小圈子和小派别的观念。现在的这个组合就完全不同了。它具有固定的论战观点和严格的分野；带着不可改变的已成定局的特点。在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左翼和右翼都有着彼此对抗的纲领和口号。

斯大林既不属于这一翼又不属于另一翼。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不得不同右翼的发言的人们携起手来，因为他要依靠他们在政治局里投赞成票。比之于他从前的那些伙伴们，他对新右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8页。

翼的人们感到更亲近一些。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接受他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却谴责这种理论。公平地说，布哈林还应该被看作是这个理论的合作者之一。他为它提供了理论上的论据，并使斯大林的多少有些粗糙的说法带上了学术的光泽。^① 性格上的相近，也使得斯大林同右翼领袖们结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首先就是一些空想家，布哈林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却象斯大林一样主要是行政官员。李可夫这时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即苏联的总理。托姆斯基是工会的领导者。他们两人都以极大的谨慎、坚强的（虽然是狭隘的）现实感和无可怀疑的真正管理着巨大的行政机器。他们同斯大林讲一样的习语，即行政官员的习语。尽管如此，斯大林在他的新联盟中还是感到不安。由于他是政治局中唯一的中间派，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他的盟友们的俘虏。他利用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在1925年12月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被选入政治局。他们实际上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虽然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更加瞩目右翼而非斯大林。莫洛托夫是一个思想迟钝而古板的人，但却极有耐心和工作能力，从1913年他协助斯大林出版第一期《真理报》起，他就如影随形一样忠实地追随着斯大林。斯大林在他身上产生的迷惑力，就是一个狡猾而冷酷的人对缺乏这种性格的人所经常产生的那种迷惑力。

^① 直到三十年代早期，俄国和欧洲的共产主义者还习惯于从布哈林的著作而不是斯大林的著作中找寻论据。布哈林的两本书，即《共产主义的ABC》（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写）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宣传的两本最重要的标准著作。

这场新论战中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实际解释新经济政策。在新经济政策下，这个国家具有混合的经济结构。国有工业构成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在商业和小规模工业中，私人企业居于优势。农业还被私有制统治着。一般都认为，只有在同私营企业的竞争中不断扩大社会主义部分，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由此也就产生了问题。究竟应该允许多大限度的竞争，它将采取什么形式呢？大家都一致同意，这个国家需要两个部分之间一定程度的和谐和合作。如果不从个体农民那里购买食物和原料，不把一部分产品出售给他们，社会主义工业就无法进行。商品的分配又依赖于私商。但是这两部分的竞争就包含着它们之间一定程度的敌对。农民吵吵嚷嚷地要求更多和更便宜的工业品，要求自己的产品能卖高价钱。工业才从废墟中缓慢地恢复着，生产的货物很少而价钱很高，也吵吵嚷嚷地要求便宜的食品和原料。笼统地说，“布哈林集团”十分强调国民经济各部分之间协调一致的合作，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强调它们之间利益的冲突。

这个总的问题又变成了两个更为特殊的问题：俄国工业化的速度；政府对私人农业的态度。左翼布尔什维克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在于工业恢复缓慢，因此迫切要求迅速地实行工业化。右翼则认为，必须确保社会主义的阵地，即使放慢工业化的速度（象布哈林说的“蜗步”）也在所不惜。^①工业化是大家“在原则上”都同意的，但它需要资金。这就必须尽量向私营企业和私人农业征收。布哈林担心这样的征收会破坏私营

^① N·波波夫：《党史纲要》，第2卷，第268页；《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35页。

企业的主动性，从而打乱已经不稳定的经济平衡。左翼争辩说，农民和商人无论怎样都不愿提供货物，只有把更多和更便宜的工业品投入市场，才能促使他们出售更多的食品和原料。

与此同时，农民们吵着要求扩大在新经济政策下对他们的让步。他们要求减少农业税。富裕的农民迫切要求废除雇工的限制。由于限制土地的出售，他们也迫切要求允许长期出租土地，要求在农业上自由投资，等等。执政党坚决主张同贫农和“中农”而不是同富农“联盟”^①。实际上还必须向富农让步，因为他们还经常拒绝向城市提供粮食，并引诱别的农民也这样做。在二十年代中期，农民出售给城市的粮食仅及他们在战前出售的三分之一。

1924年夏，格鲁吉亚发生了农民的暴动。一部分原因是在1921年的入侵中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感情受到损害，现在作出了迟延的反应。一部分原因也是对经济情况的不满。斯大林召集党的各农业组织书记开会，并警告他们说，“俄国各地都会重演格鲁吉亚发生过的事件”。^②他总结说，党已经失去同农民的联系；必须比以前更加小心和信任地去接近农民。

但是仅仅宣布要信任农民是不够的。政治局对下一步如何做未能轻易地定下决心。起初，这一争论还没有引起明确的分野。季诺维也夫力主给农民在苏维埃中更大和更多的实际管理权。托洛茨基争辩说，需要给他们以经济上的刺激。后来当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主张一种明确的亲农民政策时，这个

^① 农民被下面这种愚蠢的方法分成三个集团：雇工的“资力雄厚的”农民被划为富农；那些小有财产但也出卖劳动力的农民被称为贫农；中农则是自立的小农户，既不雇工也不出卖劳动力。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67页。

分野就明确化了。他们三人要求政府鼓励能够给城市提供粮食的富裕农庄的发展，因为贫农、甚至中农仅仅能够生产自己糊口的粮食。这种态度的逻辑结果就是，要求党放弃对富裕农民的敌视；按照布哈林的看法，这些富裕农民并不构成对社会主义的危险，只要政府掌握了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统帅地位”的工业、运输和银行就行。最后，布哈林认为，甚至富农也能够多少无痛苦地被吸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虽然社会主义的航船不得不按发展最慢的部门（即农业部门）的步子前进。布哈林坦率地号召农民“发财吧”。

斯大林在政治局里倾听着这场辩论，起初并没有表态。为了实际上的方便，他倾向于接受亲农民集团的政策。但是他在心里却有保留，特别是当右翼公开鼓吹向富裕农民让步时。他企图说服他的同事们要更加谨慎一些；他拒绝对布哈林坦率地向农村**资产阶级**发出的呼吁承担责任。当最后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时，他的说法却是折衷主义的。实际上他已选择了布哈林所鼓吹的路线，但又急于表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正统的信徒。

1925年4月间一次党的会议，打破了最近这些辩论的均势。^①农业税被削减了。对出租土地、雇工和资本积累的限制也大部分撤销了。亲农民集团取得了初步胜利。它主张这条路线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资本主义农业，而是因为看到这种农业是改善城市粮食供应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国内政策的改变，对国际形势的一种新观点也被接受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告诉全党说，欧洲的革命紧张时期已经结

^① N·波波夫：《党史纲要》，第2卷，第227页。

束，外国资本主义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这肯定要使苏联在未来的长时期中处于孤立地位。右翼的发言人预言，资本主义国家会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时期，也许就类似 1914 年以前的情形。^① 斯大林小心地强调了一下可能打破“稳定”的情况，但是他议论的一般调子还是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克服了大战的后果，国外任何新的革命危机前景多少还是遥远的事。^② 现在看来，这些预言作于 1929 年大萧条以前两年，似乎是使人大吃一惊的。对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对于当时苏联政治中的渐进主义（差不多同费边主义一样）的倾向，这些预言倒不失为一个奇异的姐妹篇。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正是在反对苏联的费边主义中成为反对派的。他们谴责亲农民的政策说，富裕农民越强大，他们就越容易拒绝向城市人口供给粮食，并从政府勒索越来越多的让步。一句话，他们就越容易损害苏维埃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政府应该减少对中农和贫农的税收，而增加对富裕农民的税收。这时国家受到了周期性粮食危机的威胁。在过去，粮食的供应是由地主的大庄园保证的，现在这些大庄园已经被分散了。革命前俄国有一千六百万个农庄，现在却有二千四百万到二千五百万个。政府应该着手建立大农场，即商品粮食的生产者。但大农场应该是大的集体农庄，而不是富农的大农庄。

照左翼布尔什维克看来，不可能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从个体农民到集体农庄这一大转变只能在得到农民同意的情况

① 波波夫前引书，第 282 页和散见各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季诺维也夫的报告，第 642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46 页，并散见各处。

下逐步实现。只有政府对集体农庄提供适当的引诱，如供给拖拉机、肥料、种子等等，贫农群众才愿意参加集体农庄。这些东西将会大大增加农业劳动的产量，使其他小农相信集体农庄的好处。但是，又只有工业发展了，才能提供这样的一些东西。此外，还必须教会农民使用机器。因此大家都认为，农业的转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左翼分子说，政府至少应该下决心去开始这一改变。

左翼布尔什维克还拒绝接受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看法。他们一再重复列宁的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也开始了全世界革命转变的时代。在他们看来，国外共产主义运动浪潮暂时的消长，并不影响这个时代的基本的革命性质。左翼布尔什维克指出，中国的革命正方兴未艾，英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经雷声隆隆。

1925年秋，这场辩论从政治局扩大到报刊和公众集会上去。季诺维也夫发表了《时代哲学》一文和《列宁主义》一书。10月间，左翼领袖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要求对所有的争议问题进行自由的辩论。这份备忘录类似于托洛茨基以前的几次干预，它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鲁普斯卡娅和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签名。

真正的论战是在两个极端派中进行的。斯大林对这场论战没有贡献出任何一点自己的思想。他在一旁斜眼盯着那个大胆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计划，并把他以前的那些伙伴和追随者称为“超工业化者”，虽然同他几年以后提出的那些计划比较起来，他们的计划几乎可以说是很胆怯的。他谴责他们企图破坏工农联盟，虽然同1929—1930年的集体化运动比较起来，左翼布尔什

维克提出来的“反农民”的措施还是非常温和的。右翼所鼓吹的方针，在他看来是很保险的，而且对眼前有很大的好处。^①

但是他煞费苦心地在党内表现为一个中间道路的拥护者。他为农民说话，也就是为贫农和中农说话，但反对富农。他斥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他们所鼓吹的恰恰不是对富农的敌视而是对中农的敌视。他把他们称为超工业化者，然而在他向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计划中却包括了工业化。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直到1928年年底，工业化实际上被束之高阁，而右翼的纲领却正在执行之中。斯大林模棱两可的中间原则是很管用的，它既批准了右翼的政策，又使那些选择左翼（如果说他们必须在左翼和右翼中作一选择的话）的人感到安心。

* * *

同时，斯大林还得益于这样的情况，即托洛茨基和那两个前执政者对是否携手合作来反对斯大林还有些犹豫不决，虽然这时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点。从这种有利的立场出发，斯大林注视着他的分裂了的对手们，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羞于主动接近，彼此之间还有猜疑和怨恨。他火上添油，模模糊糊地表示一下对托洛茨基的友好，使得对手们更加混乱了。这位总书记的代理人殷勤地提醒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反对他们的斗争中，是季诺维也夫而不是斯大林表现得最恶毒。斯大林本人则在他1926年1月发表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把争论的矛头完全对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抑制着不对托洛茨基说一句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4页，并散见各处。

不友好的话。有些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如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和拉狄克，就力促他们的朋友们同斯大林携手合作。另外一些人则对这位总书记和他以前的伙伴都感到讨厌。托洛茨基一个最亲近的朋友穆拉茨柯夫斯基就曾简洁地描述任何联合的危险性说：“斯大林将欺骗我们，而季诺维也夫又将临阵逃脱。”^①另外一方面，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们曾经被强烈地灌输去反对托洛茨基，现在却要他们去重复托洛茨基的论点，这对他们岂不是一种历史的嘲弄。这时，总书记的铁腕已经伸向了这些新的持不同政见者，就象他过去对付那些老的人一样。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们被撤销了负责职务。普通的工作人员还记得他们过去由于赞成前反对派而使一些人丢掉了饭碗，所以这次就不再表态，只有那些最有勇气的人才敢于冒这个危险（当时在新经济政策下失业者极多）。那些犹豫和动摇的人则受到总书记发出的“铁的纪律”的约束，不敢轻举妄动。

1925年11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它表明，即使对于“铁的纪律”的最无理的要求，党也要条件反射似地加以服从。继托洛茨基任军事人民委员的伏龙芝病倒了。一些医生建议他进行外科手术，而另一些医生却担心他身体太弱禁不起手术。于是政治局作出决定，命令这位人民委员接受外科手术。伏龙芝勉强地服从了，结果就死于手术之中。托洛茨基后来暗示，斯大林使一些奉承的医生向政治局表示同意进行手术，因而他实际上就宣判了同季诺维也夫站在一边的那位人民委员的死刑。^②很难说事实究竟如何。但可以肯定的、而且最有意义的是，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涯》，第505页；《反对派公报》，第54—55期。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418页。

政治局竟然有权对纯属私人的事情作出决定。每一个布尔什维克，不管他是总司令还是省委书记，全身心都是属于党的。离开了党，他就不存在和没有意义了。甚至他私生活中最隐秘的方面，也得由他的上级加以审查。不用说，连伏龙芝都已屈服，一般的党员就更不敢坚持自己的权利了。党作为一个机构，充当了这位不宽容的外科医生——总书记手中的刀子。

因此，无怪斯大林能够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挫败了他以前的合作者，即使季诺维也夫成功地纠集了列宁格勒的代表，进行了一场气势汹汹和引人注目的斗争，也无济于事。他和加米涅夫两人强烈抗议这位总书记的统治，并且过迟地想把列宁的遗嘱引起全党的注意。这时，斯大林就把托洛茨基加给他们的、而在一年前他还为他们辩护的罪名都一古脑儿地加在他们头上。他们是十月革命的“逃兵”和“工贼”。他以过去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样方式，支持新的合作者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说想要摆脱他们对党的领导是荒谬的。^①他说，他曾经被现在的批评者选举担任这个职务，而他曾多次想辞掉它。列宁格勒的代表们高喊，“现在就辞职吧！”但这种声音被多数派的愤怒吼声以及为斯大林和“团结在斯大林周围的列宁主义中央”的欢呼声所淹没。从这时起，这一具有特征的用语就时兴起来了。名义上还是由一个集体（即列宁主义中央）领导着党，但这个集体已经“团结在斯大林周围”了。按照党的章程，总书记不能要求其地位高于其他中央委员，但实际上他已

^① 斯大林“拒绝”把“布哈林的血”输给反对派。参看《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3，318—321页；《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504—505页。

经被公认为“同辈之中居首位者”。多年以后，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被削弱为他的影子以后，他在名义上还是这个地位。

这次代表大会以后，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把反动派从它在列宁格勒的堡垒中赶走。这座“列宁的城市”的声音太有份量了，不能让它为反动派说话。斯大林派到列宁格勒去代替季诺维也夫的是谢尔盖·基洛夫——他在1934年被刺死，这成为三十年代晚期恐怖的开端。基洛夫在此以前是巴库组织的书记，在老布尔什维克中还不怎么知名。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组织者，又是一个能干的演说家。他被赋予全权，要求列宁格勒人遵守纪律。^①他很快就达到了目的，至少是表面上如此。这个城市虽然继续同情反对派，但却屈从于那位总书记的命令。

只是到了他们遭受打击后的1926年春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最后把命运同托洛茨基连在一起。这时，托洛茨基的地位已经进一步削弱，因为他的国外支持者发表了列宁的遗嘱，而他却加以否认。他甚至走得更远（这也是为了纪律的缘故），竟然说这个文件是伪造的。因此，这两个反对派的联盟只不过是先前两个分离组织的残余的联合而已。

斯大林听到他的对手联盟的消息后挖苦地说：“唉，他们彼此赦免了。”为了使他的三个敌手处于可笑的地步，他只消回忆一下最近期间他们三人相互之间都说了什么和写了什么。^②全党还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谈到他们自己的以及斯大林阴谋反对托洛茨基的“内幕消息”。这些透露并不能使人对这些阴谋家中的任何一人产生信任。因为对于那些习惯于把政治局看

^① 谢·基洛夫：《论文和演说选集》，第35—95页。

^② N·波波夫：《党史纲要》，第2卷，第275页。

成是一切美德、特别是无私地献身革命的场所的人们来说，这些消息听起来是太不可思议了。事实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时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因而使这些消息的可靠性更蒙上了一层暗影。他们向托洛茨基及其密友吐露的事情的确是令人吃惊的。他们以肯定的语气警告托洛茨基说，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还透露，同斯大林决裂以后，为了防备万一，他们已经立下了遗嘱。他们把这位总书记形容为狡猾的、报复心切的虐待狂，爱慕虚荣，权欲熏心。但是他们却没有解释，如果这些的确是他的不道德行为，那末他们为什么还会成为他亲密的合作者达三年之久？他们也没有因此引起恐慌，不去做他们大获成功的黄粱美梦。加米涅夫曾对托洛茨基说：“只要你同季诺维也夫一起出现在主席台上，就能够重新征服全党。”^①

不久以后，斯大林就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他知道，这个混合起来的反对派不能不陷入已经使托洛茨基失败的犹豫不决之中。他也知道，这个斗争不会在党的范围外去进行。反对派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要组织单独的党，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原则：在苏联只能存在一个单一的党，如果两个党互相竞争，其中之一必然会扮演反革命的角色。不过，由于形势的发展，驱使反对派不得不起一个单独党的作用。它在这个方向每走一步，它的领袖们就充满了懊悔和恐怖的情绪。于是走一步之后，又退了回去，公开承认错误；再走一步之后，还是感到遗憾和犹豫。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看来，这种态度是不真挚和不诚恳的，因此也就不能不使反对派的追随者感到灰心丧气。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涯》，第505页。

最为微妙的问题还是反对派在军队中的行为。伏龙芝死后，伏罗希洛夫被指派为军事人民委员，这仿佛是察里津集团对于托洛茨基的报复。^①但是，季诺维也夫的朋友和支持者拉舍维奇仍是伏罗希洛夫的副手。不象1924年的反对派，现在的反对派在犹豫很久之后，开始在军队中进行这一斗争。1926年7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揭露了拉舍维奇的行为，说他领导了军队中反对派同情者的半秘密组织。这对反对派是一次粉碎性的打击。拉舍维奇被解除了军职，他的保护者季诺维也夫则失掉了在政治局中的位置。

斯大林现在可以用开除党籍来威胁反对派了。反对派为了避免这种威胁就实行撤退。10月4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科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其他一些人签署了一项声明，承认他们触犯了党章，并保证解散他们党内之党。他们还拒绝为自己队伍中的极端派承担责任，这个极端派是由1921年的反对派头子施略普尼柯夫和麦德维捷夫领导的。但是，托洛茨基及其同伙虽然承认违反了党纪，却又庄严而坚定地重申了他们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治批评。

这时又是斯大林采取了行动。1926年10月底，他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这个机构中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反对派的代表了。他罢免了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中的职位，并向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控告了他，执委会批准了对季诺维也夫的罢免。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批准了政治局人员的改变，并在施略普尼柯夫和麦德维捷夫模范地承认错误之后准许他们重新入党。这样一来，就为未来的开除出党、承认错误和重新入党建

^① 见本书第6章，第233—234页。

立了一个模式。

这些事件以后，1927年上半年有一段虚假的休战时期，最后收场的时间就来到了。这一年的夏天，随着国际政治的重大发展，斗争之火又重新燃起。5月12日，英国警察突然搜查了在伦敦的苏联商务代表团驻地；两星期以后，英国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6月7日，苏联驻华沙的公使沃依科夫被一个俄国侨民刺杀。大约与此同时，蒋介石转而反对中国共产党；而在此以前，中国共产党是支持他的，并且参加了国民党。斯大林受到反对派的严厉批评，因为他支持蒋介石，并约束了俄国人和中国共产主义。蒋介石的这一新行动给斯大林很大的难堪。苏英两国工会协议的破裂也使他极为窘迫，因为他曾鼓励两国工会去反对反对派。^①在这些事件造成的如战争一般的紧张气氛中，八十三个反对派领袖发表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宣言，为最近的所有失败而对斯大林和布哈林进行谴责。

1927年夏，在这场辩论的过程中，托洛茨基发表了所谓的“克里蒙梭声明”，这是理解十年以后发生的许多事件的线索，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出现在前头了。托洛茨基声明的主要之点是，他断言，如果俄国进入战争，反对派对统治集团采取的态度，就类似克里蒙梭在1917年危机中对凯鲁和马尔维的法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克里蒙梭在他掌权和领导反德战争获胜以前，谴责法国政府没有效率和实际上充满失败主义精神。）换句话说，托洛茨基谴责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和伏罗希洛夫缺乏远见、效率和决心；他并且警告说，一旦紧急情况发生时，他将努力更换政府，以便全国团结一致，并有效的

^① 在第10章讨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时将对这些事件作详细叙述。

组织一切人力和物力来进行防御。^①按照允许选择政府的任何政权的正常标准来看，托洛茨基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不正常的。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丘吉尔就在英国实行了“克里蒙梭策略”。但是，在一个不允许选择政府的政权下，托洛茨基的声明似乎就有点叛逆的味道了。总书记发表了一个反声明来回答他，说这是“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反苏统一战线”。

从各方面来看，反对派这时已经被宣布为非法了，即使说已被开除出政治局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仍然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总书记拒绝批准发表他们为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备忘录，反对派的成员们就半秘密地印刷了它。为了这事，这些领袖们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7年11月7日在官方举行的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祝中，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领导他们的追随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举行单独的游行。虽然游行是和平性质的，而且游行者的旗帜和口号只是含蓄地反对统治集团，这一事件却使斗争达到了顶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立即开除出党。12月举行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追随反对派和宣传它的观点是同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②加米涅夫和拉柯夫斯基为反对派进行抗辩，但被会场中的持久而发狂的吼声所淹没。斯大林说：“够了，同志们，应该结束这场游戏了。……加米涅夫的发言是反对派已在这个台上作出的发言中最不老实的、伪善的、卑鄙的和无赖的。”^③代表大会要求反对派的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第175—176页。

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318页。

③ 同上书，第372页。

领袖放弃并谴责自己的观点，说这是他们想继续成为党员所必须做的事情。加米涅夫和拉柯夫斯基徒劳地辩论说，这种要求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矛盾的；如果他们放弃自己的观点，他们只会使自己丢脸而得不到党员的尊重。^① 12月18日，代表大会决定开除反对派的七十五名领导成员，此外还有很多人早已被开除或监禁起来。

一天以后，反对派就分裂了。托洛茨基派这一部分拒绝屈服于代表大会的要求。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拉柯夫斯基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追随者却发表了一项声明，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反对派所以遭受失败，这次背叛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斯大林的报复。随着这次的背叛，那些投降者所遭到的屈辱还不过刚刚开了个头。代表大会拒绝接受反对派的无条件投降，把准许重新入党的决定交给总书记去斟酌处理。斯大林对他以前的合作者大获全胜，其程度远远超过对托洛茨基的胜利。

后来发生的事在很多方面都是很单调的，同先前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很相似，所以不怎么值得去很详细地叙述。斯大林同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的对手失败后不久就破裂了，完全象托洛茨基辞职以后三人执政垮台的情形一样。而且，虽然这个新阶段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大不相同，但主要演员们的个人野心，他们的恐惧和事后聪明，他们为时已晚地去找寻新的结盟，如此等等，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52—253页。

令人吃惊的是，斯大林的新老对手对他都大大低估了；他们很快就将认识到这一错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击败的反对派预言，在左派被清除以后，领导权就将从斯大林转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手里。^①托洛茨基不停地警告党说，正在发生一次近在眼前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向右转”，其结果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认为他们已是胜利者了。代表大会后选举的政治局，其组织成分似乎也保证了他们的优势。政治局共有九名委员。斯大林有把握掌握四票：他自己、莫洛托夫，以及新选入的两人，即古比雪夫和鲁祖塔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可以指望得到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的支持。但是当摊牌的时候，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却投票赞成斯大林。布哈林后来说，“我不知道斯大林对他们有这样特别的威力。”^②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基洛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和其他人，除了乌格拉诺夫一人以外，都是斯大林的支持者。斯大林依靠自己掌握的多数，开始把布哈林的追随者从行政上的重要职位和党的核心中驱逐出去，但暂时忍住不去反对他在政治局中的对手们。

正如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预见的，一个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经发展起来；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对右派的运动开始了。从代表大会对他们宣判以来还不到一周的时间，俄国大小城市就面临饥荒的威胁。1928年1月，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购到的粮食，比维持城市人口的最低需要少二百万吨。^③于是政治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248—1250页。

② B·苏瓦林：《斯大林》，第484页。

③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页。

局命令实行“非常措施”，按斯大林的话说，这就是“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①同他最近的一些声明相反，斯大林现在断言，由于富农不卖给政府粮食，他们正在“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②6月间，新的非常措施公布了；到了7月，斯大林就号召全党“打击那些……富农和投机分子”。^③在农村中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愿执行这一命令的，因为最近三年以来，“同农民联盟”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而且他们还被告知，敌视农民是托派异端的明显标记。从3月、4月、5月一直到6月，总书记命令在全党进行“春季清党”，撤换那些阻挠非常措施的工作人员。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政治局内曾经徒劳地企图阻止这条新路线的实行，并为清洗的牺牲者提出抗议。但是他们小心谨慎地不把这一争论公开化。因此在全国看来，他们对非常措施的实行也应负一份责任。斯大林充分利用他的自由处置之权，向全党保证说，非常措施和清洗是政治局一致决定的。他还在10月间说过，“政治局内没有右倾分子”。^④一个月以后他又说，“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团结一致”。^⑤在一次中央全会上，他只限于攻击布哈林的一名追随者、新任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的讲话。弗鲁姆金说：“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又说“中农基本群众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⑥只是在1929年4月，即这场斗争开始后已经一年多，斯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8页。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1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8页。

④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43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49页。

⑥ 同上书，第232页。

大林才第一次公开地提到布哈林是右翼反对派的领袖。

先前的反对派在他们失败之前至少还同斯大林搏斗了一阵，但布哈林集团甚至没有能力去接受他的挑战。1928年7月，在争论的初期，布哈林曾转而要求加米涅夫的支持，很象当初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而要求托洛茨基的支持。在这两件事情中，这些斯大林往昔的合作者所“透露出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那种恐慌和模糊希望交织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谈到托洛茨基生命发生危险的情况。布哈林现在也恐怖地对加米涅夫小声说，“他会绞死我们的。”^①

“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把一切都从属于他的权力欲望。为了摆脱某个人，他任何时候都会改变自己的理论。”“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路线对革命是致命的。这条路线会使我们掉入深渊。我们同斯大林的争执远比同你们的争执要严重。”仿佛是为了增强信心，布哈林还列举了支持反对派的组织和有势力人物。但是他以同样的语气恳求他的对谈者不要泄露秘密谈话的任何东西，因为他们两人都受到政治警察的严密监视。当他同加米涅夫分手时，他怀着畏惧之心把那位总书记比作“成吉思汗”。托洛茨基和那两个前执政者携起手来反对斯大林时已嫌太晚。对布哈林和加米涅夫来说，企图携手合作更是太晚了。

事情所以达到如此可悲的程度，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斯大林对全国政治生活所实施的压力几乎是自动地在增长着。各反对派的相继失败，使得自由表达意见的可能性剧烈地缩小了。同斯大林结盟，使每一个反对派的领袖即使降服了对手，

^① B·苏瓦林：《斯大林》，第485页。苏瓦林在书中引证的布哈林透露出来的东西，本书作者也曾看到过。它当时在俄国秘密流传着。

自己也不可能获得更大的自由活动的余地。每一次摊牌之后，原先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行动都被说成是不可原谅的。过去斯大林还不能把托洛茨基的“克里蒙梭声明”作为一个正式理由来开除他，即使这个声明意味着要推翻现政府。他只能以违犯纪律、秘密印刷和未经批准而上街游行等特殊的过错（这些过错是斯大林有意煽动对手去犯的），才能证明1927年对反对派的报复行为是有道理的。但不到一年以后，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悔过的反对派领袖之间的秘密谈话，即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谈话，就已经成为一桩严重的罪行，使得布哈林泪流满面地要求政治局原谅。^①选择屈服，这是一种加倍难以忍受的陶片放逐法，^②因为这不是由阶级敌人而是由革命队伍中的同事来宣布对“犯罪者”的处理的，这使得“犯罪者”呼天不应，求助无门。

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造成了这种咄咄怪事，这就是斯大林的手们越是陷于无望的境地就越是七零八落。布哈林曾经告诉加米涅夫：“我们同斯大林的争执远比同你们的争执要严重。”布哈林心中想说的是斯大林表现出来的举止态度，即他的专制，不择手段，无视舆论，轻视党内知识分子精华。在这一点上，所有新老反对派的确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但是这还不足以使他们结成一个单一的、紧密的团体。相反地，斯大林最近的行动，他抛弃亲农民的政策，使得他的批评者的队伍更加混乱不堪了。他把托洛茨基的主张抢先接了下来。于是总书记

① B·苏瓦林：《斯大林》，第518页。

② 古希腊时，对危害国家的人，由公民用陶片投票决定是否放逐国外；得陶片逾半数者，逐出国外十年或五年。一译者

的代理人这时就拜访了许多流亡的老反对派领袖，劝诱他们浪子回头。他们说，斯大林终于采取了你们的主张。他打击了富农并要开始国家的工业化。他已经对你们的和他的真正对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进行斗争。现在党迫切需要你们的经验和才能时，你们仍停留在政治的旷野中有什么用呢？你们说要公开地恢复名誉。但是在这个危急时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党的威信，你们为什么还要要求党的领导承认自己的错误呢？个人的尊严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一种美德。此外，你们知道，你们的确是违犯了纪律。党所要求于你们的只是一种例行的手续，抛弃那种无论如何已经是过时了的态度。回到党来，就会使你们继续为革命作出崇高的服务。

托洛茨基和拉柯夫斯基是不悔过和不投降的。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皮达科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和其他许多人则被驱赶着去“违反自己的良知”。整个1928年和1929年，不断有一些“悔过的”反对派成员从流亡地回到莫斯科来。这些悔过的反对派认为，斯大林突然地摆到左边，会使形势有利于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就会重新掌握全党。同时，他们还批评那些宁愿流亡或受监禁的朋友，说他们是在搞一种令人不解的和不庄重的策略把戏。因此，当斯大林对新的反对派进行打击时，他保证向老反对派的许多追随者实行暂时的仁慈。老反对派的一些领袖由于失败而灰心丧气，这时就警告布哈林和他的同事们不要贸然地进行无望的冲突。亲农民的集团一时之间也只好谨慎从事了。它认为，斯大林正领导全国进入一个死局，因而他的免职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要做的事就是，为这一关键时刻的到来进行准备，并在缰绳从斯大林手中滑脱时紧紧地抓住它。

到了1928年底,危机的迹象的确是增加了。但是斯大林已看穿了敌手们的希望和策略花招。他知道,最危险的反对派还是托洛茨基,因为他的不妥协态度,使他赢得了朋友和敌人新的尊敬。于是在1929年1月18日,斯大林向政治局提议,把托洛茨基逐出俄国。尽管布哈林表示抗议,这个提议还是被通过了。这一事件使我们可以重新估价一下逐步升级的情况,正是这种逐步升级使冲突发展到了血腥的高峰。1929年时,斯大林还不敢在俄国监禁托洛茨基,七年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宣判了托洛茨基和整个“老近卫军”的死刑。

他在最终把托洛茨基赶下俄国政治舞台之后,就立即去打垮右翼的领袖们。李可夫被免除了他继列宁之后出任的苏联政府总理职务。托姆斯基被撤了工会的领导职务,理由是他曾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工会反对工业化。布哈林则被解除了他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和政治局委员职务。1929年还没有过完时,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已经批判了自己的观点,从而带来了几年的虚假的喘息时间。

斯大林的支配地位现在已经完全巩固了。权力之争已告结束。他的所有敌手已被消灭。政治局的任何成员都不会梦想去向他的权威挑战。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莫斯科庆祝他的五十岁生日,仿佛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从俄国各地发来了向领袖致敬的贺词。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书记过份而拙劣地赞颂他的美德。莫斯科的墙上挂满了他的巨型画像,他的各种大小的全身和半身塑像充斥了广场、公共建筑大厅、商店橱窗直至最寒酸的理发店。宣传员声嘶力竭地高喊着“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有些老人回忆起列宁的五十寿辰。这是一次

规模很小和朴实的庆祝活动。只是由于列宁的钦慕者们逐渐喜欢讲究排场和虚礼，一再劝说，列宁才勉强地参加了庆祝活动。这种新的对斯大林的迷信现在已经明显地同老的对列宁的迷信结合在一起了，甚至还超过了它。在一些庆祝活动中，斯大林登上了红场上的列宁墓，这座巨型的陵墓仿佛就是列宁继任者的踏脚石。

如果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所以要反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人的野心，这种判断就是皮毛之见了。情况并非如此。在这场斗争中，他个人的目的并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法码。在1928到1929年那些紧张的日子里，整个苏联的命运都在未定之天。

从表面上来看，危机的开端是那樣的平淡无奇，仿佛是一些毫不相关的事情。农民们没有给城市运去几百万吨粮食，这是一件平凡的事情，却演出了一场真正的戏剧。农民们拒绝出售粮食，并非出于明显的政治动机，目的也不在于推翻苏维埃政府，虽然富裕农民中一些有政治思想的分子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农民群众是由于经济形势所迫而采取这种特别形式的“怠工行动”的。大多数的小农，其生产只能自给自足。1917年的农业大变动，十多年以后已经出现了恶果。把大农庄分散成为一些小农户，使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但是其结果却使农业的生产力，或者说农业供给城市人口粮食的能力，大大地削弱了。另一方面，大农户要求高价出售粮食，这种高价成为城市人民无法忍受的沉重负担；而且大农户们还

要求对资本主义农业作进一步的让步。斯大林的确面临一个十分复杂的困难问题。如果他向农民作更多的让步，就会引起城市工人阶级的危险对抗，而城市工人阶级整个来说是支持政府的，特别是当政府在1927年左右把工业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之后。但是如果拒绝向农民让步，也会引起饥荒和城市动乱。这个问题需要作彻底的解决。如果政府能按照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当初的建议，早一点开始抑制大农户和鼓励逐渐的集体化，现在就可能不需要为了获得粮食而采取剧烈的紧急措施了。正如事情所表明的，斯大林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他思想上毫无准备，就促使他采取易于失去控制的行动方针。

如果斯大林没有在前几年（从1924年到1929年）公开宣布过他的观点，那末他现在从事第二次革命的那种考虑不周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是不可思议的了。一直到了最后时刻，他还对这个大变动畏缩不前，对它的规模和暴烈程度也无任何考虑。在这方面，还不仅是他一个人如此。布尔什维克的集团、派别或小圈子中，没有谁想到斯大林目前发动的工业化是如此地集中和迅速、农业集体化是如此地全面和剧烈。甚至最极端的布尔什维克左翼也认为，集体化是一项温和的、渐进的改革。只有一个人曾经鼓吹在农村进行“第二次革命”的思想，他就是尤里·拉林，一个二流的经济学家，一度是孟什维克右翼。他早在1925年就谈到了这种思想，而斯大林把这种观点嗤之为胡思乱想。^①他严厉斥责那些想“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说：“这是……空谈。……这是重弹孟什维克旧百科全

^① 参阅《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1页。

书中的孟什维克老调。”^①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对他提出一个吹毛求疵的问题：“怎样同富农斗争而又不挑起阶级斗争呢？”他以同样的语调毫不理亏地说，党无意在农村中挑起阶级斗争，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不正确的”。^②

三年以后，1928年5月，当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已经实施时，他仍坚持说，“剥夺富农是愚蠢的”。^③ 他并不指望在下一个四年里把农业中的更大一部分按集体化的路线加以重新组织。^④ 这一年年底批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到1933年至多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户集体化。甚至到1929年春天斯大林已经公开谴责布哈林集团是资本主义农业的推销商时，他仍然坚持认为，“个体贫农和中农经济在供给工业以粮食和原料方面……在最近的将来还会起主要作用”。^⑤

几个月以后，“全面”集体化轰轰烈烈地展开，个体农户的命运就注定了。斯大林在年底说道：“我们已经使许多地区的基本农民群众从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转到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⑥ 这时政治局已经指望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会供给城市一半的粮食。这一年的最后几天，克里姆林宫就传出了斯大林的命令，全线展开“对富农的攻势”。“向富农进攻，这就是击破富农并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04—105页。

② 同上书，第148页。

③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26页。（此语出自《列宁和联合中农问题》一文，系1928年6月12日写的。一译者）

④ 他在1928年7月还说：“有些人认为个体农民经济已经完全没有发展的可能，不值得去支持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种人和我们党的路线毫无共同之处。”（《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80页。）

⑤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89页。

⑥ 同上书，第331页。

消灭富农阶级。离开这些目的，进攻就是高调，就是扭打，就是空喊。……向富农进攻，就是准备实际行动，打击富农，而且把他们打得再也站不起来。”^①他已经不把剥夺富农谴责为愚蠢的事了，他辩解说：“是否可以允许……剥夺富农财产呢？……真是可笑的问题！……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②

他关于工业化的重大声明中有一段简要的概括说明，同样透露出令人吃惊的矛盾。在二十年代中期，俄国工业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每年的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③政治局讨论了速度问题，即在现有大小工厂充分开工之后产量还能扩大多少。每个人都同意，一旦达到了充分开工之后，每年的增长率就会小一些。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认为，仍然可能提高每年产量百分之二十弱一点。斯大林把他们封为“超工业化者”。当他的对手提出在第聂伯河修筑大水电站的计划时，他把它束之高阁，并且说，对俄罗斯而言，建筑第聂伯水电站就好象要农民去买一架留声机而不是买一头牛。^④1927年12月他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国家的工业状况表示了充分的满意；但是他也抄袭了反对派的主张，认为在下几年中，工业产量每年应该增加百分之十五。

一年以后，他对工业状况的满意情绪消失了，认为俄国工厂的技术是“非常落后的”^⑤。现在他开始力促工业化的更快发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58页。

② 同上书，第359页。

③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54页。

④ 《列昂·托洛茨基案件》，第245页；《反对派公报》，第27期（1932年3月）

⑤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4页。

展。考虑到他的许多听众一时转不过弯来，他辩解说：“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但是任何一个旧的阶级……都不能解决消灭我国落后性的任务。”^① 俄国社会的新结构为工业化创造了无以伦比的优越条件。但即使到了现在，斯大林的计划仍然是适中的。在一次中央全会上，他同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争辩，因为弗鲁姆金只愿意在预算中拨出六亿五千万卢布作为资本投资。最高经济委员会要求八亿二千五百万卢布；斯大林也为了更多的拨款而争辩。^②

第二年，即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实际的投资高达十三亿卢布，比斯大林的最高估计几乎多五亿卢布。到了1929年中，工业化发生了剧烈而具有决定性的转变，资本投资的拨款突然上升至三十四亿卢布，等于财政人民委员所答应五倍，也等于斯大林自己要求的四倍。政治局很快就陷入一种真正疯狂的工业化之中。1930年6月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被斯大林洋洋得意的声明惊得目瞪口呆：“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③ 他预言，许多工业部门都将在三年、甚至两年半中完成计划，而不需要五年。他向代表大会说，下一年的工业生产已经规定提高近百分之五十。这种拼命的劲头真正是超工业化的狂想了。^④

这时他一门心思地认为，他能够依靠一个绝招就使整个苏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5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6—237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32页。

④ 准确地说，增加百分之四十七。斯大林后来在一次工业经理的会议上承认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即使这个数字也是可疑的。参看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93页。

联发生奇迹般的转变。他似乎生活于统计数字和索引、工业命令和指示的半真半假的梦幻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似乎没有什么目标是他和党所达不到的。他创造了一句话说：没有什么堡垒是布尔什维克征服不了的。这句话在许多年里一直被所有的作家和演说家重复着，并写在全国各地的旗子和招贴上。

下面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那种努力的疯狂性质。钢铁是工业化的基础。1928年俄国只生产三百五十万吨生铁。在五年计划下，它将在1933年年底生产一千万吨。斯大林对于提前一年或两年完成计划仍不满足，他告诉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说：

“我们需要的生铁不是五年计划所要求的一千万吨，而是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吨。”^①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经理担心这样高的目标不可能达到，他就把他们叫做“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破坏分子”，即使他们提出的目标是非常有道理的。1941年，当希特勒入侵俄国时，俄国的生铁产量刚刚达到按斯大林的命令应该在十年以前就达到的目标。^②

我们已经谈过，由于1928年和1929年粮食的周期性危机，使得斯大林突然加速了集体化的进程。他的一些反对者建议，如果进口粮食，可以避免这种危机。但是却缺乏支付手段，政府也不能指望得到外国贷款，因为从十月革命以后就开始的对俄国的财政抵制实际上仍在继续着。除此以外，如果把本来已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9页。

② 沃兹涅辛斯基：《1940年苏联经济成果》，第10和13页。还可参看《计划经济》1947年第5期；库尔斯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第35页。

经稀少的外汇基金和黄金储备用来购买外国粮食，就会使现在已经大大发展的工业连中等程度的发展也达不到。工业的停滞必然引起更为严重的粮食危机，随后又会引起城乡之间更为危险的紧张形势。

洗劫富裕农民的谷仓，没收隐藏起来的财物，不失为摆脱困境的一个简单方法；比之于农村使城市面临饥饿的威胁来说，也未必是最不公平的。但是行政当局甚至在党和警察的帮助下，也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城市的行政当局鞭长莫及，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去规避它的管理和控制。象这种管理和控制，更不用说没收，只有由当地的一部分农村居民去执行才是最有效的。因此斯大林就呼吁贫农去反对富裕农民。他不能白白地让贫苦农民大众去做这件事，而必须为了这种合作给他们可以看得见的报酬。对于广大的最贫苦农民来说，他们只拥有极小块的土地，用木犁进行耕种，既没有马又没有牛，经常要仰赖富农和高利贷者的鼻息，那末还有什么东西比集体农庄更诱人的报酬呢？组成集体农庄后，政府答应资助他们一些富农的农业工具和耕畜，甚至还有拖拉机。

在二千五百万个体农户中，究竟有多少是属于最贫苦的阶级，还没有确切的数字。一般认为是五百万到八百万户，至少有五百万最小的农户是用木犁耕种的。^①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则有一百五十万、或许二百万富裕的农户。在两者之间，有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中农”。因此，只有农民中的一小部分（虽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能够指望衷心地欢迎这一“大转

^① 托洛茨基：《俄国真相》，第64—67页；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18页。

变”。如果斯大林把这次改革仅限于使最贫穷的农户联合起来，以及在最富裕的农民和最贫苦的农民之间适当地重新分配一下财富，那末集体化就不会变成它实际上已经变成的那种血腥的社会大变动。如果集体农庄进而得到工具和机器的资助，得到政府的贷款和技术帮助；如果它们后来能够明显地改善庄员的生活，那末它们很可能会吸引很多所谓的“中农”参加，因为这些中农实际上过着一种变化不定的可怜生活。

大约在1929年之中，斯大林被运动的势头冲昏了头脑。集体化的开头无疑是成功的。当总书记的案头堆满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报告时，斯大林就开始超过原先规定的限度加速集体化的进程。他派了成千上万的代表到农村里去，训令他们“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并驱赶广大的不是心甘情愿的中农进入集体农庄。他的这些命令的精神可以从他在1929年12月对党的土地问题专家代表的讲话中表现出来。^①他用最直截了当的语言来打消听众的犹豫不决，他们显然感到，在一场革命中，可以而且必须无情地打击一小撮剥削者，但是却不能打击千百万小农所有者。斯大林带着模糊的嘲弄态度引证了恩格斯的下列说法：“而我们则坚定地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斯大林告诉他的听众说，恩格斯“过分慎重”，他说的情况只适合于西欧的情况，而不适合于俄国。小农不用给予时间去考虑他的财产的集体化问题。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他的论点说，对富农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39—361页。

不仅要加以剥夺；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在剥夺他们之后，应允许他们参加集体农庄，这是荒谬的说法。他没有告诉听众，这二百多万富农（连同他们的家属就可能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人）在被剥夺了财产和禁止参加集体农庄之后，他们究竟应该如何办。

在一个短时期中，俄国的农村地区变成了一座地狱。绝大多数的农民对政府作殊死的反抗。集体化蜕变成为一次军事行动，一场残酷的内战。反叛的村庄被机关枪包围起来，迫使其投降。^①众多的富农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不毛之地。他们的房屋、谷仓和农具转交给集体农庄，据斯大林自己的估计，被转交的财产价值超过四亿卢布。^②大多数农民决心尽可能少地把自己的财产带到集体农庄去，因为他们认为，集体农庄将成为国营工厂，他们只会成为工厂的工人而已。于是他们在绝望中就屠宰牲畜，毁坏工具和焚烧谷物。这是农民大规模的鲁德式叛乱。^③只是在三年以后的1934年1月，斯大林才泄露出它的一些结果。1929年，俄国拥有三千四百万匹马，到1933年只剩下了一千六百六十万匹——一千八百万匹马被屠宰了。被屠宰的还有三千万头大牲畜，占总数的约百分之四十五；近一亿头绵羊和山羊，占总数的三分之二。^④大片的土地荒芜了。

① 在那个紧急期间，笔者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旅行。他记得在从莫斯科到哈尔科夫的火车里，有一位格柏乌的上校向他生动地叙述了集体化的情况。这位上校由于最近在农村中的经历而在精神上完全垮了，他差不多啜泣着说：“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曾经在地下反对过沙皇，后来又参加了内战。难道我那样干只是为了现在用机枪包围农村并命令我的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农民群众开枪吗？噢，不，不！”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52页。

③ 十九世纪英国发生的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因为工人认为机器的使用引起了失业。——译者

④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35页。

饥馑笼罩着城市和乌克兰黑土地带的大草原。

在农业上的这一绝招促使斯大林企图在工业上也试一试。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时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大规模的农业需要一个比小农业（特别是古老的俄罗斯型小农业）高得多的技术基础。拖拉机必须代替马匹。在大量屠宰牲畜以前，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的集体化将需要至少二十五万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机器。当这个大变动开始时，全苏联只有七千台拖拉机。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斯大林才在1929年弄到了近三万台拖拉机。^①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没有机器和技术指导，就不可能对农业劳动实行合理的组织和分工。许多集体农庄刚成立起来就有解散和瓦解之势。现在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工业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提供大量的机器；油井必须生产几百万吨石油，供拖拉机使用；要建立一些新的电站，使农村电气化；最后就是要训练千百万农民去操纵和驾驶各种机器和车辆。但是大小工厂生产这些东西的原材料却付阙如。煤、钢、石油和别的原料都极为不足。训练无知农民去驾驶拖拉机的人也还没有。

这整个试验似乎是一件出奇的蠢事，所有的逻辑规律和经济原则都被颠倒了。它仿佛是整个国家突然抛弃和摧毁了自己的房子和茅屋（它们虽然破败，却是在现实中存在的），一古脑儿地搬到一些虚无缥缈的建筑中去，而这些建筑在现实中连个影子都还没有；它仿佛是全国仅在发狂的迁移之后，才开始去制造砖坯，为新居砌墙，但后来却发现甚至连制砖坯的稻草都很缺乏；它仿佛是全国饥寒交迫，肮脏邋遢，一身疾病，却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38页。

开始狂热地搜寻稻草、砖坯、石头、建筑工和泥瓦匠，以便能够最后开始建设比仓促抛弃的简陋旧居要无限宽敞和卫生的家园。想想看，这个国家有一亿六千万人口；它是被一个普通、平凡和相当认真的人引诱和驱赶着走进这一超现实的事业中去的。这个人的思想被一种半现实半梦魇的幻觉所支配，他把自己当成一个超级法官和超级建筑师，当成一个现代的超级法老。粗略说来，这就是当时俄国生活的奇形怪状，其中充满了痛苦和希望，充满了悲怆和荒唐。这也就是斯大林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只不过他驱赶着人民去建筑的并不是毫无用处的金字塔而已。

在斯大林的心目中，他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现代的法老，而是一个新的摩西，在沙漠中领导着一支上帝特选的子民。这位无神论的独裁者心中乱七八糟地充满了基督教圣经的形象和信条。在他那枯燥而乏味的文章中偶尔有些隐喻和形象的说法，“向社会主义天堂”进军就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句子，甚至当他在梯弗里斯或巴库领导着少数几个“委员会人”时就已如此。^①这个句子这时在他听起来就更显其真实了。尽管他同克伦威尔、他的追随者同那些清教徒在时间上隔了几个世纪，而且民族性格又有所不同，但麦考利^②对于克伦威尔及其属下性格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斯大林：

那个独特的团体大部分是由一些热心的共和派组成的。他们在奴役自己的国家时，却自我欺骗地认为，他们

① 参看本书第79页。

② 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等书。
——译者

是在解救这个国家。他们最尊重的那本书，为他们提供了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先例。诚然，无知而不领情的子民们还对这些解救者发出了怨言。尽管另一支上帝特选的子民对那个领袖也发出过怨言，他还是领导着他们通过痛苦而阴郁的道路，从奴役之地走到繁荣之乡。那位领袖不管他的弟兄们愿不愿意总是拯救了他们；对于那些轻视给予他们自由的人，对于渴望着寻欢作乐的人，对于监工和崇拜埃及的人，那位领袖是不惮于制造一个可怕的榜样的。

当斯大林把他的计划提交给人民，要求他们作出努力和牺牲时，他不能简单地把它解释为应付当前的经济需要。他企图赋予它一种更为形象的号召力。这时他除了诉诸国人的社会主义感情外，还第一次公开地诉诸他们的民族感情。诚然，社会主义在单独一国胜利的理论已经包含了这种双重的号召力了；但是迄今为止，他还是抑制住不去公开地挑动民族的骄傲和雄心。因为人民对于布尔什维克敌视这些情感是记忆犹新的；任何公开地吹嘘这些东西，都将使他遭到对手的批评而使自己弄得狼狈周章。也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系列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他早年的思想中也还没有完全形成。到了1931年2月，他在一次对企业行政人员的著名讲话中，就高唱这种新的调子。他同那些拥护以较慢速度实行工业化的人进行没完没了的辩论；他解释了他的政策的国际和国内动机。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世界无产阶级瞩望苏联政府去建设社会主义。他说，他甚至把这些国际义务看得比国内义务更为重要。但是他谈及这个问题的国际社会主义方面时全是一派陈词滥调，毫无生气，使人明确

地感到他完全是言不由衷的。只是在谈到国内方面，即谈到这一政策的纯粹的俄国动机时，他的话才有一些激情和光彩。

不，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①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99—400页。要理解斯大林的讲话对于俄国来说有何新奇之处，人们必须注意他为沙皇的过去恢复名誉至何等程度。按照斯大林总结的俄国历史，俄国好象始终是外国征服者和压迫者的牺牲品。但在此以前，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学家和作家特别着重地揭露了俄国历史上不光采的一面，使人们理解沙皇帝国对弱小民族的征服和压迫。斯大林很快就解决了这种从革命以来就不断灌输给青年一代的反民族主义观念。俄国历史中这种反民族主义观点的最著名解释者就是波克洛夫斯基教授，不久以后他就被革除教门，他的书遭到查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为民族传统恢复名誉的事达到了高潮。

斯大林号召实行工业化，首先燃起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希望。年轻的一代早就梦想俄国成为“另一个美国”，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第聂伯水电站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企业以及许多最现代化、最巨大的工业联合企业，就象魔法一样地在他们的眼前召来了新文明的远景；在这种新的文明中，人们将使机器服从他们的意志，而不象过去那样是自己服从机器及其主人的意志。大量的青年工人，特别是共青团员，都自愿地去不毛之地打先锋。他们热情地欢呼新世界的远景，即使这个世界是在他们的白骨之上建立的也在所不惜。比较现实的一些人也欢迎工业化，因为它将结束自新经济政策以来就困扰俄国工人的失业现象。

这一次他又被运动的势头冲昏了头脑。他那样地好高骛远，使得任何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都为之却步。但奇怪的是，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上还是毫无经验的。他没有受过经济方面的训练，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他比一般的政治家能够更周密地理解经济。在列宁领导时，他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所起的作用是不足轻重的，他主要是一个政治管理人员。此外，在那些年代里，俄国的经济状况十分落后和原始，也不需要作出什么真正复杂的决定。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埋头于统帅布尔什维克核心组织去反对敌手们；而且除了对政治事务的一般指示之外，他也没有什么机会和时间去顾及其他。因此，他发动这场工业革命时，对于国家资力的限制，对于人民能够忍受的程度，或多或少是不明白的。他的一切经历使他过分地相信严密组织的和无情的行政权力。难道他不是仅仅利用这种权力就消除了一度强大的敌手吗？难道他没有把一度很不听话的党变得顺驯起来并使它成为可以颐指气使的一个团体吗？那么为什么他不能按照自己

的想法成功地去处理分散的、无组织的农民群众的问题呢？为什么他不能使那些工业的领导人按照计划规定去生产出大量的煤、钢和机器呢？主要的事情就是，他和政治局要对那些人施加不断的和无情的压力。在对下属施加压力并使这种压力逐级传下去方面，他是无人能够相比的。在整个事情中他是首要的恫吓者、首要的驱赶者和首要的诱骗者。

当他终于意识到农村中这一鲁蛮灭裂的运动的后果时，他就急于要安抚农民和逃避自己的罪责。1930年3月2日他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①的文章，企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他把发生的事情归咎于过分热心的官员。他承认已经有一半的农户集体化了；在很多场合曾使用了强迫手段；有一些集体农庄是存在不下去的。而在三个月以前，他还威逼着党派住农村的代表，不允许小农有任何时间去“考虑”集体化“他们的财产”，他亲自发出了强迫集体化的毫不含糊的信号。现在他却威胁说，他的命令被误解了：“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这样做是愚蠢的和反动的。”他责骂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傻瓜”、“喧嚣的左倾分子”、“胆怯的市侩”和“歪曲者”。他号召他们不要“跑得太远”。他以农民的保护者自居，这使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都为之吃惊。他没有同他们商量。他照例越过这些人而直接向农民呼吁，这些人只不过是他的共犯，而现在仿佛成了主要的罪人。^②甚至当时很温顺的中央委员会，对于把它作为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66—372页。

^② 《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似乎印证了一个熟知的信条：经是“好的”，和尚把它“念歪”了。不管这个呼吁效果如何，一个乌克兰老农的评论却是不错的。他在作者询问下粗鲁地说：“我们的集体农庄搞得很糟，但是自从斯大林恢复了他被胜利冲昏的头脑后，事情就好办多了。”

逃避众怒的避雷器来使用，也提出了抗议。于是斯大林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说，他号召停止使用暴力，并不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态度。^①

不论真象如何，他有力地煞住了这个集体化运动。在后来的三年里，只有百分之十的农户集体化了，因此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才有十分之六的农户集体化。集体农庄的性质也有所改变。起初，差不多农民的所有财物都被宣布为集体财产；庄员的劳动只得到不多于工人的工资。在三十年代早期和中期，一系列的“斯大林改革”对农民的个体经济作了一些重要的让步。集体农庄是一种合作社，而不是公社。庄员享有农庄的利润。他们被允许保有自己私人的小块土地、家禽和一些家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新的社会分化发展了：有富裕的农庄和贫穷的农庄，每一农庄中又有富裕的庄员和贫穷的庄员。当局是赞成“富裕的集体农庄”的。斯大林命令结束大多数国营农场，把它们的四千多万英亩土地赠给集体农庄。^②因此，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就建立了一种新的、虽然不是很牢固的平衡，使得政府能够以比起头更慢的速度差不多全盘实现了集体化，而没有引起猛烈的抵抗。1929年到1930年代价很大的血的教训并不完全是白费的。到了三十年代晚期，俄国农村中新的社会结构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巩固，尽管在这个十年的开头，它的基础已被动摇了。

工业革命的折腾也并不轻。1930年，人们还记得，斯大林要求铁和煤的产量在这一年中增加近一半。正如他在第二年承认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73—392页，

^② 柯舍列夫教授：《斯大林的章程就是集体农庄的基本法》，第28页。

的,实际上仅增加了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①采矿业进展的缓慢影响了制造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斯大林固执地逼迫着要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发展新的巨大而现代化的铁矿和煤矿,很少注意或根本不注意有什么困难。一个美国目击者和参与者写道:“我在马格尼哥尔斯克立即陷入一场战斗。我被调派到钢铁战线上去。为了建设高炉,成千上万的人忍受着极为紧张的艰苦生活,而且很多人是自觉自愿的,无限热情的,从我到达那一天起就感染了我。”这位作者作结论说:“我敢担保,光是俄国黑色冶金战斗所引起的伤亡,就多于马恩河战斗^②的伤亡。”^③

人的生命、能源和原材料的耗费是巨大的,但收获也是可观的。的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并没有达到;^④而且除了在反德战争的年代以外,斯大林再也没有要求工业作出他最初要它作出的那种努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四;正是在这个比较适当的计划下,1932年到1937年,工业化的进展实际上巩固了下来。^⑤

只有一个毫不悲天悯人的专制统治者才能在这样多的灾难中坚持这一危险的事业。斯大林在那几年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冷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03页。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攻势在此受到阻止,双方伤亡很大。——译者。

③ 约翰·斯科特:《在乌拉尔以东》,第9页。

④ 当斯大林于1933年1月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宣布仅仅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七。即使这个数字很可能也是夸大的。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51页。

⑤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55页。

静的外貌，几乎有点不可理解。在这种外貌的后面，必然存在着紧张和苦恼。但是只有一次，他似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整个1932年，灾难和挫折纷至沓来，他独处室中大生闷气。这时他的声望已如日落西山。他紧张地注视着不满的浪潮拍打着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他不可能不看到被击败的对手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眼里充满了希望和忧虑之情，他们所以没有动手，只是因为危机正威胁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各种思想和派别。党内右翼和左翼的旧的分裂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希望改变的普遍情绪，这种情绪甚至开始影响到斯大林的一些死党。在他的最接近的随从人员中流传着一个要求罢免他的备忘录。这是由西尔佐夫和洛米纳泽签署的，他们两人都曾帮助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西尔佐夫甚至还接替李可夫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席。^①同样的一份备忘录是由宣传负责人柳亭和其他一些人签署的。结果这些人被指控为搞阴谋，并被监禁起来。严格地说，他们并没有搞任何阴谋，他们只不过是敦促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合法手续罢免斯大林；斯大林表面上也从未怀疑中央委员会有合法的权利去罢免他的总书记。乌克兰也充满了失望之情，反对派在暗中活动。斯大林的一个亲信波斯蒂舍夫前往清洗乌克兰政府，而这个政府一般认为是由忠实的斯大林分子组成的。这次清洗导致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斯克利普尼克的自杀。

作为这些发展的最高潮，这位独裁者自己的家里也发生了

^① 西尔佐夫是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的主席，而不是全苏联政府的主席。从李可夫被免职以后，曾由莫洛托夫接替他的职务。

悲剧。他的妻子纳杰日达·阿利鲁耶娃是工人阿利鲁耶夫的女儿，在此以前一直盲目地崇拜这位比她大得多的丈夫，现在对于他的政策是否明智和正当也开始发生怀疑了。1932年11月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和妻子到伏罗希洛夫家作客。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在场，共同讨论有关政策的事宜。纳杰日达·阿利鲁耶娃发自肺腑地谈到饥荒和全国的不满情绪，谈到大恐怖使党的道德败坏。斯大林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当着朋友的面，就粗鲁地痛骂了他的妻子。纳杰日达·阿利鲁耶娃离开了伏罗希洛夫的家，当天晚上就自杀了。^①

一位法国的前共产党员作家V·塞尔日曾在俄国呆了许多年，他说道：

报纸谈到了这次突然的和过早的死亡。最初的传闻是这样的：这位年轻的妇女因全国饥荒和大恐怖而痛苦，因她在克里姆林宫的舒适生活和看到那位总书记的画像挂满了公共广场周围的建筑物而痛苦。她由于忧郁而憔悴不堪。

.....

面对那具尸体.....他真象他自称的是一个钢铁的人。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政治局开会，他向同事们提出了辞职的要求。“也许我已经的确成了党内团结的障碍。如果是这样的话，同志们，我准备隐退。.....”政治局（它已经清除了右翼分子）的成员们不知所措地面面相觑。他们之中谁敢于答复说：“不错，老伙伴，事情就是要这样做。你应该离开。你这样做是最好不过了。”谁敢于

^① A·巴尔明：《一个幸存者》，第264页。

这样答复呢？谁要是这样说，而又没有得到别人的支持，他的命运就危险了。因此谁都没有反应。……最后还是莫洛托夫说：“算了吧，算了吧。全党都是信任你的。……”这个事件就结束了。^①

这似乎是唯一的一次，斯大林的自信心暂时垮台了。经过沉闷的几个月之后，他又在1934年^②1月向中央全会作报告。他的报告虽然在口气上是辩解的，但也表明他已经恢复了自信：“党仿佛是鞭策了国家，督促它向前奔驰。……落后了一百年并因落后而有灭亡危险的国家是不能不加以督促的。”^③他实际上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完成，但解释其原因是：由于远东的战争威胁，工业必须转而生产军火。这正是日本征服满洲的时期。斯大林是否认为日本进攻俄国的危险已迫在眉睫，因而要大幅度地重订经济计划，这还是可以怀疑的。因为这时也恰恰是希特勒掌权的前夕，他却向国家保证说，危险已经过去，不再需要强求工业化的速度。在未来二三年中，俄国的任务是巩固已经获得的成果，并掌握工业技术。

几天以后，他又出现在讲台上，描述农村中的形势充满了危险。他说集体农庄甚至可能比个体农户对现政权构成更大的危险，这种话使全党都为之吃惊。他说，过去农民是分散的，行动也是迟缓的，缺乏政治组织的能力。自从集体化以后，农民已经组织成严密的团体，这种团体可能支持苏维埃，但也可能比个体

① V·塞尔日：《斯大林画像》，第94—95页。

② 应为1933年。——译者

③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53—454页。

农民更有效地转向反对苏维埃。为了保证党对集体农庄的严密控制，成立了农村中的政治部。^①同这些措施平行的，还着手解决另一个令人惊异的任务。一年以后，斯大林向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说，二百万从来没有操纵过机器的农民已经在这期间训练成为驾驶员；差不多同样多的男人和妇女已经训练成为集体农庄的管理人员；已经有十一万一千工程技术人员和农艺人员派往农村。不识字的人数已经缩小到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十。^②这次所谓的文化革命也是在极度匆忙中进行的，因此是极为表面的。不过，它还是标志着全国观点和习惯重大改变的开端。

描述斯大林在第二次革命中的作用，如果不提一提新的社会政策，那就是不完全的。这种新的社会政策也许比“大转变”的其他组成部分更为直接地由他引起。在这个方面，他的政策瑕瑜互见，对比鲜明。在1929年年底，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劳动政策，但词意含混，以致其重要性几乎完全没有被理解。^③在新经济政策下，劳动政策的特点是高度的自由放任：工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即使失业的灾难使这种自由成为半虚幻的东西。经理们或多或少地可以自由地雇用和解雇工人。但是迅速的工业化立即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这也就意味着自由放任的结束。按斯大林的话来说，这就是在劳动市场上“结束自流”。在讲英语的国家，后来就把这种情况称为劳动管理。管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90页。

② 同上书，第546页。实际上文盲还是普遍存在的。

③ 同上书，第333页和404—405页。

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工业企业同集体农庄签订合同，规定后者有义务向城市的工厂派出一定数量的男女。这是基本的方法。“强迫劳动”这个词是否能够应用在这上面，这还是一个可以争议的问题。但是在这一过程的最初阶段，使用强迫手段是很厉害的。当时那些被宣布为多余的和被剥夺了庄员资格的集体农庄庄员，其地位同由于经济需要才去受雇的失业工人不无相似之处。一旦到了城市，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就可以自由地改换职业了。斯大林的目的在于通过法令为工业保证人力的储备，而在大多数国家里，人力的储备是由贫困的农民长期而自发地流入城市造成的。

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强迫劳动是强加给那些采取暴力抵抗集体化的农民的。他们被当做罪犯看待，并受到监禁。历史在这儿又开了一个恶毒而阴郁的玩笑。苏联早期监狱制度的改革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把监禁犯人看成是一种再教育的手段，而不是为了进行惩罚。他们使犯罪者受雇于有用的工作中。犯罪者有工会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按工会规定的标准付酬。随着叛乱农民的增加，他们被组织于巨大的劳动营中，从事开运河、修铁路和伐木等等工作。在三十年代早期的饥荒和悲惨生活中，规定给他们的保护被完全忽视了。“再教育”蜕化成为奴隶劳动，草菅人命，从而成为第二次革命画图中的一个巨大污点。斯大林后来宣称，在苏联，劳动“已经从一种耻辱和痛苦的重担转变……成为一种光荣、英勇和英雄主义的事情”，他的话听起来好象是对劳动营中犯人的嘲笑。对于那些在工业化中获得了社会进步的较幸运的工人，这话到还是真的。工业劳动和技术效率有着不平常的魔力，吸引着青年一代。报纸、

剧院、电影和广播都在赞扬“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们”，那种方式就象其他国家吹捧著名军人和电影明星一样。各类技术学校的门都向来自工作台的工人开放；这类学校以异常高的速度在增加着。斯大林力促布尔什维克们“应当掌握技术……成为专家”。^①他并且说：“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②在整个三十年代，新的知识分子队伍大大膨胀了，以致斯大林把他们说成是同苏联社会两个基本阶级——工人和农民地位相等、甚至还颇为优越的社会集团。新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和政治素质上同老的知识分子非常不同，老的知识分子在沙皇统治下点燃了革命的火焰，在早期领导了这个工农共和国。新的知识分子被教养成为摒弃政治野心的人。他们缺乏前辈的那种知识的敏锐性和美学的精致性。他们对世界事务的好奇心不是被抑制了，就是根本还没有觉醒。他们对俄国和世界其余地区命运相关这一点没有真正的见识。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机器和技术发明，在于发展落后省区的大胆规划，在于行政工作，也在于管理企业的艺术。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表现出一种粗俗的习态，往往成为外国专家的笑料。但是这种粗俗却同异常的求知欲、异常的精明和接受能力以及拓荒者的性格结合了起来。的确，这就是斯大林的“边疆派”一代。

同时，老的知识分子遭到了贬黜。由于他们许多人爱批评和具有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观点，斯大林对他们是不信任的。老的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者对于他的计划也抱着冷眼旁观、甚至公开敌对的态度。有些人还同这个或那个反对派站在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02页。

② 同上书，第414页。

一边。少数人则坚持失败主义的态度，阻挠、甚至破坏经济计划。起初，斯大林对于老一代的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表现得十分谦恭，这是无产阶级新掌权者往往具有的特点。后来，当他的自信心增长起来，当他同那些墨守陈规或对工业革命的速度采取清醒而现实态度的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发生冲突之后，他就变尊敬为敌视了。他咒骂和污辱他们。他因为少数人的犯法或犯罪，而对所有的人都抱极端怀疑的态度。还举行了几次对“破坏者”和“怠工者”的公开审讯，象拉姆金教授及其同事那样的科学家和科学院院士就被交付审判。经理和技术人员还受到工人和工头的监视。结果使工业遭到了灾难。而且，要训练新的知识分子，也得依赖那些老知识分子的自愿合作才行。到了最后，斯大林只好亲自出马来保护老知识分子。他在这方面的讲话充满矛盾，反映了他的病态的恐惧、犹豫不决和过迟地想挽救形势。

他的社会政策中最重要方面，也许是他同平均主义的斗争。他坚持说，工人的物质报酬必须有很大的区别，以便鼓励熟练和有效率的劳动。^①他声称，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均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他用马克思著名的论述来支持他的论点，说即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里，工人的工资起初也应该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来发给。但是，在布尔什维主义中有很强烈的平均主义倾

^① 斯大林首先在他著名的工业化“六个条件”的演说（1931年6月23日）中提出这一政策。后来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都重复强调这一点。在1939年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大声地反对工资和薪金中的平均主义，把它说成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谬论，这种谬论适合于某种原始的禁欲主义教门，但是不适合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左派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穷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58、562页）。

向。例如，在列宁治下，执政党的成员，甚至是最高级的成员，其最高的收入也只能和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相等。因此，工业化的需要就同“禁欲者的”生活水平发生矛盾；而由于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缺乏物质刺激，就妨碍了工业方面的熟练劳动。这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事。但是，也发生了另外一种情况：在整个三十年代，工资和薪金的差别被推到了极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如果说在文字上还未偏离的话）。这条鸿沟使广大的非熟练工人和低工资工人同特权的“工人贵族”和官僚分隔开来，这条鸿沟可以说阻碍了整个国家文化和工业的进展，就象早期严厉的平均主义观点所起的作用一样。

斯大林的反对者，特别是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主要就是根据斯大林的社会政策，把他谴责为新的特权阶层的头子。他的确以很大的决心去鼓励收入的不平等。在这一点上，他在“大转变”以前就已经下了决心。早在1925年，他就莫测高深地警告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说：“决不能玩弄关于平等的词句，因为这就是玩火。”^①在后来的年代里，他深恶痛绝地反对“平均主义”，使人感到，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防御他的政策中最敏感和最脆弱的一面。说它敏感，是因为高薪和特权的经理集团已经成为斯大林政权的支柱。这些人在这个政权下已有了既得利益。斯大林感到，他个人的统治越坚固地建立在利益和势力的严格等级制度上，就越加保险。说它脆弱，是因为要在刚刚被社会革命所破坏的基地上建立一个新的等级制度，是再困难和危险不过了。这场革命唤醒了人民潜伏着的对平等的渴望。当领袖们感到无法满足这种渴望并着手去压抑它的时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4页。

候，革命的发展就到了最危险的关头。^① 这些领袖所从事的工作，就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对革命的背叛。但是由于他们的这种暧昧作用，他们的良心感到不安，神经十分紧张，以致要把一切怨气都发泄在他们“背叛”的牺牲者头上。正因为如此，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或斯大林都异常激烈地打击他们各自时代的平均主义者。

只是到了三十年代晚期，第二次革命的果实才开始成熟。到这个十年的末尾，俄国工业力量已经赶上德国。它的组织效率和能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如此。但是，在矿业的总产量、基本设备和工厂方面，已接近欧洲大陆所有最发达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是在外国资本家的帮助下，经过了四分之三世纪深入的工业化才成功的。另外一些大陆国家，几年之前俄国人还难望其项背，而现在已经被抛到后边去了。^② 工业革命从俄国中部和西部发展到它亚洲部分遥远的不毛之地。集体农庄也开始产生积极的成果。到这个十年的末尾，农业已经克服了三十年代早期的衰退；工业也终于能够

① “官僚统治的基础就是社会消费品的匮乏，以及由此而引起了相互斗争。当商店中有充足的货物时，消费者在需要时就去购买，当货物很少时，消费者就被迫去排队。当队排得很长时，就必须派警察去维持秩序。这就是苏联官僚政权的出发点。它‘知道’谁可以得到东西，谁应该等待。”（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第110页。）

② 在斯大林的传记中，很难来详细叙述计划经济的成就。这儿只提供一个简略的统计数字。1928—1929年俄国的工业力量同1937—1938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时）相比较，十年里电力由六十亿瓩小时上升到四百亿瓩小时，煤由三千万吨上升到一亿三千三百万吨，石

大量地供给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具，农庄实现了非常高的机械化。对于这个重大的变化，以及它所意味着的国际均势的改变，外部世界多少还是不认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惨败，使外国观察家对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执极端怀疑的看法。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清洗”审讯也暗示着经济和政治上的脆弱。这种脆弱的因素无疑是存在的；如果回顾过去，并从后来四十年代的高处看问题，这种脆弱的因素看来还要更大一些。但是有力的因素也较三十年代认为的要大得无可比拟。

成就是显著的，即使仅仅拿俄罗斯民族的抱负这一尺度来衡量也的确是这样的。在不同的规模上，它为俄国新政权奠定了基础，有如克伦威尔的“航海法”曾经奠定了英国海上优势的基础一样。那些根据国家的雄心和威望来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的人们，不得不在世代代所有那些增强俄国威力的统治者中，把斯大林推于首位。正是在这种动机的激励下，许多流亡在外的白俄也开始把斯大林欢呼为民族英雄。但是第二次革命的意义不仅限于、甚至主要并不限于俄国。对于全世界来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计划经济的第一次真正巨大的试验，

油由一千一百万吨上升到三千二百万吨，钢由四百万吨上升到一千八百万吨，汽车由一千四百辆上升到二十一万一千辆。机床的产值由三十亿卢布上升到三百三十亿卢布（按“固定价格”计算）。（1941年苏联机床工业的总产量为1913年的五十倍。）从1928年到1937年，职工人数从一千一百五十万上升到二千七百万。革命以前，有医生二万人，1937年已有十万另五千人。医院病床从十七万五千张上升到六十一万八千张。1914年各类学校有学生八百万人，1928年有一千二百万人，1938年有三千一百五十万人。1913年，有大学生十一万二千人，1939年有六十二万人。革命以前，公共图书馆中每万人拥有图书六百四十本，1939年是八千六百一十本。（1946年《世界各国统计年鉴》）

是第一次一个政府对其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进行计划和管理，指导它的国家有工业力量去飞速地增加国民财富。诚然，斯大林并不是这一思想的开创者。他大量地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他的敌手们，因此他常常被指责为直接的剽窃。但是，他是第一个把抽象的思想变成实际管理的人。的确，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政府和总参谋部就已经在实际的计划工作上作了重要的开端；因而列宁经常提到这一先例，把它作为未来试验的方向。斯大林在计划工作中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战时的试验，而且还是和平时经济生活的正常模式。在此以前，各国政府从事计划工作，只是为了获得战争工具。斯大林的五年计划，也是要大量地生产大炮、坦克和飞机；但这些计划的主要功劳并不在于能够武装俄国，而在于能够使俄国的社会发生转变和现代化。

我们已经看到伴随斯大林的“大转变”而来的那些愚蠢和残酷的事情。它们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忆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过的英国工业革命的情况。这两者在很多方面是极其相似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描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或者如亚当·斯密称为的“预先积累”）。这是最初的暴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社会阶级积累了手中的生产手段，而别的阶级却被剥夺了土地和谋生手段，降到工资劳动者的地位。三十年代在俄国发生的过程，也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中的“原始积累”。马克思描述了“圈地”和“清扫领地”的情形，英国的地主和工场主正是利用这些办法剥夺了作为“独立农民阶级”的自耕农。^①同圈地法一样的办法也可以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9—268页。

苏联找到。斯大林在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提到这个法，它允许集体农庄“圈划”或“调整”它们的土地，以便使它连成一片。在这个办法下，个体农户或者被迫参加集体农庄，或者就实际上被剥夺了。^①马克思谈到了“血腥纪律”，它使英国的自由农民沦为工资劳动者；还谈到“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②。他的话可以适用于斯大林的许多实践。马克思总结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情况后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也是这样来到世间的。

尽管“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英国的工业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对它表示怀疑）标志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它开创了一种新的和大有希望的文明时代。斯大林的工业革命也能够声称有同样的功绩。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在更早的世纪里犯下残酷的罪行是情有可原的，但现在却不能原宥了。这是一个正确的论点，但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才有道理。俄国的历史发展迟缓。英国的农奴制度到十四世纪末已经消失，而斯大林的父母却还是农奴。按照英国的历史标准，十四世纪和二十世纪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都集中于当代的俄国，集中于斯大林的身上。历史学家如果在斯大林身上发现一些通常同早些世纪的暴

① 这个法是1930年1月通过的（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51页）。马克思在上引书中说：“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7页。

君相联系的性格，那也不必太过分惊奇。而且即使在斯大林工业革命最荒谬和最可笑的阶段，他也能够宣称，他的制度至少避免了折磨着西方先进国家的那种主要的和令人痛苦的蠢事。他在资本主义大萧条的时候说过：“在他们资本家那里，在危机期间以销毁‘剩余’商品和焚毁‘多余’农产品来保持高昂价格、保证高额利润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而在我们苏联这里，人们会把犯这种罪行的罪人送到疯人院里去。”^①

显而易见，斯大林已经离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流很远了。他的社会主义和差不多所有社会主义派别想象中的新社会的共同点，只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和计划经济。它的不同之处则是，它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发生退化，并使革命从过去承袭下来的一片贫穷中又复发了显著的社会不平等。但是斯大林主义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的根本区别，还在于它们对社会转变中暴力作用所持的不同态度。

马克思主义仿佛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倔强的私生子。它拼命反对它的父母，却同它们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自由放任政策的提倡者曾反对过政治暴力，认为它在社会生活中不能起进步作用。同自由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在一些历史事例和情况中（如英国和法国的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暴力的确帮助了民族和阶级的进步。但是他们也认为，政治暴力有效地改变社会前景的可能还是很有限的。他们认为，人们的命运主要是由基本经济和社会进程所决定；同这些相比较，暴力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2页。

只能起附属的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思想彼此相异甚大，但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十九世纪现代文明的未来表示乐观。两者都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将或多或少自发地实现他们各自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一句著名的话表达了他们共同的观点：暴力是每一个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助产妇。助产妇只是当时间成熟时帮助孩子离开母体。她除此以外就无能为力了。斯大林反映在他的行动上而不是话语上的关于暴力作用的观点，造成了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气氛。斯大林可能把马克思的那句老格言解释为：暴力不再是新社会的助产妇，而是新社会的母亲。

第九章

渴望权力的诸神

导言：布尔什维主义和雅各宾主义。——斯大林注视着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活动。——托洛茨基在俄国的影响。——两代布尔什维克反对派。——斯大林动摇于镇压和自由姿态之间(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1934年12月)和半自由时期的结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重新承认错误。——斯大林派日丹诺夫去“清洗”列宁格勒。——布哈林和拉狄克是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主要作者。——关于斯大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法庭庭长的题外话。——政治局的观点。——斯大林的文学和文化影响。——他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清洗”审讯(1936—1938年)。——被告和指控的罪行。——为什么被告们都“供认罪行”？——审讯的时机选择。——图哈切夫斯基密谋。——斯大林公布新宪法(1936年11月)。——1939年初结束审讯，审讯的后果。——托洛茨基被暗杀(1940年8月于墨西哥)。

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了斯大林事业中最黑暗的一章。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审讯，差不多整个地消灭了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这一时期经常被人们拿来同法国雅各宾革命(断头台的统治)的最后阶段加以比较。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似的，以致使得这一戏剧的一些主要演员和观众容易忽略它们之间的区别。斯大林和罗伯斯比尔的“恐怖统治”都具有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性质，同样无理性的残酷色彩，同样象神话一般的恐怖

表现，使得人们对革命吞食自己的孩子的情景永远不能忘怀。甚至恐怖事件进行的顺序都是相同的。罗伯斯比尔首先击败了由艾伯特和克鲁兹领导的雅各宾左派，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得到由丹东领导的雅各宾右派的帮助的。然后他就消灭了丹东和他的伙伴，在一个短时期内确立了他的雅各宾中派的绝对统治。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中派的领袖，他起初得到布尔什维克右派的帮助，击败了左派，然后转过来又去反对右派，最后他作为他一派的胜利的领袖而独掌大权。

但是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雅各宾领袖们的相互屠杀发生在革命的早期阶段。革命各个阶段之间的间歇（即高潮和突降）是很短暂的；而且所有阶段中似乎都被同样盲目而新鲜的热情所统治。1793年初，山狱派和吉伦特派看来是站在一起反对君主的。十个月以后，在10月31日，吉伦特派的领袖们就上了断头台。后来就来了“理性的节日”，雅各宾主义的高潮。仅仅五个月之后，在1794年3月，雅各宾左派的领袖就被砍了头。两星期之后，刽子手又把丹东硕大的头颅展示给围观的巴黎人。罗伯斯比尔的个人独裁还没有支持到四个月，在7月27日（热月9日）就垮台了。而对事件自发的、疯狂的速度，人类理性、自我约束和自我保存的任何天性似乎都是无能为力的。领袖和追随者，派别和个人，似乎都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作用，没有摧毁封建的法国，却在一阵疯狂之中毁灭了他们自己。

俄国革命的一系列事件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头二十年结束时，还没有表现出雅各宾似的疯狂迹象。在1918到1921年的内战期间，的确不乏恐怖的事例。但那种恐怖

还只是反对武装的和好斗的反革命的一种军事措施。它的方法和目标都由那次战争的性质所决定。不象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处决它们的吉伦特派。孟什维克的一些最著名的发言人如马尔托夫、唐恩、阿布拉莫维奇，在他们的党被禁止后，或者被允许离国，或者自己流亡国外。一小撮留下来的人则被监禁起来，但大多数孟什维克在甘于失败之后，都忠实地为苏维埃行政机关服务，有的人甚至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员。

俄国的山狱派既然能够赦免它的吉伦特派的生命，因此就自然可以指望它不会把自己的领袖淹没在血泊之中。三十年代早期，在布尔什维克中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在斗争开始时，它的领袖们曾秘密而庄严地发过誓言，永远不使用断头台来彼此反对。不管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可以肯定斯大林是的确考虑过法国的恐怖先例的；而且在几年里这种考虑阻止他采取最激烈的镇压手段。他也不只一次地这样说过。例如，他曾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进行报复的要求，说：“我们所以没有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①他似乎是说，二十世纪的革命可以摒弃自己的子女，但不需要吞食他们。1929年，他下决心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国。但仍不能想象可以把托洛茨基监禁起来，更不用说枪毙他了。一直到了几年以后，当革命的熔岩似乎完全冷却下来时，新的恐怖才爆发起来。斯大林的敌手们都招供了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7页。

罪行和进行了自我谴责，这同大多数雅各宾领袖在审讯中表现的骄傲和蔑视行为形成了尖锐的对照。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斯大林的清洗审讯看起来甚至比罗伯斯比尔的还要更令人迷惑不解。

法国大革命完全是自发的。它的党派都是在大变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没有固定的纲领或明确的思想。它们是革命大潮流的一部分，其政策和口号随着运动的阶段而发生变化。雅各宾主义的力量在于它决心粉碎法国的封建结构。它的弱点则在于它完全无能给法国社会提供任何新的和积极的组织。罗伯斯比尔给法国提供了建立于小私有制上的社会平等的乌托邦，而法国只愿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产阶级的不平等去。他努力想使整个法国转变为正直的下层中产阶级社会，因而他处死了他的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敌手们。法国挣脱了他想迫使它躺下去的普罗克拉斯提斯床，^①抛弃了那位曾经使它卸去封建锁链的乌托邦独裁者——这样它就获得了恢复和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雅各宾主义的支持力量是很弱的，因为它的各派中没有谁对社会的需要和国家的前景有任何现实的和积极的观点。

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力量就无可比拟地大得多了。它本身远不是革命潮流的一部分，在进入革命前，列宁的党就是一个决心控制自发运动的组织紧密的团体。布尔什维克纲领的主要路线早在1917年前就已形成。即使在革命低潮时，这个党虽然内部纷争不已，仍然向国家提供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建设性纲领。在差不多二十年的过程中，它的理性观点捍卫着它，反对

^① 希腊神话：普罗克拉斯提斯是一个强盗，他劫得人后强使其躺在床上，身比床长者，砍去长出的部分；身比床短的，则强把身体拉与床齐。——译者

由革命产生的专制主义所固有的那种无理性的冲动。在差不多二十年中，布尔什维主义抵抗住了渴望权力的诸神。但是当它向它们屈服后，它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甚至比雅各宾主义更为丑恶。

虽然更为丑恶，但却不怎么完满。不象罗伯斯比尔那样，斯大林本人并没有被送上他自己设置的断头台。

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国后，斯大林必定是大大舒了一口气。托洛茨基即使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也还同他那些尚未“投降”的追随者保持联系；离开俄国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片不满声和紧张气氛之下，他还可能鼓舞起有力的反对。斯大林同凯末尔帕夏政府达成了协议，把托洛茨基放逐到了土耳其。他希望托洛茨基到了那儿之后割断了同世界的联系，从而就无所作为。但是托洛茨基在流亡中仍继续用他唯一留下的武器——笔来进行战斗。他在居住的太子岛上出版了一份小型期刊，名叫《反对派公报》。他亲自在刊物上撰写对苏联和共产党政策的连续评论。这个不显眼的刊物开头却对旅行国外的苏联官员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读它，还常装在行李中带回国去，转给朋友们看。斯大林自己也仔细地阅读了每一期刊物。^① 这刊物对俄国国内发生的事非常灵通；而托洛茨基又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评论家。斯大林的一些行动，首先是由《公报》暗示出来的。^②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64页。

② 特别是1932——1933年的经济政策。参看《反对派公报》，第33期，1933年3月。

除此之外，对于反对派的情绪和希望，《公报》比斯大林的政治警察的报告更有启发性。

对于托洛茨基从国外发生的出乎意外的影响，斯大林是不会低估的。他记得列宁的《火星报》是一份并不比托洛茨基的《公报》更显眼的报纸，却一度“点燃了革命的熊熊大火”。诚然，托洛茨基现在是鼓吹改革而不是革命。他的《公报》不象布尔什维克往日的秘密报纸，很可能永远到不了俄国工人手里；但是它越发自由地在高级官员和有影响的党员中流传，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托洛茨基手下服务过的，而且还保留着忠于他的感情。在托洛茨基被放逐后不久，政治警察的一个头子布鲁姆金在国外旅行时到太子岛去拜访了他。斯大林决心终止这类接触。布鲁姆金被枪毙了，以警效尤。一个反对派的同情者遭此极刑，这似乎还是第一次。过了一些时候，托洛茨基及其家属被取消了苏联国籍。从此以后，任何同这位红军创建者接触的人，都将被指控为同“外国阴谋者”接触。

但是，托洛茨基继续从远方施加某些影响，特别是在1932年到1933年危急的时刻。当危机发展到顶点，大约就是斯大林的妻子自杀时，《公报》发表了一篇对经济形势的详尽评述，包含了丰富的统计资料，而这些资料是只有苏联政府成员才能看到的。^①这篇匿名的文章总结道：“鉴于现领导无能摆脱经济和政治的僵局，关于需要改变党的领导的信心正在增强。”这篇评述的作者是I.N. 斯密尔洛夫，他是打败高尔察克的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投降”之后已经担任了职务。托洛茨基抗议取消他的苏联国籍时，也再次提醒他以前的同事们，要他们记住

^① 《反对派公报》，第31期，1932年11月。

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关于“撤换斯大林”的建议。

在俄国的反对派有些激动，但却没有行动起来。从西伯利亚回来并投降了斯大林的领袖们虽然压制不住对斯大林政策的不安，但却没有和不能公开地出来反对这些政策。托洛茨基虽然不遗余力地批评斯大林，但他的实际结论却是犹豫不决的。他在1932年秋天写道：“当前，苏联官僚统治（即斯大林的统治）均势的倾覆，几乎可以肯定会对反革命力量有利。”^①这就等于劝告反对派，除了抽象的宣传外，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过，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又宣称：“不久的将来将会表明，左翼和右翼反对派既没有被击溃，也没有被消灭，恰恰相反，它们都在政治上真实地存在着。”^②1932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许多人再次被开除出党，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季诺维也夫这时说道：“我一生的最大政治错误就是在1927年抛弃了托洛茨基。”^③托洛茨基《公报》上那篇述评的作者斯密尔洛夫被逮捕了。被逮捕的还有宣传负责人柳亭（一些对政治不满的人开始聚集在他周围）和莫斯科党委书记乌格拉洛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抛弃了他们的那些想同左翼反对派达成协议的追随者，并再次谴责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几个月之后，在1933年5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次承认错误之后，被允许从流放地返回。托洛茨基评论这些新的“投降”说：“斯大林就象果戈里笔下的人物，由于缺乏活的，就去收集死魂灵。”^④一再重复的放逐和承认错误是为斯大林的

① 《反对派公报》，第36—37期。

② 同上，第31期。

③ 同上，第33期。

④ 同上，第35期。

目的服务的：放逐吓倒了反对派，而承认错误又迷惑了他们。不过，托洛茨基的嘲笑倒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党内普遍存在不满情绪。1933年到1935年间，被开除的人达几百万；被开除出共青团的则更多。更为重要的是，不满情绪开始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反对派中的两代人之间出现了分裂，这就是父与子的分裂，但它又不同于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中的那种分裂。

到了这时，反对派中的老人不仅早已被击败，而且精神上垮了。甚至不屈不挠的前乌克兰总理、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拉柯夫斯基（他比别人流放和监禁的时间都长得多）也投降了，并在1934年返回莫斯科。象所有的悔过者一样，他也签署了一项声明，其中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吹捧和对自已的谴责。所有这些声明的要点都是说，斯大林执行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反对派所鼓吹的任何路线都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不过，这些“投降者”并未承认他们努力要使资本主义复辟。也没有要他们这样承认。他们自我谴责的主要意思是，如果采纳了他们的政策，就会违反他们的初衷，使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他们所以同意进行这种“自我批评”，并不只是由于斯大林对他们的沉重打击。事实上，他们所以屈服，就证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疲倦了，或者就是在半心半意地进行反对。光是他们的年纪就足以说明他们是疲倦了：大多数“投降者”都已进行了三十或四十年的持续斗争，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斗争。他们所以半心半意地进行反对，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不管他们对他的方法是怎样想的，斯大林所完成的转变是不能逆转的，否则就会危害革命。尽管他们对他的方法充满了恐惧，但他们

感到，他们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他们的自我贬低就是付给这位船长的赎金。因此，他们的承认错误既不是完全诚恳的，又不是完全不诚恳的。他们从流放地归来以后，都急于同政治上的老朋友和老关系进行交往，但却小心谨慎地避免反对斯大林的任何政治行动。差不多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斯大林的新政治局成员保持联系。有些悔过者，如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或者是斯大林的个人顾问，或者就是政府成员。如果他们想暗害斯大林或他的亲密同伙，他们是有无数机会去这样做的。

托洛茨基在俄国的一个记者因此描述了这些人在1933年的情绪说：“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斯大林的孤立和对他的普遍仇恨。……但是他们往往又说：‘如果不是亏了那个（我们在此省略了对他的那些强烈的形容词）……现在一切都已经崩溃了。正是他维系了这一切。……’”^①在反对派队伍中，“父辈”的反对派抱怨、叹息，直抒胸臆间的闷气。他们继续把斯大林称为政治局中的成吉思汗、亚细亚人、新的伊凡雷帝。这些抱怨和称号立即被报告给斯大林，因为他的耳目遍布各地。他知道他的蒙受耻辱的反对者的真实感情和他们公开歌颂的价值。但是他也相信，由于他们在政治上软弱无力，所以他们至多只是在言词上激烈一下罢了。

的确，反对派中的老战士们把模糊的希望寄托于将来。因此他们认为，也许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繁荣和政治上的满足就会到来，然后斯大林严酷的统治就将成为不必要或

^① 《反对派公报》，第34期。

可以加以容忍。这时他们只好等待时机，并约束他们之中的青年人和更无耐心的追随者。甚至怒斥“卑怯的投降者”的托洛茨基也在1933年3月写道：“在党内和党外，‘打倒斯大林’的口号越来越响亮。理由……是无需在这儿解释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本人而在于他的集团。……不消说，群众被迫加以崇拜的由一个领袖掌握的波拿巴政权，是应该和一定要完蛋的，因为这是对革命政党思想的最无耻的歪曲。但是我们并不关心排除个别人，而是关心制度的改变。”^①当这个政权面临自由化的严重时期，托洛茨基甚至向斯大林建议合作，共同反对反革命的危险。

这些老战士的等待态度不能和没有满足青年人中的不满分子。这些“儿辈”的反对派就以比“父辈”大得多的热情，试图去反对令人窒息的独裁气氛，这本来是自然而无可避免的事。新一代肯定是不能按老一代的路数去行动的——更不用说令人作呕的承认错误和自我羞辱了。他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伟大的老头子们”还是有些尊敬的，希望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使他们重新掌权。这些“儿辈”不仅感到“父辈”在教育和政治经验上比他们高，而且也接受了“父辈”的主要想法：“回到纯粹的列宁主义去”，不管这意味着什么。在方法的选用上他们是不同的。老的布尔什维克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反对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对沙皇仆从的暗杀行为；他们象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依靠群众运动的增长来反对沙皇制度。他们仍然忠实于那种政治传统，希望依靠工人阶级态度的改变，而不是依靠背着人民的个人密谋活动来改革这个政权。“儿辈们”不理这些约束。他

^① 《反对派公报》，第33期。

们看到，现在的产业工人阶级主要是刚刚从农村招来的不成熟的农民，他们的政治觉悟是很可怜的，他们差不多没有什么行动的能力。如果改革要通过那个工人阶级来实现，那么国家就得忍受斯大林的统治许多年。这恰恰是这些最热情的青年反对派所不甘心的前景。在学校和共青团的小组中，他们听到了那些孤独的俄国革命家的故事。在十九世纪时，那些人几乎没有得到俄国社会任何阶级的支持，就用炸弹和手枪去进攻专制制度。列宁的哥哥不就是参加企图暗杀沙皇亚历山大第三的密谋吗？教科书中大肆颂扬了那些烈士和英雄；而过去的这些神圣的亡灵现在似乎又把炸弹和手枪塞到一些不耐烦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共青团员手中。①

在反对派分裂的同时，政治局中也产生了新的意见不和。它的成员虽然都是斯大林亲手挑选的，并誓死保卫现存的状态，但他们在手段和方法上却有分歧。有些人敦促斯大林把他的专制主义带上更多的自由色彩，而另一些人则主张高压政策。基洛夫、伏罗希洛夫、鲁祖塔克和加里宁似乎是“自由派”。伏罗希洛夫不得不认真看待集体化对军队士气的影响。远东军区司令员勃柳赫尔将军宣称，如果在边疆区强行集体化，他就无法负担捍卫远东疆界的责任。② 伏罗希洛夫在政治局中支持勃柳赫尔的观点，因而使远东的农民免除了集体化。基洛夫被派到

① 由于这个缘故，日丹诺夫要求教科书不要再颂扬十九世纪的革命恐怖主义者。

② E·沃伦堡：《红军》，第258页。

列宁格勒去镇压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但不管愿不愿意，他却不得不为俄国这座最欧化和最革命的城市中不安的情绪代言。他恳求斯大林宽大对待反对派；而且在他职权范围内，尽力约束政治警察。^① 鲁祖塔克是副总理和工会领导，他也在相同的方面施加了自己的影响。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则是高压手段的主要鼓吹者。

他们所有的人不成问题都是忠于斯大林的。他们是他的禁卫军的领袖。公众看到他们同斯大林亦步亦趋，因而对于这种拔河游戏是毫不知晓的。斯大林本人冷静地注视着情况，对它毫无畏惧。对手们诉诸他的明智，等待着他的裁决。他一会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又支持另一派。整个1934年，他都动摇于加强镇压和自由姿态之间。这一年的春天，他命令对反叛的富农实行有限的大赦。但是到了6月，他又发布命令，对谋反的家庭实行连坐法。人们如果不向当局告发谋反的亲属，就要遭到严厉的惩罚。一个月以后，他取消了格柏乌，代之以内务人民委员部。政治警察的权力受到了限制，总检察长（一个前孟什维克律师安德烈·维辛斯基很快被任命担任此职）被赋予监督它的活动的权力；如果它的活动违法，可以加以否决。反对派的领袖们被允许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虽然不能批评现政权。采取进一步自由措施的呼声很高。政治局也放出了要改革宪法的风声；反对派的几个主要领袖被邀来共同草拟新宪法。

1934年12月1日，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尼古拉耶夫在列宁格勒暗杀了谢尔盖·基洛夫，于是这种半自由的时期就突然

^① A·巴尔明：《一个幸存者》，第247—248页和252页。

中断了。斯大林匆匆赶往列宁格勒，亲自审问了恐怖主义者达几小时。这次暗杀是一个青年共产党人的小团体干的，他们被国内的镇压气氛所激怒，并沉溺于革命恐怖主义的思想之中。这种情绪在青年人中相当普遍。尼古拉耶夫及其朋友认为自己是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但他们同他并无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基洛夫反对政治警察对他加以严密警卫，也许正是基洛夫的这种自由主义，使得恐怖分子能够接近他在斯莫尔尼学院的办公室。无论如何，列宁格勒的格柏乌是知道这个暗杀预谋的，但没有采取行动来加以防止。斯大林是不是也知道这个预谋而加以默许呢？这还不能肯定；不过他利用基洛夫之死来证明他的结论说，半自由的让步时期已经结束。他对反对派的胜利还远远没有完成。他只是把不满分子赶到地下。现在他要进行更为深刻而沉重的打击。

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俄国专制制度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沙皇统治下的几乎每一代人中，同反对派中温和的“父辈”和激烈的“儿辈”之间的分裂相应的，在宪兵当局和沙皇扈从的半开明派之间也存在着一场隐蔽的激烈斗争。甚至在专制制度比较温和的时期，它也没有开明到足以满足反对派的程度，而只温和到革命者可以对之进行打击的程度。温和的“父辈”徒劳地劝说激烈的青年耐心等待沙皇作出进一步的让步。想对专制制度进行的每一变革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统治集团中，半开明派被打败了，宪兵当局又重露头角。宪兵当局并不满足于镇压革命者，他们还要温和的反对派对激烈的青年的行为负责。开明派就对此进行抗议，并指控专制制度不允许公开而合法的反对派，因而要对青年的“过火行为”负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在亚历山大第一统治下就充满了半开明的改革。1825年十二

月党人的起义，是铁沙皇、宪兵沙皇尼古拉第一统治的前奏。半开明的亚历山大第二被革命密谋者杀死以后，他的继位者亚历山大第三就利用暴力进行镇压。最后一个沙皇的政策则摇摆于两条路线之间。在斯大林统治之下，由于一个尚未巩固的、革命后的社会所特有的紧张局势，这些俄国政治斗争的传统特点就更为突出了。

尼古拉耶夫和他的同伙被处决了。他们是根据一项恐怖分子无权辩护和上诉的特别法令进行秘密审讯的。斯大林不允许他们把审讯席作为陈述自己观点和控诉统治者的讲台。他还不就此甘休。象过去的宪兵当局一样，他也为激烈的“儿辈”的行为而责备开明的“父辈”，指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对基洛夫的被暗杀负责。他们的审讯也是秘密进行的。两人都不承认同这次暗杀有任何关系。在谴责这种行为时，他们承认，这些青年恐怖分子可能从过去他们对斯大林的批评中得到鼓舞；但是他们宣称，由于斯大林镇压公开的批评，驱使这些共青团员进行无望之举。季诺维也夫被判十年、加米涅夫被判五年监禁苦役。但是，斯大林这时最无兴趣把这两个老布尔什维克关在监狱里，因为这会使他们成为殉道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会重新树立他们作为合法要求政权者的形象。他主要的目的在于套出他们承认有罪的口供；根据口供，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手摧毁自己作为殉道者头上的光环。

继之而来的就是关于承认错误方式的一个稀奇古怪的讨价还价过程。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是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所在的卢布扬卡监狱之间进行的。斯大林同意公开宣布免除这两个囚犯同暗杀者的一切干系；但他

要求他们承认自己的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两名囚犯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斯大林就利用了他们已经承认的一点，即恐怖分子曾从反对派往日的宣传中得到了鼓舞。^①不管是用恐吓还是用辩论的方法，他终于使季诺维也夫公开承认了。季诺维也夫说：“由于客观环境的力量，以前的反对派的以前的活动，不能不促使那些犯罪者堕落”，也就是招致了基洛夫的被暗杀。这句话既是诚恳的，又是外交上的辞令。谴责恐怖行为是诚恳的；斯大林是能够从季诺维也夫那儿得到这样的话的，因为季诺维也夫也希望反对恐怖主义倾向。但是季诺维也夫小心翼翼地强调说，他只准备承担间接的道义责任——按他的话说，就是仅仅“以前的反对派的以前的活动”可能鼓舞了恐怖主义的倾向。这种说法还包含着对斯大林的谴责，因为他的话是说，恐怖主义是由于“客观环境”造成的，即由于全国的镇压气氛造成的。在这个阶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不准备更多地进行自我谴责；而斯大林也只好如此。季诺维也夫微妙地设辞，对他的“承认”作了两面的解释，这对公众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承认本身就说明问题了。反对派的领袖们在下坡路上滑得太远，导致了大清洗审讯。

基洛夫的被暗杀使斯大林警觉起来。是不是密谋者已渗入他的办公室里呢？在1935年春季，差不多有四十个他的私人警卫被秘密审讯，两个人被处决，其余的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劳役。报纸上没有提到这次审讯。^②接着就在党和共青团的一切

^① 参看《反对派公报》，第42，47,52—53期。事件的过程可以根据《真理报》1934年12月下半月到1935年1月初的报道再现出来。

^② 很多情况是由南斯拉夫共产党前领导人A·西利加透露出来的，他在监狱中遇到了那些审讯中的被告。参看《反对派公报》，第47期。

部门中疯狂地搜寻恐怖分子。斯大林这时的行动原则是，光打击他的真正敌手已经不够了，他要连根扫除产生他们的环境。他把一腔怒气发泄在列宁格勒上，因为它的守护神在最近十年来似乎一直在蔑视他。他派了安德烈·日丹诺夫到列宁格勒去接替基洛夫的职务。日丹诺夫是一个年轻、能干而无情的人，他曾经负责清洗过共青团中的异端分子，并在同工会的斗争中，以对托姆斯基进行目空一切的攻击而知名。斯大林可以依赖他去捣毁列宁格勒的马蜂窝。在1935年春季，成千上万被怀疑的布尔什维克、共青团员和他们的家属，从列宁格勒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从其他城市也流放了很多“暗杀基洛夫的人”（这是对那些受放逐者的称呼），他们塞满了监狱和集中营。

对政治犯的待遇也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在此以前，他们的待遇同沙皇时代还没有什么区别。政治犯可以享受某些权利，被允许从事自我教育，甚至进行政治宣传。反对派的备忘录、小册子和期刊在监狱之间半公开地传递着，偶尔还被夹带到国外去。斯大林自己就作过囚犯，深知监狱和流放地是革命者的“大学”。最近的事件也教育他不去冒这个险。从这时以后，在监狱和流放地的一切政治讨论和活动都受到无情的镇压；反对派的人们衣食匮乏，劳动艰苦，过着可怜的牛马生活，以致不能正常地思想和形成自己的观点。^①

^① 当一车皮一车皮“暗杀基洛夫的人”从俄国许多地方运往东边和北边去的时候，斯大林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这些同志并不始终只限于批评和消极对抗。他们还以在党内举行暴动反对中央委员会来威胁我们。他们甚至曾用子弹威胁过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看来，他们指望吓倒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列宁的道路。……我们曾经不得不狠狠地打击了这些同志中间的某些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应当承认，对于这件事我也是出了一臂之力的。（热烈鼓掌，高呼“乌拉”。）（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80页。）

当斯大林已经背叛自由改革的希望时，他仍装着愿意满足这种改革的希望。他给人民提供了一种恐怖和幻想的混合物。他行动狡猾，因为光给人民恐怖，他们就可能进行绝望的暴动，使得最有力的政治警察也无能为力。但是光给人民幻想也不足以保护斯大林的政府，如果不同时用恐怖手段来掩护它的话。基洛夫被暗杀后两周，在1935年2月6日，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认为需要一部新的宪法，并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草拟它。这个委员会由斯大林领头，包括象布哈林、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这样的人，以及他们未来的起诉人维辛斯基。在后来的一年半里，这个委员会经常在斯大林主持下开会。布哈林和拉狄克是这部新宪法的主要作者，他们经常在《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专栏中讨论它。这部宪法于1936年11月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正好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处决后几个月。它被称为“斯大林宪法”，“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

在描述基洛夫被暗杀前后的形势时，我们提到了沙皇专制制度下传统的政治模式。这种类比或许是牵强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和沙皇俄国之间毕竟隔着一条鸿沟。不过，正是列宁第一次暗示了这种类比。在最后几次报告中的一次中，他提醒追随者注意，当征服者的文化低于被征服者时，历史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被征服的民族会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列宁说，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已经打败了地主、资本家和沙皇官僚制度。但是，列宁说：

“他们的文化〔即被击败阶级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可是总比我们那些作负责工作的党员高得多。”^①

被击败的沙皇俄国把自己的标准和方法强加给胜利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只是看到了这一过程的开头。对于作出英勇努力来摆脱过去的一代人来说，过去也对他们作出了残酷的报复；而这种报复恰恰在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达到高潮。俄国历史的这种怪事就体现在斯大林身上。他比任何人都能代表那些“做负责工作的党员”，他的“文化”低于俄国的老统治者，因此他压倒一切的爱好就是经常不自觉地去模仿老的统治者的风俗习惯。这个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过程，反映在斯大林政治外貌的变化上：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沙皇的特征，似乎在目前统治着克里姆林宫的那个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身上复活了。有一个时候，他表现得有点象铁沙皇，即尼古拉第一。另一些时候，他又更象彼得大帝的直系子孙：彼得大帝在沼泽和建筑者的白骨上建设了他的圣彼得堡，斯大林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建设了工业化的俄国吗？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又假装和模仿亚历山大第一的姿态。现在，在大清洗的期间，由于他镇压自己的反对者，他就越来越象激烈反对特权贵族的伊凡雷帝了。他的政治警察既看管工业企业也看管监狱，同使伊凡雷帝获得支配地位的禁卫军也是相象的。在他同托洛茨基的争论中，人们还可以觉察到伊凡同特权贵族的反叛领袖库尔布斯基亲王激烈论争的微弱回音。就象在十六世纪一样，莫斯科的人们现在也是“在恐怖中祈祷，但愿这一天没有处决人”。在这种历史的报复中，似乎是较远的过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4页。

去比较近的过去更能够赶超向前运动着的民族。能得到世人承认的，只是早期那些具有凶猛精神的开疆拓土的沙皇，而不是处于沙皇制度衰颓中的更亲近、更温和、更“开明”的沙皇。过去压迫现在的残酷性，是同革命开始抛弃过去的决心成比例的。

但是，在斯大林身上，那种革命的因素，特别是从列宁继承下来的那些特点，同传统的因素奇异地结合了起来；而这种结合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最令人不解和最难以捉摸的人。过去并没有使革命消失，而只是在新社会的实体上打上自己的印记。就象克伦威尔作为护国公和拿破仑作为皇帝一样，斯大林现在也仍然是革命的保护人和托管人。他巩固了民族的利益，并扩大了这种利益。他“建设了社会主义”；甚至他的反对者，在谴责他的专制时，也承认他的大多数经济改革对于社会主义的确是重要的。因此，过去的报复并没有对他的社会纲领而只是对他的统治手法发生了影响。主要就是在这一点上，沙皇制度“低得可怜”的传统才起了支配作用。

我们知道，他所以搞权术，说明他对社会执不信任态度，对处理社会问题有悲观主义思想。他的社会主义是靠压制而不是靠说服来建设的。甚至当他企图使用某种说服方法的时候，他也更乐意采取宣传花招，而不是启发式的论点。换句话说，他吸取了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统治者臣服人民的种种阴谋诡计。由于革命宣布其指导原则是信任人民，即信任工人阶级；又由于它曾经谴责政治欺骗是为阶级压迫服务的，所以过去的报复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各种思想的大冲突，引起真正的思想危机，最后在这一代人中就改变了共产主义的面貌。这是权威和社会长期冲突的尾声。权威一心想绝对地从上面来塑造社会，

而社会却渴望着有自决的自由。

这种冲突并不是俄国革命所独有的，它在每一次革命和每一种宗教教义中都重复出现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位宗教法庭庭长同基督之间发生过一场深刻、阴郁而激动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本质正是由这种冲突形成的。斯大林就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法庭庭长一样，也代表了教会去造福音的反。宗教法庭庭长争辩说，基督把他的教导建立在对人、对人的自由梦想以及对人生活在自由中的骄傲和勇敢的信念上。因此他曾经拒绝了撒旦的引诱，并不愿通过诉诸人的奴性而使他们皈依。但是基督教却不能实践基督的这些教导。因此当基督重临人间的时候，宗教法庭庭长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纠正了你的行为，并把它建立在奇迹、神秘和权威之上。……人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又象羊群一样重新得到了领导，而且最终在心中升起了一种可怕的天赋权力，这种天赋权力〔自由的权力〕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们的这种教导和行动难道不对吗？请您回答！千真万确，我们是热爱人类的，当我们认识到他们是如此的软弱无力时，我们就怀着热爱之心去减轻他们的负担，而且只要得到我们的允许，甚至还容忍他们的弱点甚至犯罪。为什么您现在要出来阻碍我们呢？”

宗教法庭庭长继续说：“我再对您说一次，就在明天早晨，您就会看到那个顺驯的羊群，仅仅在我的一个暗示之下，就会冲到火刑柱前，堆满炽热的炭块，因您出来阻碍我们而把您烧死。因为如果有谁最应受到我们的火刑，那末他就是您。明天早晨我们就要烧死您。”在宗教法庭庭长的牢房中，基督“走近那个老人，亲切地吻了他的毫无血色的、已经有九十岁的嘴唇”，

仿佛他已经默许了关于他的教会的自由和尊重人的奇迹、神秘和权威的那番话。

许多教义都经历过这种谈话，布尔什维主义也不能免。如果斯大林曾经解释过他的深奥哲学，他一定会公开地讲，俄国不可避免地需要“纠正”十月革命的行为，并清除它对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自由、进步和团结的最初信念。他会解释宗教法庭庭长的意思说：“只有依靠上帝的选民和根据这种信念而来的坚强行动才行，而人类是软弱的，他们渴望着面包和权威。”他会以严厉而不安的眼光看着社会主义奠基者们的面孔，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出来阻碍我们呢？”

他知道，老的一代革命者虽然已经疲倦和受到羞辱，但除少数例外，都从来不是全心全意地皈依奇迹、神秘和权威的；而且他们总是把他看成是一个篡改最初原则的人和篡权者。他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前政治犯协会和共产主义学院，这些机构都是老布尔什维主义精神的最后藏身之地。这些行动表明了自从他以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名义开始同“前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斗争以来他所走过的一段道路。这时他向青年一代呼吁，当然不是向具有倔强精神的青年，而是向比较胆小但却很重要的青年；这些青年虽然热心学习和切盼在社会上得到进步，但对布尔什维主义早期的思想知之不多或根本不知道，而且也不愿意去为它费脑筋。这个较年轻的一代，从他们能记忆起，就总是把各个反对派的领袖看成是代人受鞭笞者或自我鞭笞者。他们从童年起就畏敬裹在神秘和权威外衣之下的斯大

林。他早已不复是党的书记处中那位平易近人、耐心和对人有帮助的代言人了，早已不复是二十年代早期的斯大林了。他已不再在党办公室的楼梯上耐心地倾听他们的牢骚。他现在只是在非常少的场合才出现在公众面前，而且周围总是环绕着一大班随从；这些随从就象朝臣一样，在一段距离之外追随着他，小心谨慎地按照已经固定下来的先后次序。他对公众讲话的机会已经很少，而且每一次讲话都被当成历史的里程碑。他的讲话总是带有独裁者的命令性质，但的确对于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一种实际的意义。他个人离群众越来越远，而其影响却无所不在，这使他的形象特别在青年一代人的眼里带上了一种令人敬畏的性质，而这是东方统治者惯于用来使人民加深印象的方法。

* * *

环绕在他周围的随从当然是他的政治局。这个政治局无论从什么意义来说都是他的，因为它的人选都是他按照自己关于领导者的标准进行挑选的。他早在1925年就写道，这种“新型的”领导者不应该是文学界的人；不应该背着旧社会民主主义的货色；应该害怕而且尊敬党的领袖^①。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科西奥尔、鲁祖塔克、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差不多所有这些人都是符合这一理想的。这些人几乎都是搞实际工作的行政官员，而且忠于自己的职守。他们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都象斯大林一样地是土生的布尔什维克。^②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9—40页。

^② 到过外国，这是攻击反对派领袖的一个老一套论点。莫洛托夫就特别说过，他们都是在国外的流亡者，同俄罗斯大地毫无关系。斯大林也在会见艾米尔·路德维希时谈到这一点。

他们大多数是斯大林从小人物中提升起来的。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也同责任一起增长了。全国的一切事情，从外交和政治的大政方针，直到各省区当局最次要的麻烦事情，都拿到这个机构中来讨论，因此它几乎每天都在开会。对于部际之间没完没了的争执，政治局有最后决定权，而斯大林在政治局中又能一言定鼎。他甚至没有主持过政治局的会议。他通常都是静静地听着争论，然后开一句粗俗的玩笑，作一次半认真的威胁，或者就是摆一个粗暴的不耐烦姿态，就解决了大多数问题。他们之中的少数人，在多年的过程中，不得不对工业和农业各个部门的措施、教育问题、供应军队的武器型式问题等等亲自作出决定，于是就积累了许多部门的大量技术知识，而这是在比较不集中的制度下工作的行政官员所难以办到的。勿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中，外国政治家和将军对于斯大林异常了解他的巨大战争机器的技术细节都有深刻的印象。但是这种过分集中的管理方法也有其致命的弊端。它使各级行政机构习染了一种奇怪的惧怕创新和负责的风气；它把每一个官员都降低为一个齿轮，经常使整个机器停摆；或者更坏的是，当上级人员没有及时揜按钮时，就会使机器纯粹因惯力的作用而向错误的方向继续转动。因此，整个机器就充满了官样文章和官场虚礼，给一些伟大的讽刺作者提供了写作的材料，如果这些作家不因害怕负责而气馁的话。

斯大林并不满足于把自己的意志施加有关国家的一切事务上，他还渴望成为他这一代人的唯一的精神领袖。他所以要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虚荣心曾受到俄国知识分子精华的伤害。在他把这些人置于自己监护之下以前，他们对他是不怎么

注意的；甚至对于他关于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看法最初也是抱着嘲笑态度的。除此以外，还因为他曾经禁止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上的异端，但却发现在哲学和文学的刊物上也充满了转弯抹角的异端学说。对他来说，冒险地闯进这些领域去，就成为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已经缩短了政治学、哲学和文学之间的距离。但斯大林却粗鲁地把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内部联系过分简单化了，以致把科学、历史和艺术降低成了政治的侍女。他每次发表新的经济和政治指示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作家都不得不仔细地核对一下，看看他们的最近著作中是否有什么地方同这位领袖的定论发生冲突。

历史学家的遭遇最惨。早在1931年时，他就在著名的《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者的信》中尖锐地指责他们。这家杂志是专门登载革命史的，曾刊载了“托洛茨基派的私货”。于是最近的历史不得不重新改写，以便把斯大林的对手们说得合乎他的心意。随着斗争的日趋猛烈，由这位总书记授意写作的历史著作证明还没有对他的敌手作足够的贬损，于是就一本接一本地撰写新的著作。由于权术上的需要，官方对较远古历史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旧俄的历史也就必须重新改写了。托洛茨基曾经在文学评论方面发生过强烈影响，这并不是由于他的官方权威，而是由于他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于是整个托洛茨基文学评论派就必须连根拔除。哲学家们曾经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教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列宁尽管同这位孟什维克领袖在政治上是对立的，对他的著作却评价很高。而斯大林却把哲学教授和讲师们召集到办公室来，猛烈抨击了他们“腐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前辈德波林教授和他的很多学生，被禁止在大学讲

课和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这种棍棒统治笔的例子可以随意举出很多来。到了最后，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把这位“敬爱的领袖”吹捧为他们时代和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迪斯雷利^①一次曾奉承维多利亚女王说：“陛下是文学界的首脑”；但麦考利和卡莱尔^②都没有被要求去按维多利亚女王的风格写作。现在这位总书记被宣布为文学界的首脑，“象斯大林一样地去写作”，就成为苏联作家们的义务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俄国文学编年史中可憎的一页：斯大林个人的风格简直就成了俄国的国民风格。评论和小品文的写作者谁都不敢不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引证一两段斯大林的话，而且他们还得十分注意使自己的句子在风格和语汇上尽可能地接近引文。因此俄国报纸和大多数期刊就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单调划一了。甚至口头语言也“斯大林化”到一个荒谬的程度，至少当人们谈论意识形态和政治时是如此的。仿佛整个国家都沉溺于耍嘴皮子的功夫中。

这种统治者的风格变成了国家的统治风格是一种反常现象，但如果这位统治者的确具有文学才能，那也许还多少能够容忍。事实上，这个国民的风格已经退化成为一种特殊的行话，其特点就是僵硬，令人厌烦的重复，粗俗，再加上伪科学的夸夸其谈以及语法和逻辑上的混乱。在斯大林爬上统治地位以后，他的风格变得比以前更加粗鲁了。一个人在其作用上是伟

①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1868年和1874—1880年出任首相。——译者

②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以《法国大革命》等书而知名。——译者

大的、戏剧性的，但在演讲和写作的风格上却是单调的、沉闷的，只是在偶尔引证一下通俗的俄国讽刺作品或开一个粗鲁的玩笑时，才使这种风格活泼一些。这种鲜明的对比的确是令人吃惊的。下面就随手举出他的风格的一个标本，这是他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最后几段：

只有我们的党才知道把事业引向何处，而且胜利地把它引向前进。我们党为什么有这种优越性呢？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因为它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始终忠实于这个学说，只要我们掌握住这个指南针，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会获得成就。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某些国家中已经被消灭了。有人说，它似乎被一种叫做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消灭了。这当然是胡说。只有不知道历史的人才会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要消灭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消灭工人阶级。而消灭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的。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于舞台以来，到今天已经八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有几十个几百个资产阶级政府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结果怎样呢？资产阶级政府上台下台，而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热烈鼓掌。）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正是在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被彻底消灭的那个国家里获得了胜利。（热烈鼓掌。）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国家现在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危机和失业的国家，而在其他一切国家内

(其中包括法西斯国家),危机和失业已经笼罩了四年,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不,同志们,这不是偶然的。(鼓掌多时。)

是的,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种种成就,就因为我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下进行工作和斗争的。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要始终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旗帜。(鼓掌。)^①

一个有过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托洛茨基作为自己智力领导人的民族,怎么会允许它在语言和文学上的光辉被如此彻底地抹去呢,历史学家对此都会纳闷的。也许他们将会把这种现象同另一种文学在革命、帝国和复辟时期触目惊心的衰落情况来加以某种类比,这另一种文学也曾给世界贡献了卢梭、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在法国一如在俄国一样,在精神力量和文学天才蓬蓬勃勃地发展之后,继之而来的却是一种懒散而麻木的状态。不过,斯大林主义文化的意义还不能仅仅根据它对于文学艺术的蹂躏就加以判断。我们应该考虑到斯大林建设性和破坏性影响之间的矛盾。当他无情地夷平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时,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也给没有文化的广大群众带来了基本的文化因素。在他的统治下,俄国文化在深度上有所失,而在广度上却有所得。也许可以冒险地预言一下,俄国的这种文化上的广泛传播,将会继之以一个广博发展的新阶段,另一代人将从这一阶段怀着欣慰的心情来回顾斯大林时代野蛮的古怪行为。那末我们也许可以说,斯大林的风格是特别适合于一个本身没有受到很好教养的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75—576页。

统治者的任务的，他不得不迫使农民和由农民产生的官僚机构走出那一片混乱的贫困和黑暗状态。

如果我们说，从文化上来讲，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苏联欧洲部分的相对失色，而有利于落后的亚洲和半亚洲边缘地区，那末我们只不过是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同样一个问题。苏联欧洲部分的水平被降低了，而亚洲边缘地区的水平却提高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知识分子一度以独立的精神而著名，而且在追求知识的认真和干劲上还往往超过他们的西欧对手，现在却被迫放弃了许多精深的志向，在半途上来等待他们更为年轻和粗野的弟兄，他们是直接从吉尔吉斯或巴什基里亚草原拥入大学的。在一个本身来自欧亚交界处的领袖统治下，当苏联亚洲部分达到相当大的欧化时，其欧洲部分不过是被亚洲半同化了。部分地说来，这种相互的同化是不可避免的和富有成果的。但是它也往往使国家发生智力上的枯竭。十分令人不解的是，斯大林鼓励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但他在精神和智力上却是一个粗俗的和专制的平均派。这并不是他存心如此（他还按照自己的方式保护了科学和艺术），而是因为他对于智力和艺术上的创造力怀着不信任的心理，总是在这些方面闻到非正统的气味。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甚至俄罗斯的诗歌和小说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官方的文学评论家多年来就吵吵嚷嚷地要求“给我们一个苏联的托尔斯泰”。苏联的托尔斯泰终于没有出现，或许是由于生活变化不定，因而不能产生史诗式的艺术技巧；或许就是由于在托尔斯泰不能自由地说“我不能保持沉默”的气氛中，无法孕育出一个托尔斯泰来。俄国当代最有创

造性的两个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一些最优秀的作家企图缄口避罪，另一些人则已经被迫沉默了。就象是往日光荣的一个纪念品一样，马克西姆·高尔基被欢呼为无产阶级文化的鼻祖，并且作为斯大林的密友，在三十年代前半期中苟延着。斯大林和高尔基的友谊很难说是知心的。斯大林需要使自己的知识和道义权威得到一个公认为权威的人的支持。高尔基早在地下时期就是列宁的知友；斯大林认为把这个友谊连同领导的许多其他象征和头衔一起承继下来是明智的。另一方面，高尔基曾不止一次地同列宁发生过剧烈的争吵，列宁宽容了他，其中有的事情是列宁从未对任何政治家宽容的。这位老作家热情地依附了布尔什维主义，而且还有点悔恨当初他对列宁的攻击，因此决心不再同列宁的继承人发生争吵，而这位继承人无论如何也是不准备容忍任何争吵的。高尔基有时还企图软化斯大林的脾气，并亲切地保护某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或某一个乖僻的文人。他甚至企图调解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的关系，但是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死于1936年，从此以后，革命前作家的伟大行列就终止了。

高尔基死后，在清洗的高潮中，有两个诗人在莫斯科一时之间最为知名，他们是哈萨克人江布尔·扎巴耶夫和高加索人莱金·苏莱曼·斯塔尔斯基。他们两人都是东方部族行吟诗人的子遗，不识字，都在九十岁以上，有着很长的胡子。他们的风格很别致，创作民歌，是晚生的当地荷马。他们从高地和草原来到莫斯科，用琴伴奏，在列宁墓上为斯大林大唱赞歌。

俄罗斯亚洲部分对欧洲部分的同化，导致了精神上的孤立

和整个俄罗斯从欧洲分离出来。这只能部分地归因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因为在二十年代时，那种对立的程度并未稍减，但俄罗斯的精神界却广泛地接受了欧洲思想和艺术的进步影响。那种孤立状态是受到三十年代特殊气候影响的，在大清洗中它就变成完全的孤立了。

基洛夫被暗杀后进行了一些审讯和流放，之后统治似乎再次放松了一些。1935年下半年到1936年上半年，公众的注意主要被吸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即将开始的修改宪法上。斯大林越来越经常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面带微笑，周围是一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获得成就的集体农庄男女庄员，他们都忙不迭地感谢他给他们带来“新的快乐生活”。他还在公众节日中出现，给胜利的运动员发奖，接受孩子们的献花，并装出各种各样悠然自得的姿态拍照。一切事情似乎都可以令人指望有一个长的政治安定时期。以前的反对派首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已经被关在维尔赫尼—乌拉尔斯克的监狱里，但他们可望再一次被释。布哈林、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则继续同斯大林一起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共事。布哈林任《消息报》主编，拉狄克是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主要新闻发言人。皮达可夫是重工业部的副人民委员和实际的组织者。前总理李可夫是邮电部的人民委员；拉柯夫斯基、克里斯廷斯基、加拉罕、拉斯科尔尼科夫、安东诺夫—奥夫申科、罗申哥尔茨、尤里尼耶夫、波果莫洛夫和其他许多人早已同斯大林和解，现在被派往国外任大使、特使和商务代表团负责人。甚至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一

些老对手虽然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曾经出来反对过斯大林，现在似乎也被宽宥了。他们主要的领导者布都·穆迪瓦尼又返回担任格鲁吉亚政府的副总理。斯大林同军队领导人的关系似乎也是平静的。1936年，军队由一支守土军改组为一支常备军；革命前的旧军纪又被重新实施，还恢复了旧的军衔。五个军队主要负责人被任命为元帅，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勃柳赫尔、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

然而，在党和政府的下级机构中，清洗仍在不停顿地进行着。1935年年底，《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充满了报道，说几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所有城市中都发现了反对派的秘密小组。报纸还报道了斯达汉诺夫工作方法在工人中遭到反对的情况。这种方法就是增加工厂劳动的强度，然后按劳动成果付酬。工人们到处袭击甚至暗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捣毁机器。新参加工业劳动的农民常常由于笨拙和耍孩子脾气而损毁机床，他们在机器发生故障时，毫无耐心地用槌子和斧头去砸。工业上的事故层出不穷。这是俄国人落后、不识字和由于强迫进行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所造成的“破坏行为”。当时还没有谁被指控为破坏分子，包括多年来担任工业主要组织者的皮达可夫，或任何以前的反对派领袖。

托洛茨基在评论《真理报》和《消息报》上不断报道开除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情况之后，就企图建立一个第四国际来反对斯大林的第三国际。他在《公报》中写道：“可以有信心地说，尽管遭到十三年的迫害、诽谤、无与伦比的恶毒和野蛮对待，尽管发生一些比迫害更为危险的投降和背叛行为，第四国际今天在苏联已经拥有最强大、人数最多和最巩固

的支部。”^①托洛茨基的断言一部分是自我吹嘘的空话，因为在流亡的七年中，他已经完全失去同苏联的个人联系。^②但是，托洛茨基主义事实上仍然是俄国内部的一股潜在的重大舆论力量。托洛茨基充满自信的断言，只能加深斯大林已经很严重的怀疑。他在读到此文时必定对自己说：“我们就等着瞧吧”。六个月以后，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使苏联和全世界都吓呆了。

这儿不准备去描述那一系列审讯的情况。我们所关心的是斯大林在这些审讯中的作用和他的动机。他本人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这位硬被说成是无孔不入的凶险阴谋的主要牺牲者，甚至没有被传唤到证人席去。但是在整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出现在提词人的席上。不，除了充当提词人以外，他还是无形的作者、经理人和监制者。

在公开和秘密的无数次审讯中，最重要的有四次：1936年8月的“十六人审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穆拉茨科夫斯基等人）；1937年1月的“十七人审讯”（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穆拉洛夫、谢列布尼亚科夫等人）；1937年6月的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红军中一些高级军官的秘密审讯；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讯”（李可夫、布哈林、克里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雅戈达等人）。这些审讯中的被告都是列宁时代政治局的成员，只有斯大林本人和托洛茨基不在其内；不过托洛茨基虽然缺席，却是主要的被告。这些人中有一个前总理，几个前副总理，两个共产国际的前负责人，

① 《反对派公报》，第48期，1936年2月。

② 《列昂·托洛茨基案件》，第264—265页。

一个工会的负责人（托姆斯基，他在审讯前自杀），一个总参谋长，一个军队的总政治委员，所有重要军区的司令员，几乎所有苏联驻欧洲和亚洲各国的大使，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还有两个政治警察的负责人：雅戈达和叶若夫。雅戈达曾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准备了“证据”，而叶若夫也对所有其他人的审讯做了同样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被指控为企图暗杀斯大林和别的政治局委员，复辟资本主义，破坏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以及毒死或杀死俄国工人群众。所有的人都被指控在革命的早期就已成为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的间谍，并且同纳粹达成了秘密协议，支解苏联，把苏联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德国和日本^①。这些审讯所积累起来的指控如果是真实的话，苏联就早已不复存在了。这些被指控的恐怖分子既然已经渗透到最高层的政府机构中，为什么只设法杀害斯大林要员之一的基洛夫呢？在审讯过程中，检查官硬说这场阴谋中还有两个牺牲者：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②。但是这些说法只不过使这一无所不包的阴谋及其微不足道的结果之间极不相称的情况更为突出。这就好象是为了挪动一只玩具船，却要把尼亚加拉瀑布的全部水力控制起来。

由于被告们（至少是那些公开审讯的人）幻觉似的行为，所有这些审讯的不真实性质就更突出了。许多著名的人，包括

① 参看官方的审讯速记报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件的审讯报告》（1936年）；《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案件的审讯报告》（1937年）；《托洛茨基集团反苏维埃制度案件的审讯报告》（1938年）。

② 斯大林的主要秘书 A·波斯克列贝舍夫在他的回忆录（1940年于沃罗内兹出版）中宣布，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的。参看 A·波斯克列贝舍夫和 B·德文斯基的《人类的导师和朋友》一文，载《斯大林（论文集）》，第194页。

所有军人和许多文职领导人，都是秘密审讯的；许多人未经审判就处决了，因为无法使他们公开承认他们所没有犯过的罪行。但是所有那些被弄到大庭广众中进行忏悔的不幸者，却大声地承认自己犯了罪，称自己是魔鬼的儿子，并衷心地赞美那位把他们踏为齑粉的超人。一个恐怖而精神错乱的国家中到处响起了一个声音：“枪毙那些疯狗！”一听到这个声音，检察官维辛斯基总是立即就结束了审讯。被告的自供是起诉和判决的唯一根据。没有提供出任何一件可以用正常的司法程序加以证明的证据。在少数几个案件中，被告们的确提到了他们同托洛茨基在国外会晤的特殊情况，但这些情况一经作证，被告自供的虚假性就立即显露出来。例如霍尔兹曼、戴维和伯尔曼—尤林三个被告曾声称，他们曾同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一座旅馆里约会，但这座旅馆在这个约会的日期以前很多年就不存在了。皮达可夫声称，他曾经坐着一架德国飞机在奥斯陆附近的机场着陆，去同托洛茨基会晤。但是这个机场的当局证明，在所说的那个时间（甚至在此前后的几个月内）中没有任何外国飞机降落在那个机场上。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也提出证据，其中有些还有爱德华·赫里欧的签名，他当时是法国的总理，以对斯大林友好而闻名。这些证据提出，由于身体原因，他们两人不可能出现在指控中说他们在某个时间出现过的那些地方^①。

根据党内斗争的情况来看，这些被告席上的人公开承认错误比不承认错误更不使人吃惊。他们承认错误并不象晴天霹雳一样地使人感到意外。二十年代以来，反对派中意气消沉的人就把公开承认错误看成是一种仪式，一种公认的例行手续。他

^① 《列昂·托洛茨基案件》，第109—227页。

们起初是承认一般地违反了党纪，最后就是承认犯了启示录式的罪行。在这其间，他们还得慢慢地爬过一个很长的阶梯，几乎象梦游者一样，很难察觉自己走向何方。他们每一次承认错误时，只是承认比上一次承认过的略为严重的错误。当然，他们每一次都希望这是为了党和为了自己赎罪所要求他们作出的最后一次牺牲。即使到了他们生命的历程行将结束时，他们是否清楚地看到等着他们的将是一场大屠杀，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曾苦于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一方面他们对于斯大林的统治感到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已经成为斯大林统治同义语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基本上团结一致的感情。不过，光是这种感情还不足以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也在为这一两难问题而斗争，但他却没有屈膝。他们被自己的顾虑和悔恨折磨着；但是他们也被斯大林的恐怖所吓倒。说他们受到催眠，或吃了神秘的药丸，这是没有的事。但无疑他们是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的，这就是俄国和其他各处所惯于使用的严刑拷问。此外，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政治警察有权把被告的亲属作为人质，而这些人质也的确出现在证人席上。即使那些为了自己的事业完全准备牺牲自己的最不屈不挠的人，也不能认为自己有权以同样的方式牺牲自己的父母或孩子。被告们肯定希望他们的坦白可以拯救自己的家庭；当然也还怀着拯救自己的一线希望。基洛夫被刺杀后，曾经明令取消恐怖分子的上诉权；但是在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前几天，上诉权又恢复了，仿佛在最后关头还有一线活命的希望。其中的少数人，如拉狄克和拉柯夫斯基的确没有公

开枪毙；一个人逃脱了死亡的命运，就会引起几十个人也希望能够逃脱性命。他们肯定认为，他们的自我谴责是如此荒谬，而且显然是在强迫下作出的，所以不会玷污他们的声誉。（同样地，在纳粹的集中营中，人们被看守训练着向自己喊：我是一头蠢猪，或者其他污辱的话，任何神智健全的人对此都是不会当真的。）因此，使得这样多的名人排着队经过斯大林面前，嘴里高喊着可怕的口号：“永别了，凯撒，死者向你致敬”，这种压力和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

斯大林为什么需要搞这种丑恶的事情呢？有人认为，他把这些老近卫军处死，是为了让他们做他经济失败的替罪羊。这种看法有一点点道理，但很不充分。因为在审讯的那几年里，国家的经济情况已有很显著的改进。他肯定不需要这样多的替罪羊；而且如果他有这样的需要，判处监禁劳役也就够了，就如早期对所谓工业党和孟什维克的审讯一样。有些在早期审讯中被判决的人，到了四十年代又作为受到很大尊敬的著名人物重新出现（如拉姆金教授）。斯大林真正的和更为深远的动机，是摧毁那些可以另组政府的潜在人物，也许还不是另组一个政府的人物，而是另组几个政府的人物。当然，在斯大林的演说和著作中对此是只字未提的。只是在以前发生的情况中，在审讯的背景和影响中，才能发现这种行为的动机。从一开始，他就把任何另组政府的企图甚至想法都视为反革命。摧毁一切可能有此企图和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开始行动的政治中心，是这些审讯的直接的和无可否认的起因。

现在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在1936年来达到这个目的？很难用国内政策的考虑来解释这个时间上的选择。人民的广泛不满是可能存在的，但这种不满还没有完全定型，不足以对他的地位构成立即的威胁。那些反对派已经被粉碎了，压制了，没有能力进行活动。只有当整个权力机器遭到某种突然打击、某种阵发性的混乱时，反对派才有可能去集合起自己已被粉碎和已经丧失信心的队伍。这种危险当时恰好已在形成，而且来自国外。在这些大审讯中，最初一次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发生在希特勒的军队进军莱茵兰之后几个月；最后一次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讯结束时，正好是纳粹胜利地宣布占领奥地利。德帝国主义正在重新武装并小试身手。关于斯大林为应付这种威胁而作出的外交部署，将在下几章讨论。这儿可以说的是：他对战争能否避免是不抱幻想的；而且他正在考虑面临着两种抉择——同希特勒达成协议，还是反对他。在1936年时，协议的机会看来确是很渺茫的。西方的绥靖政策使斯大林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他怀疑西方不仅默许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而且还煽动它来反对苏联。

苏联单枪匹马地同德国打仗的前景似乎是很可怕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军事机器虽然陷入两面作战，但还足以给俄国以粉碎性的打击，并削弱了沙皇制度^①。当斯大林观察着希特勒初试锋芒的时候，最后一个沙皇的阴影必定不只一次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人们可以在想象中虚构一段这位活人同

^① 1939年9月6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冯·舒伦堡伯爵向里宾特罗甫报告说：“对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力量到处都是记忆犹新的。”见《纳粹和苏联关系》，第88—89页。

那位鬼魂之间的谈话。那个鬼魂小声地说：“你的末日快到了；你利用战争的混乱推翻了我的皇位。现在另一次战争的混乱将要吞没你。”那个活人回答说：“你滚下了皇位，却什么也没有真正地学到。你当然不是由于战争本身而失败的，你是被布尔什维克党打败的。当然，我们是利用了战争所造成的情况，不过……”那个鬼魂打断他的话说：“你能肯定反对派不会利用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你还记得当德军占领里加的消息传来时彼得堡发生可怕的骚动吗？如果德军又出现在里加，或者出现在基辅、高加索、莫斯科大门口，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形呢？”

“我告诉你，当时反对你的是难以对付的布尔什维克党，而我现在已经流放了托洛茨基，并粉碎了我的其他一切敌手。”鬼魂听了哈哈大笑地说：“在1914到1917年时，我不是把你流放到西伯利亚并使列宁和托洛茨基流亡国外吗？……”

在战争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反对派的领袖如果还活着的话，可能由于确信（不论对还是错）斯大林指导战争无能和具有灾难性而被迫采取行动。在更早一点的阶段，他们可能会反对他同希特勒的交易。托洛茨基不是早在他的著名的“克里蒙梭声明”中预示了这种反斯大林的行动吗？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反对派领袖活着看到了1941年和1942年红军的惨败，看到了希特勒已经到了莫斯科的大门口，几百万苏联士兵被德军俘虏，1941年秋天人民的士气陷入了最危险的情况，那时整个苏联的命运悬于一发，斯大林的道义权威达到了最低点，那末他们会怎样呢？很有可能，他们会企图推翻斯大林。斯大林是决心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当然，他对他们的指控完全是无耻的捏造。但是这些指控

的根据是一种反常的“心理上的真理”，即一种对未来发展的极其残酷而又歪曲了的预想。他的推理很可能是沿着这样一条线发展的：他们想在危机中推翻我——我就指控他们已经有了这一企图。他们肯定认为自己更适于指挥战争，这是荒谬的想法。改变政府可能削弱苏联的战斗力；而且如果他们得到成功，就可能被迫同希特勒签订停战协定，甚至也许同意割让土地，就象我们曾经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做的一样^①。我就要谴责他们已经同德国（和日本）结成了背叛性的联盟和割让苏联土地给那几个国家。

要屠杀这些老近卫军，没有比这更适当的借口了。如果他们仅仅作为反对斯大林的人，或者作为企图推翻他的政权的阴谋者而加以处决，那末很多人就可能把他们看成是为了美好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他们必须作为卖国贼，作为毫无理由的犯罪者，作为可怕的第五纵队的领导人死去。只有那样做，斯大林才有把握使他们的处决不致引起危险的反感；相反地，他会被人们、特别是被年轻而思想划一的一代尊崇为国家的救星。人们不必假定他的行为纯粹出于残忍或权力欲。他可能使那些半信半疑的人真诚地相信，他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才这样做的，而只有他一人才能正确地解释那些利益。

那个时时萦绕在斯大林心头的想象中的阴谋，在大规模的清洗之中，就不可避免地采取流血方式了。当恐怖的恶性循环

^① 提到布列斯特和约时，斯大林的宣传者的确把它拿来为1939年的苏德条约辩护。（参看《历史的伪造者》，第45页。）

扩大时，弄得人人自危。有的人为了停止这架可怕的永动机，被迫采取了行动。这种行动并非出于无能为力的老反对派的领袖，而是出自迄今还未受到怀疑的人，他们的精神还未被没完没了的承认错误所瓦解，他们的手还掌握着若干权力的杠杆。1937年初，在审讯拉狄克、皮达可夫和索柯里尼科夫后不久，斯大林最亲近的随从中开始了反对恐怖的行动。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明显地发生了冲突。奥尔忠尼启则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曾同斯大林一起被关在巴库的监狱里；1912年在他的提议下，斯大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十年以后他又帮助斯大林征服了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在反对所有的反对派斗争中，他都热心地同斯大林合作。这时他为自己的副手皮达可夫和许多工业领导人的被害而鸣不平。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奥尔忠尼启则的突然死亡，情况至今不明。后来又是鲁祖塔克起来反对斯大林，他在此以前是斯大林派的一个主要人物，任副总理和工会领导人。

但是，真正的密谋据说是由军队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事们搞的。确切的情况还不清楚，而且有的人否认有任何密谋，他们坚持说，这是希特勒的间谍机构编造出来的谎言，而且还制造了伪证，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转给了斯大林。按照这一说法，真正的伪造者还是莫斯科的格柏乌，它在斯大林的默许下设计了整个诬陷的丑剧。但是有一些非斯大林派的人却坚持认为，这些将军的确计划搞一次政变，而且是出于自己的动机和由自己采取主动的，同任何外国都没有什么联系^①。

^① 在纽伦堡审讯纳粹领导人的所有文件中，没有一件哪怕是暗示一下所谓第五纵队在苏联政府和军队中的情形。在这些文件中有希特勒准备战争的极为丰富的证据，对比之下，就更有说服力地驳斥了这次清洗审讯。

政变主要是一次宫廷的反叛，接着就袭击格柏乌的总部，最后是刺杀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被认为是这次密谋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军事上的天才，是使红军真正现代化的人；他在内战中功勋卓著，成为军队中的宠儿。在当时的所有军事领导人中，他的确是唯一同最初的波拿巴相似的人，能够扮演苏联第一执政官的角色。据认为参加这一密谋的还有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雅基尔、西部军区司令员乌波列维奇、莫斯科军事学院院长柯尔克、布琼尼骑兵部队的副手普里马科夫、军队总政治委员加马尔尼克(他当场自杀了)和其他一些军官。在1937年五一节时，图哈切夫斯基还在列宁墓上站立斯大林一旁，检阅五一节游行队伍；十一天之后被贬黜；6月12日就宣布了他和他的朋友们已被处决。这些密谋者没有表现悔恨之情，也没有承认被控的罪行。据说这一密谋是由政治警察发现的。图哈切夫斯基在被捕时受伤，后来用担架抬到斯大林那里。在同斯大林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之后，这位元帅被送回监狱。他的死刑令至少名义上是由另外四个元帅(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签署的。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不久以后也被清洗了^①。

即使这些审讯的最完整的报告，也只能对它们的起因提供非常有限的说明。真正大规模的清洗是背着公众进行的，没有受害者的供词，往往是不经过任何审判的。托洛茨基在评论莫斯科的这些奇怪的审判时说：“斯大林在饮鸩止渴^②。”他处死了

^① 苏联官方的材料没有对这一密谋作特别的说明。关于反斯大林的说法见E·沃伦堡：《红军》，第232—264页，M·波波夫：《是阴谋还是革命》，载《社会主义公报》，第10期，1947年；V·G·克里维茨基：《我是斯大林的间谍》。

^② 《反对派公报》，第64期。

几千人，把几百万人送到监狱和集中营去。他计划本身的性质就迫使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已经开始消灭那些能够组织另一个政府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有多年工作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曾训练和提升了一些行政官员和军官，并交了许多朋友。斯大林不放心的就是，从那些受害人的追随者中会不会产生复仇者。既然他已经消灭了能够组织另一政府的第一批潜在的领袖人物，他就不能饶过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以至无穷批。凡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提升起来的党的干部，凡是拉柯夫斯基或索柯里尼柯夫培养出来的外交人员，凡是在军事学院档案中有图哈切夫斯基写的好评的军官，凡是同皮达可夫共过事的企业经理——所有这些人都是危险的，可以怀疑的，因而是注定了命运的。从纳粹德国、皮尔苏兹基波兰和霍尔蒂匈牙利流亡来的共产党员，过去都同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个或那个派别和小圈子有联系，都自投罗网了^①。受害者的人数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按照某些材料来看，光是军队中就有两万名军官被捕，占全部军官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有几千名军官被枪毙^②。整个国家的机构都动摇了。

在这场地震当中，斯大林在1936年11月对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宣布了新宪法^③。他用自由词藻和许诺的帷幕遮住了背后的断头台。新的宪法代替了列宁的选举制度，它公开而坦率地支持产业工人阶级，但也给所有阶级以平等的选

① 当时被消灭的著名的外国共产党人有：匈牙利1919年革命的领导人库恩·贝拉；希特勒上台前共产党在帝国国会中的重要发言人雷麦尔和诺伊曼，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乎全部成员，以及其他许多人。

② E·沃伦堡：《红军》，第253页。

③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99—628页。

举权，其中包括在此以前没有选举权的前资产阶级。直接选举代替了间接选举，秘密的投票代替了公开的投票。斯大林说，这种进步之所以可能，是由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实现；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农民已经同社会主义经济结为一体；新的知识分子已经同工人阶级骨肉相联。在反对他所说的某个人对宪法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时，他坚持说，宪法必须保证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在反对另一个其目的在于设立个人总统以代替多头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修改意见时，他警告听众说，个人总统可能变成独裁者——宪法不应留下这样的空隙。他甚至坚持要给以前的自卫军和牧师以选举权。但是在这种民主的天方夜谭中，最真实的东西还是宪法禁止任何反对派的存在。用斯大林的话说：“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①

这时他从事的另一件伟业就是《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它号称是这一领域中第一本准确的和在理论上可靠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党的整个历史都根据那几次审讯的情况加以改写。以前的所有教科书，即使是斯大林紧密的追随者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写的，都被宣布为不足凭信的，停止了发行。据说这些书对于党史的叙述，都同最新的“发现”不相一致。这本立即被宣布为

^① 即使从斯大林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并没有把英国的托利党和自由党或者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看成是代表“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资本主义政党。因此，在单一阶级利益的基础上也是能够建立两党制的。

党的圣经的书，是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由其秘书处撰写的，只是它的哲学部分，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篇不成熟的摘要，是由斯大林本人写的。他作为那几次审讯的提词者是不为公众所知的，但他现在却在公众前扮演起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宪法制订者的角色了。

断头台一旦行动起来，斯大林似乎最后也会在劫难逃。他消灭了老近卫军，但他本身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支柱一旦摧毁，他又能够依靠谁来支持呢？托洛茨基于1937年9月写道：“斯大林正在接近完成他的悲剧性使命。他越是觉得不再需要任何人，他就越是不为任何人需要。如果这个官僚制度成功地改变了所有制形式，如果在它的行列中形成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这个新的有产阶级就会寻找没有革命历史和更有教养的新领袖。斯大林就会听不到人们对他完成的任务表示感谢的话了。公开的反革命将要同他算帐，很可能要控告他实行托洛茨基主义^①。”几个月以后他又作出了不同的预言：“斯大林正准备在革命的废墟和革命者的尸体上举行‘加冕典礼’。斯大林举行波拿巴式加冕典礼之时，就是他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死亡之日^②。”这些预言都没有应验；而且谈到斯大林的“加冕典礼”，那是发生在那些审讯以前而不是以后。这些清洗的真正令人吃惊的方面，不在于它们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而在于它们没有怎样改变苏联的外表；政权机构虽然遭到利斧的猛劈，却没有受

① 《反对派公报》，第58—59期。

② 同上，第60—61期。

到多少影响。在那些审讯以后也如以前一样，苏联社会似乎一方面还狂热地致力于经济任务，另一方面又在一种道义和政治的麻痹状态中逐渐衰落下去。以前和以后，斯大林都被欢呼为人民的父亲，敬爱的领袖。

罗伯斯比尔在消灭了他的敌手后，某天在国民公会中突然遭到热月党人的反叛。国民公会仍然象以前那样充满了狂暴的冲动情绪。在这样的一个机构中，人们受到恐怖的统治，却激发起绝望的勇气，行动起来，责备独裁者，并使他垮台。但是在1917年革命后的二十年中，苏维埃国家中一切自发的冲动劲头都已经消失了。象国民公会这样审慎的机构是不会发出反对“人民公敌”的命令的。而斯大林却亲自操纵着从自己的办公室到政治警察总部、监狱和法庭的那条线，预防任何预见不到的干扰。在任何时期他都不必在可能发出抗议呼声的听众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热月党人受到人民的支持，这些人民中的各个阶层都已经厌恶恐怖行为了。热月党人就公开地诉诸人民。如果象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事那样的人想结束斯大林的统治，他们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去行动，而不能依靠一个极端秘密的阴谋小集团。这也正是他们致命的弱点。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斯大林获胜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不象罗伯斯比尔一样，他却给他的国家提出了一个社会组织的新的和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虽然给很多人带来贫困和痛苦，但也给不少人创造了梦想不到的机会。这些人是在他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斯大林在屠杀了老近卫军之后并未觉得自己处于真空之中，这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将近三年期间，他的铁扫帚横扫国家和党的一切机构。1936年还在任职的广大

官员，到1938年时已经所剩无几了^①。在公共活动的每一领域中，清洗造成无数的空位。从1933年到1938年的五年之中，差不多有五十万行政官员、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和其他行业的人从大学中毕业。对于一个受教育阶级以前在社会中占很小比例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是很大的^②。这是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填补了因清洗而空出来的职位。它的成员从童年起就是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对老近卫军的人们，他们不是抱敌视态度，就是对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极其热情地投身工作，没有受到近来事变的影响。他们的资格的确是很嫩的，几乎还没有实际经验。这个国家还需付出昂贵的代价，使它的官员、工业经理和军事指挥员进行实习；而这个实习期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到1939年初，公开的清洗告结束了。3月间，斯大林在隔了五个多事之年以后才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点。党的章程也根据半自由的精神修改了。即使在列宁时代也以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的清洗，现在完全废除了。斯大林说：“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③他嘲笑国外人士的一种看法，即他们认为对“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的审讯削弱了苏维埃国家。但是他也公开地向他自己问道：“我们直到最近，即在1937—1938年间，才知道上层托洛茨基分子和上层布哈林分子所干的间谍活动和阴谋勾当，而从材料上却可以看出，早在十月革命的初期，这些老爷们就充当了外国谍报机

① 1936年任各州党委书记的人，1937年时没有一个再被任命。见《反对派公报》，第70期。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687页。

③ 同上书，第692页。

关的间谍，并进行了阴谋活动——这难道不奇怪吗？……这个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①的确，这应该如何解释呢？他回答说，是由于丧失了警惕，“低估了”苏联侦察机关的意义。清洗的最后一幕就是处决叶若夫，他是政治警察的头子，是自从雅戈达被撤职以后所有审讯的直接组织者。叶若夫的继任者是贝利亚，他是斯大林的同乡人和传记作者之一，在此以前，他是格鲁吉亚政治警察的头子。

真正的尾声并没有发生在苏联，而发生在墨西哥。托洛茨基经过长期的漂泊后，定居在那儿。1936年，当托洛茨基呆在挪威时，斯大林通过他在奥斯陆的外交使节，对挪威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剥夺托洛茨基的避难权。挪威政府受到商业抵制的威胁；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威胁，因为挪威政府急于要维持同苏联的商务关系。挪威司法大臣特里格夫·赖伊同意拘留托洛茨基，直到他在墨西哥找到避难所。托洛茨基继续从墨西哥抨击斯大林的政策，有力地揭露了各次审讯，并徒劳地想把新的生命注入第四国际。他为不断要谋害他的企图而困忧。他所有的孩子都不明原因地死掉了，因而他谴责斯大林是对他们进行复仇的谋杀者。最后，在1940年8月20日，当他正从事写作一本谴责性的斯大林传记时，一个不明身份的人装做他的同情者，用斧头打碎了他的脑袋。于是，莫斯科审判庭对托洛茨基的死刑判决就执行了。斯大林已经无情地在苏联根除了托洛茨基主义，现在又在他本人身上获得了最后的阴暗胜利。托洛茨基的名字，象列宁的名字一样，代表了十月革命的巨大希望和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700页。

巨大幻想。具有悲剧象征意义的事实是，他的脑浆溅满了他描述斯大林事业的稿纸上面^①。但是在暴风骤雨的那一年（1940年夏季）中，由于莫斯科的审讯，这个尾声几乎毫未引起注意地就消逝了。

^① 指上述的正在写作中的斯大林传记。此书后来以《斯大林·对其人及其影响的评价》为名出版，中译本名为《斯大林评传》。——译者

第十章

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一)

(1923—1933年)

斯大林对外交政策没有提出严密的理论。——一篇诗的启示：亚历山大·布洛克的《斯基台人》。——革命同帝国主义决裂。——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凡尔赛和约。——苏德腊帕洛条约(1922年)。——德国共产主义在1932年的崩溃。——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的作用。——共产国际试图采取温和主义(1925—1926年)。——1928年的剧烈转变。——斯大林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未来政策的指针：斯大林1925年论俄国在新战争中的地位的秘密讲话。——他谴责关于列强共管和势力范围的想法。

对于苏联以外的大多数人来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斗争、五年计划和大清洗，听起来就好象是远方传来的毫不连贯的嘈杂声音，同国际政治舞台上正在进行着的主要阴谋没有什么关联。斯大林的形象似乎也是在遥远地区晃动着一个模糊的幽灵。只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时，许多事情才渐露端倪：远方的那些嘈杂声音原来预示着将要上演的这部戏剧中的最关键的一幕，那个在背景上的阴影也表明自己原来是这部戏剧中的主角之一。在慕尼黑协定以后的那些紧张的年

月里，人们日愈紧迫地问这个问题：“俄国将要怎么干？”或者干脆说：“斯大林的政策是什么？”

在斯大林的演说中，在党对于外交政策所通过的一些“提纲”和决议中，人们可以找到部分的答案。但是这些公开的声明还是很不够的。斯大林的话照例是干巴巴的和互相矛盾的套语大杂烩，只是按照当时的需要和正统观念的要求拼凑在一起的。但这种大杂烩也透露出他没有系统的思想，没有清楚的外交政策理论。在他后面的人民的情绪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在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官方记录中，很难找出俄罗斯人民情绪和本能态度的线索。人们倒不如从一个伟大的象征派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的诗里去找寻它。布洛克是著名的神秘革命诗《十二个》的作者，他的另一首也是写于革命早期的诗《斯基台人》，在俄国知识界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布洛克在这首诗里提出了苏俄对于世界态度的一种幻想的预言。在诗歌天才的焕发中，他透露了民族感情的内在根源。他的那种直觉式的指引，是那些政治套语中所罕见的。

他的幻想跨越了远古（差不多是史前时期）、现在和将来；它表明返祖现象的强烈要求和新的革命冲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历史模式。斯基台人曾经住在俄罗斯草原上，长期地在西方捍卫着希腊和罗马，反对自东而来的匈奴人的压力；但是他们却经常处于罗马从西而来的侵略威胁之下。直到他们在反对东方和西方的众寡悬殊的战斗中消耗殆尽时，罗马的文明也就在匈奴人的冲击下崩溃了。在诗人的幻想中，古代的斯基台和当代的俄罗斯就是一个东西。俄罗斯是西方文明的半开化的、朝气蓬勃的边缘部分，它知道面对西方时它还处于劣势，

但它仍以自己的使命而感到骄傲。它继续在为这个文明的生存而战斗，即使西方迄今一直以敌视的态度来报答它。十月革命就是这种捍卫西方的最高行动。问题在于，西方是以革命的信息来回答它呢，还是报之以宿怨呢？这一点将依现代斯基台人对于世界的态度而定：

你们有千千万万；我们也是一群又一群。

要想打我们，你就试试看。

对，我们是斯基台人；对，我们是亚细亚人，也斜着渴望的眼睛。

……啊，旧世界。

……

俄罗斯是一头斯芬克斯。

怀着快乐与忧愁，

流淌着黑色的血，

她睁大眼睛盯住你，

内心充满了仇恨和热爱。

对，热爱，因为只有我们的血才能爱，

而你们早就不再热爱人。

你们已经忘记了会有这样的热爱，

所以才烧杀和破坏。

到我们这边来吧。

从战争的恐怖中投入我们和平的怀抱；

在来得及的时候把宝剑还鞘。

伙伴们，让我们成为兄弟。

如果你们不肯，我们也无所失。

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也能背信弃义；

而已经感到厌恶的下一代人类，

将长期地诅咒你们。

在欧洲进入我们的丛林之前，

我们就已经分散，

然后我们丑陋的亚细亚人的脸，

就将扑向你们。

.....

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庇护你们，

就不再参加战争。

我们将眯着眼睛在一旁观看，

当你们在作殊死的战斗时。

当残忍的匈奴人搜查死者的腰包，

焚烧城市，把牛羊赶进了教堂，

而且烧烤白人弟兄的人肉时，

我们也不会为之一动。

你想一想吧，旧世界！

这是最后的时刻了——对劳动和和平的节日，

这是最后的时刻了——对光明和友谊的节日。

野蛮人的竖琴声现在正召唤着你。

“君士坦丁堡必须留在穆斯林手里。”“我们宣布，瓜分波斯的协定[1907年英国和俄国缔结的]已经撕毁和废除。”“我们宣布，瓜分土耳其的协定[1915年英俄秘密条约]和夺取亚美尼亚的协定已经撕毁和废除^①。”这就是由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早期宣言之一。布尔什维克刚刚公开了沙皇的外交档案，公布了一切秘密条约，谴责了俄国从这些条约所得到的利益，并宣布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建立世界各民族开诚布公关系的新时代。它还宣称，只有“不赔款和不割地”的公正和民主的和约才能为革命接受。布尔什维克所以采取这个独特的革命理想主义行动，是因为他们希望别的国家也能很快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抛弃殖民统治。布尔什维克无疑地认为，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他们抛弃沙皇帝国的征服物并不会使俄国受到真正的损失，因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制度在物质和道义上的好处，将大大超过任何国家可能从剥削弱小民族得来的似是而非的利益。俄国很快就感到了真正的损失；但是布尔什维克决心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树立榜样，斯基台人号召西方：“在来得及的时候把宝剑还鞘”。

即使在内战、外国干涉和饥馑的年月里，这个号召仍继续在回响着。共产国际起初也抱着这样的希望，即西方的工人阶

^① L·费舍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第1卷，第29页。上述引语来自《致俄国和东方的穆斯林劳动者宣言》。

级将自动地寻求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然而，苏联的领导人很快就被迫自卫，采取了某些外交的常规方法。他们临时制定了一套旨在恢复欧洲暂时均势的外交理论，以便增强自己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通过凡尔赛和约，战胜国（特别是法国）支配了欧洲大陆。按照法国的联盟体系，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被派以双重的作用：它们将成为反对东方革命威胁的保护墙，同时又能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任何压力。这个联盟体系起初更为直接地是反对苏联，而不是反对德国。苏联人的目标就是针对它来建立一种平衡的力量。通过同战败国部分联盟以反对战胜国，即同德国联盟反对协议国、特别是反对法国，苏联外交达到了这一目的。令人奇怪的是，英国和苏联尽管意识形态是冲突的，它们的政策却并行不悖。出于不同的理由，英国和俄国从欧洲相对的两边寻求一种力量，来抵制单独一个军事强国支配欧洲大陆。甚至在两国舆论对于凡尔赛和约的态度中，也能发现这种并行不悖的情况。英国和苏联都谴责凡尔赛和约。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中的主要论点，也由苏联的经济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的习语在阐释着。但是和英国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没有被对法的义务所牵累，可以更自由地玩弄均势的把戏。1922年，契切林签订了苏德腊帕洛条约。甚至在此以前，苏联就已获得另一战败国土耳其的友谊。

布尔什维克起初把他们在外交领域的策略看成是暂时的折衷办法。他们仍然期待着西方的社会大变动。共产国际是他们外交政策的主要杠杆；外交人民委员会却成了一个可怜的助手。政治局严格地训令外交人员，不说和不做任何可能使国外

共产党感到困窘的话和事。大使们照例得到指示，不要漠视外交礼貌，不要说起话来就象一个革命鼓动者；他们最多只能“严肃地、事务性地”同资本主义国家从事商务活动。

在斯大林步入三人执政的前列以前，这种趋势就在外交政策中流行了一个时候。列宁同契切林（外交人民委员）、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契切林的助手加拉罕和李维诺夫一起指导了外交政策，他们全都是以前的国外侨民，对西方国家有很深的了解。斯大林同外交政策的指导毫无关系。似乎只有一次他被牵涉到外交事件中，这就是寇松勋爵抗议他对穆斯林的一次贺电，把它解释为煽动殖民地人民起来反对英王陛下政府。他在共产国际中的作用也完全是无足轻重的。

作为三人执政者之一，他逐渐在这方面变得积极起来，但起初他还没有去改变外交政策的既定方针。这时俄国正在收获腊帕洛条约的初步成果，不断扩大了“防疫线”的裂口。1923年、1924年和1925年，许多国家恢复了同它的外交和商务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减轻敌视的每一迹象，都使莫斯科感到真正的快乐。苏联正在得到喘息的时间。

但是，这种充满希望的发展却要求在苏联外交和共产国际之间有一个新的平衡。世界革命和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正常或友好的关系，这两个目标基本上是不相容的。必须牺牲其中之一，无论如何也要使一个从属另一个。要进行选择，就要看事件对两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这两个问题就是：“世界革命的机会怎样？”和“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可不可能有巩固的和平？”这个两难问题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是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而逐渐提出来的。它的解决办法也没有采取郑重决议的方式，在

特定的时间通过和记录在案，而是暗含在一系列的转变中，时而令人觉察不出，时而又很惹人注目。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了四年之后，政治局还不能毫无怀疑地看到世界革命的前景。但这种怀疑还是有限度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深信，在适当的时候，社会主义肯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就如资本主义已经代替了封建主义一样。然而斯大林并不满意这种一般的历史前景，因为它对于当前迫切的主要问题似乎并没有作出解答。欧洲废除封建主义的过程持续了若干世纪。那末资本主义还能抵抗多久呢？列宁估计主要欧洲国家还能存在的日期，最初说是几天，后来说是几个月，再后来又说是几年。现在为了慎重起见，又说是几十年了。在这样长的时期中，苏联的命运还是未定之天。布尔什维主义能指望有几十年的和平吗？苏联外交最近的成功，使斯大林抱着乐观的态度。因此，对世界革命的极端怀疑，坚信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事实上会有一个长期的休战，就成为他的“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胜利”的孪生前提。

托洛茨基叙述了斯大林如何轻蔑地不考虑外国共产主义的潜力。斯大林硬说，共产国际在几十年内都不会实现革命。二十年代是斯大林亲密同事的洛米纳泽说道，斯大林曾经说过，“共产国际代表不了什么东西。它只是由于我们的支持才存在下来。”^①斯大林亲自否认了这些话。洛米纳泽可能指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次随便谈话。但是在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大多数公开声明中，虽然说得十分小心，却到处都暗示了同样

^① 《反对派公报》，第33期，1933年。

的意思^①。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25年6月9日他对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演说^②。他描述了“如果苏联在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内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支持”，它将采取什么样的国内政策。后来他解释他的观点时，还假定苏联的和平孤立将持续二十年，也就是到1945年^③。这还不是他的几个可供选择的前提之一，而是他的政策的总前提。他的听众是一些热情的青年共产党员，很多人都同情左翼反对派；对于他们来说，世界革命的间歇如此之长，是使他们感到震惊的。而和平前景如此之长，在他们听起来也是难以相信的。因此这位演说者不得不考虑到听众的情绪，小心地阐述他的观点。在他的心目中，肯定是把苏联孤立的时间估计得更长的。

他的这种态度就要求共产党的政策逐渐从属于苏联外交的需要。在列宁当权的时期，外交简直就是共产国际的辅助部队。现在这个关系被颠倒过来了。按照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各国共产党从“世界革命的先锋”一变而为多少是苏联的和平“前哨”。从斯大林的观点来看，拿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体去冒险，来换取虚无缥缈的国外革命，这是十足的傻瓜。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下决心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而不管世界共产主义究竟如何。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分道扬镳了。托洛茨基一直到最后的日子还认为，世界共产主义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要更现实一些，尽管世界共产主义有各种弱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7，32，37，51，59，156页。本书作者曾亲耳听到二十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内欧洲领导人们和托洛茨基的反对者们说，斯大林谈过同上引洛米纳泽和托洛茨基的话大体相似的话。

② 同上书，第131页。

③ 同上书，第139页。

点，也尽管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获得了许多成就。其他的大多数领导人动摇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对于这个关键性的问题犹豫不决。至于斯大林，他的政策的这个总前提，在两次大战之间一直没有改变。

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毫无保留地暴露出自己的总前提。认为世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这本来是列宁主义的主要动力。斯大林越是被迫对于革命的期望作些口头上的许诺，他就越陷入同左翼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因为他们谴责他抛弃了列宁主义的遗产。主要是在斗争的最初阶段，即在1925年到1926年时，他还公开地认为，在二十年左右的期间，西方不会有社会主义的高涨。后来，被他的反对派所迫，他或者模棱两可地说一下，或者就同反对派竞相预言革命已经临近。这种预言是他的政策的公开一面，没有这个保护层，党内大部分人就不会同意接受他的观点。他的内心想法则秘而不宣，顶多只同自己一派的领导人讨论一下；但这些想法总是可以从他的行动中看出来。他的政策中的这两方面的矛盾，使得他的行为表现得有点不诚恳，甚至有点两面三刀。因此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谴责他阴谋制造世界革命，而他的布尔什维克批评者又责备他阴谋反对世界革命。

1923年德国共产主义的崩溃，决定性地加速了与斯大林主义相联的一整套思想的形成。这一年的夏季，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热烈讨论了因法国占领鲁尔和德国货币疯狂贬值所引起的德国危机。有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德国的十月革

命”已经临近了。德国共产党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抵达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商讨战略和策略问题。正是在这一场合，斯大林第一次以自己日愈增长的权力干预了共产国际的重大决定。他在致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提出了对德国形势的看法，其中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德国共产主义成功机会的强烈不信任。他列举了1917年革命中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一些例外条件，然后得出结论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没有这样一些条件。当然，他们有一个苏维埃国家作为邻国，这是我们当初没有的。但是我们又能对他们提供什么呢？……如果德国政府这时垮台……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他们就将以失败而告终。”^①他警告政治局，不要鼓励共产党人冒险在德国举行示威游行，因为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目前形势完全对他们有利”）会把它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最后可能以共产党人的被消灭而告结束。“照我看来，德国人〔即德国共产党人〕应该克制而不要冲动。”斯大林认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机会和德国共产党人在1923年的机会之间的差别，在于布尔什维克当时有渴望和平的人民和渴望夺取地主庄园的农民的支持。他的这种说法就暗示，德国共产党人不管是在1923年还是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都没有希望夺取政权，因为他们永远得不到象布尔什维克得到过的那种农民的支持；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有德国在另一次战争中失败，才可能给他们一个机会。对于可能有利于德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条件，即德国产业工人阶级比俄国工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368—369页。这封信的真实性被德国共产主义的两个敌对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和鲁特·费舍尔所证实。在斯大林的全集中没有收入这篇东西，虽然斯大林从未否认过它的真实性。见A·塔尔海麦：《1923年：一个被错过了的革命》，第31页。

人阶级的作用大得多，斯大林却不予注意^①。

这一年的年底，德国的骚动日益严重，俄国人鼓吹采取革命行动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并开始“鞭策”起德国人来。斯大林停止散布他的怀疑，并把自己隐藏在幕后。他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专心致志地去处理这些事情，虽然他们几个人彼此之间意见并不相合。布兰德勒带着一套彼此不关联和互相矛盾的指示返回德国。他要去组织一次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同时又进入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他要在萨克森而不要在首都或任何别的重要中心发动革命，等等。这些指示会使任何起义的党丧失掉最好的机会。结果发生一系列不协调的行动，最后归于失败。这次失败对于莫斯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孤立就此决定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共产国际的命运仍然未定。斯大林虽然认为这个组织作为革命的工具或多或少是无用的，但他也不能割断苏联执政党同它的联系，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太紧密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由于它的使命而感受到鼓舞。它只是代表欧洲工人阶级中的少数派；但那是一个很大的和很重要的少数派，其中包括了西方无产阶级最有理想、最积极和最热情的分子。共产国际的活动不能不使苏联的外交感到窘困。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才迫使斯大林试图去驯服这一难以驾驭的组织。还有另外一个缘故，就是共产国际对于苏联内部

^① 这封信还包括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独特的评论，它是未来共产党策略的一个指示器。信中说：“当然，法西斯分子并没有在睡大觉。但是让他们首先进攻是对我们有利的，因为这将使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的周围。”（同上书）

斗争可能产生的影响。在那些年代里，欧洲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接受已经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关于革命的指导，仍然同他们平起平坐，而且还认为理所当然地有权对苏联的事务发表意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起初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同斯大林斗争，同具有欧洲思想的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实行苏联等级制度的书记处。因此，为了国内和外交的原由，斯大林不能不把共产国际延续下去，但仍习惯于去影响它内部的各种倾向、传统和意见，而他过去正是用这个方法使苏联党改造成为“坚如磐石”的机构的。

他在幕后活动，主要是通过坐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代理人去执行。列宁在共产国际的每一次代表大会上都讲了话，而且虽然他是政府首脑，却公开地为共产国际的政策负责。斯大林在政府中没有职务，也从未在共产国际的任何代表大会上讲过话。在纪念性的会议上，他静静地坐在主席台上，接受代表团中多民族群众的欢呼。只有那些创始人才知道，公开的辩论和投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除非得到斯大林的批准，共产国际的重大决定是没有任何效力的。他轻视重大的意识形态辩论，而列宁却怀着极大的热情，乐此不疲。斯大林还认为定期的代表大会是浪费时间。在列宁领导的四年中，就召开了四次盛大的代表大会；而在斯大林领导的二十五年中，只召开了三次代表大会；一次在1924年，它批准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谴责；另一次在1928年，在会上消除了布哈林和右翼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第三次在1935年，它宣布了人民阵线的政策。这个组织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它的执委会去了。就象苏联党内的情况一样，共产国际内也是核心小组掌握了运动的整个机构的支配地位。

当然，斯大林建立核心小组的大多数工作都是背着人做的。他挤走了那些有独立思想的人、反叛者、理论家、激进的文人学士以及在自发时期的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他们几乎每一个都牵涉到二十年代早期那些倒霉的事件中，因此是容易受到攻击的；斯大林还利用他们的“错误”和“偏向”来使他们丢脸。欧洲共产党人对于遭到大肆诽谤和攻击的俄国革命，是怀着很深的感情的；如果他们的领袖当初知道是在反对俄国党的权威，他们就不会那样做了。斯大林很少直接使用他的权威。判决和谴责都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执委会又是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的。不过它差不多总是由苏联代表团支配，而苏联代表团的意见又受到苏联党政治局的约束。在政治局中，斯大林则统治着多数^①。他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控制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苏联代表在名义上并不比外国党代表具有多大特权，但是他们的道义吸引力却是决定性的。当这种吸引力不够用时，就使用各种压力来粉碎反对派。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外国党领袖都被分配到莫斯科国际的总部去担任名誉职务，以便更容易地控制他们，并割断他们同追随者的联系；还动员其他共产党的舆论来反对他们，鼓励他们国内的对手和敌手起来与他们对抗。如果反对他们的一切伎俩（其中也包括进行诽谤）都已施尽，而这些“偏离方向者”仍在自己的党内享有权威，那末共产国际的出纳就停止对他们党的津贴。但

^① 斯大林本人名义上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之一，但他只偶然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命令处理这个或那个外国“异端者”。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10页，96—101页，103—108页。

是这种极其粗暴的压力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①。正是俄国革命的传奇性，即它的坚固而持久的主旨同转瞬即逝的神话交织在一起，使得斯大林能够君临这个各国共产党的大集合体。在这些共产党的队伍中，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理想主义者，比随波逐流者在人数上大得无可比拟。即使是随波逐流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因为他们虽然准备服从任何主人，但只有这个主人以革命的权威说话才行。多年以来，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思想成功地训练了这一群人，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群人愿意为一个伟大的事业服务。不论正确与否，他们把这个事业就视为苏联的事业；比之于苏联党政治局中的长期不和或共产国际的变化不定，比之于苏联外交的诡谲或苏联前途的暗淡，这个事业对他们来说还是更为单纯和宏伟的。

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共产国际不仅反射了苏联党的光亮，而且也反射了它扰攘不安的内部组合情况。在许多情况下，要想了解任何共产党历史的人，如果只从这个党的国内环境出发，那一定会无从着手的。他无法说明路线的不断变化，领袖们的下台和上台，以及组织结构的各种改革。所有这些情况的根源，必须经常地到苏联党总书记那儿去寻找，而不是从

^① 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津贴起初本来是无关宏旨的事。每一个支部都向这个组织的财务处交纳应摊的份额，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再领取费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在不同程度上也实行这样的办法，并没有产生腐败的行为。由于苏联党的财力比其他支部大得无可比拟，所以共产国际就逐渐依靠了它。当然，外国党有很多的追随者，容易自立。但是莫斯科却鼓励它们超过自己的财力去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是变成官僚机构，也就越发需要外部的津贴。由于钱来得容易，它们就忽视自己收取党费，引起了涣散士气的效果。“莫斯科金钱”培养国外共产主义的作用经常被大肆渲染，不过，这种津贴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使共产党的等级组织服从斯大林的指导。

当地的社会斗争中去寻找。当托洛茨基同三人执政对抗时，托洛茨基主义缠住了共产国际。后来，凡是在观点和感情上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有关联的领导人，不是参加了对他的谴责，就是从此消失了。在布哈林同斯大林联盟的那些年月里，他是共产国际的一颗明星。他宣布国际的各项新政策，从同情布尔什维克党中派和右派联盟的外国共产党人中挑选自己的班子。在这个联盟崩溃之后，国际就在“布尔什维克化”的新痛苦中挣扎了。

共产国际本来是在革命高潮中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中产生的，而且它希望击败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一翼。在斯大林认为是革命停滞的旧时期中，他就竭尽全力地修改这个从革命遗传下来的组织。在资本主义的稳定以及工人运动两翼（即第二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和解上，斯大林目前究竟更多地考虑哪一个呢？如果他的判断正确，这两个国际目前所能做的事不过是以或大或小的决心从有产阶级手中强行夺取改革和让步。在这个基础上，它们是可能有共同行动的，而且它们的合作也就可能填平它们之间的鸿沟。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合作共事期间，他们正是根据这一精神来指导共产国际的事务的。这时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正欣欣向荣；在一种混合经济的结构内，执政党保护私营农业和商业。它的这种“费边主义”的态度，似乎也要求在国外实行一种温和的方针，而这是同共产国际的主旨大相逕庭的。

二十年代中期，有两个问题引起了斯大林的很大注意，这

就是中国革命和苏联工会对待英国工联的态度。中国革命在其早期年代是完全处于俄国的魔力下的。国民党的奠基人孙中山强烈要求他的追随者保卫两个革命之间的友谊。孙中山逝世后，斯大林曾给国民党发了如下的电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国民党一定会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伟大斗争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国民党一定会光荣地举着这面旗帜，直到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代理人。”^①俄国的顾问被派去帮助蒋介石进行战争。中国共产党人被莫斯科训令去参加国民党，于是“四个阶级的集团”就成了国民党的组成成分；国民党本身也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系成员。^②

这就产生了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它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共产党在其中应起什么作用？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即摆脱西方的监护和本身的封建分离主义，是这次运动的动力。这次运动在开头时是作为一支统一力量行动的。但是，在这个外表的下面，将军们和农民们、商人们和苦力们之间存在着社会分裂。这种分裂随着时间而加深。在中国沿海的工业和商业城市中，工人阶级则成为最有力量的政治因素。

这能成为中国的1917年吗？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答复是“不能”，而托洛茨基的答复却是“能够”。如果要从俄国历史中寻求先例的话，斯大林倒是宁愿以1905年的情况来相比，当时布尔什维克都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期望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此斯大林作出结论说，中国人也只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他又回到了“旧的布尔什维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5页。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记录》（1926年2月—3月），第12—13页。

主义”，而这是列宁在1917年4月坚决抛弃掉的东西，只是他从未成功地从他的一些信徒的心目中完全根除掉它。由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使中国统一和现代化，并赢得民族的独立，而不是争取社会主义，所以照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应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目标。相反地，他们应该同资产阶级、农民和进步的民族主义将军们和谐地一块工作。他敦促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严格纪律，因为它现在只是国民党中的一个派^①。他还指导苏联的宣传机器增强蒋介石的威信，把他看成是中国民族复兴的无异议的领袖。最后由革命产生的政府，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是列宁在1905年发挥过的公式，适用于特殊的情况，即只适用于“落后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纯粹为了反封建的革命而斗争，并同革命的中产阶级和农民代表分享政权。

这种早已耳熟的关于这一公式的半学院式争论又重新爆发了^②。托洛茨基谴责斯大林主张的同蒋介石联盟，并主张中国共产党人直截了当地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持1905年的列宁主义传统，接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但他们批评了斯大林的政策，认为它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属于资产阶级。这场争论达到难以置信的狂热和尖锐程度，加速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最后分裂。

与此同时，中国“四个阶级的集团”也分崩瓦解了。尽管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很温和，但它的发展却吓坏了蒋介石和资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8—329页。还可见《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中布哈林对这一问题的报告。见该书第27—29页。

^② 参看第2章第50—51页；第3章第84—88页和第5章第156—163页等处。

产阶级的领导人物。蒋介石粗暴地甩掉了令他头疼的同盟者：他把俄国的军事顾问送返俄国，并残酷地镇压曾经在他下面服务过的共产党人。由于斯大林曾经坚决地支持蒋介石，所以现在他的地位和威信一时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他企图挽救一下他的中国政策，就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同在汉口成立政府以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携手合作。但是这个联合很快也就崩溃了。共产主义即使企图否认自己的性质而去迎合资产阶级盟友，即使训练自己去实行温和和妥协的计策，甚至改变自己的标记和语言，也不能不引起资产阶级领袖和政党的恐惧和惊慌。它一生下来就带有革命的标记，不是受到诅咒，就是受到祝福，不是引起恐怖，就是引起希望，任何策略上的计谋都不能将它隐藏，甚至也不能使它的痕迹消褪掉。

另一个温和政策的重大试验也遭到同样的挫折，这就是1925年5月成立的英俄统一委员会。政治局原来希望，英国工联会利用它们的影响来改善当时已经紧张的英俄关系。斯大林派了政治局最有影响的一个成员托姆斯基到英国工联赫尔代表大会去致词。他希望通过同英国的谅解，使国际工人运动中互相对立的两翼达成充分的协议。原来同共产国际平行的工会国际（即赤色工会国际），是同西方改良主义工会组成的所谓阿姆斯特丹国际相对立的。但工会国际遭到了比共产国际还要惨的失败。现在莫斯科愿意承认这个失败，并同阿姆斯特丹国际实现某种和解。英俄统一委员会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垫脚石。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右翼怀着模糊的希望，以为两个政治性的国际重新联合，就将圆满地完成了和解的工作。斯大林一如既往，小心谨慎地不卷入这些有远见的计划中去。但是他

却慷慨地支持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奉行的方针，并为这种方针遭到布尔什维克左翼的尖锐批评而进行辩护。^①

俄国和英国工会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经得起1926年总罢工的考验。俄国的领导人由于受到自己的左翼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时常地批评他们英国同事的温和态度。他们的批评尽管很缓和，却引起了一片愤怒声。另一方面，英国工联的领导人也由于受到保守党舆论的强大压力，对他们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感到很不自在。他们拒绝接受俄国工会作为团结姿态而募集的支援矿工罢工的资金。过了一些时候，英俄统一委员会就解散了；布尔什维主义同欧洲改良主义进一步和解的希望也就随之逝去。

和解的途径就这样以令人失望的结果而告终。1923年底，世界曾把布尔什维克作为革命者而加以拒绝；到了1927年底，世界又把布尔什维克作为和解者而加以拒绝。共产国际不仅无效地在中国和英国试图实行温和政策；而且它也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做了同样的事情。^②但是共产党人却到处被他们往日的盟友所抛弃或追捕。对于和解政策的失望，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引起了一种激烈的变化，为一个完全同老方针相反的新方针铺平了道路。这个变化十分强烈，以致在1927年年底，斯大林为了在他的中国政策上挽回面子，竟然建议已经由于野蛮的迫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57—172页。托姆斯基从英国回来后，对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工人高水平的生活印象很深，他告诉他的一个密友、共产国际前德国副主席（本书作者又从他听到了这一事情）说：“我不明白你们西欧工人为什么非要成为共产党。我在西方看不到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② 例如在波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携手帮助皮尔苏茨基1926年的政变。在罗马尼亚和其他巴尔干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害和屠杀而削弱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实行起义。这次起义事前就注定了是要失败的，而且事实上招致了对共产党员的新屠杀。^① 整个共产国际很快就沉溺于长期的“极左”冲动中，想为它注定要倒霉的温和的政治家风度赎罪。德国共产党在兴起的纳粹主义面前，把这种极左的政策发展到了自杀性的极端程度。

共产国际的这种变化还有另一原因，就是1928年到1929年俄国党内发生了新的组合，这个原因肯定比共产国际队伍中的情绪更具有决定意义。这时，斯大林正在使右翼布尔什维克屈服。由布哈林、托姆斯基或李可夫最先提出来的任何政治概念或口号，没有不受到谴责的。而真正发生争论的还是俄国本身的问题，如新经济政策、工业化、集体化，等等。但是，由于俄国党猛烈地“转向左边”，也就自动地把这种倾向传到了迄今仍由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内。有些外国共产党人倾向于站在布哈林一边，所以斯大林不得不把反对布哈林的斗争也带到了共产国际里面。^② 他为欧洲各党制定了新的政策，使其在外表上同俄国的趋势相一致。在俄国，共产党人同个体农民和商人的合作既然已经终结，那末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国外的共产党人应该停止同其他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合作。

俄国的每一运动和折腾都自动地传达到其他各党，这就构成共产国际生活中主要的和十分离奇的反常现象，甚至到了后来这种反常现象都习以为常了。正是因为如此，共产国际的很

^① “广州公社”的事情见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352—377页。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59—265页。

多活动都笼罩着一种不现实的气氛。斯大林在俄国的向左转并不仅是很认真的事，而且它具有民族规模的宏伟场面，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伟大国家的社会结构。党的路线的每一次转变，以及把诺言和口号最后变成事实，都是以巨大国家的全部权力作后盾的。但是，共产国际政策的这样一些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最多只是毫无意义的东施效颦。这就好象一个身材魁伟的运动员正从事一项英勇的竞争，他的周围却投下二三十个人影，每个人影都模仿真人的激烈角斗和凶猛姿态，仿佛要使天地为之震动。事实上这些共产国际的支部并不仅仅是影子，所以使这一图景就更加光怪陆离了。这些支部半是实体半是影子。当它们是实体时，就沉浸在民族生活的现实中，企图表达自己国家工人阶级的愿望；而当它们是影子时，它们就参加了那场乱哄哄的幽灵舞蹈，围着那位总书记转。

1927年12月，紧接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开除出党后，斯大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结束，这使四座为之一惊。他说：“两年以前，人们还在谈论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对均势，谈论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存’。现在我们有一切理由说，‘和平共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让位给帝国主义进攻和准备干涉苏联的时期。”^①他并不想费力去把这个新观点同他以前关于有十五到二十年“和平共存”时期的预言协调起来。他的这个新论点最后在1928年夏季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接受为新政策的基础；他在这次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34页。

代表大会上使外国代表团大为吃惊，因为他通过幕后活动，实际上贬黜了布哈林^①。

这次代表大会预言资本主义国家即将发生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这个经过斯大林认可的预言惊人地被证实了，第二年美国就发生了大萧条。)从这些前提出发，制定了新的策略。人们期望着发生一系列的革命爆发。西方各国共产党将要发动对资本主义的最后攻势。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现在被称为社会法西斯，当成了共产主义的最危险敌人。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甚至被当成是比右翼更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越左就越危险”。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任何合作和接触都会使自己受到沾染。因此共产国际就召集自己的队伍，绝对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条件，去进行全世界范围的斗争^②。

尽管斯大林的宣传机构欢呼所有的革命火山即将爆发，但他本人是否相信此点，至少可以说是值得怀疑的。他了解外国的情况虽然很可怜，但还不致于使他相信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那些极端革命的幻想。他仿佛毫不理会共产国际的大吹大擂，比以往更加强调“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这个最高的信条，认为不仅他自己的党而且整个共产国际都有义务遵守它。这时他对于在俄国新建一个工厂看得比外国革命的一切伟大期望都无比的重要。^③ 他的外交甚至比以前更小心地摸索前进，

① 斯大林关于贬黜布哈林的说法，见他1929年4月在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载《列宁主义问题》，第246—325页。

② 《共产国际文件集》，第769—792，876—877，915—930，952—965页。

③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高级的布尔什维克那里听到一句颇有特色的话：“一个苏联的拖拉机手比十个好的外国共产党人还有价值”。这句私房话反映了斯大林随从如何看待共产国际。

而且根据俄国要长期处于孤立的假设去继续工作。他的两条政策路线，一条是在俄国实行的，一条是鼓励共产国际实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无可否认的矛盾。这两种政策孰轻孰重，这是很容易猜到的。

共产国际这时的确是在从事虚幻的战斗。它的超激进主义是这样的不现实，斯大林所以还支持它，十之八九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国际在那些年所做的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如果他真地这样认为，那末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共产国际的超激进主义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虽然它是一种负作用。特别是在德国，情况更是如此。德国是这项新政策的试验点，那儿的工人运动已经遭到迅速兴起的纳粹主义的威胁。但是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之间却发生了分裂。社会民主党把兴登堡作为靠山去反对希特勒，并拒绝同共产党进行任何合作；而共产党却把社会民主党视为比纳粹还要大的威胁。这种极其不合理的分裂，瘫痪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而那时单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就足于阻挡希特勒当权。我们这儿不去谈论魏玛共和国崩溃的经过，反正它是以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工人组织向褐衫党投降而告终的，其中没有放一枪，没有进行一次认真的抵抗。只要说一个情况就够了：崩溃之后，德国左翼中流行一句话说，“没有斯大林就不会有希特勒。”当然这种说法是不足信的。1933年以后德国左翼意气消沉，大多数的领导人只热衷于为自己的失败辩护，把一切都归因于斯大林的恶劣影响。但是，作为共产国际政策的授意人，斯大林的确是应该负他那一部分责任的，因为那种政策不明智地使得希特勒获得了胜利。

从三十年代早期共产国际的所有文件和斯大林自己的谈话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点，这就是他完全没有认识到纳粹主义的意义及其破坏性的劲头。^①对斯大林来说，希特勒只不过是许多反动领导人中间的一员，他由于政治上的拉锯战而一时之间忽上忽下，他不过是另一个勃吕宁或巴本，另一个鲍尔温或哈定。在所有的人中，偏偏是斯大林完全忽视了纳粹主义的集权愿望和根据这种愿望来行动的力量。早在1924年，他就形成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基本观点：

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是不对的。……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没有根据推想，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支持，而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样也很少有根据认为，社会民主党没有资产阶级战斗组织的积极支持，而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些组织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法西斯主义是这两个主要组织的无形的政治联盟，它是在战后帝国主义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目的在于同无产阶级革命作斗争。^②

这些话可以说代表了斯大林对于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解。在后来的年代里，他又模模糊糊地重提了一两

① 斯大林一直把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视为本质上一致的东西。我们在这儿也把这个词交互使用。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46页。

次，没有什么修正。^①共产国际的许多理论家和作家多年以来一直在玩味他说的“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对这个冲垮了欧洲旧政治结构的新力量作不出一个前后一贯的解释。甚至在希特勒已经执政以后，斯大林的代言人们还在预言纳粹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在搞“密约”，但只要共产党东山再起，希特勒的影响就将立即冰消瓦解。^②在希特勒上台一年以后，斯大林虽然已经正确地预见到纳粹主义带来了战争的危險，但却含糊地向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说：“革命危机正在成熟，法西斯主义决不能长久存在。”^③只有一件事他没有预见到，而且他的代言人一直强调地认为不可能发生，这就是希特勒将把社会民主主义连同共产主义一块消灭掉，法西斯主义要把它的“孪生兄弟”送到集中营去，独揽一切大权。应该补充说一句，有这种错误的并不仅是斯大林一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一直到最后还希望同希特勒找到妥协的办法；而那些对纳粹主义表示良好祝愿的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保守派也在自欺欺人地认为，希特勒会按照他们订下的规则来进行这场比赛。

研究这些事情的学者中，没有谁会忽略这一显著的矛盾：斯大林尽管掌握了一个大国所能得到的一切情报来源和广泛的国际组织，但在这个严重的考验中，却表现得如此缺乏理解力和想象力；而托洛茨基虽然独处太子岛的避难所，对于德国的危机却很有洞察力和责任感。他在一系列的书籍、小册子和文章中，对纳粹主义作了当时来说是最详尽的社会学解释。他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1页。

② 《观察》，第43期，1933年；《共产国际》，第14期，1933年。

③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08页。

一步一步地追溯着希特勒运动的发展，对它的每一阶段都在事前作了很好的预言，并徒劳地想使德国左翼、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即将降临到它们头上的大破坏引起注意。

他在1931年写道：

〔我们〕有责任提出警告：共产国际的领导正在引导德国无产阶级走向巨大的灾难，其核心就是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惊慌失措地屈膝投降。德国国家社会党的掌权，首先就意味着德国无产阶级精华的被消灭，组织的被摧垮，信仰的被根除。考虑到德国社会矛盾的极其……尖锐，凶恶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比较起来，也可能显得是苍白无力的和几乎是人慈的试验。^①

在希特勒掌权以前两年，托洛茨基再次发出了警告：

工人们，共产党人们……如果法西斯当权，它就会象一辆可怕的坦克压碎你们的头颅和脊骨。只有无情的斗争才能解救你们。而只有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团结战斗才能获胜。赶快行动起来吧，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②

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和苏联的其他领导人还在用法国领导的反苏十字军来吓唬人，但却看不到正在地平线上升起的真正的反苏十字军。1930年7月，斯大林还把法国描述为“世界一切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最富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

^① 托洛茨基：《德国，国际形势的关键》，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44页。

家”，它正准备发动反对俄国的战争。^①托洛茨基反驳道：“没有一个‘正常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能够在目前冒险发动反苏战争。……但是如果希特勒掌了权，打垮德国工人的先锋队，并在以后的多年里使整个无产阶级四分五裂和士气涣散，那末法西斯政府将是唯一能发动反苏战争的政府。……万一希特勒〔在德国〕胜利，他将成为资产阶级世界的超级勇士。”^②莫斯科对托洛茨基的警告报以自满的嘲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继续顽固不化地重复着关于死对头和双生子的梦呓。

直到希特勒掌权以前，苏联大体上一直执行着腊帕洛政策。这个政策给予战败的德国有限度的支持来反对战胜国。支持的形式是多样的，但整个来说，还没达到使德国满足强行修改凡尔赛和约的野心。苏联也尽可能地通过与德国联合中得到好处，特别是当别的国家对它实行不同程度抵制的时候。德国工业品的进口，帮助了俄国在二十年代的恢复工作。政治局授权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征募失业的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来训练红军的军事技术。作为回报，俄国人允许德国的军事技术人员继续在俄国国土上进行那些根据凡尔赛和约不允许在德国进行的试验。斯大林没有改变这些安排，它们根据惯性力量一直继续到希特勒夺取权力以后若干时候。^③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3页。

② 托洛茨基：《德国，国际形势的关键》，第25页。

③ 谴责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同德国国防军合作，这倒是有点道理的。俄国人和德军的合作，在政治局的授权和监督下，从1922年到1935年，持续了近十二年。

尽管如此，这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并没有结盟的性质。正如以前说过的，它们的目的是抗衡协约国的优势，并防止德国同西方携手来反对俄国。因此一当西方国家试图减轻德国的赔款负担时(如道威斯计划)，或者一当它们试图在凡尔赛和约基础上同德国改善关系时(如罗迦诺公约)，苏联领导人都不安的注视着，看看这些行动中是否隐藏着反苏的联盟；同时他们还鼓励德国去反对战胜国。但是他们对凡尔赛体系的稳定性并不抱幻想。因此斯大林在1925年评论罗迦诺公约时说：“如果认为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试问有什么办法保障这个在法律上确认德国丧失西里西亚、但泽走廊和但泽，乌克兰丧失加里西亚和沃伦省西部，白俄罗斯丧失它的西部领土，立陶宛丧失维里诺等等的凡尔赛和约和它的继续罗迦诺公约……不会遭到与普法战争后从法国割去亚尔萨斯—洛林的那个旧普法条约同样的命运呢？……罗迦诺公约却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①因此，在1925年，斯大林就已经以很大的准确性列举了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个暴风雨中心。

斯大林在二十年代中期作出的若干预言是特别有意思的，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指明了他未来的政策。和平只不过是两次战争中间的休战，这对他来说已是一条规律。他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也认为资本家对于原料、市场和有利投资的竞争，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军备竞赛。现在还不能肯定的，除了战争爆发的时间以外，就是未来敌对双方如何分野。在二十年代中期，托洛茨基曾大大夸大了英美对立的尖锐性，预言美国同英帝国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26—227页。

之间将要发生一次战争。这个观点也被政治局接受了；而且迟至1930年，斯大林还重复了这个观点，说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矛盾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①他在另一场合还说：“没落的资本主义英国和上升的资本主义美国”。^②美国的上升使他充满了预感，因为他看到美国主要通过贷款给德国，正在支撑着日益衰落的欧洲资本主义。此外，直到1933年，美国还顽固地拒绝承认苏联政府。

如果大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按照定义都是帝国主义）之间发生战争，俄国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政治局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没有达到最后的结论。布尔什维克通常的答复就是，但愿交战双方都倒霉。他们还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棱镜来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希望交战国家的工人阶级也能象俄国工人阶级所曾经做过的那样实行起义。一般来说，俄国的任务就是鼓励国外反军国主义的革命运动。

但是，在二十年代中期的辩论中，斯大林对未来的变化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和更为复杂的看法。这些辩论的详情尚未公布，因为大多数的辩论都是秘密举行的。只是到了1947年，斯大林才第一次发表了他1925年1月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可以说明他当时的态度。

由于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而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7页；托洛茨基：《欧洲和美洲》，第4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2页，“然而有一种力量……一定会摧毁不列颠帝国。那就是英国保守党人。”《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1页。

（当然不是明天，不是后天，而是几年以后）。……我认为西方革命运动的力量是强大的，这种力量正在壮大并且还会继续壮大，这种力量能够在某些地方推翻资产阶级。事实就是这样。但是要保持住这种力量是很困难的。……当我们周围的国家里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问题，我们军队的实力问题和它的战斗准备问题就一定会成为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这并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积极地反对谁。……我们的旗帜依然是和平的旗帜。但是，如果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不应该坐着不动。我们必须行动，但我们是最后行动。我们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把有决定性的砝码、把能够举足轻重的砝码放在天平盘上。①

应该全文读一读这篇很有启发性的声明。对于西方革命力量的那些说法，透露了演讲者对它们是抱怀疑态度的。既然认为这些力量是“强大的”，而且“正在壮大”，但它们却只能在“某些地方”推翻资产阶级；甚至后来它们也不能够“保持住这种力量”。斯大林无疑地认为，是俄国军队的力量，而不是国外的革命力量，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因素。红军会出来帮助外国革命“保持住这种力量”吗？他回避了这一问题，但坚持说，并没有义务去这样做。虽然他对此说得不多，但他是宁愿坐观交战的资本主义国家打得精疲力尽，以便红军“把能够举足轻重的砝码放在天平盘上”。也许这就象美国军队在1918年干的那样。现在他出来证实了下面两点：第一，俄国的利益是在未来的争夺中尽可能长地作壁上观；第二，红军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页。

比西方实际的或潜在的革命力量要优秀得多。1925年时，他心目中对这两点究竟明确到什么程度，这还很难肯定。他可能不过是在向中央委员会讲话时一边说一边在这样想。或者他可能想到了甚嚣尘上的英美战争中俄国可以袖手旁观的说法。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反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是根据这两条原则行事的。

大约在1925年以后，他又宣布了另一种外交政策，这回想起来是有特殊意义的。他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谈到了某些外交人员（他没有提到名字）反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他说，这个反对派赞成俄国同前协约国和解，抛弃共产国际，并重新收回俄国曾经自愿放弃的势力范围。这些显然是布尔什维克对于外交的重新考虑，它对于自己放弃的帝国主义特权感到懊悔了。但是这种重新考虑也代表了一种在方法上的精明预见，斯大林本人从1939年以后就在他的外交政策中奉行这种方法，首先是同希特勒达成协议，然后是同罗斯福和丘吉尔达成协议。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斯大林却对这些预见性的建议直截了当地进行谴责说：

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他指的是1925年6月提出的势力范围的概念，这恰恰是在波茨坦会议前二十年〕，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

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①

对势力范围的怀念当时已在苏联外交中兴起，这看起来比斯大林对它的谴责甚至还要出人意外。在二十年代，这种想法无论如何是提得早了一点。当时俄国的讨价还价能力还太弱，不足以同英国或法国达成协议来瓜分势力范围。这一点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斯大林对这一想法干脆不予考虑。他没有必要平白无故地就牺牲了他的外交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随后的许多年月里，在涉及苏联的问题上，他的外交一直限于维持国际形势的现状。斯大林在1930年6月对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说：“别人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要，自己的土地呢，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给任何人。”②这就是1939年以前斯大林对外政策的主题。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0—14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7页。

第十一章

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二)

(1934—1941年)

斯大林在希特勒统治的第一年小心地保持沉默。——寻求“集体安全”(1934—1938年)。——斯大林接见艾登、赖伐尔和贝奈斯(1935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共产国际宣布人民阵线政策。——世界革命是一场“悲喜剧的误会”。——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赌注(1936—1938年)。——慕尼黑协定以前和慕尼黑协定期间苏联的孤立。——斯大林的迅速回击。——他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9年3月)。——在和平状况最后几个月中的外交策略。——苏德条约的最后准备阶段。——里宾特罗甫在克里姆林宫(1939年8月23日)。——瓜分波兰。——第一次苏芬战争。——斯大林拒绝希特勒访问柏林的邀请(1940年3月)。——法国的崩溃出于斯大林预料之外。——苏德在巴尔干的敌对。——日本特使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成为政府总理(1941年5月6日)以及他同希特勒和解的最后企图。——斯大林1939—1941年外交的资产负债表。

纳粹在德国的兴起，并没有立即使斯大林感到有必要对他的对外政策作某些修改。他起初在等待着，看看纳粹政权是否稳固，希特勒会不会接受他前任的腊帕洛政策，或者会不会按照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表示的思想，对苏联采取不能改变的敌视态度。同时，斯大林又极其小心地不作出任何刺激的行动。

德国共产主义完全消极地让自己被希特勒所粉碎，可能使人们预期苏德之间的友好关系会继续得到促进；而这件事是那样地引人注目，它似乎可以驳斥所谓俄国干涉德国内部事务的流行看法。① 腊帕洛协议与1926年的友好和中立条约还在继续生效；它们在1931年又延长了有效的期限；这次延长在1933年5月得到批准，这时希特勒已经成为总理几个星期了。希特勒对所有国内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和他的民族迫害行为，都没有怎样影响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日常外交事务，就恰如没有怎样影响巴黎或伦敦同柏林之间的关系一样。斯大林无疑地在推测德国外交中俾斯麦传统的力量，这个传统就是要求德国避免和俄国卷入纠纷。在希特勒任总理的头一年，斯大林没有公开地谈论过关于德国事务的一句话，虽然他的沉默使共产国际中已经很窘的追随者十分苦恼。②

只是到了1934年1月的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他才打破了沉默。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对于欧洲左派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还是避免作出什么结论。他还模模糊糊地抱着幻想说，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将证明是不会长久的。但是他也把纳粹的兴起描述为“复仇思想占了上风”，并且

① 有些反对斯大林的共产党人（如沃伦堡、克里维茨基和其他人）认为，斯大林故意使德国共产党人向纳粹主义投降，以便挽救腊帕洛政策。按我们看来，这种看法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斯大林对于正在兴起的纳粹主义的政策是极其短视和愚蠢的，但还不是故意的背叛。

② 他所以沉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要延缓俄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这导致两个重要的结果：1933年11月，即在十月革命后十六年，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倡议下，终于正式承认了苏联政府。大约与此同时，俄国将中东铁路让给日本的傀儡满洲国政府。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增强了斯大林的地位；但是，整个来说，却使他后来同德国和日本打交道时处于软弱的地位。这时他的国内战线正因集体化的后遗症而艰难地前进着。

说，德国政策中的反苏倾向已经胜过了老的俾斯麦传统。即使这样，他仍煞费苦心地说清楚，苏联愿意继续同第三帝国保持友好，就象它同魏玛共和国保持友好一样：

有些德国政治家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苏联现在采取了指靠法国和波兰的方针，说苏联已经由凡尔赛条约的反对者变成了它的拥护者，说这种变化是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这是不对的。当然，我们决不会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而喜不自胜。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这至少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妨碍苏联和这个国家建立最好的关系。问题也不在于我们象人们所臆造的那样对凡尔赛条约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我们受过布列斯特和约的耻辱，是不会赞美凡尔赛条约的。我们只是不赞成世界由于这个条约而被卷入新战争的漩涡。^①

随后发生的事件增强了他的预感。德国和波兰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他心里有些嘀咕，不知道希特勒是不是在玩弄波兰统治乌克兰的老把戏，而皮尔苏茨基元帅过去就是这种把戏的最著名的倡导者。当波兰同意延长它和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时，他才部分地消失了这种怀疑。与此同时，莫斯科向柏林建议，由苏德共同保证波罗的海各小国的边界和独立（这些小国是从陆上入侵俄国的一个走廊）。希特勒不愿捆住自己的手脚，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自此以后，斯大林就一心一意地想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21页。

保证苏联边界的安全。但是当前的状况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由北方从波罗的海进入苏联的道路是敞开着；从中路穿过波兰入侵的路线，似乎也取决于波兰政府的暧昧态度；从南翼进攻苏联也是方便的，因为几个多瑙河国家抱反苏的态度，只是到了1934年夏季，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才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从腊帕洛条约以后，斯大林还是头一次明瞭，苏联的外交政策需要作一次全面的修改。

这时开始的苏联同德国的西方敌国之间的外交手法（这种手法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末），也许是现代史中最为复杂的一页；而斯大林在其中的作用看来也比其他任何人要更为复杂。不过，这种手法的复杂性并不是由于双方动机和行动的多变性，而恰恰相反地是由于它们的单纯性和一致性所引起的。相继发生的许多僵局和对峙，非常象两个人在下棋，他们都在自己一方持续地采取平行行动，因而在棋盘上引起了复杂的变化。每一个德国未来的敌人都在被折磨着，它们一方面幻想战争可以避免，另一方面又模糊地感到它的不可避免性。它们都怕被孤立的危险，采取了某些行动来增强同盟的保护体制。它们都不愿承担明确的军事义务，害怕这种义务可能使战争更加临近，或使战争更加临近自己的边境。未来盟国的每一个成员们都热烈地希望，重新兴起的德国军国主义的那股劲头，可以转移到对自己民族利益无害的方向去。起初，德国军国主义的弱点曾经诱使它们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后来由于希特勒利用这种消极态度来增强他的战争机器，它们又开始来利用这种弱点。未来盟国的每个成员都竞相出卖空间以换取时间，并拆自己盟友和朋友的台，一直到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出卖和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争取时为止。

当然，有关各方并不能同时进行平行行动。在每一阶段中，为了打破僵局，某一方必须先走一步；某一方还必须首先牺牲一些卒子。因此，尽管有关各方那些巧妙的行动和计策多么相似，各方却在一个期间夸耀自己的公正，而把对方视为恶人。当法国和英国错误地在搞绥靖政策时，苏联却勇敢地吹起了集体安全的号角。后来，当英国为自己历史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而自豪时，苏联却热衷于同德国进行肮脏的交易。后来，为了巩固盟国的团结，它们相互间有了忍让；但是一旦战火平熄，又重新相互谴责起来了。

在1934年中，斯大林着手寻求保护性的同盟。他逐渐地、但不是不可察觉地从反对凡尔赛体制一变而为捍卫它。9月间，苏联参加了国际联盟。在此以前，克里姆林宫同国际联盟是互相抵制的。照列宁看来，国际联盟是“强盗窝”，是为了实施凡尔赛和约、使殖民统治永久化和镇压全世界解放运动而设计出来的组织。斯大林也认为，“要加入国际联盟，正象李维诺夫同志所正确说过的，就必须在铁锤和铁砧之间作一选择。然而我们既不愿意成为敲打弱小民族的铁锤，也不愿意成为受强大民族敲打的铁砧。”^①但是德国的复仇到底是比凡尔赛体制还要坏的东西。李维诺夫很快就成为一个“强大的”国际联盟的最热情鼓吹者，认为它应该能够阻止或惩罚侵略行为。在斯大林对国际联盟的新热情中，有一点和平幻想的味道。他企图建立一个东欧公约的打算，也同样可以这样说。按照这个公约的设想，苏联、德国和东欧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5页。

所有国家都互相保证，当其中一国受到侵略时，其他国家将自动地进行援助。苏联创造一个东方罗迦诺的努力，受到法国外交部长巴都的有力支持，但是由于德国和波兰的共同反对而告失败。

到了1935年初，斯大林由于建立区域性的东欧防务体系没有收到效果，就转而计划同西方联盟。1935年3月，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安东尼·艾登。这位未来的外交大臣当时还仅仅是一个低级的大臣，他是对布拉格和華沙作了同样的访问后来来到莫斯科的。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位英国的高级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柏林访问了希特勒。不过，艾登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热烈欢迎。在多年的磨擦和敌对之后，他是第一个正式访问红色莫斯科的英王陛下大臣。两个国家之间的坚冰似乎已经打破；而且斯大林也不遗余力地去加速打破它。他一反总书记很少出头露面的惯例，亲自主持了对英国贵宾的接待。他还违背布尔什维克的习惯，命令演奏英国国歌《天佑我王》。但是，这次访问本来就不打算产生而且也的确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结果。后来到了5月，刚刚在希特勒恢复征兵制以后，另外两个重要的访问者赖伐尔和贝奈斯抵达莫斯科。结果缔结了苏法同盟和苏捷同盟。斯大林亲自招待了赖伐尔和贝奈斯。他虽然名义上不是政府成员，却参加了同外国重要政治家的谈判，并正式接待他们，从此这就成为正常的外交程序。

赖伐尔访问中的一次事件引起了轰动。他回到巴黎后声称，斯大林授权他宣布，他同情法国增强防务的努力。在此以前，法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在原则上都是反对国防的。它的议会代表始终一贯地投票反对军事预算；它的党员们在武装部队中从事革命宣传。斯大林的话听起来好象是不赞

成这种态度；而且令人有点反感的是，他竟然选择赖伐尔来传达这句话，而法国左派是把赖伐尔视为他们之中的一个最凶恶的叛徒的。法国共产党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一个时期中继续反对国防开支。党内反军国主义的传统仍很强烈，这是不能随随便便地加以嘲弄的。此外，赖伐尔也无意使刚刚缔结的同盟生效；他拖延了它在国民议会中的批准手续，不让法国的军事领导人同他们的俄国同事讨论防务计划。因此，共产党人也就不想投票赞成他的军事预算。尽管如此，斯大林的声明预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重大变化。

在同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个变化公开出来了。从1928年以来所曾经使用过的一切理论、策略和口号——法西斯主义和民主是“双生子”的看法，禁止同社会民主党领袖合作，等等——都被抛到共产国际的杂物堆里去了。保卫民主（“资产阶级”的形容词被小心地略去了）和反对法西斯主义，被宣布为工人运动的最高任务。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被号召携手合作，建立“人民阵线”，它包括一切资产阶级党派和集团，不论是自由派、激进派、甚至保守派，只要他们宣布自己愿意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就行。（这不仅从根本上离开了以前的策略，而且从根本上离开了共产国际的基本章程，即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草拟的著名的“二十一条”，它明确地禁止共产党人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共产党人还不应该用过分激烈的要求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吓跑”资产阶级自由派。这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党人很快就变成民主国家国防的最热心的、甚至是大叫大嚷的支持者。共产国际执行这条新“路线”是如此的热心，以致从这一观点出发，它在左派的队伍中搜寻残余的反军

国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把他们当成危险的异端分子；而对于象法国的孟戴尔和英国的丘吉尔这些传统的反德右派，则视为实际上的同盟者而加以欢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的代言人曼努依尔斯基过去骂社会法西斯比别人都凶，现在由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代替，他是德国国会纵火案莱比锡审判的英雄，他的名字这时已成为反法西斯的战斗象征。斯大林随时随地都要表现一下他同季米特洛夫的私交，于是这位保加利亚人的领袖就经常站在他的一旁出现在各种典礼和检阅中。

斯大林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派寻求同盟是不是真诚的呢？后来1939年的事件似乎证实了这个怀疑。但是甚至在1936年时，法国赴俄军事使团的团长还写道：“俄国力图击退西方的一场风暴，而那样的风暴它感到在东方也是要发生的……它不愿介入即将出现的欧洲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它渴望象美国在1918年所做的那样，在将被无情的战争弄得衰败不堪的欧洲扮演仲裁者的角色。”^①这种观点似乎被斯大林1925年的演说所证实，当时他把苏联说成是未来战争的一个旁观者，此点那位法国将军可能是不知道的。不过，尽管有这些情况，人们还是有理由断言，在1935到1937年期间，甚至在以后的年代里，斯大林是真正为反希特勒联盟而努力的。他也是迫于大势所趋。当时，似乎每一件事都证明，德国外交中的俾斯麦传统已经完全被抛弃了。在1936年9月纽伦堡的集会上，希特勒把乌克兰和西伯利亚说成是德国的生存空间，其言辞的肯定和激烈，使人似乎感到他完全不考虑同斯大林哪怕是实行短暂的谅解。在

^① 这些话出自法国将军施威斯古特向其上级爱德华·达拉第和里昂·勃鲁姆的报告。见乔治·博内：《保卫和平，从华盛顿到奥尔赛河岸》，第124页。

这一年的末尾，轴心国的领袖又一块儿宣布了反共公约的缔结。在那整个期间，俄国和日本的边防部队时时发生冲突，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冲突。于是俄国的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似乎都笼罩了乌云。即使不是出于反法西斯的美德，也是出于自保的要求，使得斯大林要去寻求在一个巩固的联盟中的安全。^①

这时他主要还是去说服西方国家接受明确的义务，或者诱使它们去承担这种义务。在这方面，他一连遭到挫折。即使在赖伐尔下台而达拉第和勃鲁姆由人民阵线选举上台之后，苏法互助公约仍是一纸空文。对于希特勒的各种挑衅、重新武装和进军莱茵兰，法国和英国完全无动于衷，不予反击。斯大林决不会相信西方的绥靖政策是由于软弱和短视所造成的。说软弱吗？在希特勒恢复征兵制两年甚至三年之后，德国国防军还不能认为是一支严重的军事力量。象大多数政治家一样，斯大林也一直认为法国陆军由于在1914—1918年中获得了胜利的桂冠而处于登峰造极的地位；而且正如我们以后看到的，他直到1940年以前还继续作这种过高的估计。他的军事和外交顾问告诉他，在那个阶段，德国的敌手们只要以军事行动作为威胁，起码就足以暂时阻止希特勒，这话也并没有说错。说短视吗？德国大企业、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联盟并不仅仅由于要雪凡尔赛之耻，而且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它的帝国主义野心

^① 1935—1936年，红军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实现了现代化和机械化。主要的特点就是陆军从民兵制转变为正规军。图哈切夫斯基是这次改革的鼓舞者，他在1936年1月15日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报告。他的报告中精明地预见到了希特勒从事战争的方法，并特别强调来自第三帝国的危险。图哈切夫斯基有力的警告同斯大林的暧昧态度适成鲜明的对照。图哈切夫斯基报告的英译发表在《苏联（1936年）》，第389—405页。

也会随之扩大，难道这个事情还不清楚吗？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西方所以赞成绥靖政策有许多因素，其中不乏软弱和短视之处。但是，斯大林显然是不会考虑这些情况而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政治家的软弱加以原谅的。

他怀疑法国和英国默许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因为它们希望把它的矛头指向苏联，正如他自己如果可能的话，也会把这个矛头转向西方的。即使他心里认为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外交路线是由于心理和性格上的缺点造成的，而不是故意要反对苏联，但是他对此也不是完全有把握的。因此他就必须采取行动，以应付万一发生的最坏的紧急事件。不可否认，对于英法统治集团来说，即使往日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已经部分地消除了，但对同它联盟的想法还是颇为反感的；西方的某些主要政治家把纳粹主义视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可靠屏障；其中的少数人还在想把这个屏障转变为攻城槌；最后，即使在那些已经看到同苏联联盟是必需的人中，也有的认为，首先让德国同苏联干起来也许是明智和稳妥的政策。

在所有这些外交计谋、友好姿态和冷遇怠慢的后面，隐隐呈现出旧的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斯大林表现得温和与柔顺，想以此来消除西方的怀疑、恐惧和偏见。首先他要驱除过去的那个鬼怪，即世界革命那个大的鬼怪。他向一个对他问及世界革命的外国访问者声明：“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和打算。……这是一场误会的产物。”访问者打断他的话问道：“一场悲剧性的误会吗？”斯大林回答道：“不；喜剧性的，或者不如说是悲喜剧性的。”^①他的话有一半是真的。布尔什维克的确没有计划

^① 1936年3月5日《真理报》。

过输出现成的革命；他们认为，每一次革命都必须在它的本土发展和成熟；但是他们也希望去促进它的发展过程。……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这时是很难相信所有这些仅仅是喜剧性的或悲喜剧性的误会。

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对斯大林不信任，并不仅仅是根据对过去的记忆。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很难去驱除那个世界革命的鬼怪，因为他情不自禁地要去追随这个鬼怪。不论他为人民阵线提出的口号多么温和，而且“纯粹”是民主的，多末的合理合法，而且“纯粹”是爱国主义的，他却不能够消除这些“阵线”的革命潜力。不管他愿不愿意，他不得不去发展这种潜力，并利用它来谋求自己的好处。人民阵线在法国和西班牙的选举胜利，自动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情绪和信心，他们模糊地认为，这如果不是革命的前奏，也是彻底改革的前奏。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不能忽视群众的情绪。法国已被前所未见的有力的罢工、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所动摇。西班牙也处于内战的痛苦中。整个西欧都在新的社会紧张状况中艰难地爬行着。共产党的领袖们受到莫斯科的压迫，经常尽一切努力来制止目的在于引起资产阶级恐惧、挑动对法西斯的潜在同情心和煽起对苏不信任的运动和事件。但是由于一种奇怪的辩证过程，人民阵线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本来打算使资产阶级西方同苏联和解，结果却使它们更加疏远了。它们本来企图压迫本国不满意的政府同苏联结盟，但随着它们所施压力的增长，这些未来可以成为同盟的国家之间的鸿沟却更加深了。在法国和英国上层阶级的眼里，李维诺夫号召集体安全和诉诸英法自身利益，是同静坐罢工、每周四十小时工作日、高

工资以及人民阵线想从停滞的法国经济中强索的其他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的。

要想达到积极的目的，就必须实际上进行一次革命。但要引起消极的结果，即惹起反革命的反扑，只消一点点暗影就足够了。在慕尼黑协定前夕，这种反革命的反扑在法国迅速地增强了。人民阵线明显地崩溃了；苏法同盟甚至比以前更不现实。李维诺夫 1938 年 3 月告诉一个外交界的同僚说：“法国对苏联不信任，苏联对法国也不信任。”^①

西班牙内战使斯大林面临同样的两难问题。他不能不希望佛朗哥失败，这不仅因为他当时遵循反法西斯的政策，而且因为如果比利牛斯山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就很可能使法国面对德国时更加胆怯。另一方面，这次内战也充满了革命的复杂性。被武装起来保卫共和国政府的工人阶级，可能企图建立共产党的或无政府主义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象旧俄罗斯一样封建的国家里，无地的农民也可能强烈要求进行土地革命。但是如果西班牙发生了自己的“十月革命”，西欧就会更剧烈地分裂，苏联同西方达成协议的机会也就会更加渺茫。因此，共产国际训令它的西班牙成员，只限于捍卫合法的共和国政府以反对佛朗哥。没有要求他们去对工业实行社会化和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斯大林命令李维诺夫参加了由列昂·勃鲁姆发起的不干涉委员会；而且在一个相当时期中，苏联的确以不干涉西班牙事务而惹人注目。^①

^① 约瑟夫·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第 189 页。

^② G·M·盖索恩—哈迪：《1920—1939 年国际情况简史》，第 430—432 页；
雅克·莫兰：《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 131、145 页。

但是，斯大林没有能够坚持住这一态度。这是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进行了干预，而光是这一点就使这位左派的保护者很难继续保持超然立场。于是他也进行了干预，而且通过法国共产党敦促法国也遵循他的榜样。他起码的希望是，如果法国进行干预，就会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因害怕而从西班牙缩回手去。但是他也还有更大的打算。如果西方民主国家进行干预，它们就将在明确的反德军事义务上大大前进一步。西班牙现在是欧洲的一个射击场，甚至可能会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头一个实际的战场。西方各国政府正是由于害怕西班牙战争可能成为世界性冲突的前奏，或者由于不愿帮助人民阵线去击败佛朗哥，或者由于这两个共同的原因，一直坚持不干预，即使由于它们的无所作为而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得利也在所不惜。结果，在不干涉委员会中对西班牙问题不断地进行扯皮，大大恶化了苏、英、法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陷入这样一些矛盾之中，就使他从克里姆林宫中指挥一场西班牙内战中的内战。西班牙的极端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共产党人不革命的策略非常恼火。在加泰隆尼亚区，一个名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半托洛茨基党企图在斗争中实行更为激进的社会改革。斯大林对于这些左派中的非正统分子实行镇压。他以出售苏联军火给共和国政府为条件，要求共和国行政当局消灭这些人。他除了派遣军事教官外，还派遣了政治警察的代理人和清洗异端的专家到西班牙，在共和派队伍中建立了恐怖统治。仿佛是为了特别强调一下这种工作的荒唐古怪，他派了1917年的英雄和前托洛茨基分子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去负责加泰隆尼亚这个“异端”堡垒的清洗工作；

而在安东诺夫—奥夫申科从西班牙返回之后，又清洗了他本人。所有这些行动的主要动机就是，斯大林想要为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保持共和派的体面，并避免引起英法政府的反感。结果他没有保持住谁的体面，但却引起所有人的反感。西方保守的舆论界对于西班牙左派自相残杀的斗争不感兴趣，又为斯大林政策的诡谲而困惑不解，因而责备斯大林是革命的主要煽动者。

为什么苏联外交信誉在慕尼黑协定以前如此猛烈地下降，这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莫斯科清洗的影响，而这是无法掩饰的事情。1936年，英法的将军们曾参加了红军的演习，他们对于红军的技术装备和军事素质，整个来说是有很好印象的。^①清洗却不可避免地同这种印象相抵触。这些清洗看起来就象苏联这座大厦发生了不吉利的裂痕。不管西方的政治家和军方人士相不相信指控被告们的那些罪行，他们的结论不能不贬低苏联作为盟友的价值。如果这样多的著名政治家、行政官员和军方人士已经在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可怕的第五纵队，那末就应该问一问：能够发生这样事情的国家，其民心士气究竟是怎样的？如果这些指控是伪造的，那末耽于这种作法的政权岂不是从头到脚地腐烂了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问题还不是那样的简单；但从局外人来看，情况就是如此，而这些局外人的看法并不是完全错误的。清洗对于红军和整个苏联行政机构的确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也还没有惨重到使它不能慢慢地、代价很大地和可靠地恢复起来，虽然为了这种恢复，需要一种十分反常的力量从外部来加以刺激；而希特勒的入侵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刺激。

^① 陆军中将吉法德·马特尔爵士：《俄国人的观点》，第13—33页。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当德国的扩张最具有爆炸性的时候，苏联却在国际舞台上几乎完全被孤立了。慕尼黑危机使这一孤立更加突出和更加不能忍耐。在整个危机中，斯大林就象他在这种时候所一贯做的那样，保持着不安的沉默。他感到惊恐和切肤之痛。几个月后他说道：“可以设想，他们把捷克斯洛伐克各区奉送给德国人，作为德国人负责对苏开战的代价。”^①为什么张伯伦和达拉第自觉自愿地去帮助希特勒分割捷克斯洛伐克，他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不仅关于集体安全的一切谈论现在都已成为笑话；不仅国际联盟（俄国是它的委员会的常委）被绕过和忽视了；不仅苏联被同它没有正式盟约的英国所冷遇；而且法国在众目睽睽之下实际上等于撕毁了它同苏联的同盟。苏联同法国、法国同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盟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法国和苏联承担了武装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但是只有在法国已经采取军事行动之后，苏联才有义务进入战争。法国忽视了它的盟友的利益和自尊，把它未来的敌人看成了实际的盟友，而把它名义上的盟友几乎看成了敌人，这就使得苏联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斯大林当时可能用《斯基台人》中的话对自己说：“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也能背信弃义”。）当然，正式说来，英国对苏联或捷克斯洛伐克都没有什么义务；但是慕尼黑交易的发起者是张伯伦而不是达拉第，因此英国也遭到了侮辱和伤害。

在危机中间，斯大林命令李维诺夫告诉捷克人，苏联准备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667页。

参加战争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法国也履行它自己义务的话。波兰人受到警告说，如果他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将犯下敌视苏联的罪行。这就是说，由于法国失信于人，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苏联也就勿须保持自己的诺言，但它却没有失信于人。后来波兰人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但莫斯科却告诉他们说，他们并没有犯下任何敌视苏联的罪行。这就再次产生了这一问题：斯大林究竟是不是真地准备在1938年做他在1939年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会不会执行李维诺夫在那关键的时刻一再向捷克人提出的保证？如果西方当时就进入战争，斯大林会不会依然要退出这个盟约？研究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可以去作这样的推测，但却无法知道1938年9月时斯大林内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如果根据他当时的行动来判断，他是无可责备的。一直到最后，他还表示准备进行战斗，颇有一点英勇士兵的风度，好象只是由于不合时宜的停火才使他未能大显身手——不过这一次并没有真正开起火来。情况很可能是，斯大林在慕尼黑协定以前和以后心情不一样。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割改变了东欧力量的均势，对苏联十分不利。在斯大林看来，1939年的危险性要比1938年为大。他对西方企图让德国进攻苏联的怀疑也比那时为强。因此相应地，他也就想抛弃西方了。

慕尼黑协定中有一条没有写成文的原则，就是要把苏联排斥在欧洲以外。不仅是西方的一些强大的和表面上强大的国家希望排斥苏联；东欧一些小国的政府也对这只巨熊发出尖叫说：“呆在你那儿，呆在你的窝里。”在慕尼黑协定前的一些时候，当法国和苏联正在讨论采取联合行动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时，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就断然拒绝同意苏联军队通过国境去援助

捷克斯洛伐克。它们所以拒绝红军的过境权，不仅因为它们害怕共产主义，而且还因为它们要讨好希特勒。在许多事件中，有一件事颇具特色，它向斯大林表明了这些政府的思想。这就是在慕尼黑协定前不久，有六架苏联飞机经由罗马尼亚上空飞往捷克斯洛伐克，虽然苏联人遵守一切飞行规则，仍然引起首先是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的抗议，然后又是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的抗议。^①象这样的侮辱和闲言碎语还很多，很长时间以后犹闻怨恨之声。

必定是在慕尼黑协定之后不久，斯大林的心中就形成了同德国重新修好的想法。这时，慕尼黑协定炮制者所抱的巨大和平希望已经迅速地成为泡影。显然，希特勒这时正想避免分散兵力，并把它集结起来，以便或者反对西方，或者反对东方。这正是斯大林试图去影响希特勒决定的大好时机。但是任何主动的行动都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希特勒拒绝，就会使苏联作为反法西斯联盟倡导者的声誉受到损害，而自己却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就会使英法政府有了口实，让希特勒在东方自由活动。斯大林行将处理的这个任务需要很大的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他不得不暂时随着猎狗追逐兔子，但又要小心地不使兔子注意到他在猎狗之中。当然，他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去试探一下希特勒，但是这看来不很可靠。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冯·舒伦堡伯爵是一个俾斯麦派的外交家，赞成俄德合作；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德国外交部，更不用说代表希特勒本人了。苏联驻柏林的大使梅利卡洛夫是一个三流的外交人员，几乎难以接近第三帝国中有影响的人物。除此之外，也可

^① 乔治·博内：《保卫和平——从华盛顿到奥尔赛河岸》，第121—140页。

以秘密地交换信件，但这可能招致危险的后果。于是斯大林相当精明地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他本人在公开的场合作出含蓄的但却是容易识出的主动表示。

在间隔了四年之后，1939年3月1日召开了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这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作为总书记通常是要回顾一下前四年国内和国际的情况的。他的报告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事项，肯定会被国外十分注意地听取，以防错过外交方面的重要暗示。另一方面，在总书记的例行报告中仿佛是顺便地提出含蓄的主动表示，这肯定要比用其他办法提出来显得不那么张扬。3月10日，斯大林向大会作了报告，其中谈及国际形势的部分是含糊其词的稀有杰作。

他说：“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次战争是在从上海到直布罗陀的广大地区上进行的，它席卷了五亿多人口。”^①“新的帝国主义大战”一词隐约地暗示，他把未来的一切交战国都看成帝国主义，苏联应该同它们划清界线。他接着指出了正在到来的萧条和战争的关系。但是后面他又直截了当地把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称为“侵略国家”，并且说它们很快就会为了逃脱严重的萧条而进行世界大战。他在详细阐述外交的经济背景时，强调了美国和英国在经济上和军事潜力上的优势。他讲话中的现实主义不仅在于正确地估计了各种实力，而且还在于他不言而喻地假定美国最终会参加战争。这个假定当时看来似乎还是牵强的。接着他就直率地攻击了西方的绥靖政策说：“正在进行战争的侵略国，从各方面损害非侵略国的利益，首先是英国、法国、美国的利益，而英国、法国、美国却一再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658页。

后退，接连向侵略者让步。”在一段推理严密的论点中，他分析了绥靖主义者的动机，这就是他们害怕革命，想在侵略者和牺牲者之间持中立立场，想让德国和苏联“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它们相当疲惫时，自己就以充沛的力量出台活动……并迫使那些精疲力尽的交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真是价廉物美呵！”^①他的演说尽管进行了尖刻的批评，但听起来仍然象李维诺夫对于集体安全的呼吁。演说中暗示，俄国不愿单枪匹马地进行战斗，而愿参加一个广泛的反纳粹联盟。但是接着他又把话锋突然一转说，即使西方想煽动苏联去反对德国，苏德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没有来由的。他用极其挖苦的语言讽刺那些西方的纳粹友人，他们想引诱第三帝国去进攻苏联，但纳粹领袖们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他暗示，负责的纳粹领袖们是不在那些梦想征服乌克兰的“德国疯子”之列的，对于那些疯子，俄国会找到“必要数量的拘束衣”。他最后列举了他的对外政策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却是彼此不相容的。他要求苏联同所有国家加强事务联系，即使他曾亲口强调说，正常事务联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他要求苏联改善同所有邻国的关系，只要它们不“直接或间接地”反对它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神圣的利己主义原则。同时，他还保证苏联支持受纳粹侵略的一切牺牲者。这样，他就使尽了一切方法。他要求法国、英国和美国对侵略者采取坚决行动，并公开地反对绥靖主义；他要求侵略者让苏联保持和平，并暗示说，如果它们这样做了以后，他本人就会提出自己的绥靖主义版本，即可以同张伯伦比美的慕尼黑协定。他的论点中是非常强调反纳粹这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665—666页。

个主题的，因而这种绥靖主义的试探气球就很难令人理解。他仍然极力希望把同英法达成协议的门大开，而另一道里宾特洛甫终于走进去的门只是半开半闭。一星期以后，他伸出了触角，命令李维诺夫谴责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并宣称苏联不会承认这个纳粹的保护国。

我们在这儿只叙述一下后来几个月发生的精彩场面。3月18日，即李维诺夫谴责纳粹占领布拉格的那一天，英国外交部要求苏联答复，如果罗马尼亚成为侵略的牺牲品时，苏联将采取什么态度。莫斯科建议由英国、法国、罗马尼亚、波兰、土耳其和苏联一起举行会议，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会议就等于一个反德联盟，而苏联将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要领袖。张伯伦甚至拒绝考虑这个建议。^①几天以后，张伯伦宣布英波互助条约，紧接着英国又宣布保证罗马尼亚和希腊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只是在英国违反了自己的传统而对东欧承担了义务以后，它的外交才稍稍接近了世界那个部分最强大的一个国家。4月15日，苏联被问道，它同不同意保证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境不受侵犯。这将是“一种单方面的保证”。这头熊仍然被要求呆在它的窝里，但它也被要求按照可能需要它帮助的小邻国的意愿，招之即来，挥之则去。

4月17日，斯大林从相反的方向采取了两个外交行动。他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第273页；L·B·纳米埃：《外交前奏曲》，第83页；《外交史》，第3卷，第673页。纳粹占领奥地利后，莫斯科提出类似的建议，但也遭到拒绝。

拒绝根据英国的命令单方面地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承担义务。他反过来建议英法苏之间缔结同盟和军事协定，然后三国共同保证去帮助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一切国家反对侵略。但是，同一天，苏联驻柏林大使梅里卡洛夫在德国外交部进行日常事务时，小心地提出了苏德恢复友好关系的问题。斯大林注视着这两个行动的反应。从巴黎和伦敦来的反应是完全令人失望的。西方国家看来是希望把苏联作为一个后备的盟友，而决心避免同它正式结盟；如果不行，也不让它在联盟的形成中具有任何真正的影响。它们把波兰的军事实力看得同苏联的一样高（如果不是更高的话）。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国家再次大声地宣称，它们不需要同邻国结盟。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府担心，斯大林要求在它们的国土上自由地进行军事行动，就意味着对它们的独立的威胁。这种威胁后来证明的确是真实的；但是斯大林也的确有很充分的理由：如果不允许他防卫从波罗的海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通道，那就不能指望他免遭战争的风险。波兰政府说，它不需要结盟，因为万一战争爆发，波兰军队完全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土，勿需红军开来救援。西方国家政府指出苏联的小邻国的反对意见，拒绝了苏联的建议。斯大林认为，它们提到波罗的海国家的反对，这只不过是个借口；他认为，西方国家如果愿意同苏联结盟，就会克服或不顾那些反对意见。他感觉到，此时他从伦敦和巴黎只会受到侮辱和阻碍而别无其他。

正在这个时候，他投到施普来河^①中的网似乎被某种东西触动了。4月28日，希特勒发表了一篇以战争威胁波兰的狂暴演说。他一反常例，对苏联没有谈到一句不友好的话。他的报

^① 流经柏林西北的一条河。——译者

纸也没有再发表一贯的反布尔什维克的长篇大论。到了4月底，斯大林对于同德国和解的机会逐渐充满了希望，但是他仍然不敢冒险同法英决裂。5月3日，他撤换了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李维诺夫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倾向西方；接替他的是莫洛托夫，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布尔什维克，而且是一个“雅利安人”，比较适合于同纳粹作最后的谈判，斯大林对他也比对李维诺夫更加信任。

5月19日，英国首相在下院谈了一些特别轻视苏联的话。^①第二天，即5月20日，莫洛托夫就受命于斯大林，同冯·舒伦堡伯爵建立了接触。德国人曾经表示希望恢复以前破裂了的贸易谈判。关于这件事，莫洛托夫说：首先必须创造这类谈判的“政治基础”。这位德国大使企图诱使莫洛托夫说出真正的想法，但没有成功。他向柏林报告说：“莫洛托夫先生显然决心只谈到这些而不多说一句话。他是态度固执著称的。”^②显然，

① 就在那一天，劳合·乔治对张伯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指出，就象1914年一样，西方国家要同德国开战，没有俄国不行。张伯伦驳斥这一类比说：“在那个时候（1914年），俄国和德国有共同的边界，波兰还不存在，如果我们要卷入战争，那么在德国边界上有一个巨大而有力的国家，而且根据协议它将给我们一切支援和它能够给予的帮助，这当然是令人满意的。……这次如果让苏联直接参与，就将完全不符合某些国家的愿望，而正是为了这些国家的利益并代表了它们，才作出这样一些安排的。”在同一辩论中，丘吉尔要求政府“根据俄国苏维埃政府提议的广泛而简单的形式”同它缔结一个条约。他说：“如果你们准备在战争中成为俄国的盟友，……那么当现在成为它的盟友就能防止战争爆发时，你们为什么又不愿成为它的盟友呢？我不明白这些外交上的奥妙和拖延不决的原因，……”（L·B·纳米埃：《外交前奏曲》，第167—169页。）如果丘吉尔都不明白那些“奥妙”，那就勿怪斯大林把它们视为阴险的了。

②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5—7页。

这是斯大林命令莫洛托夫“只谈到这些而不多说一句话”的。^①斯大林既然已经走了第一步，他就期望希特勒来走第二步。但是希特勒也还不愿意约束住自己。这时，斯大林只允许一个无名的官员，即俄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参赞格奥尔格·阿斯塔霍夫对德国外交部更加自由地进行试探，并说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话。万一失败，斯大林能够很容易地拒绝为阿斯塔霍夫承担责任，而使他成为替罪羊。斯大林小心谨慎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召回了驻柏林的大使梅利卡洛夫，并使他整个春夏都没有返任。大使的长期离任是有双重好处的：一方面它使莫斯科对阿斯塔霍夫的接触比较少地负正式责任；另一方面又可掩护这些试探的真实意义。

到了六月底，斯大林的策略无论在柏林还是在伦敦和巴黎表面上都陷于停滞状态。几个首都都表现出不信任，都在拖延时间以观变化。但是在这场默默进行的多方面的神经考验中，希特勒的神经似乎首先受不住了。通过齐亚诺这条迂回的途径，斯大林得知德国准备转变为亲苏态度。他还不知道，里宾特洛甫正在急不可耐地要求他的驻莫斯科大使让俄国人亮出底牌。大使半含歉意地说：“我们无法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拽过勃兰登堡门。”^②到了7月22日，战争的阴云已经低垂在波兰上空时，苏联人最后同意进行贸易谈判，不再坚持首先建立“政治基础”。但是三天以后，伦敦和巴黎最后同意派遣军事使团到莫斯科去。斯大林的两面派政策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他继续努力要确保

① 在会谈的最后阶段，无论是莫洛托夫还是米高扬（前者当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后者任外贸部长，两人均为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向他们的德国对手隐瞒这样的事实：他们谈判的每一细节都向斯大林汇报，所有的决定都是斯大林作出的。（《纳粹和苏联关系》，第86页和134页。）

②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31页。

他的侧翼。他仍使前门为英法开着，而只限于在后门同德国进行接触。他选派了最重要的军队首脑、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去同西方军事使团会谈。同纳粹接触的担子主要仍由阿斯塔霍夫去承担。

甚至到了现在，关于这些事件的许多文件已经发表，仍然不能确有把握地说，斯大林当时特别看重哪一方面：是在前台进行的密谋，还是他在朦胧的后台中正在进行的微妙的反密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西方国家的政府曾经想把他驱赶去同希特勒相撞，那么它们现在要比以前困难得多。英法军事使团动身就延误了宝贵的十一天，他们乘坐一条最慢的船，在路上又多花了五天。当使团到达莫斯科时，它的信任状和权限又是不清楚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几乎是在希特勒的颐指气使下屈尊地把首相和总理派往慕尼黑去，却拒绝派出任何有名望的部级官员去同苏联谈判联盟的事情。它们派往苏联进行军事谈判的军人，其地位比派往波兰和土耳其的都要低。^①如果斯大林曾经打算结成联盟，那么他所受到的有意怠慢就会使他放弃这种打算。相反，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同希特勒和解，而他同西方国家进行谈判只是为了得到一个道义上的借口，好把吹嘘已久的大规模反纳粹联盟流产的责任归罪于英法，那么英法恰恰以莫明其妙热心而毫无代价地提供给他这种借口。

在1939年初夏，他很可能还没有下定决心。他的那个老的想法，即最好使苏联免于战争，肯定已经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对他来说，最好莫过于首先作为一个旁观者，然后在这场即将来临的竞争中充当仲裁人。只有同希特勒进行交易，他才能够

^① L·B·纳米埃：《外交前奏曲》，第188—189页。

实现这一野心，因为如果同西方联盟，从战争一开始，苏联就有义务参加战斗。由于这种考虑，使斯大林有意于去同他的主要敌人寻求和解。但是希特勒也愿意做这个买卖吗？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尚未得到答案。一直到了七月底，事情的进展实际上还没有超过模模糊糊的试探，即没有超过早春所达到的阶段。从那时以后，还没有采取任何一个特别的行动来准备苏德之间的协定。情况既然如此，斯大林在另一方面也必定担心，他不仅不能使苏联免于战争，而且还可能使它被孤立于西方之外，成为德国侵略的下一个牺牲者。诚然，在苏联和德国之间还有波兰，它是希特勒直接威胁的目标；而且西方已经承担帮助波兰的义务。但是，正如斯大林后来告诉丘吉尔的，他认为，西方国家可能抛弃波兰，就象它们曾经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到了那时，德国和苏联就会直接相撞。^①要防止这种情况，唯一的保证毕竟还是同西方国家联盟。他虽然一方面想同希特勒搞买卖，但鉴于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所以他很可能仍然准备着同首先走向前来抓住他的手的人进行合作。如果西方国家提出的条件容许苏联在联盟中起到他认为应起的作用，那么他是可能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在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前不到三个星期，舒伦堡向柏林报告说：“我的总印象是，苏联政府当前已经决心同英法签订协定，只要英法满足它所有的愿望。”^②

八月下半月，事情急转直下。希特勒明白无误地开始追求斯大林的友谊。这位追求者的迫切之情与日俱增。阿斯塔霍夫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305页。

^②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41页。

报告了德国外交部急不可待地要同苏联寻求友好解决办法。8月3日，舒伦堡给莫洛托夫转去里宾特洛甫的一封信，其中差不多声明放弃反共公约，并答应“尊重苏联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利益”。^①斯大林到这时才下了决心。他毕竟能使苏联免于战争了。但是，他还不急于抓住希特勒伸出来的手。他的答复仍然是：

如果你的确爱我，那就忠实地宣布吧：
但如果你认为我太容易征服，
我会为此不高兴和闹别扭而向你说声不，
所以你应该苦苦地追求……

莫洛托夫摇着头严肃地告诉舒伦堡说，他还没有看到德国的内心有什么变化。他反对德国的一项建议，即在将要签订的贸易协定文本上加入一段关于苏德友好的开场白；他继续给舒伦堡明确的暗示，德国侵略波兰是犯罪的。^②里宾特洛甫这时真地已经急不可待，谋求同斯大林会见。他起初遭到搪塞；后来斯大林让莫洛托夫答复舒伦堡一再提出的要求，总是说要会见希特勒的这位特使，需要“长时间的准备”。这位外交上的贱民这时终于受到那个使欧洲颤抖的人的巴结。

斯大林最后决定不再“不高兴和闹别扭”的时间，我们能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39—41页。

^② 同上书，第41、47页。

够颇为准确地指出来，那就是8月19日下午三点一刻。在这一天下午的早些时候，舒伦堡再次请求莫洛托夫为他的部长的拜会确定一个日期。莫洛托夫对于这位大使的提议“无动于衷”，再次说，“由于需要进行彻底的准备，甚至大约确定一个拜会的时期也是不可能的。”里宾特洛甫也抱怨说，到了这种程度，无论如何也要让他去碰碰运气。莫洛托夫在下午三时同德国大使分手，并立即把谈话情况向斯大林报告。只是到了这时，斯大林才命令莫洛托夫立即召回舒伦堡，交给他一份条约草本，并告诉他，斯大林准备在大约一周内接见里宾特洛甫。下午三点半，莫洛托夫再次同德国大使接触。第二天，希特勒亲自请求斯大林提前两三天接见他的特使。^①这时战争指日可待，已经十分临近了。斯大林同意了希特勒的请求。这还是两人第一次交换私人函电。希特勒的电文中充满了虚夸和自负。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长期政策”、“过去的几个世纪”，等等。即使当他认为要对斯大林显出政治家风度的时候，也禁不住要对波兰发出街头演说式的歇斯底里恐吓。他大量地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我接受”，“我欢迎”，“我的部长”，“我以为”。斯大林的答复不亢不卑，简洁明了，说理冷静，而且几乎是无人称的：“……苏联政府授权我通知您，它同意冯·里宾特洛甫先生于8月23日到达莫斯科。”^②

8月23日黄昏和深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两次会谈，双方讨论和解决了共同关心的一些主要问题，签署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和一个“秘密的附加议定书”。在条约中，它们彼此承担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65—67页。

^② 同上书，第69页。

了严格中立的义务，如果其中一方卷入战争的话。这个文件中没有包括友好的保证，除了两国政府保证“通过友好地交换意见”解决双方争端。斯大林丝毫不怀疑，这个条约立即就使希特勒摆脱了两线作战的梦魇，以致最后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他，斯大林倒是问心无愧的。在他看来，战争是无论如何不能避免的，即使他不同希特勒搞交易，战争或迟或早也是要爆发的，而且是在对他的国家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爆发的。他不认为自己是放火的人，因为是希特勒在世界上点起火来的。他，斯大林只不过是把战火从苏联引开而已。正如后来事情所表明的，他期望波兰能够抵抗得更久一些，但不怀疑波兰最终将会屈服，而且西方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给它以有效的帮助。^①因此他看到了德国可能进攻苏联的出发点已经东移数百英里了。正如他已经看到的，他的任务就是减少这种变化中充满着的风险；而要减少这种风险，他只能参与对波兰的支解。这是在“秘密议定书”中安排了的。这样，他到了这个时候就要抛弃所喜爱的外交原则——“我们不需要别人的一寸土地”。

苏联领土扩张的时代于是就开始了。斯大林眼前的动机就是寻求安全，这多少同十八世纪沙皇们的情况相同，当时沙皇们害怕普鲁士军国主义国家的成长，三次参加对波兰的瓜分。这一次是第四次的瓜分，苏联起初分得了沿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以西的整片领土。它的界标一直插到维斯杜拉河东岸的华沙城郊。秘密议定书还把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置

^① 斯大林在三年以后告诉丘吉尔说：“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如果波兰遭到进攻，英法政府没有决心进入战争，但是它们希望，只要英法俄在外交上站在一起，就能威慑住希特勒。我们肯定这是不可能的事。”（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305页。）

于苏联“势力范围”之下，而使立陶宛留在德国一边。苏联因此为它十分暴露的第二首都列宁格勒获得了防御的缓冲地带。在南面，苏联重新合并比萨拉比亚的权利得到承认，德国宣称，它对巴尔干“在政治上没有兴趣”^①。这个秘密议定书的措词是模棱两可的，因为正如里宾特洛甫后来解释的，双方充满了不信任，而且担心被泄露和受讹诈。^②没有说清楚“势力范围”是什么意思，不过它理所当然地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控制，也包括明明白白的占领。巴尔干国家的命运甚至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在这个阶段，斯大林是可以对巴尔干提出自己的条件的，希特勒当时急于得到自由行动的权利，对别的民族的土地是非常慷慨的。但是，斯大林只是按照眼前的安全动机而行动，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追求领土的扩张；由于德国没有在巴尔干行动，他也就按兵不动了。例外的情况是讲俄语的比萨拉比亚，它在革命期间被罗马尼亚吞并，莫斯科从未予以承认。

斯大林对于战争是怎样想的？他认为同希特勒的协议有多大的巩固性？人们还不知道，在那个阶段他是不是回溯了亚历山大一世同拿破仑结成同盟的历史先例（1941年以后他经常提到这个先例）。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仿佛使人感到他是老在考虑那个先例的。现在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提尔西特和约，虽然还不象他那位戴皇冠的先驱那样，同他的对手在固定于河上的木筏上会谈。^③提尔西特和约以后，亚历山大有了四年的喘息时间，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157—158页。

③ 1807年，俄国被法国打败，沙皇亚历山大同拿破仑在提尔西特的一条河上签订了和约，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们“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译者

只是在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之后，他才同拿破仑发生冲突。在希特勒1941年6月使斯大林大失所望以前，斯大林每采取一个步骤，都希望能使冲突延缓同样长的一段时间。他肯定是不怎么相信希特勒会获胜的。他现在的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实行他的经济计划，增强苏联的力量，然后当交战各国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把这种力量投入天平。①

他的这种观点，甚至可以从他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中加以推断。关于这方面，我们只有里宾特洛甫的记录，它是很不完整的，而且有些地方可能有歪曲，但是它毕竟还是再现了符合斯大林性格的形象。苏联方面没有发表任何材料，当然就会急急忙忙地出来指出里宾特洛甫记录中的公然歪曲之处。②

斯大林和希特勒特使彼此以一种和解了的敌人的华而不实的腔调在交谈；他们在长时期的敌对之后，又要尽力掩饰自己，故而显得过分的热诚。其中的一人仿佛在说，“告诉我，你过去在一些场合中想对我搞什么鬼把戏？我也会告诉你一些你感兴趣的内幕消息。”这两个和解了的敌人假装愉快，尽情地喝酒和纵声地大笑，但是每人都很警觉，唯恐说走了嘴，泄露了什么重要的情报，或作出了不合时宜的动议。除了他们行将成交的

① 斯大林在三月间的代表大会上说：“最后，为此还需要时间。是的，同志们，需要时间。必需建设新的工厂，必须培养新的工业干部，但是，为此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少的时间。在两三年内是不可能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列宁主义问题》，第675页）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代表大会上谈及俄国的经济成就时，都是比较冷静和节制的，同早先的过分乐观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新的调子是用来间接证明外交政策上的极端谨慎。

② 只要一有可能，本书作者就对莫斯科这次外交事件的各种说法进行核对（如《纳粹和苏联关系》中叙述的），并对卷入这一事件的一些主要的外交领导人进行研究。

买卖外，还彼此答应给予无穷的友好帮助，但是所有的允诺都不会兑现的。

这的确就是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之间的友好闲谈。里宾特洛甫说，英国人已经花了五百万英镑去贿赂土耳其的政客们。斯大林插嘴说，哦，我能向你保证，他们花得比这个数目还要多。接着话题转到了反共公约。斯大林虚张声势地说，只有伦敦城和一小撮商人才对此感到兴奋。里宾特洛甫变得更随便了，他说，你知道，英国有人说您不久也要参加反共公约了。针尖对麦芒，笑话接着俏皮话。斯大林时不时地暗示，他仍然认为希特勒是侵略者，而且虽然希特勒需要战争，但德国人民却需要和平。斯大林对在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使团作了“不满意的评论”。这个使团刚刚由于他同希特勒的条约而大吃一惊，显然对于自己遭到的烦恼和屈辱还没有回过味来。但是斯大林没有告诉里宾特洛甫关于他同英法长期谈判的任何内容，也没有给他提供同军事使团交换而来的任何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情报。他搪塞里宾特洛甫说，英国使团“从未告诉苏联政府它的真正意图”。接着，里宾特洛甫再次提出他自己和元首关于帮助日本和苏联实现缓和的建议，斯大林对此只说，他作为一个高加索人，比里宾特洛甫更了解亚洲人。^①（我们很快又要听到斯大林说这句具有特色的话：“我是一个亚洲人。”）里宾特洛甫还有另一个进行“友好帮助”的计划。他受希特勒的指示，告诉斯大林，德国对伊斯坦布尔和波斯普鲁斯海峡没有兴趣。但是，虽然讨论了土耳其问题，却未提到伊斯坦布尔和波斯普鲁斯海峡，显然这是因为斯大林同希特勒的愿望相反，对这一问题还没有什么兴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251页。

趣。当这位特使抱怨土耳其人不可信赖时，他仅点头表示同意。

他想引里宾特洛甫说出意大利的军事计划，但没有得到什么启示。谈话于是转向英国和法国。斯大林评论了英国军备不足，并发泄了对英国的反感：“如果英国统治了这个世界……这是由于别的国家的愚蠢，它们总是让自己被吓住。比如，几百个英国人就统治了印度，这是很荒谬的”；但是他接着说，“尽管有弱点，英国将狡猾地和顽固地进行战争”，这种观点显然是这位纳粹外交部长所不同意的。^①里宾特洛甫也不同意斯大林对法国军队的高度评价。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斯大林政策的一个主要前提和主要错误：他期望英法能够长期地抵抗住德国；他正确地估计到了英国在军事上的弱点和它进行战斗的决心；但他过高估计了法国的军事实力，过低估计了德国的打击力量。他决没有想到，在他同希特勒的条约签订两周年时，他会用“打倒德国侵略者”的口号来迎接它。

斯大林的第一个、但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失算在九月初就已经露其端倪了。他对波兰武装抵抗的迅速崩溃感到吃惊。9月5日，里宾特洛甫开始催促苏联人向他们分得的那部分波兰领土进军，但斯大林还没有准备好发出进军的命令。^②他这时有些迟疑不决，并重新进行思考。他不会公开地援助正在被击败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72—76页。

② 同上书，第91页。在波兰问题上的错误几乎是一种通行的毛病，反映了在两次大战之间流行的对国际力量标准的一种错觉。当德国被解除武装和苏联被半解除武装的时候，对波兰军队的重要性自然就过分地夸大了。但是甚至在力量的真正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之后，这种对力量标准的错觉仍在盛行。

的波兰，但毫无疑问，他也拒绝在波兰崩溃前开始动手。他重新考虑的是如何在苏联分得的那部分同波兰族聚居部分划一条分界线。这时他还无意对这部分进行吞并，因为那会公然违背布尔什维克政策所公认的原则。他这时宁愿把这条分界线划得更东一些，即从维斯杜拉河到布格河，以便使俄国分得的那部分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把这些地区同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重新结合起来，在政治上是有道理的。①它使红军能够名正言顺地开过国境，不是作为波兰的征服者，而是作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解放者。他这时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称为“血缘兄弟”，已经染上了他的纳粹对手所散布的种族主义细菌了。当斯大林迟迟不动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就开始讹诈他说，波兰东部会产生政治“真空”，一些“新国家”可能出现。②这些“新国家”可能由反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领导。希特勒还反对斯大林提出的一项公报，其中说，红军越过边界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免遭纳粹的侵略。这时，斯大林看到德军已经在波兰东部采取行动，心里十分焦急；他要求德国大使保证德军从那里撤走。③有一个短时期中，他反复考虑过是否成立一个残余的波兰国。后来他放弃

① 波兰是根据1921年里加和约得到这些土地的。边界两边的人一直希望把所有乌克兰的土地重新结合起来。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努力想从俄国和波兰两方面都获得重新结合和独立。在主张波兰“向东进军”的农民中很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主张在苏联之下重新结合，甚至在那些对斯大林同希特勒搞交易感到不安的共产党人中，重新结合所有乌克兰土地的主张也是很得人心的。直到1939年夏，托洛茨基还写道：“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正准备永远把西乌克兰放弃给波兰，以换取外交上的盟约。”（《反对派公报》，第77—78期。）

②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93—94页。

③ 同上书，第98页。

了这个想法，发布了红军的进军命令。

九月底，里宾特洛甫再次来到克里姆林宫，终夜欢宴，并听取斯大林重新考虑后的看法。后来做成了一笔新的买卖：德国保留波兰民族居住的整个波兰，立陶宛则划归苏联。

斯大林对于希特勒在波兰的闪电式胜利获得深刻的印象，从而失去了大部分的自信心。西方从事的那场莫明其妙的战争^①使他忧心忡忡：英法借战是不是为了鼓励希特勒去进攻俄国？这时该他来向希特勒献殷情了。结果在互不侵犯条约上又补充了一个友好条约，它宣称，苏德特有的任务是在波兰“重新建立和平和秩序”，并“保证当地人民过同他们民族性格相符的和平生活”。^②西方国家对德国和苏联的获得物是无权争议的。斯大林已经抛弃了冷静的保留态度。在全世界面前，他已承担起纳粹占领波兰时所实行的恐怖政策的共同责任。他不仅表现为希特勒在买卖上的伙伴，而且就是他的共谋犯。一项特别的秘密议定书中规定，双方政府有义务携手镇压波兰人恢复波兰独立的宣传。^③达到登峰造极的是一项联合声明，它呼吁立即实现和平，并把继续战争的责任转嫁给英国和法国。^④在给希特勒“和平攻势”以支持方面，没有人比斯大林更伪善的了。因为这时谁都比不上斯大林那样热心地祈求战争的延长，如果西方这时缔结停战协定并默认德国对波兰的征服，希特勒很可能在1940年夏季就进攻苏联了。

① 波兰战败后的七个月期间，英法同德国不战不和，故被人称为“莫明其妙的战争”（有译为“假战争”的）。——译者

②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105页。

③ 同上书，第107页。

④ 同上书，第108页。

这种装假已经成为1941年6月以前斯大林对待希特勒的特点了：他对那位元首越不信任和越恐惧他的侵略，他就越大声地和虚夸地宣称他的友谊。一旦希特勒的部队似乎在远离苏联边界的地方被阻止住，他的谈话就变得不那么友好，态度也就变得更僵硬了。在这场交易中，双方都是有得有失的，斯大林当然是要尽可能地少失而多得。苏联供应德国谷物和原料，而从德国得到机器和机床。条约缔结之后，斯大林头一件事就是派遣各种军事使团到德国去。这些使团贪婪地想趁第一阵友好的高潮去刺探德国的战争工厂，以致使得戈林、凯特尔和雷德尔在十月初就抱怨这些使团“过分好奇”。^①后来不久，纳粹的经济领导人也抱怨说，俄国人要太多的机床去生产大炮，而且还要太多别的战争物资。

波兰战争刚一结束，斯大林就不安地看着苏联和德国之间那一块广大的无人防守的土地。事实上，自8月以后，波罗的海各国已经不再是无人防守的土地了。9月和10月，苏联军队已经驻守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国家仍然保留旧制度和政府；斯大林的行动好象是只为了确保战略基地而无其他目的。这时他头一次暴露出对巴尔干国家的短暂忧虑，这倒是一片真正无人防守的土地。10月，莫洛托夫要求保加利亚同苏联结盟，保加利亚拒绝了，斯大林也没有追问这件事。这时他的注意力正被同芬兰的麻烦冲突所吸引住。芬兰拒绝让给苏联防御列宁格勒所必需的战略基地，也不愿把自己看成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苏芬战争在1939年11月30日爆发。迫使斯大林从事这场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127页。

战争的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是历史开的一次恶毒玩笑，因为正是他本人在十月革命后第一个月宣布芬兰独立的。芬兰人这时竭尽全力地进行保卫战，起初他们获得了重要的胜利。这一方面要归因于气候的反常，一方面也要归咎于因最近的清洗而使苏联的指挥部削弱了。一时之间，苏联的威望和讨价还价能力大大削弱。而且这场冒险还会引起严重的麻烦。英国和法国同情芬兰的情绪在高涨。这两个结盟的政府正式答应对芬兰进行军事援助；两个国家里已经征募了志愿军；而且当齐格菲防线和马其诺防线笼罩着一片神秘的沉寂时，法国政府却宣布有大量部队在魏刚将军指挥下集结在中东地区，正好是在苏联易受攻击的高加索边境对面。12月14日，苏联被逐出国际联盟，而国联过去对第三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总是那样宽容的。斯大林有某种理由怀疑西方国家是不是准备把战争从德国“转换”到苏联。这场芬兰战争是得不偿失的；但他卷得太深，以致无法脱身。正是在这种吃不准和拿不定的心情下，他在1939年12月庆祝了自己的六十岁生日。他利用这一机会以一种既可笑又拙劣的态度向希特勒保证友好。他对希特勒的贺电回电说：“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谊是由鲜血凝结成的，因而是永久的和坚固的。”^①斯大林后来恨不得在记录上把这句话抹去，出多大代价他也是愿意的。

芬兰战争于1940年3月结束了。苏联军队的威信得到部分的恢复。希特勒这时正准备入侵西欧，很可能一直担心斯大林“从背后插刀”。这两个人再次交换了角色。3月28日，里宾特洛甫打电报给他驻莫斯科的大使说：“元首对于能在柏林欢迎斯

^① 1939年12月25日《真理报》。

大林不仅将感到特别高兴，而且他务必要使斯大林受到与其地位和重要性相称的接待。元首将给予他在这种场合所要求的一切荣典。”^① 斯大林没有急于接受这种荣典，或者象另一位领袖^②那样同希特勒并肩检阅游行队伍。甚至莫洛托夫也不急于接受这一邀请。冯·舒伦堡伯爵只好在元首面前美言，解释斯大林的保留态度是由于他“不愿在陌生的环境中出现”。^③

很快就发生了使斯大林受到猛烈震动的事件，这就是法国迅速的崩溃和投降，以及英国从欧陆撤退。斯大林的战略打算也从而崩溃了。^④ 由于担心同希特勒在欧洲面面对峙，他毫不疑延地关闭了波罗的海的海门户。他不信任波罗的海各国政府，因为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倾向柏林而不是莫斯科，于是就派了日丹诺夫到爱沙尼亚、维辛斯基到拉脱维亚和捷卡诺佐夫到立陶宛，授命他们推翻当地的政府，建立由共产党控制的新行政机构，并准备把这三个共和国合并于苏联。

这样，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上就发生了一种新的和重要的转变。在波罗的海国家建立基地，最初他只是从战略上的一时需要出发的。他显然无意改变它们的社会制度。由于法国崩溃而使他大大加强的危机感，迫使他要在这三个小国家中发动革命。这还是他第一次稍稍离开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是他坚持不懈地反复灌输给苏联整个一代人的。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135页。

② 此处的领袖（Duce）指墨索里尼。——译者

③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136页。

④ 里宾特洛甫后来“机密地”告诉日本外务相松冈说，“苏联想使这一场战争尽量拖长。……法国异常迅速的失败是完全不合那个狡猾的政客斯大林的心意的。”（同上书，第305页。）

他所以离开这一理论，也是由于他那种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态度。但是他的干法却完全不同于老布尔什维克所曾梦想的传播革命。他是用刺刀尖或者说用坦克履带把革命从国外带进去的。波罗的海各国的工人阶级很可能是支持他所规定的工业社会化的，但这儿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苏联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当地人民的情绪。老布尔什维克照例把革命首先看成是人民的运动，看成是劳动人民的工作，是由他们自己的党组织和领导的。现在这个大变动却是一个大国战略上的机械的副产品。

在任何大的或者中等程度的国家里，这种大变动很难贯彻执行，因为它的社会有机体是依靠自身的新鲜血液在运动的。但是这三个小共和国及其花费很大的、喜歌剧似的警察政权，却是直截了当地被它们的大邻国所挑起的行动粉碎的。它们过去所以能够存在，一部分应归因于俄国在1918年的软弱，一部分应归因于早期布尔什维克的慷慨。斯大林的苏联既不软弱也不慷慨；因此斯大林是作为旧俄国属地的收复者、沙皇遗产的要求人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对于外部世界，他到了现在的1940年才第一次体现了这一角色。头年9月，他还不肯贸然合并原先属于沙皇的那片波兰族居住的土地，而只满足于那些从种族理由来说苏联至少同波兰一样有根据提出要求的土地。现在他却吞并了波罗的海各国，而苏联对这些国家是既没有也不能装着有任何种族上的要求的。但是，他还不能公开地提到沙皇时代的地契，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正统观念禁止他这样做。这种正统观念也不允许他承认为了战略上的原因而压制了弱小邻国的意志，因为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来说，这就有点帝国主义的味道了。为了挽救面子，他伪造了人民的意志，并导演了一场公民

投票，结果是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都要求加入苏联。其他大国领袖也紧紧掌握或者去夺取战略基地，因而斯大林的行为不应受到过分的苛责。但是在外表上看来，这种行为是更令人作呕的，因为它如此明显地违背了他承认过的原则，也因为他采取了这样拙劣的把戏来掩盖这一违背。^①

整个夏季，他都警觉地注视着希特勒对于波罗的海各国苏维埃化的反应。整个来说，希特勒仍然愿意保持这种买卖关系，因此没有进行干预。当斯大林从罗马尼亚分离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时，希特勒也没有设置什么障碍。这些就是他们之间圆满合作的最后一幕。

到了1940年夏末，正当不列颠之战^②期间，斯大林的策略甚至比以前更曲折迂回了。他对希特勒横扫一切和压倒一切的胜利仍抱怀疑，但他显然也估计到英国投降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他尽力要给希特勒这样的印象：他，斯大林认为，希特勒的胜利差不多已成定局，苏联已经准备在纳粹的这种“新秩序”中进行调整和安顿。法国投降后不久，莫洛托夫告诉意大利大使说（他知道他的话会被立刻报告给希特勒），他的政府认为战

① 斯大林对于芬兰的处理当然是不同的。根据1940年的和约，芬兰割让了所要求于它的战略基地，但当时它并未加入苏联。这一部分是由于芬兰人的态度——要他们的国家加入苏联就可能引起再次战争——和西方曾对他们的战斗表示过同情。但是，斯大林所以这时和以后的1945年对芬兰异常“温和”，一部分也由于过去是他亲自宣布芬兰独立的，这是他作为民族人民委员时的第一个重要表现。对于这一功绩，他可能怀着足够的骄傲和感情来回忆它，以掩盖他的不遵守誓言。

② 从1940年7月10日开始，德国对英国进行连续的猛烈轰炸，企图瓦解英国的士气和工业，伦敦等地遭到重大破坏，考文重被夷为平地。到10月以后，希特勒承认失败，并取消了入侵英国的计划。这一期间被称为“不列颠之战”。——译者

争差不多要结束了，苏联现在的主要兴趣在巴尔干，它想在那儿对保加利亚施加影响，并剥夺土耳其绝对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权利。表面上看来，斯大林是在索取希特勒“最后”胜利的赃物。实际上，他的这些要求是由于担心德国从南面进行包围。在希特勒看来，这些要求又好象是俄国人企图包围德国。在他们自称为友好的第二个年头中，充满了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尔虞我诈。

斯大林一方面向希特勒表示他对战争将迅速结束的信心，一方面又派出外交使节和代表到国外去鼓舞任何反对“新秩序”的迹象。莫斯科的报纸在此以前只是轻蔑地谈到同盟国，现在也开始同情地报道不列颠之战，并号召法国爱国者抵抗对他们国家的征服。甚至在这以前，德国外交部就不得不抗议苏联驻瑞典公使柯仑泰夫人的反纳粹宣传。^①

但是，这些行动都是偷偷干的，或者是由斯大林可以宣布对其言行不负责任的人去干的。支配一切的腔调仍然是对德友好。斯大林尤其小心谨慎地避免给希特勒一个印象，以为他正在寻求同英国——希特勒的唯一还在挺立着进行战斗的敌人——的接触。另一方面，斯大林完全有必要同英国保持接触。1940年7月初，他亲自接见了新的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这是自从里宾特洛甫访问以后他还没有给过任何外国使节的殊荣。这位新大使是以倡导英苏友好而著名的，他的任命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温斯顿·丘吉尔甚至到了这时还想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斯大林承认或不承认这种友好姿态都是很尴尬的。他倾听着英国大使谈论德帝国主义给苏联带来的危险（这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147页。

种危险他太清楚了)，以及苏联保持巴尔干现状的排他性权利和保卫它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的利益（这倒是比较新鲜的）。但是斯大林拒绝表示明确的态度。他否认德国对苏联有任何威胁，拒绝了关于苏联在巴尔干有排他性权利的建议，虽然他证实了他希望在海峡问题上有一个新的解决办法。他唯恐讲出的任何一句话会被解释为同情的表示，所以谈话时躲躲闪闪，虽然还不是不友好的。他认为，英国自然想要使苏联同德国卷入纠纷，因此任何一句不小心的话，特别是它被登在英国报纸上，就可能使苏德之间立即发生冲突。他谨慎小心到如此程度：竟命令莫洛托夫把他同英国大使谈话的一个适当的副本交给了舒伦堡伯爵。在这个副本中，据说斯大林谈话比实际上要严厉得多，而且有许多对“主要德国政治家”吹捧的话。^①

甚至在不列颠之战结束之前，苏联和德国之间对巴尔干无人驻守地区的竞争就已公开化了。希特勒没有同克里姆林宫商量，就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划了一条新边界。他还给予罗马尼亚调整边界的保证，这就意味着直接反对苏联。德国部队还出现在罗马尼亚和芬兰。当莫洛托夫抗议对以前协议的这些违反时，他被告知，德军进入这两个国家，是为了预防“英国的威胁”。在整个无人驻守的地区，发生冲突的地方日见增加。东欧和东南欧正在迅速地变小，以致容纳不下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个人了。希特勒说：我来了，你就得滚开！

由于德国正与英国对峙着，希特勒就不能再把红军在东欧的力量看得无足轻重。现在只有斯大林同意参加他的阵营并从而成为他的卫星国，他才能够同苏联保持和平关系。他企图把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167页。

这件事做得尽量地吸引人，以诱使斯大林来扮演这个角色。里宾特洛甫于1940年10月13日给“我亲爱的斯大林先生”写信说：“根据元首的意见……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采取一项长远的政策……在世界规模上划分它们的利益……看来是它们的历史使命。”^①希特勒不再提起曾经被拒绝的对斯大林的邀请，只是要求莫洛托夫到柏林去，并让里宾特洛甫安排一个日期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谈。德国方面以为四国公约的建议将被接受，于是里宾特洛甫就通知斯大林说，为了这个盛大的场面，他准备同日本和意大利的特使一块到莫斯科去。

对于里宾特洛甫这一冗长而又夸夸其谈的信，斯大林只是简短而枯燥地回答了几句，而且拖延了一个星期。^②他在“原则上”不反对里宾特洛甫的建议，但不愿仓促行事。他愿意派莫洛托夫到柏林去，并在莫斯科接见里宾特洛甫，但是“同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共同商议”必须进行很多“事前调查”。^③（又是那个熟悉的借口！）从莫洛托夫在柏林的表现，可以容易地推断出他是如何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行事的：莫洛托夫以一种友好的态度，仔细地听取一切建议，不承担任何新的义务，而在巴尔干这个利害关系上则剧烈地讨价还价。

莫洛托夫从柏林归来后的报告，简单说来就是：希特勒亲自重复了关于四国公约的建议，显然希望由于苏联的参加而可能使英国投降。俄国将分得那个“破了产的拥有四千万平方英里的世界大庄园”——英帝国的一部分作为报酬。四国将瓜分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213页。

② 这一星期里，在这一年开头时还对俄国实行道义上禁运的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次演说，把俄国称为一个“伟大的友好国家”。

③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216页。

那个“破了产的庄园”，而停止自己内部的争吵。元首认为，从长期来看，德国、苏联、日本和意大利的利益只需从一个方向扩张，就是向南方扩张。德国和意大利将在非洲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日本则在南亚建立殖民帝国；苏联将朝印度方向扩张。莫洛托夫竭力想把谈话从希特勒描绘的诱人图景转到更切实的一些小事情上。对他来说，抓住巴尔干这只鸟，其价值就等于英帝国丛林中的所有东方的鸟。他企图使希特勒解决苏联和德国在东南欧的势力范围，但没有成功。

斯大林这时采取的步骤是有最严重后果的。它等于拒绝了希特勒的建议。他表面上同意参加四国公约，但在这样做以前，要求希特勒从芬兰撤出部队，承认保加利亚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帮助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获得长期的基地，等等。希特勒只有放弃进攻苏联的一切计划和他不再担心苏联发动任何进攻，才可能接受上述的那些要求。事实是他既不愿放弃进攻苏联的计划而又担心苏联发动进攻。结果这个四国公约的主意就被放弃了，以后也永远没有再提起。希特勒收到斯大林的答复后三个星期，就给总参谋部发出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反苏战争的第一个指示。

在1941年的头几个月中，苏联被完全挤出了巴尔干，克里姆林宫为此怒气冲冲。一月间，它突然宣布，德军进入保加利亚，既未同它协商也未征得它的同意。到了3月，它甚至以更为生硬的词句重复了这一抗议。这时凡是反对希特勒的迹象都受到了鼓励。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加夫里罗维奇受到克里姆林宫的接待，“宛如兄弟一般，他在那儿亲密无间地讨论、筹划和签署协议。斯大林……还同他并肩照了相，并且……同他终夜讨论

友好的前景。南斯拉夫大使问道：‘如果德国人不高兴，转而反对你，该怎么办呢？’……这位独裁者微笑着答道：‘那就让他们来吧！’”^① 1941年4月4日，苏联同南斯拉夫签订了友好条约。莫洛托夫听南斯拉夫大使说，德军准备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天之后他就向德国大使说，他希望德国能同南方斯拉夫人保持和平关系。

在斯大林和希特勒彼此成为公开敌人相撞以前，只有一次斯大林偷偷地抢在希特勒以前行动。1941年4月13日，他接待了日本外务相松冈，商谈了一个中立条约。这一条约使苏联免除了两线作战的危险，也使日本解开了双手去从事太平洋战争。松冈刚从柏林返回，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那儿都曾明白暗示他，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并要求他不要在莫斯科签订什么条约。但是日本和苏联这时都担心两线作战，而且这种担心比意识形态上的友好和敌对都要强大得多。

在松冈两次访问莫斯科（头次是1941年3月，第二次是1941年4月）期间，斯大林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活跃，甚至变得唠唠叨叨不休。他告诉他的拜访者说：“我们两个都是亚洲人。”他一再谈到这个主题。这部分是外交辞令，部分也是斯大林想夸耀他的血统。自从他飞黄腾达以后，苏联的亚洲人地位已经被提得很高，现在他又亲自把它拔到了最高点。他仿佛是在想引起人们注意，苏联所以赢得宝贵的和平应该归功于他，而他是从欧亚交界处发源的。他高兴地向日本客人表明他的亚洲人观点。这两位都有一种特别的作风，就是直言不讳而又各怀鬼胎。松冈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后裔，却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精

^① G·加菲库：《俄国战役的前奏》，第192页。

神上的共产党人”。斯大林静静地听着松冈叙述其祖先的英雄业绩和他自己的保证，说什么日本虽在中国作战却不反对中国人，但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派一心想推翻日本的“精神共产主义”。^①从政治哲学出发，这两个人转而在萨哈林岛（库页岛）北部的让步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他们以一种东方人的方式剧烈地讨价还价；斯大林作手势说，松冈（这个没有心肝的家伙）一心要想扼死他。

斯大林炫耀自己是“亚洲人”，这是有一种隐蔽的动机的。他刚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尽管他进行抵抗，德国仍然已经成为巴尔干的主人，没有留下一寸欧洲的土地让苏联的势力进行扩张。他不得不实行退却。在六星期以前，为了苏联在欧洲的利益，他还派莫洛托夫去同希特勒剧烈地讨价还价。现在他以一种隐蔽的态度企图向希特勒表明，他，斯大林已经撤出这场竞争，准备象希特勒通过莫洛托夫向他忠告的那样，满足于在亚洲的利益。在松冈4月18日离开莫斯科的那一天，斯大林作了一个虚夸的姿态，意在使希特勒对他的新态度引起注意。他完全出人意料地从隐居的生活中脱颖而出，到火车站去欢送那位日本大臣。当着大群外国记者和吃惊的外交人员，他拥抱了他的“亚洲人伙伴”。后来舒伦堡转述说，他“公开地找寻我，当他看见我的时候，就走向前来，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说：‘我们必须继续友好，您现在就必须尽一切可能来达到这个目的！’。隔了一会儿，他又转向德国……武官克莱伯斯上校，首先弄确

^① 这发生在松冈1941年3月的第一次访问中。几天以后，松冈告诉教皇说，他的国家并不是同中国人打战，而是在同受盎格鲁—撒克逊人支持的亚洲布尔什维主义打战。在他第二次访问斯大林前不久，他建议希特勒复活反共公约。见《纳粹和苏联关系》，第297和313页。

实他是一个德国人之后，对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仍是你们的朋友。’”^① 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不可能不明白所有这些事情的意义。斯大林仿佛接受了他们在11月的建议，并表露了他要谈判的愿望。

可是为时太晚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莫斯科和柏林之间为了侵犯边界问题彼此进行抗议。德国飞机飞越苏联领土，苏联飞机侦察了德国的地形。大约有一百五十个师的德国部队集结在边境上，同它们相对的有数量上稍占优势的苏联部队。正是在那些日子里，大约是4月底，斯大林收到了从英国来的信息，这是丘吉尔在他6月22日的演说中提及的，他警告斯大林，德国的进攻即将开始。这个警告是很准确的，按照一些说法，它提到拿破仑入侵俄国的纪念日6月22日是德国入侵的最可能的日期。^②

在莫斯科，至少有两人拒绝认真地考虑这个警告，这就是斯大林和舒伦堡。那位德国大使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他忠实于他的俾斯麦传统，希望德苏之间的摩擦不致引起战争。在4月的最后几天，他到希特勒那里去恳求和平，就象一百三十年前另一位大使高兰柯尔向拿破仑恳求不要入侵俄国一样。舒伦堡带去了苏联来年供应德国五百万吨谷物的建议；他还试图向希特勒解释苏联军队所以集结边境，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俄国要三倍保险的要求。如果我们为了某种原因派去一个德国师，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324页。

^② 德国驻莫斯科的海军武官向柏林报告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提到过的那个日期，被认为是“荒谬的”。（《纳粹和苏联关系》，第330页。）美国政府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也向莫斯科发出关于德国进攻的同样警告。见萨姆纳·韦尔斯：《决定的时刻》，第136页。

他们就会为了同样的目的派去十个师，以便确保安全。我不认为俄国将会进攻德国。”^①但是希特勒不为所动。

说斯大林也希望苏德之间的和平尚能挽救，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不过，这可以追溯一下他在关键性的几周中的整个行为。这时他犯了一个那种过分狡猾的人所容易犯的错误。他不考虑一切凶兆，坚信凭他自己的策略花招和对政治上急转弯的洞察力，就能挽救形势。

5月6日，莫斯科为斯大林担任总理的消息而大吃一惊。从1923年以来，他还是头一次从总书记的职务中走出来，承担政府的直接责任。这是为什么呢？一些重大决定的命运尚在未定之天。它们将会如何变化呢？刚刚过去的五一节检阅已经变成了一场不平常的军事力量的显示。在被任命为总理的前夕，斯大林参加了军事学院的军事演习，并对毕业的军官发表了一篇很长的秘密讲话，赞美了红军的英勇。那么是要打战了吗？希特勒的对手们都屏息地注视着斯大林这位总理的最初几步，而他们都为之骇然。斯大林否认大军集结边境的传闻，恢复了同亲德的伊拉克政府的外交关系，而先前他是拒绝承认它的；最使人吃惊的是，他要求比利时、挪威和南斯拉夫在莫斯科的使节关闭他们的使馆并离开苏联，因为他们的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最后一个行动，特别是他所说的理由，显然都是为了安抚希特勒的。究竟是他的不择手段还是眼光短浅更使人吃惊，这就很难说了。不过，当他想尽办法要重新获得希特勒的信任时，他也担心这样做会使本国人民受到软弱和失败主义的影响。因此，他把关闭三个使馆的决定向苏联军民保持秘密。然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331—332页。

后他过了一个月，看看希特勒有没有表示赞许的迹象。但却没有任何这样的迹象。

他作了最后一个绝望的和悲喜剧的努力。6月14日，正好是德国入侵前的一个星期，他授权新闻机构发表了一个声明，它一反外交惯例，猛烈地攻击英国大使散布“苏德战争迫在眉睫”的谣言。这篇声明很容易看出就是斯大林的手笔，它否认德国曾向苏联提出任何经济或领土的要求，否认因为苏联拒绝了这些要求，两国正在完成战争的准备。同莫洛托夫给里宾特洛甫的几个秘密照会相反，斯大林这时却相信德国将“不折不扣地履行”它同苏联的协议；而且他虽然不再否认边界两边大军云集，却把德苏军队云集那儿是为了打战的一切说法斥之为“捏造的，荒谬的和挑衅性的”。^①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外交记录中也找不到任何比这更可悲的事了。在这个希奇古怪的声明中，斯大林在全世界面前颂扬了下一星期就将脱去面具而成为苏联死敌的人们，而又嘲笑奚落了下一星期将成为苏联唯一盟友的人们。但是这个声明并不完全是虚伪的。诚然，正如斯大林所宣称的，德国并没有对苏联提出要求。但是他显然是期望希特勒提出要求来，以便对它们可以进行讨价还价。德国进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时，的确曾经在事前提出公开的要求和进行大声的恐吓。斯大林显然认为，希特勒还会重施故技。由于他没有看到这种通常的危险信号，所以他也就拒绝承认迫在眉睫的危险了。在他的声明中，他以希特勒在1939年3月中已经了解的那种迂回方式，邀请希特勒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开始进行谈判。但希

^① 《纳粹和苏联关系》，第345—346页。

特勒不理睬这个暗示。

然而为什么到了这时斯大林还要奚落英国呢？他认为（这一次他想对了），英国一定有兴趣来破坏他同希特勒作最后一分钟和解的计划。他认为英国大使言行失检，并因此而大为恼怒。但是，即使英国人在这件事上完全不是为了私利，他们也仍然会引起他的愤怒，因为光是对暴风雨的预言，对他来说就等于使暴风雨更临近了。另一方面，他是不怕伤害英国的感情的。这时，英国已经同德国孤军作战了一年，他知道无需去追求英国的友谊；一旦苏德之间爆发了战争，苏英之间的联盟差不多就会自动地建立起来；到了那时，就不会去算老帐了。

斯大林同希特勒在1939年到1941年之间的交易，引起了极为热烈的争论。他的批评者说，在那些年代里，他先前的政治道德记录已经够低了，后来甚至低到了背叛的程度。他的维护者反驳说，虽然他的道路充满了曲折，但他却是根据合法的权宜之计行事的，从来没有丧失最后的目标，也从来没有抛弃了他的原则。

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亲自出来辩解。他在1941年7月3日说：“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①他否认“犯了错误”，并提

^① 《斯大林文选》，第283—284页。

出他的政策的好处：“我们保证了我国获得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自己的反击力量。”除了赢得时间以外，苏联当然也赢得了领土，即它非常希望得到的防御缓冲地。它在民心士气上的所得就是，使人民清楚地知道德国是侵略者，而他们的政府直到最后都在寻求和平。

在这三个所谓的收获（时间、空间和士气）中，士气上的收获是最货真价实的。俄国军事史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俄国士兵不同于德国士兵，在保卫自己的家乡时是战斗得很好的，而且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战斗的坚定信念，迫使他们在随后的年月里产生出最好的品质。至于苏联所获领土的战略价值，看来就不那么可靠了。在波罗的海各国和前东部波兰的一些军事前哨，开战几天以后就全部丢失了。但建立这些前哨时却是那样地艰巨和讨厌；它引起很多小民族的极大怨恨，特别是在把“不可靠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人放逐到苏联内地之后。总之，这些军事前哨在战略上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无论怎么说，反正是很快就丢掉了；但是由获得这些领土而引起的道义和政治上的坏处却是很大的。权衡得失，整个事情是代价很大的和可悲的失败。

时间上的所得也不是很绝对的。的确，斯大林利用了这二十二个月的喘息时间，集中地发展了苏联的战争工业，并根据新的军事经验重新训练了军队。但是希特勒也利用了这二十二个月的时间。他摆脱了两线作战的梦魇，征服了差不多整个欧洲，把十多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使用到德国的战争机器上去。苏联在1939年到1941年之间战争储备的新积累和军事工厂的扩张尽管很大和很重要，却不能和希特勒在同期中自然增加

的力量相匹敌。^①有三年之久，红军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陆地上同希特勒的部队搏斗，丢掉了广袤而富饶的领土，流的血比任何军队流过的都要多，而且焦急和沮丧地挂虑着西方开辟第二战场。不过，如果斯大林在早期的一个阶段中就把苏联的力量投入斗争，那么第二战场在1939年到1940年间就存在了；而且还可能在以后一直存在着。

的确，就是这一段喘息的时间，他也没有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由于他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然希望避免战争，而且不顾战争不可避免和迫在眉睫的一些征兆，他就没有充分地动员力量来防止德军获得初期的巨大胜利。他只是动员了一半力量来对付希特勒的猛攻。1941年6月的时候，苏联和德国动员起来的师在数目上是差不多相等的，但苏联的师只有一部分准备好来对付有经验的和装备优良的对手，而且这个对手由于获得一长串辉煌的胜利而信心百倍。但是红军是可能在人数上占优势的。^②斯大林所玩的政治把戏过分复杂，使他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他怀着极大不安的心情动员了一百七十个师，并把其中的大多数师开往边境；但是由于他太自满，或者说太过于担心“激怒”希特勒，所以没有能够实现必需的动员规模。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他自己的权威解释。他在1941年7月3日说道：“问题就在于，德国军队是作战国的军队，它已经完全被动员起来了……已经处于完全备战的状态，只等待进攻的信号了；

^① 这一点在斯大林1941年11月6日的演说中实际上也承认了。参看《斯大林文选》，第274—275页。

^② 西里尔·福尔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13页。舒伦堡向希特勒保证说，苏联由于“对安全的要求”，当德国派出一个师时它就派出十个师。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而当时苏联的军队还需要进行动员，还需要向边境集结。”^① 斯大林事实上就是承认，在入侵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他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而他竟然还用赢得时间来为他的政策辩护。他接下去说：“这里还有一个情况起了不小的作用，就是法西斯德国……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就是说，斯大林告诉全世界，“漂亮的诺言和卑鄙的伪造品”出卖了他的“天真无邪”。

在这奇怪的二十二个月的不分胜负之中，不能忽略共产国际不明智地给希特勒提供了无偿的服务。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刚一签订1939年8月的条约，共产国际就立即取消了反希特勒的讨伐运动，而这是它的吹鼓手们长期以来就号召各国政府和人民起来做的事情。所有反法西斯的战略和策略，所有精心制造的论点和口号，都被全部抛弃了。苏联总书记在欧洲的影子们都纷纷采取了模棱两可的中立姿态。这时的说法是，交战双方都是追求帝国主义目的的，因此不可能在它们两者之中进行选择。工人阶级被号召去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点类似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行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政策。但这种类似是骗人的。列宁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始终如一地反对战争，而共产国际的政策只不过是为了适应斯大林外交政策的一时权宜之计，它同那种政策本身都是居心叵

^① 《斯大林文选》，第263页。斯大林甚至比哈里·霍普金斯更明确地承认这一事实。见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第333和335页。不仅是军队的动员而且还有工业向战时的最后转变都过分地拖延了。只是到了194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和副总理沃兹涅辛斯基才透露，1941年第三季度的计划还是根据和平时期的设想制订的，而适应战争的新计划只是在战争爆发以后才拟定的。见沃兹涅辛斯基：《苏联的战时经济》，第37页。

测的。这种反对战争的方法有时还有一种明显的亲德性质，例如1939年10月时，共产国际作为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的传声筒，号召双方谈判和平，并把战争的责任归诸英法。这种政策的效果，特别是在法国，只是失败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它正好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准人民牌的失败主义，补充了已经腐蚀法国上层社会的那种失败主义。只是在受到了损害之后，在莫斯科孩子于希特勒的胜利而开始鼓励对纳粹占领进行抵抗时，法国共产党才转而采取新的政策。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条约对于德国反纳粹分子的影响虽还不太明显，但却不是不重要的。它使他们陷入更大的混乱，加深了他们的失败感，并诱使其中的一些人赞同希特勒的战争。

如果认为斯大林不明白同希特勒“友好”的后果，那就太天真了。在同已经得到的一些实际利益相比较时，他几乎肯定地认为这些后果是无足轻重的。他的实用主义思想使他老抱住有关防御的具体战略概念、军事基地、河流、突出部和环形战线等等；而由于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这些东西的价值已经大大削弱了。对于法国或德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对于波兰人、芬兰人和别的波罗的海人的民族怨恨，他认为是不值得考虑的。不过，由于不考虑这些，苏联过去和现在都遭到了报复。在这一点上，他在重大的政治过程中忽视非物质的因素，就成为他坚强而有局限性的现实主义的主要弱点。

当我们必须谈到斯大林的失算和错断时，如果把这一切仅仅归咎于他个人的缺点，那也是不对的。他的政策后面有一股人民感情的有力潮流，亚历山大·布洛克已经如此强烈地预感到这股潮流：

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庇护你们，

就不再参加战争！

《斯基台人》中的这些诗句概括地向西方传达了1939年苏联社会的情绪。大多数的苏联人民，由于多年紧张的经济建设而疲惫不堪，由于热爱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团结一致，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敌意或冷淡感到愠怒，觉得在自己的理想主义追求中遭到了孤立和背叛。这样的人民就会一致地同斯大林站在一起，“当残忍的匈奴人搜查死者的腰包”时，他们拒绝“为之一动”；甚至当纳粹准备建设奥斯威辛和麦丹涅克死亡室“烧烤白人弟兄的人肉”时，他们也要坚持和平。

苏联人民中不仅有这一股感情上的潮流，而且还有一股不安和疑虑的暗流。党有一种犯罪感，军队有一种模糊的屈辱感。而超乎这一切的，可能就是人民想逃脱无情的战争命运的要求。

第十二章

大元帅

斯大林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的举止行为。——他在1941年7月3日的讲话。——他对战争的领导。——他拯救莫斯科和命令第一次反攻(1941年12月)。——“1942年获胜”——盟国内部的恐惧与猜疑。——“这不是阶级战争”。——第二战场。——丘吉尔同斯大林1942年8月的会晤。——斯大林格勒之战。——俄国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斯大林企图使列宁主义和俄国的传统主义调和起来。——他解散共产国际和恢复东正教的地位。——政治局和总参谋部。——斯大林和希特勒作为军事领袖的比较。——斯大林和他的元帅们。

1941年6月22日，莫洛托夫以德国进攻的严重消息惊醒了苏联人民。斯大林仿佛是由于自己的希望遭到灾难性的破灭而感到困惑，避免出头露面。在差不多两个星期中，他没有对公众发表任何言论。他显然是在等着看看初战的结果、英美的态度以及全国的反应。他同军事领导人关在密室中讨论动员措施和战略计划。他把广阔的战线分为三个战区，由伏罗希洛夫指挥北部战区，提摩盛科指挥中部战区，布琼尼指挥南部战区。他自己担任最高统帅。他的总参谋长是沙颇什尼科夫，他从革命以前就服务于总参谋部，以博学和工作刻苦闻名，但却不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战略家。战争的最高指挥权集中于国防委员会，

它的五个成员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主管外交，贝利亚负责国内政策，伏罗希洛夫保证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联系，作为总书记助手之一的马林科夫代表党。斯大林自己则主持这个委员会。

斯大林尽管有一些失算之处，但对于应付紧急事变并非毫无准备。他曾经坚定地武装了他的国家，并重新改组了它的军队。他的实际思想并不墨守任何片面的战略教条。他没有麻痹红军，使他们在苏联的各种马其诺防线后产生虚假的安全感，而这种静态的防御体系曾在1940年使法国军队遭到毁灭。他能够依靠苏联广阔的空间和严酷的气候。这时已经没有谁来对他的领导权进行争议。他已经具有绝对统一的指挥权，这是现代战略家所曾梦想得到的东西。

但是，那些有利的条件被一些不利的条件抵消了。红军只是到了这时才经历了真正的火的洗礼。它的士气还不是稳定的。农民起义反对集体化才仅仅过去了十年；对于大清洗也是记忆犹新的。从战线上最初传来的报告，描绘了一幅混乱而矛盾的图景。一些地方的师团瓦解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被德军俘虏的士兵非常多，表明惊人地缺乏战斗精神。但是另一些地方的兵团虽然被包围和切断了联系，却顽强地防卫着自己，拖延了敌军的前进。还有一些地方虽在极其强大的压力之下，部队仍能作有秩序的撤退，为未来的战斗保存了有生力量。但是，希特勒的军队到处都在势不可当地前进着。后方谣言蜂起，一片惊惶和混乱。

1941年7月3日，斯大林终于打破沉默，给他不知所措的国家提出了指导。在一篇广播演说中，他谈到面临着“严重的

危险”。他的声音缓慢，时断时续，苍白无力。这篇演说象往常一样地是不自然的和枯燥的，其中没有象丘吉尔许诺其人民的“流血、劳苦、流泪和流汗”那样激动人心的话。这篇演说的风格不仅同当时戏剧性的事件不相称，而且同其本身的内容、同反映了他的不屈不挠的胜利意志的呼吁和训示也不调和。

他在开头说：“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团和他们的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往前线调来了生力军，继续向前闯进。”^①他不想把严酷的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只好在前面讲了一些轻率乐观和明显不真实的话。^②他继续为他同希特勒缔结的条约辩护，这已经是我们耳熟的了；他只补充说，希特勒得到了突然袭击的好处，但那不会长久有利于他。然后他以一种农民的粗鲁想法谈及敌人的目的：“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已的汗水灌溉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已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德意志化〔苏联人民〕，把他们变成德国公爵和贵族的奴隶。”^③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苏联人……不要再对此漠不关心。……对敌人毫不留情……。必须使垂头丧气分子和胆小鬼、惊惶失措分子和逃兵在我们的队伍中毫无容身之地。……”他号召同入侵者展开最无情的斗争，克服后方的混乱和惊惶。最后他号召人民对于不得不让给敌人的地方实行“焦土政策”：

① 《斯大林文选》，第262页。

② 布鲁门特里特将军说：“在最后攻击莫斯科前，我们的损失是不重的。”（见利德尔—哈特：《在山的那一边》，第200页。）而且斯大林的这些话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仅仅两周之后说的。

③ 《斯大林文选》，第265页。

当红军部队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铁路上的全部车辆，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把所有的牲畜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机关保管，以便运到后方。凡是不能运走的一切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燃料等，都应当绝对销毁。在敌占区，必须建立骑兵和步兵游击队，建立破坏小组，以便同敌军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破坏电话和电报联络，焚毁森林、仓库和辎重。在被占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所有走狗无法安身的条件，步步追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设施。①

这仿佛是1812年俄国的再现，而且是通过斯大林的嘴说出来的。他的确回想到俄国对拿破仑的胜利，并且说，希特勒不比拿破仑更不可战胜。他提到，对“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关于帮助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帮助我国的宣言”，表示“衷心的感谢”。②正象1812年一样，俄国从事的是一场“民族爱国主义的战争”，也是一场为所有民族争取自由的战争。他在结束时号召人民“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③他出人意料地用第三人称提到自己，使他的演说增加了不协调的气氛——这篇演说既伟大又平淡，既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又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

① 《斯大林文选》，第266—267页。

② 同上书，第267页。

③ 同上书，第268页。

苏联是用空间来换取时间的。让出的空间要使敌人无用，但却要向敌人索取无情的代价。斯大林在犯了一切错误和失算之后，这是能够对付欧洲征服者的唯一方法。他用超级的意志力来对抗希特勒。但他是否如所断言的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丧失信心呢？根据斯大林在那几个关键的月份里所作的一些谨慎的谈话，人们可以对此加以怀疑。在他7月3日的演说中，他不仅谈到了拿破仑在俄国的失败，也谈了德皇威廉的命运。威廉虽然曾被认为是无敌的，最后却“被英法军队”击溃了。斯大林没有提到，德皇的军队在被西方敌人击溃以前，就已经打败了俄国。他显然是从拿破仑回想到德皇，又从德皇回想到拿破仑。他不能不考虑，德皇已经做到的事，难道希特勒会做不到。当他在7月30日同罗斯福总统特使哈里·霍普金斯谈话时，这种思想必然在他心里闪过。他承认自己没有料到希特勒会发动进攻；他还进一步说，“战争将是艰苦的，也许还很长”；他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军事工业都座落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及其周围，很快就要受到敌人的威胁；他愿意让美国总统知道，他，斯大林“将欢迎美国军队完全在美国自己的指挥下参加俄国战线的任何部分作战”。^①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作者谈及斯大林的最富于启示性的一次说明。在整个战争中，斯大林曾坚持不让任何不在他指挥下的外国军队参加他的战线。他也不让外国观察员到他的战线去；甚至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他照例不允许盟国的飞行员飞越苏联上空。那末当美国甚至还没有参

^①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第339—343页。

战，而他的建议又是那样不现实的时候，他为什么在1941年7月如此热衷地“欢迎美国军队完全在美国自己的指挥下参加俄国战线的任何部分作战”呢？人们只能得出结论说，他是在信心低落、或许还是大失所望的心情下讲了这一番话的。这本来也是自然的，因为当斯大林和霍普金斯谈话时，希特勒的军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推进了四百五十英里；北部的斯摩棱斯克战役已经开始；南部布琼尼的部队正在溃退。在布琼尼从第聂伯河灾难性的败退以后，9月间又有两个来访者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他们注意到斯大林有意气消沉的迹象；而且他还询问英国能否派一些部队到乌克兰前线去。^①这一年的秋末，当德军接近莫斯科时，他向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表示了焦急的心情。他告诉这位英国大使说，莫斯科将防御到最后，但他也设想到德军占领它的可能性。他继续说，如果莫斯科失陷，红军将要从整个领土撤退到伏尔加河以西。他认为，甚至到了那时，苏联也仍然能够继续作战，不过将需要很多年才能重新返回伏尔加河这一边。

这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他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1945年5月24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庆祝胜利“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时说：“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1941—1942年，我们处在危急万分的关头，那时我军实行退却……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是旁的人民，他们也许会对政府说：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请走开吧，我们要成立一个能同德国媾和……的政府。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这样做。……感谢俄罗斯人民的这种信任。”^②

^①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第387—389页。

^② 《斯大林文选》，第428—429页。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斯大林必然是忧心如焚的，即使他对世界装出一副刚强的样子。

他以惊人的坚毅和自制力来装出刚强的样子。也许这种样子是他最有力的武器了。它使他的胜利意志具有一种英雄的、几乎是超人的外表。苏联是有很多薄弱环节的。对于一个通过半强制和半说服的方法掌握国家全部命运的人来说，稍微有一点情绪低落的表示，都可能增加薄弱的环节，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斯大林自然知道，比起希特勒的任何对手或牺牲品来，他个人的犹豫或软弱更容易招致不光采的结局。这种自我保存的力量使他不得不如此表现；而且现在他个人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同国家的利益合而为一了。任何集权主义的政权，都是既强大又软弱的。在某个时刻，一个强大国家的全部命运似乎系于它的独裁者一身，他的垮台或消失，都将造成任何人几乎无法填补的空白。

在战争中访问过克里姆林宫的许多盟国人士都很惊异地看到，在军事、政治或外交方面的许多大小问题，都是斯大林亲自拍板的。他实际上是总司令、国防部长、军需司令、供应部长、外交部长，甚至还是礼宾司长。红军的总司令部就设在他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他从办公室的书桌前同各条战线的司令员保持经常和直接的联系，注视和指挥在战场上进行的各个战役。他从办公室的书桌前也管理着另一个巨大的行动，即从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把一千三百六十座大小工厂撤退到伏尔加河、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次撤退不仅包括机器和设备，而且包括几百万工人及其家属。在其他方面，比如他还同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就西方盟国供应苏联的铝的数量或步枪与防空武器

的口径讨价还价；或者接待从德国占领区来的游击队领导人，并同他们商讨在敌人前线后面几百英里的地方进行袭击。1941年12月，正当莫斯科战斗处于高潮的时候，街头已经听到了希特勒不祥的炮声，斯大林仍能找得到足够的时间同前来缔结苏波条约的西科尔斯基将军玩弄微妙的外交游戏。在后来的日子里，从世界各地来的访问者、大使和特使日益增多。他通常都是在深夜和黎明时接待他们。在充满了军事报告、行动决议、经济指示和外交争论的一天之后，他在黎明时就仔细地考虑一下前线发来的最新文电，或者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送来的关于民心的机密报告。正如负责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的一位将军说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包括了头一天的关于苏联、关于它的盟国及其计划、甚至关于斯大林办公室的一切事情。那位英国将军的办公室里“布满了隐藏得很好的窃听器”，记录下他的每一句话。^①在整个四年的战争中，斯大林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工作。他真是一个耐心、固执和警惕的奇才，差不多无所不在，也差不多无所不晓。

10月，希特勒正式开始了莫斯科战役，即所谓“空前的巨大攻势”。列宁格勒已被切断联系和封锁起来。差不多整个乌克兰和亚速海岸都被德军占领。布琼尼的部队全线崩溃，在第聂伯河被德军俘虏了五十万人。斯大林解除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指挥权。这两个察里津的人，曾被托洛茨基称为“军士”，是不能胜任这场摩托化战争的。新的司令员朱可夫、瓦西列夫

^① 约翰·迪安：《奇怪的联盟》，第154页。

斯基、罗科索夫斯基很快就代替了他们。

11月，德军企图全面包围莫斯科。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离首都二十到三十英里的地方，其中有一处只离五英里之遥。所有的人民委员部和政府的其他部门都已撤退到伏尔加河岸的古比雪夫。在莫斯科，官员们正在烧毁没有带走的档案。11月6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莫斯科苏维埃照例举行了庆祝集会，不过这一次集会是在地下即地铁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举行的。斯大林以平静的语言向大会致词，虽然他在讲话中惊人地承认，苏联坦克“比德国人的少几倍”。^①第二天，他站在列宁墓上，检阅了军队和人民自卫队的志愿师团，他们从红场就直接开往这座城市的郊区前线。他呼吁士兵们从内战的记忆中吸取力量，那时“我国四分之三的领土都在外国武装干涉者手中”，而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同盟国。“敌人并不象某些惊惶失措的知识分子所形容的那样强大。魔鬼也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可怕。……德国是不能长久挣扎下去的。再过几个月，再过半年，也许一年，希特勒德国一定会由于其罪行累累而崩溃。”他在结束演说时奇怪地和出人意料地召唤了帝俄时代圣者和勇士的亡魂：“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札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②这是他第一次召唤过去的那些亡灵，而革命对于这些东西似乎是永远要加以轻蔑和排斥的。最后他增加了一句：“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

① 《斯大林文选》，第275页。

② 同上书，第284—286页。

前进！”

关于政府撤退的消息震惊了莫斯科的人民。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刻。任何政府在战争中作出撤离首都的决议，都势必损害作为一个战斗国家的士气，并增加人民的离心力。1940年的法国就是这样的，当时法国政府抛弃了传统的权力基地，就象一个离了壳的蜗牛一样脆弱。一个越是集中的政府，它的稳定性和权威越是植根于熟悉的权力界碑之中，差不多也就是植根于首都之中。政府从莫斯科撤退后就发生了一些混乱和骚动。人民认为这座城市已经被放弃了。一伙一伙的人袭击了食品仓库。有些党员撕毁了党证和徽章。有些反共分子准备同共产党员算帐，换取侵略者的青睐。在前线和伏尔加之间的区域内，许多地方都表现出无政府的迹象。

那些日子里呆在莫斯科的人们，后来描述了人们听到斯大林没有离开以及政府其余部分决心发扬莫斯科大公国精神的消息后如何受到欢迎，他们把这看成是一个证据，说明体现在斯大林身上的胜利意志是没有动摇的。他到了最后时刻仍出现在克里姆林宫，这的确是对命运的一次挑战。这仿佛是全世界的命运都系于这座古老堡垒的尖塔上。对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来说，克里姆林宫已经成为他们野心的象征。当斯大林拒绝离开它的宫墙时，希特勒发布了一项命令说：“炸毁克里姆林宫来庆祝布尔什维主义的被推翻”。^①正是在克里姆林的环境中，斯大林的形象才发展成今天的这个高度。他同这种环境及其历史联系已经溶为一体，因此他好象是害怕同它分离开来。至少他的部分权力是来自同人民的疏远。如果他离开，这种疏远的

^① 利德尔—哈特：《在山的那一边》，第194页。

符咒就会失灵。那时在人民看来，他就可能象一个在逃的独裁者。这当然不是说，他不能在这个国家的某个隐蔽场所来指挥战争。但是无论如何，离开莫斯科对他来说总是尴尬和丢脸的，因而他最后也不愿意走这一步。

顺便说一下，他因而在整个战争中都自愿地埋首于克里姆林宫中。看来他没有一次想到过要去同他在战场上的部队直接接触。托洛茨基在内战中曾坐着他那传奇性的火车，从一条战线转到一条战线，有时冒着敌人的炮火去考察前线阵地和审核战术安排。丘吉尔也曾在非洲的沙漠中和诺曼底的海滩上同他的士兵们混在一起，以他特有的庄严的话、滑稽的帽子、雪茄和V字手形向士兵们欢呼。希特勒曾花了很多时间在他的野战总部里。斯大林对于实际的战争并无兴趣。他也不依靠同部队亲自接触的效果。不过，他毫无疑问地还是部队的真正总司令。他的领导决不限于抽象的战略决定，这一方面是一个文职的政治家也能胜任的。他最大的兴趣还在于研究现代化战争的技术方向，一直到它的细微末节，这表明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半瓶醋的业余爱好者。用现代的话来说，他主要是从后勤的角度来观察战争的。保证人力的后备和武器的供应，以适当的数量和比例把它们在适当的时间分配和运输到适当的地点去，积聚具有决定性的战略后备，在决定性的时刻把它投入战斗——这些工作就构成了他的任务的十分之九。

到1941年底，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形势似乎是无望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沃兹涅辛斯基曾经写道：“在1941年11月被德军占领的领土上，居住着全苏联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战前那儿生产了全苏联的百分之六十五的煤，百分之六十八的生

铁，百分之五十八的钢，百分之六十的铝……百分之三十八的谷物，百分之八十四的糖……百分之四十一的铁路线也在那儿。……”^①从6月到11月，工业生产减少了一半多；钢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对于现代化机器不可或缺的轴承，比正常年份减少了百分之五。到了这个时刻，苏联吹嘘的“无穷无尽的后备”已经变成了神话。它的物质资源比德国差得很远；甚至它的人力也没有很大的优势，至少比德国和它的卫星国加在一起的人力要少得多。因此，苏联的抵抗，特别是在战争的头一年中，就是决心和精神优势的一次胜利，这种精神使青年共产党员在莫斯科郊外视死如归，他们高喊口号：“我们后面就是莫斯科——已经没有退却的余地了。”^②

12月8日，希特勒宣布，他已经命令在冬季中暂停一切军事行动。他的部队曾两次企图突击莫斯科，但都被打退了。德军现在被天气的突然变化而弄得动弹不了。一个严寒的冬季比通常早几个星期就到临了。希特勒不知道，在他宣布结束1941年战役前两天，即12月6日，斯大林却发出了进行一次反攻的命令。

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人曾经思考过他们在1941—1942年被迫退却的情况。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斯大林解释苏联初期的失败是由于希特勒得到了进行突然袭击的好处。到了1946年，他对于事件提出了一种颇为不同的解释，暗示他曾经故意地引诱德军深入苏联内地，以便在那儿消灭他

^① 沃兹涅辛斯基：《苏联战时经济》，第42页。）

^② 德军副总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说：“我军第258步兵师的一些部队实际上已经进入莫斯科近郊。但是俄国工人从工厂里涌出来，手拿锤子或其他工具来保卫他们的城市。”（见利德尔—哈特：《在山的那一边》，第196页。）

们。在一封给军事史学家拉辛上校的信中，他提到他所遵循的两个历史范例：“古代的安息国人就已经懂得这样的反攻了，当时安息国人曾引诱罗马的统帅革拉苏及其军队深入自己的腹地，然后发起反攻，并消灭了他们。我们的天才统帅库图佐夫也很懂得这一点，他用准备周密的反攻，打垮了拿破仑和他的军队。”^① 这个第二种解释是有意提出来去制止对1941—1942年失败原因的深究的，因为这样的深究不可能不损害斯大林的威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苏联是由于德国的巨大压力才被迫退却的，从最富庶的地区撤退不可能是他们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斯大林并未象库图佐夫一样打算使敌人陷入莫斯科城（它现在是首都，但1812年时首都是圣彼得堡）。1812年时，领土的损失并没有损害俄国从事战争的能力；而且拿破仑只限于沿大道向莫斯科前进。在现代化的战争中，作如此规模的故意撤退，遭受象苏联在1941—1942年那样的损失，如果不是更坏的东西，也是十足的疯狂。

但是，斯大林对他的战略的这两种解释，并不是象表面看来那样互相排斥的。他一旦被迫放弃了大片领土，就决定要很好地处理这一灾难性的形势，集合新的部队，避免作决定性的

^① 《斯大林文选》，第458页。斯大林提到安息人，表明他必定是以特殊的兴趣研究了个临近他的家乡高加索的古老国家的历史。安息帝国曾经囊括了波斯北部地区。顺便说一下，斯基台人是安息帝国的武士阶级，安息帝国的将领和一些皇帝都出自这一部族。在战时的苏联，研究“斯基台人的军事艺术”几乎成了一种风尚。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在1942年11月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时举行了特别会议，米苏林教授在会上发表了论“斯基台人军事艺术”的演说。演讲者用下面的话总结了这次对十月革命的奇怪的纪念：“在我们祖国的古代编年史中，充满了不少斯基台人为争取独立而进行顽强战斗的英雄篇章。”见米苏林：《关于斯基台人的军事艺术》，载《历史杂志》第8—9期，1943年。

战斗，把自己的部队从一连串包围中解救出来，等待希特勒的军队长驱冒进，然后就对他们过度拉长的侧翼和交通线进行打击。斯大林以其原始的、东方式的、但却屡试不爽的狡黠，在希特勒的骄傲自大上进行赌博。由于获得一连串无与伦比的胜利，的确使希特勒变得过分的骄傲，以致在攻击莫斯科后，他没有采取甚至一个平庸的将军都会采取的预防步骤。他没有把他的部队撤退到防御阵地上去，而是命令他们在看得见莫斯科的地方建筑冬季营房；他没有补充他们冬季的衣被；他也没有预见到苏联的泥泞和霜冻会使他的战争机器停摆，而冬季这一因素将使苏联士兵优于任何敌手。斯大林的军事错误决不是来源于过分的小心谨慎，而他很快就能看出那位元首倒是缺乏谨慎之心。他正是在这一点上建立起他的行动计划的。他不仅因此挽救了莫斯科，还迫使德军作前所未有的代价很大的长距离撤退。

在苏联军队获得这一初次的胜利后，全国开始有了信心。在战场上的军队突然认识到，他们已经获得任何军队迄今无法得到的某种东西。在几个星期中，德军经常受到正规军的进攻和游击队的袭扰，似乎就要象拿破仑的大军那样在雪野中瓦解了。瓦解倒没有发生。不过苏联士兵现在已经觉得，能够打败敌人一次，也就能够再一次打败它。

斯大林对这种情绪加以鼓励，并号召“1942年获胜”。在战争刚开始时，他曾经告诉哈里·霍普金斯说，他估计是一次长期的和代价很大的战争，将持续三四年。那么什么东西迫使他现在提出这一新口号呢？形势的确是改善了，这不仅因为苏联获得了最近的胜利，而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参战。尽管有这些

新的情况，他还不得不考虑下面的一些事实：莫斯科反攻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冬季的天气；美国还正在把它潜在的巨大力量转变成实际的力量；英国军队还没有从欧陆败退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只有出现一次“奇迹”，才有可能在1942年结束战争。但是难道莫斯科的防御不是一次“奇迹”吗？情况可能是，斯大林急切地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但它也可能是，虽然他知道没有希望能在1942年获胜，但他不能向苏联人民发出严肃的警告，说他们的考验还要继续几年之久。这种考验太可怕了，因此不允许讲这种残酷的老实话。^①

战争持续时间的长短显然取决于西方盟国的态度。苏联已经同英国和美国都签定了协议，获得美国的贷款十亿美元，并获得从西方不断供应战争物资的允诺。但是斯大林还是非常警惕，生怕发生战争中充满了的那种突然事变。同盟国这个联盟是在违背它的各个成员国的意志下成立的。它们之间的纽带似乎还是很脆弱的。在失败、竞争、彼此责难的压力下，它也可能一下就折断了。在骨子里，老的敌对和紧张情绪仍然存在。斯大林不禁要考虑一下，西方会不会同德国单独媾和而把苏联弃绝不顾呢？在他看来，德国法西斯资本主义同英美自由资本

^① “1942年获胜”的口号，当时看来并不象后来回想起来的是一种狂想，因为事实上，在那一年开头，龙德施泰特和李勃已经劝说希特勒直接撤退到波兰边境（见利德尔—哈特：《在山的那一边》，第203页）。如果德军撤退得这样远，那就等于是苏联获胜了。这一定是希特勒拒绝听从他的将军们劝告的原因。当这些将军们着眼于军事战略时，希特勒主要关心的却是政治战略；因此决不能象德国将军们认为的那样，希特勒拒绝撤退就是“错误的”。他的不幸是，他同他的将军们都是“对的”，不过是出发点不同而已。

主义之间的冲突，比之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苏联同英美任何一方的基本敌对，都是更为表面的东西。他从这一事实看到了历史在开玩笑：英国的保守党为了自保，正在同反共力量的领袖、欧洲反革命的实际头子希特勒进行战斗。他必定已经进行了推论，这个历史的矛盾，可能证明是暗藏着危险的。我们知道，联盟的另一方也认为苏联可能同德国单独媾和。罗斯福和丘吉尔一直为此牵肠挂肚，唯恐由于苏联损失惨重，而且两个集权国家之间有一种亲属关系，可能使斯大林象1939年那样地同希特勒和解。^① 当时，这种恐惧是双方都有的，它使战时的政治行动改变了颜色。

斯大林小心地不使这场战争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去进行，他显然认为，这会使这个联盟破裂。他把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为指导各国共产党战时行动而制定的指示和方法抛到九霄云外。按照那些指示，共产党人应该宣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利用战争造成的一切机会来达到这个目的。^② 相反地，他们现在接受各盟国政府的领导，支持它们的战争努力，以便帮助苏联。在大多数纳粹占领的国家中，他们承认抵抗运动的资产阶级领导：法国的戴高乐，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荷兰的威廉敏娜女王，等等。甚至他们对德国、意大利和巴尔干诸国的宣传，也不号召推翻资本主义。他们号召那些国家的人民以民主

①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第400、466、495、734页和其他各页；西恰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167—168页；中将吉法德·马特尔爵士：《俄国人的观点》，第76页；《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71页和其他各页。

②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一再重复地说：“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发生问题，就象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15页。）

的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去抵抗他们的统治者。(只是到了战争临近结束时，“民主”这一词才成为争论的目标，有着“东方”和“西方”的解释。)莫斯科现在是以民族利益、情绪、甚至偏见，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向各民族讲话。在希特勒进攻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就宣称“这不是阶级战争”；而斯大林似乎是响应了丘吉尔的说法。他刻意地培养整个联盟所共同的单一反法西斯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外表。由于需要这样一种外表，他牺牲了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决定解散它。这是他对这一伟大联盟紧密结合的政治贡献。

斯大林不仅一直担心英美同德国单独媾和；在他看来，虽然不太严重但却非常真实的是这样一种危险：西方盟国将按兵不动，让苏联和德国彼此消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英国政府成员塔拉的布拉巴松勋爵公开地劝说盟国采取这一态度，使斯大林更加深了这一猜疑。结果塔拉的布拉巴松不得不从英国政府中辞职，而且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都怀着极大的同情心谈到苏联的战斗和他们的盟友斯大林。但是克里姆林宫内部圈子却老是忘不掉那位不谨慎的大臣所说的话。斯大林无疑地认为，那位大臣的话所以遭到拒绝，是因为他太不谨慎，以致说出了他的大多数同僚藏在心里的话。照斯大林看来，事情总是那样发展的：阶级间的敌对仅仅是暂时收起来了，而由于俄英之间由来已久的抗衡，英国在俄国人的眼睛里总是“背信弃义的英格兰”，要利用俄国农民去做炮灰。最后但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斯大林自己在1939—1941年的态度，由于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已经使他自食其果了。于是他开始催促西方盟国立即在欧洲大陆参加反德的战争，他力求从它们那

儿得到关于这方面的正式许诺。^①

与此同时，他一直注视着极为复杂的外交问题。在同希特勒合作时，他已经延伸了苏联的边界。他改变了合并地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观点，并在苏联宪法上加上一些适当的条款，把这一合并确定下来。现在他同希特勒的合伙关系破裂了，因而想来挽救他从这一合伙关系中得到的东西。他要求西方盟国承认他所得到的东西是合法的，而西方盟国却认为那完全是一桩非法的买卖。英国和美国都不急于公开承认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合并。但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波兰问题要更加困难一些。波兰是反德联盟中最老的一个成员。在它准备臣服德国的同时，它的东部边界丧失给了苏联。单是为了这个伟大联盟的体面，就要求满足波兰的愿望。这倒不是因为波兰对于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接界的地方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而是因为这些地区是被如此卑鄙和野蛮的手段剥夺了去的。但是，斯大林是不可能把这些领土归还给波兰的，因为它会引起乌克兰人的怨恨，而乌克兰人对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是他要加以保持的；因为它将暴露他在1939年命令在波兰东部实行的公民投票是骗人的把戏，其目的只不过是得到了对这些土地的合法权利；因为它将暴露他在苏联宪法中载入的条款只不过是一种欺骗性的手续；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必然要大丢其脸。

所以他只对波兰人作了一个姿态，暗示他将满足他们的愿望，而实际上却没有给他们什么东西。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

^① 早在1941年11月，斯大林就曾在地铁马雅可夫斯基车站发表的演讲中说道：“现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支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的英国或美国的军队，因此德国人……不必在东西两个战场上作战。”（《斯大林文选》，第274页。）

里，他的政府就宣称，一般地说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关于波兰的条约已经无效。波兰流亡政府的首脑西科尔斯基将军把这解释为苏联同意把东部边界地区还给波兰。但这并不是斯大林的本意。当莫斯科之战的高潮时期，安东尼·艾登正在苏联首都，斯大林向他要求英国承认苏联的边界就是希特勒进攻时的那条边界。这位外交大臣宁愿把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① 斯大林于是建议同西科尔斯基会谈。这位波兰的总理回答说，波兰的宪法没有给他权力去谈判他的国家的边界。从此以后，斯大林也援引苏联宪法，说它禁止他割让苏联的任何领土。^② 这样，拖得很长的苏波冲突就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冲突由于大量波兰人被放逐到苏联而更加剧烈了。

斯大林为了达到三个目的——保证不单独媾和，加速开辟第二战场，以及盟国承认苏联1941年边界——于1942年5月派莫洛托夫前往伦敦和华盛顿。莫洛托夫的使命在表面上是成功的。他缔结了英苏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斯大林于1941年9月首先向比弗布鲁克勋爵提出的。条约有效期为二十年。此外，英国人还公开声明，他们同意苏联人“关于迫切需要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丘吉尔和罗斯福都私下向斯大林保证（前者不无勉强），他们的军队实际上将于9月横渡海峡入侵法国。但是，莫洛托夫没有能够使英美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从事情的表面来看，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了。联盟的所

^①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66—1167页。

^② 西恰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88—89页。

有成员都已宣布了打败德国的同样坚强的决心；苏联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西方曾经把苏联的抵抗力量看得很可怜，莫斯科之战以后，英国和美国对苏联军事力量的评价提高了；苏联立即在这一联盟中占了主要的地位。西方往日的反苏情绪，很快就让位给对苏联一切事物和斯大林本人普遍表示一种天真而真诚的钦佩。罗斯福和丘吉尔不惜吹捧斯大林；他的形象也开始受到某种普遍的爱戴，而在此以前，西方对他是疏远的、不理解的，甚至还是讨厌的。

公众舆论的转变并不是单方面的。在苏联，人民也忘记了往日的怨恨和怀疑。宣传员已不再把世界分成资本家的和无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和殖民地的，而是分成法西斯的和民主的。不仅“新政”的领袖、美苏友好关系的促进者罗斯福，甚至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的前领袖丘吉尔，都被欢呼为进步人类的象征、伙伴、朋友。当宣布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时，这种情绪达到了高潮。1942年7月，斯大林邀请丘吉尔到莫斯科商讨共同的军事行动，这种情绪也仍然存在着。

丘吉尔于8月间抵达，但他的这次访问是十分令人失望的。他不得不告诉斯大林，英美总参谋部已经决定取消计划中的对法国的入侵，而准备代之以入侵北非。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这次会谈，语言尖刻，争吵激烈。苏联半官方的记述中有这样一些对话：

丘吉尔：……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我觉得难以启齿，
但是……

斯大林：首相，这儿的人神经都很坚强。

丘吉尔： 侵欧洲今年是不可能的了……

斯大林： 这就是说，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抛弃了今年春天向我们许下的庄严诺言……

丘吉尔： 我们建议入侵西西里。

斯大林： 这是一条政治战线，而不是一条军事战线……

丘吉尔（保证将在1943年入侵西欧）。

斯大林： 怎么保证这个庄严的诺言不再被抛弃呢？

莫洛托夫： 英国首相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他的国家是不能牺牲人的。①

也许可以怀疑斯大林的语言是不是那样的粗鲁。但是对这次会议内容和大体近似的叙述，已经由英美的材料加以证实。②斯大林在送给丘吉尔的备忘录中说，第二战场的拖延，是“对苏联公共舆论……的一次道义上的打击”，而且它“损害了苏军指挥部对夏季和冬季行动的计划”。③

苏联前线的形势的确再度陷入危险。德军已经推进到高加索，差不多到了伏尔加。这时斯大林格勒的战斗刚刚打响。军队有失去高加索油田的危险。虽然苏联已经不再是不堪一击的了，但斯大林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会成为一场消耗战，这会使他

① N·维尔塔：《斯大林格勒大战》，第21—23页。

② 罗·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第590、617页；约翰·迪安：《奇怪的同盟》，第17页；中将吉法德·马特尔爵士：《俄国的观点》，第113、157、158页。

③ 很可能由于这一原因，斯大林采取了一个极端危险的决定。他把一部分远东的军队投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而在此以前，他一直没有动用这支部队，以准备对付日本。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把远东的后备军又返回原来的建制。见约翰·迪安：《奇怪的同盟》，第223—224页。

的坦克、飞机和运输动弹不得。他特别重视斯大林格勒之战，这是“斯大林的城”，他的旧察里津，如果它陷落，就会对民心士气发生无法估计的影响。因此，当丘吉尔向他传达那个消息时，就勿怪他要怒气冲冲地说，苏联对此大失所望。他过去经常重复地说，他不愿“为别人火中取栗”，现在他仿佛感觉到，他毕竟被引诱去干这桩不合口味的的事情了。在苏联对丘吉尔这次访问的记述中，曾引证了斯大林在丘吉尔离开以后所说的话：“一切都清楚了。只是在非洲和意大利发动战役。他们只是想第一个到达巴尔干。他们要我们流尽鲜血，然后再把他们的条件强加给我们。……这是异想天开！斯拉夫人是和我们站在一块儿的。……他们希望我们丢掉斯大林格勒和丢掉发动一次攻势的跳板。……”^①

这一记述显然是事后作了一点渲染。斯大林说丘吉尔在1942年8月就有了入侵巴尔干的计划，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那时这个计划在丘吉尔心中是不大可能成熟的。但是丘吉尔向他解释的推迟第二战场的理由——主要是缺乏登陆舰艇——肯定是不能使他信服的。他认为，德国的军队绝大部分陷在苏联战线上，希特勒已经没有足够的士兵来防御大西洋沿岸了。^②

丘吉尔后来承认，他对斯大林反复无常的行为大惑不解。

① N·维尔塔：《斯大林格勒大战》，第26页。

② 美国的一些主要将领（其中包括马歇尔将军）和一些英国专家也持有这种观点。（罗·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第526、568—570、589—591页以及其他各页。）马特尔中将在他的《俄国的观点》（第157—162页）中也说，德国在1942年能用于防御大西洋沿岸的兵力比1944年的要少。马特尔将军还说：“这倒是我们的良机，但我们却缺乏登陆舰艇。”龙德施泰特元帅和德国的其他将领证实了这一观点，参看《在山的那一边》，第237—240页及其他各页。

关于第二战场的叫喊一过去之后，斯大林对丘吉尔又出乎意外的亲切，极为友好地倾听丘吉尔解释入侵非洲的计划，对于英国计划无情地轰炸德国城市表现得兴高采烈。这是很容易猜到的，斯大林的“反复无常”反映了他态度上的矛盾：对于第二战场问题他不禁要发发脾气，但是他太关心苏联同西方的结盟，太担心单独媾和了，以致不得不在争吵一番之后不去迁就他的客人。当然，外间对于这种严重的不和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人们只知道，这两位首相的会谈“是在友好和完全真诚的气氛中进行的”。不过，苏联士兵还是感到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他们在这场考验中对他们的西方盟国越来越不耐烦和越来越失望了。又隔了两年盟国才入侵西欧，对于这件事如何影响了群众的情绪，倒不必夸大其词。不过，红军是在一种被孤立的压迫感下去从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的。

在这次战斗打响之前，苏联军民的士气十分低落。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的团长写道：“在南方罗斯托夫周围，俄国人的士气似乎已经降到了低点，他们几乎停止了战斗。据信，斯大林元帅亲自到了那一段前线。总之，事情看来是清楚的，很快就实行了大范围的清洗。……结果很成功，南方俄国人的士气立即就有好转。”^① 据说斯大林主持了一次军事审判庭，以玩忽职守罪审讯了几名将军。^② 党的宣传部长雅罗斯拉夫斯基谴责

① 中将吉法德·马特尔爵士：《俄国的观点》，第43页。

②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接替布琼尼并卓著功勋的提摩盛科从指挥的岗位上消失了，但是还不清楚他是被撤职，还是因为在战斗中受伤而离开。

高加索的行政当局，说它完全没有准备防御该地的城市。德国企图在高加索的民族和部族中挑拨离间，并在其中征募合作者，这种企图倒是有些成功的——这件事实战后已为当局承认，当时有几十万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以及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被控以帮助敌人而遣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兆头并不是好的。但这是一场关系到个人前途的竞争（它甚至超出了纯粹的军事关系），斯大林是经不起失败的。在战斗持续的六个月中，他指挥和监视着这次战斗以及随后展开的反攻的整个过程。

从一开始，这一战役的运气就很好。德国人起初并不认为这座城市是头等重要的。苏联人只是在7月中旬才布署部队来防御它。的确，在军事上并没有必然的理由使斯大林格勒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战役的所在地。德军很可能十分容易地在斯大林格勒南面割断斯大林格勒和里海之间的伏尔加生命线。现在主要是心理上的动机迫使希特勒要去进攻。德国的将军们是这样叙述事情的经过的：“到了那时，即8月下半月，对斯大林格勒就开始故意地一再加码。俄国人在那儿集结了更多的后备力量。……俄国人增援斯大林格勒比增援高加索要更容易一些，因为斯大林格勒更接近他们的主要战线。希特勒因一再受挫而怒不可遏。这个地方的名字——‘斯大林城’——就是一种挑战。于是他从主要战线和其他地方抽调力量，力图攻克它，甚至因此而捉襟见肘。”^①在前一年，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的野心曾经集中反映在克里姆林宫中的讨价还价上，现在两人的野心同样强烈地反映在争夺斯大林格勒上。

^① 利德尔—哈特：《在山的那一边》，第215页。

到8月下半月，苏军已经撤退到斯大林格勒防御区的中心。斯大林派他最能干的司令员朱可夫、总参谋长瓦西列夫斯基(他是接替沙颇什尼科夫的)和马林科夫到危急的现场去。他给斯大林格勒的守卫者发出著名的命令：“不许后退一步”。这并不是撤退中的军队的司令员所经常爱说的一句漂亮话，也不是斯大林迷恋静止防御，就象希特勒在战争的锋芒转而反对他时所做的那样。相反地，巧妙的撤退和避战迄今一直是斯大林“纵深防御”的主要因素。但是阻止敌人向这个以他命名的城市推进，这对他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事情。他的传奇正处于危险之中。

德军在继续推进着，但速度很慢，牺牲很大。9月上半月，战斗转移到通向该城的要道上；下半月就在它的郊外和中心进行了。崔可夫的第六十二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工厂的工人共同作战，这些工人中有的人在二十二年前就由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领导着在这儿战斗过。防守者被挤到了伏尔加河岸；所有的退路都被切断了；增援部队和补给只能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由河那边运过来；浮冰很快就阻碍了水上的运输。10月5日，斯大林再次向被围的守军讲话：“我要求你们采取一切措施来守卫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一定不能放弃给敌人，那一部分已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必须收复。”从9月27日到10月13日，战斗是在三座工厂的所在地进行的，它们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红十月工厂和街垒工厂。从10月14日到11月19日，战斗就逐屋进行。现在德军占领一条街所消耗的时间和鲜血，就比以前征服整个欧洲国家的还要多。到了11月中，防守者只剩下紧靠河岸的少数阵地了。就在这样的时刻，斯大林在他11月7日发布的命令中还企图鼓舞一下人心，他说：“在我们的街头仍

然要庆祝节日”。11月19日，当德军似乎要作最后的努力来完全控制城市的时候，斯大林发布了反攻的命令。

他在9月大混乱的时候就已开始计划这一攻势。他向瓦西列夫斯基总结形势说：“我们仍在单枪匹马地战斗着。我们的局部反攻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一些师被消灭了。有的〔将军〕要我们这样做，有的又要我们那样做。有的人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只限于把德军逐出斯大林格勒；另外一些人又想说服我们等待盟国的帮助。而所有的将军都在要求后备兵力。”他认为，只有发动巨大的反攻才能克服危机，而这样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要求瓦西列夫斯基（也许他是要求朱可夫吧？）制订行动计划。

斯大林对这次反攻的想法，还是根据莫斯科战役所曾根据的同样的心理前提和对希特勒思想的同样洞察力，虽然在军事行动方面，这次战役要更为复杂、成熟和有效。斯大林再一次指靠他的敌人的盲目自大来取胜。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希特勒以为苏联军队夏季中在南方已经被打乱和解体，不可能集结起来进行一次反攻。斯大林还进一步认为，德军将再一次不可能重新部署自己的队伍，以便从进攻队形改为防御队形。希特勒在10月14日的命令中事实上是向他的士兵明确保证，苏联的反攻是完全不可能的。斯大林分配给斯大林格勒守军的任务就是，在斯大林格勒这个口袋中牵制和消耗德国南方集团军的这支精锐部队。同时他还增强了战略后备，对来自战场上受压最厉害的司令员要求增援的绝望呼声充耳不闻。他训令他的总参谋长：“不管他们怎样叫喊和抱怨，都不要答应给他们任何后备力量。不要从莫斯科前线哪怕是抽出一个营给他们。”他没有犯招致希特勒失败的兵力分散的错误——希特勒那时正把

他的后备队毫无目的地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之间调来调去。斯大林让朱可夫掌握后备队的使用。^①朱可夫极端秘密地把这些后备队分配给斯大林格勒侧翼北面、西北面和南面的三个集团军。瓦图丁、罗科索夫斯基和叶廖缅科负责这三个集团军；沃罗诺夫指挥这次战役的主要武器炮兵群。这三个集团军都集中打击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的后部，并割断他们同西面德国集团军的联系。第一个打击落到德军战线的薄弱结合部，即由半心半意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部队守着的那一部分战线。这是另一个关于心理和政治远见的例子，这次计划正是根据这种远见制订出来的。11月19日，瓦图丁从北面出击，第二天罗科索夫斯基跟着出击，然后是叶廖缅科从南面出击。到第四天，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本身就被包围了。

斯大林这时命令他的将领，不去注意冯·保卢斯被围的师团，而是打击外围的德军，并把他们从伏尔加赶到顿河和更远的地方。这时，曼施坦因的一个德国集团军从南面冲来解救冯·保卢斯；希特勒还命令他的空军建立了一条到斯大林格勒的空中走廊，把食品和弹药送给被围的师团。斯大林投入了他的空军后备队，封锁了这条“走廊”。后来他的将领在先对付冯·保卢斯还是先对付曼施坦因上意见不一，他决定首先对付曼施坦因。进攻获得了成功；到12月底，主要的德军部队已被

① 战后所写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历史，把后备队和这次反攻的指挥者说成是瓦西列夫斯基而不是朱可夫。这必定是战后为了贬低朱可夫作用的明显目的而对历史进行的“修改”。在战争还在进行时，发表于1942年12月31日《真理报》上的苏联情报局的官方公报说，这次军事行动是“在最高指挥部的代表们全面指导下进行的，他们是：朱可夫大将、瓦西列夫斯基上将和沃罗诺夫炮兵大将。”由于朱可夫是大将，官阶高于其他三人，所以必定是他而不是瓦西列夫斯基担任最高指挥。

逐退到斯大林格勒以外一百二十英里处。2月1日，冯·保卢斯和二十三名德国将领以及他们的部队全部投降。不久以后高加索的德军也被肃清了。这样，这次在各方面都同斯大林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战役就结束了，德军的精锐被全部歼灭。同这次战役相对照的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那次战斗，那时斯大林作为一个军事领袖，跌跌撞撞地走了第一步，而现在他在世界人民的眼里几乎成了一个巨人了。①

1941年和1942年的事件使苏联的观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斯大林经常指出，战争使苏联受到了最严重的考验，也最后证明激励苏联人民的思想 and 原则是正确的。的确，这个政权比它的反对者、甚至比它的某些赞美者所预料的都更能够经受考验。在最严重的危机中显示出它的基本力量。但是战争也的确使这一政权赖以存在的那些思想习惯发生混乱，就象三十年代的情况那样；同时战争也迫使斯大林公开地和隐蔽地进行政治调整，以便克服国内业已存在的分裂，并创造对于胜利十分必要的在目标上的统一意志。

全国的民心士气有两度达到破裂点：在莫斯科战役前夕和

① 这里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叙述是根据《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官方公报(《苏联情报局消息》，第3卷)的报道，以及《伟大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文集和对这一战役有很明晰的总结和分析的论文：B·特尔普霍夫斯基的《伟大的斯大林格勒之战》，载《历史问题》，第2期，1948年；M·沃多拉金的《斯大林格勒的民军》，载《历史杂志》，第3期，1945年。维尔塔的《斯大林格勒大战》史料价值有限，有的地方的可靠性是很可疑的。德国关于这次大战的观点，见利德尔—哈特：《在山的那一边》。

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夕。形势的恶化引起了一些严重的迹象，如惊惶失措和开小差；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情况，这些迹象还会再度出现。其他方面，如大规模地同敌人合作，特别是在乌克兰和高加索，这是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不满和怨恨造成的结果。斯大林认识到，这个国家需要某种国内休战。他能够比较容易地安排这种休战，因为就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要去同任何值得一斗的政治对手进行和解——那些政治对手早已经被消灭了。他所必需做的只是消除某一部分人之中的模模糊糊的不痛快和说不出来的怨恨之情。这部分人究竟有多少和有多重要，这也很难说。不应幻想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是敌视政府的。如果情况真是那样，那末不管是爱国的呼吁、督促或压制，都不能防止希特勒仍在坚决希望的苏联在政治上的崩溃。^①战前这个国家已经实现的转变，尽管有它的阴暗面，却增强了这个国家在道义上的力量。大多数人都因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进步而深受鼓舞，使得他们决心坚忍不拔地去防御外来的危险。少部分人肯定是不高兴和怀恨在心的；而且从战前社会大动荡的规模和敌对利益影响的范围来看，还不能轻视这少数人。在满意和不满分子之间，还有那些执怀疑和观望态度的人。一碰到惨重失败时，全国的情绪就可能有所波动，忽高忽低，突然而迅速地摆来摆去，以致破坏了政治上的平衡。政府竭尽全力来稳定全国的情绪。只有稳定了情绪，才有希望使人们响应政府的紧急要求，才可能激起全国最大的热情，如果没有这种热情，未来年月的巨大胜利就是不可能的。

^① 利德尔—哈特：《在山的那一边》，第182页。冯·克莱斯特元帅说：“胜利的希望主要建筑于这样的前景上：入侵将使俄国发生政治上的大变动。”

战前，整个的宣传机器都在不停地唠叨着党内斗争的故事。不允许国家片刻忘记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和其他偏向的罪恶，不允许片刻松懈对“人民敌人”的“警惕”。在战争期间，这个主题已经被谨慎地抛弃了。面对希特勒货真价实的阴谋，以前那些伪造出来的阴谋仿佛已经被忘却了。被粉碎的反对派中的幸存者，凡是对战争努力还有用的，都从集中营中放出，并分配了重要的国家职务。图哈切夫斯基的追随者曾被撤职和流放，现在都涌回军事总部。根据一个可靠的报告，这些人中间就有罗科索夫斯基，他是斯大林格勒之战的胜利者，前波兰共产党员，曾经充当图哈切夫斯基总部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官。还有拉姆金教授也被释放，并由于服务优越而受到称赞，荣获最高的奖赏和勋章。他是三十年代“工业党”的领袖，曾被控进行阴谋活动和同某一外国力量有联系。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实际上曾经鼓吹把苏联转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共和国，现在又作为莫斯科主要报纸的撰稿人而出现了。这些都是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模模糊糊的国内休战情况。说它是模模糊糊，这是因为它不是根据任何正式的和解行动或者大赦，而只是根据斯大林的暗示。这种暗示虽然对被涉及的人来说是明白其意思的，但却不使斯大林承担什么义务，也不等于他在作“自我批评”。

* * *

但是，最重要的新发展还是民族主义的高涨，而在不久以前，这种思想还被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不相容的。这一高涨部分是自发的。从占领区传来的消息说，纳粹对苏联人的亲属

们有一种虐待狂，而且希特勒宣传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是劣等民族，这使广大的苏联人怒不可遏，并产生了一种民族的骄傲感。这种愤怒和骄傲感又被盟国推迟入侵西欧而加深了的孤立感进一步深化了。诗人、作家和新闻工作者都表达了这种感觉。照亚历克赛·托尔斯泰的话来说，苏联把自己看成是“阿特拉斯神^①，独自承担了世界的重担”。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斯大林把它作为一项政策来人为地鼓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已经看到，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个月中，他就召唤过库图佐夫、苏沃洛夫、米宁和波札尔斯基的亡灵了。大量的宣传者效学他的榜样，毫无节制地赞颂俄罗斯帝国的过去。后来他又向国家发布了一长串改革或反改革的法令，目的都是为了煽动这一新的情绪。

这个国家需要某种东西，需要一个口号或思想，来点燃它的幻想力和支持它的英勇精神。在内战时期，国际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激励了红军的战斗。后来，广大的布尔什维克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发生战争，苏联就要把它转变成为一种不是按照国家而是按照各国的阶级来分野的斗争。这种对革命国际主义的信念已经逐渐衰退了；在单独一个国家中长期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及那些解释国际主义的人在大清洗中牺牲以后，国际主义的信念就所遗无几了。^② 斯大林现在一门心思地要维持苏联

① 希腊神话中把天扛在肩上的巨人。——译者

② 莫洛托夫在战争第一天所说的话中还回响着老布尔什维克的思想：“这次战争不是德国人民，不是德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强加给我们的，他们遭受的痛苦我们是很理解的；战争是嗜血的法西斯统治集团强加给我们的。”（《爱国战争中的外交政策》，第1卷，第75页。）这种对德国人民，甚至包括知识分子全部免罪的说法，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了。

和西方国家的联盟，这就是对恢复老的革命国际主义的决定性的威慑力量。民族主义的高涨正是国际主义的反动；这种高涨当然在军队中被强化到了顶点。

正是在军队中，由于体现这种新精神，发生了最惊人的变化。作为革命和内战的一种遗产而还留在军队中的习惯、举止和制度，大多数都已经荡然无存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当中，1942年10月发布了一条特别法令，废除了政治委员，而在此以前，政治委员是代表党监督军官们的。事实上，政治委员还是保留着的，不过是从属于军事指挥员罢了。这个措施在军事上是有道理的，它建立了指挥上的统一，增强了纪律性。但是它的政治意义也不是不重要的。它是热心于返回革命前军事传统的一个信号。《真理报》1942年11月在评论关于废除军队中的“社会主义竞赛”法令时直截了当地说，士兵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义务，他的职务就是为祖国服务，就象他的先辈所做的那样。彼得大帝的军事规章制度被作为学习的模范。建立了近卫团和近卫师（光是这一名称就令人回想起沙皇时代）。设立了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勋章。曾经作为沙皇压迫象征而加以蔑视的哥萨克兵团又复活了，并恢复了它往日的魔力。最后，在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前夕，军官制服上重新采用了肩章，而在头一批布尔什维克法令中，有一条就是把肩章作为军队中反动等级制度的标记而加以禁止的。敬礼制度作为一种义务，并且严格地加以实行。成立军官专用俱乐部，下级军官和上级军官的食堂被严格地分开了。仿佛是为了批准这整个趋向（通过它而使军官团的地位和特权提高了），并强调他个人同这一趋向的关系，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后，斯大林于1943年3月接受了

元帅的军衔（这是他在六十四岁时的第一个军衔）。他还大肆封赠他的军官团。光是12月，他就提升了三百六十名指挥员为将军；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报纸每日的篇幅上都登满了提升的长名单。他授予一些最卓越的司令员以元帅杖，接着又十分热心地显示他自己就是军官团中的一员。

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不仅仅限于在军队中流行，它还渗透进全国的政治领域。斯大林小心地不使他个人对这一新路线太直接地承担责任，因为他显然深切地知道，老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是反对这些东西的。但是他以自己的那一种奇特而又难以捉摸的方法批准了这一新路线。在莫斯科战役中他谈到国家社会主义时说：“能不能认为希特勒分子是**民族主义者**呢？不，不能。实际上希特勒分子现在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帝国主义者**。”^①他继续说，当希特勒统一德国领土时，还有相当的根据说他是民族主义者，但是当他吞并非德国领土时，他就不再是民族主义者了。这是出自斯大林之口的一个奇怪的论点，因为在此以前，布尔什维克们（其中包括斯大林）从来就不拒绝把他们的敌人和对手封为民族主义的，因为对列宁的信徒来说，这是一个贬义词。现在他拒绝封希特勒为民族主义者，就使这个词失去了贬损的含义了。他仿佛在说：“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是**我们**，而不是我们的敌人。”他的宣传人员抓住这个暗示就大作文章。他自己则心神不安地在残余的国际主义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倾向之间保持平衡。因此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

^① 《斯大林文选》，第276页。

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①希特勒的宣传机器广泛地利用了这些话，他们告诉德国士兵，红军不会饶俘虏的命，从而诱使他们作野蛮的殊死战斗。斯大林后来改正了自己的说法，把对他的话的解释称为“愚蠢的谎言和对红军的拙劣的诬蔑”。他接着说：“如果把希特勒匪帮同德国人民、同德国国家混为一谈，那是可笑的。历史经验证明，希特勒之流可以上台下台，而德国人民还是德国人民，德国国家还是德国国家。”^②他的宣传人员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也没有弄清这个区别。他们同其他盟国的许多同事一样，唤起人民来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国家，而不是仅仅反对纳粹。斯大林的作战命令结尾处总是有这句话：“消灭德国侵略者！”这句严酷的话日复一日地加以重复，并在诗歌和报纸文章中出现，就立即激励起并长久保持住这个战斗中的国家的同仇敌忾之心。这好象就使复杂而多面性的战争缩减成为原始的肉体消灭了。

一方面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野蛮行为，另一方面是斯大林宣传民族主义的狂热，这就使得苏联人几乎不可能向德军的普通士兵进行呼吁，不可能在国家社会党员和其他德国人民之间打入一个意识形态的楔子，不可能有效地进行可以减少恐怖屠杀的政治战争。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启示的力量，使得苏联士兵不能投降或动摇。这是苏联的一个弱点，因为有了这个弱点，苏联只有付出高昂的和最可怕的代价才能取得胜利。的确，也很难讲下面两种情况何者是更重要的：苏联不幸碰到了这样一个领导，它不能以破坏和流血再少一些的代价赢得战争的胜

^① 《斯大林文选》，第279页。

^② 同上书，第293页。

利；或者苏联有幸碰到了这样一个领导，它能够在付出了比任何国家付出的更为高昂的代价，使得一个在历史的过程中一度除了投降和屈服之外就别无出路的国家获得了胜利。^①

1943年9月4日，斯大林又以突然恢复东正教的活动而使世界大吃一惊。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教会一直被视为旧社会的东西而处在半被镇压的状态中。斯大林接见了教会的实际领导者谢尔盖大主教，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的会见之后，发布命令恢复了东正教的教务委员会。他对这一行动的解释是，教会曾在战争努力中进行合作，因而证明它是忠于祖国的。这当然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占领区中的主教和牧师也曾同德国人合作。对于俄国旧传统的这种新热情，要求恢复教会的活动，因为它在那个传统中占了中心的地位。由于宗教还没有失去对农民的掌握力，由于在最近的这场考验和磨难之中宗教情绪有些复活，对教会的这场新的交易大概可以消除政府同教民之间的隔阂，从而增强了政治上的休战。

斯大林的心里还有更为广泛的考虑。在红军夏季攻势的过程中，乌克兰的大部已经获得解放；斯大林看到红军有一天会跨过边界进入巴尔干，那儿东正教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他可能对自己这样说，为苏联在巴尔干的影响，是值得举行一次东正教弥撒的。沙皇们曾经利用宗教来作为他们外交的驯服工具；斯大林从他的冷静机会主义打算出发，现在也步上了他们的后尘。他作为一个正教学校的学生，已经半真半假地重返教

^① 丘吉尔在战时说过：“对处于痛苦中的俄国来说，在它上面有这样一个伟大而粗犷的战争领袖，是非常幸运的。他是一个有着极为出众性格的人，适于他投身其内的那个阴暗而多事的时代。”

会，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巧合，罗曼蒂克的历史学家可以从中看出一种特别的意义。但是，他在解散共产国际不久之后就恢复了教会的活动，这是更具有政治意义的一次巧合。这两个行动彼此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由于下面这一事实就更加得到了强调：《国际歌》本来是一位巴黎公社社员写的世界工人运动的赞歌，在此以前一直是苏联的国歌，现在它已被另一首更富于爱国主义高贵精神的国歌所代替。^①

也是为了和整个趋势相一致，斯大林发起了一个新的亲斯拉夫运动。亲斯拉夫主义和它的极端泛斯拉夫主义曾经是革命前俄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一个变种曾经是沙皇外交的一种工具。在沙皇同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进行斗争时，它号召沙皇的斯拉夫臣民——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捷克人——同俄国实现种族上的团结。亲斯拉夫主义的另一变种有着一种革命的、“民粹派”的色彩，它宣称要达到斯拉夫农民国家的团结，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布尔什维主义）曾经抛弃了各种亲斯拉夫主义的版本，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是鄙视关于种族团结的任何呼吁的。现在复活的亲斯拉夫主义兼有它早期两个变种的特点——它既是外交的工具，同时又暗示斯拉夫人所特有的一种共同的革命利益。

斯大林虽然倡议这种新的传统主义，但他不能不认识到，这两种观点，一种是返回沙皇大俄罗斯主义，一种却是从列宁的教导中得到启示的，它们从根本上就彼此对立。他不能同两

^① 新国歌开头的一句就是：“伟大俄罗斯自由共和国的不可摧毁的联盟永远团结一致……”

者之中的任何一个密切结合起来。他已经离开列宁主义俄国的海岸很远了，但他又不能在俄罗斯母亲的海岸旁抛锚，于是他就两者之间游荡。当然，这两种观点不可能发生任何公开的争论，因为政权及其意识形态都必须保持“磐石般的坚固”。甚至也说不准，政治局的成员中谁更多的表达了这一原则，谁又更多地表达了另一原则，或者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那些年里政治局内部的生活是几乎不为外人所知的。但是，两个派，一个革命派和一个传统派（只是有些半自觉的），安静地共处在人民思想和感情中，也共处在斯大林本人的心灵中。研究他的战时演说的细心读者，通过他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曲折转变和着重点的变化，可以探索到时而这一派时而另一派占先的例子，以及他们彼此牵制的例子。例如，斯大林观点的两重性就生动地反映在他庆祝1943年十月革命节的行为上。在纪念日前夕，他戴上了苏沃洛夫勋章。他出现在莫斯科苏维埃的大会上作一贯的纪念演说，但这是他头一次穿着元帅制服、佩戴着绣金的和用钻石与珠宝镶嵌成红星的肩章出现在那里。当外面礼炮齐鸣、烟火缤纷地庆祝基辅解放时，他站在苏维埃的台前，宛如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俄罗斯的化身。但是他在演说中却完全不顾帝俄的崇高象征，相反地却回忆起“伟大的列宁的遗训”，接着并详细地论述了胜利的进程。仿佛是为了冲淡一下前几个月抬得很高的对军队的迷信，他现在说：“无论是在和平建设年代，还是在战争时期，苏联人民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都是列宁的党。”^①

^① 《斯大林文选》，第364页。

他的行为、甚至整个的形势都表明，他正企图减缓党和军队之间的某种潜伏的紧张关系。民族主义情绪集中表现在军队里。军队获得了许多荣誉，从而使党相形见绌。这两个部门本来没有必要去搞任何耸人听闻的阴谋或权力斗争，它们之间的联系迄今一直是非常坚固的，因为很多军官都是党员，而且外来的危险也使它们团结一致起来。但是，一定程度的竞争还是不可避免的。在和平时期中，党热心地保护它对其他一切组织的领导地位，但战争势必要削弱这种领导地位，给军队以新的重要性。由于形势使然，总参谋部和政治局居于平等地位，并使军官团比党书记处文官统治集团享有更大的权威，更不用说具有更大的魅力了。党不得不对此加以容忍，但它也不得不为此而烦恼。

希特勒因为他的将领同他意见不和而大生其气，有一次曾告诉他的朋友们说，他多么地羡慕斯大林，因为斯大林能够比他更无情地对待固执的将领。^①这位“波希米亚的下士”^②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同他对苏联的许多“直观”一样，都是肤浅的和错误的。他很可能想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及其集团的被清洗，而这件事恰恰发生在希特勒同施莱歇尔将军摊牌后三年。^③的确，红军军官团是国内唯一的这样一个组织，斯大林

① 利德尔—哈特：《在山的那一边》，第207页。

② 指希特勒。他的祖籍是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之间的下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德军中任下士。——译者

③ 1933年1月28日施莱歇尔内阁垮台，希特勒跃跃欲试，但风闻施莱歇尔要发动军事政变，他就调兵遣将，对付这次可能的政变。1933年1月30日他终于受命组阁。——译者

没有对它施加集权主义的全部压力。他当然是控制着军队的，但他也小心地不使它过于卷入震撼了党和国家的所有那些争论和阴谋。他鼓励非政治化的将军，要他们忠于职守，一心做好工作，只要时不时地向党在口头上表示忠诚就行。过去同情过这一反对派或那一反对派、但在政治上却不是积极的将军，就不需要进行污辱性的悔罪仪式，而在政治上有同样污点的文职人员却是不允许对此规避的。在政治上重要的少数领域中，军事艺术算是在创造性和试验精神上受到斯大林鼓励的一个领域，他没有根据他的假辩证法教义对它强加是否。在1937年以前，他曾允许图哈切夫斯基在有关战略和战术的问题以及军队现代化上自由行事。这样，军官团的大部分人就逃脱了暴虐的精神训练，而多年以来这种精神训练曾经残害和毁灭许多文职人员。诚然，1937年的清洗使情况严重地恶化了。但是意味深长的是，被控告的军事领袖中没有一人被叫去当众背诵通常的悔罪和自我谴责书。他们都象男子汉大丈夫一样地面对审判官和执行吏。光是这一情况就足以表明，在那种集权主义的气氛中，军官团已经获得十分罕见的一种独特思想、一种独立精神和一种道义上的支撑力量。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军队除了遭到其他损失以外，还严重地丧失了自信心，而这是清洗运动在指挥人员身上所造成的后果。不过，斯大林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件事。他使得他的将领们重新获得自由行动的感觉，鼓励他们说出心里的话，自己通过试验和总结错误的方法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他还使他们解除了对老板发怒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正是重压在希特勒将领们心头的事情。他由于他的军官们缺乏勇气和警惕性而严重地处

罚他们；由于他们的无能而撤换他们，甚至当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表现无能时也在所不惜；他也擢升那些有创造性和有效率的人。希特勒的将领们对斯大林和希特勒作了比较，他们更为敏锐地评价斯大林的方法说，在苏联的上层指挥中“充满了一些有能力的人，因此他们被容许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而且可以平安无事地坚持按自己的方法去做”。^①

当然，他同希特勒一样，在每一个重大的和许多次要的军事问题上都作出最后的决定。那么，人们就要问了：一方面是斯大林经常干预战争的指挥，另一方面他的下级又有主动的自由，这两者究竟是如何调和起来的呢？问题在于，斯大林作决定时有他独特的方式，他不仅不限制将领们的想法，相反地还诱导他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希特勒一贯是在事前想好了主意——有时是漂亮的主意，有时就是胡思乱想——然后试图去强迫象布劳希契、哈德尔和龙德施台特那样的人去接受。他是一个半瓶醋的业余爱好者，在战略问题上尽放空炮，却不能容忍那些看不到他的特殊教条或计划有何优点的人。斯大林不是这样的。他不把战略上的教条强加给别人。他又不把自己的行动蓝图直接交给将领们。他根据对形势的一切方面，即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卓越知识，向他们指出一般的想法。但是除此之外，他就让他的将领们去形成自己的意见，制订自己的计划，然后他再根据这些作出决定。他的作用似乎就是在将领中作一个冷静的、超然的和有经验的仲裁者。在他们发生争论时，他就收集有关人员的意见，权衡利弊得失，把局部性的观点同一般的考虑联系起来，最后谈出自己的想法。因此他的决

^① 利德尔—哈特：《在山的那一边》，第232页。

定并不完全勾销将领们的想法，而经常是批准了将领们曾经一再考虑过的那些主意。这种领导方法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是新鲜的。在二十年代早期，他以类似的方法领导了政治局。当时他就小心谨慎地查明多数人的意见，然后据此形成自己的意见。现在这些将领所以容易接受他的启发，也正因为他自己易于接受他们的想法和建议。他不象希特勒那样脑子里老是产生一些战略上的新花样，而是在工作方法上留有余地，让他的指挥员们进行集体的创造。他还赞成在总司令和下属之间有一种更为合理的关系，这比德军最高司令部中盛行的那种情况要好得多。^①

这并不是说斯大林只是简单地追随指挥员中的多数意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多数人的意见就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也不轻易随和。在遭到严重失败时，他剧烈地补充和更新了最高司令部的人员。他把老资格人员的一切缺乏创见的主

^① 下面的引证很能说明斯大林的工作方法。它描述（虽然在方式上太通俗和太简单，但实质上却是正确的）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一个重要环节上进行干预的情况。这时在瓦西列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之间对于首先打击保卢斯还是曼施坦因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个分歧提到了斯大林那里。罗科索夫斯基抗议把原配属给他的马林诺夫斯基兵团调去打曼施坦因。斯大林因此征求其他将领的意见：

莫斯科总部。

斯大林（在电话上说）：你的意见怎样？把它抽去打曼施坦因？谢谢。（挂上电话，又重新要号）喂……瓦西列夫斯基建议，我们应该先处置曼施坦因。他建议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兵团去完成这个任务。你的意见怎样？还是让这个兵团隶属于罗科索夫斯基吗？谢谢。（挂上电话，又重新要号）瓦西列夫斯基建议把马林诺夫斯基的兵团改属叶廖缅科，以便击败曼施坦因。你的意见如何？（倾听）不，这不是回答。要干脆回答是还是否。你还要想一想吗？好吧。

最后斯大林同意瓦西列夫斯基的意见，命令向曼施坦因发动进攻。（N·维尔塔：《斯大林格勒大战》，第230—231页。）

张都抛到一边，只注意在战斗中的实际表现。当战争爆发时，差不多他目前所有的元帅和将军都还是下级军官或无名小辈。在莫斯科战役时，他开始对这一群新的军事杰出人物进行基本的挑选，于是朱可夫、瓦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和沃罗诺夫就涌现出来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继续进行了挑选，于是瓦图丁、叶廖缅科、马林诺夫斯基、崔可夫、罗特米斯特洛夫、罗第姆采夫和其他人就从此为人所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这种挑选接近完成了。这次战役成了年轻的切尔尼亚科夫斯基象彗星一样的一生中的转折点，他在三年之中，从少将升为大将。这些人差不多都是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毫不墨守陈规，在战争这座严酷的学校中贪婪地学习，直到他们成为敌人势均力敌的对手，后来更胜过了敌人。

军队、士气和指挥人员的新生，是苏联最突出的一个成就，这要归功于斯大林。但是这一新生的政治含义却是很不合斯大林口味的。他的元帅和将军们开始引人注目了。在此以前，甚至在政治局的同事中，斯大林也是居于最高位置的。在人民眼中，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居于他的副手地位，也没有一个人享有普遍的尊敬和爱戴。斯大林一个人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只是在很下面的地位才出现几乎是没有什么性格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日丹诺夫、安德列耶夫。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曾经笼罩在一片灰色的藉藉无名的气氛中。这种气氛现在大部分消散了。新的名字与伟大而光荣的胜利相伴，载于人民的口碑。他们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力量，虽然它绝对不是反对斯大林的，却也不合于他的政治风格。我们曾经看到，从早期以来，布尔什维克就多么担心革命会发生波

拿巴的变形。虽然斯大林本人曾一直被骂为现代的波拿巴，但他现在也不禁要斜着眼睛看着在他的元帅中正在日愈发展的军事传奇。

第十三章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斯大林 1943 年的外交。——德黑兰会议的准备。——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他们性格的比较和对照。——“第二战场”的争论。——“事实上、精神上 and 目的上的朋友”。——1944 年的“十次打击”。——斯大林拒绝西方在苏联和波兰之间调解。——势力范围的分界（1944 年 6 月至 10 月）。——斯大林在东欧和西欧的政策。——他在 1944 年 8 月华沙起义中的行为。——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1945 年 2 月）。——他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利益。——他政策中的两条线。——1815 年和 1945 年；亚历山大一世和斯大林（相同点和相异点）。——“人民民主”的故事。——斯大林对德国共产主义的看法。——他关于大国共同统治的希望受挫。——斯大林在波茨坦（1945 年 7 月）。

在 1943 年的夏季攻势中，红军克复了曾经丢掉的苏联领土的近三分之二。这次攻势之后，斯大林对于战争的结果就不可能有什么怀疑了。在他的历次胜利中，这是第一次冬将军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苏联的野战军在数量上还没有达到超过德军的优势，只是到了后来它才获得压倒的优势的。正如斯大林在德黑兰亲口告诉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他只比德军多六十个师，他把这些师在各个战区中迅速地调来调去，以便在选择地点和决定的时刻有进攻的优势兵力。^① 他的部队也还没有比德军

^① 约翰·迪安：《奇怪的联盟》，第 87 页。

更为精良的装备。1942年苏联的工业慢慢地从迁移后的情况中恢复过来，产量还很小。只是到了1943年，新建的工厂和从西部逐步迁移到乌拉尔及其东面的工厂才大量地生产出坦克、飞机和大炮。这些武器都要经过极坏的公路和稀少的铁路走一千到二千英里才能运到前线去。在1944年以前，这些武器还不能在战斗中充分发挥作用。同样地，西方国家供应的战争物资只是到了1944年才增加到了最大限度。因此斯大林明白，他仅仅使用了他很快就能调度的力量中的一部分，就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虽然还警告人民不要自满和懈怠，但他的话反映了他的信心在不断地增强。现在他已经能够说：“红军已成了最强大和最有锻炼的现代化军队。”^①

他对于德国同西方国家单独媾和的担心，如果说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话，也必定是大大地减退了。希特勒已经投入了地面部队的百分之八十或九十来进攻苏联，而且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已无力增加在东线的力量来打败苏联。^②甚至还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各种有利条件的结合，其中包括相当重要的希特勒在战略上的错误，苏联能够在没有英美入侵欧洲大陆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③他当然不会这样来进行赌博，但是他知道，他对盟国讨价还价的地位异常地增强了，因为现在是它们更有理由害怕单独媾和，更加急切地要保持这个联

^① 《斯大林文选》，第372页。

^② 希特勒保护大西洋沿岸的部队只有五十九个二等师，而他包括最精锐的师在内的二百六十个师却在苏联前线战斗，这个力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败俄国时的部队多了一倍。见利德尔—哈特在《在山的那一边》（第247页）中所引德国将领的叙述，它在一切要点上都证实了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说明。

^③ 这是苏联军事作家在战后所曾表示出来的观点。

盟。他还知道，它们也急于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这个前景此时还是相当模糊的。在所有政治家中，还没有谁象他那样拥有这样多的王牌。

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达到他在 1941 年提出的那些目标，因为英美迄今还没有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边境的合并。罗斯福和丘吉尔劝他把同波兰的问题留待战后去解决。但是斯大林决心现在就要促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由于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曾宣称它要收回波兰在 1939 年前的每一寸土地，因此斯大林显然就要防止这个政府在波兰建立。1943 年春，一个模糊不清的事件在这个问题上帮了他的忙。德国人宣布说，他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村发现了一个波兰军官和战俘的大规模坟墓；他们说，这些人是被苏联人杀死的。在伦敦的波兰人要求派一个中立的调查团去调查卡廷的坟墓，并暗示说，他们相信德国人的说法。事实上，一些时候以来，他们已经对那些军官的命运感到不安了。当西科尔斯基在 1941 年访问斯大林时，他曾问到这些军官的问题，斯大林对此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无论怎样，波兰人间接支持德国人的说法，这是很不明智的，何况还有很多理由怀疑这是德国人自己的罪行，因为他们就曾杀死了几百万人。如果斯大林正在找寻借口，以便宣布波兰政府是不可取的，那末他现在找到这个借口了。盟国之中没有谁为波兰人的行动辩护。莫斯科断绝了同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关系，并开始准备建立一个亲苏的波兰政府。于是盟国之间现在不仅在波兰的边界问题上、而且在它的政府问题上也逐渐发生了分歧。但是斯大林显然认为，不管他怎么干，盟国都会加以容忍的。他坚信，是苏联军队而不是英国或

美国军队将把德国人逐出波兰，因此就是他而不是丘吉尔或罗斯福将在维斯杜拉河上发号施令。

胜利已成囊中之物，他的野心也就日愈膨胀了。他不再满足于保护他同希特勒合伙时所既得的利益，他还想得到当初因为希特勒的反对而从手上滑掉的东西。1940年他已经要求苏联的利益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占居优势，现在他又再次提出坚决的要求。他对未来和平的想法已经成形，这种想法是同势力范围的那些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二十年代时曾有一些苏联外交家受到这一概念的吸引，但当时就受到斯大林本人的直接谴责。^①现在还不可能非常精确地追溯这一发展的各个阶段。反正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区的问题是在1943年10月盟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提出来的。^②讨论情况含糊不清，问题因此悬而未决。也许可以假定，斯大林是通过莫洛托夫来试探盟国态度的，但这个问题早已经在斯大林核心的班子里讨论决定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即1943年下半年，斯大林开始全神贯注地研究向德国提出的和平条件。1943年1月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宣布了一条政策的指导原则：不允许德国谈判和平条款，它必须“无条件投降”。罗斯福是联想到美国内战而提出这个公式的，在那次内战中北方各州拒绝同南方谈判投降条件。^③罗斯福提出这项充满着严重后果的政策，事前既未同斯大林也未同丘吉尔商议过。斯大林是以一种复杂的感情接受这一公式的。他在这一公式中看到了一项附加的保证，即西方

① 参看第10章所引斯大林在斯维德洛夫大学的演讲。

②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98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1574页。

国家不会损害苏联而同德国寻求和解——当罗斯福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时，战争的势头还没有十分有利于苏联，因此斯大林还能容忍那个附加保证的轻蔑。他在1943年5月1日的命令中也谈到了无条件投降，把它作为自己的公式。但是他也认识到，罗斯福的政策首先势必使德国进行顽强而长期的抵抗，而使盟国单方面负起争取和平的重担。他试图说服罗斯福总统修改他的政策，起码也要在和平条款的一般定义上缓和一些。英国也向罗斯福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是罗斯福坚持他的观点。^①

无条件投降的口号抚慰了所有盟国的民族感情。对德国实行惩罚性的“迦太基式”和约，^②这种思想到处都有许多人赞同。甚至到了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都还赞成使德国“田园化”的计划，即剥夺德国的重工业。^③斯大林的观点也是一个样的。1943年9月，他的经济顾问瓦尔加教授（他在二十年代曾严厉地批评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公开鼓吹下面的观点：应使德国向盟国付出巨额赔款。苏军越是向前推进，越是看到德国人蓄意把占领区变成一片废墟，这个要求就越加深入人心。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谈到了他关于重划德国边界的想法。1943年7月，他授权正在伦敦完成一项特别使命的迈斯基声称，苏联赞成合并东普鲁士和波兰的但泽，这个计划已为罗斯福总统同意。但是斯大林此时还没有建议波兰的边界向西延伸至奥德河和尼斯河。^④把德国的几个省区合并

①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72—1573页。

② 指对战败国提出的苛刻和约。公元前202年，迦太基将领汉尼拔被罗马将领西底阿击败，罗马向迦太基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和平条件。——译者

③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02—1605页。

④ J·西恰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198、213页。

过去，是为了“补偿”波兰人失去的东部边境地区；但也是为了把波兰暴露在德国复仇主义者之前，以便使它绝对地依靠苏联的保护。粗略看来，当斯大林 1943 年 11 月同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见时，他关于和约的想法和他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

* * *

德黑兰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很奇怪的。斯大林尽可能地规避同他的伙伴们会晤。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他拒绝参加他们在开罗举行的会议，理由是蒋介石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如果参加就可能过早地激怒日本，而苏联是极不愿意卷入同日本的纠纷中的。当向他建议单独会见罗斯福时，他也拒绝了。^① 1943 年 10 月，科德尔·赫尔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竭力劝说斯大林同意会晤。斯大林让步了，但又坚持会议必须在德黑兰举行，因为德黑兰当时在苏英军队的占领之下。他顽固地拒绝到离苏联太远的任何地方去；在答复罗斯福的一再建议时，他提议把会议推迟到 1944 年春季，届时他准备在阿拉斯加的苏联战时基地费尔班克斯会晤他的伙伴们。^② 他的借口是，在军事行动过程中，要求他呆在莫斯科，而且只能到可以直接同他的总参谋部联系的地方去。他可能是不愿意离开克里姆林宫，他在那儿有可以信赖的保镖和秘书簇拥着，有充分的安全和权力感；或者他可能希望诱使他的伙伴们到苏联来会晤他，这样就会对他已经提高了的地位增加光采。他所以这样躲躲闪闪，还有自

① 罗·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第 671、733—734 页。

②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294 页。

己的政治动机。他想向他们表明，他对盟国迟迟不入侵西欧是感到愠怒的。他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向他们表示，他认为，同在苏联的巨大战役比较起来，盟国在南意大利的作战是微不足道的。他也可能是想避免向他的盟国透露其军事和政治计划。最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只好同意在德黑兰会晤他。

人们可以想象，脾气、背景和利益如此相异的人，作为盟友或者伙伴走到一起来决定最重大和严重的问题，这还是很少有的情况。在谈判桌上面对面的这三个人，在身世、观点和抱负上是多么地相异呵！丘吉尔和斯大林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马尔巴勒公爵的后裔，一个是农奴的儿子；一个生于布莱尼姆宫，一个生于单间的茅屋。一个人尚生活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英国的精神世界里，并以罗曼蒂克的气质充满活力地去捍卫这种皇家传统；另一个人则具有沙皇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那种严厉气质，曾冷静而镇定地渡过了许多风暴。一个人的后面有四十年议会辩论经验；另一个人长期地活动于秘密小组和保密的政治局内。一个人充满了古怪的癖性，喜欢高谈阔论；另一个是语言无味而不可信。最后，一个人要失去一个帝国；而另一个却好象要赢得一个帝国。

罗斯福站在他们两人中间，但更多地靠拢丘吉尔。罗斯福成长的环境，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出身，受到的各种影响，以及种种的政治传统（如纽约律师协会和海军部），都迥异于斯大林。但是罗斯福的传统比丘吉尔的要更年轻和更得人心一些，因为美国资产阶级究竟要比英国贵族年轻。也许由于这个缘故，使罗斯福能够更接近斯大林。他有时同斯大林一样对丘吉尔的浮夸表示不耐；但是当斯大林听完译员翻译丘吉尔的话后

表现冷淡或讥讽的时候，他又经常在两人之间进行调和。斯大林和丘吉尔代表了阶级意识的两个相反的类型。在他们两人看来，罗斯福这位资产阶级进步派左翼的预言家必定时时表现为一个不合逻辑的中间道路者。斯大林尽管已经有所演变，仍然是根据《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丘吉尔却用一句警句来概括他的观点：“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①这仿佛是特意为了同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原理进行争论的。罗斯福作为一个清教徒和国家领袖，迄今一直免于陷入最坏的阶级斗争暴力和最坏的战争灾难之中，是很难同意那两种概括说法的。

斯大林把他的两个盟友都看成资产阶级的代表。对于他们的民主表白，他即使不怀疑其真诚，也是不太重视的。在他看来，他们的民主不过是假货，因为这些东西如果只是为了隐蔽巨大的剥削机构和产生剩余价值的工厂，那末民治政府的表面文章又有何意义呢？他用一种冷静的好奇心注视着他的伙伴们，就象一个科学家观察自然元素，深信他会明白它们的结构，能够合理地预见到它们在某种情况下的反应。这儿就是那个异己的社会的两个活标本，“另一个世界”的两大领袖。由于历史的矛盾，那“另一个世界”现在奇怪地分裂了：其中的一部分正同苏联作殊死的斗争，而另一部分则由于同盟的纽带而和苏联联系在一起。盟国之间的鸿沟是可能沟通的（沟通它是十分重要的），但它却不会消失，不管向世界人民宣布的友好和一致的庄严声明中如何讲得天花乱坠。斯大林的心中肯定是反反复复地在想这些问题的。

^① 温斯顿·丘吉尔：《战争后果》，第451页。

丘吉尔的思想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他是从另外一个极端出发的。丘吉尔在1941年6月22日曾经说道：“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谁比我更坚持反对共产主义。我决不会收回我对它讲过的一些话，但是在目前展开的场面前，这一切都已经逐渐消失了。”人们当然知道，丘吉尔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所说的一些话，他是拒绝“收回”的，这就是关于恐惧、仇恨和轻蔑的话。这就使人们认识到，“这一切”并不能真正地从他的心中消失。但是人们也可以猜到，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态度，在某些方面比斯大林对他的态度更为复杂，因为丘吉尔不能不除了用政治家的眼光外还用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的眼光来观察他的伙伴。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一心要策略地处理好同这个他认为是危险的盟友的关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很可能由于那位伟大的“否定者”（丘吉尔这样称呼列宁的）的继承人使苏联发生的奇异变化而浮想联翩。最近俄罗斯传统主义的高涨，不能不使他感到，斯大林已经半信奉他丘吉尔的原则，正在把保守精神贯输到一个革命的社会中去。这一点以及共同的军事利益，可以说明为什么当丘吉尔提及斯大林时，经常会闪耀着一些真正同情的话语。作为一个艺术家，丘吉尔必定对于这个阴暗的人及其阴暗的一生感到着迷，虽然由于过分的阴暗，使他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发生反感。

当斯大林对这两位西方领袖人物的态度固定下来并趋于合理时，当丘吉尔在同情苏联这匹“战马”时又夹杂着反感时，罗斯福对于他不得不面对的这种奇怪现象感到大惑不解。对他来说，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苏联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他曾谦虚地向他的助手承认：“我不知道怎样分清好

的俄国人和坏的俄国人。我能够分清好的或坏的法国人，我能够分清好的或坏的意大利人，我也分得清希腊人的好坏。但是我不了解俄国人。”^①斯大林显然是超出了罗斯福的“好”和“坏”的想法的。

斯大林邀请罗斯福同他一起住到苏联大使馆，说德黑兰有人正在搞一场阴谋。这样他们就相识了。斯大林自己搬到大使馆内的一间小屋子，把地方腾出来给他的客人。尽管有这种关心的姿态，他仍然如罗斯福后来所说的，“端庄、僵硬、严肃、不苟言笑，没有一点人情味”。这位总统力图“打破这个冰层”；当他设法讥刺一下丘吉尔以取悦斯大林时，他觉得他已经达到了这一效果。^②事实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不和谐的任何迹象，哪怕十分微小，都对斯大林产生抚慰的效果。他所以邀请总统作为他的客人，很可能是为了防止罗斯福过分接近丘吉尔，到还不是为了适应他自己在策略上的方便。

这无疑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很快就发现，他无需再去搞什么小动作，因为在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表面看来，争论只表现在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发展上。实际上争论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包括了对战后欧洲的政治观点，这是那些军事行动赖以决定的基础。丘吉尔向会议提出了他的关于英美军队入侵巴尔干的计划，它将进一步推迟入侵法国的计划。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的敌对，自从他们在1942年8月会晤以后一直存在着，现在又立即重新紧张起来了。1942年时，斯大林怀疑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背后动

^① 弗兰西斯·珀金斯：《我所知道的罗斯福》，第72页。

^② 同上书，第70—71页。

机，是盟国打算让苏联和德国互相消耗到精疲力尽。当1943年夏季入侵法国还未实现时，他可能仍抱着这一怀疑。但是到了现在，即到了1943年年底，他已不再害怕打消耗战了。他也不再认为丘吉尔还在指靠这一打算。他现在的怀疑必定是认为，丘吉尔想认真地对付苏联的实力而不是弱点；丘吉尔新计划的目的在于事前防止苏联占领巴尔干的国家。的确，丘吉尔是把他关于在地中海进行冒险的新计划同英美苏联合占领巴尔干的计划联在一起的。^①

斯大林僵硬地反对这一计划，要求登陆法国。丘吉尔、罗斯福和他本人都没有接触到根本的政治问题，虽然三人心中必定在考虑着它们。会谈差不多尽是军事上的正反两面意见。斯大林占居有利地位，因为军事上的争论十分有利于他。丘吉尔建议盟国部队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点登陆：在意大利北部，从而能够解救被德军封锁在意大利南部的盟军；在亚得里亚海沿岸，从而能在铁托游击队的帮助下强行进入多瑙河河谷；在爱琴海地区，在那儿与土耳其一起向北发动进攻。斯大林指出，这些行动都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徒然过多地消耗盟国的力量。相反，如果渡过海峡入侵，盟国会有交通线最短和防备最好的优点，可以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他们解放了法国，就可以使德国的士气遭到无可挽救的打击；最后，他们就会有一条最短和最直接的路线，直捣德国工业中心鲁尔。斯大林直率而简洁地提出他的论点，中间还夹杂着一些讥刺的话语，使得丘吉尔咆哮如雷，面红耳赤。在三次全体会议和政府首脑的两次秘密会议上，一直进行这个争论。在所有的时间里，都是斯大林单独

^① 约翰·迪安：《奇怪的联盟》，第42—44页。

代表苏联代表团发言，这个代表团只包括他本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一个译员。

斯大林的论点占了优势。美国三军参谋长同意斯大林的意見。甚至某些英国将领也反对丘吉尔的主张。罗斯福起初有点犹豫不定，后来也接受了斯大林的看法。打赢这场战争，尽快地打赢这场战争，以及使入侵的部队遭受最小的损失——这就是罗斯福一心要想做到的事情。从这个观点出发，横渡海峡的入侵比地中海战役要更有希望一些。按照罗斯福实用主义的、非阶级意识的想法，他是看重这一入侵的重要性以及它能立即达到的目的，而不顾战争的后果、它可能产生的敌对以及正在困恼他的英国朋友的紧张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必定影响了他的决定，这就是斯大林在会议开始时发表声明说，苏联一俟从欧洲的斗争中解脱出来，就参加对日作战。不管罗斯福的道理如何，他的决定解决了这一问题。大家一致同意“霸王行动”（入侵法国的代号）将在明年5月进行。

这是斯大林获得最大胜利的时刻。也许只有他和丘吉尔明白它的含义。欧洲这时已在军事上一分为二；而且在军事的分裂后面，还隐隐地呈现出社会和政治的分裂。在一个十分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俄国外交又在重温它的老梦——使巴尔干处于俄国的影响下。

在获得这个胜利之后，斯大林变得轻松和温和起来了。他积极参加了如何横渡海峡实现入侵的争论。他装出一副雍容大度的样子，以一个经验丰富的胜利者的身份来对待现在刚刚开始进行第一次真正大冒险的盟友们。他提供有帮助的建议，并乐于提供他的经验。他坚持认为，英美必须实现指挥的统一，

并敦促它们立即指派自己的总司令。迪安将军说，在他的敦促下，“肯定加速了对艾森豪威尔的选派”。^① 他一再警告他们要防止拖延和疏忽的缺点；而当丘吉尔谈到必须保密、伪装和进行牵制性行动（所谓的“兵不厌诈”）时，斯大林透露了他的某些战争诡计：他有五千辆假坦克、二千架假飞机和其他东西，用来引诱敌人的攻击。最重要的是，他答应在西方军队登陆欧洲大陆时发动强大的支援攻势。

丘吉尔军事计划的被否决并不是斯大林的唯一胜利。“三强”还在苏波边界问题上达成了秘密协议。四国外长刚刚在莫斯科开过会，他们对这一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感到，现在再象以前一样地建议把苏波之间的长期不和放到将来的和平会议上解决，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了。红军正在迅速地接近波兰以前的边境地区，肯定会要把它重新合并于苏联的。由于无法在事前防止这个重新合并的行动，丘吉尔显然宁愿由盟国来批准这一行动。于是他提出了一项建议，“三强”承认所谓的“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的新边界。斯大林对此欣然同意。寇松线是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于1920年提出因而得名的。这次经过一些微小的修改后，把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划归了苏联。罗斯福同意这一建议，但仍企图把里沃夫城划给波兰。

斯大林对于现在所得到的利益只能啼笑皆非地表示满足。他必定探索到了丘吉尔动机中的某些奥妙。的确，他使丘吉尔面临不容易反驳的道理：1941年时西方国家欢迎苏联成为一个盟友，而当时苏联就拥有那样的边界，因此西方国家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同意在花了如此高昂代价获得胜利之后却缩小苏联的

^① 约翰·迪安：《奇怪的联盟》，第43页。

领土。但是波兰人也有道理可谈。波兰人辩解说，英国已经同拥有东部边境地区的波兰结成联盟，因此他们有权要求英国不参加剥夺他们领土的活动；此外，波兰成为英国的盟友比苏联还早一些。同刚刚在东线显示出来的力量对比的巨大转变相比，波兰人的要求就无足轻重了。丘吉尔所以如此，也不仅仅是屈服于权力。他是想在寇松线上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这条线将成为相对立的两个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新分界线。他在斯大林面前退让，正是为了更好地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相当坚固的一条防御线上阻止住他。他希望，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它肯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将在寇松线以西建立；他并且催逼斯大林恢复同该政府的关系，因为现在西方国家已经不再对苏联的所得进行争议。丘吉尔还希望，通过说服和压服的方法，他将使在伦敦的波兰人同意这个新边界，因为不这样的话，斯大林就不愿意同他们进行谈判。斯大林显然深信丘吉尔是不会成功的，然后他就可以放手地去倡议建立另一个波兰政府；而且西方国家一旦承认了寇松线，由于他们立场的逻辑结果，就将被迫承认那个已经接受新边界的波兰政府。在德黑兰会晤以前不久，他已经向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人指出，他欢迎在波兰组成一个政治实体，它虽然还不是一个竞争性的政府，却可以对伦敦流亡政府代表波兰说话的权利提出争议。这个实体就是波兰民族委员会，它事实上已在德黑兰会议后一个月于德国的波兰占领区内组成。这场关于波兰的错综复杂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在同意了第二战场和寇松线之后，“三巨头”特别非正式地交换了关于德国未来的观点。他们的意见非常模糊不清，以致参加者中没有一个人对于这一未来的巨大争论真正预感到一

点迹象。三个政府首脑看来一般地同意了“迦太基式”和约，虽然在鼓吹这一方式上面，斯大林无疑地比其他两人都更坚决。

在会议临近结束时，会议开头时的那种紧张和敌意似乎已经消散了。在庆祝丘吉尔六十九岁生日时，斯大林把他作为“伟大的朋友”而举杯祝贺。在另一个仪式上，他从丘吉尔手里接受了以英王名义送给斯大林格勒的一把剑。罗斯福后来谈到这事时说，他看见斯大林以一种奇怪的骑士浪漫姿态俯身吻剑时，眼里充满了泪水。^①眼泪也许同他的性格不相宜，但也许是斯大林真的动了感情，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因为有谁曾预言过，英王陛下有一天会给予一个用格鲁吉亚农奴的儿子、巴库监狱的囚犯、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列宁的信徒的名字命名的苏联城市以这样的荣誉？又有谁曾预言过，这个“伟大的否定者”的信徒已不再否定这样一个荣誉？

12月1日，三国政府的首脑离开德黑兰。在分手前，他们发表了一个关于达到完全协议的联合声明。没有告诉全世界，在达成协议前曾有过剧烈的争论——在战争期间当然不能这样的轻率。“三巨头”庄严地宣称：“我们是怀着希望和决心到这里来的。我们离开这里时已成为事实上、精神和目的上的朋友。”

1944年，斯大林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军事胜利。在这一年开始时，苏联人还在为打破列宁格勒的封锁而战；这一年结束

^① 弗兰西斯·珀金斯：《我所知道的罗斯福》，第71页。

时，他们已经封锁了布达佩斯的德国守军。

在这一年里，红军发动了不断的攻势（斯大林称它们为“十次打击”）；而在年中，西方盟国在法国登陆。在东线，从欧洲的最北面到最南面，仍有大量的人在进行战斗，但战线已经不可抗拒地向西转移了。简单地列举几次主要攻势，就可以看出战斗的格局：1月，列宁格勒解围，苏军由诺夫哥罗德直插波罗的海沿岸。2月和3月，在克复基辅之后，苏军从第聂伯河推进到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早春，战斗转移到最南边，德军被逐出克里米亚和奥德萨。6月，在入侵法国的同时，战斗又从战线的最南边转移到最北边，芬兰实际上已被击倒了。6月和7月，红军解放了维切布斯克和明斯克，并席卷到涅曼河和维斯杜拉河。7月和8月，红军沿喀尔巴阡山继续推进到波兰南部。8月，红军占领罗马尼亚，并由于该国内部的大动乱，推进到了保加利亚和匈牙利。9月和10月，主要战斗再次转移到北面的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后来战斗中心又转回到南方，转回到喀尔巴阡山及其南面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在这一年的开头，红军已经在人数和武器方面拥有相当大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还在与日俱增。斯大林的特点是，即使到了现在，他也不象希特勒过去那样对闪电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企图进行那种横扫一切的洋洋大观的攻势，因为这种攻势虽然可能使敌人发生混乱并一举把它击溃，但是它也可能使进攻者的战线危险地拉长，并暴露了自己侧翼。即使到了现在，胜利已经如此明显地在望，他仍然毫不激动地谨慎从事。在整个一年中，他以惊人的规律性、力量和慎重，把战斗中心从北面转到南面，忽退忽进，就象一个拳击者有计划地狠

揍对手，并不期望一击就把他打倒。他使得希特勒老是在猜测，老是把自已的预备队抽去填补不断出现的缺口，老是想去应付新的威胁，老是在这一过程中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十次打击”在协同作战和时间的安排上就象钟表一样的准确，证明斯大林目前的总参谋部具有组织能力和系统的工作，这同1941年的无能和混乱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①

红军的每一次重大胜利都使新的政治问题突出起来。斯大林这时专心解决这些政治问题，而把军事战役的指挥更加信任地交给他的元帅和将军们。在1月初，红军越过了旧的苏波边界，波兰的危机就更变得尖锐了。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大声地宣称，它有权管理现在已经收复而由苏联控制着的国土。莫斯科同样大声地拒绝这一要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急于调解

^① 有必要在这儿解释一下苏联在物质方面的优势。整个战争中，苏联面对的德军，在数量和装备上大约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俄国的大一倍。苏联所以有所成就，主要是由于东部各地区的迅速工业化，其中大部分又是在和平时期的基础上在战时发展起来的。未遭德军占领地区的工业生产，在正常情况下约占整个苏联工业生产的百分之四十。从1942年到1945年间增加了一倍。东部军工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五百到六百。从1943年到1945年，每年平均生产三万辆坦克和战车、四万架飞机，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几乎不生产这些东西。现在每年大炮的产量是十二万门，而1914—1917年还不到四千门。苏联军队差不多每年得到四十五万挺本国造的机关枪，而在沙皇时代，每年才生产九千挺。每年还生产五百万支步枪和冲锋枪，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五倍。（参看A·I·诺特金：《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概要》，第272—273页。）红军主要是依靠国产的武器从伏尔加河打到易北河的。西方国家供给的武器是一种有用的、某些情况下还是重要的补充。载运苏军进入德国的车辆大部分是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生产的。在租借法案下，差不多供给苏联四十万辆车辆。苏联步兵穿着的靴子，大部分也是西方国家供给的。他们正是穿着这种靴子，通过泥泞、积雪和多沙的东欧平原到达柏林的。军队的很多被服和罐头食品也是根据租借法案供给的。人们可以笼统地总结说，红军的火力是本国造的，而他的机动成分则大部分是进口的。

两个盟国政府的公开争吵，建议由美国出面调停。这个建议显然激怒了斯大林，他认为，德黑兰会议以后，西方国家不能对他控制波兰东部边境地区的权利提出疑问，也不容许波兰人对此提出争议，因此没有任何调解的余地。

他以一种极为奇怪的曲折方式表示了他的愤怒。莫斯科发表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报道，谴责英国背着苏联同德国议和。^①这个谴责是在德黑兰会议后不久作出的，使英国人特别感到受了侮辱，因为仅仅在几星期之前，他们曾拒绝了希特勒的警察头子希姆勒伸出的“和平触角”，而斯大林对此是不可能不知道的。^②这一事件很有可能反过来使英国和美国怀疑苏联是否在找寻借口去谈判单独的和约。斯大林使他的盟友们面临这种暗示的威胁。这个暗示是这样的不清楚，使人们不能肯定地说，斯大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打算去单独媾和。由于他的军队正在接近1941年的边界，他或他的某个随从自然会偶然想到，现在是不是可以暂时停一下，以制止可怕的大屠杀，并磋商和平。难道库图佐夫不曾劝说亚历山大一世停止在俄国边境追击拿破仑的大军，不再继续从事那场只对“该死的不列颠岛国”有利的战争吗？对于那个岛国，库图佐夫是但愿它沉沦在海里的。^③另一方面，斯大林也象亚历山大一样地野心勃勃，要使他的军队凯歌高奏地进入敌人的首都；而且也象亚历山大一样，他是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机会的。人们还不知道，在他的总参谋部或政治局里，有没有人曾经对他提到库图佐夫的上述建议。但

① 这一报道发表在1944年1月17日的《真理报》上。

②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73页。

③ 塔尔列：《拿破仑传》，第248页；《外交史》，第1卷，第373页。

是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有理由认为，他通过单独媾和得到的东西能比通过同西方国家共同胜利所得到的东西多，他摧毁第三帝国的决心也是可能减弱的。但是他没有理由去这样想，因为西方国家已经一再地向他提供保证。

他拒绝西方在苏联和波兰之间进行调解，这不仅仅因为照他看来波兰的边界问题已在德黑兰会议上解决了。他坚持的原则是，盟国不应干预照他看来纯属苏联及其邻国的事务。因为东欧将要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正是在这个阶段，在德黑兰会议以后几个月中，使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的计划越来越清楚了。这个想法甚至在德黑兰会议以前就已有所风闻了。盟国的政界和新闻界曾经讨论过三大盟国的共管，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施最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光是三个大国就已具有足够的力量来赢得战争和保卫和平。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一个类似的计划，即“四个警察”（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维持世界秩序的计划。^①盟国外交家们的思想又返回拿破仑战争后统治欧洲的神圣同盟和更近的凡尔赛经验上了。上一次的凡尔赛和会，尽管有一些民主性的表面标志，也是由几个大国一致统治的。斯大林的外交家们则查阅了一些秘密条约，它们是革命前俄国的统治者缔结的，后来被列宁加以公布和谴责。其中有1907年的英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两国在波斯划分自己的区域。还有1915年的伦敦条约，其中规定，英国同意俄国吞并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峡和色雷斯，并且实际上支配巴尔干。斯大林的外交家们现在显然有理由认为，对于沙皇俄国在共同战争中很小的贡献，

^①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第785页。

英国人尚且给予如此的报酬，他们为什么不会给予斯大林的俄国以同样的奖赏或者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呢？

过去战胜国所以能达到相对的团结，是由于它们的统治者属于同一社会阶级，或者代表了类似的利益；是由于他们说着同样的或相似的语言，因而彼此被某种团结一致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目前的这个试验所以新颖和令人吃惊，则是由于它是由代表敌对的利益和冲突的原则的人们所进行的。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共产主义的死敌英国首相却是这一计划的主要倡议人。

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头一次多少有些正式的安排，显然是由英国政府于1944年6月提出的。^①英国建议，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应该作为苏联的范围，而英国的势力将在希腊居于最高地位。斯大林欣然同意了这一划分。现在也同1939年时一样，不是他而是他的伙伴将承担分割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公愤。他想知道的是，这是不是丘吉尔的主动行为和是否由他一个人负责。他问道，罗斯福同意这一安排吗？罗斯福这时的态度是不明朗的。他事实上拒绝面对他在德黑兰会议上的态度所引起的后果，而在那次会议上正是他帮助苏军成为巴尔干的唯一主人的。丘吉尔这时正从他在德黑兰会议上的失败中得出结论，尽其所能地要把希腊留在苏联范围以外。但是罗斯福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所以斯大林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在1944年6月的协议下，英国和美国已经把巴尔干的大部分分给苏联了。1944年10月，丘吉尔和艾登到达莫斯科，那个安排又作了肯定和扩大。在他们的会谈中有一种近乎荒唐的调子，两位政府首脑和他们的部长们竟然固定了他们各自在巴尔干分得的

^①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51等页。

百分比。正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向国务卿报告的那样，他们同意苏联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的优势，而英国的份额却是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在南斯拉夫，两国将在一半对一半的基础上行使自己的影响。^①

在1944年6月的时候，还说划分区域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它将是一种严格的军事安排。到了10月，双方已毫不讳言它的政治意义了。他们秘密地达成协议，“如果英国觉得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来镇压希腊内部骚乱，苏联将不进行干预。作为报答，英国将承认苏联有权领先在罗马尼亚维持秩序。”^②丘吉尔要防范什么样的“内部骚乱”，斯大林是心中有数。英国刚刚在希腊登陆，并发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民解”（人民民族解放军）游击队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国家。丘吉尔想预先防止内战，而且正在为此进行准备。斯大林实际上是宣布他不关心希腊左派的命运。作为对此的报酬——英国答应不干预罗马尼亚——也等于说丘吉尔对罗马尼亚权利的命运也是漠不关心的。

这是从未有过的好买卖（有些人可能说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买卖），它自然要牵涉到其他一些国家。这个买卖一经确定之后，丘吉尔和斯大林互相热心地为对方的行动辩护，互相在口头上为对方吹捧，这使世人为之吃惊。斯大林在丘吉尔访问后不久说道：“值得惊讶的，倒不是有分歧，而是分歧如此之少，而且几乎每次都照例是本着三大国意见一致和行动协调的精神解决的。”接着他又说：“最近在莫斯科同……丘吉尔先生和……

^①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58页。

^② 詹姆斯·贝尔纳斯：《讲老实话》，第53页。

艾登先生在友好的气氛和完全一致的精神下进行的谈判，应该认为是……更鲜明的标志。”^①丘吉尔也投桃报李，他对下院说：“斯大林元帅和苏联领导人都愿意同西方民主国家生活在体面的友好与平等关系中。……我还认为，他们是言行一致的。我还不知道有哪个政府比俄国的苏维埃政府更严格地遵守义务，即使它心里对此并不高兴。我在这儿绝对拒绝讨论关于俄国的真诚问题。”丘吉尔有充分的理由来作这个声明，因为1944年12月的时候，希腊的内战已经爆发，苏联报刊和电台没有对希腊左派游击队讲一句同情的话。这个“谜一般”的沉默表明，斯大林已经不再管这类事了。这真是斯大林同丘吉尔和好的全盛期。“好的密谋结成好的朋友，而且前程远大；极好的密谋就结成极好的朋友。”

人们不要以为协议的条款是明确地规定了的，也不要以为斯大林曾经坦率地表示过他同意对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共产主义进行镇压，或者他公开宣布过他只打算在国内建立共产主义。在他的或丘吉尔的心中，这个问题都可能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尽管他们达成了协议，这两个伙伴彼此仍是不信任的，因此他们都避免太过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即使是“势力范围”这一个词，在官方的记录中也几乎是没有出现过的。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一种暗示和暗喻。几乎所有的政策声明中都有这样的神圣句子：对别的国家“不干涉其内务”。实际上，在整个战争中，每一个强国只要在别的国家有任何军事利益，就要干涉这一国家的内部事务。英国和苏联联合干涉了波斯，并推翻了它的亲德政府。英国曾经干涉了埃及和伊拉克，苏联也在波

^① 《斯大林文选》，第397—398页。

兰和它曾经庄严地保证不干涉的那些国家中进行过干涉。美国曾经干预了法国的达尔朗、吉罗和戴高乐之间的争论，干预了意大利的维克托·埃曼努埃尔、巴多利奥和反对派之间的争执。科德尔·赫尔为了反对1945年3月的查普尔特佩克法曾经写道：“我希望……说服俄国采取合作和不干涉政策，但美洲的各共和国却一致同意在某种情况下对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国进行实际上的军事干涉。我们一旦同意了这种干涉的新立场，俄国就更有借口去干涉邻国，而我们就没有更多理由去反对它这样做。”^①但是，尽管科德尔·赫尔进行反对，查普尔特佩克法毕竟是美国的政策。斯大林是“没有幻想的人”，他把“三大国”在各自范围内进行内部事务的干涉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这种干涉一半是由于军事的需要，一半也是利用军事需要作为一种借口。

斯大林急于表现出他对英美的势力范围是不染指的。但是实际上他又不可能完全不插手。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主要由于在抵抗运动中起到了值得称赞的作用，因而在战争过程中赢得了巨大的威望和权威。尽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莫斯科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圣地。因此斯大林就继续在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内行使一种强有力的和不断增大的影响。^②在法国解放后不久，他是以一种态度来利用他的影响的，这就是故意迎合保守派的舆论，消除丘吉尔和罗斯福可能有的担心和

^①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66—1467页。

^② 斯大林本人也必定因西欧共产党影响的日增而大吃一惊。他在战争中曾表示过这样的看法，认为法国人民是支持贝当的。参看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第777页。

怀疑。无疑地，在他的鼓舞下，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表现得异常的、无私的温和。它们不顾禁止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纲领，破天荒地在广泛的民族联合的基础上参加了各该国的政府。虽然它们当时在自己的国家里是最强大的党，却同意在政府中居于次要的地位。从这样的地位出发，它们现在或者以后都是没有希望夺取政权的，而且它们最后被其他党派几乎毫不费力地就排除出政府去了。军队和警察仍然掌握在保守派或者起码是反共团体的手中。西欧仍然由自由资本主义所统治。

斯大林有时表现出来他是不拘一格的，这使得最软弱的社会主义左派和最温和的自由派都为之震惊。例如，在1944年3月，甚至还在势力范围协议达成以前，他就承认了巴多利奥的意大利政府。这时意大利的左翼和中间党派还在吵吵嚷嚷地要求免除巴多利奥的职务，因为他是阿比西尼亚的征服者、维克托·埃曼努埃尔国王的亲信。斯大林此举提高了巴多利奥同反对派对立的地位。不久以后，《消息报》还对迫切要求不受信任的国王退位的意大利左派提出忠告，要他们暂缓同王室进行争论。甚至在很久以后，意大利制宪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还投票赞成恢复墨索里尼同梵蒂冈缔结的拉德兰条约，因此他们就违反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意愿，把国家精神生活的统治地位让给了天主教会。法国共产党也只是略表不满之后就服从了戴高乐将军的领导，而戴高乐的独裁野心、反马克思主义态度以及同教会的联系是早已昭然若揭的。

斯大林也没有明确地表示过他将赞助苏联势力范围内国家进行革命。这些国家中共产党宣传者的调子都是民族主义的、甚至是教会的。罗马尼亚的国王米哈伊尔已经退位，还获得苏

联最高的军事勋章，表彰他在罗马尼亚脱离德国的政变中所起的作用。苏联的将军们和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还向巴尔干国家的东正教会表示敬意。在波兰，他们讨好和奉承天主教会，不谈工业的社会主义化，只在延误了很久之后才开始实行土地改革。

1944年春，斯大林做了一个奇怪的尝试，想同教皇实行和解。这个尝试真正成了一个喜剧性的插曲。1944年4月28日，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一个奇异的来客，即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来的波兰裔美国天主教牧师S.奥尔列曼斯基。这位牧师是一个简单而虔诚的人，不知道高层政治中的圈套，离开他的安静的教区，怀着某种使命感来到莫斯科。他是想来对两个“历史性”的和解作出个人贡献的，一个是克里姆林宫和梵蒂冈之间的和解，另一个是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和解。在这几天之中，这位好心人成了众目睽睽的人物。使大家吃惊的是，斯大林不仅接见了，而且两次同他密谈了很长的时间。奥尔列曼斯基在教会中没有什么权威，也没有受权代表教会进行谈判，甚至离开教区时也没有得到主教的批准，但他竟然得到了斯大林亲笔签名的一份庄严的书面声明，其中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建议同梵蒂冈的主人和解。^①如何使用这个建议，他留给奥尔列曼斯基去自由决定；于是奥尔列曼斯基就带着这份重要的文件返回了他的教区。他的主教猛烈地抨击了他，指控他违反了教规，并威胁要把他革除教门。这位可怜的牧师弄得意气消沉，搬到一个修道院去，以苦行来赎前愆。因此，克里姆林宫和梵蒂冈修好的这个伟大的尝试就完蛋了。斯大林尽管很精明、狡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2卷，第129—132页。

猾，有时还很有远见，但也经常表现出一种天真的笨拙，这一事件更是增加了一点滑稽的成分。他是一个大独裁者，远离自己的人民，在他的首都也不轻易接近重要的外交家；他是三巨头之一，此时甚至是他们之中的年长者，决定着世界未来的命运。但是他竟然在他发动的巨大攻势当中，同一个籍籍无名的怪人进行密谈，想通过他来向世界宣布一个重要的政治声明。斯大林如果需要的话，他是可以通过任何重要的天主教政治家去接近教皇的；他也可以利用盟国政府来进行斡旋。因此情况也许是，比之于同梵蒂冈寻求和解，他更热衷于宣传他的可敬的温和态度。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是无需采取这种花招的，因为在几天之中，这使他成为世界的笑柄。不过，这个事件倒足以说明当时斯大林政策中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

与此同时，他还设法建立了两项原则，而且还得到了盟友的赞同。这两项原则都是模糊不清的，用来指导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其一是他应该能够自由地在苏联邻国反对亲纳粹和法西斯的党派和团体，建立民主秩序。其二是那些国家的政府必须是“对苏友好”的。^①斯大林把这些原则首次应用于波兰问题。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波兰问题已经成为盟国外交活动中的障碍物。斯大林的目的是说服西方盟国，要它们抛弃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理由是它既不民主又不对苏友好。他作为一个典型的独裁者，现在却来赋予或拒绝赋予别的民族以民主行为是否良好的资格，这种态度是极其稀奇古怪的。他的盟国

^① 丘吉尔在十月访问莫斯科归来后向下院说：“我们的决心是从来没有削弱的，波兰将恢复和重建……并根据它的人民的选择……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但我必须说，条件是它们不能追随法西斯的路线，而且波兰必须忠诚地成为俄国的屏障和朋友。……”

也以严肃的态度和庄重的姿态来参加这次奇怪的表演，以便保持这个伟大同盟的民主利益一致的外表。不过，把斯大林的行动仅仅说成是诡计(尽管其中有很浓烈的诡计成分)，也是不对的。他无疑地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一个深刻的民主目的；而除此之外，他的论据所以有力，还由于伦敦的波兰政府的确是一个五花八门的联合，其中包括半保守的小农党员，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根据“东方”或“西方”的标准都不能称为民主派的人们。这个政府的核心都是波兰独裁者皮尔苏茨基和里兹一斯密格莱的追随者。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政府的成员，不管是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除了少数例外，都具有波兰政策中传统的仇俄倾向，而这种倾向又由于1939年以来波兰人在苏联手里的遭遇而更加深了。的确，在所有的波兰党派中，只有共产党是“对苏友好”的。^①斯大林利用这种仇俄倾向作为理由，当红军一进入波兰本土时，就组织了一个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共产党和左派社会党人在其中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斯大林同波兰人的关系仍然是反常的，这从下面的插曲中就可以看到。在斯大林的波兰门徒中，有些人是1941年后才从苏联监狱和集中营中释放出来的。在一次他为解放委员会举行的招待会上，斯大林走到一个委员会的领导人面前，这个领导人是一个老的左派社会党人，战前在波兰曾受到过迫害，斯大林问他：“同志，你在监狱中呆了多少年？”这本来是一个前政治犯问另一个政治犯的典型的问题。这位波兰人答道：“哪

^① 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其态度正好相反，特别是它完全不理解国际权力均势的变化，竟然向盟国政府抗议，反对苏军进军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见西恰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227页。

个监狱，你是说波兰的监狱还是苏联的监狱？”斯大林说：“我们把苏联监狱的事忘得越快，对我们两个国家就越好。”

由于发起组织了这个委员会，斯大林就把一个难题提到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面前。如果他们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只有对苏友好的政府才能在波兰存在，那末他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个委员会；或者他们就不得不抛弃这个原则，继续支持他们迄今一直支持的波兰人。起初他们企图回避这个两难问题，说服斯大林同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兹克谈判。米科拉伊兹克是一个保守的小农党员，自从西科尔斯基死后，他就领导了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只有很少的波兰流亡政治家认为，即使要接受寇松线，事前也可以对它讨价还价一番，米科拉伊兹克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到1944年7月底，他果真到了莫斯科，但一到达时就听到苏联政府正式承认所谓的卢布林委员会。斯大林采取了一个剧烈的干涉行动，在波兰设立了一个他所选择的政府，然后就否认他有任何干涉波兰内部事务的企图，建议米科拉伊兹克去同“卢布林的波兰人”协商。

正当这个争论在进行之中，发生了一个悲剧性的事件，斯大林在其中的作用是极为暧昧的，甚至是阴险的。1944年8月1日，华沙发生了反对德军的武装起义。起义是一些军官领导的，他们得到了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的指点。这时红军已经迅速地接近华沙，而且这次起义的指挥者错误地认为，德国守军就要撤出这个城市。起义的群众受到了激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放自己的首都。但是，他们的指挥者犯了一个大的政治错误，他没有同正在推进的苏军指挥员建立接触和进行协调，就发布了行动的命令。（顺便提一下，苏军的指挥员恰恰是一个

波兰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当然,这个错误是由于政治形势而发生的。起义的领导者们希望,他们或者在苏军进入之前,就控制了波兰的首都;或者他们失败了,也能够对苏联人施加道义上的压力,要他们承认那些曾帮助过他们驱逐德军的人的政治要求。

事情很快就表明,起义的时间是十分糟糕的。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已被德军阻于维斯杜拉河,后来又被逐退了。德国守军根本没有准备撤退,于是就以全部的力量凶猛地对付起义者。一场悲惨而绝望的战斗展开了,波兰人以罕见的罗曼蒂克的英雄主义进行战斗,而德军报复性地焚毁和夷平了一条条的街和一所所的房子,直到华沙这座城市实际上化为灰烬。波兰人乞求援助。米科拉伊兹克也向斯大林发出呼吁。斯大林的态度不说其他,起码也是非常奇怪的。起初他不相信起义的报告,怀疑它是谣传。后来他虽然答应进行帮助,但却没有实现这个诺言。到目前为止,仍然可以对他的行为作一种宽厚的解释。也许(而且它的确是很可能的)是由于罗科索夫斯基被德军逐退,无法去救援华沙,而且斯大林正在指挥南线(即喀尔巴阡和罗马尼亚)的几个主要攻势,不能改变他的战略部署,去援救那个出乎意外的起义。但是后来他的某些行为,却使各个盟国不寒而栗。他不允许英国的飞机从苏联基地起飞去给起义者投掷武器和食品,也不允许这些飞机降落在战线后方的苏联基地上。他因此把英国对起义者的援助缩小到最低限度。后来苏联的飞机飞到那座燃烧着的城市去进行帮助,但为时已经太晚了。人们不容易看出,斯大林究竟想从他的这种冷淡表现中得到什么。华沙的这场悲剧,对波兰的反苏情绪无异是火上

添油，而且它甚至使西方的斯大林赞美者都感到震惊。人们很难想象，是什么政治上的考虑，使他采取这一最玩世不恭的态度。实际上他是由于那种深仇大恨而出此的，这一点已在国内的几次大清洗中充分得到证明。

当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晤时，胜利已经在握了。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发生不和，就会丧失胜利的机会。的确，这也是希特勒所馨香祷祝的事，他就一再谈过腓德烈大帝的事迹。在七年战争中，由于腓德烈的敌人彼此不和，使他奇迹般地逃脱了失败的命运。三个盟国的领导人这时也急于给敌人最后一击，因此他们就把引起分裂的争论搁置起来。

斯大林这时已经不象在德黑兰那样是唯一的胜利者了，因为英美军队已经驻足莱茵河畔。但是苏联的军事优势仍然是显著的。红军已经到了奥德河，准备对柏林发起攻击。在雅尔塔会议前两周左右，发生了一件事情，似乎使苏联的军事优势更加突出了。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了最后的一次反攻，一时之间他们似乎可能冲破英美的战线。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副手泰德空军上将到莫斯科去，要求斯大林使苏军发动一次攻势，以转移德军对西方的压力。斯大林答应了这一请求。三天之后，红军进入华沙，并从维斯杜拉河直扫奥德河。因此当斯大林在利瓦底亚（这是雅尔塔附近的沙皇避暑别墅，周围都是最近战斗的废墟）会见他的客人时，他心中充满了苏联对胜利作出贡献的骄傲感情，而他的客人们不得不对此表示谢忱。

在“三巨头”的心里，仍然想着如何把目前的团结维持到和平时期，并根据他们共管和势力范围的原则来考察未来的发展。但是战争越接近结束，他们内心的保留、怀疑和恐惧就越强烈。每一方都对其他一方作出一些让步，但又为这种让步寻求保证。对每一个达成协议的行动，双方都处心积虑地加上一个但书。在军事上的每一个考虑，都同社会利益和意识形态原则交迭或冲突。仿佛是命中注定一样，“三巨头”被迫采取一个接一个的军事权宜之计，而每一个权宜之计都包含了未来不和与敌对的种子。

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用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一段对话来加以说明。这是在雅尔塔讨论联合国组织的章程时发生的。讨论集中在有关否决权的条款上，各大国都想在这个组织的安全理事会中为自己保留这一权利。斯大林比他的两个伙伴更强调这一点，要求使否决权更加严格，以抵制任何打消或削弱它的企图。丘吉尔也大致说了这样的话，他认为这个组织还应该有能力采取行动，反对某个大国可能产生的统治世界的企图。斯大林回答说：“我到愿意请丘吉尔先生指出哪个国家可能打算统治世界。我肯定英国是不要统治世界的。这就从怀疑的名单中排除了一个。我肯定美国也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因此另一个国家又排除于打算统治世界的国家之列。”丘吉尔打断话头问道：“我可以答复吗？”斯大林不耐烦地提出自己的明确观点：“等一等。将来的危险就在于我们自己中间可能发生冲突。”他挑明了丘吉尔的言外之意——丘吉尔显然是怀疑苏联的，而且希望使联合国的章程尽可能地使苏联难以达到目的。丘吉尔由于斯大林挑明了自己的意思而感到有点尴尬，他回答说，只要他们三个共同指挥

这场伟大战争的人还活着，就没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但是他们的后继人还能够继续团结一致吗？斯大林仍然有些不痛快，他提醒客人们记住苏联的一次旧恨：1939年，当第一次苏芬战争时，国际联盟曾经当众羞辱苏联，并把它开除出这个组织。可是同一个国联，却从来没有动一个指头来反对希特勒，也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来反对任何侵略行为。……不，苏联不允许在将来受到这样的对待。^①

令人奇怪的是，在战争的整个这一阶段中，斯大林一方面以最大的毅力鼓吹“三大国”共管世界，对任何打算削弱这种主张的建议都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对于将要成为苏联共管世界的伙伴，又在每一步上都暴露出恐惧和怀疑来。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建议让法国参加管制德国时，他表示反对，说“法国曾经开门揖敌”。他的老一套论点是，任何国家在未来和平中的地位，都要同它已经表现出来的实力和它在战争中的牺牲成正比例。不用说，这个原则使苏联比任何国家都要有利，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遭受的牺牲能够同它相比。丘吉尔开玩笑地说，“三大国”是“一个排他性十分厉害的俱乐部，入会费至少是五百万士兵或它的等量物。”斯大林对此必定满怀怨恨地说，苏联已经付出了比五百万战死的士兵多得多的入会费。他顽固地反对任何这样的建议，即允许小国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大声地反对大国。他显然是担心大国可能煽动小国去反对苏联。有一个时候，他坚持联合国必须有自己的军队，特别是一支在各小国有基地的国际空军。^②这个建议虽然遭到美国的反对，却似乎证明

① 詹姆斯·贝尔纳斯：《讲老实话》，第25页。

② 《斯大林文选》，第400页；《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82页。

他对“三大国”团结一致的信心。但是后来又由于担心苏联在联合国中没有足够的票数，他要求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作为有投票权的联合国会员国。主要是为了能够证明这种要求是有根据的，他在1944年2月对宪法进行了修改，至少在名义上废除了他的1924年宪法的主要原则，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变成了某种共和国联邦，每一个加入联邦的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外交部和自己的军队。^①

人们不禁要思考一下，一方面根本的分歧和敌对是那样的严重，另一方面由此而引起的讨价还价的事情又是那样无谓和琐碎，这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政府首脑们、部长们和大使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争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表决权，仿佛和平的未来真地系于这一问题。斯大林在雅尔塔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即使从他的观点来看，除了也许满足他变幻莫测的野心以外，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因为作为报答，他也同意美国在联合国中有三票表决权（但美国没有使用这一权利）。最后，还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三大国”从雅尔塔号召世界上的中立国在1945年3月1日前对德国宣战，这就是说，在战争实际胜利以后，只有参战的国家才被允许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过了3月1日，售票处就要关闭了。

在雅尔塔和波茨坦成交的那些复杂而迷人的买卖和发生的所有争论，在这儿无法详谈，甚至无法加以概述。“三大国”团

① 这次修改宪法的第二个动机可能是斯大林想安抚一下外围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红军进入这些共和国时，那种特殊的俄罗斯爱国主义宣传的调门放低了，以支持更为广泛的苏联爱国主义，包括了苏联的所有民族。但是由于俄罗斯传统主义的高涨，也刺激了苏联各小国的民族主义倾向。

结一致的本质只在于，当涉及到主要的和眼前的军事利益时，它们才能采取共同的决定，并比较轻易地加以实行。但是一旦没有了这种利益，它们的共同立场就越来越化为乌有了。它们在雅尔塔制定了继续进军的计划和划出各国将来占领德国部分的轮廓。但是它们甚至没有想去明确地把德国划为四个占领区，而只是讨论了德国在制度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此外，现在它们团结一致的原因越来越不是在欧洲的共同军事利益，而是计划中的对日作战的新伙伴关系。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答应过参加对日作战。在雅尔塔他又保证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参加作战。这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对于原子武器试验的结果都还没有信心（这个试验甚至对他们的苏联盟友都保持秘密）；没有苏联的帮助，他们还没有把握能够轻易地战胜日本。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对苏联让步；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是很难作出这种让步的。

斯大林在太平洋战争中有什么利益？根据苏联同英国的盟约和同美国的协议，苏联都没有义务要成为英美在亚洲的同盟。对日作战在苏联也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日本只是它的敌人的盟友，而还不是它的敌人，况且它已经被一个战争弄得精疲力尽，而不愿意再去打另一个战争了。如果斯大林无论如何都要决定去从事一项新的冒险，那是因为他深信，那样做的风险是非常小的。当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认为他们不得不在远东打一场旷日持久和牺牲惨重的战争时，斯大林却设想他的军队顶多只需再打三个月就够了。^①他是肯定要赢钱才下赌注的。他的目的是收复自从1904—1905年俄日战争缔结朴茨茅斯条约后俄

^① 约翰·迪安：《奇怪的联盟》，第264页。

国丢给日本的一切土地。在雅尔塔，他同罗斯福达成了一项最秘密的交易，苏联不仅将收回大约十年以前让给日本的中东铁路，而且还得到萨哈林(库页岛)的南部、千岛群岛和旅顺口。^①斯大林向他的人民和全世界描述这场战争是对1904—1905年的报复。他在宣布日本投降时曾说道：“……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四十年。”^②斯大林的这些话在历史事实的面前碰得粉碎，因为老一辈的人，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甚至自由派，都曾为沙皇1904年的失败而兴高采烈。列宁当时评论俄国在旅顺口的失败说：“欧洲资产阶级是有值得害怕的东西。无产阶级是有值得高兴的东西。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快要到来，它还预告着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③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曾以同现在一样的精神（虽然不怎么明确），在一篇公告中号召梯弗里斯的工人：“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④他的新历史观点，他对俄国过去的屈辱重新感到遗憾，是完全适应他制定政策的传统精神的。他现在作为旧俄领地的收复者，沙皇遗产的继承人，出现在太平洋岸，一如他先前出现在波罗的海海岸一样。他正是以这样的词句向罗斯福和丘吉尔表达自己的抱负，而否认对亚洲有任何革命的野心。

① 这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就统统取消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工作，因为朴茨茅斯条约就是在西奥多·罗斯福主持下于1905年谈判签订的。

② 《斯大林文选》，第438页。

③ 《列宁全集》，第8卷，第30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65页。

他不仅容忍了美国实际上单独管制日本，在波茨坦会议上他甚至走到这样一个地步：拒绝对中国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事业承担责任，说国民党是能够统治中国的唯一政治力量。^①

我们不论翻阅斯大林亚洲的还是欧洲的政策记录，总是在其中发现传统主义的和革命的部分奇怪地交错在一起，这使他的盟友和敌人都困惑不解。斯大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有时利用革命的借口来达到目的的恢复帝国的建筑师呢，还是利用帝俄传统工具来伪装其目的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促进者？英美的政治家们在企图看穿斯大林的动机时一直在深思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斯大林的性格只有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假的和装出来的。其实两种性格看来都是真实的。甚至人们可以冒险地猜测一下，斯大林本人有时在心里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哪一种人。这种双重性是太普遍了——传统和革命的确在俄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中和平地并存在一起；而且它在斯大林对内和对外活动的每一领域中都是一贯的，以致不能用纯粹的人工伪装和故作姿态来加以解释，虽然斯大林有时无疑地伪装了他的行动，以欺骗他的敌人或盟友。

在战争结束阶段时，他的政策中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几乎是难分难解的。传统主义的部分经常居于显要的地位，以致斯大林的行为、愿望、行动方法、甚至他的姿态和任性，都十分生动地同亚历山大一世在结束拿破仑战争后的行为、愿望和姿态相似。这种相似性主要是发自内心的，但也必定有一些刻意模

^① 詹姆斯·贝尔纳斯：《讲老实话》，第228页。斯大林在远东追求他的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国人的愿望发生冲突。在波茨坦会议前不久，他曾同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进行过谈判。在苏联和美国联合的压力下，并且希望此举能够增强他对付共产党的力量，蒋介石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

仿的成分。斯大林正式把这场战争称为“保卫祖国的战争”，而这一名称恰恰是记载在俄国历史中的1812年史诗的名称，从这一点就显然看出他是在刻意模仿。在拿破仑的大军失败之后，沙皇亚历山大想牺牲俄国和英国的盟友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利益来扩张自己的帝国，他要它们的波兰领土同他的波兰王国结合起来。普鲁士则得到萨克森作为“补偿”。现在只要把普鲁士换成波兰，就完全足以说明斯大林的政策了。英美的外交家同斯大林谈话后的报告，在许多地方都使人想起卡斯累里同亚历山大谈话后的报告。这位1815年的英国外交大臣写道：

这位皇帝暗示，〔波兰〕问题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解决，因为他已经占有了波兰。我说，的确，陛下已经占有波兰，而且他必定知道，谁也不会比我对他的占有更少异议；但是我敢说，在欧洲普遍反对的情绪下，陛下不会甘冒不韪而戴上征服者的头衔。

亚历山大和斯大林都关心俄国对于巴尔干的影响；而且两人都尽力要使土耳其的海峡归他们控制。俄国同其西方盟国的紧张关系，1945年亦如1815年那样的尖锐。^①这两个统治者在外交上的隐密手段，他们使盟友大吃一惊的策略，以及他们软硬两

^① C·K·韦伯斯特在其《卡斯累里的外交政策》一书(第2卷,第88页)中描述1815—1818年俄英关系时说：“……在这三年中，差不多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它们〔英国和俄国〕的政策都明显地发生冲突。沙皇或者至少是他的一些仆从，搞了五花八门的的活动，几乎都是敌视英国的。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外交上的决斗，它遍及广大的地区。在巴黎，它们互相向路易十八争宠；在马德里，它们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进行凶猛的竞争；在意大利和德国，英国支持奥地利的势力去反对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几乎是公开

手交替使用的态度，都同样使他们的盟友感到迷惑不解。两个人的外交大臣都同样害怕自己作出决定，都同样等待主子发话，都同样在交易中异乎寻常地拖延以考验对方的耐性。英美的谈判者抱怨斯大林反复无常，这也可以借用拜伦对亚历山大说的话来更好地说明：

现在是半解冻到大解冻
但一当黎明严寒时又冻得梆梆硬。

.....

他多么高贵地赐给波兰人国会
然后又告诉好斗的波兰要乖乖地听话。

令人奇怪的是，从主要问题一直到各种细节都有类似之处。亚历山大急于提高俄国的威信，希望在巴黎作为主要的胜利者受到欢迎。同样的动机迫使斯大林命令朱可夫元帅，在德国于来姆斯英美总部签署了投降书以后，又在柏林的苏占区中举行了德国投降的特别仪式。波茨坦会议中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插曲，它也使人联想到另一往事。斯大林在抵达波茨坦时就表示了一个看法，认为希特勒还活着，躲在德国以外的某地。许多天以后，他仍然满怀信心地重复了这个断言，使英美为之惊

地表现出意见的分歧。竞争还扩大到亚洲。争取波斯斗争业已开始。必须记住，这是俄国在起一种完全新的作用。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它表现为一个半野蛮的国家，同西欧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它的影响是至高无上的，而且还在欧洲一半的王朝中明显地增加着。它的代理人正在整个西方挑动冲突。因此，勿怪很多人都咒骂沙皇伪善和诡计多端。他所表白的基督教原则，被认为不过是用来掩盖它统治欧洲的长远计划的。”

愕不已。^①斯大林的心里仿佛想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和百日执政——难道希特勒不想同样地返回来吗？由于拿破仑的重新出现，使战胜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恢复了团结，斯大林似乎也想利用希特勒在波茨坦的幽灵，以便从希特勒生前所造成的盟国的团结中得到某种东西。

但是，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斯大林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另一个亚历山大。世界形势不容许他完全扮演那个角色。亚历山大的军队即使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它所进入的欧洲，也不象斯大林军队进入的欧洲那样地不安定和分崩离析，那样地缩小成为一个真空。在维也纳会议上，沙皇不得不同反对者进行斗争，这些反对者不仅来自英国，也来自中欧、东欧和南欧的奥匈帝国、普鲁士和奥斯曼帝国。甚至战败国法国的声音在与会各国中也是很有份量的。在1945年，战败国德国已经在政治上化为齑粉；其他的大陆国家，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差不多都奄奄一息。由于异常的真真空状况同苏联新表现出的力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斯大林的形象在欧洲的地平线上显得比亚历山大更为突出。他对一些国家是一个更大的威胁，而对另一些国家却又是一个更大的希望。

他的形象还不仅出现于欧洲的政治地平线上。全世界已经看到，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令人吃惊的权力两极化现象。从抽象的统计数字来看，苏联的经济实力远较美国为差。但是由于苏联接近欧洲舞台，它的压力远比它的经济实力所可能显示的要强大得多。到战争结束时，斯大林可能想到美国的力量或迟或早就要退出欧洲大陆，从而进一步增强苏联的优

^① 詹姆斯·贝尔纳斯：《讲老实话》，第68页。

势。但是这也不能完全肯定。同苏联力量增长相对照的是，它由于战争的巨大损失和破坏，必然存在着各种弱点；而且这些弱点势必限制它的影响的扩大。

除了1945年和1815年情况的差异以外，现在还应须加上斯大林外交中的革命因素。只是到了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才重新坚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以便抹掉同亚历山大的相似之处。但是他的这种表现早在雅尔塔和波茨坦时就已经令人感觉到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那种最后席卷了苏联势力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的革命模式已经开始发展了。

在所有那些国家中，政府在名义上都是由各个政党联合组成，其中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农民、教徒、甚至还有准法西斯。但是在每一个政府中，共产党人至少负责两个关键性的部门：警察部门和军事部门。他们首先利用这些部门建立对全国的控制，然后再控制政府中的伙伴，直到他们能够排除这些伙伴，或者迫使这些伙伴在革命中进行合作。在实现这个计划时，共产党人可以援引这样的事实：根据停战协定的条款或特别宣言，各国政府有义务从自己的行政机构和政治组织中清洗那些反对过苏联的纳粹分子、法西斯分子、军国主义分子，等等。它们还有义务保证苏军通往各国的交通线的安全。这些条款是经过西方盟国认可的，它们足以使斯大林在不公然违反盟国内部的常规下，发动和指挥一个进程，使东欧的老统治阶级陷入完全的混乱，丧失组织，在政治上变得毫无能力。事实上，这些阶级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反民主分子，在战争中由于他们的亲德或反苏态度而同敌国妥协。把这些老的统治阶级消灭了，就为共产党的支配地位准备好了基础。那些中间的派别，它们可能是

支持代议制政府的，但缺乏任何真实的传统，而且极为软弱和无效。当它们的队伍由于老的统治阶级党派成员参加而膨胀起来之后，就轮到它们遭受清洗了。很难说什么时候斯大林或当地的共产党人真正地按照西方盟国同意的条款办事；什么时候他们只是利用这些条款作为借口，同他们急于要加以镇压的党派算老帐。事实上，两种情况都有。

这一连串的清洗，持续到了四十年代晚期。通过这些清洗，就建立了共产党的垄断地位，而没有由苏联进行引人注目的干预。只是在发生了真正的障碍时，特别是在初期阶段，斯大林才授权由苏联实行直接而剧烈的干预。例如，当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尔于1945年春拒绝解除他的朝臣拉德斯库的首相职务时，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维辛斯基出现在罗马尼亚朝廷上，命令国王在两小时内改变政府，并威胁说，如果拒不执行，苏联就要把这种行为视为对停战协定的违反。结果亲共的政治家格罗查代替了拉德斯库；而且斯大林为了增强这位新首相的地位，宣布把希特勒奖赏给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还给罗马尼亚。在苏联进行了这样的干预之后，当地的共产党就能够负责去进一步地改变政府了。

这样，世界就发生了不同于先前任何革命的社会大变动场面。在俄国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存在着一种金科玉律。革命是从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开始的。为了自卫的目的，于是它增强了自己的警察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后来这个新国家却匍匐于它自己的工具之下，从而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现在斯大林在半打国家中实行的革命，其整个过程似乎是颠倒过来的。革命首先获得的东西，即它的第一个基础，就是警察。不管是俘

虏来的还是自己建立的警察，已经成为社会转变的主宰。诚然，群众（即人民）也还出现在舞台上，并发挥其作用。但从来不清楚他们是如何想和如何感觉的。是他们自愿行动的呢，还是由于背后的主宰者在统率和训练他们去那样做呢？

这场革命迟迟不宣布它的原则和规定它的目标。它的历史就是一连串的计谋、策略和诡计，最后这些东西就成为一种革命的模式，而且是卑劣的和邪恶的。这些诡计中没有一件比伪造普选更邪恶的了——或迟或早地必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投票赞成现政权。在俄国，布尔什维克起初把他们的统治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剥夺了前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的选举权；他们制定了选举法，以便保证产业无产阶级对人数更多的农民的优势。但是在这种公开宣布的狭窄范围内，选举毕竟还是真正的选举。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朋友和敌人都明白它的主张是什么，甚至它的敌人也不得不怀着某种尊敬的心情承认布尔什维克宣布其阶级原则是坦率的。俄国革命的东欧继承者则装成更加民主的样子，愤怒地否认他们同独裁统治有任何相似之处，硬说自己是通过普遍和秘密的投票而得到压倒多数的，从而具有一种优越感。对于这种不加掩饰的伪善，甚至他们的朋友也感到愤怒。

不过，斯大林所倡议的这场奇怪的革命，却给东欧的人民以“帮助，而对于这种帮助，很难过分地责难它邪恶和功利主义”（借用麦考莱对某一英国政治家的评论）。在两次大战之间，差不多所有的人民都陷入绝境；他们的生活极端贫困和黑暗；他们的政治由具有古代作风的集团所控制，这些集团只要自己的特权得到维护，就不管他们的臣民在物质和文化上的倒退。

欧洲这一部分的人民，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可怕的“磨炼”，甚至更加贫困、凄惨和无助。对于这些人民来说，摆脱这种绝境的唯一机会，可能就是使用暴力，正如斯大林所唆使他们的一样。在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所发动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虽然也许还不完美）农民和知识分子几代人的梦想。在整个东欧，共产党人在实现了主要工业国有化以后，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充分就业的计划，以致超越了物质资源和本国“私营企业”的才智，弄得在资本、技术和进取心方面都极端地缺乏。他们还以新的热情和雄心去加强教育工作，企图消除旧统治者多年以来的过失。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平复民族间的世仇和增进它们之间的合作。总之，他们为东欧打开了共同改革和进步的广阔前景。事情仿佛是，苏联把它在集体劳动和社会组织上试验新道路和新方法的要求传给了它的邻国。也许还应该补充说一句，考虑到这一大变动广泛而剧烈的性质，斯大林和他的手下在完成这个任务时不会不使用恐怖手段，也的确不会不放肆地进行一系列的政变，但是他们却没有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一国挑起了诸如在希腊进行的内战。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必须提出来的问题是，当斯大林为其势力范围讨价还价时，他是否已经打算把它完全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是不是在德黑兰或雅尔塔时期他就已经想到了这一革命计划？这一计划是不是在波茨坦时期最后形成的？贬低他和为他辩护的人都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为两者都要我们看到在他的行动后面有一个极端精明而有远见的计划。但是斯大林的行动有很多奇怪而显著的矛盾，因而还看不出来他已经有了任何革命的

统治计划。相反，它们表明他根本没有这种计划。下面就是一些最突出的矛盾。如果说斯大林一贯坚持要在华沙建立共产党的政府，那末他为什么还要如此顽固地拒绝在东部边境地区对波兰人进行任何让步？比如说，波兰和乌克兰边境的城市里沃夫，由共产党的基辅或由共产党的华沙来统治，对他来说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而如果作出这样的一个让步，肯定就会大大加强剩下来的波兰的地位。同样地，如果说他事先就计划在东德进行革命，那末他为什么要把尼斯河和奥德河以东的所有德国地区分离出来，并并入波兰，以致使波兰人都喜出望外呢？为什么他坚持要从那些地区把全部德国居民驱逐走呢？而这个行动不可能不进一步激怒德国人民，使他们不仅反对波兰人，而且还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他对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的赔款要求，从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地方遭受的破坏来看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也同样是有害的。斯大林要求清算德国的大部分工业，情况就更其如此了。他在德黑兰会议（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就已表示，他将要提出这一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他提议在战争结束后两年以内，将百分之八十的德国工业加以拆卸；直到波茨坦会议时他也没有撤销这一要求。^①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计划是冷酷无情的，也是空想的，如果执行起来，就会涣散德国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却是共产主义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可以对之进行号召和要求支持的社会力量。所有这些政策，没有一件可以幻想是在为革命奠基。相反，斯大林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煞费苦心地为革命设置可怕的障碍。光是这一点

^① 詹姆斯·贝尔纳斯：《讲老实话》，第26—27页。

似乎就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甚至在战争结束时，他的意图说得轻一点也是极端地自我矛盾的。

米科拉伊兹克曾报道了他同斯大林在1944年8月的一次奇怪的谈话。这个波兰的政客有点农民的狡猾，企图试探一下斯大林对德国的打算。他告诉斯大林说，波兰人俘虏的德国兵据说曾表示这样的希望：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将信奉共产主义，而且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将统治世界。米科拉伊兹克说，斯大林愤愤地回答说，“德国要实行共产主义就象把马鞍子配在牛身上一样”。这个表示轻蔑的警句无疑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它同他的对德政策的整个趋势是完全协调的，同我们熟知的他对于西欧共产主义的不信任是十分符合的，而同他那些日子的言行也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它不可能纯粹是策略上的空话。

的确，斯大林在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法上，他的民族主义和革命主义发生了极其尖锐的冲突，民族主义的（人们可以说它是反革命的）因素长久地居于首位。他在雅尔塔会议以前不久说道：“如果以为它不会企图恢复自己的实力和进行新的侵略，那就太天真了。……历史表明，只要二三十年的短时期，德国就会从失败中复元过来，并恢复自己的实力。”^①他在德黑兰会议上谈到了同样的论点，只不过预言德国会在更短的时间内恢复自己的实力。^②他几乎对每一个拜访克里姆林宫的人都重复同样的话，看起来他几乎摆脱不了未来德国复仇的思想。当他谈到各大盟国在和平时期需要团结时，他指出那种危险。当他提议削弱德国工业，改变德国国界，把奥地利从德国分离出来，

^① 《斯大林文选》，第399页。

^②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第786—787页。

或者建立亲苏的波兰(“德国进军苏联的走廊”)政府时,他也重复同样的话。他全神贯注于防范德国以确保苏联的安全,使用了福熙、克里蒙梭和彭迦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曾使用过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保守派的语言,他们把过去看成未来,又把未来看成各国之间的竞争、斗争和战争。他关于德国“在二三十年内”就要复仇的警告,就等于说他坚决认为德国“在二三十年内”仍然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因为“德国要实行共产主义就象把马鞍子配在牛身上一样”。如果他曾指望过在德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他就会看到他所鼓吹的惩罚性和约条款是根本不需要的。

他这样说,无疑是表达了苏联人的愿望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苏联都希望,胜利之日就是审判德国之时,而且这种审判要由德国的受害者来实行。国际主义思想和同外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感情,虽然还没有完全被民族主义的浪潮所淹没,但它们却对敌国无效,因为德国工人阶级既没有做什么事来预防、阻碍希特勒的侵略,也没有起来反对这种侵略。的确,由于不断地进行宣传,也由于斯大林日复一日地在重复冷酷无情的口号“消灭德国侵略者”,苏联人民的民族主义感情被猛烈地煽动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些宣传,民族情绪可能不会上升到后来的那种高度。但是原因和结果也不是那么绝对的。即使没有民族主义的宣传,德军的残暴,有系统地大规模屠杀妇孺,实行奴隶劳动,以及毫无心肝地毁灭城市和乡村,这一切比任何宣传都更具有说服力。从斯大林格勒打到柏林的士兵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因为他们就是通过德国制造的废墟前进的。这样,作为战胜者,他们就要把愤怒发泄到战败者身上;就期

望他们的政府利用德国工业和劳动力的帮助来重建苏联，并摧毁德国从事战争的能力。最后，当他们把红旗飘扬在帝国议会大厦上时，这就成为革命的苏联战胜德国的象征，而不是德国革命胜利的象征。

但是，苏联对于德国的这种令人可怕的憎恨，当战争接近结束时，却证明是政治上的一笔巨大负债。它引起德国的恐惧，并延长了德国的抵抗。直到最后，希特勒的军队在东方比在西方战斗得更加顽强。斯大林也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1945年3月，驻意大利的德军总司令凯塞林陆军元帅首次提出向英美全军投降的建议。当斯大林得知英美在同凯塞林商谈时，他大为“激动”，因为这是他旧日担心西方盟国和德国单独媾和的一种迟到的反映。^①不久以后，即在4月间，他就停止了民族主义的叫嚷，并命他的宣传机构重新发表他差不多忘记了的话：“希特勒之流可以上台下台，而德国人民还是德国人民，德国国家还是德国国家。”^②这种想减轻德国对苏联恐惧的企图来得太晚，以致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战争最后的日子，大批德国士兵由于心虚和恐慌，从苏联人手里逃到英美那里去当俘虏，而德国的代表想方设法地要同西方盟国而不是同苏联安排停战。斯大林满怀狐疑地注视着这些策略花招；当他最后能够宣布德军也向苏联投降时，是很难抑止自己的惊奇和宽慰情绪的。^③战争最

① 约翰·迪安：《奇怪的联盟》，第164页；詹姆斯·贝尔纳斯：《讲老实话》，第56页。

② 正是在这一个方面，格奥尔基·亚历山大洛夫（他当时是党的宣传部部长）在《真理报》上攻击了作家伊里亚·爱伦堡，因为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沒有区别纳粹和非纳粹的德国人。爱伦堡是士兵们喜欢的作家，他的文章每天发表在红军的机关报《红星报》上。

③ 《斯大林文选》，第422页。

后几周的事件表明，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各以自己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所挖掘出来的德苏之间的鸿沟，在战后许多年都无法用一般的外交政策或革命政策来填平。^①

因此，斯大林的对外政策表现出来并不是事前计划的结果，而是国内和国外压力互相矛盾的结果。现在一如往昔，事件左右他的力量，大大超过了他能左右事件的力量。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某些国内压力的情况。至于在国外方面，从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之间长达数月的盟国内部的冲突和争吵，以及波茨坦会议上极为尖刻的争论，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划分势力范围上已经达成协议，尽管斯大林对希腊内战保持沉默，西方国家仍然对苏联干涉罗马尼亚以及波兰与南斯拉夫的发展情况提出了抗议。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意见不和本来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消除，现在又重新显露出来。斯大林拒绝了罗斯福关于莫洛托夫必须参加在旧金山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请求，以此表示了他的不愉快心情。（只是到了罗斯福死后，斯大林为了表示对美国新总统的友好，才在1945年4月12日同意莫洛托夫出席，以增加旧金山会议的光采。）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无疑地感到，他的盟国正企图使他丧失它们先前让给他的阵地；正是怀着这种真正的怨恨，当哈里·霍普金斯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告诉他说：“即使俄国人是单纯的人，而西方却经常错误地

① 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在莫斯科成立的自由德国委员会在宣传上完全没有什么效果。这个委员会起初由塞伊德利茨将军负责，后来也由冯·保卢斯陆军元帅负责。斯大林让这个委员会起的作用，引起了西方盟国的各种猜测。据认为，这个委员会将是苏联卵翼下的德国政府的核心。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流产的在宣传上的冒险行为。它企图主要向德国保守的舆论进行呼吁，因而它不仅使用非革命的语言说话，而且还使用霍亨索伦王朝的旧旗帜。

把他们当成了傻瓜。”^①

“三大国”共管的想法在还没有成形之前就夭折了。既然盟国已经使它失去了决定性的环节，要建立它就是无用的。大家彼此埋怨，反唇相讥，因而几乎不可能找出谁第一个“违反了誓言”。盟国的誓言毕竟是十分模糊的，充满了各种漏洞，以致双方都可以援引文本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问题在于，盟国之间的根本分歧不可能不导致一方或双方都抛弃自己承担的义务。这种因利害关系的结合，双方在一开始时就在心里想到不可避免的离婚；而且差不多从一开始，双方就会考虑到结合时能够得到的利益和离婚时所遭到的不利。

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安排，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它的作者来说是很吸引人的，但却是非常不合乎人情的，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懊悔和再思。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领导人来说，把这样多的新阵地让给苏联，这是反常的。即使丘吉尔和罗斯福已经完全克服了他们的犹豫不决，但他们也不能忽视国内那部分重要的舆论。这种舆论或者出于保守派对东欧社会革命的敌视，或者出于民主派对于警察国家（这种革命同它就是一回事）的憎恶，都强烈地反对同斯大林打交道。这些交道对于苏联国内那部分重要的舆论必然也是不合乎人情的，这部分舆论尽管还没有公开表示出来，却通过许多迂回的方法实施它们的压力。莫斯科报刊对西班牙内战保持沉默，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表现得异常的温和，这些都使许多布尔什维克大惑不解。相对来说这些还是遥远地方的事，离国内更近的苏联占领国家正在进行的事情

^① 詹姆斯·贝尔纳斯：《讲老实话》，第62页；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第894页。

则是更为重要的。对于那些占领军,至少是对许多有政治思想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国内的积极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来说,一想到要在红军花了很大代价独力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土地上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就觉得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虽然最近受到传统主义的宣传,但毕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因而他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现在要成为那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卫士吗?正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把欧洲引入了纳粹的时代,而且如果让它恢复过来,也不会使欧洲变得更好,因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欧洲历史偶然误入歧途,而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表现。他们这些战胜者,现在要去保留无论从他们经历和愿望来说都是敌对的社会制度,这完全是不合乎人情的事——对他们的伟大“解放战争”来说,这将是更可耻的背离。

斯大林不能忽视这种情绪。起初他显然只想迁就他们一下,于是他倡导“人民民主”的思想。这就是说,在苏联邻国建立的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两者之间的东西。人们根据后来的事实经常认为,这个口号不过是为了迷惑资产阶级,斯大林从一开始的目的就在于搞苏维埃化。不过,作为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人民民主观点,一时之间受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认真的对待,苏联一些政治理论家也热心地进行了讨论。^①人们记得,正是斯大林自己曾经产生一个制度既不完全是资本主义而又不是社会主义

^① 参看《国家与法》1947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47年第2期(特刊)和E·瓦尔加:《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第14、291页。

的想法。这个想法还归结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公式，他一直到1917年还坚持这一公式，在1925—1927年辩论中国革命时他又再次提出了它。在战争临近结束和后来的一些时间里，这个想法显然又在他的心里油然而起。

从他的观点来看，他正在试验的这种中间制度，主要是它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可以帮助他去维持“三大国”共管的主张。但是这种希望将要落空。“人民民主”太富于革命气息，制造者的印记也太明显，以致不能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意。它产生了斯大林想要避免的一切紧张和摩擦。这提醒了他，西方国家准备在苏联边界上重新建立一些老的反苏党派和集团，最后把苏联排挤出欧洲去。无论是对过去俄国的传统主义者还是今天的布尔什维克，西方国家的这种意图看来都同样是明显的。正是因为这样，在拿破仑战争以后，西方国家急于否认俄国刚刚获得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它们在圣斯蒂凡诺条约之后就联合起来反对俄国，并在1878年的柏林大会上剥夺了它主宰巴尔干的权利。斯大林的雄心是不让俄国再次被打回来。在过去，俄国势力在欧洲的扩张多少是短命的，它对巴尔干的影响也随着政治潮流而进退，因为在沙皇统治下，俄国的势力还没有和不可能深入到那些它想主宰的国家的社会结构中。亲斯拉夫主义和东正教还不足以创造永久的纽带。这次苏联的主宰地位如果是建基在东欧的革命和社会结构的改造上，它就能够长治久安，任何外交压力和阴谋诡计都不可能使它逆转。由于苏联同它的盟国之间的争论日益扩大和尖锐，斯大林也更倾向于放弃他的这个中间政权的试验，把“人民民主”缩小成为掩饰共产党垄断政权的门面。当然，他朝这一方向每走一步，都增强了苏联

同西方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雅尔塔会议时，斯大林曾催逼丘吉尔解释他所说的有的国家可能想统治世界是什么意思，而丘吉尔也谈到三位战时领袖的后继者可能要发生冲突。到了波茨坦会议时，这几个伙伴就使用更明确的语言了。会上丘吉尔对布加勒斯特的英国代表的处境发出抱怨，直接了当地对斯大林说：“在他们的周围降下了一道铁篱！”铁篱后来变成了“铁幕”，成为后来更大争论中的主题和行话。斯大林也立即说：“这完全是谎言！”当他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政策受到攻击时，他反唇相讥，攻击英国在希腊亲保皇派的政策，虽然在此以前，他在这一问题上一一直保持沉默。但是一当英国停止攻击苏联政策时，他也就不再对此责难了。不过，争论的领域继续在扩大。波茨坦会议前不久，斯大林提出了在土耳其海峡设立苏联基地的要求——这是老沙皇们从未实现过的梦想。他在波茨坦会议上看到，他的这种努力也会受到他的盟友、特别是曾经挫折了沙皇愿望的英国人的阻碍。于是在关于托管墨索里尼非洲帝国的讨论中，他出人意料地要求意大利的一个殖民地由苏联来托管。丘吉尔为这个新要求而大吃一惊，说他还没有想到苏联会想“获得非洲海岸的一大片地方”。^①这个要求当然会成为对英国控制地中海的一种威胁。看来斯大林也并不指望他的要求会得到满足，因为他能够讨价还价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无论怎么说，他的这些要求，在总体上包含了老的东方问题的危机因素，而正是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时曾经使俄国同英国的关系大大恶化。

但是，即使这个东方问题的新版本，也还不是盟国之间冲

^① 詹姆斯·贝尔纳斯：《讲老实话》，第76页。

突的焦点。盟国无法找到统一解决办法的最大问题还是德国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尖锐分歧，如果不是全部、也大部分是从它们业已同意的一个问题上产生的，这就是它们曾经共同决定把德国置于军事占领下若干年。但是占领的期限却从未规定下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都曾经进行过争论。光是这个问题就足以使盟国的政策南辕而北辙。由于没有德国政府，各盟国不得不起德国政府的作用；但是它们停留得越久，就越要在自己的占领区中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经济和政治生活。这是很自然的事：苏联军事占领当局的官员不会在东德实行资本主义经济，一如美国军事当局不会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去改组西德。因此，盟国军队在德国的长期存在，就势必使这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分裂开来。

但是，战胜国保证过要保持德国的统一，并为此目的而共同管制它的事务。它们在波茨坦会议上十分着重地宣布了这一保证，并实际上设立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在理论上赋予它管制德国各占领区的主权。但是，有关各方在波茨坦会议上就已经或应该明白，共同管制德国将是一场拔河游戏。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实际上都不要对方干预自己占领区的事务。斯大林把奥德河和尼斯河以东的整个区域转归波兰，就是把一个既成事实强加给他的伙伴。从名义上来说，波兰仅仅是对那些地区进行管理，而且斯大林也是向西方盟国这样说的。但由于形势使然，波兰对那些地区的管理就等于把它们并入了波兰。当西方盟国同意斯大林关于把这些地区的德国居民全部驱逐出去的建议时，它们就等于承认（至少也是默认）了这一点。诚然，西方国家接受这一既成事实是附有一个条件的，即只有将来的和会

才能划定德国和波兰的最后边界。但是它们既然事前同意了把奥德河和尼斯河以东的全部德国居民驱逐出去，这个附带条件也就显得是虚伪的了。斯大林必定从他的盟友们的行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既然甘于这样的景况，那末他们对于有关东德的事务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西方国家也断然拒绝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再提出的让苏联参加管制鲁尔经济的建议，这就使得苏联对西德无法进行影响的事实变得明显了。

由于在赔偿问题上的一个模糊不清的妥协，德国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了。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曾寻求英美同意苏联应得一百亿美元的赔款要求。罗斯福总统只是含含糊糊地答应说，这个数字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在波茨坦会议上，西方国家再次拒绝考虑这一要求。一部分原因是，苏联已经拆卸了东德的工厂，并把它们转运到苏联去，而英美对这一过程的规模却无法加以监督。但是这种新的不和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斯大林仍然坚持他的“迦太基式”和约的计划。但英国和在更小程度上的美国，已经不愿摧毁德国的工业力量了。这一观点上的冲突，由于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一项协议，而被掩盖了起来。这项协议就是，每个占领国可以在其占领区内自由地拆卸工厂来满足自己的要求。^①这个协议如果不是在名义上也是在实际上使每一个国家来单独负责管理本区的经济和社会事务，这也使斯大林有权在东德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在波茨坦会议后不久，这个革命就开始了。它的头一个行动就是没收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它曾是德国官僚机构的脊梁和军国主义

^① 根据波茨坦协议，苏联和波兰从西德得到百分之十的“剩余”工厂设备，此外还从食物和原料的交换中再得到百分之十五。

的柱石。斯大林大笔一挥，或许只是使了一个眼色，就摧毁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反动力量，而这是德国过去奋斗了一个多世纪都没有成功的事。第二个行动是对东德的某些工业实行国有化。第三个行动是实际上镇压了社会民主党，表面上是把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组织合并为统一社会党。

社会革命的区域于是就从奥德河扩长到易北河。在德国的历史中，易北河标志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分界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过去德国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在易北河以东，而要求改革和革命的冲力大多来自易北河以西。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改革的社会影响没有越过这条河流。仿佛是为了补偿这一点，现在的另一次革命却从东横扫全国，直到易北河上。但是现在这条河不仅分离了两个德国，它也变成了“两个世界”的边界。这两个世界的代表越是长久地以自己军队同另一方对峙，这条边界就越象要变成一条潜在的战线。

波茨坦会议中一个有意义的插曲，预示了这个胜利的联盟中存在着新的紧张关系。7月24日，在“三巨头”一次会议之后，杜鲁门总统以一种几乎是漫不经心的态度告诉斯大林关于发明原子武器的事。据詹姆斯·贝尔纳斯报道说，“斯大林的回答只是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炸弹的消息，他希望我们将使用它。”^①他对这一件事没有表示进一步的兴趣，也没有询问情况，这使美国的这位国务卿得出结论说，他或者不理解这一发明的意义，或者就是他认为询问这件高度机密的事是不适当的。苏联情报部门也许已经知道比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情况，因此斯大林对此表现冷淡，是由于这件事并

^① 詹姆斯·贝尔纳斯：《讲老实话》，第263页。

没有很出于他的意外。鉴于他一贯地和不厌其烦地对技术武器感到兴趣，以及他对苏联科学家（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早已研究原子的分裂了）的重视，说他没有理解这一发明的意义，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即使他真地没有立即理解这一意义，那么在会议快结束时，他必定已经意识到，由于这一新武器的发明，使军事力量的对比突然有利于美国，这很可能使盟国之间的冲突加深和更加惹人注目。

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曾经说过，也许不是他们这些盟国的战时领袖，而是他们后继人将互相敌对。在波茨坦会议上，这话至少部分成为了事实。在会议的前一半，战时的三巨头只有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参加。在会议的后一半，由于英国大选使工党政府上台，于是艾德礼和贝文代替了丘吉尔和艾登。这并不是说，如果演员表没有改变，这场戏的进一步过程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丘吉尔毕竟很快就已成为斯大林最直言无讳的敌手；而且如果罗斯福还活着的话，他也不可能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成为苏美友好的守护神。不论怎么说，对于波茨坦这场演出，演员表的改变很可能立即就发生了有害的影响。虽然新角色的出现和盟国内部政策并无干系，但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是，在希特勒首都废墟中矗立的这座腓德烈大帝宫殿里，只有斯大林一人作为战时的领袖还留在人间来创造和平。这个伟大的同盟正在解体之中。

第十四章

胜利的辩证法

苏联胜利的壮观和惨状。——斯大林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和革命。——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胜利”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地区胜利”。——斯大林是自上而下革命的倡导者。——“铁幕”的历史和意义。——西方对苏联的影响。——斯大林和朱可夫。——列宁主义的复兴。——两难问题：在原子时代中“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对斯大林作用的总评价。

1945年6月24日，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检阅红军的伟大胜利队伍，这是为了纪念希特勒进攻苏联四周年而举行的。在斯大林的旁边，站着他的副手朱可夫元帅，他是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的胜利者。在他前面行进的队伍是由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领头的。步兵、骑兵和坦克兵带着无数面希特勒部队的军旗，通过泥泞的道路（这一天天下着滂沱大雨），由红场急驰而过。部队到了陵墓下面，把那些旗帜掷在斯大林的脚下。这个寓言式的场面虽然很新奇，却又是熟悉的，因为库图佐夫的士兵也曾把法国的军旗掷于亚历山大的脚下。第二天，斯大林因为1941年保卫了莫斯科而接受该城的颂词。第三天，他被命名为“苏联英雄”，并被授予大元帅的头衔。

这是梦想不到的胜利和光荣的日子。不过，1945年的苏联，胜利和挫折如此相伴而行，这也是很罕见的。也许还从来没有一次胜利象这次胜利一样，壮观和惨状如此交替出现。

斯大林这时完全沉浸在人民赞扬和感谢的光辉之中。这种感情是自发的，真诚的，不是官方宣传机构制造出来的。“斯大林时代的成就”这种过头的口号，现在有了新的意义，不仅对青年人是这样，对于老一代中怀疑和不满者也是这样。全国都自愿地原谅斯大林的一些过错，而只记住他所做的好事。由于一事成功，而事事顺利，甚至他的错误和失算，包括1939——1941年的那些，现在在许多人看来好象都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行为。甚至对三十年代的残暴行为也有了新的看法，认为苏联人民所以能够生存下来还应该归功于这些有益的行动。

对于斯大林的这种新评价，并不仅仅来自胜利兴奋中产生的思考。事实是，如果苏联、特别是它的东部地区没有深入地实行工业化，这次战争就不可能打赢。如果没有大批农庄的集体化，这场战争也是不可能打赢的。1930年的农民从来没有操纵过拖拉机和机器，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集体农庄连同它的机器拖拉机站遍布全国，成为农民打现代化战争的预备学校。^①迅速提高的教育水平，也使红军能够征召大量有知识的军官和士兵后备。“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这是斯大林正好在希特勒开始征服苏联前十年说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话作为一种辉煌实

^① 顺便说一下，集体化使政府更易于增强食物和原料的储备，当国家的粮仓被隔断和交通被破坏时，城市人民还能免于饥荒，工业免于瘫痪。

现的预言，作为一种最适时的行动号召，不能不使人获得深刻的印象。的确，如果苏联的现代化延迟几年，那么是胜利还是失败就很难说了。

和这相对照的，还应该提到苏联为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按官方统计，死亡七百万人（事实上损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伤残数百万人；大多数的城镇和欧洲部分的大部分农村沦为废墟；工业遭到破坏，例如顿尼茨的煤矿全部被水淹没；二千五百万人无家可归，居住在窑洞、壕沟和泥舍里，更不用说撤退到乌拉尔及其以东的数百万人也等于是无家可归的。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胜利的代价包括了人民的极度厌倦，因为为了工业化和战备，多年以来人民就缺乏最必需的生活日用品。

国家被削弱了，而且处于饥饿之中。人们可能期望着胜利带来奇迹，政府创造奇迹。他们要求尽快地重建城市和恢复工农业。他们渴望生产更多的食品和衣物，设置更多的学校和娱乐设施。但是苏联已经耗尽和解体的资源是不能很快地满足这些要求的。随着胜利而来的悲惨情况更加令人难以忍耐。斯大林是不敢使人民失望的。为了加速重建工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不得不利用别国的资源。

在理论上，他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做到这一点。他可以向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要求援助。在联盟的全盛期中，曾有过关于美国贷款给苏联和苏美贸易的许多谈论。但是在后来发展了的紧张关系和冲突中，经济合作的前景就消失了。斯大林也必定不愿意使自己的国家处于相对依赖别人的地位，因为处于这种地位之后，任何债务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同他的债权人发生对

立。他实际上只限于在两种办法中进行选择，一种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是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方法包括向战败国要求贡款，拆卸它们的工业以运往苏联，从它们当前的生产中强索赔偿，以及直接使用它们的劳动力。革命的方法，其成果可能更慢一些，但却更持久。它包括苏联和它的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在经济上联合起来，从而扩大计划经济赖以运转的基础。逐渐地把几个小的和中等的国家（它们大多数在三十年代以前在工业上都比苏联发达）结合成为一个计划经济体系，这将会加速苏联发展的速度和重建的工作。这种结合的首要条件就是，那些有关的国家必须是共产党当权的。在走上这条道路时，斯大林默认了托洛茨基所喜欢的表达方式，即苏联的生产力将要反抗它的国界。苏联的经济机体已经处于这种状况：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的，除非这种恢复是缓慢的、痛苦的，并伴随着战胜国所难以忍受的如此众多的苦难。

我们已经看到，民族主义的和革命的这两种政策在一些关键性的方面发生了矛盾。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明确地在这两种政策中作出选择；他同时实行这两条路线，但民族主义的路线在战时占了优势，革命的路线则在战后盛行一时。

这种发展构成了斯大林在政治演变中最显著的矛盾——一个最为荒唐的矛盾。二十多年以来，他一直在鼓吹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福音，并竭力坚持苏联社会主义的自力更生原则。他如果不是在口头的训示上、也是在实际上使苏联背离了世界革命——或者是苏联使他背离了世界革命吧？现在当他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胜利时，他又再一次如果不是在口头的训示上、也

是在实际上否认了他自己鼓吹过的福音。他抛弃了他关于苏联要自力更生的原则，恢复了苏联对世界革命的兴趣。布尔什维主义好象跑完了一个圆周，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的确，这种斯大林胜利的奇怪辩证法，似乎把这一胜利变成了托洛茨基死后的殊荣了。这仿佛是斯大林通过对他的已经死去的敌手进行出人意料的平反，而为他自己那些煞费苦心的争论和清洗贴金。

但是，这样一种观点也只代表一半真理。无疑地，1945—1946年的斯大林已不复是我们已知的1925—1935年的斯大林。时代的潮流已经使他不再是他自己宣称的那个人和他实际上是的那个特殊的人了。但是时代的潮流还没有使他返回自己的出发点，即他一度同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主张的世界革命的观点。现在他已把某种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地区胜利”的思想代替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思想。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中，社会主义革命本质上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全球性过程，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敌对力量之间有长久的休战。按照这种思想，是不容许在两种制度之间故意地去划分势力范围的。这种建基于划分势力范围的几大国共管的思想，从老的布尔什维克观点看来，似乎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原则的否定。在斯大林主义的观念中（就斯大林政策中可以推断的来说），世界革命的过程也是全球性的，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对，就象早先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敌对一样，都是现代文明所固有的。但是它们的斗争只是在更为广阔的历史和哲学意义上继续下去，很可能要延续许多代人的时间。在实际政治的现实中，革命过程的中断同它的继续如果不是更重要、也是同样重

要的。对立制度之间战争似的冲突之后，将会（或者可能）继之以长久的休战，也许会持续几十年；而在这个过程中，两种制度的敌对将采取和平竞赛的性质。这个过程性质不仅允许、而且还积极地在事前安排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订立契约和进行交往。它甚至允许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象划分势力范围这样的国际上的实用主义原则。通过这种势力范围的划分，社会主义国家固然增强了世界那一部分地区中资本主义的地位，但是作为回报，它也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并使之扩张到对方的范围内去。

同这一观点有关的是另外一个在态度上的区别，它在四十年代的事件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按照老的布尔什维克观点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是“高度工业化的西方”。俄国开始了这场革命；西方将继续进行这场革命，使它开花结果，然后再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反作用于“落后的俄国”。现在，照斯大林主义看来，这种对事物的计划已经十分可笑地陈旧了。部分原因是，西方仍然无力进行革命；部分原因则是，由于苏联进步的结果，西方争取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削减了，以致能够在这次势力范围的巨大均分中放心大胆地把西欧让给资本主义。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把眼睛注视着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看成二十世纪革命的主要代理人；而斯大林的眼睛却主要注视着华沙、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和布拉格。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区域内胜利（即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胜利），已经成为整个历史时代在政治战略上的最高目标。

但是，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革命的方法。一般来说，老的

布尔什维主义是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力量上的。它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外国工人阶级创造性经验和斗争的结果,因而这是他们社会和政治自决的最可靠的行动。换句话说,老的布尔什维主义认为,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 就象1917年的那种大变动。现在斯大林在东欧和中欧所实行的革命, 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它由在这一区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加以规定、激励和管理。虽然当地共产党是它的中间代理人和执行者,但处于幕后的最大的革命党还是苏联红军。这并不是说当地的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这场大变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参加, 那末这场冒险就只会成为昙花一现的东西。仅仅是自上而下, 而没有有关各国的重要部分自愿合作, 任何革命都是不能实现的。因此, 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发生的事情半是征服和半是革命的。这使得对这一现象的估价十分困难。如果它仅仅是征服, 那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它谴责为苏联帝国主义的行为。如果它仅仅是革命, 那末起码对于那些认为一个国家有权自己进行革命(这个权利是每一个大国都曾经使用过的)的人, 就将毫无顾虑地欢呼这个革命。但它是征服和革命的混合, 这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区域胜利”的本质。

斯大林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倡导者, 在欧洲现代史中是无独有偶的。他与拿破仑和俾斯麦为伍, 却又在其他方面大大不同。他的这种作用是由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有一种特殊的类似之处(这种类似之处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显露出来)。十九世纪时, 在法国以外的欧洲, 可以看到封建制度已经土崩瓦解, 而由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但是, 在莱茵河以东, 封建主义还没有被一系列法国大革命模式的剧变

所推翻，还没有被人民群众失望和愤怒的爆发所推翻，也还没有为某些雅各宾党人在1794年所希望的那样由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推翻。相反地，欧洲的封建主义是由于一系列自上而下的革命所摧毁或削弱的。拿破仑是国内雅各宾主义的驯服人。他在意大利、莱茵兰和波兰等外国土地上实行了革命，全部或部分地废除了农奴制度，而且他的《法典》还摧毁了许多的封建特权。他并非出于本意地执行了雅各宾主义的部分政治遗言。更为奇怪的是，保守的容克地主俾斯麦也起了相似的作用，他使德国摆脱了许多妨碍资产阶级发展的封建主义残余物。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二代人亲眼看到了一个甚至更为奇怪的场面，即俄国沙皇亲自废除了俄国和波兰的农奴制，这个行动不久以前还是“雅各宾派”所梦想实现的。封建制度已经垂死，不能再生存下去了。但是法国以外的人民群众力量又太弱，不能一致起来“自下而上”地推翻它，因此它就自上而下地横扫一切了。拿破仑对于法国各邻国的冲击，可以拿斯大林主义对东欧和中欧的冲击来加以类比。两者的历史情况在主要方面是相似的：东欧的社会制度已经很难生存下去，就象拿破仑时期莱茵兰的封建制度一样。但是革命的力量又太弱，不能一致起来推翻这个时代错误。于是征服和革命就融合在一个运动中，既有进步，又有后退，最后终于改变了社会结构。

胜利的斯大林主义还有另一个“辩证的矛盾”，这就是“铁幕”，即斯大林教育苏联一整代人极为严格地孤立于世界之外。这种孤立事实上对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不

可缺少的，因此斯大林可以被称为“铁幕”的主要建筑者。但是，孤立的原因和构成这种孤立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正是这些因素互相结合起来，才使“铁幕”这样地坚固、厚实和不可逾越。

首先的因素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在世界革命的希望受挫以后采取了自卫的态度。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把自己关闭于敌对世界之外。在这一方面，它同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和雅各宾时代的法国没有什么两样。清教徒的英国一直怀疑和害怕“法国的阴谋”和“法国的金钱”在反对它。而“英国的阴谋”和“英国的金钱”这一幽灵也一直缠住雅各宾的法国。在两种情况下，革命的国家都是有理由表示怀疑的，因为敌对的“阴谋”和“金钱”并不仅仅是幻想中的事情。同样，在两种情况下，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防范都是异常强烈的，这是任何革命时代中群众感情的特点。

布尔什维克苏联的这种精神状态，由于俄国的民族传统而大大增强了。就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民族的风俗习惯更容易和更强有力地坚持下来，因为它们同革命的真实而明显的需要是和谐一致的。俄国由来已久的同西方的隔离，是由于军事上的考虑（俄国平原无险可守），是由于东正教对天主教的敌视，在后来则是由于专制的沙皇制度急于防止西方自由派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渗入。诚然，在十九世纪，俄国的知识界曾部分成功地打破了这座墙。但是即使获得这个成功，也是经过了艰苦的斗争的，它更加突出了孤立的基本事实。这座墙虽然有了缺口，但仍在那儿矗立着。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起初想推倒它；后来他们发现这座墙大有用处，就不仅保留了它，甚至还

修补了它的缺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铁幕”是经济保护主义的一个变种。任何一个现代的大国，除了英国是特殊的例外，在发展本国工业的时候，都要用高关税的壁垒和其他一些限制性措施来保护自己，以反对较老的工业国的竞争。正是借助保护主义这一盾牌，美国和德国使它们的工业成熟起来。在一国胜利的社会主义，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办法。别的国家在发展工业时，都得到外国资本援助的好处，或者象美国的情况，受到两大洋的地理“保护”。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没有这样的好处。外国资本不会帮助它来发展自己的财富。在它面临新的总体战争的威胁并被迫把大部分财富转入军备方面以前，它几乎还没有真正认真地开始工业化。这就使得它的工业革命比其他没有这种情况的工业革命来得更为痛苦；而这也就使得它的保护主义异常地严格和苛刻。

首先感觉到这种严格和苛刻的就是普通的工人。政府和计划当局不得不把国家的资源分配给工业和交通的发展、农业的机械化、军备和个人消费。分配给工业和军备的资源越大，剩下来分配给个人消费的就相对地(甚至是绝对地)越小。这是一个很明白的经济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逻辑已为所有交战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或再认识到了，但是苏联却是在许多年后才不安地认识到这一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现在又为国家政策的更高目的而牺牲。尽管这样，在三十年代晚期，生活水平已经开始感觉到有所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是短暂的。战争再次使生活水平降低到可怕的程度。

苏联的人民群众看到，国家迅速地越来越富，而绝大多数

的人却仍然贫穷，甚至越来越贫穷。的确，经济学家明白，这是从事工业革命的差不多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的事情。十九世纪保护主义的本质就在于，阻止外国便宜的货物拥入消费市场，以便保护和刺激本国工业力量的成长。但是，在国民财富的积累和个人贫穷之间的对比，没有任何国家象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那样尖锐。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哪个国家把这种对比看作是社会主义和无阶级社会的等同物。斯大林要求工人阶级不仅要努力工作，忍受牺牲，而且还要相信他们的生活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更容易和更舒服。这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真的；但这却不是社会主义的过失。大体说来，这也不是斯大林及其政府的过失，虽然他们的某些错误曾使这种情况更为恶化。但是斯大林是有过失（如果用这个字是正确的话）的，这就是他把苏联人民悲惨的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成就而奉献于人民之前。

这种歪曲的说法引起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虚伪的欺骗。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不允许人民群众把苏联的和外国的生活水平加以真正的比较。第二个结果是，在许多年里，宣传机构不仅粉饰国内生活的状况，而且坚持对国外工人阶级的悲惨情况作极其荒谬的夸张。第三个结果是，只有极少数的苏联公民才被允许或者通过直接观察或者通过阅读外国书报去研究外国的社会生活。保持“铁幕”就成了斯大林的主要经济和政治利益所在。

苏联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简直弄得密不透气，在大清洗中就成为一种乖张的精神病态。总检查长维辛斯基所描绘的那幅阴险的、无孔不入的外国阴谋的图画，由于被告们的坦

白，甚至变得更为不妙了。据说在国家的每一部门中都有阴谋的代理人，而对于“阴谋分子”都实行可怕的惩罚——所有这一切就使得对外国的事情都非常神经过敏。同外国人和外国事物的接触，尽管十分小心谨慎，都被认为受到了感染。老年人自然猜想这一切都是阴谋；而出于恐惧，他们就同意了这种孤立。但青年人却只相信它的表面价值。他们固然恐惧外国的罪恶事物，但对国内的事物也执异端的看法。这一部分是他们正常的心理状态，一部分是他们的性格使然。他们差不多从摇篮时代起就被那个铁板一块的国家所塑造；他们并不是被灌输了马克思主义，而是被灌输了一种粗暴的拜占庭式的翻版。他们从未被允许养成对接受真理时的疑问习惯；他们也不具有在观点和原则上真正发生冲突的任何经验，即缺乏独立思考的经验。大清洗最后使青年一代的思想与扰乱人心的外在影响完全绝缘。

由于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因素，“铁幕”实际上就起了“进步的”和“反动的”两重作用。在这个铁幕之后，革命感到了某种程度的安全，政府可以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工作。（“铁幕”的真正军事价值直到战争时才表现出来，希特勒的将军们在入侵苏联以后发觉，他们对于自己的敌人几乎一无所知。^①）同时，“铁幕”也保护了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传奇和欺骗。“铁幕”的这两种作用，已经成为斯大林主义存在的不可残缺的条件。

现在，这场胜利正威胁着要使斯大林丧失这一必不可少的条件。苏联突然发现在各方面都被卷入外部世界的生活和事务之中。几百万的苏联士兵进入了十几个国家。他们的心理充满了拿破仑对进入外国的军队所说的那种航海一般的感觉。几

^① 利德尔—哈特：《在山的那一边》，第184、187和196页。

百万强迫劳工从德国的长期拘禁中返回家园。无数的军官坐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每天同异己的世界接触。于是“铁幕”就被穿透、打破，几乎被粉碎了。

资本主义西方给苏联人的印象，决不象某些自我恭维的人所想的那样是一贯良好的。苏联人看到一片废墟的欧洲。千百万男女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铁丝网包围的德国集中营里，或处在毒气室的威胁之下。他们看到的是欧洲文明可怕的、不健康的残余部分，而不是它往日高贵的形象。对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来说，外部世界的图景甚至比国内宣传机构曾经描述的还要更黑暗。即使是那些没有这种悲观经历的人，也绝不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上去。在他们多数人看来，生产资料不是公有化的任何社会，本身就是社会的不正义，是一种莫名其妙或可笑的时代错误。但是，在同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多年孤立所养成的思想习惯如果不是完全崩溃，起码也是开始被削弱了。苏联人注意到，即使在战争的蹂躏下，外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比他们高。甚至战败国都还享受的舒适生活，使他们为之眼花缭乱。^①他们不无羡慕地看到，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比他们更少受到压抑，在发表自己的思想时也更少受到限制；总之，他们享受着某种程度的自由。

同外国的接触产生了精神上的激动。这种激动的规模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受到这种激动影响的千百万人返回家园

^① 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曾经辩论说，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便宜货物的压力”，将使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陷于失败。斯大林的经济保护主义使这种压力不能接近。“洪水一般的外国便宜货物”是不允许运入苏联的。但是当苏联人进入欧洲之后，他们仍然感到一种“便宜货物”的压力，那就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更高的生活水平。参看托洛茨基：《俄国的真相》，第83页。

之后，不能不把他们经历的某些事情告诉他们的亲朋。但是，从这种情况中还没有立即产生出轰动的政治发展，也没有使这种激动形成任何明确的政治思想，因为还没有能够形成这种思想的独立的团体或组织存在。过去人们被强迫着去形成自己的意见，现在还不能马上就重新认识这种习惯。因此，在他们思想中开始形成的，似乎是一种不易觉察的根据新的原则对价值观念重新考虑的过程，它能够持续多久和它的最后结果是什么，还没有人能够预言。这种最近的经历使全国产生新的强烈愿望，要改善物质生活的条件。斯大林政府很可能要通过向战败国征收赔款和积极恢复国内经济，来部分地满足这种愿望。除了物质利益的范围以外，还可以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新的好奇心。对于这种渴望和好奇心，政府不得不部分地去满足它。^①胜利不能不把先进的观点传给这个国家，起码也是传给它的知识分子。人们有一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和已经达到成熟阶段的感情，认为他们已经长大了，不再需要曾经对他们很有用处而又使他们遭受很大苦难的那种监护了。诚然，在胜利的心情中，全国是愿意原谅斯大林过去的过失的，但也许更为真实的是，人们不愿意看到那些过失再重复了。

我们曾经说过，还不存在什么团体和组织来使这种新的激动形成政治思想。这种说法需要作进一步的证明。在战争接近结束时，军官团代表了这种组织的萌芽。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分析了使它半免于集权压力和容许它获得明确身份的那

^① 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要废除死刑（这是对刑法的一种半自由主义的修改），要强调人身保护权和守法，以及战后的其他一些改革。

些情况。到了战争快结束时，军官团在道义上已经居于全国的首位。它有一个值得尊敬的领袖，即莫斯科的保卫者和柏林的攻克者朱可夫元帅，他的威望仅次于斯大林。这也许是更为名副其实的，因为官方的宣传对此并无什么功劳。但这并不是说斯大林的地位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或者朱可夫能够扮演同他敌对的角色。在演变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前，或许还需要很长一段时期；而且当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能否做到这一点，还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尽管斯大林的地位并未处于危险之中，他还是急于象三十年代那样，再次镇压（虽然以更为温和的形式）另组政府的潜在可能性，或者勿宁说不是他指定的政府继任人出现的可能性。他也许记起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在接触了欧洲后所发生激动的后果。在战胜拿破仑后不几年，沙皇的军官团中就充满了秘密组织，它们都是由那些观察了外国生活从而想为国内改革而战斗的人组成的。亚历山大死后，那些秘密组织就准备和实行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成为一系列革命骚动的前导。

因此，斯大林的主要努力就是要使党重新回到它往日的崇高地位，不与任何别的组织分享这种地位。于是一些著名的元帅和将军就黯然失色了。在战火消停后几个星期，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就几乎不再在宣传中提及。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正常而合理的现象，任何不是处于军事独裁之下的国家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情况仍有不同。军官团的黯然失色是有其政治意义的。这是精心策划和前后一贯的行动。到了1946年，情况就清楚了，朱可夫元帅完全从公众的眼里消失了。从那以后，他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甚至保卫莫斯科中的作用，在官方的战

争记述中逐渐模糊了，一直到柏林战役的三周年时，《真理报》发表了纪念的文章，其中却一次也没有提到朱可夫。^①他的名字已经从战争编年史中抹去了，就象许多名字从革命编年史中被抹去一样。

斯大林一方面恢复党在道义上的最高权力，一方面又努力重建党的观点，以反对前几年中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场革命和传统的拔河赛中，前者明显地重新坚持了自己的地位，虽然也还没有完全压倒或消灭了后者。和平时期亦如它以前的战争时期一样，在公众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在政治、经济、哲学和历史的写作以及小说和艺术上，都作了很多意识形态的调整。那个家喻户晓的俄罗斯母亲之神，不久以前才重塑金身，现在则到处都把它悄悄地扔进杂物堆去了，如果不是完全抛弃了的话。召唤库图佐夫、苏沃洛夫、米宁和波札尔斯基的名字，已不再是好的爱国主义风格了。已经不再时兴颂扬伟大的沙皇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而在不久以前历史学家和作家还怀着崇敬的心情把他们说成是斯大林精神上的先驱。甚至亲斯拉夫主义的宣传也消声匿迹。一般说来，已经不再需要使人民的思想过多地转向过去。^②新的任务是恢复“布尔什维克意识”。青年们被教导去根据新旧俄国的相异处而不是相似处评价事物。

① 1948年9月5日的《真理报》声称，围攻柏林计划的作者是斯大林本人。这篇纪念文章的作者们提到参加这一战役的许多将军，唯独没有提到朱可夫。

② 1945年初，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停办苏联历史学家的杂志《历史杂志》，而代之以叫做《历史问题》的另一杂志。“在我们过去几年的历史研究中，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倾向的……曲解，也存在着以概括的方式为沙皇殖民和吞并政策恢复名誉的倾向，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解释俄国国家的成长，拒绝承认农民运动的革命意义，把一些贵族人物理想化，放弃了对历史现象的阶级分析。”（《历史问题》，1945年第1期）

而且还要他们知道，苏联之有今天，大大归功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斯大林解释的马列主义。现在是提倡和鼓励列宁主义的复兴。

这种新的转变，部分可能是对战时过度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真正的反动，部分也可能是出于斯大林个人的考虑。在1941—1943年时，他还接受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的吹捧，并以1812年和1941年两次卫国战争的类似而引为荣耀。他是站在祖先的肩膀上才显出自己的高度的。但是现在作为一个胜利者，他已不需要这一切了。彼得之流、库图佐夫之流、亚历山大之流，同他比较起来，都显得是侏儒了。把自己再次说成是列宁的继承者，这对他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列宁的地位毕竟一直是很高的。但是除了这些考虑以外（关于这点人们只能进行猜测了），斯大林鼓励列宁主义的复兴还有更为广阔的动机。他希望通过它来对抗资本主义西方对苏联的新冲击。民族主义的宣传曾足以唤起人民来为生存作殊死的斗争，但还不足以激起人民来反对外部世界的“腐败”影响和提供新的希望。布尔什维克鼓吹资本主义注定要崩溃而社会主义注定要胜利，只有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这种理论，才能使人民明白，在西方吹得天花乱坠的事物表面下，却隐藏着不可挽救的衰落。斯大林企图燃起已经半熄灭的往日对意识形态和对共产主义的热情，以便坚守自己的阵地，不仅在外部的而且在苏联内部反对西方。他特别希望燃起这种热情之后，能够恢复知识分子的信念，使他们重新服从他的严酷统治。这又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列宁主义现在被用来堵塞斯大林“铁幕”的缺口。

由于斯大林对外和对内政策的明显矛盾，这些工作都将是

徒劳无功的。他的对外政策是要把苏联保持在欧洲之内，但他的国内政策又要使它的思想保持在欧洲之外。他的目的不仅是使苏联重新孤立于英美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之外，而且还要孤立于苏联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因为“人民民主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气同苏联的很不相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传统不一样。即使在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形成过程也经历了很多年，而且需要很多经济上的变动、政治上的冲击和缓慢的变化。经历了长期痛苦过程的最后产物是不能现成地输出到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去的。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以及它们农业中私人占有的优势，工业化方法的不同，工作效率的不等，都使它们和苏联有所区别。捷克人和波兰人的生活水平在传统上就高于苏联人，是不能象在苏联那样为了工业化而被压低的。所有这些情况看来都会产生离开正统观念的“偏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真正接触——自由旅行和自由交流思想——是很容易成为苏联内部骚动的另一个来源的。因此，斯大林就保持了两个“铁幕”，一个把苏联同它的势力范围隔离开来，一个把它的势力范围同西方隔离开来。西方的舆论更多地想着后者，其实前者才是两个“铁幕”中最穿不透的一个。但是，这两座墙能否有效地使苏联同时既在欧洲之内又在欧洲之外，这还是可以怀疑的。

但是，胜利的斯大林主义主要还面临着一个更为广阔和更为危险的两难问题。斯大林把全部赌注都下在对整个苏联势力

范围实行革命化方面。他显然认为，只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就能够确保伟大的休战，用他的话来说，即资本主义的西方和共产主义的东方“和平共处”。这两个目标，即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实行革命及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势必要互相妨碍。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休战，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均势上的，现在几乎不能再恢复这种均势了。当时构成这种均势的要素是苏联的软弱和美国的孤立主义。这两者都属于过去的事了。任何新的均势都需要这样的条件：美国要甘心于苏联在东方的优势，而苏联也甘心于美国在西方的优势。它还需要各国把在世界上划分的势力范围永久固定下来。即使它们能够做到这些，但由于世界权力的两极分化和两个制度边界上的摩擦，这种新的均势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进入原子世纪的门口，世界对于两个敌对的制度是不是变得太小了？这并不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工业技术的进步早就使民族国家和帝国变得陈旧了。但是，美国势力和苏联体系的突然扩张，是同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因而又以令人迷惑的坚持性和难以忍受的尖锐性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在这个问题前面，胜利的斯大林主义也同世界的其余部分一样，看来是要遭到失败的。

到此我们就暂时停止叙述斯大林的生平和工作。我们并不幻想能够从中得出最后结论，或者根据它来对这个人以及他的成就和失败作出肯定的判断。在经历了这样多的高潮和低潮之后，他的戏剧似乎现在才达到了顶点；而我们不知道这最后一

幕将比前几幕有什么新的景象。

看来可以确定的是，斯大林是属于那种伟大的、革命的专制暴君一类的人，就象克伦威尔、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一样。这个形容词的每一部分都应该强调地说明一下。他是伟大的，如果从他工作的规模、行动的气概和统治范围的广大来衡量的话。他是革命的，这不仅因为他一直忠实于革命的所有创造性思想，而且因为他把一个社会组织的崭新原则付诸实践，不管他个人或者与他的名字相连的政权怎样，这个社会组织肯定是能存在下去的，能丰富人类的经验，使它转入一个新的方向。人们看到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企图偷偷地学他的榜样，宣称它们也采取计划经济的方法，这的确是斯大林的一个胜利。最后，他的非人道的专制主义不仅败坏了他的很多成就，还激起猛烈的反抗。在反抗中，人们很容易暂时忘记他们究竟是反抗什么：是斯大林主义的专制，还是它进步的社会功绩。

当企图把他和希特勒加以比较时，斯大林性格和作用的复杂性就变得明显了。他们的相似处是很多的和显著的。他们都毫无怜悯和顾虑地镇压了反对派。他们都增强了集权国家的机器，并使人民处于他们经常的、无情的压力之下。他们都企图重新塑造国家的思想，使之成为单一的模式，排除任何“不合需要的”冲动或影响。他们都根据严格的领袖原则，建立起自己不受挑战的统治地位。^①

^① 但是，在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领袖原则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希特勒被他的追随者当成半神来崇拜，毫无禁忌，因为英雄崇拜非常适合于种族主义的神秘性。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崇拜，却永远不能使之适合于马列主义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受到崇拜，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神秘的英雄，而是因为他理论的指导者、革命的受托人、权威的象征。马克思主义的约束迫使他用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权威来掩盖他的个人权威。

他们的相似处仅止于此，但却有着许多不相同之处。希特勒没有使德国民族在任何一个领域中超出他掌权以前的水平；在大部分领域中，却使它大大倒退和可怕地倒退了。在他1933年上台时，德国虽然还有经济萧条和社会紧张现象，但它却是一个富足繁荣的国家。它的工业是欧洲大陆最有效率的。它的社会服务事业是最现代化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无法同它相比。它的大学是知识的重大中心，以拥有著名的科学人才而自傲。德国青年的优秀部分是认真的、活跃的和有理想的。德国的剧院受到高度的赞赏和仿效。最好的一些德国报纸是欧洲大陆报纸中最明智和最灵通的。

希特勒留下的德国已经贫困不堪，沦为未开化状态。我们并不是在说德国战败所受到的影响，而是说与战败无关的国家状况。在希特勒统治下国家拥有的物质生产机构，除了一些特殊的军事工厂以外，基本上不比他当政以前更大。它的社会服务事业已经一半被毁坏了。它的大学已变成训练恐怖而残酷的一代人的基地。它的著名科学家或者被迫流亡国外，或者被迫接受冲锋队的指导，并学习那些种族主义的狂言滥语。它的医疗人员都变成了纯洁种族血统的专家，暗杀那些被认为血统不纯的人们。在它的国家哲学的圣殿上，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已经占据了伊曼努埃尔·康德的壁龛。在纳粹报纸、广播、电影和戏剧十二年的“教育”下，德国的集体思想已经显得荒谬而堕落。这些可怕的损失是不能单靠一个积极的成果或一个新的思想来挽救的，除非人们把一个国家或种族有权统治或消灭别的国家和种族当成是这种新的思想。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德国的社会结构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变化。当纳粹主义的门

面垮台以后，全世界都看到，德国的社会结构还是同希特勒以前的一个样，存在着大工业家、克虏伯之流、蒂森之流、容克地主、中产阶级、富农、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虽然不是从政治意义上说，而是从社会意义上说，1945年的德国仍然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德国，只不过是由于一场悲剧性的毫无目的的暴乱而被投入可怕的骚动和混乱之中。^①

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毕竟有很大的不同。斯大林掌权时的国家，除了一小批有教养的人和先进的工人外，完全可以称为未开化的国家。这并不是要责难苏联的民族性格——苏联“落后的、亚细亚的”条件是它的悲剧而不是它的过错。用一句著名的话来说，斯大林使用野蛮的方法来肃清苏联的野蛮状态。由于他使用的方法的性质，使得大部分苏联生活中已经肃清的野蛮状态，又返回来了。但是，国家在许多领域中还是大大前进了。它的物质生产机构，在1930年时尚劣于欧洲任何中等国家，现在已经如此巨大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欧洲的第一个和世界的第二个工业化强国。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它的城镇增加了一倍；它的城市人口增加了三千万。各级学校十分引人注目地成倍增长。整个国家都进入学校了。它的思想已经如此的清醒，几乎不能再使它重新睡去。它对于知识、科学和艺术的热情，受到斯大林政府的鼓励，已经达到了无法满足和令人为

^① “比希特勒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更可怕的是他造成的经济后果。即使是最无情地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也不会比希特勒完全忽视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更具有破坏性。……希特勒的四年计划同俄国五年计划中那种建设性的计划毫无共同之处。”这个评论出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死敌贾尔马尔·沙赫特之口，他一度任过希特勒的“财政术士”。见贾尔马尔·沙赫特：《和希特勒清算》，第41页。

难的程度。还应该说一下，斯大林虽然使苏联同西方当代影响隔离开来，却对他所谓的西方“文化遗产”鼓励和提倡学习的兴趣。也许还没有一个国家象苏联那样，青年们对于别的民族的古典文学艺术怀着最大的崇敬和喜爱。^①这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教育方法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另外一个区别是，斯大林不象希特勒那样禁止新的一代阅读和研究同他的思想观点不一致的本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当他对活着的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画家、甚至作曲家实行专制的时候，整个来说，却对已死的表现出一种奇怪的虔敬心。象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别林斯基和其他许多人的作品，其中对于过去专制的讽刺和批评，和今天的情况经常是相同的，但却照印数百万册交给青年阅读。俄国的莱辛或海涅的作品没有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焚毁。也还不能忽略斯大林主义所固有的理想主义本质（虽然斯大林在大体上给予了歪曲的解释），即不是人统治人、国家统治国家、民族统治民族，而是大家基本上平等。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它也只是为了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去；而且它是自由和平等的共同体，而不是独裁。这些说法仍然是很鼓舞人心的。因此，在斯大林主义的教育影响中还有很多积极而宝贵的成分。从长期来看，这些积极而宝贵的成分可能会要转过来反对斯大林主义坏的方面。

最后，苏联社会的整个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和多方面的变化，因此它真正不能够逆转了。可以想象，苏联人民对于他

^① 到战争爆发时，苏联出版的外国古典著作总数为：拜伦的五十万册，巴尔扎克的近二百万册，狄更斯的二百万册，哥德的五十万册，海涅的一百万册，雨果的三百万册，莫泊桑的三百万册以上，莎士比亚的一百二十万册，左拉的二百万册，等等。

们长期生活其中的戒严状态将会发生猛烈的反抗。甚至也可以想象，可能发生某种政治上的复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这种复辟也只能触及苏联社会的表面，而且面对革命已经做了的工作，它会表现出是软弱无力的。因为革命已经作了的工作，甚至比斯图亚特和波旁王朝复辟所做的工作都更为全面彻底。“二十年做了二十代人的工作”，这句话对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来说，比对其他革命的国家都更真实。

有了这样一些理由，就不能把斯大林归入希特勒一类的人物中去；在所有的暴君中，希特勒的记录是绝对不足称道和最无价值的。希特勒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反革命领袖，而斯大林却是一场悲剧性的、自我矛盾的、但又是创造性革命的领袖和开拓者。就象克伦威尔、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一样，他起初是起义人民的公仆，后来却成为他们的主人。就象克伦威尔一样，他体现了革命一切状态和变态的连续性，虽然在头一阶段中，他的作用不是那样显著。就象罗伯斯比尔一样，他使自己的党流尽了鲜血。就象拿破仑一样，他建立了他的半保守和半革命的帝国，并把革命带到国界以外。斯大林事业中最好的部分，肯定要使斯大林流芳千古，就如同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事业中最好的部分也使他们流芳千古一样。但是为了挽救斯大林事业中最好的部分于未来，为了使它具有充分的价值，历史还不得不严格地净化和重整斯大林的事业，就如它曾经净化和重整克伦威尔以后的英国革命和拿破仑以后的法国一样。

第十五章

补篇：斯大林的最后岁月

斯大林的成就和毁灭。——战后的五年计划。——二千万人死亡。——新的恐怖。——日丹诺夫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冷战的开始。——斯大林拒绝“马歇尔援助”。——共产党情报局。——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封锁柏林。——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中国革命：斯大林和毛泽东。——铁托被革除教门。——朝鲜战争及其后果。——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兴起。——斯大林和犹太人。——他是否患了偏执狂？——他对语言学和经济学的最后见解。——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医生阴谋”。——斯大林作用的重新估价。——他的逝世。

斯大林的晚年给他带来了成就，但也给他带来毁灭。他一生的戏剧又在尾声中重演了；而舞台比开始时大得多，他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扩大到了如此程度，甚至使得一个相当伟大的人都相形见绌了。苏联同它的战时盟国的冲突已经席卷了半个世界；现在中国革命又获得了胜利，最后结束了苏联的孤立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局面。它使斯大林在东欧上演的暧昧不明的革命都黯然失色。它一举改变了世界的均势。而且它把斯大林主义连同它的民族自给自足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都变成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时代错误。

同时，苏联的变化也缓慢而确实地从内部侵蚀着斯大林主

义。国家正重温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历，因为战争已使它倒退，并阻碍了它的生长和发展。斯大林重新开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他不允许人民从战争的劳顿中有任何缓解。他不得不重新动员他们，要他们贡献出每一分力量来恢复已被破坏或工作过度的工业，重建无数沦为废墟的城镇。他以坚持不懈的冷酷无情来对付人民的极度疲惫。他重新训练和编组他们，把最严厉的紧急条令和劳动法规强加给他们，使他们服从无孔不入的警察的控制，并扑灭抵抗和异端的每一个火星。

但是，历史并不是简单地重复着。国家已经不能再回到它过去的阶段。虽然它由于战争的屠杀和破坏而损失惨重，但它也获得了新的基础和有利条件，并正在迅速而有力地恢复过来。东部各共和国和州的工业化已经加速进行；从德国入侵以后就成为红军兵工厂所在地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以东地区，成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基地。国民经济的恢复还得到了德国和其他战败国赔偿的帮助。尤其是，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国家已不复是当初的样子了。我们已经看到，由于1941——1945年的经历，它的道德力量已经加强，它的思想中已经引起了激动。不断发展的社会现代化和群众教育加深了这种激动，即使人民的情绪由于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还是十分克制的。

斯大林由于性格使然，生方设法地要堵截和减弱一种新社会意识的激动。又由于他的不安全感和急于使国家生活永远“铁板一块”，他企图恢复和重温大清洗的梦魇。他看不到，由于鼓励社会现代化和群众教育，他自己正在“毒化”群众的心灵，并使苏联准备好同斯大林主义决裂。他不理解他的统治方法和教条已经过时，而且又被越来越浓和越来越迷目的烟雾所萦绕，因而

在晚年时就越来越同他的时代、甚至他的统治的现实隔离了。

斯大林的继承人们，他生前的那些顺驯的仆人，在他死后，用阴暗的颜色来描绘他晚年的黑暗情况，说他对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缺乏理解力，愚蠢无能。这些证词有许多真实之处，但也包含故意为了吹嘘他的继承人的所谓美德的拙劣说法。在战争的余波中，斯大林的行动仍然是既大胆又怯懦，既有政治家风度又很愚蠢，既精明又盲目，这是他终其一生的性格特点；在许多方面，他的工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气馁。

在1946年2月9日的一次“选举”演说中，他宣布了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三个或更多一些的五年计划”主要目标的大纲。他指出，只有达到这些计划的目标之后，苏联人民才最后得到真正的繁荣和安全。他们必须继续增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以便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每年生产六千万吨钢、五亿吨煤、六千万吨石油，等等。他说：“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的保障。”这篇演说发表于头两个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才几个星期，因此他暗示由于美国核垄断而使苏联面临新的不安全；他敦促人民去应付美国的挑战。^①

照许多人看来，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似乎是不现实的。斯大林号召的工人们正处于饥饿状态中——城市消费比最贫乏的1940年还缩小约百分之四十。在顿尼茨盆地的煤矿中，人们

^① 《斯大林文选》，第452—453页。

正在从矿井中把水抽出,提升到矿井口的每一吨煤都受到珍惜。在钢铁工厂里,人们拼死拼活地才生产了一千二百万吨钢锭,只及美国产量的一小部分。机械工厂里都是由一些年轻的徒工在劳动。人们鹑衣百结,大多数人赤着脚。要求他们“赶上”美国,这差不多是在开玩笑。但是,苏联还是达到了斯大林所提出来的主要工业目标,而且是提前完成的。仅在十二年以后,每年就生产了五亿吨煤。石油在九年以后年产量就达到六千万吨。而钢铁工业在五十年代末就达到年产六千万吨。在同一期间,水泥和建筑工业扩大了四倍多;每个工人在工业上使用的电力增加了三倍;机器和机床增加了七至八倍。这个进展的最大和最困难部分,是在斯大林时代的最后八年中完成的。^①

与此同时,苏联奠定了自己的核工业基础。这一事业耗费了大部分苏联已经缩小了的财力。1946年到1950年之间投入工业各部门的资金,同1928年到纳粹入侵时共十三年的总投资相等。和往常一样,斯大林还是一心想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对消费工业只提出了极其节制的目标;而且这样低的目标也没有完成。这样巨大的建设又一次建立在极不可靠的农业基础之上。在战争期间,敌人占领了全国最富足的粮仓,国家其余地方的农业生产下降到正常年份的不到一半。战后第一年全国的收成只及战前的百分之六十。粮食储备已经枯竭;很多牲畜被屠杀了;机器和拖拉机急待修理,而且十分不足;甚至种籽的储备或者本身耗干了或者被吃掉了。休耕多年的土地也没有人手去耕种。

^① 《苏联的工业(统计汇编)》,第35、39、151、154、157、161—163页;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50卷,1957年版,第290—296页。

1946年全国发生可怕的旱灾，局势更加糟糕了。按照官方的宣布，这是从1891年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农业遭到的最严重灾害。它远比1921年旱灾和风灾的范围广泛。1921年的灾害曾摧毁了伏尔加地区的全部庄稼，使三千六百万农民陷于饥馑，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①人们听了这个宣布，都感到不寒而栗，因为1891年的灾难——这次事件加速了沙皇制度的衰落——一直还萦绕在人们的心头。1946年的危机泄露和恶化了整个农业结构摇摇欲坠的情况。集体农庄处于半解散状态中。^②农民们更加留意他们私人拥有的小块土地，而不关心他们公共拥有的土地。他们正是依靠高价出售小块土地上的产品，弥补从集体农庄得来的微薄收入。战争期间，农村居民拼命劳动来维持自身生活，供应军队，认购战时公债，并给他们在前线的父兄和丈夫寄食物小包。当战争结束时，只有极少数家庭看到自己家里的人转回乡村。农村损失了人力中最壮健和最能生产的一代同龄人；在战后年代，只好由老人、残废人、妇女和小孩来耕种。

苏联军事胜利最悲惨的方面是，在战争中它丧失了二千万人。斯大林小心地隐瞒了损失的程度，因为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只是七百万人。当然，每个家庭都知道它和它的邻居在这场大屠杀中遭到多大的损失。每一个农村都知道它悼念的死者有多少。斯大林的目的是不让全国再增加伤亡的数字。他唯恐这会影响到全国的民心士气，而且意识到这对他是一种危险，因为如果他让人民知道曾经流过多少血，人民就可能比以往更加坚

^① P·I·里亚什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第578—579页。

^② 《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1038—1044页。

持要问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而原因之中也就包括斯大林本人的错误和失算。他也不愿他战时的盟友而如今的潜在敌人知道苏联从这场浩劫中被削弱和消耗到何等程度——甚至他的继承者都犹豫了很多年才透露出这个数字，在过了差不多十五年以后，全国才在1959年举行了战后第一次人口普查。这次调查表明，战争结束时十八岁以上的同龄人，即在战争中拿起武器的那一代人，现在只有三千一百万男人和五千二百万女人。^①在活下来的人中有几百万是残废者和病弱者，当然还有几百万老人。整个一代人都毁灭了；它的阴影使苏联的和平为之黯然失色。

为了防止全国因痛定思痛而颓然倒下（这种危险是真正存在的），任何政策的首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鼓起劳动力的生产干劲。斯大林政府继续保持在战时抽调入工业中的几百万妇女和青少年，而且还进一步抽调了数百万人。一些西方的旅行者参观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城市，有时还错误地发出义愤，报道说，在战斗刚结束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老年妇女在从事艰苦的劳动，凭着赤手空拳去清除街道和广场上的废墟。事实上，在建筑业里，妇女提供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在更适合于她们的经济部门中，她们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在城市经济中，她们平均占百分之五十一，在农村里占百分之五十七。所有限制雇用青少年工人的法律规定都被抛到一

^① 《苏联1961年的统计数字》，第34—35页。人口中男女数字的不平衡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以及大清洗和大流放的年代使人力遭到损失而引起的。但是，在1941年前，这儿谈到的同龄人中的男女比例是9比10；到了1946年，它已经达到约6比10，虽然在战争和纳粹占领中也有很多妇女死亡了。

边去了。战争前夕实行的每周至少工作四十八小时的工作时间现在仍在实行，还加上严厉的工作纪律，工人们稍有违犯就可以送到集中营去。只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才使城市的就业工人在和平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增加了近一千二百万人，因而使1950年的工人和雇员人数比1940年时高八百万人。^①不准许任何人自由选择或改变工作，国家保留了指导劳动的无限权力。最后，斯大林还继续反对“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提倡斯达汉诺夫竞赛，实行不同的工资率和计件工资，以便保持或扩大收入的差异。

人民对于他严格要求的反应如何，这是很不容易说清楚的；这些要求中哪些是出于国家的需要，哪些只是出于他的专横，这也很难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人的性格中，英雄般的无畏精神是和被恐吓后的温顺共存的。莫斯科战役和列宁格勒被围的生还者，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的胜利者，在他们返回家园后，都同样感到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很艰巨，环境很困难。在最近的一些磨难中，很多人考虑到国家的悲惨情况，不得不在和平时期忍受贫困和压迫；但是也有很多人发誓不再屈从，要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使苏联成为一个更为愉快和自由的国家。现在他们发现还不容易甚至还不可能按照这个决心来行动。鉴于他们的城市已成废墟，乡村沦为平地，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贫困状况和比以往已经习惯了的更大的压迫，决心以艰苦的劳动来重建国家生存的基础。他们的确不是经常能够区别出斯大林的法令哪些是为了公共利益和哪些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专制。因此，最值得赞扬的、甚至是高贵的动机，就有时驱使一

^① 《苏联1961年的统计数字》，第310、313页。

些勇敢的人再次成为斯大林的屈从的仆人。这种屈从的天性和习惯是很强烈的，因为三十年代大恐怖在所有的人（除了很年轻的人以外）心里还有很深的印象。斯大林也尽一切可能地来使这些记忆保持下去。不论他在哪儿发现一点点对他的权威挑战的迹象，他就进行惩罚。在极北部和西伯利亚的集中营中又关满了人。这些新难友都是军官和士兵，他们曾经是战俘，在德国的战俘营中渡过了可怕的岁月。当他们刚一跨入自己国家的国界就遭到了审问，甚至不让他们回家看看，就被监禁和流放了。敌人曾动员了敌占区的很多平民到德国去作强迫劳工，他们所有的人都被认为是叛徒。这是因为斯大林不让士兵被敌人生俘，而这些士兵却没有服从他的这个命令；至于平民，则认为他们曾经同敌人合作过。实际上，斯大林的命令是行不通的，千百万士兵只好不去管它；而且他们在俘虏生活中所受到的折磨也足以补偿“违反纪律”的过失了。甚至从最玩世不恭的态度出发，斯大林对他们惩罚也是荒谬的，因为这进一步损害了国家的人力资源。不过，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前，斯大林就命令把被控为叛国的整个少数民族流放，如克里米亚地区的鞑靼人和印古什-车臣人，他们同在此以前的伏尔加地区的日耳曼人一样，都被强迫离开自己的家园，移居到西伯利亚的荒原上。赫鲁晓夫说过：“乌克兰人所以能够幸免，只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但是，他们之中许多同敌人合作过的、或者被怀疑是合作过的人，仍被处以长期的劳役。^①

斯大林把愤怒发泄到人民头上，不仅是为了惩罚那些违法者，而且是为了扑灭任何新的不服从的冲动。严厉的判刑和大

^① 斯大林死后出版的许多小说和戏剧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

规模的流放，目的就是为了让震慑住从战争中转回家园而怀着在国内进行改变和改革的大胆思想的那些人。斯大林再次“根据这样的原则行事，即光是打击他的真正反对者还不够；他还要根除产生反对者的环境”。但是，即使他的政治警察也经常无法控制波动和混乱，无法渗透进移动着的人流，即千百万转回老家或寻觅新家的撤退者和复员士兵。他们还经常无法压服由于绝望而引起的暴力行动。在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地区中，纳粹的宣传曾使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俄罗斯人是可恨的。在从波兰手里重新合并过来的西乌克兰，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武装匪徒出没在喀尔巴阡山的丛山峻岭中，阻碍苏联重新建立权威，并散布恐怖情绪。乌克兰的东部也扰攘不安。以前同敌人合作过的匪徒和强盗游荡在草原上；甚至那些已经定居下来的和平居民，也有反俄和反犹的情绪。莫斯科的过分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使边区各共和国中从来潜伏的地方沙文主义更加严重起来。斯大林为了阻挡地方沙文主义的发展，不只一次地降低了大俄罗斯宣传的调门，但为时又不能很久。他的这种自我矛盾的态度，是和他的官僚机构的分裂和一般人民之间的分裂相一致的。他一直想防止这种分裂的具体化，并尽其可能地把它弄得模糊起来。传统和革命之间的冲突在战后仍然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强化。在斯大林主义的铁板一块之中仍然并存着“两个党”——一个忠实于列宁主义的传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另一个忠实于大俄罗斯的骄傲与偏见，甚至忠于黑帮和大屠杀的传统。^①

知识分子最尖锐地感到了在意识形态上的不舒适。即使在

^① 参看第12章，第559—566页；E·叶夫图申科：《早熟者的自传》，第108—115页及其他各页。

一个铁板一块的集权制度之下，有创造性要求的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必然要崭露头角而同官方的国教发生冲突，都必然要表达（尽管是微弱的）国民思想和感情实际上的差异。因此，这几年来就充满了斯大林和知识分子之间悲剧性和悲喜剧性的拔河游戏。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力图同正统的观念保持一致，但他们却经常被斯大林主义中互相矛盾的因素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弄得不知所措。他们无法根据主子的神秘而无法理解的命令把这些矛盾的东西结合起来。一个著名的乌克兰诗人会突然被发现犯了鼓吹“地方沙文主义”的罪行；有权威的历史学家会由于低估了沙皇征服高加索和中亚的进步性质而遭到严厉批评；一个著名的讽刺作家会被指责为虚无主义；哲学家们被责以过分颂扬马克思主义的始祖德国的黑格尔；伟大的作曲家因为对斯大林所喜爱的民歌轻视和不敏感而遭到谴责；文学评论家则被责以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如此等等。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在民族主义和“无根的世界主义”夹缝中生存。斯大林指派了政治局成员、列宁格勒负责人安德烈·日丹诺夫去整顿理论家的队伍和惩罚迷失方向者。日丹诺夫对艺术和文学进行审查的短时期（他死于1948年夏），知识分子把它看成是不得不忍受的最坏的天罚而永志不忘。^①

但是，日丹诺夫的命令只是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最上层。下层的工人和农民是完全哑口无言的。如果不是战争在他们之中

① 日丹诺夫的运动从1946年夏开始，首先攻击列宁格勒的几家文学杂志，攻击左琴科、阿赫马托娃和其他作家，并由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严厉批评一些主要剧院的导演上演了“不适当的”戏剧。《真理报》，1946年8月21日；《布尔什维克》杂志，1946年第16期；《联共决议汇编》，第1028—1037页。

造成如此深的鸿沟，难道他们会是这样的吗？在三十年中，由于战争、内乱、清洗和饥荒，苏联人民一再丧失了最积极、聪明和无私的分子，丧失了可能努力捍卫革命传统以反对独裁专制的人们。现在工人阶级中的一半是中年和老年人，他们经历很多，遭到的磨难也很多，以致丧失了战斗性；另外一半是青少年，他们的经验和理解力都很差，不能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在战争中失去的一代不能再讲话了，这就象一个棺罩一样封住了整个阶级的觉悟。农民们甚至更消沉和沮丧。由于受到恐吓，也由于潜心于重建最基本的生活物质条件，广大的人民群众放弃了一切政治抱负，只顾自己个人的生活。年轻、成熟和精力充沛的一代人的丧失还产生了另一个后果，这是人们很少提到的一件事。由于失去了二千一百万男人，在人口平衡中产生了亏缺，对社会中一大部分人的家庭关系和性生活都发生了影响，这是人们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总之，这种国家生态平衡的被打乱，是心理上的不稳定和社会政治上的衰退的另一个原因。

这就是冷战头几个阶段中苏联的情况。1946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在他著名的富尔顿演说中对“共产主义第五纵队”“对于文明的日益增加的挑战和危险”提出警告，说这种危险会使人们“返回中世纪和石器时代”。他说，谁也不知道，“苏联和它的共产国际将来打算干什么，或者它们对外扩张和使人改宗的倾向有无止境”。当丘吉尔要求美国保持核武器的优势和支持东欧人民反抗共产主义时，立即引起全世界的恐惧和惊惶。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心目中出现了红色游牧部落突然袭击西

方自由人民的幻影。苏联的普通人民也感到“午夜以前就会有原子弹扔到他们的头上”。

斯大林由于力量十分软弱，就决定表现出镇定、自信和力量，以吓退对方。在英美的压力下，他已经从波斯北部撤出，这是他的军队根据同英国的战时协议而曾经加以占领的。他也没有在土耳其海峡获得一个海军基地，这是俄国的西方盟友经常在战争中允许给它、而在和平时期又拒绝给它的一个奖品。现在看来，它的盟友正在想方设法地削弱或者消灭苏联在巴尔干和东欧的势力。1946年夏，巴黎和会成了控制多瑙河盆地的一场政治战。斯大林在外交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而且获得了胜利，因为苏联军队实际上占领着这些地方，而西方的外交又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响应丘吉尔的好战叫嚣。9月间，丘吉尔公开号召组织一个颠倒过来的同盟，敦促“德意志民族”停止“互相厮杀”，并主张当法国和德国“奇怪而不稳地共居于美国原子弹的保护下”时，结成一种“伙伴关系”。甚至到了这个时候，斯大林还回答说，照他看来，苏联和前盟国之间“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为了驳斥丘吉尔关于“共产党扩张”的谈论，他向西方保证说，他，斯大林认为，在“一个国家内”不仅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甚至可能建立共产主义。^① 1947年初，他对是否结束东欧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还有点犹豫，他在那儿还容忍着政府里的非共产党人物，并允许资本家利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同西方国家达成关于同意大利的和约和同巴尔干国家的和约的协议之后，他幻想也能够同它们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列入了

^① 见斯大林答亚历山大·韦尔特问。（《斯大林文选》，第478页。）

1947年3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的议程中。

这次会议才开了两天，一记打击就使达成协议的希望破灭了。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向两院联席会议宣读了一个咨文，它后来就成为所谓杜鲁门主义的文本。这是美国进行冷战的正式宣言，而在此以前冷战一直时断时续和不加宣布地进行着。此时正当希腊发生危机之际。那儿的内战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由英国支持和资助的保皇派政府无力胜过在全国进行战斗的共产党游击队。英国的经济已陷入严重的危机，无力继续进行干预，并正在准备撤退；杜鲁门总统于是宣布，美国正在填补这个缺口，以保证希腊不会屈服于共产主义。如果光是这一点，美国的决定倒不会使斯大林十分不安，因为他在雅尔塔会议时就对希腊问题洗手不干了，他既不帮助也不鼓励希腊的起义者，甚至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帮助希腊还感到恼火。^①但是，杜鲁门总统还谈到反对苏联觊觎土耳其海峡的基地，并资助和武装土耳其人。而且，他还宣布，从此以后，他的政府将支持任何抵抗共产主义的国家，而且抵抗共产主义是“差不多每一个国家”的义务。因此，美国政府就承担了义务，干涉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共产党革命，并事先使苏联政府打上了这种革命的挑唆者的印记。

影响马上就显示出来了。外长会议在一片互相责难声中散了。在几个星期中，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被排挤出联合政府，它们本来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作为温顺的副手坐在政府里，而且热衷于抑制两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美国的影响在排除共产党方面起了积极和决定性的作用，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

^① 杰吉耶尔：《铁托讲话了》，第331页。

密了。不久，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提出了他的计划，向一切正在为克服战争所带来的贫穷和混乱而斗争的政府提供美国的经济援助。这个计划甚至也扩大到东欧的共产党政府。斯大林必定是犹豫了一阵，在6月底以前，他派莫洛托夫和一大批专家到巴黎去，摸清这个计划可能给苏联提供什么利益（如果有什么利益的话）。结果表明，苏联要得到帮助，首先就要起草一张经济资源的资产负债表；而且按照苏联专家的看法，美国附在援助上的条件，将妨碍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东欧政府的工业国有化。尤有甚者，美国现在已经决心恢复西德的经济，而不顾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向德国提出的赔偿要求。^①

斯大林不能不拒绝这些条件。他不能同意向西方提交苏联资源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其中必然要泄露苏联惊人的衰竭和他连自己的人民都要对之隐瞒的人力上的可怕缺口。他不仅想要掩饰苏联的弱点，而且还害怕美国的经济渗入东欧甚至苏联，可能激励当地的一切反共力量和加强反革命的活动。他决定不让西方渗入东欧。他的行动虽然是始终一贯的，但又很突然而笨拙。他简单地拒绝了美国的建议，而没有指出美国的条件是什么任何反资本主义政府所难以接受的。他急于要隐藏自己地位的软弱，就以一种进攻性的粗暴态度行事，因此使西方大多数人看来，他不仅是拒绝了援助，而且还把疲于战争的世界又赶到新战争的边缘，从而引起了公愤。

美国的巨大财富和苏联的捉襟见肘形成了鲜明对照，使

^① 参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我在莫斯科的三年》，第10章；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345—363页和以后各页；乔治·凯南：《俄国和西方》，第25章和以后各章；D·F·弗莱明：《冷战》，第1卷，第14—17章。

得那些年里笼罩了暗影，并使斯大林据此决定了自己的政策。美国政府用它的经济力量来支持反共运动，这远比它的军事干涉行动更重要。不过，杜鲁门主义也有其立即的军事后果。由于美国的核垄断，这个主义中所蕴含的战争威胁是无法预测的。如果这种威胁还没有成为事实，一部分原因是，要号召西方的人民来反对苏联并不容易。西方的人民还记得，就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政治家还在令人作呕地吹捧苏联盟友；而且他们自己对于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的保卫者的钦佩之情还没有消退，对于他们在东方牵制住希特勒部队从而解救了西方，也还怀着感激之心。因此还需要一些时间，搞一系列危机、警告和恐吓，使人们认为共产主义是扰乱世界和平的恶棍，才能转变西方人民的情绪，使他们转而反对苏联。这时，美国已经进行复员，它的人民强烈要求把部队从欧洲撤回，而它的将军和外交家们又指靠着核垄断，向他们保证在同苏联对峙中可以保持长久的优势。美国假定苏联在近期不能打破这种垄断，不得不向美国的压力让步，这也是杜鲁门主义的基础。斯大林则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地打破美国的垄断。但是在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之前，他把军队从一千一百五十万人缩减到不足三百万人。从1948年开始，他又扩大了军事编制，到五十年代早期达到了五百五十万人以上。^①这种动员对于苏联的经济和人力显然是一个可怕的负担。但是，苏联这种在常规武力上的优势，是斯大林应付美国核优势的唯一办法。他暗示苏联可能入侵西欧，作为一种反威胁，来挡住任何可能对苏联进行核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1960年，第8卷，第922页。这些数字是在斯大林死后七年才发表的，因此肯定不是为了宣传他才制造出来的。

攻击的威胁，而入侵欧洲是北大西洋联盟各国无法阻挡的。因此，西方唤出来为杜鲁门主义辩护的那个妖怪——红色游牧部落威胁欧洲——看来就有些现实性了；但这只是由于宣布了杜鲁门主义才引起的结果。斯大林无意使自己的军队越过已经达成协议的欧洲分界线。但是他建立起一种相对的力量均势，或者用后来变得很时髦的词来说，一种威慑的均势。在初期阶段，这种均势是由两种不同的军事力量因素达到的，即一方是核武器，另一方是常规武器。

在军事力量的保护下，斯大林加速了东欧的革命进程。如果美国的经济力量能够使华盛顿对它的西欧盟国实行间接而谨慎的政治控制，那末苏联只是依靠直接的政治控制和赤裸裸的暴力就达到自己的目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在东欧也引起了反响，这表明该地对于美国的渗透也是很有利的。波兰、匈牙利的残余分子，东德的资产阶级，以及大部分个体农民，都祈祷苏联和共产主义遭受原子毁灭。工人阶级正在陷入饥馑之中。反革命尚能集合起相当可观的力量。诚然，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还是很得人心的；但在东欧的其余部分，它是软弱的，至少是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站住脚的。斯大林这时决定一劳永逸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意大利和法国政府时，他也认为必须把反共分子排挤出东欧各国政府，并对他们进行镇压。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建立了一党制。他派出全权代表、行政专家、将军和警察代理人去指挥和监督当地的共产党和政府，并把单一的政策和单一的纪律强加给它们。

当从事于这一政治改组的时候，他决定复活他在1943年

解散的老的共产国际残余部分。1947年9月，他成立了所谓的共产党情报局，以便统一东欧共产党的行动，并使西欧共产党的政策作一新的转变。就象在共产国际时代一样，他自己仍然隐于幕后。他派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去指导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只有苏联、东欧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出席。斯大林并不怎么想把共产党情报局变成世界革命的真正工具，所以他没有要求中国和亚洲其他党参加这个新组织。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他主要关心调整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以适应他在外交上的新需要。在成立大会上，日丹诺夫严厉批评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行动因循，同本国资产阶级合作，对天主教和社会民主党表现温顺。在莫斯科看来，这些政策和态度在伟大同盟存在的时候是可以赞美的，但在冷战中就是有害的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南斯拉夫的卡德尔和吉拉斯（前译德热拉斯）最热诚地鼓吹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新路线。卡德尔告诫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说：“如果工人的党陷入议会主义，那就一切都完了。……我们已经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看到一种修正马列主义的新倾向，一种新的偏向……”卡德尔解释说，这种新的修正主义可以从陶里亚蒂和多列士希望争取一个和平议会行动的新时代以及他们对梵蒂冈和戴高乐的谄媚上看起来。他继续说：“意大利共产党理解美国政策的意义太慢。因而它提出这样的口号：‘既不要……华盛顿也不要莫斯科’。但事情很显然，没有莫斯科就不可能有自由和国家独立。”吉拉斯甚至说得更斩钉截铁：“问题的本质……是美国有统治世界的野心。这就构成……甚至比法西斯主义更大的威胁……法国共产党一步步向反动派退让，并容许抵抗运动被解散和被解除武装。”但是共

产党情报局并没有向它的西欧成员提供什么革命的计划；对于这一点，在它们 1944——1946 年失去了自己的机会后，现在毕竟是太迟了。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仅被期望去阻碍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执行，但是即使这一点，它们做起来也是软弱无力和前后不一致的。^①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东欧各国实行了戒严状态。通过诸如苏匈、苏罗和苏保联合股份公司等特殊机构，他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向苏联运去煤、机器、铝土矿、石油和小麦，或者是作为赔偿、或者作价很低，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却遭到匮乏和贫穷。由于各反对党已经一个接一个地遭到镇压，人民的不满就找不到人来代言。恐怖统治窒息了任何抗议的呼声和怨言。苏联的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监督着东欧的工业，苏联的将军指挥着它们的某些军队，苏联的警察管理着它们的保安部队。

1948 年初，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没有遵循这个新模式的国家。从 1945 年以来，莫斯科就坚持不让捷克共产党采取革命行动。不过，捷克斯洛伐克结束战争之后的确是处于革命形势之下，它的工人阶级已经武装并强烈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它的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得到近百分之四十的票。捷克人亲苏的情绪是真诚的，它根源于民族传统，而且从慕尼黑危机以后，由于对西方的嫌恶，这种情绪就更强烈了。

^① 见欧金尼奥·里尔：《雅克·杜克罗在被告席上》，这是一个意大利参加者对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的叙述。里尔从当场的记录中概括了卡德尔和吉拉斯的讲话（该书第 129—150 页）。他的说法为南斯拉夫方面的材料所证实。见杰吉耶尔前引书，第 302—306 页，以及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100—101 页。

但是，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它的政府虽然由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任总理，国家却仍旧生活在资产阶级民主之中。爱德华·贝奈斯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扬·马沙里克是外交部长；政府依赖共产党人、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议会投票。在冷战的狂风暴雨中，这个政权已经不能再生存下去了。贝奈斯和马沙里克努力想维持中立态度，但他们本质上是“西方的人”，并已经表明他们（甚至还有哥特瓦尔德）热衷于接受美国提供的援助。

这儿明显地存在着斯大林防御的一个缺口，捷克共产党人必须去补上它。在1948年2月的最后一周，他们实行了拖延已久的革命，并取得了政权。不象别的东欧国家的社会大变动那样，这次革命带有自下而上革命的标记，虽然它发动的时机是适应斯大林的方便的。共产党人依靠大多数工人的支持，独力完成了这一革命；他们只是用武装的民兵在街上游行，就阻止了任何的反行动。苏联的占领部队早已撤出了这个国家；仅仅由于害怕他们返回来，就足以使资产阶级政党气馁了。哥特瓦尔德甚至还遵守议会游戏的规则：那些本来希望阻碍或防止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部长，突然辞去自己的职务，并离开了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机器；然后哥特瓦尔德和他的同志们设法引诱那些犹豫不决和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使他们同自己组成了议会的多数。贝奈斯和马沙里克看到群众对于革命的支持，弄得惊惶失措和意气沮丧——布拉格街头充满正向政府所在地进军的武装工人——屈从于胜利者。但是，几天之后，发现马沙里克死于外交部窗下的走道上；而且从未弄清是他自己跳窗还是被人推下。

这一大变动刚一完成，斯大林就开始处理他防御中另一个更为危险的缺口。在大国的冲突中，没有一个地方比德国的冲突更激烈；而在德国的冲突中，又没有一个地方比柏林的冲突更加尖锐而集中。在那儿，美国的富裕和苏联的贫困形成鲜明对照，使人人都为之注目。当美国和英国已经给西德倾注经济援助时，苏联却仍然为了自己重建的需要而从东德吸取资源。对于反苏的宣传家们来说，把这种战争后果、这种长期而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说成是敌对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考验，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他们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繁荣和自由，而苏联共产主义只能靠掠夺和奴役来生活。看来没有人比德国人更愿意相信这种粗劣的宣传了，因为他们对于必须付出的赔偿和遭受苏联的羞辱忿忿不平，现在急于投身西方阵营而逃避战败的最坏后果。斯大林也急于制止苏联经济衰弱和不得人心同美国富足和具有吸引力这种长期的对比，已经在横过德国的地方拉起了“铁幕”。但是在铁幕后面一百二十五英里处的帝国旧都，这种对比却继续存在，并且愈明显，日愈厉害和日愈具有爆炸性。斯大林和苏联大多数人民看到苏联在这座城市中的力量和威望不断降低和遭到奚落，必定是很恼火的，因为这座城市是他们独力占领的，而且在盟国考虑共管德国的那些遥远的日子里，他们就已允许西方盟国进入这座城市。

现在共管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斯大林拒绝西方国家对东德的事务有任何发言权，正如西方国家不让他参与管制西德。美国、英国和法国已经组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由阿登纳的保守的和公开反苏的政府管理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先关于西方对柏林派出代表和卫戍部队的目的就失去了意义；西方

国家现在把柏林当作在敌国领土内的一块飞地——斯大林的继承者甚至在十年以后对这一问题也还是全神贯注的。1948年春，这一问题终于爆发了。西方国家急于加快它们占领部分的经济恢复工作，提出要进行货币改革，用一种新的马克来代替已经贬值的旧马克。这一改革使德国的分裂永久化，并立即形成了柏林的货币问题。苏联不能允许这个城市在金融上同西德合并起来，而西方国家也不能容许它在金融上被东德所同化。如果两种货币同时在柏林流通，势必要引起长期的冲突，因为西方不断增加的货物必定保证了新马克的稳定，而东德货币的价值就要由于货物的继续稀缺而受到损害。为了防止这一点，斯大林冒险采取了一种绝望的赌博。他命令封锁美国、英国和法国在柏林的占领区。通向西柏林的所有交通要道，不论陆路还是水路，很快就陷于停顿状态了。

通过这次封锁，斯大林希望或者把西方国家赶出柏林，至少也要劝使它们放弃利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盟友来反对苏联的计划。但是，封锁并没有达到第一个目的，其结果只是使西方国家加速同前敌国联盟的过程。在这场赌博中，斯大林再一次依靠虚声恫吓。由于失算，他输了，这反映了他的奇怪的老式思想方法。他威胁着要使柏林的工业瘫痪，要以饥饿迫使它的驻军和人民屈服。美国则威胁要以装甲列车开路，但他没有被恐吓住。他也不顾美国将军们要向莫斯科投掷原子弹的大声恫吓。他建议向柏林居民供应食品以争取人心；同时他又挑拨英美拒绝这个建议。他准备一直封锁下去，以削弱一切抵抗。他坚信时间是对他有利的，封锁是严密的，他的对手无法打破它，因为通向这座城市的一切道路他都掌握着。他忽略的地方是，

根据盟国内部的协议，西方国家尚掌握着一条狭长的“空中走廊”，从它们德国的各占领区通向柏林。利用这条走廊，它们就能供应柏林的驻军和居民，甚至还可以供应它的工业需要。他没有考虑到西方的空中力量和英美的能力。英美不象苏联，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是长期从事空中战斗的。

1948年6月28日，美英开始了对柏林的“空运”。这个行动大出斯大林的意料，他也还不敢拒绝他的对手们使用空中走廊，于是他亲自同西方驻莫斯科的大使们进行商谈。后来他又破裂了这些谈判，深信由于冬季的开始，这个城市将要受他的支配。但是，西方的空运不断扩大，在那几个关键的月份里源源不断地供应了食物、燃料和原料。封锁失败了。从开始至今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最后由于联合国谨慎的谈判而达成协议，结束了这一封锁，恢复了柏林的现状。

但是，封锁的广泛影响却是消除不了的。国际舞台的现状已经不能恢复了。当柏林被封锁的时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事实上已经存在，北大西洋联盟已经宣布成立。封锁给反苏宣传提供了材料。美英人民为斯大林的行动所激怒，热烈赞扬他们的政府使联盟逆转，而这一想法是他们直到最近还不愿听到的。因此，对于杜鲁门主义所要事前防止的危险和威胁，斯大林的封锁似乎是在提供事后的证明，而且它还加剧了冷战的气氛。

正当西方资本主义从斯大林的倒霉中得到力量和信心的时候，共产主义却在东方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毛泽东的军队于1949年1月22日进入了北京。欧洲人和美国人几乎没有注意

这一事件，因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充满了德国空运的火光和吼声。在转变命运的斗争中，毛泽东的游击队同蒋介石的军队战斗了数十年，而蒋介石的军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装备了美国的武器，有时还得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持。游击队有时似乎处于屈服的危险中，却终于挺了过来，并继续战斗。但是，在中国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考虑到他们的全面胜利已经迫近。迟至1948年，斯大林还如同二十多年前向陈独秀建议的那样，也建议毛泽东同国民党讲和；而当他得知毛泽东全面发动攻势的计划时，他却把这个计划斥为不现实和鲁莽灭裂。这位世界上最大军队的胜利的大元帅是看不起游击队的，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机会深表怀疑，而且对于没有他的批准和超出他军事力量范围以外的自作主张的革命，都是不信任的。^①他还害怕毛的冒险可能引起美国的大规模干涉，从而使美国的军队接近苏联的远东边界。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深入地展开攻势，直到内部已经腐朽的国民党垮台。4月间，西方国家刚刚宣布成立北大西洋联盟时，毛的军队已经在南京和上海举行胜利的阅兵；而在夏季还没有过完之前，整个中国大陆都是他们的了。9月24日，毛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共产主义和全世界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苏联长期的孤立终于结束；同许多人的预料相反，十月革命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亚洲找到了它迟延很久的结果和继续。

我们将在以后看到这一事件如何影响了斯大林主义的命运。它眼前的影响则是增强了斯大林对付西方国家的力量，西方

^① 参看杰吉耶尔前引书，第331页和吉拉斯前引书，第141—142页。他们都引用了斯大林向卡德尔谈到的他“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

国家突然发现自己在亚洲被从侧翼包围了，那儿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正发出怒吼和进行反叛。斯大林在欧洲遭到挫败，却能在东方玩弄实力。而且由于一种奇怪的巧合，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周里，世界还听到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

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孤立的产物和集中的体现，现在由于革命的传播，就摧毁了它赖以繁荣的某些环境。新的革命国家的巩固，势必要损害斯大林（实际上是莫斯科）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独一无二权威。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权威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强迫的双重基础上的，依赖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自愿地把苏联看成“工人的第一个国家”而同它密切地结合起来，并把自己的愿望从属于斯大林的存在；也依赖于斯大林用来消灭其批评者和反对者的那种压力和强制。这种双重的基础现在被粉碎了。外国共产党人已由受迫害的鼓动者一变而为各国的统治者，他们看来不会象过去那样长久地被莫斯科的圣言吓唬住，也不那么容易被欺侮了。他们不再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去牺牲自己的愿望和雄心，以满足苏联真实的或装出来的需要。他们已经不断地提出自己的雄心大志和需要以及他们革命国家的利益。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制造出“多中心的共产主义”这一词以前很久，“多中心的共产主义”时代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了。

斯大林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是为了重新集中和重新训练各国共产党，但情报局刚一成立，斯大林的权威就受到这个新组织中的南斯拉夫成员的挑战。我们已经看到，南斯拉夫代表在成立大会上如何热心地帮忙，他们支持了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政策的最新转变。这就勿怪铁托和他的同志们直到1948年以前还被认

为是所有欧洲斯大林主义者中最教条和最狂热的分子。这种名声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他们过去的记录而来的。在大清洗的年代，铁托呆在莫斯科，他并不是平白无故地被提升为党的领导，当时党的前领导人已经在清洗中被消灭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铁托以其正统的观念和偏执劲头成为模范，赢得了莫斯科的信任。在西班牙内战中，格柏乌消灭了许多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战士，铁托在其中的行为并不比斯大林的任何傀儡为好。但是，铁托在本国的革命武装斗争中已经从一个傀儡转变成为一个人和领袖。斯大林意识到这一变化，并且愈感到怀疑。他要求南斯拉夫人进行“爱国主义的和反法西斯的”战争，不要搞社会革命，但他们却不服从他的命令。他谴责他们危害苏联同美英的联盟，并“在苏联背上插了一刀”，战争结束以后，这种不和更有所发展。南斯拉夫人是极端激进和具有很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他们努力要从英美的手中和在意大利的反对下把的里雅斯特合并过去。斯大林唯恐这会加剧他同西方国家的冲突，制止了南斯拉夫人。于是他们就反对他的“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他们对斯大林的特使和将军们的傲慢态度感到不满；他们抗议苏军在南斯拉夫的不规矩行为；当他们发现斯大林的间谍机关在南斯拉夫军队和警察中征募间谍时不禁勃然大怒。斯大林为如此大胆的反抗所激怒，决心象整治所有共产党反对派一样地整治他们一下：他把他们称为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叛徒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把铁托主义斥为一种异端。他吹嘘说：“只要我动一下小拇指，铁托就要完蛋。”南斯拉夫人仍然矢忠于斯大林，在会议上和各种场合悬挂他的画像。但是，他们抗议对他们的谴责，并积极捍卫自己。斯大

林于是采取了经济和军事封锁手段，其野蛮程度同封锁柏林一样，但也同样归于无效。^①

在斯大林的一生中，这还是他头一次感到对一个共产党反对派无能为力。远比铁托地位高的异端派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失败的事情，铁托却干成功了。他自己的国家、军队和警察保护他免遭斯大林的打击；而他由于蔑视莫斯科而激起的民族热情和忠诚，甚至更加使他安然无恙。他的行动使斯大林的权威和声望遭到了无可弥补的损害。许多东欧的共产党人发现铁托的行为是值得学习的。他们对于斯大林的不满甚至比铁托对斯大林的不满还要厉害，而且他们也久久向往能够坚持自己的民族尊严，以便使自己的人民不再把他们看成是苏联的傀儡。即使在斯大林自己的随从中，也不乏对南斯拉夫抗上而表示同情的人。

斯大林害怕“铁托主义”的传播，就采取过去在反对异端中屡试不爽的血腥办法来进行反击。他宣称，共产党人如果对铁托主义表示同情和同贝尔格莱德保持联系，就算是叛变。当莫斯科从南斯拉夫撤出一切顾问和特使时，东欧各国政府也随之效尤。斯大林还动员它们在南斯拉夫边界进行威胁性的军事演习。但是，要镇压对铁托主义的同情也是不容易的，因为铁托主义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或纲领，而是勇敢者和战士的一种基本的冲动，他们坚持自己民族的和共产党的自尊，以反对某一大国和某一主子过分利用他们的忠诚和粗暴地侮辱他们。这种冲动在一些有国际主义思想的党员和“民族共产党

^① 参看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8年）；《南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之间的通信》，1948年贝尔格莱德出版；吉拉斯前引书，第98—144页。

人”中都存在着。斯大林的特务们密切地监视着他们，并小心地注意着他们之中可能表现出的倾向“铁托主义”的每一迹象。

这种倾向的标志就是共产党人喜好谈论“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合法性。斯大林自己也在战后的头几年里谈论过这一题目，那时他还在努力剪除反对苏联霸权的东欧各种民族主义反对派。南斯拉夫人现在就利用这个口号来反对他。在东欧国家的每一个首都都有一些斯大林主义统治集团的著名人物，如哥穆尔卡、克里门蒂斯、拉伊克、科斯托夫等等，他们以其表面价值接受了这一口号。共产党情报局所采取的新方针并不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曾经奉行“右翼的”、“温和的”和民族主义的政策，而这是头几年中斯大林鼓励他们这样做的。甚至在斯大林已经改变了这一路线之后，他们仍然坚持那些政策。这就是他们毁灭的原因所在。他们被控同铁托主义勾结，因此被称为破坏者和间谍而投入监狱，受到威逼和酷刑，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就象在莫斯科大审讯中的被告承认自己的罪行一样。经过十多年以后，1936——1938年那种可怕景象又在东欧的差不多每一个首都重现了。1949年9月，拉伊克和一些匈牙利的领导人被审讯和处决了；12月，科斯托夫和一些著名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随后的三年里，乌烟瘴气的公开审讯和大规模恐怖，在整个东欧盛行一时。唯一的例外是，象哥穆尔卡这样的异端分子终于活了下来，在斯大林死后胜利地复出。这一清洗在苏联也有其原因不明的衍生物：政治局成员、国家经济计划的负责人、战时曾统率国家经济资源的沃兹涅辛斯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1941——1943年保卫列宁格勒的组织者库兹

涅佐夫和波普科夫，以及所谓列宁格勒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成了牺牲品。在这一事件差不多二十年以后，人们还不知道斯大林为什么要怀疑这样一些人。是不是他们反对他的什么政策，或者是不是他们卷入了斯大林随从中杀气腾腾的争权斗争（例如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之间的斗争）。他们的审讯和处决是极端秘密的。在这几年里，斯大林已不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再搞那种公开认罪の审讯，而在布达佩斯和索非亚却正在上演这种表演性的审讯。^①

当斯大林正在如此凶猛地抨击铁托主义时，一个更为有力而危险的异端在北京抬起了头。中国共产党人以不顾斯大林的阻碍夺取政权而自傲。作为中国独立的建设者、作为包括人类很大一部分和肯定要对未来多少世代和世纪发生影响的革命的发动者，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尊敬毛泽东，把他看成是一位出众的革命战略革新者、一位天才的领袖和理论家。虽然在总的方面他们过分宣扬了毛对理论的贡献，但他的确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以来的最伟大和最有创造性的革命实践家。他肯定是比斯大林更富于性格和有更大勇气与干劲的人。但斯大林却傲慢地对待他，从来没有对他的功绩赞一言，而且还不信任地看着他的非正统行为。早在1927——1928年，当毛第一次把其活动中心从城市转入农村时，斯大林把持的共产国际就曾否认他这一行动的合法性，并批准把他从中共中央委员会中

① 《拉兹洛·拉伊克及其同党在人民法庭上》，布达佩斯1949年版；《特莱科·科斯托夫及其集团的审讯》，索非亚1949年版。对哥穆尔卡案的不完整叙述，可看《新路》，1956年10月号，它包括哥穆尔卡复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反铁托运动在东德的反应，在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的《革命之子》中有所论述，见该书第386—394页及以后各页。

降职。甚至在他复职以后，在他已经巩固了他的红军和延安政府以后，莫斯科对他仍持令人困窘的保留态度。他争论说，中国的革命不同于俄国的革命，它必须以农村作为主要的根据地，而且必须从农村到城市而不是从城市到农村。这真是异端邪说。为了避免同莫斯科公开破裂，毛披上了斯大林主义正统的保护色。斯大林也曾意识到毛这一手法的复杂性。在其利益攸关的国际政治领域中，他本来是不会容忍任何共产党有这类事情发生的。但是差不多直到1949年，中国在斯大林的心目中还居于次要地位；而且毛的行为在他看来似乎是堂吉诃德式的——外表上又是那样顺驯——所以还没有要求把他革除教门。^①

即使如此，中国的游击队在其长期的艰苦考验中却从来没有得到苏联的任何帮助。他们对此深表不满，但却微笑着把自己的失望隐藏起来。战争开始以来，斯大林的行为引起他们新的和更为严重的忿恨。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占领了满洲，仿佛它是被征服的敌国领土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人们还记得，日本把中国的广大地区分离出去，并把它置于其傀儡满洲王朝的统治之下。斯大林曾于1935年把苏联承让下来的中东铁路卖给了这个王朝，希望以此取悦于日本。后来到了1945年，他又收复了这条铁路，而没有允许中国得到它。此外，他还延长了对满洲两个大海港旅顺和大连的控制。所有这些都伤害了中国人。后来他们又愤慨地看到，苏联视满洲工业为战利品，把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77—388页和《大河彼岸》，第201、646—672页；艾萨克·多伊彻：《毛主义的根源和观点》，载《历史的嘲弄》（1966年）。

许多工厂拆卸后运往苏联。日本人曾蓄意地剥夺中国本部的工业，但为了自己的便利也曾促进满洲重工业的发展，因而中国人把满洲视为全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地。毛的政府不得不把苏联行动所引起的义愤多少传达给莫斯科；它急于收复苏联已经占用的设施和机器。

这就是严重不和的起因，也是十年以后斯大林继承者伤脑筋的冲突的先兆。任何轻率的表示和行动都会立即引起爆炸。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十分小心而冷静地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宣布成立，他就邀请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1949年12月，他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地接见了毛，表示了十分的友好和尊重。这些日子正是大肆追捕铁托分子和列宁格勒集团之时，沃兹涅辛斯基仅仅在几个月前失宠，而科斯托夫的审讯刚刚在索非亚开始。但是在他这种迫害狂的气氛中，对于共产主义世界中一个真正伟大和危险的异端，斯大林却毫不费力地装出是一个和蔼的主人和明智而有帮助的老同志。他已经从对铁托的错误中领受了教训。他知道他不能对毛动一动“小姆指”，更不用说大姆指了。他表现得是那样的亲切和愉快。

但情况还是很微妙的，斯大林不得不侦察一下，而且他还不大愿意放弃自己在满洲的战利品。他拖住毛泽东作长时间的不慌不忙的解释，慢慢地进行讨价还价。他还经常用国宴和私人谈话来打断这些谈判，以表示两个革命领袖之间的互相信任。但是在私人接触之间，这两个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性格和地位上的悬殊差别。斯大林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国际政治家”，一个胸前挂满了勋章的大元帅，一个巨大官僚统治集团的首脑，就象过去的任何沙皇一样同人民远离开来。毛泽东仍然保

持着他二十年来在山沟和窑洞中指挥当代历史中最长内战的那种神态——他那几年中一直生活在贫苦农民中，同他的游击队一起战斗和进军，不允许在伙食和衣着上有区别、在官兵关系上有任何疏远。如果说斯大林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加上了很多沙皇制度和东正教的东西，那末毛泽东则是通过东方的扎克雷起义^①和孔夫子的文化遗产折射出列宁主义。两个人都十分工于心计，但毛泽东由于在性格上比斯大林更人道和在思想上更有教养，因而在这方面有所节制。对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而对斯大林来说，这个革命却是他的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虽然也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在冷战的高潮时，他突然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从此以后，中国将保护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使他能够在欧洲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新统治者虽然可能有一天要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暂时之间还要依靠斯大林，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得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

斯大林和毛泽东费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才敲定了他们的买卖，并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一个正式盟约。斯大林着手归还他的“战利品”，并“不迟于1952年底”交还中东铁路。他还让出了旅顺口，这是他同罗斯福通过秘密协议获得的，他曾以此作为对俄国1905年败于日本的报复和一种历史正义行动而加以欢呼。^②他仍然继续控制着有战略重要性的大连港和满洲的交通线。但是他答应慷慨地给中国经济发展以援助。他就是这样防止了他同毛泽东之间的敌对以及两党和两国政府之

^① 1358年法国北部反封建贵族的农民起义。——译者

^② 参看第13章第606—608页。

间的冲突。

仅仅四个月以后，朝鲜战争就开始了。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必定在莫斯科策划了它。一些时间以来，北方共产党的部队同南方反共的部队之间沿三八线发生了一些冲突和摩擦（三八线从日本投降后就把这个国家分成了两个部分）。1950年6月，共产党政府的首脑金日成指控南方的李承晚政府进行侵略，于是命令发动一场越过三八线的总攻。北方的军队迅速地获得初期的胜利，这表明这次打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其准备之好，似乎有理由相信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事先的确商量过，甚至就是他们下的进军命令。毛泽东赞成这种冒险是并不出乎意料之外的。对他来说，由共产党控制全朝鲜，似乎就是中国革命的自然结果。如果这一目的成功了，就会使任何敌对力量不能象过去那样在未来使用朝鲜作为入侵中国的基地。斯大林的动机则不那么清楚。他是急于避免同西方发生武装冲突的，而且他在朝鲜的战略利益是很小的。（朝鲜同苏联只有十英里的边界接壤，而同中国却有五百英里。）他的行动很可能是着眼于他同毛泽东潜在的竞争。他在不久以前如此丢脸地对中国革命的机会判断错误，所以很想把他在政治上胆怯的印象消灭掉，以证明他自己同毛泽东一样是大胆的革命战略家。

风险似乎是无足轻重的。苏联占领军撤出北朝鲜已经近两年；到1948年底，美军也从南方撤退了。而且，美国人曾宣称，他们在朝鲜并无重大利益要去保卫，甚至还暗示，他们认为这

个国家是“可以牺牲的”。因此，斯大林有理由认为，金日成是在发动一场局部战争，不会转变成为一场重大的国际冲突。当美国决定进行干预并号召联合国也这样做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错了。当美国把这一争端提交安理会时，斯大林更铸成了另一个大错。安理会中的苏联代表是经常使用否决权的，甚至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是很容易利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的行动的。但是这次苏联代表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在关键性的会议上示威性地退出了安理会。美国和它的盟国于是就利用苏联代表缺席的机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使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派部队到朝鲜去同共产党交战。局部战争于是变成了一场国际性的大灾难。在三年的过程中，它一直威胁着要变成美中之间的一场正规战争，甚至要变成一场世界大战。由于错误地造成了这样的形势，斯大林只得采取了预防措施：他虽然武装了北朝鲜和同美军在三八线对抗的中国“志愿军”，但却不允许苏联军队卷入，而且还使谈判的门一直开着。

朝鲜战争和它的危险性笼罩着斯大林统治的最后三年。他的地位仍然是很软弱的。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到一年，苏联才爆炸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而美国却已经积累了五年多的核武器了。美国在远东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吵吵嚷嚷地要轰炸满洲；根据新近缔结的同盟条约，这将使苏联有义务出来援助中国。斯大林现在已经不能象几年前那样指望美国人民的和平主义和对苏联的同情来防止战争的蔓延，因为当时美国人民

的情绪已经变得十分敌对。^①而且即使美国因为卷入朝鲜战争而妨碍了它在欧洲的自由行动，斯大林仍不得不保持常规武力的动员，促进核工业的异常发展，使苏联的经济立足于临战的水平，并加强在苏联和东欧的戒严状态。他达到了他的某些重要目标。他坚定地抵抗住西方的压力，使美国不敢扩大战争；苏联的核工业飞跃地进展，在1953年生产了第一颗氢弹，只比美国晚了一点点。苏联经济的基本部类在1948—1949年已经达到战前水平，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中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苏联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已经加速。光是五十年代早期，城市人口就增加了约二千五百万。中学和大学在校学生比1940年增加了一倍。苏联已经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重建起工业和军事优势的基础，不久就将震惊全世界。

但是，苏联人民生活的悲惨情况几乎仍同三十年代原始积累时期那样地令人惊心，甚至比那时更加难以忍受。广大人民靠洋白菜和土豆生活，穿得破破烂烂，住在肮脏的茅棚里。苏联最先进的机床厂，与美国同类工厂一样地有效率；但它一般欠发达的消费工业却比美国的至少落后一个世纪。苏联公民消费的货物，只及美国的不到三分之一、甚至不到四分之一。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住房问题简直无法解决。在一些首府所在的城市，通常是几家人合住一间房和合用一个厨房。政府对于人民的困境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因为重建被破坏城市的工作进行得太慢；在一片废墟和贫民窟的背景前，斯大林又

^① 最能说明这种变化的是，美国一家通俗的杂志《柯里尔》出版了一期专辑，登载一篇关于美国在战争中打败苏联的幻想小说，描述莫斯科在美国占领下的情况，作者是阿瑟·凯斯特勒。

命令建筑了一些富丽堂皇的政府大厦和纪念物，它们装饰的不雅是无与伦比的，成为官场虚夸和粗俗的象征。

最坏的还是农业情况。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四年中，平均每年谷物的收获量仅为八千万吨，而1940年是九千五百万吨，1913年是八千六百万吨。牲畜也低于1913年。政府虽然没收或以半价购买了近一半的谷物产量，但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仍然处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城市居民每周只消费不到半磅肉和四分之一磅油脂。农庄缺乏人力、拖拉机、农机具、运输工具和肥料。集体农庄仍然是一种经济混合体，一半集体，一半私营；除了公共拥有的土地外，农民还有一些小块的土地，他们辛勤地耕作这些个人的土地，而忽视集体所有的土地。政府使用严密管辖的办法来保证粮食的供应：它规定农民在每一块土地上种什么和应该收获多少。大批的监工把本属简单而例行的农事活动（如耕、种和收获），变成了一场紧张的“粮食战线上的战斗”。

最后，在1950年，苏联的农村再次处于大变动的痛苦中，这可以称之为补充的集体化运动。大约有二十四万个集体农庄（每个农庄平均占地一千公顷），被合并为十二万个，最后又合并为九万三千个大型单位。农民们对这次合并十分冷淡，而没有象集体化初期那样作拚死的反抗。但是，农业情况依然未变，于是对下一步如何办的争论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尼·谢·赫鲁晓夫建议，把农庄改组为谷物工厂，农民重新安置在“农村城镇”中。斯大林否定了这个意见。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中，他担心这样剧烈的变化会使国家暴露于敌人之前。

由于内部有这样多的弱点和混乱，外部又有这样多的灾难，斯大林使苏联比以往更加孤立于世界之外。他发布命令说，苏

联人同外国人结婚就是犯罪，任何官员透露苏联生活任何方面的琐碎材料就是叛国，任何外国人对这些材料表现好奇就是间谍行为。从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执行占领任务后归国的士兵，都不得谈论他们的经历。报纸把西方（包括美国）的情况说得一团漆黑，以便使苏联人民对他们可怜的生活还存一点乐观的希望。所有苏联开向世界的窗子和门户都关死了，在它们的后面继续进行着毫无节制的自我吹嘘。沙皇俄国的伟大，甚至吹得比战争期间还要更加刺耳。历史学家吹捧帝国征服的每一功绩，把每一个伤害俄国属国的暴力行为都说成是解放和进步行动，被压迫民族要对俄国感恩戴德。他们欢呼叶卡德琳娜大帝和尼古拉一世，把他们说成是高加索和中亚民族的恩主和保护人；而那些抵抗沙皇和为独立进行斗争的民族领袖，却被描述为反动派和英国、土耳其的走狗。学生们被灌输这样的观点：历史就是一系列可恶的外国阴谋，而总是由于他们祖先的警惕和英勇而被挫败。没有一个人怀疑俄国（而且只有俄国）是社会中坚、文明摇篮、人类精神中一切伟大和高贵的东西的来源。俄国人成为了现代技术中一切成就的拓荒者、发现者和发明者，只是由于世界的无知和邪恶，才把这些成就归诸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报纸的篇幅中每天都充满了奇迹般的故事，说波波夫们或伊凡诺夫们曾经第一个发明了印刷机、蒸气机、飞机和无线电。这种自我吹嘘只缺一点就圆满了，就是《真理报》应该宣布，制造了第一个轮子的史前时期人类曾居住在莫斯科河畔，或者干脆说普罗美修斯^①是一个伟大的俄

^① 希腊神话中的神，曾从天庭把火种偷给人间，因而受到宙斯的惩罚。有些神话还把他说成是带给人类艺术和科学之神。——译者

罗斯人，因为除了伟大的俄罗斯人以外谁还能做出这种英雄业绩来呢？

下面可以援引本书作者论及“本世纪中的俄国”的一段话：

俄罗斯被教导去怀疑和轻视外部世界，只颂扬自己的天才，只关心自己的伟大，只依赖自己的私利，只期待自己力量的胜利。斯大林主义企图把其他民族创造的一切功绩都归诸伟大的俄罗斯。它宣称，俄国人如果认为其他民族过去和现在也有伟大之处，这就是一种犯罪（即“拜倒于西方文明脚下”），但如果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乌兹别克人不拜到在大俄罗斯脚下，那也是一种罪行。^①

自大和仇外是医治有自卑感民族的药物，使他们免于为西方文明（过去多少代的知识分子曾为之着迷）所吸引，使他们不致被美国的财富弄得灰心丧气，使他们坚强信心来接受冷战（如果需要的话，就是武装冲突）的考验。沙文主义鼓动的热度就可以测量出这个国家战争狂热的程度。

由于如此赤裸裸地鼓吹民族自大，那就勿怪半藏着的反犹偏见也盛极一时了。尽管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其最好的年代里曾反对过这种偏见，但对犹太人的敌意几乎仍没有减退。反犹主义有许多根源：东正教和屠杀犹太人的民族传统；人民在战时同纳粹主义的接触；犹太商人和工匠不适应公有化的经济，在

^① 艾·多依彻：《过渡时期的俄国》，第83—100页。

消费短缺的情况下，他们违法的和半违法的商业活动十分兴旺；早期布尔什维克领袖人物中有不少是犹太人；即使在这些领袖人物被消灭以后，犹太人在斯大林官僚机构的中层中仍有相对的重要性。头脑简单的共产党员经常把犹太人看成是城市资本主义的残余分子；而反共的人又把犹太人看成是统治集团中有影响的成员。

斯大林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从个人来说，他是没有受到粗俗的民族偏见影响的，他唯恐触犯党敌视反犹的准则。在他的随从中，犹太人是颇有名望的，虽然比起列宁时代要差一些。李维诺夫担任苏联外交部负责人达十年之久；卡冈诺维奇直到最后都是斯大林的家庭总管；麦赫里斯是部队的总政治委员；萨斯拉夫斯基和爱伦堡则是最出名的斯大林的谄媚者。但是，当他认为方便的时候，他也不反对玩弄反犹的情绪。在同党内反对派进行的斗争中，他的代理人经常提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的犹太出身——在1936—1938年的审讯中，维辛斯基就一再地提到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是缺乏俄罗斯民族感情的可怜虫。后来在战争期中，希特勒的宣传大骂这场“犹太人进行的战争”，说犹太籍的人民委员就靠这场战争自肥，并号召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起来反对他们。斯大林的宣传机构对此感到很尴尬，只好默不作声。斯大林禁止他们作可以暴露希特勒反犹主义极不人道性质的反击，他担心这种反击可能使人民大众想到纳粹的宣传还有些道理，并使他看起来起一种保护犹太人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他当时所不愿起的。他也害怕人民反犹的要求，占领区中反犹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积极响应纳粹的主张，更使他相信这种害怕是有理由的。

但是，当希特勒的军队向前推进时，苏联政府曾尽力从受威胁的地区中撤退犹太人，即使某些城市（如塔干罗格就是最出名的）的犹太人不相信关于在纳粹占领下他们将会遭遇什么的警告，拒绝迁移。在斯大林的批准下，一个由知名人士为首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组成了，它号召西方的犹太人支持苏联。（但是，这个委员会一开始工作就没有好兆头，早在1942年，它的两个成员亨利克·埃尔利希和维克托·阿尔特就被当作“纳粹间谍”逮捕和处决了，他们是波兰犹太崩德的领袖，社会党国际执委会的成员，在苏联寻求避难的。）在军队中服役的犹太人打仗很勇敢，被授予勋章，甚至还被提升到高位。但是作为犹太人，他们的功绩却没有得到表扬，因为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实际上是被遗忘了。报纸和电台对敌后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不置一词，只是很少地提到奥斯威辛或麦丹尼克的死亡营，或者只简略地提一提，使人看不出牺牲者大多数是犹太人。战后，苏联公民中凡是同纳粹合作过的和仇视犹太人的，都作为卖国贼加以惩罚。但是即使到了这时，对犹太人殉难的情况仍被隐瞒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基辅的情况，在该城被德国人占领时，有五万或六万犹太人被杀死，但却不允许建立任何纪念碑或别的标志来纪念他们。

斯大林在1948年的行动宛如他是以色列新国家的教父一般，这是居心叵测和完全出于权术考虑的。他在联合国中的代表为承认以色列进行辩护，而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它是否合法还是有争议的。（应该记得，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还有苏联和东欧的整个左派，包括大多数犹太社会主义者，传统上就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斯大林鼓励东欧的某些政府，要它们允许

各强国残存下来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甚至还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武器，去从事自己的独立战争。他的这种政策的动机是不难看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斗争就标志着英帝国解体的一个阶段，它将使英国加速从中东撤退。由于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所以斯大林还希望通过这一政策来修补一下苏美关系。这个希望终于成为泡影。此外，以色列很快就成为西方在中东的前哨。于是斯大林就责备以色列领袖们忘恩负义。同时，犹太国的复活，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联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仍沉浸在圣经的传统中，而且正由于他们的人民遭受折磨和暗中的歧视而痛心疾首。当以色列的第一个外交使节果尔达·梅厄夫人出现在莫斯科时，她立即受到同教人的大声欢呼。这件事恰恰发生在斯大林大肆宣扬民族自大和仇外以使人民不受外国影响之时，因而苏联某些犹太人拥护以色列的这种感情深处的突然表露，不能不使斯大林警觉起来。这种自发表示出来的情绪，公然蔑视他维持全社会的那种机械的纪律，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在他的铁板一块的统治中，最微小的裂缝也会危及整个结构。如果允许犹太人在未经批准的游行中宣泄未经批准的感情，他又怎么能够禁止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做同样的事呢？于是他禁止了游行，并命令逮捕和流放了一些犹太人。党的宣传员开始谴责以色列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并责备那些对以色列表示友好的苏联犹太人无耻地抛弃了对苏维埃祖国的忠贞。

这还没有完。犹太人被剥夺了作为一个民族迄今所享受到的权利，即在有限范围内发展他们的犹太人意识的权利，送孩子到国立学校接受用意第绪语进行教育的权利，出版自己的刊

物和报纸的权利，发展自己的文学和戏剧的权利。这样，斯大林就推翻了他任列宁领导下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所一度制定出来的政策。他的借口是，苏联的犹太人已经享有同其他民族完全平等的权利，已经和俄罗斯人“同化”，不再需要坚持过时的分离主义。这种说法多少有些道理，但是从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反应来看，他们的“同化”远不是普遍的或完全的，甚至在最俄罗斯化的犹太人中，由于他们民族最近的悲惨遭遇而激发起一种新的犹太人意识，而斯大林现在所实行的强迫同化措施只能使这种意识更加尖锐和固执。斯大林的官方用民族不歧视的原则来为歧视行动辩护，由于这是在纳粹消灭了几百万犹太人之后不久进行的，就更加令人震惊了。

当犹太人的剧院、刊物和出版社被封闭时，他们个人遭到了清洗。一些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有联系的知名人物也成了牺牲品。他们之中有罗佐夫斯基，他一度是红色工会国际的负责人，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还有大卫·伯格森、伊兹克·佩弗和皮奈兹·马尔基什，他们都是一些著名的意第绪语作家和诗人。所有这些都遭到监禁、判处死刑和处决。一个意第绪语的天才演员米霍尔斯神秘地死去了。接着，一种裹着神秘气氛的恐怖又降临犹太籍的苏联作家头上。外间只是从报纸上间接地知道一点点情况，这些报纸严厉批评“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和“忠贞无常”的人们，其中透露了一些以俄罗斯笔名而为公众所熟知的犹太作家的名字。后来据说，斯大林甚至打算把所有犹太人放逐到比罗比詹的“犹太人自治区”（这是二十年代在接近满洲边境的地方建立的）去，就象他曾经放逐了伏尔加的日尔曼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印古什-车臣人一样。如果他真有

这种想法，那是不切实际的。犹太人受到国家生活中重要部门的一些著名人物在一定程度上的保护，这些人属于工业的管理部门、核研究部门、党的机构、学术界和军队。（在各大学任教的犹太人约有二万人。）但是，国家虽然离不开他们的服务，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上级不信任和下级嫉妬之中，前途未卜，被看成是外国侨民，而又被剥夺了任何文明社会中外国侨民所正常享受的保护。他们感到自己是一种模糊而不祥的阴谋的目标；正是在斯大林的统治结束之前，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黑云越来越浓了。

多年以来，甚至表面上的“集体领导”也没有限制住斯大林的专制；而对他的“个人迷信”甚至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荒谬程度。他被说成是人民的父亲，历史最伟大的天才，所有劳动人民的朋友和导师，人类的光辉太阳，给社会主义以生命的力量。诗歌和报纸文章，公开的演讲和党的决议，文学评论和科学论文——所有这些都充满了这些称号。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一使徒传统中，比起他的先辈来，斯大林不过是一个侏儒。如果说君主专制是靠上帝的恩赐来进行统治的话，斯大林就是靠历史的恩赐进行统治的。他被尊为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国家以其骄傲的崇高地位，据认为是居于其余人类的顶上，但却拜倒于他的脚下。《真理报》日复一日地在头版登载肉麻的《致斯大林的信》，而其他报纸也群起效尤。1949年12月，在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致敬电文如雪片飞来，《真理报》差不多逐封地登载了一年；对他七旬大寿的颂词直到他死前不久还

登在专栏上。著名的莫斯科革命博物馆变成了他的生日礼物的展览，这些礼物从每一个工厂、矿山、集体农庄、工会、基层党组织和学校中大量涌来。同这位独裁者“历史性的生日”比较起来，仿佛中国革命、同西方的严重冲突、朝鲜战争、甚至国内工业建设的业绩都无足轻重了。仿佛二亿苏联公民生活中的唯一目的就是崇敬他和给他送去大量礼物。为了使这种大规模的谄媚行为不致因为单调的重复而使人乏味，那些拍马者还费尽心机地想出一些吹捧的新花样，一些越来越新奇和怪诞的最高级形容词曾使公众为之吃惊。

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亲自使用一切可以想象到的办法来助长对他的颂扬”。他校订了关于自己生平的官方传记，这本传记中本来就有许多“毫无节制的吹捧”，他仍然感到不够，亲自特别加了这样一些句子：“斯大林是列宁事业最好的继承者……是当代的列宁”；“在斯大林同志主持下，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战争的每一个阶段，斯大林的天才发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斯大林对于军事的精通既表现在防御上也表现在进攻上。斯大林同志的天才使他能够推测敌人的计划并击破它们。”最后，就是这种无以伦比的说法：“斯大林从来不允许他的工作由于轻微的虚荣心、骄傲或自我吹嘘而受到损害。”^①就象一个瘾君子一样，他渴望能够过足瘾，就不断增加吸毒的剂量。他似乎仍在企图逃脱已经长久折磨他的自卑感，逃脱内心的不安定，逃脱处于权力顶峰的孤寂感，以及逃脱由于远离下面的人民而产生的恐惧。这种不断吹嘘的效果，就是要使人民在心目中把他看成是一种几乎超自然的和不

^① 尼·赫鲁晓夫：《斯大林的下台》（按：即他在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可动摇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使在他们内心深处也是无法抵抗的。

赫鲁晓夫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斯大林随从在这几年里的情况。式微的凯撒、博恰家族^①在对待他们的仆从方面，也不会比斯大林对待国家高级官员和政治局委员更为轻蔑和反复无常。他“以〔他们的〕名义行事……却不征询〔他们的〕意见……；他甚至经常不把他……关于党和国家重大事情的决定告知他们……在战争的那几年里，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诚然，在1941年10月曾企图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全国的代表都被召到莫斯科来，他们等待了两天……但却没有用。斯大林甚至不打算同他们会见和谈话。”赫鲁晓夫指出，自从消灭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在这方面赫鲁晓夫之流曾积极地帮助了斯大林）之后，斯大林变得特别任性和专横。“斯大林认为，自此以后他就能单独决定一切事情了；他现在只需要一些跑龙套的人；他以这样的方式同他们相处，即他们只能听从和赞美他。”事实上，在摧毁了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之后，斯大林就着手镇压他自己的斯大林派。赫鲁晓夫正好透露了这个大清洗的最后阶段，当时斯大林怀疑他的一些追随者是伪装的托洛茨基派或伪装的布哈林派。因此，他命令逮捕和处决了1934年召开的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的一千一百零八人），以及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百分之七十的成员（一百三十九人中的九十八人）。^②所

① 博恰家族是十五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的一个家族，出了一些教皇、总督等统治者，以残忍，荒淫和野心勃勃而为意大利人民所痛恨。——译者

② 赫鲁晓夫前引书。

有这些人都是斯大林派——教科书中把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说成是“胜利的大会”，因为斯大林派在会上曾庆祝了他们对所有党内反对派的最后胜利。在消灭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斯大林派主要干部之后，生存下来的人就为自己的生命心惊胆战了。赫鲁晓夫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我经常同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布尔加宁交谈。有一次当我们两个人在一辆车里旅行时，他说，‘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作为朋友被邀请去见斯大林；但是当他同斯大林坐下后，他不知道下一步会被送到哪里去：是回家还是进监狱。’”“斯大林是一个十分不信任人的人，有着病态的怀疑。……他能够看着你说：‘今天你的眼睛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今天你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安，而且还避免直视我的目光？’”“他十分任性，要从精神上 and 肉体上把一个人掐死。”战后，“斯大林甚至变得更加反复无常、神经过敏和残忍不仁。……他的迫害狂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自从赫鲁晓夫说了这些话以后，一般都认为斯大林害了偏执狂。但是这不一定说他已经害了严格意义上的精神错乱症。他的半偏执狂行为是由于他的处境而来的；是大清洗及其后果的逻辑结果。他甚至对他自己的追随者都发生怀疑，这倒是不无理由的。这些人曾经同他一道而且帮助过他去迫害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但是当这种迫害转变成1936—1938年的大屠杀时，许多最忠实的斯大林分子也感到震惊，并有些懊悔。他们接受斯大林行动的前提，但不是它的后果。他们曾同意镇压反对派，但不是肉体上消灭他们。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柯西奥尔和其他一些人敢于表达他们的悔恨和怀疑，并对维辛斯基的审判程序提出质疑。他们这样做，

就立即遭到斯大林对他们忠诚的怀疑；的确，他们也正在变得对斯大林“不忠诚”了。在对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时，他们并不是不同意斯大林的一般政治决定，而是谴责他的道德品质，并暗示他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如果他们的行动贯彻始终，就注定了要想法去推翻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他就可能变得比布哈林分子或托洛茨基分子更为危险，因为他们仍能利用自己作为斯大林派领导人的影响和权力来反对斯大林。他不得不认为，他们的言和行是一致的。他不能等着瞧他们是不是利用他们的权力来反对他。为了自保，他不得不先发制人。而且只有消灭了他们，他才能防患于未然。

他陷于恐怖的恶性循环中，即使他的精神是完全健全的，也必然要成为迫害狂。他对周围的人越是采取现实的、清醒的和健全的看法，他就越加不信任他们和害怕他们。他越是免于自我欺骗，他所看到的梦魇就越可怕。他不能既保持自己的权力而又毁灭掉他的整个派别；他不得不挽救其中的一部分，使它继续存在下去，利用它作为自己统治的工具。但是那些幸存者是以什么感情在为他服务呢？象莫洛托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和米高扬这样一些人，都是鲁祖塔克、柯西奥尔、波斯蒂舍夫和爱依赫这些斯大林主义老近卫军的亲密同志，难道他们对这些人的被处决能够无动于衷吗？如果他们的确无动于衷，他们就是没有一点点良心的坏蛋，那末斯大林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忠诚呢？如果他们有动于衷，那末不管他们如何小心地隐藏自己的感情，也不能不对他们残忍的主子感到深刻的不满和仇恨。不论是哪种情况，斯大林都不能按表

面价值来接受他们的服从和忠顺。他不得不怀疑他们，监视他们，警惕他们。有些时候(例如当他咆哮说“今天你的眼睛为什么躲躲闪闪的?”)，他企图洞察他们隐藏着的思想和感情。但是这些思想和感情是猜不透的，因为他作茧自缚，自己造成了这种情况。他既然迫使他的副手和从属们伪装无限的景仰和忠诚，戴上了假面具进行掩饰，那么他现在就无法诱使他们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既然他无从知道他们在伪装的后面可能包藏着什么坏思想和阴谋，那末他们正在策划某种形式的阴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暴君的廷臣是他无限权利的最好见证，他们熟知自己的命运和公共事务的指挥经常决定于他的一时兴致和自负，因此没有人比他们更容易把专制看成是一切罪恶之源。对他们来说，搞阴谋的思想是十分自然的；宫廷叛乱是他们行动方法的特点。

在这几年里，当克里姆林宫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唯一中心时，在克里姆林宫中有没有人企图搞宫廷叛乱呢？斯大林继承者告诉我们的一切内幕消息中，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但是，他们的确透露出，在斯大林的晚年，他的随从中差不多一直在酝酿着一个阴谋。他的最亲近的一些副手们经常处于对他的恐惧之中，徘徊于在职和丢官、生和死之间。即使不为别的，起码为了自保，也必定促使他们采取某种行动；而且如果赫鲁晓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1956年能够那样憎恨和咒骂斯大林，那末这种感情肯定在斯大林生前也在激动着他们，使 they 要试一试去摆脱这个可怕的梦魇。斯大林不可能不感觉到这一点，或者说猜到这一点。

那末，为什么反对他的阴谋又没有形成呢？显然，这些想

搞阴谋的人由于一种强烈的约束力而克制住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尽管是残存的和歪曲了的，但仍反对他们使用“个人恐怖”手段。而更为有力的因素是，这种约束力是来源于集体犯罪和集体责任。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他们的朋友们，曾暗中参加了斯大林的许多罪行，因而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如果想采取暴力行为来割断这种联系，那无异是自杀行为。（甚至当斯大林死后，他们想不用暴力来撇清这种关系，他们发现自己只是大丢其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恐怖首先降临斯大林的追随者头上，当时他们有理由担心宫廷叛乱会毁灭国家的士气和防务。战争使上层的危机暂时中止了。战后，斯大林受到他的胜利的保护——谁又敢动手来反对处于全盛时期的大元帅呢？在新的灾难、新的恐怖和新的失望使那种全盛时期的光荣黯然失色并再次使人们陷入失望以前，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只是到了斯大林的晚年，上层的危机才又重新爆发。沃兹涅辛斯基的倒台和列宁格勒事件就是这种危机的第一次表现。在清洗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之前，曾在意识形态和政策问题上有过长期的和半公开的冲突，这次新的清洗则不是这样。因此，谁也说不清象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那样的人主张什么和他们的失宠预示着什么。也许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政治问题发生过冲突。对于一个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会书记，现在最好还是明智一点，不要去激怒那位领袖，或者牵涉进一件暧昧不明的宫廷阴谋里，不然他就在劫难逃了，而他的命运也就是对别人的一个警告。

赫鲁晓夫说，在沃兹涅辛斯基消失后不久，他同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到斯大林那儿去为他们的同事求情。斯大林向

他们咆哮说：“沃兹涅辛斯基已经被揭露是一个人民公敌；他今天一大早就被枪毙了。你们是想告诉我说你们也是人民公敌吗？”听了这样的话后，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或者不得不要求召开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紧急会议来考虑这一事情，而这就等于发动一次反叛；或者他们不得不退缩。结果他们退缩了。他们知道，甚至在他们企图召集政治局会议以前，他们就会遭到毁灭。在他们设法联系别的成员以前，斯大林就会知道他们的意图，因为每一个成员即使私处在寝室或浴室中，也受到侦察和窃听。而且政治局（更不用说中央委员会了）无论如何也是无力采取行动的。斯大林怂恿它的成员相互猛烈地竞争，以便分而治之。他由于害怕随从们搞阴谋，就无情地用阴谋来对付他们。

这位七旬老翁的健康正在下降，他的精力在迅速地减退。爱伦堡注意到，他一点也不象他在公众场合悬挂着的肖像，看起来就是“一个小老头，脸上爬满了岁月的痕迹”。但是谁也不去想、甚至谁也不敢悄悄地问一下他死后应该怎么办。这位作家继续说道：“我们已经长久地忘记斯大林也是一个终会一死的人。他已经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和神秘的神。”青年一代的诗人叶夫图申科说：“我不能想象他会死，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理解我们怎么会分离。”^①

他的意志仿佛是无所不在的，但他本人却几乎是看不见的。莫斯科人只是在很少的法定节日中在远距离看到他，那时他站

^① 伊·爱伦堡：《回忆录》，第3卷；叶夫图申科前引书。

在列宁墓顶上，接受群众的致敬；或者就是在某些要人的葬仪中看到，那时他为时很短地走在棺材旁，直送到克里姆林宫墙的葬地。大约有五年的时间他没有公开发表一次讲话（除了少数几次外国记者的老一套访问，但记者们几乎不被允许当面采访，他们收到的是书面答复）。正当朝鲜战争初期令人焦虑的日子里，他选择了这个时机来进行一次表态，这一次是在语言学问题上。《真理报》增加篇幅发表了他的一系列信件，攻击尼·雅·马尔学派，这个学派是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的权威解释者。^①斯大林没有受到他在知识上一知半解的限制（他只初步懂得一种外语），大谈语言学的哲学问题，语言、习惯语和同行语之间的关系，聋哑人的思维过程，以及在遥远的将来人类统一在共产主义中所产生的单一世界语言。他在信件中洒下了一点自由主义的玫瑰香水，痛斥马尔学派对苏联语言学的垄断，并抗议它对反对派意见的压制。他宣称，这种做法可以同亚历山大一世的臭名昭著的警察头子阿拉克齐耶夫相匹敌。他看起来好象超然于报纸上正在流行的维护国教的趋势，超然于李森科对非正统的生物学家的攻击，超然于日丹诺夫对于艺术界中“颓废的现代主义派”的折磨，也超然于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和“腐朽的自由派”的运动。他这位政治迫害的教唆者，却在公众面前把自己表现为国家的知识仲裁人，不，简直就是学术自由的保护人。但是，当有些人说，由于苏联已经不再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而是处于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内，现在应该是国家“逐渐消亡”的时候了，也就是应该抛弃政治上的压制了，斯大林却提出一个说法来反对这些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人的意见。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在大部分（而不是在少数几个）国家胜利以前，国家不能开始消亡。这就是说，他用教条主义的语言让知识界“不要头脑发昏”。

他关于语言学的敕令被欢呼为划时代的事件；在几年之中，党的雇佣文人拒绝对他们沉默的主人的经文作任何新的解释，只是不断地引证他关于聋哑人思维过程的学究式说法（见一些自称要启发人民对当代政治事务看法的文章）。直到1952年10月，他才又出来作新的和更为重要的表态，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他在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中给一些院士们的信。^①在考虑苏联所谓的“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他谈及了苏联经济中社会主义工业和半集体半私营农业之间的分裂。他指出，农民的私人利益和贸易正在阻碍国家的进步。他大声地提出警告说：“这些现象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他因此就给全国一种暗示，在统治集团中对于农业政策是有争论的——早先的一个迹象是赫鲁晓夫关于“农业城镇”的想法被正式否定了。斯大林现在又否定了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在五年以后由赫鲁晓夫实现了），即国家应该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斯大林反对这项建议的理由是，不能指望农民能象国家那样去更新和现代化农业机器；而且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他们，就会进一步提高已经阻碍国家计划的农业经济中的非社会主义趋势。他建议逐渐限制农村贸易，并实行政府和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集体农庄之间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直接交换。但是他又坚持说，这只能是一个长期性的解决办法，他没有给党提供如何立即解决农业停滞的建议。他遗留给他的继承人的就是这个困境，即他强迫实行集体化的沉重负担。

1952年10月4日，即他发表那些文章后的第二天，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了。从1923年以来，斯大林还是头一次没有作为主要报告人向代表们讲话。这个角色由马林科夫代替，就象在列宁晚年斯大林第一次做的那样。赫鲁晓夫则提出修改党章的报告。于是全党才理解接班人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了。斯大林远远地坐在主席台后面，成为没完没了的致敬和欢呼的对象。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引述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但没有什么真正的辩论。代表们“百分之百地一致”通过了新的五年计划和党章的修改。只是在闭会的时候，斯大林才站起来讲了几句关于苏联在世界上地位的话。他说，苏联作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堡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它的周围都是一些友好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突击队”，而且由于同这些国家团结和合作，使它执行自己的任务更加容易了。他还号召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共产党“举起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并为所有民族的独立而斗争。他的讲话充满了乐观主义，甚至是很热情的。但是他所说的，正好埋葬了他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这是他统治三十年来最后一次对党和国家的讲话。

尽管斯大林说了一些宽心的话，但代表大会仍然感到难以预测的和凶险的事件已经临近。马林科夫和其他发言者谈到了前面的危险，谈到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的加剧，也谈到需要高度戒备。就象在战前大清洗的前夕一样，四面八方都在高喊提

高警惕。^①仿佛是预见到了要同过去重新划清界线一样，代表大会决定党今后不再称自己为“布尔什维克”。新的中央委员会有二百四十名委员，比旧的多一倍。这个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一个主席团（已经废除政治局），其人数也比它的前身多一二倍。作为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人数都太多，机构十分臃肿。为什么斯大林要这样做呢？赫鲁晓夫后来说，斯大林所以使代表大会选出这样大的中央委员会，是由于他计划通过血洗的手段来缩小它的规模。他采用预备演员的办法，来代替他准备消灭的那些人。赫鲁晓夫进一步说，在新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就恶毒地攻击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但又没有明确指明他指控他们什么——他已经表示过，他怀疑伏罗希洛夫是一个“英国间谍”。据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再次想“干掉”政治局的一些老的委员，以便消灭他的罪行的见证人，因为这些人能够向子孙后代作证来反对他的。^②不管真象究竟如何，反正代表大会以后空气立刻由于恐怖而变得令人窒息。11月，斯兰斯基、克里门蒂斯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布拉格遭到审讯，其罪名是托洛茨基分子、铁托分子、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间谍。这是东欧一系列审讯中的最后一次，也是莫斯科新的审讯的前奏。几乎没有一天不对党和各界的知名人士提出不可思议的恶毒攻击；几乎没有一天不硬说居于高位的人犯了缺乏警惕的罪行；几乎没有一天不阴险地暗示“人民公敌”和间谍渗入国内；也几乎没有一天不大声地反对犹太籍人的“无根的世界主义”。《真理报》严肃地提醒读者说，任何苏

^① 见1952年10月上半月的《真理报》。

^② 赫鲁晓夫前引书。

联公民对其亲属所犯的罪行都负有责任——这种警告从雅戈达和叶若夫时期以来就耳熟了。很少人知道这一条将实用于什么人。不过米高扬的两个儿子刚刚被逮捕了；莫洛托夫的妻子也被从莫斯科流放出去，她是一个老党员，而且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这一年的年底，《布尔什维克》的主编费多谢耶夫遭到贬黜，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之一苏斯洛夫谴责他是沃兹涅辛斯基的同犯。

最后，1953年1月3日，官方宣布，九个医学教授已被揭露出来是美英间谍机关的特务。这九个人都服务于克里姆林宫，作为统治集团成员的家庭医生。他们被控按照美英间谍机关的命令，谋害了党的两个领导人日丹诺夫和什捷尔巴科夫，并且企图谋害瓦西列夫斯基、果沃洛夫、康尼夫、什捷缅科等元帅和其他人，以削弱国家的防务。这些“穿着白大褂的暗害者”大多是犹太人，被控是按照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国际犹太人组织的唆使行动的。据宣布，这个阴谋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调查清楚，于是关于提高警惕的号召和反犹的喧嚣就达到了顶点。

这次对克里姆林宫医生的控告不过是一场正戏前的小戏。他们身为医务人员，在政治上是很小或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他们不可能是那种为自己而努力夺取权力的人。如果对他们进行审讯，起诉书中将不得不把他们说成是怀有更大政治野心的人的猫脚爪，是那些醉心权利和以此为职志的阴谋者的从犯。这样的阴谋者只能出自党统治集团中居于高位的人，因而对于这次阴谋的“真正”指挥中心的揭露将会轰动一时，成为这次医生审讯的高潮。这场审讯的舞台监督暂时还在忙于迫使医生们“坦白”，让他们准备按照自己分配的角色去进行演出。这些医

生们面临一个伪证，这就是某个叫做蒂马舒克的医生给斯大林写的一封检举信（蒂马舒克因而在列宁逝世纪念日获得了列宁勋章）。赫鲁晓夫描述了斯大林如何亲自监督讯问并命令把犯人带上镣铐和进行殴打。他对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杰夫说：“如果你拿不到他们的口供，我们就砍你的脑袋。”后来他把医生们的口供材料让主席团成员传阅，但他没有允许他们过问这个案件和核实那些指控。他感觉到他们的怀疑和不安，就嘲笑他们说：“你们就象一群瞎猫。如果没有我，这儿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国家将要毁灭——你们就是不知道怎样识别敌人。”

主席团的成员们有一切理由感到困惑和惊恐。虽然这次案件在很多方面使人联想起老的清洗审讯，但它也有一种惊人的新奇特点。在那几次老的审讯中，被告除了被控其他罪行以外，总是说他们企图谋害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党的领导人。现在这一次审讯这一点就更具有重大意义了。“阴谋者”企图暗害的人简直就是斯大林高干名单中的人。在这次审讯中，检查官、法官和报界都将告诉全国：“这些人都是我们不可缺少的领导人，我们不能不需要他们的服务。敌人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就要千方百计地消灭他们。”如果某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没有包括在这个特殊的高干名单中，那他实际上就是失宠了，因为如果“人民公敌”都不想去消灭他，那末他或者是不配居于高位，或者就是同他们互相勾结。

医生案件令人感到惊异的新奇之处，在于被告们不是被控企图暗害现存的党的某一领导人——只有早已死去的日丹诺夫和什捷尔巴科夫被说成是他们的牺牲品。指控中故意地强调一点，认为医生们的目的全在于消灭军队的首脑。这种奇怪的

情况，即硬说敌人只选择元帅们和将军们作为自己的目标，使党的领导人们大费思索。他们不得不考虑这种说法的寓意究竟何在。显然，策划这个阴谋的人就是想把军方作为崇拜的偶像，而对文职的领导人进行诽谤。究竟是谁发明了这种说法呢？看样子是军队的情报系统而不是国家安全部。这两个苏联的情报部门互相进行竞争，这已是昭然若揭的事了；显然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杰夫是不愿执行这些命令的，所以斯大林才不得不用“砍脑袋”来威胁他。内务部长贝利亚也不大可能是阴谋的发起者——几年以后，当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把他作为斯大林的帮凶和叛徒加以“清算”时，他们也没有指控他同医生案件有何牵连。但是，如果说阴谋的发起者来自军方，那末斯大林又为什么支持他们呢？是不是他着眼于接班问题而鼓励将军们出来争取权力呢？如果是这样，这对党的领导们又预示着什么呢？他们是不是要被撤职和消灭掉？是不是因此斯大林才攻击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和安德列耶夫？这是不是他的最后一次清洗，他同已被他贬低和流尽鲜血的党的最终决裂？他一只脚已经进入坟墓，难道还想演出或帮助将军们演出布尔什维克多年来一直害怕的波拿巴政变？究竟斯大林这样做的利益何在？他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了；党的领导人们也不比子孙后代更能解开这个谜，因为斯大林的动机和行动看来是完全脱节的。

除了在争夺权力上进行斗争，在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也有过斗争。斯大林继承者之间在1953年和以后表面化的分歧，甚至在很早以前就使他们分裂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集团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集团之间的分歧（赫鲁晓夫采取骑墙态度，而军方则始终作为后盾），是早已经存在的，虽然由于斯大林活

着，妨碍他们自由交换意见，以致这些集团还不能明确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使之具有一定的形式。大多数的斯大林随从知道和感觉到，国家这口大锅已经热得过分危险，需要打开它的安全阀门。但是斯大林却以其阵发性的余勇，关上了这个阀门，而且把它拧得紧紧的。准备重复 1936—1938 年的政治迫害，更使这口锅的压力大增，并加剧了苏联同西方的紧张局势。在克里姆林宫的每张床下，在每个办公室、科研机构、犹太人家庭和知识界中去疯狂地搜寻美国间谍，这被公认是犯了精神病。但是假设这个国家正在准备战争，那就能够从这种疯狂行为中理出一个头绪来了。只有在准备战争的情况下，斯大林决定提高元帅们和将军们的地位，使他们出足风头，这才有点道理可说。同样，他醉心于保密（即使对他来说也搞得过分认真了），坚持猛增军事开支，以及其他一些措施，也只能说他打算使国家转变成为一座兵营，并准备好随时击退某个敌人的进攻。

也只有这样，斯大林外交的僵硬和粗暴才能得到解释。朝鲜战争在拖延着，斯大林以诸如交战双方对战俘的处理未达成协议等微不足道的借口，阻止谈判已久的停战协定签字。斯大林显然是不愿让美国军队从朝鲜脱身，从而在冷战的其他地区得到行动的自由。事实上，他的外交是静止不变的，而这是由于各种互相冲突的政策所造成的僵局使然的。在克里姆林宫中仿佛有一个“主战党”和一个“主和党”在争吵不休，而暂时之间两者又处于僵持不下。这并不是说，政府中有势力的分子是真正主战的和斯大林在赞助他们。国家由于上次大战的大屠杀尚处于十分衰弱的情况中，甚至最玩世不恭或最缺少现实感的政策制定者也不可能潜心于策划军事侵略。分歧勿宁说集中于对敌人

意图的估计上——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不会进攻苏联或东欧。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它在二十年代曾进行过辩论，还将在未来呈现在苏中的争论中。斯大林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曾把它作为一个争论的问题提出来，他公开宣称，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斯大林尽管作了乐观的声明，却是在那儿撒谎。他表面上消除了对美国进攻的顾虑，实际上却发动了或默许了根据进攻威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制定的行动方针。因为只有假设华盛顿正在计划战争，才有理由来刺刺不休地谴责美国战争贩子，把克里姆林宫医生说成是为某个美犹组织服务的暗害者，使整个国家动员起来和歇斯底里大发作，使美国军队缠在朝鲜脱不了身，以及使苏联及其卫星国保持持久的警戒和军事准备。

外交政策上的这个两难问题自然要影响到国内政策。那些主张国家必须在物质和精神上立足于战争的人，是不可能赞成将使政治纪律放松和把国家经济资源作有利于民需分配的任何改革的。另一方面，任何鼓吹国内改革的人，由于他们态度的逻辑结果，必然指望同大西洋联盟国家实现和解，要求在外交上更加主动和灵活，并希望实现能使国内气氛安定和正常的“国际形势的缓和”。对于这些人来说，任何改革没有问题地都会恢复国家的公民自由，为代议制的政府铺平道路，并捍卫住革命的传统。他们的目标虽然是很温和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使国家摆脱斯大林主义恐怖的疯狂，并使统治的方法合理化。在外交政策上，他们的目标必然也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知道，

冷战不同于任何军事冲突，是不能由军事谈判代表举着白旗去安排停火而宣告结束的。但是，即使在冷战中，苏联和西方也还存在着广阔的余地，可以进行更为真诚的接触和交涉，以达成富有成果的相互让步。（但是，更为彻底的计划和雄心壮志也已经在考虑之中，例如，贝利亚已经在考虑苏联从柏林和东德撤出的意见，这个意见很快就使他丢了脑袋。①）

然而，只要斯大林还在当权，一切改变和改革的道路都被阻塞了，形势一天天地变得更具有爆炸性和更难以预测。斯大林喜欢吹嘘自己在战略上的精明和现实主义。他曾轻蔑地谈到象希特勒那样的“贪婪的征服者”，他们“志大才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②他说，他不是希特勒；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这种吹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斯大林在同他以前的盟友的军事冲突中曾一再地在边缘上停了下来。他曾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停了下来，他曾在伊朗问题上停了下来，他曾在用军队进攻铁托之前停了下来，他曾在柏林封锁还没有引起最后灾难前停了下来。他准备在朝鲜战争所引起的冲突中走到多远，我们还不清楚。他周围的人现在正纳闷：“他是不是还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呢？”

① 但是，这些分歧只是在斯大林死后才明朗化的。赫鲁晓夫在贝利亚被处决后才把苏联从东德撤退的计划归咎于贝利亚。海因兹·勃朗特偶然证实了这个说法，并描述了贝利亚在柏林的建议。他1950—1953年时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东柏林书记，后来逃到了西德。见海·勃朗特：《东德1953年6月17日的人民起义》，载于《评论》（1959年10月），这是由布鲁塞尔伊姆雷·纳吉研究院出版的一个季刊。

② 见斯大林在战时对英国外交大臣的谈话，载《艾登回忆录，结帐》，第413页。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不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去触怒和伤害这个国家。他完全不明白他已经陷入了道义上的危机。他没有认识到，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可能再继续实行他的那种统治方法，他的各种思想同国家的需要和时代的现实情况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这个国家已经长大了，不再需要他的监护，也不再能容忍这种监护了。他的思想看来还固定在二、三十年代。在他心目中，苏联就仍然还是一个工业化以前的和大部分是文盲的原始社会，而他就是在这种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他不能使自己适应于本世纪中叶的苏联，这时苏联一部分不顾他的想法，一部分又是在他的鼓舞下，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使它的社会结构现代化，并教育了它的群众。这个转变仍在继续之中，要使它的结果真正造福于国家，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但是也还得承认这样的事实：“斯大林在发现俄国的时候，它还在用木犁耕种，而当他离开它时！它已经装备了许多原子反应堆了。”^①虽然说来，木犁时代在国家生活的很多方面还是迟迟地不愿离去。对斯大林统治的这个总结，当然是对他的成就的一种赞颂。但是，在斯大林主义中，木犁和原子反应堆也是奇怪地共存着的，就象原始的野蛮和马克思主义共存着一样；而且当国家已经前进了，而斯大林政权的倒退因素却不断地阻碍它的进步，并威胁着要使它停止前进。

斯大林反复无常的专制主义从旧式农民的懒散和麻木中吸

^① 这句话引自我对斯大林的唁文，发表于1953年3月6日《曼彻斯特卫报》。

取力量，工人阶级甚至也从这类农民中招募新成员。但是，这类农民同业已存在的巨大的城市和工业社会是完全不协调的。他和他的宠臣们从克里姆林宫过分集中地控制全国经济，这在“原始积累”的早期阶段可能是有用的，当时必须调度国家极其有限的资源，监督每一吨钢、煤或石油都必须运往适当的生产点，并按照规定的方法加以使用。但是对于一个巨大的、技术上先进的和复杂的工业制度，这种方法就绝对地有害了。同样，斯大林政府用强制的方法使千百万农民进入工厂，对他们加以生产技术的训练，并使他们固定在那种职业上，这在劳动力和生产技术极端缺乏的情况下，部分说来是情有可原的。斯大林通过工资差别和斯达汉诺夫运动来鼓励不平等，虽然是冷酷无情的，多少也还能说明他进行建设的决心。但是，当工业技术熟练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强制和过分的不平等，就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使广大工人群众变得冷淡而沉闷。一般来说，起初由于防止反革命破坏“十月革命成果”而必须使用的恐怖手段，当新的社会结构已经巩固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时候，它就越来越有害了。一再进行的政治迫害和清洗，破坏了群众和官僚机构的一切社会主动性和责任感。对领袖的迷信，给愚昧无知的农民群众提供了“父亲般的形象”，代替了上帝和沙皇，这对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异是一种侮辱，因为他们勤奋地在使国家现代化，渴望吸收现代科学，使自己在文化上达到成熟。

我们在前面说过，斯大林主义是用野蛮的方法使俄国摆脱野蛮状态。^①我们现在应该补充说一下，这个方法也不能无限

^① 见本书第 650 页。

地应用下去。在斯大林的晚年，由于他使用的方法，他的政权的进步影响越来越不起作用了。苏联为了使自己继续文明化，就不得不摆脱斯大林主义。其中最迫切的就是摆脱斯大林主义教条对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哲学、经济学、文学和艺术的干预——这种干预使人联想到宗教法庭的时代，那时它为整个基督世界决定在上帝、宇宙和人方面什么思想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在苏联各大学中，爱因斯坦的著作在1953—1954年以前一直是受到禁止的，弗洛伊德的思想也是一样。这种神学或官僚教条对于科学思想的侵犯，本质上是属于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本世纪中，苏联的行为等于是在故意破坏科学、技术和国家防务。这种破坏行为即使对最狭隘的宗派利益也是毫无好处的，而一切有教养的人都急于要防止它。为了做到这点，他们首先必须驱散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仇外思想的迷雾。在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时代中，这种迷雾使他们的国家脱离了全世界的运动，并助长了莫斯科公国民族精神的排他性倾向。斯大林主义的孤立，如果说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时还是很有道理和很现实的，那末现在就是十足的荒谬了，因为它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科学只在一个国家胜利了。当苏联的命运已经同世界其余地区的命运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民族自我中心的思想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时代错误。即使从斯大林主义的观点看来，这种对古俄罗斯母亲的反常的歌颂，也不可能同近年来革命的发展相调和。现在人类的三分之一已经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但是斯大林主义仿佛还认为它的领域只限于古老的唐波夫省或土拉区。克里姆林宫丧失了一切时间观念。

“医生阴谋”的丑闻最终暴露了道德上的败坏。斯大林对待犹太人的暧昧行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关于世界犹太人反苏阴谋的说法，本身就有一种“犹太长老议定书”^①的气味，而且类似戈培尔宣传部的编造。如果这个阴谋得逞——如果医生案进行审讯的话——它只可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全国规模地屠杀犹太人。但是，曾制造这一阴谋的政府仍然宣称信奉马列主义，仍然成百万地出版着无产阶级几个国际奠基人的作品，也仍然在学校的必修课程中包括这些作品的学习。斯大林现在是在连根摧毁革命、党和国家赖以生存的思想；是在消灭他自己政权的出生证和意识形态所有权状。由于这个行动，斯大林主义甚至在他的作者去世以前就在自杀了。党尽管已经变质和显得荒谬愚蠢，也不能跟着斯大林朝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走下去。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无数的先进分子也不会这样做。这件丑闻只能加速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并准备好了一次突变。在斯大林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个案件就收场了；这些医生的完全恢复名誉，则是这个国家同斯大林主义决裂的头一个表现。^②

我在1948年总结斯大林的统治时说过：“不能把斯大林归入希特勒一类的人物中去；在所有的暴君中，希特勒的记录是最不足称道和最无价值的。希特勒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反革命领袖，而斯大林却是一场悲剧性的、自我矛盾的、但又是创造性

① 十九世纪末一个有关犹太复国的伪造文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俄国曾加以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希特勒利用来反犹。——译者

② 艾·多伊彻：《斯大林以后的俄国》，第6章：《道德气氛》。

革命的领袖和开拓者。”^① 如果要对斯大林的全部事业进行评价，上述的说法也仍然是正确的。我还继续说过：“斯大林事业中最好的部分，肯定要使斯大林流芳千古，就如同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事业中最好的部分也使他们流芳千古一样。”这些话也是站得住脚的。但还必须补充一句，在斯大林的晚年，他统治中的一些最坏的特征更加严重和扩大了。这种情况只是加重了下述结论的分量：“为了挽救斯大林事业中最好的部分于未来，为了使它具有充分的价值，历史还不得不严格地净化和重整斯大林的事业，就如它曾经净化和重整克伦威尔以后的英国革命和拿破仑以后的法国一样。”现在我们知道，从斯大林死的那一天起，历史已经开始净化和重整的过程——但是“历史”在这儿并不代表任何最高的意志、时代精神或抽象的规律，而是代表人类为了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而被迫采取的有效行动。正是由于苏联社会在这个伟大而阴沉的时代中的需要，以及这个社会由十月革命继承下来的理想，推动这个社会中具有进步思想的分子同斯大林主义决裂。在四十年代晚期，似乎还可以怀着乐观的情绪希望：“从长期来看，这些积极而宝贵的成分可能会要反过来反对斯大林主义坏的方面。”这种愿望现在也已经实现了，虽然斯大林主义遗产中不一致的成分之间的斗争甚至在六十年代中期都还没有最后解决。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头一个十年左右，苏联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十月革命唤醒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又进一步刺激了进步的社会经济热忱，但几十年的集权统治和所有政治思想和行动独立中心的被消灭，又使它的道德和政治退化，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很大的矛盾。苏联的统治方法和生

^① 见本书第 652 页。

活方式都必须作一次全国性的剧烈变化，但却没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来实现它，或者以明确的态度来提出这种迫切的要求，虽然在人民群众中却存在着这样的力量。正因如此，就不会马上发生推翻官僚专制主义的革命，也不会从社会底层产生要求逐步改革的有组织的运动。改革只能从上面、从统治集团本身、从斯大林的追随者和同伙中而来。这种情况事先就决定了所谓非斯大林化的迟疑不决、矛盾百出和机会主义的性质。

顺便谈及，从上而下地通过纯官僚主义方法来实行俄国生活方式的重大而拖延很久的改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百年前，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死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发出了废除农奴制的命令。这是革命前俄国全部历史中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当沮丧的农奴主感到沙皇背叛了他们而提出抗议时，亚历山大答复说：“从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度，要比从下而上地开始废除它好得多。”同样地，在斯大林的晚年，他的继承者也决定，从上而下地废除斯大林主义的坏的方面，要比从下而上地废除它们好得多。但是，正如沙皇半心半意地解放农民使俄国的巨大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样，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也仍然没有满足苏联的社会主义愿望，而且它渴望已久的自由仍然遭到挫折。历史仍然需要完成对斯大林事业的“净化和重整”过程。

斯大林的死讯是1953年3月6日早晨宣布的。按照官方的医疗公报，他六天前患脑溢血，全身瘫痪，丧失说话和意识能力。3月4日晚上，第二次发作影响了他的心脏和呼吸器官。

第二天下午九点半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斯大林的病期很短，使他的继承者刚刚来得及考虑如何面对全国和在党与国家上层职务的重新分配上达成临时协议。按照报道来看，全国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很矛盾，而这是斯大林复杂而暧昧的性格所引起来的。一些人痛哭流涕，另一些人感到宽慰，而更多的人惊得目瞪口呆，不愿想到未来。他的继承者们则小心谨慎地行事。他们过去只不过是斯大林的影子，但现在不能仍作为他的影子来统治这个国家。他们不想象生前那样地对死者进行令人作呕的恭维，但又害怕不这样做会有坏处。甚至那些久已渴望摆脱对他个人迷信的人（他们在这种迷信中曾充当了高级的祭司），一想到任何看来是对斯大林亵渎的行为所可能引起的骚乱，都不觉为之吃惊。因此，在斯大林的葬礼中，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都异常克制地低声赞颂他的优点。当丧礼进行时，大量的群众自动地拥入红场；由于当局没有预料到这样大量的人拥入，民兵们无法加以应付，于是群众自相践踏，许多妇女和孩子死于非命。这种灾难在过去沙皇的葬礼或加冕典礼中是经常发生的。

斯大林的棺材被放到红场列宁墓的墓室里，同列宁的棺材并列。晚上，斯大林的名字被写在列宁墓外墙上列宁名字的下面。但是，现在他的尸体已经从那个圣殿中撤出，他的名字已被抹去。那些被斯大林鬼魂缠身、并为他统治的遗产感到不知所措的后代子孙们，仍然无力控制和超越他，只能暂时地把他从记忆中忘掉。

译者的话

斯大林的传记作品很多，但译成中文的还不多见。解放以前，曾出版过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解放以后，国内流传着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传略》，1963年三联书店又内部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在这三本书中，前两本是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的情况下写的，因此对斯大林的评价充满了溢美之词；而后一本则因作者完全出于敌对立场，所以对斯大林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诽谤。

多依彻的《斯大林政治传记》多少是一本不同类型的作品。作者标榜自己不是从党派性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写作的，要努力做到客观主义。他当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在书中也勉强地承认这是不容易的事，所以要努力以赴），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倒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正反两面的材料，以及一些正确的解释和荒谬的解释。所有这些都供我们参考和进一步研究。

作者对于十月革命、列宁的领导、苏联的成就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等，都是执肯定意见的。但是他对斯大林的作用却是有褒有贬，褒中寓贬。他把斯大林的作用和成就作为历史不可避免的事而加以接受。因此他说，在他所描绘的这幅画像中，斯大林从正面看是列宁的子孙，从侧面看是伊凡雷帝的子孙。又说，斯大林是用野蛮的方法来消灭俄国的野蛮状态。可以说，

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思想。

应该指出,本书还存在其他许多缺点和错误。例如,它对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了一些正确的话,但有些地方也
是胡说八道的。作者虽然标榜客观主义,但可以比较明显地看
出,他在书中是在扬托洛茨基而抑斯大林的。他对斯大林心理的
描述,有些资产阶级评论者认为是一大特色,但在我们看来,许
多地方都是主观臆断的。至于作者在书中非常喜欢进行的历史
类比,除个别几处还有启发作用外,大部分都是庸俗和肤浅的。

本书作者艾萨克·多依彻,1907年生于波兰,1926年参加
波兰共产党,1926—1932年编辑党的刊物。1932年因反对斯大
林主义被开除出党。1939年以后他定居英国,直至1967年死
去。他先后在英美等国担任记者和教授,著作很多,主要著作有
关于托洛茨基生平的三部曲。从作者的观点来看,他是托洛茨
基派,但据皮埃尔·弗兰克1969年所著《第四国际》一书,他
在1938年时曾反对成立第四国际;虽然弗兰克也说,他的著
作,特别是有关托洛茨基的三部曲,对托派运动的基本思想有
“不可估量的作用”。

于 干

一九八二年四月